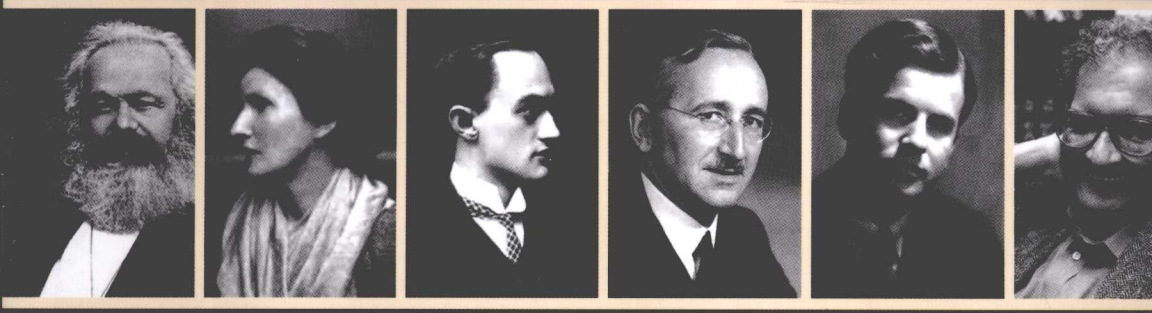
《美丽心灵：纳什传》作者新作



推手

改变世界的经济学天才

NLIC2970894483

[美]西尔维娅·娜萨 著

马韧 译

Grand Pursuit

THE STORY OF ECONOMIC GENIUS

人民文学出版社

畅销文库

从马克思到哈耶克，从西德尼·韦伯到密尔顿·弗里德曼，娜萨将那些改变了经济学格局的经济学家描写得活灵活现。她借由讲述经济学家们极其翔实的故事追踪现代经济学思想的发展轨迹，而正是这些男男女女改变了我们对生活中存在的可能性的看法……从许多层面而言，这本书都非常令人着迷。娜萨的上一部作品《美丽心灵》讲述的是一个叫约翰·纳什的经济学家的故事，但其实娜萨的心灵也同样美丽。因为一颗并非同样美丽的心灵无法写出一部如此丰富，感人，重要，同时充满趣味的作品。

—— 米奇·爱德华兹 《波士顿环球报》

这是一次对经济学思想和人物的令人着迷的走访，正是这些思想和人物使我们能享受到人类在其以往的历史中难以望其项背的生活……曾经写出过《美丽心灵》的娜萨被知识界的巨匠们吸引了。这些巨人们以他们独特的步伐从《推手》一书中极具可读性的每一页上踏步而过。全书还弥漫着大卫·麦卡洛讲述大众化历史的风格……这些书页让这门所谓的悲观的科学显得格外亮丽。

—— 凯伦·郎 《克利夫兰正直人报》

从维多利亚时期的伦敦到现代的印度，娜萨的目标是将读者带入书中人物生活在其中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去。她极为成功地展现了她所做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以及行文的典雅。

—— 斯蒂芬·帕尔斯泰因《华盛顿邮报》

娜萨是位极其出色的作家……本书就像是经济思想家们的一次肖像展，每个人都按他所生活的时代和地点被描绘得活灵活现……你会不由自主被他们的生活经历吸引得手不释卷。

—— 詹姆斯·格兰特 《华尔街日报》

这是一个关于激进的能改变我们这个星球的思想是如何演变而来的故事……画面如史诗般宏大，而细节却那么的生动鲜活，有时甚至有些恐怖……然而，从这些翔实而复杂的细节中，我们却能看到许多粗糙却关键的概念在闪闪发光。我真希望大学里的经济学入门课程能像本书一样有趣。

——《财富》

《推手》是一部有血有肉，充满激情和温馨的关于经济学的历史……风格让人联想到她1998年出版的畅销书《美丽心灵》……绝对是一本好书……不但在经济学家的研究中应占有一席之地，每一位严肃的读者也需要在自己的床头柜上摆上一册。

——《经济学人》

ISBN 978-7-02-009712-8
9 787020 097128 >
定价：58.00 元

推手

改变世界的经济学天才

[美]西尔维娅·娜萨 著

马钧 译

宁波大学图书馆 藏书 NLIC

Grand Pursuit

THE STORY OF ECONOMIC GENIUS

NLIC2970894483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13-0955 号

Sylvia Nasar

Grand Pursuit

Copyright © 2011 by Sylvia Nasar
Published by arrangment with The Robbins office,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2013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推手：改变世界的经济学天才/(美)娜萨著；
马韧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ISBN 978-7-02-009712-8

Ⅰ. ①推… Ⅱ. ①娜… ②马… Ⅲ. ①经济学家-生平事迹-世界 Ⅳ. ①K815.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33450 号

特约策划：吴文娟
责任编辑：曾少美
封面设计：高静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496 千字
开　　本 72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35.5
版　　次 2013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712-8
定　　价 58.00 元

目 录

前 言 十分之九的人类 /001

第一幕 希望

序 幕 好好先生与守财奴 /009
第一章 焕然一新：恩格斯和马克思在神奇年代 /018
第二章 无产阶级的存在是必然的吗？马歇尔的守护神 /056
第三章 波特女士的职业：韦伯夫妇和家务管理型国家 /101
第四章 黄金交叉：费雪与货币错觉 /150
第五章 创造性的破坏：熊彼特与经济演变 /183

第二幕 恐惧

序 幕 世界的战争 /211
第六章 人类的末日：熊彼特在维也纳 /221
第七章 欧洲奄奄待毙：凯恩斯在凡尔赛 /249
第八章 忧郁的街道：熊彼特和哈耶克在维也纳 /277
第九章 无形的思维方式：凯恩斯和费雪在20世纪20年代 /296
第十章 结构性难题：大萧条中的凯恩斯和费雪 /323
第十一章 实验：20世纪30年代的比特丽斯·韦伯和琼·罗宾逊 /356

第十二章 经济学家的战争：凯恩斯与弗里德曼在财政部的较量 /373
第十三章 流亡：二战中的熊彼特与哈耶克 /392

第三幕 信心

序 幕 无所畏惧 /403
第十四章 过去与未来：凯恩斯在布雷顿森林 /410
第十五章 来自奴役之路：哈耶克与德国奇迹 /419
第十六章 统治的工具：萨缪尔森到了华盛顿 /430
第十七章 巨大的幻觉：罗宾逊在莫斯科 /448
第十八章 命运之约：森在加尔各答与剑桥 /467

尾声 想象未来 /483
鸣谢 /486
注释 /489
图片来源 /548

前　言

十分之九的人类

世上众多的国家和民族对富庶生活的体验都极其短暂。从古至今，他们中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在贫困中度日。

——约翰·加尔布雷思[①]，《富庶的社会》，1958年[1]

虽然生活的苦痛偶尔也能得以缓解，但人们更常遭遇的却是这样或那样的不幸，作为一个种族而言，人类十有其九都是在含辛茹苦中悲惨度日。

——埃德蒙·伯克[②]，《对自然社会的辩护》，1756年[2]

人类与经济需求之间的关系终会改变：人类将能游刃有余地应付他们所面对的物质条件，而不是相反地被之束缚。对这种标新立异的观点，简·奥斯汀（Jane Austen，1775—1817）从来都是嗤之以鼻。

就以这位《傲慢与偏见》的作者所栖身的辉煌的乔治王朝[③]而言，当时的英国拥有“举世罕有其匹和令人瞠目的巨大财富，或为世界各国所称羡”。作为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公民，她正好亲身经历了破除迷信、愚昧和专制的欧洲启蒙时期。[3]她出生于一个英国的中等阶级家

① John Kenneth Galbraith（1908—2006），美国经济学家、新制度学派的领军人物。

② Edmund Burke（1729—1797），18世纪英国著名的政治家和保守主义政治理论家。

③ 指1714年至1830年，从乔治一世延续至乔治四世。

庭，当时的“中等”意味着非比寻常，是普通平民的反义词。与《傲慢与偏见》中的本内特先生甚至是《理智与情感》[4]中的达什伍德小姐相比，简·奥斯汀的家族简直就是个穷光蛋。即便如此，他们家一年总共二百一十英镑的进项也还是超出了当时英国百分之九十五的家庭的收入水平。[5]尽管为了生活免遭“困苦、破败和沦落”，她也曾被迫从事过一些“庸俗的经济”活动[6]，但她的家族仍然拥有房产和闲暇的时间，能够自由择业，可以上学，读书，写作，以及涉猎诸多的报刊。简和她的妹妹卡桑德拉都未曾像《爱玛》中爱玛的情敌简一般，因生计所迫而出任别人的家庭教师，她们也都不曾下嫁一位并非自己所爱的男人。

用一位传记作家的话来说，在奥斯汀家族与所谓的“下层”人之间横亘着一道鸿沟，这是绝对而且毋庸置疑的事实。[7]哲学家埃德蒙·伯克曾如此描述一群矿工的悲惨境遇，他们“几乎终日身陷地底，见不到阳光；虽然他们从事的是最累最枯燥的活计，但他们从中得不到哪怕是一丁点的盼头。即便吃的已经是最粗糙最下等的粮食，他们仍然常常食不果腹。他们的健康遭受严重的摧残，寿命也因之被减短。”[8]尽管如此，从生活水准来看，这些“不幸的人们”其实还算是相对幸运的。

当时英国的“平民”指的是在农场干活的劳力。[9]按经济历史学家格列高利·克拉克的说法，他（“平民”）的物质生活水准比古罗马的一个普通奴隶高不了多少。他的农舍除了一间黑洞洞的屋子以外别无他物，他年复一年终日与妻儿和家畜们相依为命。他唯一的取暖源是做饭时点燃的冒烟的柴火。他仅有一套聊以蔽体的衣服；从无车马代步，一生中从未出过远门。他仅有的消遣是男女的交媾和偷偷打猎。他无处医病，目不识丁。他的儿女们自幼便被派去放牛，或在农田里驱赶乌鸦，一直到他们长大成人，把父辈的饭碗继承过去。

收成好的时候，他吃的只是最劣等的粮食——麦麸。可别以为它是如今的面包和麦片粥的样子。连土豆都是他难以企及的奢侈品。（“土豆当然是你们贵族才有的好东西了，不过种植它们一定得花不少钱吧。”一个村民曾如此对简的母亲说过。）[10]据克拉克估计，当时的英

国农场劳工平均一天仅摄取区区一千五百卡路里的热量，这相当于如今新圭亚那（法属）或亚马逊丛林中的一个原始部落成员三分之一的水平。[11] 他不单要忍受粮食的长期匮乏，而且一旦面包价格出现巨幅波动，他面对的将是不折不扣的断粮与饥饿。十八世纪的人口死亡率对农业歉收和战争时期的高通货膨胀极其敏感。[12] 尽管如此，当时的英国平民与同等地位的法国或德国人相比还是要富裕得多，以至于伯克在其书中向他的英国读者们保证，“英国国内奴隶制的诸般卑鄙和恐怖的行径，与世界其他各地的情形相比远不值一提。”[13]

天命难违。重商主义和工业革命使这个国家的财富急剧膨胀，但即使最精明的观察家也不得不承认，所有这些都无法把人类从上帝为他们设定的贫穷和“世代辛劳”的宿命中解脱出来。在当时，人的社会地位是与生俱来的，自己无法作主。当一位忠诚的仆人去世以后，他或者她也许能得到“他无怨无悔地在命运为之安排的位置上履行了他的职责”的称赞。[14] 因此，乔治王朝时期的改革派，帕特里克·科区杭在提出其“国家应该负责贫困儿童的教育”的改革建议时，不得不在序言中开宗明义地保证，他的建议并非是要“让那些穷孩子能受到与他们社会阶层不相匹配的高等教育”，以免“那些命中注定要一辈子当劳工和下层人的家伙们”逐渐心生不满。[15]

在简·奥斯汀的时代，每个人对自己所属的社会阶层都了然于胸，而且从不会有人对现状提出质疑。

简刚刚去世五十年，这个世界便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人类的财富、奢华和生活品位在突飞猛进”[16]，也不仅仅是在此期间，那些身处社会底层已经绝望了的人们的生存环境有了前所未有的改善。罗伯特·吉芬，这位维多利亚时代的统计学家就曾特别向他的读者们指出，奥斯汀时代的工资水平只相当于现在的三分之一，“事实上，五十年前，在全英国范围内，周期性的断粮挨饿对人数众多的劳动阶层而言还是家常便饭。”[17] 最大的变化在于，人们逐渐感觉到，那些被承袭了千百年的条条框框已经慢慢开始松动。如今，问题的焦点已不再是社会是否需要变革，而是变革该以何种规模和速度进行，以及需

要为之付出何种代价。最大的变化还在于，人们已经意识到，这种变化绝非偶然，也并非拜天所赐，它是人类理想、意志和知识的结晶。

人类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人的命运并非前世注定、一成不变，或绝对不可更改。这种观念是有史以来人类最激进最革命的发现之一。它使人们开始质疑以往被奉若圭臬的人类应该臣服于上帝和自然的教条。这种新观念认为，若是拥有了新型工具，人类必将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它呼吁人民大众起来呐喊与行动，而不是悲观放弃，任人宰割。1870 年之前的经济学几乎全都是在灌输你不能做什么，而 1870 年以后，讲的则几乎全是你能够做什么。

“绝大多数经济学研究都源于一种良好的愿望，希望为人类整鞍备马，将之送上文明的坦途。”近代经济学之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①]曾经这样写道。与宗教、政治和军事等领域相比，经济范畴内的可能性研究在当时风靡一时。维多利亚时代的学者们对经济学如醉如痴，他们当中为数众多的人把写出一部经济学巨著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在自然科学迅速发展的鼓舞之下，他们开始规划出系统的程式以便探索出一个“极具创造性也极其有效的社会机制”，这种机制不但能创造出史无前例的物质财富，而且还能带来同样丰富的新的机会。最终，新经济学改变了这个星球上每一个人的生活。

您手中的这本书并非一部经济思想的发展史，它讲述的是一个故事：有一种观点，它萌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黄金时代，但接下来的两次世界大战、独裁政权的崛起以及经济大萧条让它在那段灾难深重的年代里饱受非难，但二战结束之后，在第二个黄金时期来临之际，它又得以复兴。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曾将近代经济学称为一个“器官”，在古希腊语中它是“工具”的意思，它不是一套系统的知识体系，而是一个对于发掘真理极其有用的“研究推动器”。正如这个名称所暗示的，它是一个实践的过程，它永远不会尽善尽美，永远不会终止。它总是需要

① Alfred Marshall（1842—1924），近代英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新古典学派的创始人。

不断地提高、改进和创新。马歇尔的学生约翰·梅纳德·凯恩斯[①]将经济学称为“经济学家的心智工具”。如同其他科学一样，经济学对于研究分析和充分挖掘当代世界的潜力是必不可少的。

我书中选择的是那些先行者，他们在经济学演变为一门为人所驾驭的工具学科的过程中居功至伟。我选择的是那些男男女女，他们“有冷静的头脑，也不乏澎湃的激情”[18]，是他们帮助构建了马歇尔的“推动器”，也是他们帮助凯恩斯发明了他的“心智工具”。我选择的人物都针对他们的时代和环境，凭借各自的禀性、经验和天赋提出了新的疑问并且也给出了新的解答。我选择的人物中有的人从十九世纪40年代的英国伦敦出发，周游世界，最后在二十世纪初印度的加尔各答结束了他的旅程。我努力尝试着去描绘他们每个人观察当时世界时所见到的画面，我也努力想弄懂究竟是什么触动了他们，激起了他们的兴趣，并一直在激励着他们。所有这些思想家们都在孜孜不倦地寻找一个“思考的工具”以期解决凯恩斯所称的“人类最终的政治问题：如何才能把经济效率、社会公正和个人自由三者完美无缺地融合在一起？”[19]

正如凯恩斯第一部传记的作者罗伊·哈洛德所言，那位多才多艺的人物把他喜爱和崇拜的艺术家、作家、舞蹈家以及作曲家们视为“人类文明的托管人”。他的愿望则是成为一名像他自己一样、比前者地位略低但仍必不可少的经济思想家：他也要做“一位托管人，但不是文明的托管人，而是文明的可能性的托管人”。[20]

正是基于后面这一类托管人的杰出贡献，那种认为人类十有其九能够挣脱他们千百年来悲惨宿命的观点终于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伦敦站住了脚跟。从那儿开始，它就如同池塘里荡漾于水面的涟漪一般，不断向外传播扩散，人类社会也因之在全世界范围内得以被重新塑造。

时至今日，这种传播和扩散仍在继续。

---

① 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现代西方经济学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

第一幕

希　望

序　幕

好好先生[①]与守财奴[②]

这是最坏的时代。

1842 年 6 月，当查尔斯·狄更斯结束了他成效卓越的美国巡回读书会归来时，整个英国正为饥饿的阴霾所笼罩[1]。接踵而至的多次农业歉收使面包价格翻了一倍。城市里挤满了来自农村的走投无路的流民。他们四处寻找工作而终不可得，于是便开始寻求施舍。棉花业连续四年萎靡不振，工人们只能靠公共救济和私人开设的粥棚勉强餬口。保守派社会评论家托马斯·卡莱尔给了一个冷森森的警告，“鉴于数百万人口已无计生存，这个国家本身也便走上了自我毁灭的死路。”[2]

日益高涨的阶级间的相互仇恨对教育、社会与宗教自由以及选举权怀有坚定信仰的狄更斯忧心忡忡[3]。那年 8 月，一个棉花加工厂的小范围罢工酿成了暴力事件。数天之内，该事件从平常纠纷升级为全国范围内的总罢工。“人民宪章”群众运动的领导人要求赋予所有男性以选举权。[4]人民宪章运动参与者将国会里中产阶层激进派所提出的“一人一票”的诉求推向了街头。政府首相罗伯特·皮尔的托利党迅速出动了身着红色军服的海军陆战队，并将带头闹事者逮了起来。其他的普通罢工者们则逐渐回到了各自的工厂。尽管如此，卡莱尔，这位写

① Mr. Sentiment，指狄更斯。

② 查尔斯·狄更斯所著《小气财神》中的主角名字。

出了让狄更斯不忍释卷的法国大革命历史的作者，却仍然悲观地警告大家，“不满、愤懑以及对上层社会的反抗和嘲讽……正在日益普遍地成为中下阶层的主流情绪。”[5]

虽然身在伦敦金碧辉煌的大厅之中为众多绅士与淑女所包围，狄更斯对共和主张的同情却如同他醒目的领结一般让人一目了然。在与这位年方而立的文学奇才初次相遇之后，卡莱尔盛气凌人地将他描述成“一位结实的小个子，非常小”，而且后面还恶毒地添油加醋地说，他的穿着与其说好，毋宁说俨如德·奥尔赛，意思是他的衣饰和那位臭名昭著的法国伯爵一样艳俗。[6]据卡莱尔的好友、激进派哲学家约翰·穆勒[①]回忆，卡莱尔还曾将一位法国雅各宾革命者形容成“那张邋遢的暴徒的脸上闪耀着天才的光芒”[7]。在午夜的奢华宴席上，宪章派人士的“暴乱”总会引发激烈的争论。卡莱尔对首相断然采取措施以防激进分子兴风作浪表示了衷心拥护。他还认为，那些真正衣食无着的人已经在得到帮助。而虽然狄更斯曾经说过“卡莱尔是我最想见的人，如果能见到他，无论走多远我都义无反顾”[8]，但此刻他却认为，无论从审慎还是社会公正的角度，政府都应当对有劳动能力但却面临失业的人们及其家庭给予救济。

1799 年到 1815 年期间，拿破仑战争所导致的连年饥馑曾在社会上引发过激烈的争论。而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爆发的大饥荒使这种争论又死灰复燃。争论的焦点是牧师托马斯·马尔萨斯[②]鼓吹的《人口论》。马尔萨斯是简·奥斯汀的同时代人，也是英国第一位政治经济学教授，他为人羞涩，心地善良，并在英国圣公会担任神职。他生来便有兔唇的生理缺陷，但他又有一个锋芒毕露的数学头脑。在早期担任助理牧师的日子里，在他任职的乡村教区内发生的饥荒曾让他饱受折磨。《圣经》将这一切归因于穷人的原罪，而时尚的法国哲学家们，包括他父亲的朋友孔多塞[③]，则认为这些都是有钱人为富不仁的结果。马

① 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

② 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英国人口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

③ Marquis de Condorcet（1743—1794），18 世纪法国哲学家，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

尔萨斯认为这两种说法都没有足够的说服力。他觉得自己必须找到一个更合理的解释。他的《人口论》于1798年出版。截至1834年他去世之时，这本书总共再版达五次之多。查尔斯·达尔文和其他进化论的奠基者们正是受到了这本书的鼓舞。也正是这本书使得卡莱尔为经济学贴上了“悲观科学”[9]的标签。

马尔萨斯一直竭力想解开的疑团是，为什么在所有的社会阶段和历史时期，包括他自身所处的时代，“人类十有其九”都是在含辛茹苦中悲惨度日[10]。即使在不挨饿的时候，这个星球上栖居的人们也自始至终生活在对因饥饿而致死的恐惧之中。虽然农业收成的好坏会带来一些不同，地域的富庶和贫瘠也能造成一些差距，但人类的生活从未长期地摆脱过勉强维生的水准。

在尝试解开这个由来已久的“为什么”的过程中，这位举止温和的牧师与后来的达尔文，甚至弗洛伊德[①]不谋而合。性，他总结说，才是罪魁祸首。也许是基于对他教区内教民们凄惨生活的观察，或是受了那些将人类等同于动物的科学家的影响，抑或是因为他第七个孩子的嗷嗷落地，马尔萨斯得出的结论是，人类进行繁殖的冲动压倒了人类所有其他的本能和技能，包括他们的理智、聪明、创造力，甚至还有宗教信仰。

基于这唯一但极具煽动性的前提，马尔萨斯推出了他的理论：无论何时何地，人口的增长都会超过粮食供给的增长。他的推论看似简单，但却极易让人堕入彀中：设想在某种条件下，粮食的供给刚好能满足一定数额人口的需要。这种皆大欢喜的局面维持不了多久，就如同亚当和夏娃不会一辈子待在伊甸园中一样。动物的原始情欲促使男男女女们越来越早地步入婚姻的殿堂，并组成人口数量越来越多的大家庭。但与此同时，就长期而言，粮食的供给却停留在一个相对稳定不变的水平。结果，本来刚够养活从前全部人口的谷物和其他基本口粮的数量，将会变得不够。马尔萨斯由此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不可避免，“它带来的后果便是穷人的苦日子变得雪上加霜。”[11]

---

① Freud Sigmund（1856—1939），奥地利精神病学家。

在任意一个经济体系中，商铺之间竞争顾客，工人之间竞争工作机会，而不断增长的人口则意味着愈来愈多的住户和家庭在争夺数量相对稳定的粮食供给，愈来愈多的工人在竞争数量未变的工作机会。这样的竞争导致了工资水平的下降和粮食价格的上涨。人们的平均生活水准——人均占有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数量——则不可避免地会下降。

到了一定程度，当粮食价格太过昂贵而劳动力工资过于低下时，便将自动产生一个反作用力。因为如果生活水平开始下降，男女众生便会又一次被迫推迟他们的结婚时间，而且生儿养女的数量也将有所减少。人口的减少意味着食品价格的下跌，因为争夺一定数量食品的家庭数目减少了。工人的工资将会上涨，因为争夺工作机会的工人数量同样在减少。逐渐，当粮食供给与人口数量慢慢回归到一种平衡状态时，人们的生活也将回归到原先的水平。但那是假设战争、瘟疫和饥荒这些来自自然界的“破坏力”[12]不会不期而至从而加速回归的进程。十四世纪蔓延于欧亚两洲的黑死病就是一例，它抹去了上百万人的生命，在它身后留下了大幅下降的人口数量及相对稳定的粮食生产水平。

不幸的是，事实证明这个新的平衡状态并不会比先前的那个维持得更久。“劳动阶层的人们还没过上几天舒坦日子，”马尔萨斯伤感地写道，“生活水平的倒退和接下来的逐渐回升，这样的过程便将周而复始地不断上演。”[13]想要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就犹如西绪弗斯[①]想把那块巨石推到山顶，西绪弗斯接近山顶的速度越快，就会越早触发巨石从山坡上重新滚下的反应。

任何违背人口规则的举动注定会以失败而告终。要求工资高于平均水平的工人将会失去工作，而比竞争对手们支付更高工资的雇主们则会失去顾客，因为更高的劳动力成本将迫使他们提高产品价格。

对维多利亚时期的人们而言，马尔萨斯理论中最遭人诟病的一个推断便是，慈善和施舍不但不会缓解它试图帮助的对象的痛苦，相反，

① Sisyphus，希腊神话中的一位暴君，被罚永远在地狱推一巨石上山，而该石被推上山后必定重新滚下。

它会使痛苦加剧。这个观点与基督“像爱自己一样去爱邻居”[14]的训谕背道而驰。事实上，马尔萨斯认为，英国传统的社会福利制度一无是处，因为它提供救济几乎不带任何附加条件，因此，它起到了奖励懒惰而惩罚勤奋的反作用。由于这类救济是按家庭成员多少而按比例增加的，所以它实际上又在鼓励早婚和多育。保守和自由两派的纳税人都为马尔萨斯的见解所折服。于是，国会于1834年毫无争议地通过了一部新的《贫穷法案》，它规定，公共救济的对象只限于愿意住进教区开办的教养院的人。

“行行好吧，先生，再给我来一点儿。”正如奥列佛·特威斯特[①]在发出那声著名的乞求之后所发现的，教养院不过是另一种类型的监狱。男人和女人被隔离开来，从事一些遭人厌恶的工作，而且可能还要面对严厉的责罚。而这一切所换来的不过是一个容身之所，“一天三顿稀粥，每星期两颗洋葱，外加每周日才会有的半只面包卷”。[15]也许大多数教养院的条件并非都像狄更斯描述的那样破败不堪，但毫无疑问的是，在劳工阶层对社会的诸多抱怨当中，这些教养机构绝对首当其冲。[16]与大多数期望变革的中产阶层自由派人士一样，狄更斯认为，这部新的《贫穷法案》在道德上是堕落的，在政治上无异于自我毁灭，它赖以支撑的理论基础就好像是人类野蛮时期的历史遗物。他刚从美国回来，在那里仍有“上亿亩的处女地无人居住，尚待开垦。那里的居民们对“一天三顿都能享用大量荤食言早已司空见惯”。[17]因此他觉得，那些认为假若解散教养院便会导致世界性粮食短缺的观点简直荒谬绝伦。

一心要替穷人争取权益的狄更斯于1843年初开始创作一部新的小说，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守财奴心灵改变的历程。他本人将这本书视若一柄巨锤，它能起到“五倍甚至两万倍”于政治传单的功效和力量。[18]

按经济历史学家詹姆斯·亨德森的说法，《小气财神》这本书其实是向马尔萨斯发起的一次进攻。[19]小说中有关食物的令人垂涎欲滴

---

① Oliver Twist，狄更斯的著名小说《雾都孤儿》的男主角。

的描写俯拾皆是。在狄更斯笔下，英国全然不是一个动荡贫瘠、人口拥挤而食物匮乏的孤岛，相反，它宛如一个巨型的福南·梅森百货公司[①]，在那里，货架上的商品琳琅满目，贮存食物的箱子深不见底，木桶里盛放的美酒永不枯竭。来自过去的圣诞精灵在守财奴斯克鲁奇的跟前出现[②]，它高高盘坐在由五花八门的食物所垒成的宝座之上，这些食物中有“火鸡，烤鹅，兽肉，家畜肉，腌肉，切好的大肉块，乳猪，成串的香肠，肉馅饼，葡萄干布丁，成桶的牡蛎，才炒出的栗子，红扑扑的苹果，蜜橘，鲜梨，硕大的主显节蛋糕[③]，以及任由人们倾倒在碗中的果汁。食物散发出的诱人热气四处弥漫，使屋里的光线都为之变暗。”食品店的掌柜们，卖家禽、蔬菜和水果的小贩们，一个个笑容可掬，争先恐后地邀请伦敦的居民们光顾他们的店铺，去亲眼目睹那里陈列的各种丰盛饮食。[20]

在这以富饶的新世界，而不是匮乏的旧世界为特征的英国，骨瘦如柴、不婚不育而且厌食的埃比尼泽·斯克鲁奇简直与时代格格不入。正如亨德森所指出的，这位商人“对自己身边成堆的美食毫无感觉，同样，他对人类相濡以沫的新道德也无动于衷”。[21]他是设立踏车磨坊和教养院的铁杆支持者，“它们已经够不错了，”他认为，“穷人们必须住进去。”来自过去的圣诞精灵反对说，“很多人都无法忍受住在那里面；他们宁愿去死也不会住进去。”这时，斯克鲁奇冷冰冰地说了这么一句，“如果他们宁愿去死，那就去死好了，反正这有助于解决人口过剩。”

令人欣慰的是，斯克鲁奇的铁石心肠也和世界粮食供给水平一样，并非一成不变。当斯克鲁奇得知小蒂姆也是所谓的“过剩”人口中的一员时，马尔萨斯那套陈旧的理论所具有的现实意义令他恐怖万分，望而生畏。“不，不，”他边哭边哀求那个精灵，求他放过那个小男孩。“怎么啦这是？”精灵嘲弄他道，“他如果想死，就让他死好了，这有利于解决人口过剩。”[22]斯克鲁奇十分后悔自己说过这样的话，决定立

① Fortnum & Mason，号称伦敦最优雅的店铺，女王的官方食品供应商。

② 狄更斯小说《小气财神》(Ghost of Christmas Past）中的一个情节。

③ Twelfth Night Cake，1 月 5 日晚上吃的蛋糕，那天传统上是圣诞庆祝的最后一天。

刻给鲍勃·克拉齐特，一位遭他长期剥削的伙计加薪，并且奖给他一只过圣诞节的火鸡。为了能改变未来事物的进程，斯克鲁奇接受了狄更斯这代人积极乐观反对宿命的观点，也从而驳斥了马尔萨斯理论中“残酷无情的历史注定将一遍遍重演”的冷酷假设。

克拉齐特所享受到的快乐的圣诞晚餐是狄更斯对马尔萨斯的直接回击。马尔萨斯曾以下面这个“自然的盛宴”作比方以警告人们，好心的施舍有时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一个一无所有的人请坐在餐桌旁的人们给他匀出个座位来，在以往人们会马上将他赶走。由于受法国乌托邦学说的蒙蔽，现在人们决定，虽然本来食物只够应邀而来的客人们享用，他们仍将那人留了下来。但他们没料到的是，一旦留下一个人，更多的人将会闻讯而来，把门都给挤破。还未等每个人都分到食物，食物便已经被分完。那些宾客对晚宴的兴致将会“被这幅乞食于人的悲惨场景破坏殆尽”。[23]

克拉齐特家中摆满美食的餐桌以及环坐在桌旁人们那一张张兴奋的笑脸，与马尔萨斯提倡的严格限制数量的救济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自然的盛宴”中所分到的少得可怜的食物不同，克拉齐特太太今天甚至还做了布丁——“它就像一只带斑点的加农炮弹，格外瓷实，里面拌有少量高度白兰地，上面还插着圣诞冬青作为点缀”——也许它的分量不够让所有人都能吃上两碗，但却已足够让全家美餐一顿。“饭后，克拉齐特太太说，她那颗一直悬着的心现在总算落了地，她说，她一直都在担心面粉太少，不够做布丁用。但所有的人都对今天的布丁赞不绝口，没有谁觉得或者在说布丁的分量不够吃。谁要真那么做就真的太不地道了。如果那样做的话，哪怕只是很小的一点暗示，克拉齐特家的人也会因此而羞愧难当的。”[24]

圣诞的基督精神仍在发扬光大。在故事结尾，斯克鲁奇甚至停止了绝食，他没有像往常那样独自一人在家里喝几口稀粥了事，而是连声招呼都未打便出现在他侄子的家门前，来参加他们的圣诞夜聚餐。震惊之下，主人们自然给他在桌边腾出了一个座位。

狄更斯希望《小气财神》这本书能像巨锤一般将社会大众敲醒。他如愿以偿了。这本书于12月19日出版。截止到圣诞前一天，该书

便已卖出六千册。从那时开始，在狄更斯的余生甚至在他过世以后，该书无数次重印出版[25]。狄更斯对穷人辛酸生活的描述，使他被人贴上了一个不无嘲讽之意的“好好先生”[26]的标签。尽管如此，我们的小说家仍然认为，一定存在着那么一条途径，它既能救劳苦大众于水火，同时又无需彻底颠覆现存的社会制度。他的这一信念始终坚如磐石，从未动摇。

过度忙于其他事务的狄更斯未能意识到，如果没有充足的资金保证，改革社会的措施将无法实施。他是一名“纯粹的现代派”和“进步的信仰者”，但他并非工业革命的反对者。他年方二十便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使他自信满满，对于人类的创造力即将改变历史的进程从无疑虑。因为曾靠跻身于新兴的大众媒介产业从而摆脱了贫困，狄更斯对卡莱尔之流的保守派以及穆勒之流的社会主义者通通失去了耐心。因为他们都拒绝承认，作为一个社会整体，“人类经过长期奋斗，历尽艰辛，已逐渐从愚昧落后的境地中挣扎了出来”。那些人“依旧抱残守缺，以古非今，依然沉浸在对蒙昧残酷的历史的陶醉之中”。[27]

狄更斯觉得，英国社会仿佛正从一个噩梦中醒来。事实证明，他的这一感觉极有预见性。宪章运动过后一年，宽容和乐观的氛围逐渐占据了上风。托利党的执政首相私下也承认，宪章运动人士的许多抱怨并非无中生有[28]。工人运动的领袖们对开展阶级斗争的呼声予以抵制，并对雇主们取消谷物和其他粮食进口关税的呼吁表示支持。国会成立了专门针对童工，劳动事故和其他丑恶现象的调查委员会，自由党的政治家们趁势推出了1884年的《工厂法案》，它对妇女儿童的工作时间作了法律规定。

狄更斯未曾料到，即使没有经济学细致精确的计算，这个世界也能存在下去。他原本寄希望于像来自未来的圣诞精灵改变斯克鲁奇一样去改变那些政治经济学家。他希望他们不再将贫穷视为一种自然现象，不再认为人的思想和愿望无足轻重，也不再理所当然地将不同阶级之间的关系设定为利益彼此对立。狄更斯尤为期待的是政治经济学家们能将互谅、宽容和尊重这些难以用数字描述的精神融入他们的学

说。[29] 在他创办的周刊《家常话》[①] 创刊之际，他向经济学家们发出呼吁，希望他们的学说能更人性化。他在创刊辞中写道，“没有一点人性为其蔽体、充实其血肉，没有一点人性的勃勃生机和人性的温暖，政治经济学就只是一具骷髅。”[30]

狄更斯并非在孤军奋战。在当时以及后来，在伦敦以及世界各地，众多的男男女女都得出了与他相同的结论。他们也都发现，人类在经历了千辛万苦之后，已经演变成一种“环境的产物”。他们同时也认识到，对“九成的人类”而言，生存环境已不再是一成不变，它绝非由愚昧残酷的宿命预定，更不是人类的力量所无法掌握和影响的。他们坚信，人类的干预能改变经济状况，但同时，他们对乌托式邦的空想及激进派的精英们提出的“人工社会”尚存疑虑。于是，他们纷纷致力于构建一个“分析推动器”[31]，（也即后来某个经济学家所称的“心智工具”[32]），他们利用它来了解现代世界的运行规律，了解人类的物质条件怎样才能得到改善，因为物质条件是一切道德、情感、知识和其他创造性条件赖以生存的基础。

① Household Words。

第一章

焕然一新：恩格斯和马克思在神奇年代

关键在于，它刚刚降生不久，它是全新的……

我们的制度虽然奇妙，但它仍有改进的余地……如果我们真想改进它，则必须去研究它。

沃尔特·巴奇霍特[①]，《伦巴底街》[②][1]

“必须将你收集到的那些材料尽快面世。”时年二十三岁的恩格斯在给他的革命同志马克思的信中写道，“机不可失，赶紧写，然后马上出版”。[2]

1844年10月，整个欧洲大陆宛如一座蠢蠢欲动的火山随时都会喷发。马克思，一位普鲁士贵族的女婿兼一份激进哲学期刊的主编，此刻正身在巴黎。他此行的目的原本是用数量分析的方法写一篇经济论文，以证明革命即将来临的必然性。而恩格斯，这位莱茵地区一位纺织富商的子弟，这时却在自家的庄园里埋头于大量英文报纸和书籍当中。他正在起草一份针对某一阶级的控诉书，他本人与马克思又正是那个阶级的成员。[3]此刻，他最大的担心便是未待他们的书面世，革

① Walter Bagehot（1826—1877），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政治社会学家和公法学家。

② *Lombard Street*，这本书描绘了英国的金融市场。

命便已然爆发。

恩格斯是一位热衷于文学的理想主义的叛逆者，在两年前首次与马克思邂逅之时他便已是一位早期革命党人和“狂热的共产主义者”。在整个青年时期，这位身材瘦削、举止文雅且高度近视的普鲁士皇家后备军的炮兵伍长一直都在试图从家族的加尔文教派[①]的传统中挣脱出来。他一直将废除上帝和金钱对人类社会的双重专制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他坚信，私有财产是一切罪恶之源，必须要有一场革命才能建立起一个公正的社会制度。他对纯粹哲学家的生活方式向往之至，但让他深以为憾的是，他命中注定要从事他家族的行当。“我不是什么博士，”他曾经纠正一位富商的说法，后者出版了一份激进报纸并错把恩格斯当成了一位学者，他还补充道，“我永远成不了学者，我不过是一位商人。”[4]

恩格斯的父亲是位狂热的新教徒，在宗教信仰上他从不首鼠两端，因此与他思想如天马行空般的儿子时有冲突。作为一名业主，他已算是颇为开明的了。他拥护自由贸易，他在位于乌帕塔尔的工厂里采用英国最新式的纺织设备，而且最近他刚刚在英国的曼彻斯特，这个工业革命时代的“硅谷”，开设了第二家工厂。但是作为一名父亲，他委实难以容忍他这位以政治鼓动和自由记者为职业的大公子兼继承人的思想观点。1842 年春，世界棉花市场崩溃，紧接着，又爆发了宪章运动的罢工。面对这种形势，他执意让恩格斯在他义务兵役期满之后立刻前往曼彻斯特的埃尔曼-恩格斯联合工厂报到上班。

谨遵父命并不意味着恩格斯的梦想破灭，他依然渴望着向一切形式的威权发起挑战。一直以来，曼彻斯特的工人都以其高昂的斗争精神闻名于世。恩格斯认定，工业领域的斗争是起义在更大范围内爆发的序曲，能亲临斗争的第一线让恩格斯乐不思蜀，而且，他还能借此机会让他的写作生涯也向前迈出一步。

同年 11 月，在前往英国途中，他在科隆作了短暂停留并到声援民主的《莱茵报》的办公室进行拜访。此前，他常常为此报提供署名为

① Calvinism, 加尔文及其信徒的神学体系，强调神的万能和只有神的恩典才能救赎。

“X”的稿件。报纸的新主编是一位来自特里尔的哲学家，此人举止鲁莽，目光短浅。他叼着根雪茄，大大咧咧地接待了恩格斯。对此恩格斯并未介意，而他也因此被委以前往英国报道革命前景的任务。

恩格斯到达曼彻斯特时，总罢工已接近尾声，政府派出的部队也已撤回到伦敦的军营之内。但街头仍然有失业的人们在彷徨，许多工厂依然处于停工状态。恩格斯毫不怀疑，工厂的所有者宁愿眼睁睁地瞅着工人们饿死，也不会付给他们工资聊以糊口。然而即便如此，他也还是注意到，英国工人吃的食物比德国工人的要好得多。在他家设于德国巴曼的纺织厂里，工人们吃的通常只有面包和土豆，而在这里，“他每天都能吃上牛肉，而且用他挣的那点钱，他能买到带骨头的肉块，这比德国最有钱的人吃的肉食还要营养。每天除了喝两回茶之外，他还有足够的余钱在中午买上一杯黑啤酒，晚上还可以再来些白兰地和水。”[5]

必须指出的是，失业的棉纺工人们则只能靠《贫穷法案》规定的公共救济以及私人开设的粥棚“勉强为生”。据埃德温·查德维克[①]新出版的《英国劳工人口的卫生状况》一书披露，曼彻斯特地区男性的平均寿命为十七岁，这只相当于临近农村地区平均寿命的一半。而且，该地区两个婴儿中平均只有一个能活到五岁以上。查德维克形象地描述了曼彻斯特的街道上充斥着阴沟、潮湿长霉的屋棚、腐烂的食物和随处可见的醉汉的情形。这充分证明，英国工人们的抱怨并非是在无理取闹。[6]但当卡莱尔，这位恩格斯崇拜的唯一一位英国人，就工人暴动的可能性提出警告时，恩格斯却发现，大多数中产阶层的英国人都认为发生暴动的可能性非常小，他们对未来的态度显得“出奇的冷静而且信心十足”。[7]

新家安顿妥当之后，恩格斯以极具维多利亚时代特色的方式解决了横亘在他的家庭需要和革命理想之间的矛盾。他过上了一种双重身份的生活。在办公室跟他的资本家伙伴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俨然就是狄更斯《尼古拉斯·尼克贝》[②]中那个“活泼、诙谐、讨人喜欢”被称

① Edwin Chadwick（1800—1890），现代公共卫生的先驱。

② *Nicholas Nickleby*，狄更斯1834年完成的长篇小说。

为“公司的侄子”的弗兰克·切雷伯。切雷伯恰好也是“在德国的工厂里干了四年管理工作之后，要来英国拓展其事业”。[8] 正如小说中那位年轻迷人的商人一样，恩格斯衣着考究，并加入了好几家俱乐部，他时常在家中举办丰盛的晚宴招待来宾。他自己还养了匹马以便能常去朋友的庄园狩猎狐狸。而在他另一半“真实”生活当中，作为宪章运动的组织者和一名调查记者，他把“公司、晚宴、啤酒和香槟都通通弃之脑后”[9]。在他所接触到的英国改革派的鼓舞下，闲暇时间里他由一位不识字且正与他相恋的爱尔兰女工相陪，对曼彻斯特进行了细致入微的了解，直至对那儿的熟悉程度不亚于自己的故乡。同时，他还收集了大量资料以用于著述。他将他那些令人震惊的专栏和论文纷纷投往各种激进报刊发表。

在英国长达二十一个月的管理培训使恩格斯开始对经济学有所发现。德国的知识分子历来沉迷于宗教研究，而英国人则似乎总爱把每一场政治或文化争论变为一个经济问题。作为英国政治经济的重镇以及自由党和反谷物法[①]联盟的桥头堡，曼彻斯特在这方面尤其突出。对恩格斯而言，这个城市是工业革命、具有造反精神的工人阶级以及自由放任主义三者的交汇点。“这里的情形强烈地让我感觉到，长久以来被历史学家们忽视或至少是低估了的经济因素，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后来如此回忆道。[10]

因为没有受过大学教育，尤其是对亚当·斯密[②]、马尔萨斯、大卫·李嘉图[③]等英国政治经济学家的著作知之甚少，恩格斯曾一度非常沮丧。但他仍然信心十足地认为，英国人的理论体系有着很大的漏洞和缺陷。他离开英国前写的最后几篇论文中的一篇，以草草数笔勾勒出了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新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他谦虚地将这篇他的初出茅庐之作定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1]

---

① 英国为了保护本土和爱尔兰谷农的利益，在 1815 年和 1846 年两次通过谷物法对来自欧洲大陆和美洲的谷物征收高额关税。

② Adam Smith(1723—1790)，英国经济学家，古典政治经济学鼻祖，代表作简称《国富论》。

③ David Ricardo (1772—1823)，在亚当·斯密之后，推动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和作出主要贡献者。

此时，在英吉利海峡对面巴黎近郊最富庶的圣日耳曼·昂莱，马克思正埋头于对法国大革命历史的研究之中。当他拿到恩格斯邮寄来的终稿，读过这位记者“对经济诸范畴批判的出色概论”之后，他如遭电击，顿时从对历史的沉迷之中回到现实中来。[12]

与恩格斯一样，马克思也有一位十分慷慨（当然也是挥霍无度）的资产阶级[①]的父亲。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他同样觉得自己正身处一个市侩的时代。他认同恩格斯所标榜的德国在知识和文化上的优越，并崇拜一切与法国沾边的东西。另一方面，他却对英国的财富和强大国力极端仇视。但是，在其他许多方面，马克思却与恩格斯截然不同。他咄咄逼人、性情冲动，同时又严肃诚恳、知识渊博，丝毫没有恩格斯那种能言会道、随遇而安的温和性情。虽然只比恩格斯年长两岁半，马克思却不仅已经结婚生女，而且还是个哲学博士，并一直要求别人以博士的头衔称呼他。他身材不高却强壮有力，模样与拿破仑如出一辙。他的双颊、胳膊、鼻子和耳朵上遍布着浓密乌黑的毛发。“他的双眸之中闪烁着智慧与恶意交织的火花”；而且，正如他在《莱茵报》的助手所回忆的那样，同别人交谈时他总爱以这句口头禅开场，“我会让你很狼狈的。”[13]赛亚·柏林，这位马克思的传记作者之一，曾这样形容马克思，“对自己和自己力量的绝对自信是他最为显著的一个特征”。[14]

相较恩格斯的精明能干，马克思则如萧伯纳[②]曾经指出过的那样毫无管理经验，他也从未与任何一个活生生的人有过商业往来。[15]毫无疑问，他博学而且多才，但他始终不具备恩格斯的工作风范。恩格斯随时都可以卷起袖子，立刻开始写作。而马克思却很可能正在咖啡馆一边品酒，一边同三两个俄国贵族、德国诗人或法国的社会主义者进行辩论。正如他的某位支持者所曾透露的那样，“他的阅读涉猎极广，工作强度也极高……他从未从头至尾做完过一件事。他总是突然间便丢下手头所有的活儿，而一头扎入一堆新的毫不相干的书籍当中去……他变得越来越兴奋，越来越狂暴，尤其是在他因为写书引起身体不适，或是一连工作了三四晚没有上床合过眼的时候”。[16]

---

① Bourgeois, 另译布尔乔亚。

② George Bernard Shaw（1856—1950），英国现代杰出的现实主义戏剧作家。

由于未能在德国的大学中谋到教职，同时也因为一直不和的家庭终于切断了对他的经济资助，马克思曾一度被迫以新闻为业。[17] 但他仅仅在科隆的一家报纸工作了六个月，据他后来回忆，“这里的氛围让我形同奴隶”，他试图挑战普鲁士当局的新闻管制制度，而最终却以辞职了事。值得庆幸的是，他成功说服了一位身家富裕的社会主义信仰者出资兴办一份新的哲学期刊——《德法年鉴》，而且委派他前往他最钟爱的城市——巴黎去主持局面。

恩格斯从曼彻斯特寄来的报道格外重视经济原因与政治效应之间的关系，这给马克思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对经济学知之甚微，诸如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物质条件以及政治经济学等词汇在他的往来信函中鲜有出现。他写给其资助人的信便足以证明，他原来设想的是将所有反对市侩主义的人，譬如所有有思想和受苦受难的人们结成一个联盟。但他的终极目标却只是良心改革，而非彻底废除财产私有。马克思在《德法年鉴》第一期，也是最后一期中的一段话表明，他原本只是想向执政当局提出批评，并没打算真向他们投掷石块：“每个人都必须承认，谁都不知道发展究竟该如何进行。然而，人们的这个缺陷对新来临的这场运动却非常有利，因为它意味着人们不会以一己的成见而有所期待，相反，他们会通过对旧世界的批判来认识和发现新的世界。”

他接着还写道，“我们只需让人们了解，这个世界为什么会如此挣扎……我们的对策是良心改革……自我净化……这是斗争和时代的需要”。这位哲学家扮演的完全是一位牧师的角色，“我们最需要做的就是忏悔，无需更多。如果想让罪过被宽恕，人类只需彻底地坦白和承认自己所犯过的罪恶”。

马克思与恩格斯第一次正式会面是在 1844 年 8 月，地点是巴黎的摄政王咖啡馆。在返回德国途中，恩格斯特意在巴黎稍作停留，以便会见这位此前曾冷落过他的人。一连十天，他们俩一边交谈一边争论一边喝酒，他们多次发现，他们的想法在对方的心里都有着强烈共鸣。恩格斯认为对现代社会进行改良毫无希望，必须把德国从上帝和其他传统势力的统治下解脱出来，马克思赞同他的这一观点。恩格斯还向马克思介绍了无产阶级这一新概念，而后者顿时对这个阶级产生了亲

切感。不难看出，马克思觉得这一阶级指的并不仅仅是那些“生而贫困”的人，它同时也包括“那一大批因为社会骤然解体而人为地沦落至贫困的民众”[18]，他们中间有失去了土地的贵族，破产的商人，当然也包括找不到工作的学者。

与卡莱尔和恩格斯一样，马克思认为，以往爆发的饥荒与暴乱足以证明资产阶级无法胜任统治阶级这一地位。他预言，对生存的迫切需求将会促使无产者起来推翻他们的压迫者[19]。通过废除私有财产，无产阶级不仅将解放他们自己，而且将要解放全人类。正如历史学家杰特鲁德·希默尔法布所言，除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维多利亚时期坚信现代社会已经病入膏肓的不乏其人[20]。但与卡莱尔和其他社会批判家们的主要不同在于，他们认为现存的社会秩序必将灭亡。即使尽量让自己不带有一个抗议者的武断，他们也仍然认为，他们所预言的经济崩溃和暴力革命绝对无法避免，也就是说，这是命中注定的。卡莱尔同样有过关于世界末日的论述，但他的出发点是教人悔过，促人改革。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末日论则号召读者们在末日降临之前选择站到历史正确的那一边去。

在其1844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恩格斯明确指出，（虽然他也并非完全正确），英国的工人们通常生活在半饥半饱的状况之下。是饥饿导致他们在1842年发起了针对工厂主的暴力斗争。但他的报导尚未能让人完全信服——假如不彻底推翻英国现存的社会制度，并且改由宪章派执政的话，那么无论采取什么措施，工人们都永远不会有出头之日。就此他曾与他的英国朋友们有过无数次的辩论，但每回他都是铩羽而归。于是，他竭力鼓动马克思将这副重担挑起来。他向马克思解释说，在英国，社会和道德问题通通会被重新定义为经济问题，社会批评也因此不得不与经济现实亦步亦趋；在德国，年轻的黑格尔[①]学派曾以宗教颠覆另一个宗教，以暴露德国统治阶级的虚伪；同样，他们二人也必须运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才能将英国人面目可憎的“金钱宗教”驳得体无完肤。

---

①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德国哲学家。

这对新结识的挚友分手之后，恩格斯回到了德国。他写了大量文章，并对英国工商界从事的“大规模谋杀、抢劫及其他罪行”进行了控诉。（不言而喻，德国的情形也不遑多让[21]）。在自家棉纱厂的工作经历让恩格斯确信，工商企业是“万分丑恶”的[22]，他还“从未见过有哪个阶级的人会像英国资本家一样，意志如此萎靡，自私到如此不可挽救的恶劣地步，内心如此糜烂，如此地缺乏进步的能力”。那些“犹太商人”们，他指的是那些曼彻斯特的商人们，都是政治经济学这门所谓的“财富科学”的爱好者。只要能赚到利润，他们对工人的苦难从来都是置若罔闻。事实上，除了金钱，他们把人类所有其他的价值观念都弃若敝屣。英国的上层阶级有着唯利是图的本性，他们在“吸干穷人的鲜血之后”，又假惺惺出来搞什么慈善活动，这两者都同样恶心得令人作呕。随着英国社会越来越清晰地分化为“富翁和贫民”两大阵营，即将来临的“穷人对富人发起的斗争”也将会变得“前所未有地血腥”。[23]恩格斯不但能言善道，也是一个行动迅捷、语言流畅的作家，在不到十二个星期的短短时间里，他便完成了书稿。

与此同时，恩格斯在不断提醒马克思“一定要尽力完成你那本关于经济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而且必须尽快面世。”[24]他自己的著作于1845年7月在莱比锡出版。《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到了诸多好评，而且这本书在众多政治和经济矛盾爆发之前就已经卖得很不错。由于他准确预判到了这场危机将会在“1846年到1847年间”到来，此书因此增添了一丝精确预言的色彩。而《资本论》这部马克思自称“揭示了现代社会运动规律”的杰作，则须再等二十年才会呱呱落地。[25]

1849年，《纪事晨报》的记者亨利·梅休[①]爬上圣保罗教堂[②]顶层的金廊以鸟瞰伦敦全城。结果，他发现这座城市大得“根本无法看到

① Henry Mayhew（1812—1887），出版了《伦敦的劳工和穷人》，对流浪乞讨行为进行了系统研究。

② 英国圣公会伦敦教区的主教座堂，坐落于英国伦敦市。

边界”[26]。经过十几年年均百分之二十的扩展，这座城市的发展“似乎已不受任何现存规律的制约。”[27]到十九世纪中期，城市人口已膨胀到两百五十万。伦敦的人口数量至少两倍于巴黎，五倍于维也纳，它相当于排名在伦敦之后的八大英国城市人口的总和。[28]

伦敦是“十九世纪经济奇迹的典范之作”[29]。伦敦港是全球最大最迅捷的港口，早在1833年，巴林银行的一个合伙人就已注意到，“伦敦已成为全球商业运转的中心”。伦敦的湿船坞占地达数百亩，已经成了游客们的必到之处。此处还有一个面积达十二英亩的巨型地下酒窖，游客们可以在此品尝法国的波尔多葡萄酒。刺鼻的烟草味，强烈的朗姆酒味，熏人的动物皮毛与犄角味，以及好闻的咖啡和香料味，统统混杂交织在一起，引发了全球性的庞大贸易和络绎不绝的移民浪潮，并从而造就了一个横跨四海的庞大帝国。

“我还从没见过像泰晤士河从入海口到伦敦桥这一段般令人震撼的情景。”恩格斯1842年第一次亲眼见过伦敦之后曾如此坦承，“鳞次栉比的房屋，沿河两岸尤其是乌里芝上游的众多码头，两岸停靠着的不计其数的船舶。船舶相互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最后只在河中间留下一条窄小的通道，而数以百计的汽轮就是从这条小小的通道中依次飞驰而过。所有这一切，都那么壮观，那么惊人，使人不得不为之瞠目结舌。”[30]

伦敦火车站比“巴比伦的古城墙……和古希腊的阿尔忒弥斯神庙”还要大。美术史学家约翰·罗斯金曾如此宣称；“发动机打雷般的巨响在日夜轰鸣”，狄更斯在其作品《董贝父子》中也曾有过类似的描述。当时，旅行者从伦敦出发，往北可到达苏格兰，往东最远能到莫斯科，往南最远可以到达巴格达。同时，铁路把伦敦的边界不断向周遭乡村的腹地扩展。狄更斯描述道，“那些原来成年累月堆积着废弃物品的荒地已失去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装满了五花八门货物和商品的仓库。原本人迹罕至的桥梁现已成为通向别墅、花园、教堂以及大众散步场所的必经之地。从紧靠伦敦的地区开始，一片片新建中的房屋，一条条初开通的大道，宛如一列硕大的火车，在蒸汽的升腾之中向乡村地区呼啸着扑过去。”[31]

位于“城”里的伦敦金融中心把握着“全球商业”经济的命脉。投资家纳森·罗斯切尔德[①]曾称伦敦为“世界银行”[32]，这丝毫没有夸大其辞。商人们都到伦敦来筹集他们进行全球贸易所需的短期贷款，而各国政府也在此发行债券以备兴修公路、运河及铁路之用。虽然此时伦敦股票交易所尚在襁褓之中，但“城”里商客和票据贴现人所吸入的“能借贷资金”的数额分别相当于纽约的三倍和巴黎的十倍[33]。银行家、投资者及商人们对资讯的需求又让伦敦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媒体与通讯中心。“现在谁都能看到新闻了。”1851 年，罗斯切尔德家族中曾有人因此而牢骚满腹，因为电报的发明使他们家的信鸽传递系统已经变得落伍。[34]

伦敦，而非北部的新兴工业城市，才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聚集地带。这里雇佣着五十万男女工人[35]，这个数字是全英国工人总数的六分之一，它大致相当于曼彻斯特棉纺工人数目的十倍。威廉·布莱克的《耶路撒冷》中那座“黑暗的恶魔工厂”的原型应该不是在北部的“焦炭城[②]”，比如那座拥有五百名工人，配备了詹姆斯·瓦特最新型蒸汽机的不列颠面粉厂。它更有可能是坐落于伦敦的泰晤士河边[36]。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出版的一本伦敦旅游宣传册上曾经如此介绍道，这里有“供水厂、暖气厂、造船厂、皮革厂、酿酒厂、蒸馏厂，还有玻璃厂，其工厂种类之繁多不免让那些第一次来此参观的人们惊掉下巴[37]”。确实，伦敦没有一门占主导地位的工业类别——比如纺织——而且，它大多数企业的雇工数目都在十人以下[38]，但所有的工业类别——比如舰队街的印刷、油漆、卡姆登的精密仪器，以及托特纳姆路一带的家具制造，都集中在伦敦。坐落于波蒲拉尔区和米尔沃尔[③]的大型造船厂雇佣有一万五千名成年男工和童工，那里建造着世界上最大的蒸汽船和装甲舰。英国大部分用于出口的商品都是在利兹[④]和纽卡斯尔[⑤]的工厂中制造，而伦敦工人们的工作则基本只能满足伦敦

① Nathan Mayer Rothschild，罗斯切尔德金融家族的五子之一。
② 狄更斯把曼彻斯特称为“Coketown”，焦炭城。
③ Poplar and Millwall，都是十九世纪伦敦有名的造船中心。
④ Leeds，英格兰北部城市。
⑤ Newcastle，英格兰北部城市。

城自身的需求。旺兹沃思[①]有面粉厂，怀特查佩尔有炼糖厂，戚普塞街上有酿酒厂，史密斯菲尔德有家畜交易市场，伯曼齐有制革厂和蜡烛以及肥皂制造商。梅休形象地把伦敦形容为世界上“最繁忙的蜂巢”[39]。

总而言之，伦敦是当时全球最大的市场。那里的人们能“以极低廉的价格轻而易举地获取即使世界上最富庶最强大的君王也难以企及的便利、舒适和享乐”。[40]在伦敦富庶的西区，“从窗玻璃到狗脖子上的项圈，几乎所有的物件都闪闪发光，炫人双目”，“你从空气中便能感觉到、嗅到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社会聚集地的存在[41]。”丽晶街上的商店五花八门，琳琅满目，这儿有世界上最齐全的“钟表制作匠，服饰用品店和摄影间”；“考究的文具用品店、针织品店、妇女紧身胸衣店、音乐用品专店、女用披肩店、珠宝店、法式手套店、香水店、针织花边店、糖果糕饼店以及女帽头饰店”。[42]

梅休将这座城市“雄厚的商业”归功于“无与伦比的商人数量以及富可敌国的巨大财力”。[43]《经济学家》杂志曾夸张地说，“大英帝国最富裕的人们都云集于此，这里的生活是最奢华的，房租是最昂贵的，同时，这里赚钱的机会也是最多的。”[44]当时，每六个不列颠岛人中便有一个住在伦敦。伦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更高。伦敦人的平均收入水平比其他英国城市居民要高出百分之四十，这不仅是因为在伦敦居住的富人数量多，同时也因为伦敦的工资水平比别处要高出三分之一强。人口数额的巨大和极高的收入水平使伦敦成为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大的消费需求集中地。经济历史学家哈罗德·珀金曾说，“消费者的需求是工业革命最根本的经济要诀”。它对经济的推动作用较蒸汽机和织布机的发明有过之而无不及。[45]伦敦的巨大需求，它对新奇时髦的酷爱以及它日益高涨的购买力，为创业者采用新技术并开创出层出不穷的新兴产业提供了极大的动力。

在吸引来一些世界巨富的同时，伦敦也如同磁石一般引来了众多为贫困所迫的人们。梅休宣称“数量惊人的来自三教九流的人们都被

① Wansworth，在伦敦郡的西南部。

财富吸引来这个地方”，他指的不单单是店铺的职员、商人、律师和医生这些专门替富人提供服务的人，同时也包括从伦敦周边乡村络绎不绝迁来的移民。他们从事的大多是仆役、女裁缝、制鞋匠、木工、码头工人、短工劳力以及信使等行当；如果找不着这类工作，他们也许就会沦为鸡鸣狗盗之徒，或去街头捡破烂，或沦为娼妓[46]。中产阶级逐渐被迫移居到市郊，这将城里的贫富悬殊衬托得愈加明显。在众多观察家的眼里尤其如此，他们普遍认为，伦敦的现状便是未来社会的缩影。贫穷自然并非刚刚出现的新生事物，但在此之前，饥饿、寒冷、疾病和愚昧似乎都是拜自然所赐，而现在，在这个世界大都会里，所有的悲剧都是无端地被人为造成的。可是，不是有一个现成的办法能将他们从困苦中解救出来吗？把那么多的华屋美服，香车盛宴分给他们一些不就行了吗？不，不行。头脑简单之人所不了解的是，给穷人们吃上一两天的蛋糕根本无法让大多数英国人脱离贫困，解决为他们提供足够的面包、衣服、燃料、房屋和医疗的问题。和很多人一样，梅休也曾天真地以为，那些一排排砖砌的仓房和“大型百货商场”里的“财富多得足够让世上每一个人都成为富人”。[47]

伦敦是整个世界的缩影，因此，一大批新闻记者、艺术家、小说家、社会改革家、文职人员以及其他社会这所大学的学生都被它吸引而至。在这里，“你可以第一手地接触到你想研究的一切事物”[48]。人们都渴望来此亲眼目睹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十八世纪来伦敦参观的人们都倾向于关注它的宗教、社会犯罪以及那些声色犬马的场所，而维多利亚时期的伦敦最让络绎不绝的来访者震惊的却是它极其悬殊的贫富差距。

查尔斯·狄更斯在他的《荒凉山庄》中写道，对这个世界上最大最富的大都会而言，11月是空气质量最糟糕的时候。[49]1849年11月29日，弗雷德里克·恩格斯和卡尔·马克思一同费力地爬上了大风车街，然后又朝皮卡迪利大街走去。他们低头小心翼翼地走着，生怕一不小心踩到齐脚腕深的烂泥里，或是被街上拥挤的人群撞到。他们俩原本就高度近视，再加上伦敦城里弥漫着的夹带着强烈硫磺味的黄色浓雾，人连一英尺之外的景物都看不清楚。

恩格斯的身形依然如军官一般挺拔，而马克思则仍然留着乌黑的大鬓角与络腮胡。他们俩特意来伦敦参加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的代表会议。该同盟是由许多团体合并而成，它包括中欧的一些乌托邦分子、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及非常规立宪派，外加少数来自伦敦本地的工厂职员代表。这些人都支持给所有男性公民以投票权，由于受到英国公民自由权和比较宽松的移民法案的保护，他们的这一呼声已经愈来愈强烈。随着铁路运输业泡沫的破灭以及随后在伦敦以至欧洲各地爆发的金融恐慌，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紧急召开了这次会议，目的是要将他们迄今仍模糊不清的奋斗目标最终确定下来。经过恩格斯的努力说服，他们决定将原来那个乏味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口号束之高阁，而代之以更为振奋人心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恩格斯草拟了两份宣言，他和马克思希望它们都能被同盟采用。同盟的领导人中有人坚持认为，工人的悲惨处境可以通过暴力推翻现存秩序以外的办法得到改善，因此，他们二人就如何排除这些人的干扰进行了讨论。“这一次我们决不让步。”在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恩格斯表示了自己的坚定立场。[50]

他们终于抵达了伦敦的苏活区，并找到了红狮酒馆。德国工人教育工会是非法的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的阵线之一，其总部便设于该酒馆二楼。屋里有数张木桌、几把木椅，屋角还摆着一架平台式钢琴，以便那些来自柏林和维也纳的流亡者们能在“音乐匮乏”的伦敦找到些宾至如归的感觉[51]。空气里混杂着淋湿的羊毛衣物、劣质烟草与热啤酒的气味。恩格斯和马克思连着主持了十天的会议程序。他们犹如水里的游鱼，对周围任何一丝阴谋和疑虑的氛围都格外警惕。

会议进行当中，马克思大声宣读了由恩格斯起草的宣言。一名与会者后来曾回忆起这位哲学家严谨的逻辑和他略带嘲讽的撇嘴的动作。而另一个人则回忆说，马克思发言时口齿不是很清楚，他说“工人们”的时候有人却听成了“八片叶子的苜蓿”[52]；还有一些会议代表指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然而十天过后，“所有的反对意见都已经偃旗息鼓。”

这次代表大会投票通过了他们二人起草的宣言，大会还同意，宣

告同盟将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废除私有财产，废除财产继承权”作为行动纲领。此时马克思已有好几次用光了来自家庭的经济资助，而且和往常一样，正面临财政破产的境地。同盟委他以一项重任——负责拿出一份号召人们进行武装斗争的宣言终稿。[53]

恩格斯曾希望这本宣传册能“对历史作一个简单综述”，他建议将它取名为《共产党宣言》。他认为，把现代社会的来龙去脉述讲清楚，对分析为什么它注定会自我毁灭是非常重要的。他将这份宣言视为集《创世纪》和《启示录》为一体的综合体。[54]

在恩格斯将英国政治经济学介绍给马克思三年之后，后者业已自称为一名经济学家[55]。而且，他还将对整个科学界都影响至深的进化论原理也一并吸收。和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其他左翼门徒一样，他认为社会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机制，而非仅仅是在周而复始地世代重复自己。[56]

他试图证明，工业大革命的意义不仅在于新技术的应用及生产力的巨大飞跃。它催生了为数众多的大城市、工厂和交通网。它导致了世界贸易的产生。全球范围内的互通有无，而非单一国家的自给自足，已成为新的游戏规则。它为人们带来经济繁荣与萧条的循环交替，它摧毁了传统社会组织赖以维持的精神支柱，并一手塑造出腰缠万贯的工厂主和饥寒交迫的城市工人等各个新兴的社会阶层。

一千多年以来，随着古今众多帝国的兴亡和财富的聚散，地球上稀薄而分散的人口始终在以极其缓慢的速度增长。唯一基本上没有任何改变的是人类赖以所生存的物质环境与条件，这便决定了绝大部分人的悲惨生活无法得到改善。但工业大革命却证明，只需二三十年的时间，一个国家的财富便能得到成倍、而不仅仅是百分比式的增长。它向人类生存最根本的一个假设提出了挑战：人类必须臣服于自然，来自大自然的惩罚是无法抗拒的。普罗米修斯[①]从众神之处为人类盗来了火种，而工业革命则是激励人类去掌握自己的命运。

与同时代的绝大多数人相比，马克思和恩格斯更清晰地感受到了

① Prometheus，希腊神话中的神，帮人类从奥林匹斯偷取了火。

他们成长于其中的这个社会的新颖之处，他们更痴迷于揭示它所蕴含的意义。他们确信，现代社会比以往任何社会的发展都要迅速。然而，对变化的高度敏感与适应却与根深蒂固的传统智慧与说教背道而驰。马克思有句名言，“无论多坚固的东西都将烟消云散。”[57] 毫无疑问，他们之所以有这种真切的感受与他们以外国记者的身份来到英国有很大关系，尤其应考虑到他们自己的国家尚未经过工业革命的洗礼。从德国的特里尔和巴曼前往伦敦的数次旅行从时机上而言是非常超前的。除了查尔斯·狄更斯，几乎没有别的人能像他们二人一样，为自己的所见所闻深深震撼、进而萌发出反抗意识。他们坦承，他们极端鄙视英国“资产阶级”的商业文化，但同时又对它拥有的巨大财富和超强国力艳羡不已。长期敏锐的观察让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在现代世界，政治权力并非从枪杆子里得来，而是从一个国家优越的经济实力及其企业阶层的勃勃生机中而来。

当时，英国是横跨全球的世界工业巨人。“如果问哪个国家的成就最大，那谁也不能否认这个国家就是英国。”恩格斯承认。[58] 工商业促使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英国每年生产的产品与服务的价值，即它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在 1750 年至 1850 年的一百年间增长了四倍。此一百年中的经济增长幅度比此前一千年的总和还高。[59]《共产党宣言》特别强调了生产力这种史无前例的爆发，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这种爆发将决定现代世界的政治力量分配：

> 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此前所有世世代代创造的总和还要多，还要大……它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了人类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出的奇迹远远超越了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它所进行的探险和旅行让历史上的民族大迁徙和十字军东征都黯然失色。[60]

马克思和恩格斯丝毫不怀疑英国的制造能力仍将成倍地增长。但他们同时也坚信，它的分配机制存在致命的缺陷，并因此将导致整个制度的崩溃。虽然社会物质财富与生产力在急剧增长，但近四分之三

的属于劳动阶级的英国人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却微乎其微，甚至仍处于极其低下的水平。据格列高利·克拉克和其他经济历史学家的估计，在1750年至1850年期间，平均工资在之前极低的水平上提高了大约三分之一。[61] 当然，如今劳动阶级的人数比以往有了巨幅增加，英国的人口数额在这段时间里翻了三倍，而且他们的生活水平毕竟远胜于他们生活在法国和德国的同行。

但某些领域内的进步却被其他领域的倒退所抵消。一是大部分工资增长发生在1820年之后，而且主要受益者是技工和工厂的操作工。至于非技术工人——比如农场工——的工资增长幅度低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即使略有增长，也如同马尔萨斯所担心的，已被他们家庭人口的日渐增多所抵消。由于制造业和建筑业深受经济形势好坏的影响，工作机会变得不如以往稳定，工作时间也比以往更长，家庭对妻子儿女出去工作以补贴家用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大。

城市工人的生活水平因为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而大打折扣。早在疾病的传播理论发明之前，在统一收集垃圾和下水道及净水供应得到广泛普及之前，从乡村到城市的移民浪潮便已开始。虽然当时英格兰乡村的生活水准要低得多，但乡村地区的人均寿命仍在四十五岁左右。而相比之下，曼彻斯特和利物浦却只有短短三十二岁或三十一岁。毕竟，在污染并不严重的地区，卫生状况不佳或者营养不良都尚不足以致命。当时，利物浦等地的城市规模以每十年百分之三十一到四十七的速度在持续增长，流行性疾病因而也成了日常威胁，即使是富人中的富人也难以幸免。阿尔伯特亲王，即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即被伤寒夺去了性命。极差的营养和拥挤的居住条件使疾病的危险成倍扩大。十九世纪上半叶，随着涌往城市的移民浪潮的加速，普通工人的健康状况不但未能随工资的增长而一并提高，反而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了恶化的趋势。在1781年至1851年间，人均寿命从三十五岁升至了四十岁，而死亡率却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起便不再下降。婴儿死亡率在许多城区反而有了上升。身高这项生理指标可用来衡量儿童时期的营养水平，但它却经常受到疾病及食物构成的影响。那些在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生的人，身高总的来说呈现出下降的趋势。[62]

英国似乎是中了迈达斯[①]国王的诅咒，对这点保守派和激进派都毫无异议。“英国的这些成功产业虽然创造了巨大财富，但却没能真正让几个人富裕起来。这是一笔中了邪的财富。”卡莱尔曾如此抨击道。[63]经济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也曾断言，十九世纪前五十年是一个国家经历过的最可怕最具灾难性的一段时期。其可怕和灾难性在于，在财富源源不断急剧增加的同时，贫困也在日益剧增；由自由竞争衍生出的大规模制造业，导致和加剧了不同阶层之间的隔阂，致使大批产业工人沦落到社会底层。[64]

的确，正如约翰·穆勒这位英国最有名的哲学家所指出的，逐步废除那些法律、捐税以及特许令，使下层的人民从被指定的城镇、职业与领主的束缚下解脱出来，将会极大增强社会的流动性：“一个人的命运将不再是与生俱来……相反，他将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和外界提供的机会来达到他所期盼的目标。”[65]但即使是像穆勒这样一名自由主义者和对社会主义抱有高度同情之人，也发现大多数英国人的生活待遇鲜有改善：“迄今为止，诸多机械化发明究竟有没有使人们的生存痛苦得以减轻，结论还很值得怀疑。”[66]

因此，在爱尔兰土豆大饥荒[②]爆发的次年，《共产党宣言》的作者们在文中重申了恩格斯早先的论断，即随着国家财富与国力的增加，人民的生活条件却在不断恶化：“现代工人的生活水平……并没有随着产业的进步而水涨船高，相反，他们越来越沦落到该阶级生存所需的条件以下。工人成为了赤贫者，贫困增长的速度比人口和财富的增长还要快。显而易见，资产阶级已经不再适合继续作为社会的统治阶级……无产者在这场革命中失去的只会是身上的枷锁。他们将赢得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67]

由于他在发表的一篇短文中对普鲁士国王有所讽刺，马克思被法国当局驱逐出境。他与数目逐渐在增加的家庭成员以及仆人们一直在

---

① Midas，希腊神话，其被赋予力量能把所有他摸到的东西都变成金子，但后来连他摸的食物都变成金子，他不得不请求免去这个力量。

② 1845 年至 1852 年，爱尔兰因土豆歉收引起饥荒，近一百万人因饥饿而死。

比利时居住，他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出版商为他的经济著作所支付的定金。在长达一个月的英国旅程结束之后，马克思回到了他位于布鲁塞尔的家中，并即刻中断了宣言终稿的写作，而开始就剥削的经济分析举办一系列的讲座……1月，同盟的领导人以将委派别人来完成这项任务相威胁，才使他重新提起了笔杆。当共和党人与政府军在巴黎作战的消息传到大风车街的时候，马克思的宣言终稿也同时经邮递抵达。2月21日当天，同盟油印了一千份用德文书写的《共产党宣言》并派人运送到德法边境。但是，这一千份之中只有一份逃过了普鲁士当局的收缴。

马克思和恩格斯焦急地等待着世界末日善恶决战的到来。如同众多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人士一样，他们“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充满冲突，灾难指日可待的时代”，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68]《启示录》的作者，拔摩岛的约翰，为他们预示了现代社会和他们所写宣言的最终结局：社会将被分割成完全对立的两个阵营，经过一场最终决战，罗马将成为一片废墟，被压迫的阶级将赢得公正，剥削阶级将受到审判，历史将由此终结。

然而，历史在1848年并未终结。那年发生的法国大革命并未赢得社会主义的实现，甚至连男性公民的普遍投票权都未能赢来。它带来的只是拿破仑三世[①]的统治。法兰西共和国的成立使马克思又被驱逐出了比利时，他在巴黎找到了一个新的避难所，但还没住上几星期，他又遭到了法国当局的迫害。巴黎警方威胁要将他放逐到一个沼泽丛生、恶疾肆虐、离首都几百里远的小镇上去。马克思以健康为由提出了反对，并开始寻找有可能收留他的国家。1849年，他移居到了伦敦，这里当时被视为“外国流亡者的圣地”。法国前国王路易·菲利浦和无数遭到政治流放的人都客居于此。[69]这只是权宜之计，马克思这样安慰自己说。

马克思刚到伦敦，正赶上该市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霍乱爆发。等

① 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趁1848年法国革命之机，攫取了法国政权，于1852年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帝国，成为拿破仑三世。

到疫情平息，总共有一万四千五百名成年人与儿童丧命。[70] 这次疫情的爆发促使身为新闻记者的亨利·梅休开始着手撰写一系列反映伦敦贫困居民的新闻报道。[71] 梅休曾经梦想成为一名科学家。他与父亲的关系势同水火。他身材圆胖，精力旺盛，性情颇讨人喜欢。时年三十七岁的他以前当过演员，还与人共同创办过一份幽默杂志《庞奇画报》。但他缺乏理财之术，彼时尚未从令他灰头土脸的破产案中恢复元气。那个案子使他失去了位于伦敦的一幢别墅，还差点将他送进监狱。在接下来的数月中，他闭门造车写了一些《点铁成金的天才们》之类颇带自嘲的低俗小说。就在这时，他突然发现了一个能让自己东山再起的机会。

梅休的八十八集系列报道让读者跟随他一起对伦敦这一“霍乱之都”[72] 进行了一次逐门逐户的巡视。位于伯曼齐角上泰晤士河南岸的雅各布岛[①] 的受灾情况尤其严重，狄更斯的《雾都孤儿》更是使该地臭名远扬。梅休向读者们保证，他将对该地区居民究竟是愿意工作、不愿工作还是无法工作的实际情况进行翔实反映。[73] 他请读者们放心，他并非“宪章派人士，也不是一名保护主义者，更非社会主义分子和共产党员”。这是大实话，他仅仅是一名“事实收集者”。[74] 于是，在数名助手和收取了订金的出租司机的配合下，他一头扎进了那个地区的众多屋棚：它们有着“吓人的木制走廊……木板上有破裂的洞口，你从口子里可以看到板子底下的烂泥。窗户也破败不堪，窗台上伸着晾晒衣服的竿子，却从未见到过几件衣服；他们赖以栖身的房间是如此狭小、肮脏和压抑，但相较而言，这里的空气污染似乎更为严重”。[75]

梅休发现，伦敦的劳动人口远不能以一言概之。相反，他们就如同一块马赛克，由许多各不相同而且极其特殊的群体所构成。[76] 他对这座城市中最大的行业——拥有十五万从业人口的家庭佣人行业（这个数字也能反映出该城市里富人暴增的规模）未予重视。同时，八万多被雇来兴修铁路、桥梁、道路以及排水系统的建筑工人也未能吸引他的兴趣。梅休集中报道的是为数不多的几门制造行业。正如历史学

① Jacob's Iseland，泰晤士河南岸。

家珈瑞斯·琼斯所解释的，伦敦的劳务市场是各种极端的混合体。一方面，这座城市吸引了大量能工巧匠，他们投富人之所好，能挣到比其他城市高出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的收入，这几乎相当于小文员或者商店服务人员这些中下阶层主要成员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非技术劳工仍在源源不断地继续涌入。虽然这些劳工比其他省同行们的工资要高，但由于这里人口过于膨胀，房屋设施也过于陈旧，使得他们的实际生活状况倾向于比别处更恶劣，比如怀特查佩尔、斯德普尼、波蒲拉尔区、贝斯诺·格林以及南瓦克区。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国会调查组的报告对这些地区的状况都有非常详尽的记载。而那些小职员、销售员以及其他白领工人，因为能够支付新出现的公共汽车和火车的费用，因而得以从城中逃脱而移居到发展迅速的城郊。而非技术工人们则别无他法，只能留在距离工厂很近并能步行去上班的地方。

来自外省甚至外国的竞争促使工厂竭力缩减劳动成本。比如血汗制度和计件工资制度就经常迫使工人在自己的住所干活，这种制度是为制衣、裁缝以及制鞋等产业量身定制的，否则，昂贵的租金、间接营业成本和工资加在一起将会逼得这些企业迁出伦敦。因此，珈瑞斯·琼斯得出了一个结论，即伦敦的贫困现象以及它的血汗工厂、人满为患、工人的长期失业以及依赖救济为生等诸多问题，事实上都是伦敦财富的衍生品。城市的急剧扩张导致土地价格、经营成本和工人工资的骤然上涨。高工资吸引了更多缺乏技术的新劳动力的到来，而这又迫使企业寻求以更为廉价的劳动力来取代相比之下工资更高的工人。

伦敦的缝纫女工便是这种现象最典型的一个缩影。梅休在他最令人动容的几个故事中对她们进行了详尽的描述。“从古至今还从未有人目睹过这种场景，或听说过这种遭遇。”他如此宣称。[77] 以人口普查资料为基础，梅休估算出伦敦大约有三万五千名缝纫女工，其中的两万一千人在条件尚可的制衣厂工作，包括为富人提供服务的服装定制店和那些面向中下阶层的厂子。而剩下的一万四千人，他写道，则沦为了工作条件极其恶劣的血汗制度的受害者。[78] 梅休竭力替她们争辩说，计件工资的工资率甚至比维持生计的最低标准还要低，这些缝纫女工们于是不得不靠偷窃、典当或卖淫来勉强过活。[79]

这一次，梅休不再只是一名观众，而是成为了一名演出经理人。11月，在一位牧师的协助之下，他组织了一场名为“缝纫女工的街头控诉”的活动。他事先答应替所有参加者严格保密。活动将所有男性排除在外，只有两名速记员负责记录。在暗淡的灯光下，二十五名妇女拿到了入场券并将逐一登台。组织者鼓励她们将自己的悲惨遭遇公之于众。在场的那位牧师也热情地劝说她们畅所欲言。出乎梅休意料的是，她们真的照办了：

> 接下来的这个故事也许是我听过的故事当中最悲惨最感人的一个。我必须得对自己说，可怜的玛德琳所经受的精神与肉体上的痛苦是非人的，是无以复加的。她是一个个头高挑，发育正常的女孩，有着引人注目的普通女性的身体特征。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她一直用双手捂着脸失声痛哭，她的抽泣声如此之大以至我们难以听清她的话语。虽然她抬着手挡在自己的眼前，但我仍能看到眼泪从她的指缝里汩汩流出。在我的记忆中还从未亲眼目睹过如此撕心裂肺般的悲痛。这绝对是实话。[80]

梅休在《纪事晨报》上的详细报道表明，卡莱尔对现代工业社会的最大担心正在成为现实。人们对经济学家们也发出了愤怒的咆哮：

> 供需规律，不干预原则，自愿原则，时间将会自发完善；直至英国的工业存在在物质与精神上都病入膏肓，沦为一片瘟疫横行毒害丛生的沼泽；它是一个活生生的万恶的受难所[①]，它将人们的精神与肉体一同活生生地埋葬掉；它是吞噬了库尔修斯[②]的那个深不可测的海湾，从未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感谢《纪事晨报》做了一件报纸不常做的事情，它为千家万户的读者描述的这一幅幅场景应当会在所有读者心里引起难以言喻的感慨。[81]

---

① Golgotha，基督被钉死之地，受难的场所。

② Curtius，古罗马的英雄，为拯救罗马而被海湾吞噬。

而这些难以言喻的感慨之一便是，阶级矛盾已经尖锐得犹如火山即将爆发。“你读过刚报道出来的那些人间惨剧吗？它就发生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上。”道格拉斯·杰拉德，《庞奇画报》的时任主编同时也是梅休的岳父曾这样问他的一位友人。“当读到居然有整整一个阶层的人都在经受如此的痛苦，当读到居然有人在从事如此贪婪、残暴、野蛮的经济剥削，人们情不自禁要问，这样的世界还有必要存在下去吗？”[82]

1850年，梅休在《纪事晨报》上发表的“劳工与贫穷”系列报道持续了整整一年。在他近半数的文章见报之后，他公开宣布了他更为宏大的终极目标。他坦承，希望能发明一种“新的能倾听劳工阶层呼声的政治经济制度”。为了证明他的这一理想可行，他断言，在当今这个时代，人们最急需的、最翘首以待的就是一个新的经济制度，“这个制度，它不但对雇主，而且对工人也应当给予公正的待遇”。[83]

卡莱尔的好友约翰·穆勒也是出于几乎同样的动机开始了他《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的写作。该书在梅休的文章发表之前两年，即1848年出版。而现在，它已成为自亚当·斯密《国富论》之后拥有读者最多的经济学著作。

“来自工人阶级的控诉是当今社会最为迫切的问题。”穆勒曾于1845年这样写道。那年正值爱尔兰土豆大饥荒爆发，这也是让他萌发写这本书的念头的原因之一[82]。当时，三十九岁的穆勒正与哈里特·泰勒相爱，后者是一位对自己的婚姻生活不满的女知识分子。卡莱尔形容她“脸色苍白……情感炙烈，神态忧郁”，是“现实罗曼史里的女主人公”[83]。因为哈里特的丈夫坚持拒绝离婚，穆勒变得日益沮丧。同时，他对她那套社会主义观点的同情也不复当初。

穆勒希望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来消除卡莱尔和泰勒二人所指出的该门学科的缺陷。卡莱尔说：“它沉闷乏味，迟钝消极，让人看不到这个世界或未来世界的希望所在。”[84]而泰勒则批评它对劳工阶层充满歧视。与狄更斯一样，穆勒认为处理这个问题特别需要避免“生硬抽象”，这种方式曾经让以往的一些政治经济学家名誉扫地。他觉得他们的失误在于“让那些本应该受到指责的人反而得以浑水摸鱼，名利双收。”[87]

穆勒一定想到了大卫·李嘉图，这位出色的犹太股票经纪人兼政治家。在三十七岁那年，他开始将经济学研究当作其第三职业。从1809年开始一直到到1823年不幸去世，他不仅将亚当·斯密杰出但稍欠严谨的理论重新塑造成一门内在统一、定义准确的数学理论，而且还提出了众多自己的独特观点。他认为，无论穷国还是富国都能从国际贸易中受益，而且一个国家若能专注于它擅长的产业，往往便能兴盛发达。然而，由于他倾向于用数学符号来阐述自己的观点，而且其结论太过冷酷，使得许多《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的潜在读者望而却步。他总结出了一条“工资铁律”，即工资水平在短期内会因为供求关系的影响而出现上下波动，但从长期来看，它会趋向于接近最低生活标准。这个观点结合了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它认为，数额的增长并不能表明工人工资有任何实际意义上的提高。[88]

穆勒发现，李嘉图、斯密还有马尔萨斯三人，都是个人经济政治权利的积极宣扬者，但同时，他们对奴隶制、保护主义、垄断以及地主特权又都坚决反对。而穆勒本人也支持工会，普遍投票权以及妇女拥有财产的权利。为了应对四十年代大饥荒所引发的经济矛盾和政治斗争，他呼吁重新废除对进口谷物收取百分之五十关税的制度。普通劳工三分之一的工资都被用来为自己和家庭提供食物。穆勒成功地预见到，一旦进口粮食的关税被废除，粮食价格必然下跌，而工资的实际购买力则会上升。尽管如此，穆勒对工人的生活水平究竟能有多大幅度的提高仍然十分悲观。和卡莱尔一样，他确信废除《谷物法案》只是权宜之计，不过是在拖延时间罢了。就像当初发明铁路、开发北美和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一样。这些发展虽然都不无裨益，但却无法改变整个世界赖以运转的规律。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李嘉图的“工资铁律”以及收益递减定律（即认为往一亩农田中投入的劳力越多，从中得到的额外增产反而会越来越少），这三者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那便是，人口增长必然快于资源的增长，要一个国家的财富增加只能以盘剥穷人为代价，穷人们“注定只能永远从事简单的再生产”。[89]而政府能做的只能是尽量创造条件，鼓励人们的自我奋斗并且保障市场供求机制的顺利运行。

穆勒认为，经济为自然法则所主宰，它犹如地球重力，并不以人的意志而改变。“令我高兴的是，”1848 年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撰写完毕之前写道，“价值理论现在以至将来都已无需人们再为之作额外的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现有理论已经非常完善”。[90]

对穆勒的这一论断，亨利·梅休却不敢苟同。他认为穆勒的不足之处在于他未能将政治经济学转化成一门“愉悦的科学[①]”，换而言之，它没能让人类的幸福、自由以及对环境的主宰的总和得到任何提升。[91]事实上，仅凭穆勒未全盘抛弃“工资铁律”这一点，人们便有足够的理由将其推翻重来。最终，梅休并未能如愿地对古典工资理论提出强有力的挑战。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也始终无人能做到这点。尽管如此，他对伦敦劳工阶层的系列报道仍堪称是一座里程碑，它成为了年轻一代“社会调查者”的行动指南，这些人为他的报道所鼓舞，也被他的理念所说服，他们都希望了解，在不全盘推翻现行制度的前提下，社会究竟能得到何种程度的改善。

马克思在伤寒肆虐的高峰期来到了伦敦。不出两年，为了参观万国博览会，全世界的人们似乎都在朝他的避难之处蜂拥而来。这一首届全球盛会的始作俑者也是一位德国移民，他便是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但马克思对此事却兴致全无。此时，他与妻子燕妮和他们的三个孩子及仆人一起住在伦敦的苏活区。他们租有两间阴暗邋遢的房间，位置在一家商店的楼上。为了远避喧嚣，马克思躲进了大英博物馆，因为那里有着教堂般的幽深和启人遐思的宁静；阅览室有个硕大的穹顶，马克思在里面的座位号码是 G7。当时报纸上铺天盖地全都是关于在海德公园兴建水晶宫的报道，但马克思却对此置若罔闻。他将英国经济学家们的著作逐一作了仔细的研究，包括马尔萨斯、李嘉图，还有詹姆斯·穆勒，即约翰·穆勒的父亲。马克思做了大量摘抄，记录了大量公式，同时也写下了无数带批评性质的读后感。让那些世俗之人争相去资产阶级的神殿中顶礼膜拜吧。他对自己说。

① The Gay Sciense，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的著作。

他绝不会与这些虚假的神祇扯上任何瓜葛。

1851 年 5 月，此时的马克思不再是一个懵懵懂懂只会穿着睡衣给贵族家的小姐写情诗的大学生，也不再只是一名声名狼藉每晚在巴黎街头的酒馆里买醉的记者。自他从耶拿大学[①]取得函授博士证书，十年来，他已经耗尽了从一位远亲那儿得到的六千法郎的意外遗产。他前后创办过三份不同的激进刊物，其中两份在仅仅发行首期之后便寿终正寝。他也尝试干过别的正式工作，但没有一次能坚持数月。虽然昔日的同伴恩格斯已经出了一本畅销书，但他自己的著作却仍遥遥无期。他也发表了一些针对其他社会主义派别的文章，但大多是些冗长乏味的口水仗。此时，他年已三十有二，既没有工作，又正寄寓他乡。他家庭的成员在不断增加，有时他不得不开口向朋友们借贷度日。幸运的是，他有一位看护神，就是恩格斯。恩格斯允诺，为了让马克思能专心著书，他会去他们家族的公司里谋一个差使。

与此同时，随着各国政要竞相来伦敦访问，苏格兰场加强了对各类激进分子的监视。根据普鲁士政府派遣的间谍所写的一份报告，马克思能造成的最大威胁就是他家中太欠收拾，绝对达不到比腾太太[②]对家庭卫生的要求：

> 马克思住在伦敦条件最差的区，当然也是最便宜的区。他们家租有两间屋。临街的那间是客厅，卧室则在后面。整套公寓里没有一件干净像样的家具，所有的东西都破旧不堪，屋里遍积灰垢达半寸之厚，狼藉之状为我所仅见。客厅中间摆了张硕大的老式书桌，上面铺了层油布，桌上摆着若干手稿、书籍和报纸，还有小孩的玩具，他妻子的针线篮里的一些碎布头，数只断了把儿的杯子，吃饭用的刀叉、台灯、一个墨水瓶，还有几只玻璃酒杯、荷兰式样的陶制烟斗和一堆烟灰——总而言之，所有的物品摆得乱七八糟，一片狼藉，而且全堆在一张桌上。即使卖二手货的旧货商见了这一堆七零八碎的东西也会不屑一顾。[92]

---

① University of Jena.

② Isabella Mary Beeton（1836—1865），著有《比腾太太家务管理手册》。

博览会这一段时期代表着马克思生涯中的一个新低潮。虽然他与夫人非常恩爱，但却不小心擦枪走火，让他的贴身女仆，也是他们家的女佣，海伦·德姆斯怀上了身孕。当时也正在怀孕的燕妮得知此事后怒不可遏。在燕妮生下一个病恹恹的女婴后三个月，家里的女佣也产下一名活蹦乱跳的男婴。在外国流亡者的圈子里已经开始有了风言风语，为了掩盖这桩“令人难以启齿”的丑闻，马克思在伦敦东区为刚呱呱落地的男婴找到了一个领养家庭，并把孩子即刻送了过去，此后再未见过他一面。“某些人在此事上表现得非常不得体。”马克思曾向恩格斯如此抱怨。[93] 男孩的母亲却仍旧留了下来，跟往常一样照顾着马克思一家人。因为呆在家中让他觉得难以忍受，马克思每天一大早便赶去他编号为 G7 的在阅览室的座位，并一直在那里待到关门为止。

1851 年 5 月万国博览会开幕之际，马克思开始对这个现代的罗马帝国还能否被它自己的臣民推翻产生怀疑。他没有盼来宪章党人围攻白金汉宫的场面，却看到总共四百万英国人和数以万计的外国人涌入海德公园来参观这场首届世界盛会。如潮水般涌来的游人使托马斯·库克的旅游生意从此开始蒸蒸日上，同时，它也让背景各异的人们有机会聚在一起。“此前在英国还从未有过这么多不同阶层的人们如此自由公开地聚集一堂。”当时对博览会的众多报道中的一份曾经发出了这样的惊呼。[94] 而在马克思的眼中，博览会与罗马统治者们曾经上演过的盛大角斗表演如出一辙，其目的都是为了麻痹广大的普通民众。“英国宛如一块巨石，它挡住了汹涌澎湃的革命潮流。”他在早先发表在德国《新莱茵报》上的一篇短文中曾这么写道，“发生在法国的每一次社会变革无一例外都会受到来自英国资本家的阻挠，因为后者主宰着全世界工业与商业的命脉”。[95] 博览会的初衷是为了鼓励自由的商业竞争。阿尔伯特亲王和其他赞助者们都希望藉此机会促进世界和平。而马克思却在祈祷战争的到来，因为“只有一场战争方能让旧的不列颠帝国分崩离析……从而使无产阶级藉机夺取政权”。[96] 根据他的推断，战争带来的后果越严重，革命爆发的可能性就越大。

但同时，他也不愿完全否认另外一种可能，即制造业自 1848 年以

来取得的巨大进步将引发一场全新的更加致命的危机。他轻蔑地将博览会称为“变态的商品崇拜”，他预言，资产阶级制度的崩溃即将到来。[97] 正如他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写，“从根本上而言，资产阶级亲手创造出了它自身的掘墓人”。[98]

革命的来临是“必然的”，也许在英国，也许在欧洲大陆。为了赶在革命到来之前将书出版，马克思开始狂热地投入到写作中去。对他而言，此书宛如一部启示录，它是对英国人所谓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一次批判。[99] 马克思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为他的著作搜集资料。“在现代财产私有和竞争的制度之下，人们的生活水平究竟能得到何种幅度的改善？”以及“这种制度还能延续多久？”这两个当代最为重要的问题，马克思在心里给出的答案都是否定的。但他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才能证明这一点。

1844 年马克思刚刚开始接触经济学的时候，他的出发点并非是为了描述和证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活有多么悲惨。十多年来的不断曝光，无数次的国会调查，以及包括恩格斯在内的社会主义者所散发的宣传册，都已经成功做到了这一点。马克思最不愿做的便是像某些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一样，仍然从道义（当然是指基督教）的角度来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比如蒲鲁东[①] 就曾宣称，“私有财产即偷窃”。马克思丝毫不指望资本家们会像他最心仪的小说家狄更斯在《小气财神》中曾经梦想过的那样，会回心转意，会良心发现。他素来旗帜鲜明地反对任何基于上帝训谕的道德观念，他坚信，人类应当自己制定一套行为准则。

他这部巨著的关键是要以“数学意义上的必然”来证明私有制和自由竞争必将失败，因而“革命也必将来临”。他企图为人们揭示出“现代社会的运动规律”。因此，正如德国的宗教学者指责圣经中的字字句句都是伪造和虚构的一样，他也必须将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及穆勒等人的理论当作虚假的宗教来予以揭露。他为他的著作起了一个小标题，即“政治经济学批判”。[100]

---

① Pierre-Joseph Proudhon（1809—1865），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经济学家、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

马克思的一位医生朋友，库格曼·路德维希，曾将一座大理石的宙斯[①]半身像当作圣诞礼物送给马克思。但他的“运动定律”并未如这位朋友所希望的那样，像雅典娜[②]一般从他冥思苦想的头脑中喷薄而出。是身为记者的恩格斯为马克思提供了其经济理论的初稿。而马克思面对的真正难题是如何证明这个理论在逻辑上是严密的，在实践上也是可行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本主义的必将破产给出了两点原因：其一是，财富创造得越多，大众的生活就越悲惨，“劳动者生活水平的恶化程度与资本积累的速度成正比”；其二，财富创造得越多，呈周期性爆发的金融与商业危机“所波及到的地区就越广泛，所造成的后果也越严重”。[101]

《共产党宣言》指出，“不断下降的工资水平”与“日益增长的工作负担”二者同时存在，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马克思在其《资本论》中断言，“资本积累的法则”要求在降低工资的同时，增加工人劳动的时间与强度，而这必将导致工作环境的恶化、工人生活质量的下降以及工人寿命的缩短。但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并未再提及经济萧条在愈演愈烈这一点。[102]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进行了驳斥。《人口论》实际上也是一部关于如何确定工资水平的理论。为了构建他的理论体系，马尔萨斯假设，决定工资水平的唯一因素是市场中寻求工作的工人数量。工人的数量越多，意味着工人之间的竞争越激烈，于是工资便会下降。工人的数量越少，结果则会相反。针对马尔萨斯的理论，恩格斯在其1844年所著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早已旗帜鲜明地指出它的致命弱点，即“贫穷在每一个社会都会存在，在社会主义社会亦然”。

而马克思高屋建瓴的理论是基于一个假设：所有的价值，包括剩余价值在内，都是由工人在劳动时间内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无一例外都是从工人没有得到报酬的那部分劳动中产生的。”在《资本论》

① Zeus，希腊神话中的主神。

② Ethena，来源于希腊语，含义是“智慧女神”（the goddess of wisdom）。

中，马克思引述了穆勒的话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 “追本溯源，生产工具与生产资料，如同其他所有的物品，最初便是通过劳动而非其他获得的。制造生产工具与生产资料所付出的劳动，与接下来运用生产工具来加工生产资料的劳动加在一起，这个总和便是在制造一件商品的过程中所耗费的劳动总额……去除资本，只不过是去除了用来雇佣工人从事生产劳动的工资而已。”[103]

研究经济学诸流派历史的马克·布劳格指出，如果只有工人的劳动时间能创造价值，那么安装效率更高的机器、重组销售团队、聘请更得力的公司领导人以及采取更佳的市场策略，所有这些与雇佣更多的工人无关的行动，则应该会导致利润的下降。因此，按照马克思的理论，防止利润下降的唯一措施便是加大对工人的剥削，强迫工人工作更长的时间，而不付给他们相应的报酬。正如亨利·梅休在《纪事晨报》上的连续报道所详细揭露的，为了达到削减真实工资的目的，办法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的。布劳格写道，无论是工会还是“剥削阶级的组织形式”——政府，都无法扭转这一进程，这一点对马克思的理论而言是至关重要的。[104]

出人意料的是，为数众多的学者都否认马克思曾经说过工资从长远来看必然呈下降趋势，或工资会趋近于生活所需的最低标准之类的话。然而他们却忽视了马克思曾在许多不同场合多次表述过这样的意思。工人在创造更多数量或更具价值的产品的同时，却无法得到相应更多的回报，这正是资本主义制度难以为继的痼疾所在。

马克思宣称，工人劳动创造了所有的价值，因而，工厂所有者的收入，包括利润、利息以及管理者的薪水，都属于不劳而获。他并没有说过工人进行生产并不需要资本的话，比如厂房、机器、工具、技术与版权之类，但他的说辞是，工厂所有者拿出来的资本只不过是工人以往劳动的产物。这简直就是基督教对待利息的立场在世俗社会的翻版。但任何资源的所有者，无论是一匹马，一幢房屋，还是一笔现

金，都可以把资源拿来以供自己使用。马克思的逻辑是，将本可以今天进行的消费留待明天进行，拿资源去冒风险，或者去经营管理一个企业，这些活动都不具有价值，因此它们都不应该得到回报。这等于在说，即使没有日积月累的储蓄，没有俟商机而动，没有甘冒风险，商品也一样能被生产出来。

正如布劳格所指出的，这段话的破绽在于，它只是在用另一种方式来阐述只有劳动才能创造价值这个论点，而这本该是马克思必须首先要证明的。因此，它并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论据。

马克思从官方发表的蓝皮书、新闻报纸、《经济学人》杂志和其他资料上搜罗来了令人瞠目的大量事实，他希望用它们证明在十八世纪下半叶到十九世纪上半叶期间，工人的生活水平是何等凄惨，他们的工作环境是何等恶劣。但他并未能成功证明，在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期间，即在他写作《资本论》的这段时间里，工人的工资或者生活水平的的确确是在下降。更直接地说，他未能证明他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工资或生活水平在未来必然呈现下降的趋势。

假若马克思能像亨利·梅休一样走出去，好好观察一番四周，或者是能同与同时代的约翰·穆勒等面临着同样问题的伟人们有所接触，他便会发现世界并未如他与恩格斯所预言的那样在变化。中产阶层在不断扩大，而不是在消失。金融恐慌和产业萧条也并未继续恶化。

万国博览会闭幕之后，“盛大的庆典”依然没有结束。有位商人将水晶宫买下拆卸之后移至位于伦敦城南的西德纳姆，并以更大的规模重建。让马克思格外厌恶的是，这座新水晶宫开张以后摇身一变，俨然成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迪斯尼乐园。这还仅仅是一个兆头。更糟的是，经济忽然间又开始繁荣起来。马克思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财运亨通的时代”，“生产力又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与进步”，第二个十年中的进步比头十年来得更加迅猛：

> 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还没有哪个时期能比刚过去的这二十年更适合被用来对资本积累进行考察……而英国又是所有国家当中

> 的典型，不仅因为它在全球贸易中占据着头把交椅，有着最发达最齐全的资本化产业，而且还因为它自1846年以来施行的自由贸易法案已经将传统世俗经济逼入了一条无路可退的死胡同。[105]

对马克思理论更为致命的是，随着资本以工厂、建筑、铁路和桥梁等各种方式继续在积累，工人的实际工资并未降低。在1840年之前的数十年之中，实际工资的上涨大多只局限于技术工人。而且，由于失业的压力、劳动时间的增加以及家庭成员的增加，工资的这种上涨对生活水平的提高能起的实际作用其实微乎其微。而相比之下，在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工人劳动收入的上涨幅度却是巨大的、无可辩驳的。这在当时便已引发了众多的讨论。维多利亚时期的统计学家罗伯特·吉芬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中期“物质财富的增长”是无可争辩的。[106] 律师兼统计学家罗伯特·巴克斯特在1867年曾把收入分配的状况比作一座海拔一万两千英尺的死火山，“在它的最底层是广大的劳工人口，往上走是中产阶层，山顶的最高处则是那几个富可敌国的人”。[107] 特内里费[①]之巅极其形象地喻示了分配多寡的现状。尽管如此，截止至1867年，巴克斯特的数据显示，劳动阶层在全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呈上升的趋势。

后世的学者们也纷纷确认了这些最新的发现。早在1963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邦就曾经坦承，“那段时期大约是于1842年至1845年左右结束的，这点已成为公论[108]。人们尚有争论的只是在那段时期里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时间离现在再近一些，查尔斯·费恩斯坦，这位在关于工业革命所具有的影响的辩论中一贯持“悲观”立场的经济历史学家，也得出了“实际工资水平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的结论。[109]

马克思始终未与外界有过任何接触。他也根本没下工夫去提高他的英语。[110] 他局限在与他声气相投的移民小圈子里。他与英国劳工领

---

① Tenerife，是西班牙在非洲领地加那利群岛中的一个岛屿，多火山。

袖们的接触也极其肤浅。他从未同可以与他平起平坐进行探讨的人们有过任何思想交流。他称当时的经济学家们为“为自由贸易这个大公司跑腿的商业旅行者”[111]，他们的理论观点正是他竭力想要铲除的，当然更不会与他们有什么来往。他从未会见过以下这些大师级的人物，也从未与他们有过任何学术交流：约翰·穆勒，哲学家；查尔斯·达尔文，生物学家；赫伯特·斯宾塞[①]，社会学家；乔治·艾略特[②]，文学家；这些人中的有些人曾在离马克思家不过一两英里的地方住过或辩论过。更令人惊讶的是，虽然他的挚友（指恩格斯）是一位工厂主，虽然他在著作中对机械化生产的恐怖之状作了大量绘声绘色的描述，但马克思从未实地参观过一家英国工厂，或是任何一家工厂。在他去世前不久，马克思曾前往查理温泉[③]做过理疗。在那里，他终于在向导的陪同下参观了临近的一家陶瓷制品厂。[112]

在恩格斯的再三坚持下，马克思于1859年极不情愿地为他尚未完稿的著作发表了一份预览书样。这本取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薄薄小册子出版后迎来的是惊讶和尴尬。除了恩格斯应马克思之约发表了一篇未署名的评论之外，它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其他反响。[113]

马克思曾三番五次为他留居英国，甚至申请英国公民的决定进行辩解。伦敦是当代的世界之都，这对他考察社会发展以及窥测它未来的走向大有裨益。但同样身为流亡者的赛亚·柏林曾这样写道，“其实，假如那里有他所需要的书籍、报刊和政府报告，他就是去马达加斯加[④]打发他的流放岁月也未尝不可”。时至1851年，他开始潜心完成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著述，他声称，这部著作将会使英国现存的经济理论全部都土崩瓦解。在此后的十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他一直都“固执己见，他的思想和态度几乎没有起过任何变化”。[114]

“将资本主义制度从产生到灭亡的全过程作一个详尽的描述与解释”[115]，马克思最初产生这样的念头时，他的视力已经差到要将书本

---

① Herbert Spencer（1820—1903），19世纪英国实证主义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教育理论家。

② George Eliot（1819—1880），英国小说家，与狄更斯和萨克雷齐名。

③ Carlsbad，捷克著名的温泉城。

④ Madagascar，世界第四大岛，位于印度洋，距非洲东南岸约250哩。

和报纸举到眼睛跟前才看得清的地步。不知近视的毛病对他的思想和观点有怎样的影响。德谟克利特[①]曾被马克思当作自己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据说他就曾有意将自己弄瞎。有传说称，这位古希腊哲学家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让自己免遭漂亮女人的诱惑。换言之，他希望能与繁综错杂千变万化的现实世界隔绝开来，以便能专心对着自己脑中的形象与意识冥思苦想而不受外界的干扰。

也许有人在想，当马克思一家从商店楼上的狭小公寓搬到伦敦的一处按期付款的贵族别墅之后，这也许会让他对自己的理论心生疑惑。在他竭力证明资本主义必将失败的二十年中，他自己业已从一名流浪汉摇身变成了有产者。他已经不再支持共产主义纲领中关于即刻废除遗产权的主张[116]。马克思一家利用他们所得到的几笔遗产中的一部分将他们以前“苏活区的洞穴”换成了位于汉普斯德特西斯[②]中产阶层新开发区的一幢“漂亮房子”。这个区是如此之新，以至于他们刚搬进去的时候发现马路还没铺好，街上还没有汽灯，公共汽车也尚未开通；有的只是成堆的垃圾、石头和污泥。

马克思常说，一种制度若是在增加财富的同时不能让悲剧减少，那么这个制度一定有其腐败之处。但他似乎从未意识到，悲剧有时确实会随着财富的增加而增加。他自以为，伦敦的贫民区几十年来变得越来越像狄更斯所描绘的那样凄惨，因此它们便是现存经济制度不能为普通大众提供体面生活的最佳证据。但历史学家珈瑞斯·琼斯却有一种相反的解释，他认为，住房危机是伦敦城市急剧扩张、财富累积以及对非技术劳工的大量需求所派生出的副产品。关键在于，在维多利亚时期中叶，伦敦为了大兴土木而进行了规模巨大的拆迁和重建。在 1830 年至 1870 年间，为了扩建伦敦港、铺埋铁轨、兴修新牛津街以及挖下水管道和供水管道，整个伦敦市中心有上千英亩的土地被铲平。而这大多数是相对贫困因而地价也较低廉的街区。接着，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伦敦地铁的首条线路也开始挖掘。于是，当数以万计

① Democritus（约公元前 460—370），古希腊哲学家。

② Hampstead Heath，位于伦敦北部。

的外来移民络绎不绝地来城市寻找工作的同时，能满足可以步行去伦敦许多工厂上班这一条件的房屋供应量却在大幅下降。因此，工人们不得不住进一些更加破败、更加拥挤，而租金却更贵的宿舍。后来，随着拆迁重建的结束以及白领工人纷纷移居城郊并搭乘火车上班，住房危机才逐渐得到缓解。

1862 年博览会期间，马克思的经济状况经历了又一次低潮。《纽约论坛报》的发行人贺拉斯·格里利裁掉了他的专栏，虽然实际上马克思给这个专栏的投稿全是恩格斯在幕后撰写的，但它毕竟是一个额外的财源。他在经济上一度陷入了捉襟见肘的困境。他不得不去申请一份铁路职员的工作，但却因为“糟糕的书写”和不会讲英文而被拒绝。他也曾动过移民去美国的念头。幸运的是，他仿佛是一只牡蛎，需要经过些许沙子的磨砺才能孕育出晶莹璀璨的明珠。出于经济上的考虑，没多久他便又开始撰写一篇长篇经济学论文，他的笔记本顿时又被记得满满的。他不时地发牢骚说，他觉得自己“仿佛就是一架机器，它狼吞虎咽地将各种书籍吃下去，然后再将它们改头换面地拿出来，抛在历史的垃圾堆上”[117]。与此同时，他为自己的著作拟定了最终的书名：《资本论》。[118]

博览会的喧嚣依旧让马克思郁郁寡欢，不然的话，他也许会有与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①]同样的反应。这位俄国作家称那幢玻璃建筑为“神圣的景观，让人一望便联想起巴比伦，它仿佛是《启示录》中的某个预言在我们眼前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119]。然而未出两年，马克思便又一次时来运转。他不但从数笔意外的遗产中得到了馈赠，而且每年还能从恩格斯那里获取三百七十五英镑的津贴。因此，他得以再一次将家搬至一处更大更富丽堂皇的别墅中。很快，他每年的花销达到了五百到六百英镑，这样的生活水平对当时百分之九十八的英国家庭而言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120]

正当马克思几乎将世界末日一事忘到九霄云外之际，它却在突然

① Fyodor Dostoyevsky（1821—1881），19 世纪俄国文坛上与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齐名。

之间降临了。

1866年4月17日，这一天是排水量达一万一千吨的诺森伯兰号战舰下水的日子，对英国来说，这本该是一个举国欢庆的时刻，因为它又一次向世人证明了大不列颠帝国在世界工业与商业领域所占据的统治地位。但结果却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诺森伯兰号已经在密尔沃造船厂的船坞坡道上停靠了将近五年。在下水当天，超乎寻常的重量使它突然意外地从原定的轨道上滑落出来。据人们事后回忆，这或许也是航运业和造船业从此风雨飘摇江河日下的一个先兆。

紧接着不到一个月，在5月10日星期四下午，恰值伦敦划船季的第一个星期，一个令人惊恐的消息将整座城市搅得心神不宁。欧沃伦格尼，这个商业银行中的劳斯莱斯，这个曾经被普通市民视为和英国皇家造币厂一样坚不可摧的银行破产了。“在获知这个消息的当天和接下来的数日中，人们的惊恐之状简直难以用笔墨形容”。《伦敦时报》负责金融报道的记者曾这么评论。“没有人有安全感。”次日上午十点，一大群“争先恐后近似疯狂的债权人”冲进了伦敦的金融中心，他们当中有男有女，并且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到中午时分，骚乱已经演变成一场暴乱。大多数银行的大门都遭到了围攻，如潮水般汹涌的人群将伦巴底街堵得水泄不通。[121]

《纽约时报》驻伦敦的负责人给他的编辑们发去一封紧急电报，电报称“眼下这一次恐慌比记忆中英国大城市经历过的任何一次都更加可怕”。最终，政府不得不增调来一队警察以维持秩序，而且，政府的财政大臣下令暂时废止《英格兰银行条例》。而到此时，英格兰银行已丧失了其百分之九十三的现金储备。英国的金融市场陷入了完全冻结，一部分靠资金借贷赖以维持的银行和企业面临万劫不复的境地。“所有英国人都在瞻前顾后，如痴如狂……最终的审判日终于降临，所有的银行家、资本家和商人的脸上都是一副惶惶不可终日的惊恐之状。”[122]

密尔沃造船厂的老板们成了这次大恐慌的首批受害者。在全球军备竞赛和国际贸易的刺激下，造船业的膨胀使得伦敦船厂雇佣的工人数额在1861年至1865年间增加了两倍多[123]。“造船业的巨头们不但由于过度生产导致了绝对的生产过剩，而且他们还在投机的驱使之下，

盲目相信未来的资金借贷不会有丝毫问题，并因而签下了大笔合同。”马克思颇有些幸灾乐祸地写道。[124]

时至欧沃伦格尼轰然倒塌之日，新的造船订单已经完全枯竭。事实上，欧沃伦格尼之所以被推下了万丈深渊正是因为“经它交易的船只多得遍布全球的大洋，由它经手的大批蒸汽船使它遭受了巨额亏损”。其他受害者还包括闻名遐迩的铁路承包商佩托贝茨。诚然，大恐慌最初的受害者们是那些轻信市场的投资者和“无数争先恐后想染指低息贷款的不良公司”。但这场信心危机却促使英格兰银行将其基准利率从百分之六上提至毁灭性的百分之十。这个“典型的恐慌性利率”[125]一直延续到整个夏季结束。一个名为《十万英镑》的话剧在此期间只上演数次便草草收场，《伦敦时报》甚至都没工夫为它写上一篇评论。经济繁荣已成昨日黄花。

马克思从当天午报中得知了这场全国性金融大恐慌的消息。当时，他正在位于伦敦城北家中的书房里为自己的财务窘境挠头不已。他们家刚刚搬入一幢海景别墅，这种炫人耳目的时尚房产当时正在伦敦周遭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但对于一名失业的记者而言，它无疑过于昂贵，何况为了专心著书，马克思已经停止接受报纸分配的新任务。但他认为，这样奢侈的住处对“帮助他已经十多岁的女儿在社会上立足是必需的”。此时，呜呼，他又一次陷入了破产的境地。他无法交付已经到期的房租。因而，不幸的是，《资本论》的完书日期被殃及了。

将近十五年来，马克思一直在对他的挚友和赞助者许诺，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已近乎完工。他也已准备就绪，要将“现代社会的运动规律”大白于天下，而且，他要给英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来上致命一击。为了支持马克思，在这十五年中恩格斯一直在曼彻斯特工厂里的砂轮旁身体力行，但时至如今，连他也变得焦躁不安起来。

其实，英国炫人耳目的经济繁荣让马克思对他所从事的工作心生疑窦。自 1863 年以来，他的写作成果便寥寥无几。好几笔意外的遗产继承使他一度尝到了经济独立的滋味，但现在他又不得不重新求助于恩格斯的救济。但这一回恩格斯第一次表现出对马克思丧失耐心的迹

象。一直以来，马克思都在绘声绘色地向恩格斯描述他的身体病痛与急需医治，并以之为借口搪塞恩格斯。风湿、肝病、流感、牙疼、还有气势汹汹前来讨债的债主以及极为罕见的全身大面积疔疮爆发，诸如此类，不一而足。1866 年 4 月，马克思坦承道，“身体欠佳让我的写作难以为继”。那年圣诞过后的第一天，他又再度为“搁笔已如此之久”而大发牢骚。次年复活节期间，他从度假的马盖海滩再次写信声称，“过去一个多月的时间我的全部精力全都用来改善自己的健康状况”。[126]

恩格斯一直怀疑马克思各种毛病的真正根源是“他在这本该死的书上故意磨洋工”。后来的事实也证实了这一点。“我希望你的风湿病和脸部疼痛已经痊愈，希望你已经又坐下来开始辛勤的写作。”恩格斯在 5 月 1 日的信中这样写道，“不知书的进度如何？第一卷何时能够付梓？”[127] 因为《资本论》离完书还颇需时日，马克思选择了以沉默作答。

恩格斯的不停唠叨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但这场全国性金融恐慌的到来却对马克思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仿佛打了一剂激素。数日之内，这位预言家便已回到自己的桌前挥笔疾书不已。7 月初，他通知恩格斯，“过去两个星期我都在夜以继日地赶写此书”，他估计在“8 月底之前”便能拿出书的初稿。[128]

一部末世预言书的作者为了等待最合适的时机而一直隐忍不发，任何人对此都无从置喙。“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已经敲响，剥削者的一切都将被剥夺褫尽。”在马克思写下这些颇具戏剧色彩的惊人预言时，从当时的时局来看，他几乎是一言中的。然而，在撰写书中著名的倒数第二章——“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时，为了证明他“穷人正在变得越来越穷”的观点，他却不惜歪曲和捏造。在引用格莱斯顿对 1853 年至 1863 年间应纳税收入呈现“惊人”涨幅的评论时，马克思将这位自由党首相的原话说成是“关于财富与权力的愉快争论仅仅局限于有产阶层之间”[129]。但《伦敦时报》刊登的那篇演讲发言稿却显示，格莱斯顿表达的恰恰是完全相反的意思：

“面对如此惊人甚至令人陶醉的财富增长，假若我发觉这种增长仅

仅局限于生活优越的那一阶层之中，那我的心情会变得十分沉重，而我对这种增长的理解也会愈加深刻。”他的原话是这么说的，而且后面还加了一句，由于应纳税所得的大幅增长，“我们高兴地看到，英国工人的平均生活状况在过去二十年中得到了极大提高，我们几乎能说这一提高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空前的，是任何国家或任何时期都不曾有过的。”[130]

马克思曾许诺在夏季结束之前将书完稿，而事实证明他的估计太过乐观。在1867年8月，也就是全国性金融大恐慌爆发后第十五个月，他通知恩格斯说，他已将终稿的校样邮寄给了德国的出版商。在信中，他还顺带着委婉地提到了法国著名作家奥诺雷·德·巴尔扎克[①]讲过的一个有名的故事。有个艺术家觉得他自己的某幅画是当世之杰作，因为他花费了多年的心血来完善它。但在作品公之于众之后，他又朝它仔细打量了一番，忽然往后退了一步说道，“一无是处，花了十年的心血，结果却一无是处”。然后，他坐下并哭了起来。[131]唉，马克思最大的担心便是“那一默默无闻的杰作”所隐喻的恰恰是他的经济理论。他的“数学论证”发表之后并没能引起丝毫反响。而后来，当现代社会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爆发之际，二十世纪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指斥《资本论》为“一部过时的经济教科书，在我看来，它不仅在科学上破绽百出，而且对于现代世界也起不到任何的实际意义和作用”。[132]

① Honoré de Balzac（1799—1850），法国19世纪著名作家。

第二章

无产阶级的存在是必然的吗？马歇尔的守护神

骑士照顾马匹，
放牛人照看牛群，
商人只顾钱袋，
馋鬼光想着肉糜；
为财产忙碌的每一天啊，
有网要织，有谷要碾；
所有的物件都已经耿上去了，
赶着人类上路吧。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①]

摘自 *Ode, Inscribed to William H. Channing*[1]

“绝大多数经济研究的出发点都是希望为人类整鞍备马，将之送上文明的坦途。”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2]

① 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美国思想家，诗人。

1866年到1867年的那个冬天奇冷无比。在伦敦东部的数幢建筑之中，有一幢的门前每日都有将近上千人在那里聚集。门刚一打开，人潮便往前拥去。人们左推右搡，前呼后应，为的是能抢到一张票。从那激烈的阵式以及未能如愿者脸上失望的表情来看，过路之人可能会以为这是在抢一场拳击赛或斗犬赛的门票。但事实上，这里面并没有灯火通明的拳击赛台。里面是教区救济所的一座泥泞不堪的院子。院内大石铺地，将院子分割成一栏一栏的。每个持票人可以凭票坐在石板上，拿一把大锤子去敲打那些结了一层污垢的花岗石。每五筐碎石子可以换取三个便士外加一条面包。[3]

那年1月蜂拥而至的这些人并非平日光顾救济机构的那些衣衫褴褛的常客。他们一个个身体健康，衣着讲究。仅仅在数星期之前，他们还在某个船厂、铁路隧道或公路工地上班，他们每星期能挣到一至两英镑，这样的收入足够养活一个五口之家，还能吃得起牛肉和黄油，喝得起啤酒，甚至还能略有盈余。[4]但那些现在都已成为往事。全国性的金融恐慌爆发之后，所有的建筑工程，无论是陆地、海上，还是地下的，全都陷入了停顿。势如雪崩的破产案铺天盖地而来，成千上万的工作岗位在一瞬间被抹去；同时，因为霍乱流行，所有的港口都被紧急关闭长达数星期之久；面包价格随之上涨了一倍；人们花光了毕生的积蓄，当遍了家中所有值钱之物，来自亲朋们的救济也已经完全枯竭。

在最穷的一些教区里，每天都会有数以百计的人们在救济院门前吃闭门羹。而其余的纳税人，包括马克思在内，也都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他们担心不断增长的贫困人口比率会把他们也拖下水去。虽然来自社会的捐助源源不断，但私营慈善机构仍然不堪重负。“人们无法理解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压力。”弗洛伦斯·南丁格尔，这名女财产继承人和医院改革家在1867年1月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

> “如今，报纸上都在连篇累牍地报道城东有两万名失业人口。其实我们的问题远不止于此。现在的问题是，每个教区内符合《贫穷法案》救济条件的人数都至少是平时的两倍，有的甚至达到

了五倍。而且，所有的救济院如今都已成了医院，那些贫民的免费学校以往每天能提供一顿免费食物，但现在它们也都已经难以为继。这种情况在马里列本、圣派克若斯、斯特兰德大街[①]以及伦敦城南都极为普遍。”[5]

格林威治[②]爆发了由哄抢面包而引发的骚乱。面包房的老板和其他店主们发出威胁，他们将以武力对付任何暴徒[6]。5月，城东的上千居民在海德公园与全副武装的警察发生了冲突，表面上他们是在表示对第二次改革法案和工人投票权的支持，但其实他们更多地是在借机发泄对富人阶层的不满和愤慨。[7]

种种的社会危难让伦敦中产阶层的人们无法逃避，因为他们所处的是一个新的信息时代。除了每天五次邮件递送，还有来自报纸、书籍、讲座以及布道会轮番的信息轰炸。在亨利·梅休、查尔斯·狄更斯和其他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前辈的事迹鼓舞之下，新一代的记者们在综合了大量目击证词和第一手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将伦敦东区的情形在各种报刊上公之于天下。这些报刊包括《每日新闻》、《晨星报》、《帕尔摩公报》、《西敏寺评论》、《家常话》、《托利每日邮报》以及比较自由开明的《泰晤士报》。为了报道贫民区的惨状，记者们纷纷将自己乔装打扮成落魄潦倒的工人模样，以便能在那些地区连续守候达数夜之久。《每日新闻》的主编罗伯特·吉芬逐渐成为一位名重当时的统计学家。他首篇有分量的学术文章是替国民财富在1845年至1865年间翻了三番的成就歌功颂德，但他在1867年写的第二篇文章的腔调和观点却有了显著变化。该篇文章转而对倒退苛刻的税务提案进行了攻击，因为它将加重勉强能餬口的穷人们的经济负担。为罗伯特·吉芬写过传记的作家罗杰·梅森曾经写道，最让罗伯特·吉芬忿忿不平地是，1866年至1867年间爆发的这场经济萧条的主要受害者绝大多数都一直在循规蹈矩地辛勤工作和努力存钱，而同时，那些生活相对更加富裕的人们也确确实实都曾向慈善机构慷慨解囊。然而，道义并未能阻

① Marylebone，St. Pancras，The Strand，这些都是昔日伦敦之行政区。

② Greenwich，位于泰晤士河畔，距伦敦市中心五英里。

止灾难的上演和扩散。[8]

在经济繁荣期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曾经视财富和进步为理所当然。但如今，在繁荣盛世之中，饥饿、无家可归以及疾病的现象又重新出现。这便使得他们突然间变得激进起来。剧作家们创作了许多以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为题材的剧本，诗人们出版了无数批判社会的作品，教授和牧师们则纷纷在他们的讲坛上对英国社会进行了谴责。在所有这些声讨文字当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剑桥大学的盲人政治经济学教授亨利·福西特的一番话了：

> “总有人在告诉我们，我们的进出口额在飞速增长；也有人在为我们描绘一幅日不落帝国及其贸易横跨世界的壮丽画面；我们的商业船队在以空前的速度扩大；工厂的数量与规模也在蒸蒸日上；在我们身边，财富的增长触目可见；公园设施在变得日益豪华，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日渐奢侈……但让我们回过头来往这幅画的另外一面看看，我们会发现些什么呢？与这些巨大财富同时存在的，与这些充满罪恶感的奢侈生活紧紧相邻的，却是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陷入贫穷期待救济这一可怕的幽灵。到世界最大的商业贸易中心去参观一下吧，看看你会发现些什么？最悲惨的贫穷总是与最庞大的财富形影相随。”[9]

由于心中充满了基督徒的负罪感，并且希望能对社会有所贡献，很多原本打算前往帝国一些边远地区传教的大学毕业生现在却发现，在他们的身边就有大量工作需要做。在那一年，威廉·费里曼图，这位《期待救赎的世界》[①]一书的作者，成为了伦敦最穷的圣马利教区的牧师。同时，身为新教成员的托马斯·巴纳多在霍乱流行的伦敦东区进行了一番走访之后，便改变了原来去中国传教的决定，而是打算就地兴建孤儿院以收留贫困人家的儿童。也是在同样经历的触动之下，《最黑暗的英格兰及其出路》一书的作者布斯·威廉将军开始了筹建救

① *The World As The Subject of Redemption.*

世军[①]的活动。另一位牛津学者塞缪尔·巴奈特则发起了“大学睦邻联盟”并鼓励学生们到穷人当中去，为他们施粥和兴办夜校。

而这群在本国积极传教的年轻男女们并没有感情用事，他们采取了更为严谨科学的态度。他们的方法不是施舍，而是向穷人们灌输中产阶层的价值观和习惯。正如牛津毕业生爱德华·丹尼森在1867年所言，“你若给予人们施舍，你便会使他们一辈子都畸形地活着；应该去修建学校，出钱请教师，设置奖励，兴办工人俱乐部；应该帮助他们自助自立。”[10]

一位身材匀称，金发翩翩，眼睛湛蓝的年青人从伦敦的尤斯顿车站登上了北方铁路公司前往格拉斯哥的火车。时值1867年6月初。他随身的仅有之物是一根路杖和一只装满了书的帆布背包。其他旅客可能都把他当成了一位趁着放假去登山的助理牧师或学者。但当列车到达曼彻斯特时，只见年青人背上背包，从车上跳上站台，然后便消失在人流之中。

在继续其前往苏格兰高地的旅程之前，时年二十四岁的数学家和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的研究员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花了大量时间奔走于工厂密集的城区以及围绕在工厂四周的贫民居住区。他“就是为了要亲眼看看生活在最底层的穷人”。本来，他还在为究竟是选择德国哲学还是奥地利心理学作为终身职业而犹豫不决，而这次的经历使他第一次从玄学中挣脱了出来，并且开启了他对社会现实孜孜不倦的探索之路。后来他自己承认，这次走访迫使他开始对“现存社会的正当性”进行思考。[11]

在曼彻斯特，马歇尔看到了雾蒙蒙的棕色天空、泥泞的棕色街道，还有成排的仓库、空空荡荡的厂房以及残破不堪的廉价公寓。而咫尺之外便是富丽堂皇的店铺、高雅美丽的公园以及金碧辉煌的大酒店，这些才符合马歇尔从伊丽莎白·盖斯凯尔的《北与南》等小说中得来的对曼彻斯特的印象。在狭窄的里弄里，他遇到一些面黄肌瘦、身形

① Salvation Army，一个主要从事慈善活动的基督教教派。

弱小且发育不良的男性，还有一些披着单薄的披肩、头发上沾着星星点点棉花团的女工。这幅在“如此众多的财富”中隐含着“如此众多的贫穷”的场面让马歇尔不得不发出了这样的疑问：无产阶级的存在难道真的如自己长期被灌输的那样，是一种“自然的必然性”吗？“为什么不能让每一个男人都成为绅士呢？”[12]

马歇尔不具备圣约翰学院其他同事所拥有的优美口音和优雅举止。有时，他会将他对贫穷的发现比作原罪的发现，而且，会将他对经济学的狂热比作对宗教的皈依。对他而言，虽然贫穷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是始于1866年的大恐慌之后，但如果说他在此之前根本没有近距离接触穷人的机会，那绝对一种误导。[13]他祖父曾是一名卖肉的屠宰工，他的曾祖父破过产；他的父亲和叔伯们都是生来一无所有的孤儿。虽然威廉·马歇尔[①]在他结婚证上职业一栏里填的是“绅士”二字，但实际上他在英格兰银行从未担任过比前台收银员更高的职务。他的儿子也并非如他后来所暗示的是出生于市郊的一个高档生活区。相反，阿尔弗雷德是在伦敦名声最糟的贫民区之一——伯曼齐的制革厂旁边出生的。后来，当马歇尔一家搬至中下阶层居住的克拉彭区时，他们就租住在一家煤气厂的对面。

由于他自幼便聪颖过人，父亲经过努力，终于说动了银行的一位主管同意资助他的学业。马歇尔得以进入了麦钱特泰勒斯学校。这是城中专门为银行家和股票经纪商的子女们设立的一所私立学校。于是从八岁那年开始，他每天都搭乘公共汽车、轮渡或是步行，途经泰晤士河边污染最严重的工厂去上学。马歇尔在一生当中对贫穷一直都有着切身体会。

在查尔斯·狄更斯的《远大前程》一书中（此书于1861年出版，马歇尔于同年从麦钱特泰勒斯毕业），身为孤儿的男主人公，毕普，曾经有过一番他自己称为“丧心病狂的自白”。在让他的女友再三发誓会替他保密之后，他小声说道，“我想成为一名绅士”。[14]他的伙伴，毕

①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父亲。

迪，听了之后竟然大惊失色，仿佛即将成为一名铁匠学徒的毕普说的是他想成为教皇保罗。确实，为了让他的主人公梦想成真，狄更斯不得不杜撰一些情节，比如雾蒙蒙的荒原上的逃犯，傲慢的女继承人，一处闹鬼的别墅，一个神奇的传说，还有一位神秘的捐助者。即使在那样一个主张自主自立的年代，且不论他们家的那一堆麻烦事，像毕普这样的男孩想成为中产阶层的一员，在当时被视为天方夜谭，是乌托邦的幻想，它与狄更斯的小说一样，在现实中是无法实现的。1859年，《泰晤士报》的一名社论撰写人曾以冷若冰霜的口吻写道，“一百个人中间有九十九个永远都不会有出人头地的机会。因为他们的身世、教育和环境将他们局限在一个低下的位置，永世都不得翻身。”[15]

然而，毕竟也有了一些变动的迹象。西奥多·霍本就曾指出过，谁能够成为绅士，怎样才能成为绅士，这个问题成了维多利亚时期永恒的文学主题。绅士身份是由一个人的出身、职业和是否受过良好的，或者说非职业性的高等教育而决定的。因此，任何用双手从事劳动之人，包括技术工匠、演员、艺术家，或商人（除非做的是大买卖），都被一一排除在外。安东尼·特罗洛普的《布尔汉普顿的牧师》[①]中的马蕾波小姐就“就曾经认为：绅士的儿子想要维持绅士的身份，他就必须做一名牧师、律师、海员或士兵来赚大钱。”[16]但白领工作的激增使得原先泾渭分明的界限逐渐变得模糊起来。不然，马蕾波小姐为什么会想到要定下这么多条规矩呢？医生、建筑师、新闻记者、教师、工程师以及政府机关的职员们都纷纷挺身而出，要求分享“绅士”这一殊荣。[17]

工薪阶层的“绅士”们所从事的职业必须让他在养家糊口之外，还能有闲暇的时间来想些别的。他的工资必须足够支付他儿子所需的教育，还要用来为他的女儿寻找一位同样是绅士的丈夫。但对于这一工资水平的具体数额人们也是各执己见。特罗洛普的《沃尔登》中的穷人们就认为，每年一百英镑的收入便足以将他们个个变为绅士。但当寡言少语的监狱官以退休相威胁时，他精明的女婿却嘲笑他竟然会

① *The Vicar of Bullhampton.*

以为每年区区一百四十英镑的退休金便能让他过上好日子。[18]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父亲一年有二百五十英镑的收入用来维持妻子和四个儿女的生活[19]，但卡尔·马克思，因为他众所周知的不善理财的毛病，所以尽管他的年收入相当于前者的两倍，他以此维持一份中产阶层的生活仍不免捉襟见肘[20]。在1867年以前，能达到绅士水准的工资仍然颇为罕见，仅有十四分之一的英国家庭的年收入在一百英镑以上。[21]

然而，即便马蕾波小姐也会同意，剑桥大学的研究员们应该算是达到了绅士的标准。圣约翰学院的所有五十六名研究员每年可从学院所获得的赞助中得到分成，分成的数额从1865年的二百一十英镑上升到了1872年的三百英镑，这还不包括学校为他们提供的房间和免费的仆人服务。[22] 此外，每天还有津贴，可以用来支付一顿高桌晚餐。这类正式晚餐通常有两道菜，包括一份烤肉配蔬菜，一份甜饼配布丁，餐桌上还有大块的奶酪供人们依次取食。每隔两星期，有一天会有三道菜，多出来的是一份汤或是鱼。大部分研究员在领取规定收入的同时，还靠收考试辅导费、在学校兼课或做兼职会计来赚取外快。研究员必须是独身。因此，一个没有妻子儿女负担的单身男人，在完成学校的工作之外，尚有许多时间可用来研究、写作和与人交流，他们的收入允许他们经常旅行，购置考究的衣物以及收藏私人的存书、绘画和必要的珍奇玩物——简而言之，这些都是绅士生活的必备之物。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从一个面色苍白、行为拘谨、吃不饱穿不好的学生娃成长为一名剑桥的大学导师，这与毕普从一名小镇上的铁匠学徒一跃成为一家股份公司的合伙人一样令人不可思议。他父亲从十六岁便开始在城市银行的一家分部任职，他的兄长查尔斯，虽然只比他大十四个月，却在十七岁时便被送往印度的一家丝绸厂上班。他的姐姐阿格妮丝为了寻找理想的丈夫，也步查尔斯的后尘去了印度，但不久她却在那里离开了人世。

和维多利亚时期其他众多有挫折感的父亲一样，马歇尔的父亲也将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他聪颖无比的儿子身上。威廉·马歇尔一心要让儿子接受良好的教育，他说服自己的雇主帮阿尔弗雷德垫付了上一所

优异的预备学校的学费。他“扮演了一个最严厉的新教徒形象，他倔强偏执，急躁易怒”[23]，在家中他是凌驾于妻儿之上的暴君。惯于熬夜的他常常逼着阿尔弗雷德反复练习希伯来语、希腊语和拉丁语，直至深夜十一点。[24]

因此，这个孩子患上惊恐症和偏头疼的毛病也就不足为怪了。一名同学后来还记得，他“身形瘦小，脸色苍白，衣着褴褛，而且看上去不堪重负。”阿尔弗雷德为人谨慎羞涩，几乎没什么朋友，但他“在数学这门他父亲对之嗤之以鼻的学科上却展现出了极高的天分”。同时，他对一众古典语言产生了极度的反感，这种反感贯穿了他的整整一生。“在去学校往返的路途中，阿尔弗雷德会把博茨的《欧几里得》一书藏在口袋里。每读完一个命题，他便会边走边在脑子里把它琢磨个通透。”[25]

麦钱特泰勒斯学校的学费相较而言算是低的。而且，它还提供很多奖助学金。即便如此，虽然威廉·马歇尔一年的工资有二百五十英镑，但他连儿子作为一名日读生所需的一年二十英镑的现金开销都几乎拿不出来。[26]但老马歇尔情愿忍受这一切，他让全家竭力节衣缩食以供儿子念书，因为如果能在麦钱特泰勒斯完成学业，则肯定能拿到一份在牛津作古典学术研究的奖学金。这可不是一项普通的奖励。在当时，念大学尚属奢侈之物，在五百个与他儿子一般大小的年青人中间，只有一个能付得起念大学的开销。而更重要的是，根据当时的规定（后来不久便被取消），牛津大学奖学金的获得者无一例外可以选择终身在学校的学院里担任古典学术的研究员，也可以进教堂或政府部门任职，还可以去最有名望的预备学校任教。

在马歇尔将他拒绝接受牛津的奖学金而要去剑桥研究数学的想法公开之后，父亲闻之勃然大怒。他对马歇尔威逼利诱，软硬兼施。而最终，来自远在澳大利亚的叔叔的一笔贷款和一份数学专业的奖学金让马歇尔得以成功违抗父命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在去参加奖学金考试的路上，这位十七岁的年青人沿着剑河一路迤逦而行。他禁不住为自己即将迎来的解放而欢呼雀跃。

在圣约翰学院的三年学习期末，他仍需参加最后一项竞赛，即数

学专业的荣誉学位考试，该考试绝不亚于一场激烈的体育赛事。莱斯利·斯蒂芬，这位马歇尔在剑桥时期的同窗和后来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①]的父亲，曾经作过一番估计，马歇尔拿到这项竞赛的亚军不啻继承了一笔五千英镑的遗产，这大概相当于如今的五十万美元。这笔钱足以让他过上出人头地的生活。[27]马歇尔得到的奖励是即刻被任命为所在学院的终身研究员，这也使他有权住在校内并收取辅导费和讲座费（据斯蒂芬的估算，这又值一年两千五百英镑）。为了偿还叔叔的贷款，他还在一所预备学校做了一年的兼职。此时，在马歇尔的一生中，他第一次实现了经济独立，终于能第一次甩开手脚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如何最好地利用这份自由成了他的一大难题。数学已逐渐让他觉得枯燥乏味。当马歇尔坐在苏格兰高地清新的空气中阅读康德（“这是我唯一崇拜过的人”[28]）的著作时，缭绕的云雾使尘世间的一切都淡出了他的视线。然而，他仍不时回想起那一张张穷苦人的面孔和那一幅幅凄凉悲惨的景象。和毕普一样，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虽然已今非昔比，但他却没有忘记那些落在后面的人们。

1867年10月，马歇尔从苏格兰回到了剑桥，他“皮肤黝黑，身形健硕，昂然挺立”[29]。作为一位本科生，他曾被排除在所有在教师室举行的社交俱乐部和私人聚会之外，然而这些活动才是剑桥教育体系中最具价值的部分。但如今，因为他已展示出自己的超凡才智，于是被邀请加入格鲁特[②]俱乐部，这是校内一个激进分子的小团体，他们定期聚在一起商讨政治、科学和社会方面的问题。他们的头儿名叫亨利·西奇威克[③]，这是一位风度翩翩的哲学家，比马歇尔高四年级。西奇威克慧眼识才，迅速将马歇尔揽至了自己麾下。“他让我耳目一新。”马歇尔自己也曾这样坦承。他的父亲曾剥夺了他生活中的所有乐趣，但西奇威克却“帮我重新找回了生活”。[30]

---

① Virginia Woolf（1882—1941），英国女作家。

② George Grote（1794—1871），英国历史家。

③ Henry Sidgwick（1838—1900），19世纪末期的功利主义代表人物。

由于有了西奇威克这样睿智的学术向导，马歇尔便开始潜心研究德国的认识论、进化生物学以及心理学。每天清晨五点他便起床攻读。他还去德国的德累斯顿和柏林盘桓了数月。据传记作者彼得·格罗恩维格称，“黑格尔历史哲学的魔力让他如醉如痴。”[31] 黑格尔认为，人应当本着自己的良心去主宰自己的一切，而不是盲目地屈从于权威。像年轻时期的黑格尔和马克思一样，马歇尔也对这一观点十分认同。同时，他还从查尔斯·达尔文 1859 年出版的《物种起源》和赫伯特·斯宾赛[①]1862 年出版的《哲学体系》等书中吸取了社会是在不断发展的观点。“人类的智力是否能提高得更高更快？”这个问题激发了他对心理学的兴趣。[32] 因为接受一流的教育从而使自己的命运得到了改变的这位年轻人最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物质条件是人类智慧和道德发展的最大障碍。”

他开始自认为一名“社会主义者”。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这个字眼意味着有志于社会变革的人或者是属于某个公社团体的成员。当时，“共产主义者”这个标签的适用范围也同样广泛，所有认为不彻底废除现存的私有制和自由竞争，社会问题便无法得到解决的人都被涵括在内。[33] 马歇尔曾向西奇威克问起如何才能消除阶级之间的隔阂，他这位导师的回答对他略有指斥，“喔，你要懂政治经济学的话，就不会这么问了”。马歇尔立刻心领神会。“由于我渴望了解由国家或别的政府机构发起的社会改革是否可行，我便开始研读亚当·斯密、穆勒、马克思以及拉萨尔[②]的著作。”后来他自己曾如此回忆道。他从阅读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入手，接着又通读了该书的第六版，“它们带给我的兴奋感日渐浓厚”。[34]

1867 年，《改革法案》出人意料的通过，一举将英国变成了一个民主国家。这使他对政治经济学愈加兴趣盎然。该法案新授予了八十八万八千名成年男性以选举权，从而使选民总数增加了一倍以上。这些新增的选民大多是技术工匠和商店职员，他们每年至少缴纳十英镑的房租或不动产税。该法案使工薪阶层得以介入政治运行的机制。

---

① Herbert Spencer（1820—1903），英国哲学家。

② Ferdinand Lassalle（1825—1864），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机会主义代表人物之一。

从此，民主政府成为唯一被人民接受的政权形式。尽管三百万工厂操作工和短工、农场工以及全部女性的权益依旧被忽视，但正如二十世纪历史学家杰特鲁德·希默尔法布所强调的，这个法案的通过预示着实施终极普选权是大势所趋。[35] 然而，马歇尔仍然心存疑虑，因为他意识到，在理想化的完整公民权与肮脏匮乏的物质现实之间横亘着一道鸿沟，它使得他的绝大多数同胞仍然无法充分享受他们的公民自由。

像马歇尔这样“脱颖而出”的人总会在心里存有愧疚感或义务感。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中充斥着这类“双重性格”的人物。尽管他们具有英雄般的气概和特质，但他们却注定得蛰伏一生，而不能像其他人一般“脱颖而出”。1869 年，在美国记者兼作家亨利·詹姆斯 ① 步行游览伦敦的时候，一个人物形象似乎“从伦敦的人行道底下跳了出来”，这个形象也就是后来他于 1886 年出版的一部关于恐怖分子的小说中的主人公海尔辛斯·罗宾逊。当时，城中的一切正让詹姆斯流连忘返，他看到了华衣锦服的人们，看到了香车宝马。有金碧辉煌的别墅和剧院，还有俱乐部和画廊，轰然的喝彩声时时从那些场所里传来，让人觉得，一走进那些大门你便能“通向温暖、光明和喜悦，你便能得到美好怡人的亲密友情”。但突然，他的脑中闪现出一个年轻人的形象，“他就像他自己，正仔细观察着外面的这一切……也在观察着他自己”，包括所有那些彰显着自由与舒适，知识与力量，金钱、机会与满足的“繁华景象”。他们二者的唯一不同在于，《卡萨玛西玛公主》② 中的主人公“只能隔得远远地徒然羡慕地望着这一切，但所有的大门都在对他紧紧地关闭”，最终他从一个图书装订工变成了投掷炸弹的恐怖分子。[36]

虽然已经进入了那一充满自由、机会、知识和舒适的世界，只是暂时还没有权力和财富，但马歇尔依旧将那张具有双重性的面孔放在每天都触眼能及的地方：

> “我在一家商店的橱窗里发现了一幅小油画，上面画的是一个男人极其憔悴若有所思的面容，它看上去像是一个穷人的形象。

① Henry James（1843—1916），美国出生的作家。

② *The Princess of Casamassima.*

> 我花了几个先令把它买了下来。我将它挂在我学校宿舍里壁炉架的上方。从那时起，我便将它称为我的守护神，我把我的一生都贡献出来，就是为了使所有像他那样的人们都能进入天堂。”[37]

在马歇尔专心研读政治经济学奠基者们著作的那段时期里，“经济有了长足的增长，但财富的增长与生活质量的提高并不成比例。于是，我便开始潜心于这方面的研究。”但此番的“潜心”还颇费了些时日。因为他发现，在知识分子圈子里，人们对“社会现实这块大陆”没有丝毫兴趣。而在社会上它也没有多少吸引力。因此，当学校让他开设一些政治经济学讲座时，马歇尔犹豫再三才答应。“我是教过经济学……但每听到别人说我是经济学家我就会气不打一处来……其实，‘我是一名沦落异乡的哲学家。’”[38]

马歇尔从1867年开始孜孜不倦地攻读经济学，但他的导师西奇威克却认为，“政治经济学最辉煌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39]1846年，《谷物法案》被成功废除，在接下来的一段时期，食品价格非常低廉，政治经济学也因之而短暂地神气了一番，还曾被人誉为“能与天文学相提并论的真正科学”[40]。然而，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爆发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动乱使许多知识分子对这门学科的宿怨又死灰复燃。卡莱尔诅咒政治经济学为“悲观的科学”，而美术史学家约翰·罗斯金有过之无不及，他称政治经济学为“王八蛋的科学”。和狄更斯一样，他期待新的经济学出现，而那将是“一门关于政治经济的真正科学”[41]。根据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的观点，问题的关键在于，“这门富人的科学”与维多利亚时代晚期新教的教义有严重的冲突。[42]贪婪是有益的，自由竞争这只看不见的手能为社会整体带来最佳的结果。诸如此类的观点都让维多利亚时期的人们极为反感。

在工薪阶层拥有选举权的新形势之下，两大政党为了争夺选票都开始对工人们大献殷勤。但反对者们动辄以“政治经济学”为据阻挠每一项改革——不论是提高农场工人的工资，还是为穷人提供救济。他们的理由是，这些改革将会减缓国家财富增长的速度。其实，政治

经济学的奠基者们都是他们各自时代的改革先锋，他们在争取妇女权益、废除奴隶制以及在中产阶层与特权阶级的利益冲突中表现得尤为激进。但他们的理论却使他们的追随者们与劳动阶级形成了对立。弗吉尼亚·伍尔芙的父亲莱斯利·斯蒂芬曾如此评论说，“这些学说……被用来粉碎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的革新计划……政治经济学家们从来都应是宿命论的忠实信徒，他们一贯宣称，任何形式的社会改造都将是徒劳无益的。”[43]

比如，亨利·福西特，这位颇具改革思想的剑桥政治经济学教授，在为罢工工人作演讲的时候就曾说他们是在自己抹自己的脖子。他的此番言论让罗斯金非常气愤。后者在1869年的一场建筑工人的罢工后曾说，“政治经济学家们真是百无一用——他们全都哑巴了，他们拿不出任何能公之于众的解决问题的方案，也根本无法说服和安抚那些持反对意见的团体。”[44]而穆勒的例子比福西特的更为夸张。鉴于如今他已是一名激进派国会成员，穆勒自称为社会主义者。他领导制定了《第二改革法案》和有关工人有权组织工会和罢工的法案。但穆勒对工薪阶层前途的看法之严厉之冷酷丝毫不亚于李嘉图和J.E.凯尼斯[①]。后者是伦敦大学学院[②]的教授。数年后，他发表了一篇有名的声讨奴隶制的檄文，并且在文中附和了穆勒的观点：

> 由于种种障碍的限制，他们的地位能够提高的幅度是极其有限的。他们要向上爬升几乎是不可能的。作为一个阶级而言，他们根本没有上升的机会。也许他们当中时不时会有个别强劲有力之人或是幸运之徒能逃脱这种命运……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将难以越雷池半步。工人的收入，不论是技术工人还是非技术工人，也将难有任何显著的提高。[45]

穆勒悲观理论的核心是其所谓的“工资基金说”[③]。根据这个后来

① Marx. J.E.Cairnes，1847年发表《政治经济学原理新论》。

②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简称UCL。

③ Wages Fund Theory.

被穆勒本人抛弃但却没有找到替代理论的学说，能用来支付工资的资源数量是有限的。一旦这些资源用罄，要想再提高工资水平便会难上加难。而实际上，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是相对稳定的，能导致工资变动的因素便只能是劳动力的供给。因此，一部分工人若要拿到高工资则必将以另一部分人拿低工资作为代价。

如果凭借工会的力量，工资得以超越工资基金理论所许可的水平，换来的结果则必然是失业的增加。假若政府以对富人加税来补贴收入的方式进行干预，则必将促使劳动人口数额的激增，从而导致失业率和税收的双双上涨。更为严重的是，用增加税收来补贴收入的方式不但妨碍竞争，同时也会消除人们对失业的恐惧，最终将导致劳动效率的下降。穆勒警告说，从长远看，“动用税收机制来帮助穷人将使整个国家的财政收入被垄断”。[46] 美国一位颇受欢迎的教科书作者曾经说过，“工薪阶层在持家和生育上必须谨慎行事，不然，他们的生活将沦落到以往极其低下的水平”。[47] 在米利森特·福西特[①]编写的政治经济学入门教科书中，她引用《谷物法案》被废除的例子试图证明工资与最低生理需求之间紧密相关。针对工人，她如此写道：

> 低廉的粮食价格并不会让他过上锦衣玉食的豪华生活，而只是使他能多养活几个孩子。这些事实让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工薪阶层的生活水平或许偶尔会有大的提高，但这种势头绝不会持久，除非我们能保证，人口数量不会随之上升。[48]

然而，当《第二改革法案》成功通过之际，工资水平从长远而言不会有任何增长的理论便已不再无懈可击。究其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平均工资水平近来有了大幅度增长。铁路、汽船以及动力织布机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意味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仍然大有潜力可挖。事实是，在移居国外的人正大发其财的同时，国内也出现了一个由技术工匠和白领工人组成的富裕中产阶层。这种现象与生物学“大规模的脱贫致富在

① Millicent Garrett Fawcett，亨利·福西特的妻子，英国妇女参政运动的主要领导者。

理论上是不可能的”的观点格格不入。在以往人类社会中，贫困曾被认为是理所当然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社会痼疾。但如今，它似乎已只是一个癣疥之疮。

究竟有没有一种创造性的机制能让平均工资提升到足以让人们过上中产阶层生活的水平呢？穆勒承认他的工资基金学说有瑕疵，但无论他本人还是他的批评者们都拿不出一套新的理论来取代它。从查尔斯·狄更斯、亨利·梅休、卡尔·马克思，到约翰·罗斯金和亨利·西奇威克，无数维多利亚时期的知识分子都曾经作过这种尝试。鉴于迄今尚未有人能大功告成，所以谁也无法断言，人类对社会进步的期望与经济现实二者之间的矛盾究竟能否调和，或者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期间收入显著增长的趋势究竟是不是势必扭转。一些托利党人，像罗斯金和身为反废除主义者的卡莱尔曾经预言，如果传统的封建社会关系和纽带不能得以恢复，那就意味着灾难。而社会主义者则认为，没有一场全社会范围内的改革，工人的处境“便不可能得到改善，他们经受过的痛苦也将无法得到补救”[49]。这场后来被人们称为“生活水平的辩论”最终归结到一个问题上：即现行的社会制度究竟还有多大的改善余地？

1873 年春的一个晚上，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站在临时借用的剑桥大学的教室里。他面对着“七八十名前来听讲的女士”。他那张英俊的面庞上神采奕奕，他的话音坚毅有力，虽然没拿讲稿，但他的发言却毫无滞碍。在对这些妇女们的演讲中，他的语言极其平易、开门见山，仿佛在和自己的姐妹们闲聊家常。他鼓励她们“放下手中的针线活，停止无所事事地度日”，他劝她们抵挡住来自家庭需要的压力，鼓励她们像“奥泰维尔·希尔女士”[①]那样走向社会，成为一名社会工作者或者教师。他再三指出，最重要的是，她们必须去了解“哪些困难是她们必须克服的，以及如何才能克服它”。[50]

和他的导师亨利·西奇威克和其他众多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学

① Miss Octavia Hill，维多利亚时期的著名慈善家。

里的激进人士一样，马歇尔逐渐将教育视为与不公正的社会制度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1869 年，穆勒出版了《妇女的从属地位》[①] 一书。和该书众多的崇拜者一样，马歇尔把受过正规教育的妇女看作是社会变革的生力军和推动者。对马歇尔而言，妇女和工人二者所面对的现实问题几乎没有区别：他们同样缺乏过一种独立的、有成就的生活的机会。低工资的制约使得工人们生活困乏，除了极少数出类拔萃者外，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在才智和能力上都无法得到充分的发展。而中产阶层的妇女们由于受传统恶习的影响，陷入了另外一种类型的愚昧和贫乏。在当代小说家乔治·艾略特[②] 和夏洛蒂·勃朗特[③] 等人作品的影响下，马歇尔对那些无法充分培养和发挥自己才智的妇女所处的困境极其敏感。同时，他也为社会由此而遭受的损失惋惜不已。他坚信，为了实现救工人阶级于水火这一重任，不但需要更加科学和完善的经济学，还需借助来自于中产阶层妇女的巨大力量。“妇女充分自由地发挥其意志和工人阶级的不断完善，这二者之间有着密切联系”，而马歇尔是这一观点的“竭力鼓吹者”。在那个妇女被标榜为“灶台间的天使”的年代，马歇尔却在为妇女们上进修课程，为她们担任义务考官；他自己出资为女性学生们设立了一项经济学论文写作的奖金，后来还为纽恩汉姆大厅的兴建捐献了一笔六十英镑的巨款。该大厅是剑桥大学最初几所女子学院的核心建筑。1873 年，马歇尔偕同西奇威克和格鲁特俱乐部的其他同仁，发起了妇女教学综合管理委员会。米利森特·福西特也是发起人之一。当时，她妹妹伊利莎白·加内特正打算开始学医。[51]

马歇尔的讲课着重论述的是现代社会中存在的一个最大矛盾：贫困与物质的极端丰富同时存在。通常他会以提出一系列问题来开始他的讲课：为什么工业革命未能将工人阶级从“悲惨的境地”中拯救出来？现行的财产私有和自由竞争的社会制度究竟还有多大的改善余地？而从他对这些问题的答案中可以看出，他的观点和结论与他众多

---

① *The Subjection of Women*.

② Geroge Eliot（1819—1880），英国女小说家。

③ Charlotte Brontë（1816—1855），英国女小说家，《简·爱》的作者。

的前辈们已泾渭分明。他告诉那些妇女，慈善与政治经济之间并非像马尔萨斯顽固认为的那样，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即使在公开置疑政治经济学创始人理论的同时，马歇尔也仍然坚信，这门科学本身是不可或缺的。贫困这一痼疾所牵扯的方方面面比绝大多数改革者所意识到的都要复杂。经济科学，如同实物科学，无非是为人们提供一种工具，使他们能将复杂的大问题分割为许多简单的小问题，然后再逐一对其加以研究和分析。基于各种错误理论对此问题妄加干预只会使局面变得越来越糟。马歇尔以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马尔萨斯、约翰·穆勒等人为例向学员们展示，这些人所构建的“研究推动器”是如何的强劲有力。但同时，他也不忘指出应该如何对它们加以改进和完善。他告诉她们，如果没有这种工具，发现真理就只能全凭运气，而那样，世代以来人类的知识也就无法得到积累和承传。

工业革命不仅未将工人阶级从最低经济需求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它也未能提供“更高水平的生活”所需的物质条件。在这点上，马歇尔与穆勒的看法是一致的。“人们本以为，我们在生产技术和工艺上所取得的迅猛进步将能在很大程度上制止为生产而牺牲工人利益的做法……然而它并未起到这样的作用。”[52] 传统政治经济学家们认为，这原本就不可能，在他们眼里，工人的工资，不论是技术工人还是非技术工人，根本就不可能在现有基础上再有显著的增长。而马歇尔正是在竭力向这种观点发起挑战。[53]

导致贫穷的最主要原因是工资水平的低下，对此他从未有过怀疑。那又是什么导致了工资水平的低下呢？激进派认为源于雇主们的贪婪成性，马尔萨斯则认为，穷人们的道德沦丧才是真正的原因。而马歇尔却给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答案：生产力水平的低下。马克思曾经断言，竞争会使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的工资在勉强维生的水平上最终汇合。但事实是，前者的工资水平比后者的要高出“两到三倍甚至是四倍”。马歇尔引用了这一事实以证明自己的观点。雇主们愿意为受过特殊培训和拥有特殊技能的工人支付更多的工资。这个事实就表明，工资高低与工人对生产所作的贡献大小是有联系的。或者换句话说，

参与决定工资水平的因素，不仅是劳动力的供给数量，还应包括对劳动力的需求状况。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工资就不该一成不变。随着技术水平、教育程度以及组织结构的提高与改进，工资也理应随之水涨船高。在组织管理、知识和技术上所取得的成果会逐渐将贫穷赖以存在的根本原因消灭殆尽。因此，马歇尔号召人们自发自觉地行动起来，而不是消极等待，逆来顺受。

后来，历史学家阿诺德·汤音比曾如此评价马歇尔理论的重要意义："这是工人们从对工资问题的最新研究中获得的第一个好消息。它向工人们指出，除了限制工人队伍的人数之外，还有别的方法可以让工资得到增长。"[54] 工人们可以凭他的一己之力对他和他的后代施加影响，从而使他们具有挣取高工资的能力。"工资水平低下，医治这一社会痼疾的最佳方法便是更好的教育。"马歇尔如此告诫他的听众。

但同时，他也不无沉痛地驳斥了某些社会主义者的论调。后者认为，若非遭受富人的压迫，穷人们早已过上了"绝对豪华"的生活。他告诉那些妇女，英国每年的国民总收入是九亿英镑，而其中作为工资支付给手工劳动者的就占四亿，而剩下的五亿英镑中的大部分，马歇尔指出，是不属于所谓的"工人阶级"的劳动者的工资：半技术或全技术型工人，政府人员和军队官兵，以及其他从业人士和管理人员。如果将英国每年的国民总收入按人口数作绝对平分，那么人均是三十七英镑。换而言之，要实现降低贫困率的目标，就需要增加产出和提高生产效率。再换句话说，就是需要实现经济增长。

那些古老的经济学家的最大失误在于，他们未能认识到人类是环境的动物。一旦环境有了变化，人也将随之改变。而批评他们的人的最大失误却在于，他们不能理解渐进的变革和时代的发展能积累起多么巨大的力量。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一点连政治经济学的奠基者们自己也未能幸免。

> "我觉得世上没有几样东西能比乘法表更富有诗意……假若思想和道德的资本每年都能以一定比率增长，那么我们的进步将

会永无止境。假若你能贡献出你的力量，并施之以乘法表所具有的加倍功效，那它便将犹如一颗种子，最终能长成无边无际的森林。”[55]

当我们不仅仅是简单重复过去，而是有所创新，那思想的作用便格外重要。“工具论”，即用于发现真理的工具，将成为一股独立的力量。而真理，如同其他所有科学事实一样，都是因时因地而异的。“世界在前进，”马歇尔说，“而前进的步伐取决于我们将如何独立思考。”[56]

一年后的某一天，马歇尔正在安·克拉夫[①]位于摄政街的家中的客厅里与亨利·西奇威克交谈。突然间，他觉得有人在注视他。[57]一位坐着的年轻的女性正朝他们的方向凝视。她腿上搁着的针线活儿几乎纹丝未动。在她那张“动人的脸庞”上有一双“硕大深陷的眼睛”，一头红褐色的浓密头发如波浪一般倾泻下来，在她的脑后被随意地夹住。[58]后来，有人将年方二十的玛丽·佩理[②]称为“艾达公主”[③]。这位吉尔伯特和沙利文同名歌剧中的女主人公，“发誓要与世隔绝 / 她和其他一些女人一道将自己关在乡下杳无人烟的房屋里 / 让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哲学研究中去。”而为了与另外一些女性先行者一样追求在剑桥的教育，玛丽刚刚与一位英俊而愚蠢的军官解除了婚约。在这一“惊人的过程”中，她既非想扮演排斥男人的角色，也不想落入普通婚姻的俗套。“一个男人想要获得这些女性的好感，那他必须 / 能引起她们思想的共鸣，/ 而不是投其感情之所好。/ 先生们，她们就像是安全火柴，/ 只有遇到知识的盒子才能擦出火花来。”[59]

玛丽曾经数次聆听过马歇尔在格鲁夫道奇的车房屋里举办的讲座。在那儿，她听他狂热地讲述康德、本瑟姆[④]和穆勒的理论。她被

① Anne Jemima Clough，创立了纽恩汉姆学院（Newnham College）。
② Mary Paley, 马歇尔的夫人。
③ 轻歌剧“Pricness Ida”中的主人公。
④ Jeremy Bentham（1748—1832）英国哲学家，主张功利主义。

陶醉了。“当时我就想，我还从未见过一张如此令人着迷的面孔。”她承认，他那双“聪颖夺目的眼睛”将她俘虏了。有一次，她去马歇尔的学院参加舞会，马歇尔那张“表情忧郁的脸”让她禁不住鼓起了勇气。她走上前去邀他一起跳兰谢舞[①]。尽管他反复声明他不会跳，她并未介意并且带着他一步步走完了所有复杂的舞步，“连她都被自己的大胆惊呆了”[60]。从那以后，她便成了马歇尔“星期日晚间聚会”的常客，这些聚会都是在他圣约翰学院的房间里举行的。在聚会上，马歇尔不但拿出茶、桔子和小圆烤饼热情款待她，还将自己“收藏的许多哲学家、诗人和艺术家的人物画像分门别类地拿出来与她尽情分享。”

玛丽也许让马歇尔想起了玛姬·杜黎弗。后者是乔治·艾略特的《佛洛斯河磨房》[②]中的女主人公，她聪明伶俐，然而却害怕数学，但她又想和哥哥汤姆一样学“欧几里得”。[61]当时，马歇尔最爱看艾略特的小说。有一天，马歇尔在街上遇到了玛丽·佩理和她的好友玛丽·肯尼迪。马歇尔向她们提出了一个请求，不是求婚，但却比求婚更加惊世骇俗。他想让这两名他最钟爱的学生参加“伦理学优等考试”。这是政治经济学、政治学和哲学三门学科的最终考试，每名男性学员都必须参加这门考试才能拿到学位。这个目标与玛丽来剑桥的初衷有着云泥之别，她原本只打算通过听听文学、历史和逻辑学的课程以获得一些“基本训练”。

这一提议比其他教育改革者提出的所有计划都要大胆，后者大多只是在强调对中学教学进行改进。“记住，到目前为止，你们还只是在与拉车的马比赛。”马歇尔警告她道，“而参加‘伦理学优等考试’就仿佛是与真正的赛马一起竞争。”他也许诺，他和西奇威克都会给她悉心指导。据玛丽·肯尼迪回忆，“他向我们介绍说，参加这门考试意味着至少三年的苦读，其中有一到两门的专业学习。当时我们也没多想便轻易接受了这个挑战，但却全然不知我们接受的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任务。”

---

① The Lancers，一种四人组的舞。

② *The Mill On the Floss*.

和马歇尔一样，接受挑战的这位年轻姑娘也来自严格的新教家庭。玛丽·佩理的曾祖父名叫威廉·佩理，他曾是昆布兰省首府喀来耳的天主教副主教，也是《道德与政治哲学原理》一书的作者。玛丽的父亲是离斯坦福不远的尤福德教区的牧师，该地在剑桥西北约四十里处。他是一个顽固的激进派，他反对狩猎狐狸，反对赛马，也反对高级教堂的祷告仪式。他从不与邻近教区的牧师来往，而且严禁他的女儿们看狄更斯的书，甚至不许她们玩布娃娃。玛丽后来回忆道，“姐姐和我原本都有布娃娃，但有一天它们不幸全被我们的父亲给烧掉了，他说那是因为我们已经把布娃娃们当成了自己的偶像。打那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过布娃娃。”

但与马歇尔的父亲威廉·马歇尔相比，玛丽的父亲则要宽容得多，他所受的教育和拥有的财产也要多得多。玛丽从小在“一幢绿荫环抱的老式房屋里长大，屋前栽满了红白相间的玫瑰。往前看，是一片如茵的草地。而远处的背景则是森林中层层叠叠的绿树。屋旁的花园中还有长长的花坛和碧绿的阳台”。佩理一家搞的活动也五花八门：圆场棒球、射箭、门球、去伦敦远足以及夏天去亨斯坦顿和斯卡伯勒度假。“我们的父亲在工作和娱乐上都很投入，而且，他对电力学和摄影的兴趣也十分浓厚。”玛丽如此回忆道。她的母亲“也有层出不穷的新主意，她为人聪明而风趣”。1862 年，玛丽随家人一同前往伦敦去参观第二届万国博览会。虽然狄更斯的书仍在被禁之列，但玛丽却借机阅读了《一千零一夜》、《格列佛游记》、《伊里亚特与奥德赛》，还有一些希腊和莎士比亚的剧本以及沃尔特·司科特爵士的小说。而这些也都是马歇尔最为钟爱的文学作品。

1869 年，剑桥大学为十八岁以上的妇女设置了高等教育考试委员会。汤姆·佩理不顾她母亲的反对，坚决鼓励玛丽去报考。她获得了优异成绩并解除了与那位军官的婚约。她父亲终于允许她去剑桥开始求学生涯，“这件事是史无前例的。”安·克拉夫是妇女教育运动的领袖之一，同时也是西奇威克的好友，她正打算替为数不多的几位女生开办一处宿舍。玛丽后来这么描述写道，“我父亲很自豪，也很满意，他本来反对送我去剑桥，但对克拉夫女士的崇拜让他改变了主意。那

种事在当时可以说是惊世骇俗的。”[62]

1871 年 10 月的一天，玛丽与克拉夫女士及另外四位年轻女士一起聚集在摄政街七十四号。对于男女同校，整个剑桥都尚未准备好。因为“男女混合授课”被视为“不合适”，因此便需要有一些好心的教师能把讲过的课为女生们再重复一遍。而作为女生监护人，克拉夫女士每堂课都得陪她们坐在一起。“被这场运动吸引而至的年轻妇女们都极端向往个性解放”，但她们当中那些面容俊俏之人却长期受她们“不幸的长相”的连累而苦恼不已。当时，玛丽刚刚步入她的“前拉斐尔①时期”，她的房间全都是按威廉·莫里斯②的设计而粘贴的。她的烦心事尤其多。她的衣着犹如伯恩·琼斯③油画中的人物：凉鞋、披肩和拖地的长裙。她本人是名业余水彩画家，她偏爱珠宝的色泽，曾经有一次，她在她的网球裙上挂满了常青藤和石榴。

玛丽开始频繁地去听讲。她兢兢业业，才华横溢，而且，她对马歇尔用以阐述供需关系的“曲线”图心有灵犀，一点便透。当玛丽最终赢得经济学论文奖金时，甚至连她自己都不敢相信。听到马歇尔大胆地劝她参加“伦理学优等考试”，她欣喜若狂。此后，在她每星期的作业上，马歇尔都会用红墨水洋洋洒洒地写下大段评语。阅读这些评语成了玛丽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1874 年 12 月，玛丽终于参加了“伦理学优等考试”。一直到临考前，校方都未明确表示究竟是否会允许她参考。这种做法让人觉得“冷酷无情”。虽然最后他们勉强同意为她评卷，但却拒绝评给她最高分。“在主考人员开会时，两位考官评给我一等，另两位给我评二等，但由于当时主席不在场，没法投决定票，于是我便‘被晾了起来’。按西奇威克先生的说法，我是在‘天堂和地狱之间’悬着。”她后来如此回忆道。尽管如此，玛丽的成功仍使她在当地声名鹊起。

眼看在剑桥的时光马上便要结束，玛丽回到了在尤福德的家中。

---

① Pre-Raphaelite，1848 年在英国组成的协会，目的是鼓励绘画忠于自然，效法拉斐尔时代以前的意大利艺术家。

② William Morris（1834—1896），英国工艺美术运动领导人。

③ Edward Burne-Jones（1833—1898），英国拉斐尔前派的画家及装饰美术家。

下车伊始，她便“单枪匹马”在邻近的斯坦福组织了一系列为妇女开设的校外讲授课程。而且在剑桥斯图尔特教授的邀请下，她还答应为这些校外讲授课程撰写一本政治经济学教材。接着，她又收到西奇威克的来信，说克拉夫女士又新招收了二十名女性学员，问她是否可以接替马歇尔在纽恩汉姆学院继续经济学讲座。

时年三十二的马歇尔是当时剑桥大学“超前的自由主义者”之一。他留一头入时的长发，蓄着翘八字胡，衣着也不再是昔日年轻牧师般一本正经的模样。他新近加入了刚成立的剑桥改革俱乐部。他读到了一本名为《蜂巢》的激进工人杂志。

1874 年春，由农场工人发动的一场罢工在剑桥的激进派与保守派之间引发了激烈争论。当时，刚刚合法化的工会尚属于新生事物。前一年秋天，由约瑟夫·奥奇领导的一个新兴激进组织——全国农业工人工会——在英国东部的十数个城镇开始迅速扩展。工人们呼吁增加工资，缩短劳动时间，并且要求获得选举权以及改革土地法。[63] 罢工的声势浩大，并蔓延到了剑桥周围所有的地区。为了粉碎“叛逆者们”的企图，农场主们团结起来，成立了“防御委员会”，他们将凡是领有工会卡的工人一一解雇，同时远至爱尔兰地区录用没有参加罢工的工人取而代之。《托利剑桥纪事报》评论道，“与其说农场主们反对的是提高工人工资，不如说他们反对的是工会的许多狡诈手段，而且，他们不能容忍少数几个代表以工会的名义兴风作浪，颐指气使。”[64] 至 5 月中，双方的对抗已僵持了近两个半月。此事也开始成为全国性的争议话题。

在大学校园内，人们虽然都争相为孟加拉饥民认捐，但对此事的意见分歧却极其鲜明。一系列的问询和调查唤醒了人们对中产阶层及穷苦农场工人的深切同情。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由曼彻斯特的主教受皇家委派而写的一份报告。该报告揭露了农场工人所面对的超长工作日、极低的工资、恐怖的工作事故以及他们所吃的“稀汤、干面包和极少量的奶酪”[65]。在双方继续对抗期间，《伦敦时报》刊登了一些令人瞠目的文章，故意吓唬维多利亚时代的读者。其中的一篇描写道，

在一间狭小农舍的卧室里，不但住着“农场工和他的妻子，还住着他们一个二十四岁的女儿，一个二十一岁的儿子，另一个十九岁的儿子，外加一个十四岁的男孩和七岁的女孩”[66]。小说家们也在这个话题上大做文章。在此前三年出版的乔治·艾略特的《米德尔马契》中，多萝西·布鲁克对她身为富裕地主的叔叔说，她简直无法“忍视客厅里那些面带微笑的一幅幅油画肖像……想想基特·道恩斯吧，叔叔。他和妻子还有七个孩子一起住在简陋的房子里，只有一个客厅和一间比这个桌子大不了多少的卧室；还有可怜的达格利一家，他们只有一间破败的农舍，全家人挤在一起住在厨房后面，其他的屋子都成了耗子的出入之所。我为什么不爱看这里的这些油画，就是这个原因，我亲爱的叔叔。”[67]

但对保守党而言，这个事件仿佛是1816年至1817年间的面包暴乱和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焚烧草垛事件的重演。从原则上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反对工会化。那年春天，学院派一位“社会地位显著，在剑桥某学院担任要职的”头面人物在《剑桥纪事报》上发表了数篇冗长的“警告通知”，并呼吁农场主们绝对不要退让。他为工会领袖们贴上了“黑帮职业演说家”的标签，并将他们的同情者们称为“无病呻吟多管闲事之徒”。这篇文章的作者很可能是剑桥一位名为威廉·惠威尔[①]的教师，他将文章署名为“CSM”，他极有可能是在利用这一署名向他自由派的对手们挑衅，因为它是“Common Sense Morality”[②]的缩写。在涉及工资和工会化的问题上，CSM援引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声称，“这无非是一个供求关系的问题，应该按通常的自然法则来任其自生自灭，而不应让以盈利为目的的煽动家和政客搅和进来。”[68]

. 1874年5月11日是一个星期二。这天夜里，成群结队的工会支持者们挤进了位于相对寒酸的剑桥北面的巴恩维尔工人大厅。大厅的台上站着一些身着学位冠袍的人，他们都是工人们的支持者，这让工人们大感意外并且有些不知所措。在众人的哄笑声中，工人们的领导人之一、热情洋溢的乔治·米切尔坦承道，“当他看到那些先生们个

① William Whewell（1794—1866），英国科学家与哲学家。

② 意为“常识道德”。

个戴着低顶宽边软帽和黑色长披肩时，他还以为自己也要弄几件穿上。”[69] 塞得利·泰勒第一个发言，他是伦敦圣三一学院的前任院士，也是一位名声显赫的改革家。泰勒提出了一个谴责农场主的议案，指责他们企图击败工会是“罔顾整个国家的共同利益”；同时，他对持CSM立场的同事们也进行了猛烈抨击。

接下来轮到马歇尔发言。马歇尔对一位持不同政见并支持农场工人的农场主的建议表示了支持，他号召人们捐款，“让我们不但用我们的心灵，同时也用我们的钱包来表示同情。”

在对农场工人的讲话中，马歇尔驳斥了“政治经济学能滋生出符合道义的决定”的论调，他指出，在这点上，“它得让位于它的同胞姐妹——伦理科学”。他在发表在《蜂巢》上的文章中写道，“如果有人声称，政治经济学本身是生活的指南，那么他肯定是在滥用这门科学。我们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发现，个人的直接物质利益并不与整个社会的利益一致。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必须重新强调责任。”[70]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六，《剑桥纪事报》载文批评马歇尔的讲话，指斥其为“新颖的诡辩”。但事实上，他已成功地论证了为什么劳动力市场不能自发产生合理的工资，以及为什么工会能带来工作效益和工资合理化的提高。“有人想让我在这里讲讲供求关系的理论”，马歇尔以这句话开始了他的演讲。反对工会的人认为，现在的工资已经达到了一个“自然的水平”，否则其他雇主们必定会向工人们开出更高的工资。而一旦工人的工资水平被人为抬高，那它必然还会回落。这是李嘉图“工资铁律”中的理论，即使许多对工人报有同情的人们也奉此理论为金科玉律。“这套说辞的确非常高明，”马歇尔也承认这一点，但它背后的假设却是错误的。没有农场主会愿意出更高的价格把本来给邻居干活的帮工请来替自己干。而且，更高的工资能使工人们吃得更好，从而会使他的生产效率更加提高。在承认“工会自有其不足之处”的同时，马歇尔也强调，“工会能赋予工人们超出他们所在教区范围的利益和同情；它能使工人们认识到对知识的需求，使他们发誓要让他们的后代接受教育……工资一定会提高……贫困现象一定会减少……英格兰也一定会繁荣起来。”[71]

虽然有来自大学和众多媒体的支持，这场罢工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农场主们靠购买机器设备和雇佣大量男女童工得以支撑下去。6月初，支持罢工的资金告罄，工会通知工人们重返农场上班。从这段经历中马歇尔认识到：只有通过精心的计划和耐心的坚持来赢得实干家们的衷心拥护，新思想才能战胜旧的教条。

离开纽约五个星期之后，马歇尔在前往旧金山的途中路过马蹄大瀑布，他蹙着眉头向下俯视着。从他站立的山羊岛吊桥看去，这个大瀑布丝毫没显露出他那本旅行指南手册上所描绘的雄伟气势。作为数学家，他知道这是视觉角度不同的结果，他暗自估算了一番并安慰自己，这个瀑布的确名不虚传。但他的数学运算并未能扫除他的沮丧之情。“尼亚加拉瀑布[①]就是一个大骗局，”他在1875年7月10日给母亲的信中说，“尼亚加拉瀑布看似雄伟，实则平常；相反，阿尔卑斯山的某些山谷看起来只有一英里宽，实则宽约六英里。这两个真相相较而言，发现前者比发现后者要费力多了。”[72]

马歇尔来美国是作社会和经济考察的。他从曼哈顿搭乘一艘明轮蒸汽船前往奥尔巴尼。他在一封信中曾回忆起四十年前，亚力克斯·托克维尔[②]发现“哈德逊河两岸的那些古希腊风格大理石般的精美别墅原来是木头搭建的”，他会觉得何等的恶心和败兴。而相比之下，他本人“遇到的赝品并没有预想中的那么多”。[73]

确实，马歇尔仔细观察了所到的每一处。他似乎不仅仅满足于表面现象，而是有了更多的发现：美国建筑师展现出“大胆和力量”的风格，他们的建筑有着“一贯的细致和坚固”。[74]有一种名为“薄荷朱利酒”的美国饮料味道“棒极了”。美国牧师的布道在英国礼拜的基础上已经有了“惊人的发展”，“我们已难以望其项背”；[75]美国工人们都一个个“劲头十足”。[76]那年秋天回到剑桥以后，他在给“道德科学俱乐部”作汇报时还说，“在美国的行程中，没有一个我遇到的美国人的外表会让人觉得他的生活乏味而枯燥。”[77]7月间，当他到达克利夫兰

① 马蹄大瀑布是尼亚加拉瀑布的一部分。

② 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法国的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

时，他已得出了一个结论，“十个英国人有九个在加拿大会比在美国更幸福，但对我自己而言，假使要移民，还是应该去美国”。[78]

虽然此时，马歇尔的巨著《经济学原理》离最终问世还有十五个年头，但他的“新经济学”中的主要思想业已形成。它既不同于斯密、李嘉图和穆勒等人的古典不干预主义，同时又有别于正如日中天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教义。在过去的十数年中，他“一直致力于为他的学说打下坚实的基础，但却没有任何实际的出版物。”[79]而这趟美国之行让他更加胸有成竹。

那位曾经资助马歇尔上大学的叔叔给马歇尔留下了一笔二百五十英镑的遗产。马歇尔打算用这笔钱去美国游历一番。他的这一计划遭到了亲朋好友的嘲笑。但他解释说，他这是为自己一本有关对外贸易的专著去收集资料。虽然这是事实，但据经济历史学家约翰·威特克观察，他真正的目的远不止于此，“此次旅行只是他痴迷于了解美国的努力的一部分，他想对（美国）这个日新月异的经济体的方方面面都了如指掌。”[80]和包括托克维尔在内的欧洲观察家们一样，马歇尔将美国视为一个巨大的社会试验室。狄更斯、威廉·梅克比斯·萨克雷①和特洛勒普②等人都将其精力花在了民主制、奴隶制和工会等过去的旧问题上，这些问题如今都已经有了定论。而马歇尔想弄清楚的是，当前工业的迅猛发展，国际贸易的扩张以及传统道德的沦丧究竟会将世界带向何处。而美国取得的进步和发展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大。“我想要亲眼目睹未来美国的这一段历史。”从美国回到剑桥后，他曾这么对一名听众说。[81]

马歇尔搭船前往美国的时候正是历史上跨大西洋旅游最红火的时期。当时，最受欢迎的北美导游团的人数已升至每年五十万。北大西洋已仿佛成为一条海上的高速公路。有不下十家的蒸汽轮船公司每周提供一趟从利物浦出发前往纽约的航运服务。公司还建议英国旅游者最好提前预订他们的舱位，有的甚至须提早一年预订。[82]马歇尔搭乘的是西班牙号轮船，这是当时大型轮船中最大最豪华的一艘。整个航行仅用了十天。而相比之下，狄更斯1842年横跨大西洋的行程花了整

① 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1811—1863），英国小说家。

② Anthony Trollope（1815—1882），英国小说家。

整三个星期。由于其地域广阔，在美洲大陆上旅行费用颇为昂贵。马歇尔的预算是每月六十英镑，而他夏天在阿尔卑斯登山度假时每月仅需十五英镑。但事后，据他妻子玛丽说，他自己觉得“从未花钱花得像这次这么值。关键并不是他从那里学到了什么，而是他从那儿终于发现了自己想要学的东西”。[83]

这段经历让他觉得，“在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决定因素当中，社会经济所起的作用比人们以往意识到的要大得多。”他尤其认为，“一个人其他任何思想、行动和感情，都无法与贯穿在他每天工作中的思想、行动和感情相比，因为后者占据了人的全部身心，并也因此有机会塑造一个人”[84]。他也花了一些时间去参观教堂和会见客人，尤其在波士顿，他会见了数位美国知识界的翘楚，包括诗人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①]和美术史学家查尔斯·诺顿。他在震教徒兴办的公社以及罗伯特·欧文[②]在新英格兰的新道德村等地也盘桓了数日。但他的大多数时间都在参观工厂，记录他与工厂管理者和工人们的谈话以及描绘机器草图。在波士顿附近一家名为“奇克林父子”的钢琴厂里，他注意到“这里的工人大多都需要有高度谨慎和判断的能力”，而且那里的工人们“均有着一副能干、近乎强健且有美感的面孔”。在去一家风琴制造厂参观的路上，他“对将每个工人的工作局限在整个生产的某一细小环节的做法尚存疑虑”，他担心“这会不会有碍个人心智的发展”。[85]但参观以后，他得出了的结论是不会。

那个时期的公务旅行多少都带些私人旅游的色彩。马歇尔也未能免俗。他没能抵挡住新近竣工的横贯北美洲的大铁路的诱惑。在尼亚加拉的旅店中，他在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提供的一张广告地图上计划好了他的西行路线，他沿着路线在地图上扎了一排针眼，这样他远在伦敦的母亲只要拿起这张地图，对着亮光，就能知道他前往旧金山的行程已进展到了何处。

芝加哥是搭乘火车前往美国西海岸的首选之地。新建成的铁路交通系统貌似一只巨大无比的手，手掌部位覆盖着五大湖区，而数根手

① 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美国散文作家、思想家、诗人。

② Robert Owen（1771—1858），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企业家、慈善家。

指则一直延伸至西雅图、波特兰、旧金山，而且，其最南端的两条支线还能到达洛杉矶。绝大多数旅客都选择搭乘西北线，由芝加哥往西，经伊利诺依、爱荷华至康瑟尔布拉夫斯[①]。但马歇尔却坐上了大北线，先去圣保罗，然后坐内河船沿密西西比河顺流而下，“这类船以其设施豪华而著称，但它的易于爆炸更是广为人知。”[86]在爱荷华州界上，他得以与西北线汇合，一天之后他已身在康瑟尔布拉夫斯。他从那儿过河至奥马哈，在那里又转而登上了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火车。从奥马哈往西，是一马平川直通怀俄明州的切尼和格兰杰；在那里，路线向下延伸了一段直至犹他州的阿格登；然后是雷诺，圣克莱门托，最终是一段一百二十五英里长的慢行线直至旧金山。在切尼稍作停留之际，马歇尔坐上一辆公共马车乘便前往丹佛转了一天。他还特意在阿格登驻足以对摩门教派之都盐湖城进行考察。在回程中，他在雷诺下车，特意去维吉尼亚城看了看“当地疯狂的淘金人”。他意识到，他面对的是一个前无古人的非凡的新鲜事物。从他所坐的火车车厢里，他看到的是“一卷正在慢慢展开的新地图，是一个初具锋芒的新帝国和一个正在产生中的新文明”。[87]

马歇尔为他所目睹的高度流动性而大惊失色，“托克维尔那个年代的许多东西现在都已经面目全非了……许多以前雷打不动的东西现在都已不复当年的地位”。他在一封家信中写道。[88]在他入住第五大道旅馆之初，首先吸引他注意的是“一架靠蒸汽推动的电梯，它从早上七点开始到半夜一直在不停地上下穿梭”；同时，旅馆大厅里的自动电报机不断吐出一截截写有股票行情的纸条，这个情景让他尤为着迷。商人们在城外的住宅区里“就像在股票交易所中一样，照样可以得到充分的资讯”，他如此写道。[89]

流动性是美国生活方式最显著的特征，马歇尔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那不仅是铁路和电报，也不仅仅是一波波不断的新移民以及从东北海岸的制造中心流向西岸的新兴蘑菇城镇的人口（这些城镇滋生得如此之快，你只能假设那是因为土地的收成太好，而建筑速度也不亚于农

① Council Bluffs，爱阿华州西南部一城市。

作物生长的速度）。[90] 人们最感兴趣的流动自由是经济、社会以及心理层面上的。离开亲戚和朋友去一个新的城市，转换职业或者另寻雇主，以至采纳新的思想和行为方式，普通美国人对这些都能泰然处之，这让马歇尔非常惊讶。他描述道，“如果某人最开始从事的是卖靴子的行当，一旦他发现这行赚钱不如他的意，他可能会去试试卖几年食品杂货，接下来还可以再试试卖书，卖表或者卖布料。”他为年轻人所拥有的独立性而欣喜，“美国的小伙子们……对学徒制深恶痛绝……如果一位美国年轻人在一个行业中干了几年，这便足够让他在头脑里生出这样一种感觉：一旦他羽翼渐丰，便将会另谋高就。”[91]

美国人对不断发展的都市化所持的欢迎态度也给马歇尔留下了深刻印象：“每谈及在美丽的风景中独自散步的乐趣，英国人穆勒总是表现出异常的热情，”他干涩地承认，他还说“那些离群索居的人们正发现他周围已开始有邻居定居，那些昔日的世外桃源如今已成了新兴的小镇，由小镇又发展为小城，再由小城而一跃成为巨大的都市，而许多美国作家正满怀热情地描写着这些人类不断丰富的生活内容。”[92]

虽然物质和技术上取得的巨大进步给马歇尔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和他最喜欢的那些小说家一样，他更感兴趣的是这些进步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有什么能够担保每一个个人作出的选择加在一起必定能让整个社会受益？而每一个个人的升降沉浮以及随之而来的传统社会关系的趋于松散，究竟会不会如马克思和卡莱尔那些悲观主义者所预言的那样引发社会动乱？还有，流动性是否意味着“向现代乌托邦分子所梦想的那种社会状态无限靠近呢”？对马歇尔而言，这些才是问题之所在。[93]

马歇尔的内在信念让他秉持着与此相反的乐观立场。在康涅狄格州的诺维奇，他曾同一位叫南恩的女士一起在夜间驱车外出。这位女士告诉他，她原本打算当一位家庭主妇，结果后来却成了一位司机。马歇尔觉得这件事颇“耐人寻味”。据他的观察，美国的女士们都是“她们自己的主人……对打理自己的事务拥有绝对的自由”。他坦承道，这种自由“在英国男人看来绝对是危险的兆头”。但他却觉得“这是正当而有益的”。[94]

美国没有等级森严的阶级隔阂，这一点让马歇尔喜出望外。在一家帽子店里，店伙计将圆礼帽从马歇尔的头上取下来，然后戴在了自己头上以测算正确的尺码。马歇尔注意到了这个细节，却也不以为忤，“我这位朋友是一位绝对的民主派，他脑中根本不曾就是否能把我的帽子戴在他头上有过丝毫顾虑，他的举止也丝毫没有任何傲慢失礼之处。但愿这种习惯能在社会中推广开来”[95]。到达加利福尼亚以后，他欣喜地向人们报告，越往西，美国越接近平等主义的理想社会。“离开美国时，我对世界前途的看法总的来说比刚出发的时候要乐观多了。”他曾这样说。

他用动人心弦的预言般的语言展望了一种焕然一新的社会面貌：

> 在美国，流动性为人们创造了平等的条件……几乎所有人都能接受同等的入学教育，而且不论是以何种方式，所有人都能从其所从事的职业中得到更为重要的学习和培训，每个人都被同等地悉心教育，每个人都能在心智上得到平等健全的发展，这样的社会才是真正的民主社会。当然，财富上的巨大悬殊仍然会存在，至少会有那么一些富可敌国之人存在。但是，界限分明的社会等级将不复存在。正如印度的种姓制度由于遗传变异而终将消亡一样，穆勒曾大肆宣扬的根据工人的不同级别将他们划分成三六九等的做法也已经殊无可能。

社会个体所作的选择综合起来能让整个社会受益，卡莱尔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为了阐释这种可能性的确存在，马歇尔定义了两种不同道德观的教育方式。一种是英国式的。他指出，在这种方式下，一个人的性情在其四周环境条件的影响之下被潜移默化地塑造着，这种人只会在无意识的道德状态下被迫走上一条与全社会的言行、同情心以及利益不相出入的道路，因为他毕竟要在这个社会中度过一生；而在美国则不同，流动性为人们的道德培养开辟了另外一条通道，那就是，“通过战胜困难从而培育出坚强的意志和信念，有了这种信念，人在每个行动之前必然要审视一番这个行动是否合理。”[96]

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大多数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评论家都曾经担心，产业机制不但会以它的“麻木、残酷和道德堕落”将传统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消灭殆尽，而且还会导致人性的扭曲变态。[97]但在美国，马歇尔看到了另外一种可能：“在我看来，在社会伦理的问题上，美国人通常比英国人更习惯于自觉和负责地运用个人的判断力，同时也更加自由和大胆。”

从表面上看，马歇尔似乎是在概括地谈论人类这一整体，但其实他也是在说他自己。他也是历经磨难从而培养出了坚强的意志——一个暴君似的父亲，一个附庸风雅的贫困家庭以及严酷的阶级束缚和压迫。他也曾向权威发起过挑战——他放弃了自己的宗教信仰，还公然违背了父亲让他成为神职人员的意愿。现在，他觉得他的人生独立不但不会使他走向没落，相反能让他成就伟大。在美国的所见所闻让他的心里充满了希望。“这样一个社会也许会堕落成一个放荡之所，再从那滋生出别的邪恶来，但就最高层面上而言，它将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法律制度，它将以法律为准绳……这样的社会将成为一个拥有无穷力量的帝国。”[98]

“要论与‘劲头十足’和‘性格坚强’的女人打交道，我可算得上是得天独厚。”马歇尔在他从美国发出的一封信中如此说道。在另一封信里，他还特意描述了他与“南恩女士”一起度过的那个“令人兴奋的夜晚”，他承认，他觉得她“天真无邪”同时又有“职业魅力”。他接着补充道，“为了有更稳定的支持，我宁愿选择从无畏和成功中吸取无穷力量的女人。”[99]很显然，当时他脑子里正在想着玛丽·佩理。在他不在伦敦的日子里，她顺利通过了伦理学优等考试。

从美国回到剑桥之后，他们二人便订了婚。当时他三十四岁，而她年方二十六。他是“新经济学”派的一颗冉冉上升的新星，她则是学院的一名讲师。马歇尔对婚姻的态度深受乔治·艾略特、乔治·刘易斯[①]以及托马斯和简·卡莱尔夫妇这样的知识分子伉俪的影响。“人

① George Henry. Lewes（1817—1878），英国哲学家及文艺评论家。

们常说，在理想的婚姻生活中，夫妻二人都应该为对方而活。如果这意味着他们都将为取悦对方而活，那在我看来这太不道德了。”马歇尔在一篇短文中如此写道，“男人和他的妻子应该这样生活在一起，他们不为对方活着，但他们却应有共同的目标和追求。”[100] 对曾因“闲得无聊”而与人订过一次婚的玛丽而言，这个理念真是太令人兴奋不过了。如同菲力斯·罗斯在其《平行的人生：维多利亚时期的五段婚姻》[①] 一书中所描述的维多利亚时期那些异乎常人的婚姻一样，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和玛丽·佩理这一对婚姻伙伴的秘密就在于“他们声气相投”[101]。订婚后不久，他们俩立刻决定将共同完成玛丽正在编写的教材，他们把正式结婚前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这项工作上。

他们的婚礼在尤福德教区的教堂举行，离教堂不远便是绿茵环绕、门前栽满了红白玫瑰的老宅。这里是玛丽长大成人的地方。玛丽没有戴面纱，只是在头发上别了一支茉莉花。为了昭示他们不墨守成规和对婚姻的高度期望，这对新人在婚誓中去除了“妻子要臣服于丈夫那一条”。[102]

结婚意味着马歇尔在圣约翰学院的研究员职位自动作废。他和玛丽曾一度产生过去一所寄宿学校任教的想法，但是布里斯托尔一所红砖大学[②] 的校长职位突然空了出来，他们便立刻抓住了这个良机。这所学校曾是英国国内首次试行男女生同校的学校。1877 年他们把家搬到了布里斯托尔，玛丽请人在家旁修了个网球场，同时把几乎所有的房间都贴上了莫里斯牌墙纸。而马歇尔挑选的则是二手的家具和钢琴。她很快也回到课堂上教授经济学兼辅导女性学员。

由于得到了当地工商界的首肯和支持，该大学的各学院努力为“中产阶层和工薪阶层的人们提供自由的受教育机会”。[103] 在马歇尔任职期间，虽然也有资金短缺的掣肘，学校仍成功地通过日间和夜间的课程向约五百名学生授课，并且对邻近社区举办的公开讲座进行了赞助。学校还向纺织工人提供过技术培训，并且联合当地企业为工程专业的学生提供了勤工俭学的机会。马歇尔不但要从事学校的管理，他

① *Parallel Lives: Five Victorian Marriages*, by Phyllis Rose.

② Red Brick College，英国最顶尖的老牌名校的称谓。

的授课职责也同样繁重。通常，听他课的人有小企业主、行业工会的成员和妇女，他的课“不像在剑桥时那么专注于学术性……而是将严格的推理与实际问题的解决糅合在了一起，同时他还会对各种五花八门的问题进行即兴探讨”。一位学生如此回忆道。[104] 马歇尔“讲课从来不用讲稿，阳光从窗外射进来独独照在他的脸上，而其他所有的东西都埋在黑影之中。他的讲课对我来说宛如美妙的天籁之声。他宣传他的信仰，他认为经济科学将对促进和推动社会进步起到巨大的作用，他的话语对听众有着极大的感染力。”[105] 每天下午，这对鸳侣仍旧在继续编写他们的《产业经济学》一书，有时他们会去户外长时间散步或者打上好几盘草地网球。一位朋友将这些称为“他们完美的幸福生活”。[106]

马歇尔后来曾说过，通过阅读马克思的著作让他坚信，“经济学家也应该研究历史，包括过去的历史以及更容易接触到的当代历史。”[107] 在狄更斯和梅休事迹的鼓舞下，他经常深入到工厂和城镇去会见企业家、管理者、行业工会的领导人和工人。“对于社会现实，我是贪得无厌。”[108] 他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他渴望替那些“在日常各行各业”中忙碌的男男女女们写一本书。[109]

他坚信，他必须得像马克思写《资本论》时一样，将理论、历史和数据综合起来。但他又非常敏锐地感觉到，这本书的读者们会需要一些简单实用的结论和适当直接的概括和评论。作为一位科学家，他断然不会让自己的理论仅仅构筑在一些未经核实的二手资料上。

马歇尔下决心仔细研究每一个主要行业的独特之处。他按技术级别和行业分工收集了工资水平的数据；他也潜心研究了穆勒提出的将制造技术、产品设计和管理融于一体的“制造艺术”。[110] 但他也承认，从先前的理论当中很难得出企业主们会不断努力去改善他们的产品，改进生产工艺和原料供应的结论。对那些家族或私人拥有的企业如何运转，以及它们是怎样不同于正在变得日益重要的联合股份公司和合伙人公司，马歇尔尤其感兴趣。他还在多个委员会任职，这更增加了他对社会的了解；同时，他也出任了伦敦慈善协会的董事，并有大量

学术方面的信函往来。在玛丽的陪同下，每年夏天他都要花数星期的时间去进行实地考查。

据玛丽记载，在其中的一次行程中，他们“考察了十四处城镇、矿山、钢铁厂、纺织厂和救世军分部”[111]。他们的行程安排胃口大得出奇：科尼斯顿的铜矿、科比的采板岩场、贝尔罗的港口与钢铁厂、米尔农的铁矿、怀特海文靠近海边的铁矿，还有兰卡斯特和谢菲尔德。马歇尔发明了一个装置用来整理和调集他个人数据库中的资料。他的这个“红皮书”是他用线手工缝制的笔记本，在每一页上都记载了数个领域的资料，从音乐到技术到工资水平，全部按年代先后顺序排列。马歇尔只需在某页的某一点上拿针戳个眼，便能了解到在同一时期其他领域内所取得的发展和成就。

和大多数维多利亚时期的知识分子不同的是，马歇尔对企业家和工人格外崇拜。卡莱尔、马克思和穆勒等人皆视制造业为一种令人生厌的现代必需品，他们认为工人正在堕落和退化，企业家则是一群追腥逐利的市侩之徒，而都市化的生活则是极其鄙俗的。穆勒认为，除了对冷僻的事物不够宽容和鼓励之外，共产主义在其他所有方面都要比自由竞争制度优越。他曾盼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出现一个实行稳定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但在这些知识分子中没有一个对工商业的了解能与马歇尔正在达到的程度相提并论。当然，如伯克那句“在含辛茹苦中悲惨度日”的名言所指出的，绝大多数劳工一直或正生活在这一宿命的阴影之下。然而，基于第一手的考察资料，马歇尔却指出，至少现代企业的某些工作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传授了新的技能，提升了社会的流动性，并且鼓励人们以长远的眼光和符合社会规范的行为行事，更不用说正是因为这些工作才使人们有能力存钱以供教育和经商之用。更为重要的是，他认为，这种类型的工作正在逐渐增加，与此同时，其他类型的工作却在日益减少。总而言之，工商企业将成为，也已经成为决定个人命运关键的一步。

虽然狄更斯常被人们认为是工业革命的历史记录者，但他小说中几乎唯一一个有关工厂的场景却是凭空想象而来的。《艰难时世》中焦炭城里的工厂是一个从远处才能看见的人形怪物，它将工人通通变成

机器，再按照自己怪物般的形象将所有自然和社会环境重新进行塑造；喧嚣，肮脏，单调，连水和空气都受到了毒害和污染。

> 这是一个红色砖墙组成的城市，只有烟雾和灰尘不能蔓延到的地方，才会有别的颜色的砖墙。但事实上，这座城市里的红黑二色都是极不自然的，它们就仿佛是野蛮人涂抹过的脸。这也是一座充斥着机器和高大烟囱的城市，烟囱中源源不断散发出滚滚浓烟，延绵不绝。城中还有一条漆黑的河沟，河水呈绛紫色，并发出一种难闻的化学染料的气味。城中还有不计其数的建筑，建筑上的窗户整天都在颤栗发抖，而在建筑里面，蒸汽发动机的活塞在单调地上下来回运动，仿佛一头抑郁得发疯的大象。[112]

焦炭城里住着一群“行为高度雷同的人，他们在同一个钟点早出晚归，经过同一条街道，发出同样的脚步声，干的也是同样的工作”。更为关键的是，狄更斯想象在工厂里面，他们干的工作也“常年不变”，“每一天都跟昨天和明天没有区别，每一年也都跟去年和明年一个样”。生产，换而言之，意味着永远都没有创新。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工厂的描述与狄更斯的极其相似，但没那么具体。这并不意外，因为马克思从未亲眼目睹过一家真正的工厂。同样，工人们被变成了“活的机器的附属品”，工作成了“简单的不用动脑的动作的重复”，自动化“剥夺了工人对工作所有的兴趣”。[113]

相较而言，马歇尔对工厂以及工厂生活的描述更具体，更细致入微，也更多样化。他花了大量时间进行观察。他对生产工艺、工资幅度以及厂房设置都作了记录。对每一个遇到的人，不管是工厂老板、工头还是亲手操作的工人，他都会问大量的问题。他也遇到了狄更斯和马克思都曾遭遇过的那个令人困扰的现象：装配线生产方式对工人造成的影响。然而，他得出的结论与前二者都不同。

> 企业的主要特征是其将每项工作分成很多道小的工序，而每

> 个工人的工作被局限于整个生产过程的无数工序之一。这种方式是否有害于工人心智的发展和提高呢？我认为不会……假如一个人没有脑子，我们会将他开除：在劳动力市场供需作用的浮动作用下，这种事情司空见惯。又假如一个人脑子比较好使，他便能保住他的差使；但如果他还有些别的想法，他便得去了解他工作的车间里所有别的情况：否则他根本不会有机会晋升为工头……绝大多数局部细节上的改进都是由车间里的工头们促成的：历史上大多数的进步也都是由一两个人促成的，因为他在一心一意专注于此事……他们对生产和机器所作出的细致改进能改善机器某些部件的密封性能，而更好的密封性能又能使另外一些部件工作得更轻松。英国人就是这样发明了有键竖琴使用的变声器。[114]

在狄更斯和马克思看来，企业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操纵和剥削工人。在穆勒的眼里，它们的唯一目的是替企业拥有者挣钱。但在马歇尔看来，工商企业并非如同一座监狱。管理者们的任务也并非只是维持监狱的秩序。为争夺顾客（雇员）而展开的竞争意味着简单的重复生产已不再能满足需要；马歇尔眼中的企业必须为了生存而不断革新和进步。当然，马歇尔并不否认企业要追逐利润，但他强调的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利润，企业的销售额必须达到一个相当高的程度，以使它在付完工人、管理人员、供应商、土地所有人、税务等款项之后，还会颇有盈余。要能实现这一点，企业管理者必须不断琢磨出新的方法，在现有或比现在更少的资源的基础上，使产出在现有水平上得到增长。换而言之，生产力的提高，这个从长期来说决定工资水平高低的主导因素，完全是市场竞争的副产品。

1879年，英国麦克米兰出版公司出版了《产业经济学》[①]一书。这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它没有什么特别新鲜的观点，但语言简练直接，具有鲜明的初级读本的特点。它涵括了马歇尔新经济学理论的所有基

① The Economics of Industry.

本观点。它的核心思想可以用下面这段语言加以概括：

> 本世纪初，英国经济学家们的主要失误在于，他们全都忽视了历史和统计数据。他们将人视为一个所谓的常数，他们也从未费心去研究是否有异变的存在。因此，他们只能将一个更系统化，更频繁的行为机制简单地归结为供求关系的作用；但他们最严重的失误却在于他们未能认识到产业习惯和制度的变化是何等之快。[115]

对工商企业运行机制孜孜不倦的钻研终于为马歇尔带来了他最重大的一个发现。在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中，工商企业的经济职能不仅仅是，甚至不主要是为企业的拥有者创造利润，而是为提高所有消费者和工人的生活水平服务。它是如何实现这个功能的呢？是通过以更低的成本和更少的资源生产和分配出数量更多、质量更佳的产品和服务。为什么它能做到这点呢？竞争迫使企业的拥有者和管理者作出不懈努力，一步步完善和提高他们的产品、生产工艺、分配和营销方式。这种不断追求提高生产效率，提高资源利用的最大化以及提倡低投入高产出的做法，久而久之便使企业能以同样或更少的资源获得更多的产出。再经国民经济中成百上千的企业加以放大，这种常年逐渐改进所形成的积累将会使生产力和工资水平双双得到提高。换而言之，在竞争的压力下，企业为了获得利润而不得不提高生产效率。同时，在竞争的压力下，企业的拥有者不得不以提升工资的方式与企业的管理者和工人分享奋斗的成果，而消费者则是以产品质量得到提升和产品价格下降的形式从中受惠。

企业是推动生活水平和工资水平提高的主要力量，这个观点与知识分子长期以来对企业所持的谴责立场大相径庭。亚当·斯密曾因将竞争的益处比作一只看不见的手而名声大噪，他认为竞争会促使制造商不自觉地为消费者的利益着想。但即使如此，他也不至于会认为屠宰商、面包房的老板以及那些大型肉联公司会将提升消费者的生活水平当作其经营的目的。而卡尔·马克思呢，虽然他认识到工商企业是

推动技术革新和提高生产力的主要力量，但他却没认识到企业还为人类摆脱贫困和主宰自己的物质环境提供了手段。

马歇尔的书刚刚出版，一连串倒霉事便接踵而至。1879 年春，马歇尔被诊断出患有肾结石，当时还不具备治疗这种疾病的手术和药物。他的医生叮嘱他道，“不能再有长时间的散步，不能再打网球，只有做到完全休息和静养才有痊愈的希望。”马歇尔后来回忆道，“他的建议对我这个生性活泼好动的人来说不啻是当头一棒。”[116] 马歇尔童年时期暗暗滋生出来的对世界末日迫在眉睫的恐惧感，在身体极度痛苦虚弱的情况下又死灰复燃了。仅仅在数星期前，他还刚刚利用假期在达特茅斯的沼泽地带独自远足。而现在，他却成了一个足不出户靠针织打发时间的病秧子。一个家住布里斯托的熟人回忆起当时见到他的情形，他觉得马歇尔看上去像有七十岁：

> 当时他看上去非常衰老，病容满面。有人曾暗地告诉我，他的一只脚已经迈进了坟墓，对此我当时深信不疑。我的脑海中闪现出他穿着大衣，带着软礼帽在埃普斯利大街[①]上蹒跚而行的情景……但到 1890 年我再次见到他时，我却发现他比我十几年前见他的时候看上去要年轻三四十岁，我都被惊呆了。[117]

疾病使他更加依赖玛丽，也使玛丽的角色从他的心灵伴侣而更多地变成了他的护士。对付疾病占用了他的全部精力。一直以来，马歇尔时常遇到写作瓶颈。而现在，他觉得自己应当集中精力继续写书。因为他的书将新的理论与来自现实社会却又经过筛选的第一手材料结合在了一起。他希望他的书能让穆勒，甚至马克思的著作黯然失色；但同时，他又担心自己不能胜任此项任务。随着他眼界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展，他对已写完的那些篇章越来越不满意。甚至远在他病情暴露之前，他便已决定取消商业贸易那一部分的出版计划。“我已经能够

① Apsley Road，布里斯托的一条街名。

断定，按目前这种状况，这本书好不到哪儿去。”早在 1878 年夏他便曾这么写道。[118] 而且，他也越来越看不上他与玛丽共同编写的那本书。然而 1881 年，在意大利的巴勒莫，他在一家屋顶的凉台上开始着手撰写《经济学原理》一书。

在所有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为医治经济大萧条所开出的药方中，美国记者亨利·乔治[①]的土地税是迄今为止最受关注和支持的一个。乔治的畅销书《进步与贫穷》使他在一夜之间声名鹊起，他的每一次公开演讲都听者如潮。乔治的理论假设贫穷的增长速度高于财富增加的速度，而这一切都是拜土地拥有者所赐。他认为，土地拥有者之所以能获取高额收入，并非因为他们为社会提供了什么服务，而仅仅是由于他们幸运地拥有了土地。而且，土地租金的上涨不断压缩企业利润和工人的实际工资，并剥夺了企业家急需的用于再投资的资金。他视土地租金收入为导致贫困的罪魁祸首。因此，他提出了一套对土地征收重税的解决方案。他宣称，土地税不但可以使其他税收得以被减免，它“还能提升工资并且增加资本的回报率。它能够根除乞讨、消灭贫困，并使所有愿意工作之人都能找到有偿的工作，使人类的力量和潜能得到充分发挥；它能使犯罪率下降，使人们的道德水平、品位和知识水平得到提高，使政府机构变得更加纯净。它将把人类文明带向一个前所未有的宏伟高度”。[119]

正忙于撰写《原理》一书的马歇尔又一次被卷进了那场旷日持久的有关生活水准的争论。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使得激进思想和社会变革的呼声再一次甚嚣尘上。同时，经济发展究竟能否为大多数社会成员造福，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态度越来越审慎。在 1893 年大恐慌之后的经济衰退期间，“失业率”这个词应运而生，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就实际工资从长期而言究竟是在增长还是在下降所进行的激烈争论。

争论的关键在于要明确竞争所起的主导作用。竞争究竟是导致了

---

① Henry George（1839—1897），现代土地制度改革运动人物。

雇主们争先恐后地削减工资并使之一路走低呢？还是像某些乐观派所说的，竞争促使企业不断地努力提高生产效率，从而在使生产力和工资水平得到提高的同时，使贫困人口的数量也大为减少呢？

马歇尔与亨利·乔治的首次正式交锋于1884年在牛津的克拉伦登酒店拉开序幕[120]。辩论者的声音被台下此起彼伏的嘘声、掌声和轻蔑的嘶嘶声所吞没。期间，一名本科生一度不得不提醒大会的主持人有“女士在场”。时至十一点，场内的叫喊声已经震耳欲聋，乔治只得声明“这是在他作过发言的会议中秩序最混乱的一次”。他并且拒绝继续回答任何问题。在“巨大的噪音”和“土地国有化”、“土地掠夺”的抗议声中，会议不得不“被迫中断”。

如果说马歇尔对1874年农业停工的支持表明他并不认同古典经济学的教义的话，那么十年后他与乔治的交锋则再一次表明，他同样反对眼下时髦的新理论。

虽然马歇尔在另外一些场合对乔治“靠征收土地税来去除贫穷”的建议也提出过批评，他也曾称乔治为“一位诗人”，并称赞他“对生活的看法新颖而充满热情”。但在克拉伦登酒店，他却没那么彬彬有礼。他指责乔治“利用他罕有其匹的哗众取宠的功夫”去“毒害人们的心灵”。他所指的“毒”便是乔治为消灭贫困所开出的处方。

在布里斯托的演讲中，马歇尔坚决贯彻了他的事先声明，“避免过多谈论乔治本人，而集中精力讨论他的话题”。“在乔治的书中，有一个副标题对‘财富增长将导致人们欲望的增加’进行了探讨，”马歇尔说，“但我们真的能够断言，财富的增加必然导致人们欲望的增加吗？……那就让我们来看看这方面的事实吧。”[121]

马歇尔列举了大量统计数据，其中很多都是从他和玛丽共同积攒的“红皮书”中而来。他指出，只有“最底层的工薪阶级”的生活水准遭受了持续下降的压力，而今天，那一阶层相对于人口总数的比例尚不到本世纪初该比例的一半。而工薪阶层作为整体而言，其购买力已经翻了三倍。“全英国几乎一半的收入都是工薪阶层的收入所得……因此，他们确实分享到了新发明所带来的进步以及由此获得的相当大一部分利益。”[122]

马歇尔充分利用了他熟知经济历史的优势。他坚信，现代社会无论有怎样的缺陷和不足，但与以往的历史相比，这些缺陷都是不值一提的。“除了在一些最新兴的国家，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地方的工薪阶层的富裕程度能与英国工人相匹敌。”马歇尔发表这番言论的时候正值历史学家们后来所称的“大萧条”时期。因此，他的这种乐观精神尤其引人注目。

在其第二场讲座中，马歇尔对乔治将贫困的原因归罪于雇主支付的工资水平过低这一论调进行了挑战。首先，雇主们自己无法替劳动力限定一个价格，就如同他们无法设定棉花和机器的价格是同样的道理。他们只是在支付市场价格。如果一个工人很能干，他的工资便会高，否则就要低一些。“许多英国工人从未受过良好的培训，更遑论有谁受过良好的教育。”生产力的低下是“导致英国工人工资水平低下的主要原因，这同时也是为数众多的实际贫困确实存在的主要原因”。虽然马歇尔不否认“某种形式的土地国有化在整体上不无裨益”，但他仍然认为，“能立竿见影治愈贫困的灵丹妙药是不存在的。我们应当更现实地去寻找一个不那么耸人听闻的良方。”[123]

这个良方便是提高生产力。途径之一：

> （从最广义的程度上）为所有非技术和低效率的工人提供教育和培训；另一方面，（下面这句话是我在贫困这一问题上的思想核心）如果非技术工人的数量减少到足够低的水平，那些从事非技术工作的工人的工资状况便会好转起来。假使总产量没有上升，这些额外的工资费用便得从资本或其他高级别工种的支出份额中来……然而，一旦生产效率的提高使得非技术工人的数量下降，那么产量必然大幅增长，这样便会有一笔更多的资金利润让人们共同分享。

他不反对工会，甚至对更为激进的土地改革和累计税制的建议他也未唱反调。他仅仅评论说，这些建议中没有一个会“使面包和黄油的产量增加”；要达到这一目标，需要“市场竞争”，需要时间，还需

要来自社会各方、政府以及穷人数者之间的通力合作。[124]

他指责乔治开出的是庸医的处方。问题不仅仅是“乔治先生说了‘如果想要致富，就把土地拿过来’这番话”，关键是它把人们的注意力从教育、培训、勤奋和节俭上转移开来。乔治的这个方案“给工人带来的收入增长小到只能以分厘计……然而就为了这样一点蝇头小利，乔治先生却还嘲笑工人们为自我拯救而作出的其他奋斗计划。”[125]

1890 年，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一书终于面世，给这门步履维艰的学科注入了新的生命。该书一举奠定了他作为知识界权威和领军人物的地位，政府人士也一时争相向他求教。

《原理》一书涵括了马歇尔对社会主义的排斥，对私有财产和自由竞争制度的拥护，以及他对人类及其生存条件能得到改善所持的乐观态度。该书没有将经济学理论视为教条，而是把它当作“心智的工具”。正如狄更斯所希望的，在为此学科奠定了更为坚实的科学基础的同时，马歇尔也为之注入了“一些人性的生机和温暖”并使之更为人性化。

书中最主要的一个观点折射出了他从美国学到的一课。在财产私有和竞争的社会机制下，企业随时都会在压力的促使之下努力用同样或者更少的资源以获取更多的产出。从社会的角度看，企业的职能就是在不断提高生产力的同时，使生活水平也同样得到提高。

在所有社会机构当中，企业的立场最为中立，其社会地位也相对要高一些。而且，它还参与了对思想观念和社会文明的塑造，这一点在美国尤为突出。企业不但是美国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社会变革的推动者，同时它还是一块吸引了众多优秀人才的巨大磁石。在狄更斯的笔下，企业家都是白痴和凶残的食肉动物，工人们则是一具具行尸走肉，而成功的生产方式只不过是简单机械的重复性举动。但美国的情况让这些描写显得非常可笑。美国的生产能力在以人们难以想象的速度迅速提高，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它意味着，至少从整体上而言，企业所依赖的并非仅仅是厚此薄彼的工资分配方式和年复一年简单的重复性生产。在他参观各工厂的过程中，管理者对细节改进的不

懈追求以及工人们对新机会新技术同样充满热情的追求给马歇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管理者与生产者似乎都一门心思要运用自身所拥有的条件以实现其利益的最大化。

当然，马歇尔也承认企业的目的在于赚取企业拥有者的利润、管理者的薪水以及工人所需的工资。亚当·斯密曾经指出，在竞争的压力下，企业只有生产出尽可能多尽可能便宜的产品并以此为消费者带来便利，才能实现企业自身收入的最大化。马歇尔在他的分析中引入了“时间”这一要素。就长期而言，企业只有不断提高其生产能力才有可能维持其利润，才有可能继续生存。在竞争中谋生存不仅仅意味着要不断适应新的变化。企业为争夺拥有最高生产力水平的工人而展开的竞争也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必须与工人分享生产力提高所带来的成果。

而这恰恰是马克思、穆勒和其他政治经济学的奠基者们曾经否认会发生的。他们一直坚持认为，生产力的进步根本不会，或只会极少地为工人们带来利益。在他们凭空想象的企业里，生产力会节节攀升，但工资却始终不会长期超越某个心理最高界限。而工作条件，如果会有什么不同的话，也只会日益恶化。马歇尔发现，这不单与事实不符，而且这根本就不可能。企业为了争夺工人而展开竞争，这将迫使企业拥有者把效率提高和质量改进所带来的利益拿出来与工人分享，先是以赚取工资的工人身份，再者便是以消费者的身份。事实表明，马歇尔是正确的。1848 年，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和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双双问世。而自那一年起，工资在国内生产毛额（即一个国家在一年之中工资、利润、利息和业主收入的总和）中所占的比重几乎一直都在上升，而非下降。工资水平和工薪阶层的消费总额也同样呈现出上升趋势。

第三章

波特女士的职业：韦伯夫妇和家务管理型国家

“她渴望能有某样东西使她的生活充满理性和热情；既然有伟人指引方向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那么，除了知识，还有什么别的能充当指路的明灯呢？”

——乔治·艾略特，《米德尔马契》[1]

每年3月，上流社会的人们都会如同一群羽毛华丽充满异国风情的鸟儿一般莅临伦敦。[2]在这场长达三到四个月的伦敦“社交季节”里，全英国的名流都心无旁骛地加入到这场特意举办的社交盛典中来。早晨通常是在海德公园的练马林荫道或女士专行道骑马，而下午，男人们不是去国会点卯便是去俱乐部消遣，而他们的妻女们则去逛商店或是进行社交拜访。晚上，所有的人又一起听歌剧，参加晚宴聚会和场面宏大的舞会。人们隔三差五地还要参加义务赛跑、划船比赛、板球比赛，或是出席某个画廊的开张典礼，这些活动稍稍能为他们的日程安排增添些新鲜花样。

和其他许多事情一样，维多利亚时期上流社会的这一类看似无聊的声色犬马的活动其实是非常严肃的。社交季节开始之日，正是国会各院复会之时，伦敦也因之成为世界婚嫁市场的中心。有钱的父母们

一心要把女儿送去经历两到三次“伦敦社交季节”，就如同他们一心要将儿子送往剑桥和牛津读书一样。参加这一繁复的求偶舞会所需花费的金钱和精力自然是相当可观的。来这里的人假如在本地没有一幢永久的“贵族别墅”，那他就得在某个打眼的地段租下一所豪宅；他还得购买大量昂贵的物件并派人送过去。而且“马厩、停车房……大量的精美服饰……以及举行晚宴、舞会、野餐和周末聚会所需的粮食和器皿设备”，这些都被认为是社交礼节所必需的。毫无疑问，如此庞大的社交活动需要有人专门负责，需要有人对“如此众多的计划、雇员及决定”进行统筹规划，换而言之，需要一个女管家。[3]

此刻，比特丽斯·爱伦·波特在想的正是这一档子事。她在家里的九个女儿当中排行第八，家人们昵称她为“波”或是“比”。她们的父亲名叫理查德·波特，他是来自格洛斯特的铁路大亨。1883 年 2 月一个寒冷的下午，她和父亲乘坐的马车在一处高大的台阶前停了下来。台阶背后是一排意大利风格的乳白色别墅。这位苗条的年轻女郎带着些居高临下的神情将公主门大街四十七号的房屋镇定地打量了一番。这里将成为逐渐扩大中的波特家族在今年“伦敦季节”期间的社交中心。她六位已婚的姐姐和她们各自的家庭也都将住在这里。门前爱奥尼克式的石柱、科林斯式的墙柱、高大的窗户、四处垂悬的果树与花草无不让这座五层别墅看上去格外奢侈。而且它还正面对着海德公园。在屋后，透过落地的玻璃门能看到一片宽阔平坦的草地，草地上装饰有古典雕像和巨大的花盆，一丛丛猩红的天竺葵在盆花的两旁攀援。别墅两旁邻近的建筑也是同样的阔绰。她父亲当初选择公主门路正是为了和这些在财富和权力上与他不相上下的人们比邻而居。一个叫朱利尔斯·摩根的美国银行家租下了同一条街上的十三号，而约瑟夫·张伯伦则订下了四十号，他原先是一位曼彻斯特的产业家，后来改行成了一名自由党政治家。他也就是后来的内维尔·张伯伦[①]的父亲。如此的环境对波特的宝贝女儿们来说真是再完美不过了。

当时才二十五岁的比特丽斯来参加伦敦季节已不下五六回。虽然

① Neville Chamberlain（1869—1940），1937 年到 1940 年任英国首相。

她已是此中老手，但她迄今却尚未坠入过爱河。至今为止，她的职责不过是参加五十几场舞会，六十几次聚会，三十场晚宴和二十五个早餐会，再有便是在这些活动的空隙时间里自得其乐。就这样一直到7月，整个上流社会的人们才会打点好行李开始前往乡村避暑[4]。以往，她从来用不着参与后台那些必不可少的“精心策划”[5]，但今年却有所不同。母亲于去年春天刚刚离开人世，除了年方十三的罗茜之外，波特的女儿当中只有比特丽斯尚留在格洛斯特的家中。于是，她摇身一变被提升为父亲家里的女管家。

离开格洛斯特之前，比特丽斯曾发誓要“将自己奉献给上流社会，并将功成名就当作了自己的目标”。[6]她所谓的“成功”指的就是像她的每位姐姐那样嫁给一位重要人物。当然，从她“将自己奉献”的用词能看出，自我牺牲将是获取成功所要付出的代价。她的姐姐当中最晚才做到这一步的是凯特，她一直到三十一岁的“高龄”才嫁给了一位著名的自由党经济学家，莱纳德·考特尼。当时他正任国家财政部长一职。她们的父亲丝毫不怀疑“波”会步凯特之后尘。在美貌、教养和财富之外，她的天赋也格外引人瞩目。她幽雅颀长的脖颈，聪颖过人的眼睛以及乌黑发亮的秀发让许多第一次看见她的人即使远隔着喧闹的大厅也禁不住会联想起美丽而又颇具威胁性的黑天鹅来。男人们纷纷为她着迷。当他们发现她并未拿他们当回事的时候尤其如此。

波特一家抵达新居后的最初一段日子是在混乱和困惑中度过的。每天都有新的包装箱，新添置的马匹和更多的马车到来。入夜以后，等到仆人们都已经退下，她的父亲也已经进过了晚餐，比特丽斯才会上楼来到她为自己选定的位于别墅最里头的一间卧室。此刻，她才会有时间想想宴席座次和菜单以外的事情：她从前买的想要阅读的那些书籍；这才是她原本想要学的东西。比特丽斯并不因为自己拥有各式各样的期望和责任而觉得矛盾。毕竟，当时盘坐在英国王位之上的是一位有着幸福婚姻的女人，而且在当时英国文坛上执掌牛耳的同样也是一位女性，乔治·艾略特。比特丽斯满十八岁的时候，她在研究东方宗教上下的工夫比她为即将“步出深闺”而作的准备工作要多得多。

从她房间的窗户望出去，正好能看见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

突然间她意识到，这座昭示着人类聪明才智的伟大纪念碑就矗立在伦敦市中心。虽然“身处大都市喧嚣繁忙的生活中心，它却依然那么安详，那么泰然自若。”[7] 比特丽斯想，自己是不是也能像它一样，在人头汹涌的客厅和剧院中如同佛教徒一般超然物外。如果不行，她便只能一边扮演她在上流社会中的角色，一边过着她拥有“思想”的另一部分生活。而那种生活却在促使她不断地问自己：“我应该怎么活？为什么而活？”[8]

打十五岁开始，比特丽斯就常常因为有关自己命运的问题而走神。她的母亲和姐姐们总觉得她的这份痴迷是不健康的表现。“生为波特家的漂亮小姐，住的是美屋花园，嫁的是金龟婿”，这些难道还嫌不够吗？[9] 如果比特丽斯是哪部维多利亚时期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那该小说的作者绝对得花些笔墨才能解释清楚为什么她对于自己命运的关切会成为全书的“兴趣重点”。亨利·詹姆斯在他 1881 年出版的《一位贵妇的画像》一书中，恰恰就是这么做的：“无论聪明与否，成千上万自以为是的女孩子每天都在向她们的命运挑战。其实这又能有什么用呢？最多我们也就是在庸人自扰罢了。”詹姆斯在序言中曾经这样发问。[10] 然而，在中产阶层的妇女们于早婚早育之外能有别的选择之前，在《已婚妇女财产法案》于 1882 年通过之前，“她还能干些什么事呢？”这个在《一位贵妇的画像》中三番五次被提及的问题根本无法激起读者的兴趣。

“你年轻，漂亮，既有钱又聪明，你还想怎么样？”在一同上学的时候，比特丽斯的表妹玛格丽特·哈克尼斯，一位贫穷的乡村牧师的女儿兼未来的小说家，曾经愤愤不平地问她。“为什么你还不知足呢？”[11] 就像詹姆斯书中的女主人公伊莎贝尔·阿彻一样，在她的成长过程中，比特丽斯被给予了不同寻常的自由，她可以出外旅行，可以阅读，还可以结交朋友以满足她“强烈的求知欲”和“对生活巨大的好奇心”。比特丽斯更喜欢与男士为伴，她理所当然地在他们跟前颐指气使，但和伊莎贝尔一样，她并不打算“以婚姻开始自己的生活”。[12] 在女性魅力之外，她还想在知识上也有所成就并希望得到人们的认

可。时间一年一年地过去，她想拥有一个“真正的目标和事业”的心情也变得愈加急切。[13] 她有一种“特殊的使命感”，她毫不怀疑“自己的一生必定会有所造诣”。[14] 和《米德尔马契》中的多罗茜一样，比特丽斯渴望有人能从原则上给她一些点拨，“并且能让她的生活顿时变得充满理性和激情”。[15]

生为英国“新统治阶层”的一员，这在比特丽斯的个性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16] 而“成长于资本投机和大企业都生机勃勃的年代”对她思想的形成也起了巨大影响。[17] 正如历史学家芭芭拉·凯恩所言，比特丽斯能够在其所属的阶层中出类拔萃凭借的并不是她的财富，而是因为“那些人都习惯于发号施令，却很少或是从未听从别人的驱使”。[18] 她祖父是靠自我奋斗得以发家的，而她父亲却在 1848 年的危机中将其继承的遗产丧失殆尽。但紧接着，他靠在克里米亚战争[①] 期间向法国军队提供帐篷而得以东山再起。到 1858 年比特丽斯出生之时，理查德·波特已经从木材和铁路行业中积攒了其三分之一的财富，并成为了“大西铁路”的董事之一（后来升至董事会主席）。波特不像其他管理人员一样事必躬亲，他更具有创业和投机冒险的精神。他曾经盘算过要建造一条能与苏伊士运河媲美的运河。他的生意遍布从土耳其到加拿大的世界各地。四处外出旅行对他和他的全家而言是家常便饭。波特一家坐落在格洛斯特的住宅起名为“斯坦迪什”[②]，它的奢华程度简直不亚于一座旅馆。来此探访的亲朋和人数众多的雇员和清客使这里常常人流不息，门庭若市。

步入中年以后，虽然理查德·波特开始将选票投给保守党，但他从来都不是一名死心塌地支持托利党的有钱人。他的父亲以前曾当过棉花批发商，也曾经是国会中的激进派，他还参与创办了被比特丽斯称为“我们的机关报”[19] 的《曼彻斯特卫报》[20]。他能接触到最新的知识。他不但眼界开阔，而且极善交际。他最亲密的朋友圈子中都是些科学家、哲学家和新闻界的记者。赫伯特·斯宾塞在十九世纪六七十

① Crimean War，1853 年至 1856 年发生于欧洲的一场战争，作战一方是俄国，另一方是奥斯曼帝国和法兰西帝国、不列颠帝国，后来萨丁尼亚王国也加入了这一方。

② Standish。

年代是英国知识界众星捧月的人物（他当过铁路工程师和《经济学家》杂志的主笔）。他称理查德·波特为“我见过的最招人喜欢的人”。[21] 尽管后者对斯宾塞的哲学观点并不感兴趣，但这并不妨碍斯宾塞终其一生都对他敬重有加。

每一位非凡的女人背后都有一位卓越的父亲，这似乎已成了一条定律。波特鼓励比特丽斯和她的姐姐们广泛地阅读，他还将自己的大量藏书毫不设限地全部向她们开放。他也从不对她们的讨论和交友横加干涉。他非常喜欢与她们为伴，即便是到外地出差他也总是会带上她们中间的一两个与他同行。比特丽斯曾说过，“他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真正觉得女人比男人更加优秀的男人，他的行为举止也颇能反映出他的这一观点。”[22] 她将自己的“大胆、勇气以及她对大企业面临的机遇和风险都了如指掌”统统归功于他。[23]

从某种程度上说，劳伦西娜·波特比她丈夫更不寻常。如果说在她丈夫身上并没有多少典型的商人气质的话，那么从她身上能看到的特洛勒普小说中那种丰满温和的母亲形象就更少了。斯宾塞第一次遇见波特夫妇是在他们婚后不久，他当时就觉得“他们俩是我见过的最令人羡慕的一对儿”[24]。后来，他对他们的了解逐渐加深，他惊奇地发现，在劳伦西娜阴柔、高雅和富有教养的完美外表之下隐藏着“极其独立的个性”[25]。相较于她丈夫随和的为人，劳伦西娜处事非常理性和严格，从不轻易满足。她出生于海沃斯，来自利物浦的一个开明商人的家庭。她从小接受了与她兄弟们相同的教育。具体点讲，她在数学、语言和政治经济学上都接受过训练。在她还是年轻女孩的时候，她便因为替反对谷物法案拉选票而成了当地的名人和报纸新闻关注的对象。十多年后，比特丽斯还时时在妈妈梳妆台的桌子上看到一些经济方面的小册子。

劳伦西娜是个很不幸福的女人。但她心情抑郁的原因却是她的女儿们无法揣测的。在她憧憬的婚姻生活中，她“和比特丽斯的父亲在精神上应该有着紧密的同志关系，在知识上可能会有所成就，并且还能与众多的杰出之士结交来往。”[26] 但与她的这些希望相反，在婚后的头二十年中，她始终都是在怀孕和养儿育女。她的大多数时间都只是

在与妇女和儿童为伴。而她丈夫则在四处周游，他还常常与作家和其他有名的知识分子一起进餐。写小说曾一度成为了她的真正理想。在被家庭的重担压垮之前，她已经出版了一部名为《劳拉·盖尔》的作品。

在劳伦西娜的第九个孩子，也是她所生的唯一一个男孩——狄基出生以后，她便将全部心血都灌注到了他的身上。然而，两岁时他却因患猩红热离开了人世。从此，她便陷入了极度的忧郁，而且与其他孩子的关系也越来越疏远。据当时年仅七岁的比特丽斯后来回忆，母亲“仿佛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人物，她要么是与父亲谈事，要么就是在她的私人房间里潜心阅读”。由于受到母亲的冷落，比特丽斯逐渐生出了“我生来便没人爱，我这个人肯定有什么地方遭人讨厌”的想法。她喜怒无常，爱自吹自擂，时不时还爱撒谎和说些大话。同时，她还继承了从海沃斯遗传来的厌世和自杀倾向。劳伦西娜的亲戚当中有两位曾经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的童年总的来说并不幸福。”成年以后的比特丽斯这样回忆说。“糟糕的健康状况和缺少关爱，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神紊乱、暴躁的脾气和满腹怨恨，这些都极大地损害了她的性格……它带来了孤独感，这是毫无疑问的。”[27] 比特丽斯在年幼的时候便曾经摆弄过装有三氯甲烷的瓶子。

据某传记记载，由于受到母亲的冷落，比特丽斯转而向“楼下”在波特家帮忙的仆人们寻找关心和爱护。她和姐姐们同专门照看小孩的玛莎·杰克逊的感情尤其密切，她们都管她叫“大大”。很久以后，比特丽斯才发现，她们的那位“大大”其实是她的一位母系亲属，她们家虽穷，但却是兰开夏受人尊敬的手摇纺织机的织匠。凯恩认为，是“大大”让比特丽斯心里有了原罪的观念，也是她使得她决心要多多行善，并让她在一生中都对那些辛勤工作的、“值得尊重的”穷人有着高度的认同感。但最终促使她开始写作的却是劳伦西娜这个活生生的样板。从十五岁生日那天开始，比特丽斯便开始了写日记，并一直坚持到她去世。“有时，我觉得我似乎必须要写，似乎我必须把我那些可怜的胡思乱想倾诉给什么人听，哪怕是给我自己听。”[28]

经常光顾波特家的知识分子中有生物学家托马斯·赫胥黎、达尔文的表弟弗兰西斯·高尔顿爵士和其他一些人，对于新兴“科学”正在逐渐削弱传统的观念，他们都持拥护的立场。在比特丽斯十几岁的时候，由于和波特家一样有持异议新教徒的背景，斯宾塞便成了劳伦西娜最亲近的密友，他对波特一家在知识上所起的影响是独一无二的。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发明“适者生存”一词的斯宾塞比查尔斯·达尔文的名声还要响亮。他认为社会各机制就如同动植物的各个物种，都在不断进化。因此，它们也和动植物一样，能够被观察、归类和分析。他的这一观点攫获和激发了社会大众的想象力。作为进化论最早的支持者之一，斯宾塞非常激进，他反对奴隶制，支持给妇女以参政权。他对政府法规与税收的反感同那些渴望进入上层社会的中下阶层人士的意见不谋而合。但同时，他拒绝否认上帝的绝对存在，这也为他赢得了更多的好感。

但斯宾塞并不适合过名人的生活。由于健康状况不稳定及忧郁症倾向，随着年岁的增长，他越来越离群索居，举止怪癖。不在俱乐部或独自在家的时候，他喜欢与波特夫妇和他们的孩子们为伴。他常常造访波特一家位于格洛斯特的住宅。他常常高喊着“不要屈服”的口号将波特家众多的姐妹们从家庭教师的管束下解放出来，并为之乐不可支。[29] 为了讲解他进化论中的诸多观点，他会带她们去采集标本。夏季，波特一家会去他们在科茨沃德的隐秘别墅，而他则会从头到脚穿着一身白色的亚麻布衣服，手举阳伞，领头在山毛榉丛子和桃树林中穿行，在他身后则跟着“一队美丽天真”的细高纤瘦的女孩。[30] 她们个个留着男孩般的黑色短发，白色的衣服像穆斯林一样将浑身裹得严严实实，手里还拿着提桶和网子。有时，他们会停下所有的活动，开始一起挖掘化石。由于格洛斯特的老铁路线地带和石灰岩矿区历史上曾经在温暖的浅海中埋藏过数千年，因此它汇集了各式各样丰富的菊石壳、海百合、三叶虫和海胆类化石。女孩们并没拿她们这位超理性的朋友太当真。“我们都是猴子变来的吗，斯宾塞先生？”她们常常会一边齐声问他，一边咯咯地嬉笑不止。而他的回答永远都不会变：“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是，只有百分之一的人不是。”这个回答会引来

又一阵欢快的笑声，偶尔，还会招来山毛榉的叶子如雨般地向他“醒目的盔帽”上抛来。[31]

比特丽斯是姐妹中最爱读书、最多愁善感的一个，斯宾塞神奇的思想让她格外着迷。斯宾塞鼓励她，并称赞她是个“天生的玄学家”，他还拿她与她的偶像乔治· 艾略特相比。他为她开出了阅读的书单，并鼓励她追求她在知识领域的抱负。若没有他的帮助，比特丽斯或许已过上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同时有时也是她自己内心想过的那种循规蹈矩的生活。

令人惊讶的是，比特丽斯所受的正规教育严重不足。如同大多上层社会的年轻女子一样，她只是在教授女子社交礼仪的精修学校呆过几个月。这与她常常生病有关，有时是真病，有时则是臆想出来的病。此外，尽管理查德· 波特在当时算得上是位开明人士，但即使如此，他也从未有过送她念大学的打算。于是，她所得到的教育大多是在家中进行的——即自学和自由阅读，她甚至能读到连外面图书馆都没有的禁书。“如我母亲所言，我还太小，太缺乏教育，最糟的是，我还太过肤浅，因此我还无法与她为伴。”她在日记中这么写道，“但我必须鼓起勇气，努力去改变。”[32]在其他事上锱铢必较的劳伦西娜在买报纸和杂志上却大方得很。比特丽斯一头扎进了宗教、哲学和心理学的相关阅读中，而这些也正是她母亲的兴趣所在。作为学龄少女，她读的主要是乔治· 艾略特，还有风靡一时的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先驱，奥古斯特· 孔德。

比特丽斯可以不受限制地涉猎父亲的全部藏书和母亲的杂志，她因此接触到了很少有女孩能接触到的维多利亚时期宗教和科学方面的大多数的主要争论。“在这个或下一个世界中，人类具有何种责任和命运，我们能不断听到当代有关这一问题的各种最新假设以及对它们的反复置疑。我们的确就生活在这样一种永恒的动荡状态中。”她回忆道。当她年满十八准备走出深闺之际，她以往圣公会教徒的信仰已被斯宾塞的“和谐与进步”的信仰所取代。同时，她也继承了她导师的自由派政治主张及其“科学考察者”的理想。“科学考察者”的形象让她的心里躁动着“对事物本源强烈的好奇”，她希望有朝一日能对人类

有一个全景式俯瞰的了解。她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心愿，那就是要写一本“有人愿意读的书”。[33]

在公主门大街住了三个星期，比特丽斯开始觉得她的时间和精力受到了很多掣肘[34]。尤其在参加完某次繁琐的晚宴之后，她为那里的“妇人们都如此刻板”[35]而大为恼火。她不明白为什么“一位知识女性要向这样的社交俗套妥协”。[36]她将所有的不满通通倾泻到她的日记当中：“我觉得自己仿佛是只关在笼中的动物，终日被囚禁在奢侈舒适的生活及人们对我社会地位的仰慕之中。”[37]

比特丽斯渴望工作，同时也渴望爱情，但她逐渐开始怀疑，与可怜的劳伦西娜相比，她能够鱼与熊掌兼得的机会究竟能多多少？伊莎贝尔·阿彻坚持认为，“女人也有别的事情可做”，她当时指的也许是那些自主独立的职业妇女，她们的人数虽然还不是很多但却在逐渐增加，她们能自由地与任何人交往，与任何人交谈，她们住在租来的公寓里，还能独自外出旅行。

但这样的女人需要放弃的也很多。比特丽斯从她的见闻中意识到了这点。在大英博物馆的茶点室里，她曾与埃莉诺·马克思不期而遇，后者的父亲便是在英国声名狼藉的卡尔·马克思。埃莉诺·马克思有着“不修边幅的秀丽衣着和随意倾泻的黑色卷发”。埃莉诺在知识上的自信与其罗曼蒂克的外表给比特丽斯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埃莉诺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却让她颇为反感。“不幸的是，要想了解一个人，你多少得跟他有一些联系。”她曾这么告诫自己[38]。她非常崇拜表姐玛格丽特·哈克尼斯，后者便是后来《在最黑暗的伦敦》、《城市女孩》和其他几部社会小说的作者。玛格丽特独自住在布鲁姆伯利[①]的一间廉价单元房里，她尝试过教书、当看护、做演员，一直到她终于发现自己在写作上的天赋。她们全家都被她给吓坏了，玛格丽特曾一度被迫与她的家庭中断了所有联系。而这对比特丽斯而言要比让她移民去美国更难以想象。她真希望自己能更安于现状，“为什么像我这样的小青

① Bloomsbury，英国伦敦中北部的居住区，因在20世纪初期与知识界的人物，包括弗吉尼亚·沃尔夫、E.M. 福斯特及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关系而闻名于世。

蛙，非要气喘吁吁地去追求一份职业呢？我真想把心里那个想要有所成就的可恶念头连根掐掉……”[39]

斯宾塞又一次站出来解了她的燃眉之急。他建议比特丽斯代替姐姐担任在东区收房租的志愿工作。这样她便能一边继续个人的学习，一边为从事社会调查的职业作些准备。和她的前辈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一样，比特丽斯发现自己被伦敦深深吸引住了。她参加了一次“慈善机构社团”召开的会议，这是一个提倡以“科学”和实证为基础进行慈善以及宣扬自我救助教义的私人组织。“人应当依靠自己的收入和努力养活自己……他应当尽可能地减少对政府的依赖。”[40]一直以来，探望穷人的工作都由妇女承担。时至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从事社会工作在未婚和没有子女的妇女当中已蔚然成风。其吸引力是多方面的。据比特丽斯观察，“走到穷人中去对我们来说是极其有利的……我们可以从他们新颖有趣的生活中吸取到经验；对他们的生活和环境进行研究能为我们试图解决的社会问题提供事实依据。”[41]那之后不久，她便产生了一个想法：“我要终生都能从事这项事业该有多好啊……”[42]然而，仅仅数月之前，比特丽斯也就去过位于怀特查佩尔的“凯瑟琳之家”两三趟。“如果我去参加所有需要的培训的话，那肯定会影响到我的家庭责任。”她发出了这样的感慨。[43]

同一个月的一天夜里，比特丽斯的心情万分激动，她辗转反侧，彻夜未眠。刚刚在邻居家举行的晚宴聚会上，她的男伴竟然是约瑟夫·张伯伦。他是英国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家，也是她见过的男人中最威严最有魅力的一位。在此之前，比特丽斯还从未恋爱过。

张伯伦比比特丽斯年长二十二岁，虽然曾两次丧偶，他却依然焕发着年轻人的力量与热情。他身形有力，头发浓密。他有着火热的目光和美妙性感的声音，他是一个天生的领袖人物。他最初靠生产螺丝和螺栓开始发家，后来因锐意改革而成为了伯明翰的市长并从此步入政坛。一连四年，他在该市“修公园，铺街道，颁布法令，搞市场宣传，并努力改善了水和煤气的供应”[44]，从而使该市从一个脏兮兮的工业小镇一跃成为现代都市的典范。接着，他又为重建自由党濒临崩溃

的政治体制花费了数年心血。作为对他的褒奖，他被授予了内阁成员的职位。

比特丽斯遇到张伯伦的时候，他已经成了英国政坛上的坏小子。他考究高雅的作派，包括他的单片眼镜、定制的衣服，以及西服翻领上别着的一朵新鲜兰花，无不与其蛊惑人心的政客形象格格不入。但在当年那些疾风暴雨般的辩论中，张伯伦将选民的注意力紧紧集中在贫穷和投票权这两项议题上。他利用其在内阁的影响来推动普选权、廉价住房以及免费为农场工提供土地等各项提议。他甚至向保守党的领袖索尔兹伯里勋爵发出了到伯明翰参观的邀请，这让保守党的党徒们怒气重重。他的竞争对手们将他称为“英国的罗伯斯比尔”[①]，并指责他煽动阶级仇恨。维多利亚女王曾经要求他为一次工人示威中对皇室的不敬举动道歉。赫伯特·斯宾塞曾告诉比特丽斯，张伯伦“此人的动机也许不坏，但无论现在还是将来，他都会给人们带来难以估算的伤害”。[45]

作为斯宾塞的忠实信徒，比特丽斯几乎反对张伯伦的所有主张，尤其是他对选民民粹化情绪的迎合。尽管如此，他仍然令她的内心激动不已；“我对他是爱恨交加。”她在日记中写道。她严肃地告诫自己，“与社会上的‘聪明男人’交谈就好比走入陷阱和错觉……直接去读他们的著作要好得多。”[46]但她却未照自己的建议行事。

波特与张伯伦两家在公主门大街上比邻而居。于是，这个颇受争议的自由党政治家与时髦而稍具反传统倾向的波特小姐免不了常常不期而遇。他们的第二次相遇是在那年7月赫伯特·斯宾塞办的年度野餐会上。与张伯伦交谈了整整一晚之后，比特丽斯坦承“我对他的个性格外感兴趣”。[47]数星期后，她又有机会坐在张伯伦和一位拥有大量地产的贵族二人之间。“那位辉格党[②]的党员张口闭口不离他的财富，而张伯伦则在动情地讨论如何利用别人的财富造福大众。”她曾诙谐地说道。虽然他的政治主张不合她的口味，但她却被他“理智的激情”和他的“使命感”深深吸引。比特丽斯暗暗告诉自己：“你得好好琢磨

① Robespierre（1758—1794），法国大革命的领袖。

② Whig，又称辉格党、维新党，在十九世纪成为现今的自由党。

琢磨这个男人。”[48]

然而，比特丽斯是在欺骗自己。这位社会调查家和公平的评论家的心中方寸已乱，她已被卷进感情的“旋涡”难以自拔。这种感情是她自己无法理解也无法控制的。嫁给张伯伦会不会让她幸福？这个问题让她苦恼不已。男人为她着迷，这对她来说早已习以为常。太过轻易的征服已难以让她满足。自幼对关爱的渴求使她希望得到男人的关注，而这个男人又必须不光倾心于她，他还得有更为重要的追求和抱负。张伯伦的理想是有朝一日能当上内阁总理，他要求他的崇拜者和家人都绝对服从于他，他以男人引诱女人的方式来吸引社会大众。在比特丽斯的阅历之中，他的个性是最具力量的。他难道不该有一位同样优秀的伴侣吗？

她也曾试图分析为什么自己会如此痴迷于他，“千篇一律的爱情让我觉得枯燥，”她曾在日记中如此写道。

> 但约瑟夫·张伯伦如此犹豫而又严肃，他很少对女人献殷勤，也不擅长甜言蜜语；他的风格极其简单，他总是认为或者干脆认定，你的层次比他要低一大截，所有你为之操心之事在他看来都不值一提；而且在这个世界上，除非你跟他沾上了关系，你个人其实并无任何重要性可言，这种方式的追求（如果它能被称为追求的话）至少能让我为之浮想联翩，为之着迷。”[49]

比特丽斯暗暗期待着张伯伦会在“伦敦社交季节”结束之前向她求婚，但这并没有发生。比特丽斯失望地回到了斯坦迪什，在那里“她梦想着自己将来必定会功成名就，爱情也会翩然降临”[50]。9月，张伯伦的妹妹克莱拉邀请她去张伯伦一家在伦敦的宅第作客。比特丽斯又一次以为张伯伦会借此机会向她求婚。“他生长的环境那么注重诚实，他究竟是如何打算的。在这件事上他一定不会拐弯抹角含糊其词的。”她如此安慰自己。[51]然而，这次他仍然没有行动。他究竟是怎么想的，这甚至已成了波特全家的讨论话题。比特丽斯试图将自己和姐姐们的期望降低，她说：“张伯伦女士说过，正直高贵的绅士‘对女人

的态度都很传统'，我那些与传统不符的气质也许正好可以断除男人对我的诱惑。反正我是不会故意去掩饰的。"[52]

同年10月，当比特丽斯仍在斯坦迪什为张伯伦冥思苦想之际，《帕尔摩公报》摘录刊登了有关伦敦东区的一份宣传册，它是公理教会的一位牧师用第一人称的方式写的。[53]这份系列材料以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描写和揭露了那一地区恶劣的居住条件。它使中产阶层的读者们一时群情激愤。正如1840年到1850年间亨利·梅休的贫困目击报道一样，《来自伦敦弃儿的悲嚎》一文详细记录了拥挤、无家可归、低工资、疾病、灰尘等一系列现象，而且，正如杰特鲁德·希默尔法布指出的，该文章对乱交、卖淫及乱伦的暗示使它更加耸人听闻：

> 如此恶劣的生活条件必然导致道德败坏……问问那些住在鸟笼般破屋里的男男女女，他们结婚了吗？对你这样幼稚的问题他们只会报以一丝微笑；谁也不知道；谁也不会在乎……乱伦也是常事；无论什么样的丑恶淫邪之举在这里人们都不会引以为怪。[54]

这篇生动形象的报道直接促使时任内阁总理的索尔兹伯里勋爵就这些问题的成因以及政府该如何应对，与张伯伦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这位托利党的党魁在伦敦东区拥有大片土地。他将问题归咎于伦敦的市政建设未能满足人口过于拥挤带来的额外需求。而张伯伦则认为城中那些房地产拥有者们难辞其咎。因此，他打算通过征税来筹集兴建工人住宅区所需的资金。引人瞩目的是，无论是托利党人还是激进派都理所当然地将解决住房问题视为政府的职责。

比特丽斯对《帕尔摩公报》上的这一系列文章却不以为然，她认为其"肤浅且有哗众取宠之嫌"，她和斯宾塞一样为其造成的政治影响摇头不已。[55]但由此她却认识到，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和实地考察是这篇文章引人入胜的关键。她提醒自己，她之所以到那些破房子里去目的不是施舍行善，而是本着科学考察的精神。《悲嚎》一文造成了巨大的反响，斯宾塞非常希望他的追随者中有人能写一篇强有力的反驳

文章。比特丽斯禁不住摩拳擦掌，她即将在诊断社会问题的舞台上小试身手。

比特丽斯决定从她较为熟悉的领域着手。她母亲的一些穷亲戚住在巴卡普，该地正位于棉花产区的中心地带。这些亲戚中包括她深爱的“大大”，“大大”最终嫁给了在波特家干活的一位男管家。这项计划最让比特丽斯喜欢的是她拥有的自由程度。为了不给家里带来尴尬，也为了防止她的采访对象缄口不言，她没有搬出“波特”家的鼎鼎大名，而仅仅是以“琼斯女士”的简单身份去了兰开夏。一个星期之后，她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无庸置疑，要想了解工业化下的真实生活，唯一的途径便是到工人当中去。”[56]

结果果然不出她之所料：“纯粹的慈善家们倾向于忽略一个事实，那便是，有一个独立的工人阶层的存在。因此，当他们眉飞色舞地谈及‘人民大众’的时候，他们指的其实是那些游手好闲之辈。”[57]她决定以这些独立的穷人阶层为题写一篇文章。那年圣诞期间，她又见到了斯宾塞，后者催她将她在巴卡普的所见所闻尽快写出来出版。托利党和自由党倾向于提高税收和政府供给，而“工人们日常生活状况的实际观察报告”则是矫正这种“恶劣的政治倾向”的一副良药。[58]斯宾塞答应去找《十九世纪》的主编谈一谈。比特丽斯自然十分满意，同时，她在暗地里也觉得好笑，因为这个所谓的“恶劣的政治倾向”的代表人物不但得到了无数支持者的拥护，而且他还即将进入到波特家族的圈子里来。[59]

比特丽斯向张伯伦和他的两个孩子发出了邀请，请他们来斯坦迪什共度新年。除了面对面的相见，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排解她的离别之苦。她觉得他对此也应该是感同身受。“我在忍受折磨，但忍耐却难以持久，”她在日记中写道，“生存还是毁灭，这个问题必须尽快了结。”[60]然而，这次来访最终却让人极其尴尬。比特丽斯越是拒绝接受张伯伦的政治主张，他就越是讲得更加起劲。在一次激辩之后，他不由得抱怨说，他觉得自己仿佛是在演说。“我觉得他那双认真好奇的眼睛没有放过我任何一个细微的动作，他仿佛想要确定我是否已在他的优越感面前俯首称臣。”比特丽斯写道。当张伯伦告诉比特丽斯，从女

人那里他想得到的是“智慧上的认同”，而比特丽斯则挖苦他说，在他脑子里，他真正想要的是“智慧上的卑躬屈膝”。这一次，他依旧未提出求婚便扬长而去。[61]

“如果你认同赫伯特·斯宾塞，你就不会认同我。”张伯伦在他们最后一次争论中曾如此向比特丽斯挑战。[62]但他如果以为这样便能让她改变立场，那他就大错特错了。

在比特丽斯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她爸爸就时不时拿斯宾塞来揶揄一番，因为后者习惯于“逆着镇子里上教堂去的人流”在波特家附近散步。“这可不行啊，斯宾塞，这可不行。”理查德·波特会这么唠叨他几句。[63]然而，二十多年以来，斯宾塞却吸引了整整一代乐于思索的男男女女竞相追逐他的足迹。在波及全欧洲的1848年大革命过后三年，他的《社会统计学》一书终于出版。该书为新经济和政治自由最终战胜了贵族特权而大声欢呼，它将限制政府干预和强调个人自由一举确立为中产阶层进步人士的忠实信条。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从斯宾塞那里吸取的进化论理论比从达尔文那得到的还要多。连卡尔·马克思都曾给斯宾塞寄来过一本有他亲笔签名的《资本论》第二版，因为如果能得到斯宾塞的认可，他的书一定能卖得更好一些。[64]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斯宾塞又一次在“逆潮流”而动。在他最新出版的《个人与国家》一书中，他针对不断增加的政府法规和税收进行了全面控诉：

> 层出不穷的专制措施在不断压缩个人自由的空间，并且从两方面达到了这一目的；政府新确立的法规每年都在增加，在某些以往不受限制的领域，公民们现在已开始受到限制；如今，公民们还被迫做一些以往他们可做可不做的事情；与此同时，公共负担，主要是当地的负担，也在日益加重，这更减低了公民的自由度，因为他能自由支配的那部分个人收入在逐渐减少，而（当作税收）被拿走的那部分怎么花只能由那些所谓的政府官员说了算。[65]

在普通读者眼里，他的自由主义纲要不过是陈旧、反动和不合时宜的学说在进行的垂死挣扎。正如杰特鲁德·希默尔法布所言，大多数维多利亚时代的思想家不但在努力摆脱或至少是置疑自由主义，他们当中甚至有许多人还为自己曾拥护过这种主义而后悔不迭。她举了阿诺德·汤音比的例子，这位牛津大学的经济历史学家就曾向他的工人听众们如此致歉："我是说，不仅仅只是那些最富有的人，包括我们这些中产阶层人士也都忽视了你们；我们只给了你们施舍，却没能给你们公道。"[66]

斯宾塞的这本书于1884年面世。此时，他与比特丽斯的关系格外密切。他们两人每天都会在一起呆上数小时。"我能够理解斯宾塞先生的逻辑推理方式，但我始终搞不懂张伯伦先生的狂热究竟从何而来。"她这样坦承道。[67]她将自己的一本有斯宾塞签名的《个人与国家》寄给了剑桥格顿学院[①]的女校长，从她随书寄去的信中便能看出，她仍是斯宾塞最狂热的信仰者。针对失业救济、公共教育、安全生产法规以及其他大规模的"政府干预"，她这样写道，"我反对这些规模巨大的试验……这些措施背后的理论破绽百出……它们是所有社会立场中危害最大的一种……它如同江湖郎中开出的拙劣的处方。"[68]

同时，她的心里又极其矛盾。张伯伦曾经逼她承认，"社会问题已经取代宗教成为了当今最为重要的问题。"[69]对此，她也曾表示认同。因此，让她在一夜之间便全盘接受这种新的"时代精神"虽然为时尚早，但她也没打算将它全盘抛弃，更不用说全盘抛弃它的那位器宇轩昂、强劲有力的鼓吹者了。[70]

张伯伦的妹妹邀请她去海贝里作客，海贝里是他们家在伯明翰新建豪宅的名字。比特丽斯收到信后便即刻启程。她想，这一定是她心上人出的主意。但当她到达以后，张伯伦一家不甚协调的品位让她大失所望。从"这座用红砖精心建造，配有无数凸窗的房子"的外表，她找不出任何值得赞许之处；屋里的陈设也都俗不可耐，"刻意用大理石雕成的拱门，铺的蜡光纸，悬挂的各式装饰品和水彩画……真是穷

① Girton College，剑桥1869年起为女性所设立的学院，开女子学院之先河。

奢极欲，金碧辉煌……面对这一切时，她浑身都禁不住颤栗发抖。没有书，没有艺术品，没有音乐，缎子面的家具上连罩子都没有，弄些罩子本无伤大雅，甚至可以用来缓和一下屋里逼人的富贵之气。”

在比特丽斯到达的头一天，一位叫约翰·布莱特的年长的自由党政治家款待了她；他同她回忆起她母亲的往事：四十年前，出于对劳伦西娜在反对谷物法斗争中展现出的政治勇气的仰慕，一群禁酒主义者和反谷物法的积极分子前往她位于海沃斯的家中拜访，而劳伦西娜则大方地以“年幼女主人”的身份接待了他们。看到这位老人对她母亲的政治智慧和热情所流露出的崇拜之情，再想起张伯伦不许他家里的妇女拥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她愈加感到他的专横。但张伯伦的自我中心主义仍然吸引着比特丽斯。那天晚上，在伯明翰市政大厅，她亲眼目睹他又一次诱导煽动着数以千计的听众，他主宰着整个会场。比特丽斯嘲笑地称那些支持者们“没受过教育”和“不动脑子”，他们为之痴迷的是张伯伦狂热的言辞而不是他的思想，即使如此，眼瞅着“全镇人在他的专横面前俯首称臣”，她承认，自己早晚也会向他屈服。在家里，张伯伦也会同样专断，甚至连她自己的感情也会出卖她。(“当感情越来越深的时候，它绝对会凌驾于理性之上，反正我若是结了婚便会是如此。”）虽然心里明白张伯伦会给她带来痛苦，但比特丽斯的心已经被他俘获。“他占据了我全部的思绪。”她在日记中如此写道。

次日，张伯伦带比特丽斯参观他新建的大型“果树温室”，而比特丽斯却声称，“她唯一喜欢的花是野花”。当张伯伦闻言流露出不悦的时候，她还故意装出非常惊讶的样子。那天夜里，她思前想后，觉得从他的表情和举止能看出，“他从内心里渴望我的思想和感觉能与他保持一致”，而且，“其他因素对我的影响让他妒火中烧”。她由此得出结论：他对她的“感情”也在与日俱增。[71]

1885 年 1 月，张伯伦发起了他职业生涯中最激进也是最辉煌的一场运动。他向他工人阶层的支持者们发出警告说，如果他们自己不组成一个政治团体，那么即使他们拥有了选举权，也不会给他们带来真正的民主。这番话引起了其他自由党人的震怒。他还在演讲中使用阶

级斗争的修辞手法来丑化保守党，他一句很有名的话是："我想问问，有谁会拿自己最心爱的东西当抵押品去赎另外一样东西呢？"[72]由于曾在伯明翰大胆实施"提高税率以维护城市健康"的举措，张伯伦开始利用他在内阁的有利地位来推动男性普选权、普通世俗教育和"三亩地一头牛"等议案。这最后一项是专门为那些不愿去矿山或工厂工作的农民制定的，因为他们不愿去挣工资，而宁愿在土地上从事个人生产。所有这些计划都要依靠提高土地、利润和遗产的税收来筹集资金。比特丽斯又一次亲自前往伯明翰，当他在台上夸夸其谈唇枪舌剑演讲的时候，她也在大厅里坐着。但结果是，她再一次受到了被拒绝的羞辱。他仍然没提出求婚。

比特丽斯固执而矛盾的感情继续在折磨她。她鄙视自己，不仅因为她迷恋上了一个刚愎自用的男人，而且因为她还未能将他征服。她曾经梦想拥有一种爱情和知识两不误的生活。她也曾有过为实现一个目标而放弃另一个目标的思想准备。但现在她却觉得，从一开始，她对自己潜力的种种估计就都是错的。"我现在非常清楚，我在智力上的唯一长处是善于作无望之想，我也没有什么个人使命"，而且，"我曾经爱过，却以失败而告终，也许我是成心把它搅黄的，也许这是为了自己的幸福；但毕竟是失败了。"[73]

在心情沮丧之际，她对自己竟然曾如此倾心于张伯伦这样的男人而惊讶不已，她也诧异自己曾经为了下面的这种可能而折磨过自己："如果一开始我就认准目标，如果我受到的是不同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又造就了我和我行事的风格，我也许会成为他的助手；那种生活不会幸福，但会非常显贵。"[74]8 月 1 日，她写下了自己的遗嘱，"我死之后，我希望我所有的日记，在我父亲读过之后（如果他愿意的话），都一并交给克里·唐宁（我的一位朋友）保管。比特丽斯·波特。"[75]

不管怎样，她毕竟承受住了这次打击。到了 1885 年 11 月初大选开始之际，她不再一心想着要自杀，她觉得身体里又重新有了一丝生机在勃动。她目送着父亲出发去投票，突然，成为一名社会调查者的理想又在她的心中苏醒了过来。而这时，命运给了她又一个沉重打击，并几乎导致了"突然和悲剧性的后果"。[76]理查德·波特突然瘫痪发作，

被人从投票站送回了斯坦迪什，但他并未因此送命。

与往常一样，比特丽斯将心中的绝望通通写进了日记。“与一个失去知觉的人作伴——一个没有行动也没有思维的生命——这根本不是工作。天哪，太可怕了。”[77] 元旦那天，她又写了一份遗嘱，她请求读到遗嘱的人在她死后将她的日记销毁。“如果死亡要来临，我会欢迎它。”她苦涩地写道，“一个未婚的女儿在家中的处境是非常不幸的，即使对坚强的女人也不例外。而如果她是个脆弱的女人，那根本就不可能。”[78]

如今看来，她从前对生活的那些梦想，她的使命感，她对爱情的憧憬，纯粹是在自恋自大。“我的内心永远也无法得到安宁。”她在1886年2月写道，“我过去全部的生活似乎只不过是一场难以弥补的错误，尤其最后的这两年简直就是一场噩梦……痛苦何时是个头啊？”[79]

几天之后，答案终于出现了。从社会的最深处发出了雷鸣般的呐喊。截止到2月8日中午时分，至少有一万名群众冲破大雾和严寒的阻挠，勇敢地聚集在特拉法加广场上。大约两千五百名警察将广场团团围住，据警方估计，三分之二的示威者是失业工人，其他人则是来自社会各阶层的激进分子。上午早些时候，一名社会党的演说者被警察从纳尔逊元帅的雕像底下赶开，此刻他又重新爬了上去。而这次当局对他却不闻不问。他使劲挥舞着红旗，在他的鼓舞下，人群中爆发出一阵阵对“造成了英国现在的苦难的那些人”的谴责之声。[80] 那名演说者代表所有听众要求国会以兴建公共工程的方式为“数以万计的工人提供他们应有的工作机会，因为他们的失业并不是个人过失造成的”。[81] 观众们欢呼了起来。整个下午，人数一直在继续膨胀，到最后人数增加了五倍。

集会和平结束。但之后，示威者们却开始涌入伦敦西区的主要街道——牛津大道、圣詹姆斯大道和帕尔摩。他们“一边咒骂着政府当局，一边攻击店铺，抢掠酒吧，一个个喝得酩酊大醉，还损毁了无数窗户”。警方不但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而且在人数上也寡不敌众。在长达三个多小时的时间里，这伙“猖狂嗥叫着的暴徒”成为了西区的主

宰。数以百计的店铺被抢，所有长相看似外国人的人都遭到了殴打，连利墨瑞克勋爵也在他俱乐部的门前被人摁在栏杆上无法动弹。在海德公园，无数马车被掀翻在地抢掠一空。整个伦敦市中心的街道交通为之阻塞，查令十字车站完全陷入瘫痪。入夜之时，圣詹姆斯和皮卡迪利大街四周遍地都是打碎的玻璃，中间偶尔还夹杂着少许珠宝、靴子、衣物和其他物什。[82]

这场暴乱令伦敦西区的富人们谈虎色变。虽然事件中没人丧命，而且只有十几个抢劫犯被抓，但大多数店铺还是听从了警方的建议，在星期二停业一天。《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对警方在此次事件中的措手不及给予了嘲讽——他说，到星期三警方才准备就绪，如果此时再发生暴乱，他们一定能加以制止。而这要是换了波士顿或纽约的警察，星期一下午他们就已经做好了准备。但他同时也对警方略表了同情，因为这是自 1780 年臭名昭著的反天主教暴乱以来伦敦发生的最严重的骚乱。[83] 伦敦居民们无不认为，自从五十年前首项改革法案通过及维多利亚女王登位以来，如此大规模的公然抢劫在伦敦还是首见。[84] 稍后，女王也谴责这次动乱为“暴行”。[85]

女王还评论说，这次暴乱是“社会主义的一次短暂胜利”。很显然她的是错的。[86] 但这段插曲确实激发了民众的积极性，他们纷纷要求政府采取措施。出于对自身安全的担心和良心发现这双重动机，伦敦市民向市长的失业救济基金捐款多达七万九千英镑，他们还要求将这些钱分发到个人。比特丽斯的表妹，玛格丽特·哈克尼斯在开始酝酿一部新的小说，名字就叫《失去工作》[87]。而约瑟夫·张伯伦，现在已是威廉·格莱斯顿首相新内阁的成员，他提出的一项伦敦东区的公共工程计划在社会上引起了激烈争论。比特丽斯此时正隐居在波特家在乡村的别墅中，她不仅要悉心照顾她父亲，照看一个烦人的妹妹，而且还要打点他父亲头绪繁多的生意。她早已从忧郁中振作了起来。她给自由派《帕尔摩报》的主编寄去一封信，在信中她就这场危机的起因和解决办法向社会上的主流观点提出了挑战。

比特丽斯作了被人婉言拒绝的心理准备。很快她便收到了报纸主编的回信——这也太快了，她想，除了被拒绝肯定不会是别的什么结

果。她将信打开，却发现里面是一份授权请求，他们想以“一位女士对失业者的看法”为题将她的文章发表。比特丽斯兴奋得禁不住叫出声来；她“获取公众注意”的首次尝试成功了。[88]这证明她的思想和言论值得人们去倾听。她毫不怀疑，这是她一生的转折点。[89]

暴乱过后第九天，比特丽斯满心欢喜地读着自己在报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我是一名租金收缴员，我主要在伦敦码头附近同大片的工人宿舍区打交道。那些宿舍是为最底层的贫困工薪阶层设计和改造而成的。”她想努力强调的不外乎两点：首先，她认为伦敦东区是一个“零工机会众多和慈善救济极为公平”的地方，它的失业是由于劳动力市场功能失调而且失去平衡所造成的，而不是像大多数慈善家和政客们所声称的那样，是“全国性行业萧条带来的后果”。在伦敦的传统产业，包括造船和制造业，纷纷外移的同时，大量农场工和外国移民却因为受到有关高工资的不实报道的蒙蔽，仍源源不断地向伦敦涌来。这才会导致以乞讨为生的人数达到创纪录的高水平。第二点又与第一点紧密相关：由于大肆对外宣传公共工程计划，不可避免地会吸引来更多的非技术的新人，从而使早已人满为患的劳动力市场变得更加拥挤。由于它使失业工人的队伍变得更加庞大，它也因此压低了有工作的那些人的工资水平。[90]

文章见报后一个星期，她读到了一封来信，这封信让她顿时心跳加速，双手颤抖。在信中，张伯伦对她的文章作了一番恭维，并向她征求建议。身为地区政府委员会主席的他现在负责贫困救济的工作。她要不要同他会面，并同他讨论如何修改他的计划以免遭失败呢？[91]她自尊心曾经受到的伤害仍然隐隐作痛，她更怕受到新的羞辱。比特丽斯拒绝了张伯伦的会面请求，她给他寄去了一份对他计划的详细评论。而张伯伦以其一贯的“赎金说”作为他的答复。他指出，“富人们必须付出，以保证穷人能活下去。”[92]从他雇佣过数千工人的经历当中，他得出了这样的认识：在目前贫困不断扩散的情况下，政府绝不能再袖手旁观。无论哪个政党执政，政府的政策都在逐渐改变；在财富增长的同时，大多数穷人的政治力量也在日益高涨。道德和政治上的双重压力让采取这些行动势在必行，这种压力是前所未有的。一旦

有办法使这些压力得到缓解——更重要的是，一旦选民们知道这样的办法确实存在——继续不作为是根本行不通的。在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时代，因为英国国力尚弱，农业所占的比重仍然很大，放任主义在那时尚能占据道义上的制高点；但时至今日，任何人若依然遵照《个人与国家》中宣扬的教条行事，都将是不道德的，这种做法甚至无异于一场政治自杀。他写道，“我的各个部门对穷人都非常了解……但我同时也坚信，那些辛勤劳动的非贫民阶层的人们也在同样遭受着深切的苦难……我们为他们又能做些什么呢？”[93]

但比特丽斯不为所动。“我看不出为什么非要采取什么措施。”她依然坚持自己的立场。她没有针对他的计划提出修改意见，相反，她建议他恪守无为，静观其变。“我唯一能给你的建议就是政府应该严厉，而个人则应充满爱心和奉献精神。”她写道。她还忍不住半带嘲讽半带挑逗地添了这么一段：

> 让一位普通妇女来评论英皇陛下最能干的部长所作出的建议，这本身就是荒谬可笑的……而且我知道，即使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女人，他也会对她的智力嗤之以鼻……他从不会欣赏任何独立的见解……[94]

对她提出的蔑视女性的指责，张伯伦替自己进行了辩护。他并不否认她的某些反对意见颇为中肯。但对她文章中所隐含的态度，他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排斥立场：

> 在最主要的问题上，你的信是令人悲观的。我也担心局势真的会变成你说的那样。但我会一如既往地努力，就当它根本不是真的。因为一旦我们接受社会的丑恶现象根本无法治愈这种观点，我们便将堕落到禽兽不如的境地。而这样的物种是绝对的纯粹的自私自利的最好代名词。[95]

张伯伦没有食言。他没有采纳比特丽斯的建议，而是开始着手进

行这场斯宾塞极力反对的“大型试验”。张伯伦所推行的公共工程其实规模一般，而且只持续了数月，但有些历史学家将该试验视为一个卓越的创举。[96] 因为，政府破天荒地将失业视为一种社会灾难而非个人失败，并且承担起了帮助受害者的责任。

当张伯伦表示对他们之间这种借助于书信的争论已经厌烦时，比特丽斯立刻怒气冲冲地给他回了封信，在信中，她承认曾经爱过他，但现在却追悔莫及。“在他面前，我曾经卑躬屈膝到了一个女人所能忍受的极限。”她对自己这么说。[97] 医生曾叮嘱她在今年伦敦的社交季节期间带上她父亲去伦敦，这个建议也挽救了她的生命。就这样，她没有缩回到她忧郁症的躯壳中去，也没有求助于鸦片酊之类的止痛剂，她将他们的家搬到了位于肯辛顿的约克府。1886 年 4 月底，比特丽斯与身为慈善家的表兄查理· 布斯一起，开始了一项英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宏大的社会研究计划。

比特丽斯的表兄已臻不惑之年，他身形高挑而笨拙，“肤色如肺结核女患者一般苍白”，他温和的举止极具欺骗性。[98] 不知底细的人还以为查理· 布斯是一位音乐家、教授或是牧师——和所有别的可能，但唯独想不到他的真实身份。他其实是一家跨大西洋船运公司的总裁。日间，他忙于打理股票价格、南美洲的新港口和船运表；而入夜以后，他却转而投入到他最钟爱的慈善业和社会科学之中；他的夫人玛利，是历史学家托马斯· 巴宾顿· 麦考莱的侄女。他们夫妇俩行为低调而活跃，对知识有强烈的好奇心。像波特家族和海沃斯家族一样，他们俩在政治上也属于自由派，都属于“大英博物馆”前的人群中那些记者、工会领袖、政治经济学家和各式各样的活跃分子中的一员。虽然比特丽斯有时对布斯两口子简约的持家之道以及他们家来往宾客的怪异举止不以为然，但她还是在他们这幢杂乱无章的别墅中住了尽可能长的一段时间。

和其他关心公益的企业家一样，布斯一直以来都是当地统计社团的积极分子。他依然秉持着维多利亚时代的信念，那就是，良好的数据是制定有效的社会措施的先决条件。在张伯伦任伯明翰市长期间，

他曾应张伯伦的请求搞过一个调查，他们二人也从此成了好友。他的调查结果显示，伯明翰有四分之一强的学龄儿童既没有呆在家中，也没去上学。以此为开端，一连串的立法行动接踵而至。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存在于物质极端丰富之中的贫困”这一现象又一次成为当代社会最为人诟病之处。面对自己明显无力应付的困难，面对五花八门互相矛盾的诊断和改革方案，那些拥有良好动机的人们都生出了“无助的感觉”，而这使布斯深受震动。他认为，问题在于政治经济学家们拥有理论，而实干家们拥有经验，但却没有任意一方能就目前的问题作一个完整而不带成见的描述，那就好比是让他在没有地图帮助的情况下重新制定去南美洲的船运路线。

去年春，某些社会党人宣称，“伦敦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口属于贫民”。布斯听到这些言论后怒不可遏。他怀疑该数字被过分夸大，但他却无法证实自己的猜测。为此事他一直耿耿于怀，并想要诉诸行动。他决心要调查每一间房屋和车间，每一条街道，每一个行业。对四百五十万伦敦居民中每一个人的收入、职业和生活状况他都想要了然于胸。他打算自己出资来绘出一张反映伦敦贫穷状况的指掌图。

与比特丽斯的偶像亨利·梅休不同的是，布斯拥有执行这一庞大计划所需的远见卓识、管理经验和技术素养。在征求过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和塞缪尔·巴奈特等朋友的意见之后，（马歇尔此时正在牛津任教，巴奈特则在汤恩比馆[①]的教育中心），他迈出的第一步是组建一个调查团队。比特丽斯接受了他的邀请，并出席了在他伦敦分公司召开的统计研究理事会的第一次会议。当然，她是与会的唯一一名女士。布斯在会上解释说，他的目标是“真实地描绘出伦敦的社会整体”。他向与会者展示了一份“详细具体的计划”，中间甚至谈到了诸如任用玩忽职守的政府官员为采访员，利用人口普查的资料和慈善活动的记录来核对调查结果等事项。[99]他打算从伦敦东区开始入手。伦敦的四百万居民中有一百万在那里居住：

① Toynbee Hall，著名的睦邻组织，于1884年在伦敦建立。

> 在这个问题上我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唯一的原因便是，伦敦的这片地区据说是英国穷困人口最多的地方；这个地区一直以来就是，将来也仍会是“贫困存在于物质的极端丰富中”这一万人瞩目的社会问题的焦点。[100]

布斯一手启动了这个规模庞大的项目，这给比特丽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想象着自己将来也能成为这样一名先驱者。她觉得，“如果不是时间不允许”，这正是“她想悉心从事的事业”。[101] 她决定以她的表兄为师，也就是说，在照料家庭之余，尽可能地投入到该项目中去，并且尽量汲取相关的知识。她的任务不是收集统计数据，相反，她被派去车间和家庭进行参观和考察，并对工人们进行采访——而这些都是从闻名遐迩的伦敦码头工人开始的。

波特一家回到他们在乡村的别墅后，比特丽斯利用这段被迫的隐居时间来弥补自己在教育上的缺陷。对她来说，通过亲身观察和采访来获取统计数据是最为重要的，然而她也意识到，若没有在理论指导下的去芜存菁，想完成出色的考察是不可能的。梅休之所以未能提出一个能经受时间考验的见解，原因就在于没有将他收集到的材料区别对待。她急于为该考察构建一个框架，因此希望学一点经济学，她尤其想了解经济学各思想流派的渊源，因为“进入工业化社会以来，每项新的进步都曾与当时先行者们的某些无心言论不谋而合……”[102]

刚断断续续读了一两天，比特丽斯便抱怨道“政治经济学真是枯燥得可恨”[103]；然而，又过了不到两个星期，她却开始骄傲地宣称，她已“弄明白了经济科学中最难的那一部分”[104]。她已将穆勒的《逻辑体系》和福西特的《政治经济学手册》读完，或者至少是浏览了一遍，她自信已掌握了斯密，李嘉图和马歇尔等人的理论精髓。8月初，她写的一篇评论英国政治经济学的文章已进入了最后的扫尾阶段。后来，那年秋天，她终于读完了马克思的著作，她认为，除了马克思，其他政治经济学的领军人物们都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他们都将假设当成了事实，她还批评他们根本没花工夫去收集与人们的真实行为相关的资料和数据。她将这篇评论寄给了表兄查理，希望能通过他的帮

助将文章发表。但令她懊恼的是，布斯在回信中劝她将这篇文章先放一放，过一两年再写。

一年过去以后，她完成了对码头工人的考察。布斯带她一同参加了在曼彻斯特举办的一个前拉斐尔派的艺术展。比特丽斯被那些绘画深深地打动，她决心要将自己的下一个考察——缝纫行业的血汗工厂——也绘制得如同“绘画”一般。她想，如果要使她的报告“戏剧化”，那就得采取秘密行动。“如果不深入到真正的工人当中去，我将无法了解到真实情况。这件事我想我还应付得来。”[105]

乔装成女工的准备工作花费了她数月的时间。整个夏天她都呆在斯坦迪什，“她将所有能找到的有关血汗工厂的书籍，政府报告，宣传册以及期刊杂志统统买来或借来，然后便一头扎了进去”[106]；入秋以后，她住进了伦敦东区的一家小旅馆，并在那里住了六个星期。在那段时间里，每天她都花八到十二个小时在缝纫实习车间学习缝纫技术；晚上，如果她没有累得筋疲力尽瘫在床上的话，她会偷偷溜到时尚的西区去参加晚宴和聚会。

1888 年 4 月，她的秘密调查行动已全部准备就绪。她搬入位于东区的一间破旧住所。次日清晨，她套上一件破衣裳，徒步走出门去，“正式开始了她的女工生涯”。不出数小时，她便头一次尝到了找工作的滋味。

她承认，那让她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觉。她在日记中写道，“除了招聘‘优秀缝纫女工’，没有别的招工告示。因为我觉得自己并非货真价实，所以便不敢进到里面去申请。我漫无目的地在那儿游荡，心情与脚步同样沉重，我的腿和背逐渐酸痛起来，我体会到了‘失去工作’的感受。最后，我决心鼓起勇气去试一试。”[107]

“你看上去不像能干活的样子。”这样的回答她不知听到了多少遍。但最终，在二十四小时之后，尽管她非常担心别人会识破她的伪装，尽管她笨拙地模仿省略掉“h”音的腔调[①]，她毕竟在一张大桌子旁坐

① 这种发音方式多流行在底层民众当中。

了下来，开始笨手笨脚地缝制长裤。她感觉自己的手指正变得肿胀如同肉肠一般。多亏有好心工友们的帮忙：其中的一位虽然她也是按件数算工钱，但她还是花时间传授了比特丽斯一些窍门；另外，“工头”也派一个女孩去帮她买来了配料，这个本应该由工人自己预备。

“女人在生活中的所有关系中都应该是被追求的一方”，一位以此为座右铭的妇女将它改编成了一首女工之歌：

当女人喜欢上男人，为什么她不能向他求婚？
女人，为什么你总被牵着鼻子，听命于男人？[108]

当煤气被点燃，热气顿时让车间里变得暖和起来。比特丽斯的手指已经发酸，背也开始作痛。这时，刺耳的声音突然传来，“按酿酒厂大钟上的时间，现在到八点了”。

这一整天她挣到了一个先令，这也是她挣到的第一笔钱。“一先令一天，这便是一个非技术女劳动力的价位。”回到住处以后，她在日记中作了如此的记载。

次日早上八点半，她又回到了麦恩大街一百九十八号。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她就只管在裤子上缝扣眼；在那之后，她离开了那个车间和在那里工作的人们；“对他们而言，这是日复一日周而复始的生活方式，而对我它不过是一个回忆”。[109]

比特丽斯的事迹渐渐传播开来。5月，上议院的一个委员会对血汗工厂展开了调查，他们邀请比特丽斯前去作证。《帕尔摩公报》对此次听证会作了追踪报道，对她的表现不乏溢美之辞，“她高挑，灵活，黝黑，眼光炯炯有神”，而且“她在证人席上举止泰然自若”。[110]在听证会上，比特丽斯年幼时喜欢夸大其词的毛病又犯了，她声称自己在血汗工厂干了三个星期，而实际上她只呆了三天。由于担心谎言露馅，在此后的几个星期里她都一直忐忑不安。但10月中旬，当“一位女工的日记片断”一文在《十九世纪》这份自由派期刊上发表时，成功的滋味对她来说是如此甜美。“公众更多的是被该行动的独创性所打动，

而非该文章的表述方式。”[111] 尽管如此，当她获悉牛津大学邀请她前去讲述她的文章时，她简直无法按捺自己的喜悦之情。（“现在我已知道，如果我想说什么，我不但能说得出来，而且还能说得很棒。”[112]）临近新年之际，虽然她因感冒卧床不起，但报纸上每天仍然充斥着比特丽斯的名字，“有人甚至杜撰了一份对她的专访，并将之电传至了美洲和澳大利亚。”[113]

比特丽斯意气风发地开始着手进行一项完全属于她自己的项目。自从以“琼斯女士”的身份去巴卡普采访完手织工匠，她就一直想写一本有关合作社运动的书。这时，她从《帕尔摩公报》上惊讶地得知，约瑟夫·张伯伦其实早已与一位二十五岁的美国贵族秘密订婚，“她倒吸了一口气，仿佛被人捅了一刀，但从那之后，她便没事了。”[114] 这些没能阻止她开始再次苦读政府发布的蓝皮报告书。而她的表兄布斯则竭力劝她写一篇有关妇女工作的论文。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也同样在劝她。她第一次见到马歇尔是在牛津大学，当时他曾邀请她与他和玛丽一起共进午餐。马歇尔说，他非常欣赏她的《日记》；她趁此机会问他对她的新计划怎么看。他出人意料地对她说，“如果你专心致志地去研究你所属的性别在工业化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你的名字将在两百年内变得家喻户晓；但如果你去写合作社的历史，用不了几年它便会被代替，会被人遗忘。”[115]

比特丽斯并未打算听从这一建议。相较而言，她更喜欢同男人交往，而不是与其他女人在一起；而且她怀疑，马歇尔是不是担心她尚不具备在他最喜爱的领域里进行写作的能力。而这时，她突然心血来潮同其他社会上有名的妇女人士一道，签署了反对授予妇女选举权的请愿书。于是，马歇尔的建议也就不了了之。“当时我是公认的反女权主义者。”她后来如此解释道。[116]

其实在很多事情上比特丽斯的主意都在变来变去。尽管在张伯伦面前她曾极力维护放任主义哲学，但她对她父母和斯宾塞所持的自由主义信仰也逐渐产生了怀疑。她同这位年迈的哲学家仍然经常见面，但由于他们之间的争论愈来愈激烈，他们俩关于政治的交谈便日益减

少。总之，她同表兄查理在一起的时间倒是越来越多了。

1889 年 4 月，布斯将《伦敦东区人民的劳动和生活》第一卷成功交付出版。《泰晤士报》的评论说，“它撩起了遮在伦敦东区前面挡人视线的帘子”，它还对由比特丽斯执笔的有关码头工人的那个章节着意褒扬了一番[117]。同年 6 月，比特丽斯参加了合作社运动的代表大会。她从此开始坚信，“如果工人来之不易的工资和工时协议有望付诸实施的话，那么除了消费者的民主权利，我们还应该将工人们的民主权利补还给他们。”[118]1889 年 8 月，伦敦码头工人的大罢工爆发了。开始，人们普遍认为工人们将各自为战，急于谋求妥协。但出人意料的是，罢工最终戏剧性地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这件事使她深受震动。“伦敦正陷入动荡之中：罢工是当今最重要的议题，新的行业工会已成功占领了码头，他们正大步向前迈进。”比特丽斯在日记中如此写道。

> “在少数几个能干的年轻人（费边社）[①] 的带领下，社会党人正将伦敦的激进派玩弄于股掌之间；只需行业工会稍作威胁，激进派便会立刻赞同呼吁政府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由于我独特的社会地位，我应当做到不偏不倚，我同情所有相关各方，但我与任何一方都没有瓜葛。”[119]

比特丽斯未能亲眼目睹这些混乱不堪的场面，因为此时她正在某个遥远的乡下旅店中陪伴着她处于半昏迷状态中的父亲，“她被与世界上所有的思想和所有人的举动都隔绝开来了。”她也试过接着写她的书，但她却没有信心能将书全部写完。“苦于应付她的课题让她烦透了。我能胜任纯脑力的工作吗？女人究竟能否胜任纯知识性的生活方式呢？……我的生活环境简直太压抑了——父亲像只狗似地躺在床上，像个小孩，像只动物，他此刻的思维能力尚不如我养的宠物唐。”[120]

照顾父亲的责任使她无法继续自己的事业，这让她非常沮丧。她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对工人阶级的压迫给妇女们带来的痛苦。她同她

① Fabian Society，1884 年创立，该社成员认为社会改革应循序渐进。

的姐姐们依然保持着密切联系，她常常想起她们下嫁的那些“为人尊敬的成功人士”，还有他们居住的豪宅：

> “然后，……我又来到伦敦的东区，在那些瘦弱病残和四处流浪的人群中择路而行。或是来到一家工人辩论协会，聆听那些生来被命运捆绑在简单手工劳动上的智者们发出的振聋发聩的呼喊，他们在大声疾呼，希望能拥有一份与其能力相得益彰的职业。这就是十九世纪男女工人的共同心声。”[121]

上一年秋天，父亲曾对她说，“我希望我的小‘比’能嫁给一个善良而强健的男人，”她在日记中写道，“但我不能，也永远不会做出婚姻所要求的巨大牺牲。”[122]

在遇到西德尼·韦伯本人之前，比特丽斯其实在数月之前便已听说过他。她读过一本费边社出版的论文集。费边社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社会主义团体，他们的理念是希望像古罗马赢得了迦太基战争的费比奥斯将军一样，靠循序渐进的游击战术而非正面交锋来夺取权力。她对一位朋友说，“迄今为止，最有意义也是最让人感兴趣的论文就是西德尼·韦伯写的那篇。”[123]西德尼在阅罢布斯的调查报告首卷之后，也投桃报李地评论道：“在此书的所有作者当中，比特丽斯·波特女士是唯一有文学天赋的一位。”[124]

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布鲁姆伯利，在玛格丽特·哈克尼斯的住所。比特丽斯此前曾问过她表妹，是否认识了解合作社的人，而玛格丽特立刻想起了一位费边社的成员，他对此话题似乎无所不知。而对西德尼而言，虽然那天他是一见钟情，但离开的时候他更多的却是失望，而非欣喜。“她太美丽，太富有，也太聪明了。”[125]他对一位朋友说。后来，他安慰自己道，毕竟他们还属于同一社会阶层——直到有一天比特丽斯纠正了他的这个想法。没错，蓝领阶层的人反而更能让她心情舒畅。她喜欢和工会的积极分子和支持者们一起在他们拥挤的公寓里聊天吸烟。与她正好相反的是，某些“从工人阶层中脱颖而出

的”人却变得自以为是起来，他们在出席伦敦的某些聚会时，“直言不讳地谈及自己的背景来历，丝毫不顾及他人的感受”[126]，而这些都触犯了比特丽斯内心深处的孤傲。比特丽斯觉得西德尼外表看上去像一个伦敦老千和德国教授的混合体，而他“资产阶级闪亮的黑大衣”和他省略掉“h”的发音方式也免不了被她揶揄一番。但她发现，“这个身材短小，头大无比的奇怪的小个子”身上有些东西在莫名其妙地吸引她。[127]

正如他的“大头”所暗示的，西德尼的确是一个勤于思考之人。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一样，他也成长于伦敦的一个中下阶层家庭，之后赶上了白领阶层地位提高的浪潮而得以脱颖而出。他比比特丽斯晚出生三年。从小在他父母开在莱切斯特广场附近的发廊里泡大。他父亲在开发廊的同时还兼做临时会计，他是一个激进的民主派，并曾经支持过约翰·穆勒参加国会竞选的活动。西德尼的母亲在家中一言九鼎，她早就下决心要将西德尼和他的哥哥培养成拥有高尚职业之人。凭其过人的记忆力、数学头脑和天生应付考试的能力，西德尼在学校时一直名列前茅，十六岁时便被一家股票经纪商雇用。据传作家罗伊登·哈里逊记载，在那之后他仍不断地获得奖学金和其他学位，其中包括伦敦大学的法律学位。到特拉法加广场发生暴乱和托利党竞选胜利的时候，西德尼已在费边社寻找到了自己的使命，并成为了该社的主要智囊。

费边主义是一只怪鸟。西德尼主张，“应在一切可行的领域内实行集体所有制，而在其他领域则应实行共同法规；对贫穷弱势个体的需求应给予集体拨款，而对财富，尤其是过剩的财富，应当实行集体税收制度。”然而，费边社会主义主要是在地方政府和小规模项目中发挥作用，例如奶农合作社和政府开设的当铺。同时，费边主义的策略也有别于其他绝大多数社会主义组织。他们希望能绕开政治竞选和革命而另辟蹊径。“通过向人们灌输集体主义理想和宗旨来培养社会力量和影响”，从而最终达到引入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128]

1887年西德尼入选费边社筹委会的时候，该社有六十七位成员，年收入为三十二英镑。费边社当时还被誉为漂亮女人邂逅成功男士

（反之亦然）的最佳场所。英国历史学家 G.M. 特里威廉形容费边社为“一群没有士兵的情报官员”。他们并不想成为国会的一个政党，相反，他们希望能发挥他们自己的影响，从而使政府政策沿着其他政党领袖所指引的方向前进[129]。西德尼曾总结道，“在英国，有那么一个人数不到两千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非常讲究实际，任何事情若得不到他们的认同都无法通过”，他还说，政治竞选是有钱人的游戏，他将费边社利用体制进行过滤的策略称作“渗透”。[130]

西德尼的挚友兼搭档萧伯纳是个风趣机灵的爱尔兰人，他在撰写舞台剧评论的同时，也是费边社的主要政论家。时至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先前在都柏林担任过房租收缴员后来在伦敦又当过股票经纪商的他认为，所有社会问题都有其经济根源。于是，他决心将十九世纪的后半段时间用来“掌握”经济学。他和西德尼都在想方设法探究他们的真实信仰，并决定将他们的精力投入到该一领域。他们经常出席由伦敦城市学院的数名职业经济学家组织的小型会议。这些研究使得他们对乌托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共产主义都同样持排斥态度。虽然他们将自己的目标也称为社会主义，但它却是一个含有贫困、议会和资本家，却没有马克思或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他们希望驯服和控制自由企业制度这头怪兽，而不是置其于死地；他们希望向富人们征税，而不是将其彻底消灭。[131]

与西德尼初次见面后没过几个星期，比特丽斯开始觉得“个人自由和财产公有并存的社会主义社会”也许是可行的，而且会非常有吸引力。“我终于也成为了一名社会主义者。”她如此宣称。[132] 自由党国会议员威廉·哈考特在 1888 年的预算辩论中曾经宣称，“我们现在都已经成了社会主义者。”[133] 比特丽斯似乎也受到了当时这种风气的影响。至于西德尼，她已将他视为“我迟早会与他休戚与共的小个子男人”。[134]

一开始，比特丽斯将西德尼对她的迷恋视为理所当然，她也任由自己在知识上对他越来越依赖。但当他向她敞开爱的心扉，请求她嫁给他时，她却以“别将工作和爱情掺和在一起”的套话来回应他。她

一直坚持要当他的合作者，而不是他的妻子，她告诉他不要再有任何“非分之想”。[135]

1891年，比特丽斯为了参加社交季节又回到伦敦。她一边紧张地等待着她有关合作社的新书能早日出版，一边又在为她已经应承别人的一系列讲座而发愁。西德尼已经宣布，他将辞去公务员的工作，因为在工作之外，他几乎没有别的生活。他觉得“自己仿佛是伦敦街头拉车的马，因为担心摔倒，便始终都不能摆脱辕驾的禁锢”。[136]他还再一次提出了被比特丽斯禁止的话题。他允诺，如果她不再拒绝，他可以同意她婚后仍然可以过她想过的生活：常到户外去，生活有节制，努力工作，有极其繁忙的社会活动。并且，他还建议他们俩合写一本关于行业工会的书。在对西德尼说了整整一年的“我不爱你”之后，比特丽斯这回终于说道“那好吧。”[137]

西德尼给比特丽斯寄去一张自己的全身照，比特丽斯收到后恳求他说，“给我寄张有头的就行了——我是因为你的头脑才嫁给你的……这张照片用来做什么都嫌太丑了。”[138]她没敢通知她的家人和朋友。“整个世界都会觉得惊讶的。”比特丽斯在日记中写道。

> “从表面上看，比特丽斯·波特光彩照人的历史就这样不寻常地结束了……她嫁给了一个又丑又矮的男人，他既无社会地位，又无财富金钱。也许有人会说他的唯一可取之处是还算有些推销的本事。还有人说我‘并不爱他’，至少不是我以前曾经有过的那种爱法。但我在他身上发现了一些特别之处……超人的智慧和善良温暖的心地，还有为社会的共同利益而自我克制和奉献的精神。”[139]

比特丽斯坚决要求，只要父亲仍然在世，他们订婚一事就得秘而不宣，当然她的姐姐和少数几个密友除外。布斯夫妇的反应颇为得体，而斯宾塞闻讯之后则立刻不再用她做他的遗稿保管人，而这曾是让比特丽斯极为自豪的角色。

1892年元旦那天，理查德·波特离开了人世。这时离比特丽斯三十四岁生日只有数天之隔。他为他最心爱的女儿留下了每年

一千五百零六英镑的收入外加“一份极为奢侈无需继续照顾任何人的自由”[140]。葬礼过后，比特丽斯在未来的婆婆家附近住了一个星期，婆婆家“位于离摄政公园不远的公园镇，四周的一切都又丑又矮。”1892 年 7 月 23 日，比特丽斯和西德尼在伦敦的一个注册办公室正式结婚。比特丽斯在日记中也记录了此事：“比特丽斯·波特已经退场。比特丽斯· 韦伯上场了，或者应该说是西德尼·韦伯夫人，哎呀，要是那样的话，我自己的姓和名就全没了。”[141]

一年多以后，在 1893 年夏末，萧伯纳首次造访了这对新人，并在那里逗留了较长一段时间。比特丽斯对他的评价是自负、轻浮和天生的调情高手，但他又“极为健谈”，“喜欢挑逗，因此也是个令人开心的伙伴”。西德尼是费边社的“组织者”，而萧伯纳则被她认为是该社的“色香味”。[142]

在前一年 12 月，萧伯纳的第一个剧本《鳏夫的房产》已于皇家剧院上演，而现在他正着手如法炮制另一个新的剧本：从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中选取一个“令人生厌的人物作为对象”，这次他先选了一个为人诟病的职业，然后再将其当作这个社会的化身来写。[143]

在过去的整整一年中，报纸上充斥着对欧洲大陆上合法妓院的报道。那是上流社会的男人们出入和谈生意的地方。很多英国女孩都被诱骗进去，在里面沦为性奴。和平时一样，萧伯纳将社会问题改头换面，使之变成了一个经济问题。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经济学研究之于我的剧本，就如解剖学于米开朗基罗一样重要。”[144]他剧本中的人物，沃伦夫人，在维也纳经营着一家高级妓院，她是个极善察言观色的商人，她清楚卖淫业的本质并非性，而是金钱。在《鳏夫的房产》中，他想让观众看清，那个恶劣的房东并非仅仅是条恶棍，他也是人人都牵连在其中的这个社会的一个征兆。而现在，他希望人们能够认识到，在一个将妇女逼得除了卖淫别无出路的社会里，所有的人都应当受到谴责。“将沃伦夫人从事的职业的罪恶全都归罪到沃伦夫人一人的头上，这对那些道貌岸然的英国公众来说是再满意不过了。”萧伯纳在序言中写道，“而现在我的目标就是要把这些罪恶归结到英国公

众自己的身上去。”[145]

比特丽斯给萧伯纳提了个建议，她让他“在舞台上展现一个真实的属于统治阶层的现代妇女”，而不是千篇一律的高级妓女的形象。[146]于是，维维·沃伦这一角色便应运而生。她是该剧的女主角，是沃伦夫人的女儿，她在剑桥受过教育。和比特丽斯一样，维维“美丽动人……通情达理……为人沉着冷静”。和比特丽斯一样，维维也从她所属的阶级和性别的宿命中挣扎了出来。此剧的剧情萧伯纳是从莫泊桑的小说《伊韦特》中借鉴而来的。在那篇小说中，出身决定人的命运。“除此而外，没有别的办法。”欧巴迪夫人，小说女主人公伊韦特的当妓女的母亲曾这样对伊韦特说。但在维维·沃伦所生活的维多利亚末期的英国，却已经有了别的办法。当维维发现了沃伦夫人的真实职业，得知沃伦夫人资助自己在剑桥受教育的资金的真正来源时，她纯真的心灵被击得粉碎。但她并没有因此而自杀，也没有走她母亲的老路，维维开始学习……会计。“我干的工作和你的不一样，我走的路也和你的不同。”她对她母亲说。和比特丽斯一样，她作出了自己的选择，从而让历史不致在她身上重演。在《沃伦夫人的职业》一剧的最后一幕中，维维独自出现在舞台上，她坐在写字台后面，埋头于一大堆“保险统计运算”之中。

而此时，现实生活中的维维正和她丈夫一起，住在一幢有十个房间的宅第之中。该住所的位置离国会只有一箭之地。几乎每天上午，她都会与西德尼和萧伯纳一起在国会图书馆里碰头。他们三个在一起，一边喝咖啡抽烟聊天，一边修改她和西德尼共同撰写的有关行业工会的著述。

著名科幻小说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一度将费边社的这个三人组合扩充成了一个四人重奏。但后来因他与韦伯夫妇不合而不欢而散。在他 1910 年出版的小说《新马基雅弗利[①]》中，他将他们夫妇俩大大讽刺了一番。小说中的阿尔提奥拉和奥斯卡·贝里是伦敦极有势力的

① Machiavelli，意大利新兴资产阶级思想政治家，历史学家。

一对夫妇，他们坚持不懈地收集并出版与公共事务相关的资讯，并借此影响摇身成为了“所有立法建议和政治方案的基准校对中心”。和比特丽斯一样，阿尔提奥拉也出生于一个统治阶层的家庭，“她很早就悟出，统治阶层的人们最不愿做的事就是工作。”她虽然性情疏懒，却天资聪慧，她嫁给了奥斯卡，因为她喜欢他的大额头和勤勉的工作习惯。在她的驾驭下，他们夫妇成了人们心目中“最强大最出色的一对”。“这两个人，一心盘算着要用最原始的方式将权力弄到手……哎呀，他们还真的成功了。”剧中讲述者的伙伴这么说道。[147]

智囊团（think tank）这个词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才被正式发明出来。该词隐晦地表明专家们在制定公共政策时所起的作用在变得日趋重要。但正如历史学家詹姆斯·史密斯所言，即使在当时，智囊团指的也不过是“可以用来讨论计划和策略的保密的房间”[148]。后来到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兰德和布鲁金斯[①]开始广为人知，智囊团才被用来代指那些私人机构，它们雇用一些恪守中立客观立场的研究人员，发布免费的不带党派政治倾向的研究报告以供政治家和政府官员们参考。而比特丽斯和西德尼，自打他们一结婚，就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智囊团——也许还是第一个，而且是最富有成效的一个。因为这点，他们也自然而然地以此为自豪。贝里夫妇在他们婚戒的内侧都刻上了“PBP：Pro Bono Publico”[②]的字样。

韦伯夫妇敏锐地意识到，随着民选政府越来越希望能有所作为，专家的作用也就越来越不可或缺。他们预见会有一个新兴的官僚阶层出现。“即使从最基本的便利考虑，经选举产生的机构必须保证能提供越来越多的专家级别的公务员服务……我们想指出的是，这些专家级别的公务员必将形成一个新的社会阶层，一个力量非常强大的阶层……我们把自己视为那个新兴阶层的先行者，只不过我们的服务是业余的，是免费的。”[149]出于这种远见卓识，他们创立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并将它作为培训新型社会改革者的基地；同时，他们还创办了《新政治家》周刊。

---

① Rand，Brookings，都是美国著名的智囊集团。

② 拉丁语，意为“为公众利益”。

他们位于格罗夫纳大道四十一号的房子是比特丽斯选定的，“它平淡无奇得到了做作的地步”，但它鲜明地显示出房主优先考虑的是哪些方面的事情。为了保持身体健康，他们每天的生活规律都如斯巴达般的严格。为了著书、撰稿、访谈和去国会作证，他们牺牲了自己中产阶层的舒适生活。在当时那种烧煤取暖和只有冷水供应的年代，韦伯夫妇经常性地雇用了三名研究助手，但同时却只雇了两名仆人。“要想在公共事务中干出一番卓有成效的事业，”在威尔斯的小说中，阿尔提奥拉这样说道，“你必须能正确地指挥你的秘书。”[150] 比特丽斯的目标是将英国自由放任的社会改造成自上而下的计划型社会。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设计了许多大胆的研究项目，他们的生活完全是按照这些项目的时间进度来安排的。韦伯夫妇的朋友们常常为“他们两人的排名先后”争论不休。威尔斯的说法是“她在操纵他”[151]。比特丽斯的朋友们也同意这个说法，她“操纵”着西德尼。她才是韦伯企业的 CEO，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她还是个远见家、实干家和策略家。威尔斯坚信，他们二人共同地充当“思想经纪人”的事业“几乎完全是她一个人的发明”。在他看来，比特丽斯“敢作敢为，充满想象力，非常善于吸收其他的思想”，而西德尼则“几乎没有任何主动的创新，在知识上，除了能记住别人的观点并参与加讨论，他没有任何别的贡献”。[152]

比特丽斯背冲壁炉站着，她浑身散发出“独特的吉卜赛般红黑银三色交织的光芒”。虽然在小说里没少讽刺她，但威尔斯也不得不承认，比特丽斯美丽，高雅，“在整体上出乎其类，拔乎其粹”。他在格罗夫纳的住所遇见的其他女人中“也不乏清醒理智或光彩照人之辈”[153]，但只有比特丽斯二者兼而有之。即使在讨论预算、法律和其他政治谋略的时候，她也会穿着价格昂贵式样轻佻的鞋子，彰显出她女性的风采和魅力。

比特丽斯曾经是爸爸的乖乖女，她素来有三种嗜好：强有力的男人、调情和传播政治谣言。而费边社的渗透策略则给了她沉溺于这些嗜好之中的最佳借口。她如此描述她陪同内阁首相进餐时的情景：“我会想方设法让他发笑，让他感兴趣，但同时我也会抓住一切机会向他

灌输正确可靠的理论和信息。”与她交往的宾客当中不乏在过去、现在或未来出任内阁首相的人物。她没有任何党派倾向，无论是托利党人还是自由党人她都能与之一见如故，相谈甚欢。“所有这些迟早都是用得着的。”她曾非常务实地说。[154]

入夜以后，智囊团就变成了政治沙龙。每个星期，韦伯夫妇都会挑选一天邀请十数名宾客来家里共进晚餐。每个月，他们还会举行一次有六十到八十人参加的聚会。来这里的客人可不是冲着食物来的。为了能雇用更多的研究助手，韦伯夫妇施行了极其严格的家庭开销计划。比特丽斯在吃上非常节制自律，能做到这点比放任口腹之欲让她更有满足感。[155] 和阿尔提奥拉一样，她给来宾们吃的是“寒酸的普通食物，但席间的讨论却是那么的不同凡响”[156]。R.H. 托尼是位经济历史学家，同时也是韦伯夫妇家的常客。据他称，客人们来韦伯夫妇家出席活动所要付出的代价就是必须像韦伯夫人描述的苦行僧一样进食。[157] 即使如此，人们仍千方百计想要获得邀请，而格罗夫纳大道四十一号则成了一个政治社会活动极度频繁的中心。在一次韦伯家举行的“盛大午宴”上，出席的有挪威派驻伦敦大使，托利党和自由党的国会议员各一名，萧伯纳，伯特兰·罗素（哲学家和后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还有就是那位几乎接待过所有当代著名政治家和作家的贵妇人：比特丽斯。这样的午餐在比特丽斯看来是极普通的。[158] 威尔斯在小说中指出，比特丽斯扮演女主人的才能是无与伦比的，而这对韦伯夫妇的事业尤关重要。“她能将各色各样从事或关心公共事务的人聚集在一起。她能让默默无闻的能人、徒有虚名的名人以及乏人指点的富人混在一起，她在一间小屋里汇聚起来的公共事务方面的各类专家比以往任何非正式场合都要多。”[159]

有位客人首次到贝里家拜访，他对带他来此的朋友说，“这是我参加过的最古怪的聚会”。

“大家都上这儿来。”身为常客的朋友答道，“很多时候我们也像恨毒药一样讨厌他们，有时也会很嫉妒，但却很少生气；阿尔提奥拉有时也会变得很恐怖——但我们还是得来。”

“来这里真能办得成事吗？”

“哦，那当然。这里可是全英国社会体系的一部分，只不过表面上看不出来罢了。”[160]

在1903年的伦敦社交季节期间，在来过这里的人群中就有温斯顿·丘吉尔。在一年前的一次自由党晚宴上，他曾与比特丽斯比邻而坐。虽然现在丘吉尔已是托利党的国会议员，但当时他的身份还只不过是古老的斯宾塞贵族家庭的后代和一位前托利党国会议员的儿子。人们都以为丘吉尔并不认同保守党政府。然而，当时他却宣称，他不仅反对行业工会，而且对公共小学教育也持反对意见。这激怒了一旁的比特丽斯。更糟的是，在席间他只顾喋喋不休地自吹自擂。后来，为了打听谁能帮他提供统计数据，他才同比特丽斯略微交谈了数语。“别人能替我做的事，我自己就不去费那个脑子。”他轻飘飘地说道。比特丽斯很生气，当天晚上她在日记中用寥寥数笔写下了她对他的评价，“自负，自大，肤浅，反动”。没有历史资料能告诉我们，丘吉尔对此评价有何反应。[161]

丘吉尔这回再次光顾韦伯夫妇宅第时，他已转投到了反对政府的自由党阵营。与此同时，选民们的情绪也起了变化。由于在南非与布尔人进行的战争耗资巨大却劳而无功，英国的选民们对在海外实施帝国主义政策不再抱有任何幻想。相反，他们为国内存在的贫困局面而忧心忡忡。近十年来，托利党一直是执政党，先是索尔兹伯里侯爵任首相，然后是亚瑟·贝尔福[①]。现在，他们又提出一项保护主义纲领，但这却只会让工薪阶层的选民们更加与之离心离德，因为后者担心该项政策将会导致物价上涨，并使出口产业丧失大量工作机会。而约瑟夫·张伯伦正是托利党这项关税“改革”计划的起草人。他在国会作他政治生涯中的最后一次发言时，大厅里几乎空空如也，没有听众。已经退隐在家的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这时站了出来，他将张伯伦和其他保护主义分子猛烈抨击了一番。但自己究竟有无必要卷入到又一场公开争论中去，他对此仍然犹豫不决。丘吉尔立即意识到托利党大势

① Arthur Balfour, 1902年至1906年任英国首相。

已去，他认为，不但自由党，而且整个国家的立场都有左的倾向。他对此趋势的解读是，无论如何，他们一定会强调要解决社会问题……他进而推断，没有行业工会的支持，自由党人要赢得选举进入国会绝非易事，而要保持他们在国会中的统治地位则更是难上加难。

晚宴上，比特丽斯安排丘吉尔坐在自己的右边。这次，他依然在不遗余力地进行他拙劣的表演，他给比特丽斯留下的印象和前一次一样糟糕。不久前，比特丽斯刚刚发过誓，要将酒、咖啡和烟通通戒掉，而只留下饮茶作为“唯一的个人享受”。晚宴以后，比特丽斯坚持认为，“他喝得太多，讲得太多，但思考能力却名不副实。”在席间，她曾跟丘吉尔谈起一个新的想法，就是实行“法定最低生活标准”的保障制度。而他仅仅是抛出了几句在她看来属于“婴幼儿学校级别的经济术语”来敷衍她。她的最终结论是，“他对所有的社会问题都一窍不通，……甚至一无所知……很明显，为什么要反对完全不受限制的自由竞争，对此他连最基本的常识都不具备。”[162]

法国历史学家艾力·哈勒非是英国十九世纪历史的权威。在他撰写的十九世纪末英国的历史当中，他提到了几项“由丘吉尔发起并几乎具有革命性意义”的重要立法[163]。在这些立法当中，有一项便是“首次尝试将最低工资引入英国的劳动法规。而这正是韦伯夫妇建议的‘法定最低标准’的一个组成部分。”

而丘吉尔则觉得比特丽斯过于专横，他说，“西德尼·韦伯太太用些打发叫花子的稀粥就想让我把嘴闭上，那可办不到。”但是，他也由此意识到了自己知识的欠缺。于是，他很快便开始“大量阅读政府发布的社会报告蓝皮书，并终日浸淫于大部头的百科全书之中”。[164]虽然他与比特丽斯见面极少，但他对绝大多数费边主义的纲要都进行过钻研，其中包括布斯的《生活与劳动》，西伯姆·朗特里[①]的《贫穷：城市生活研究》以及比特丽斯和西德尼的《行业工会的历史及工业化民主》。此时，H.G. 威尔斯的写作重点已从科幻转移到了社会工程方面，而他成了最令丘吉尔心仪的作家。“我现在一定能通过他们的考试。”

① Seebohm Rowntree（1871—1954），英国企业家和管理学家。

丘吉尔曾如此夸口[165]。他还是萧伯纳的狂热崇拜者，并且曾经出席了《巴巴拉少校》一剧的首演式。他和他的私人秘书埃迪·玛尔西曾经仿效前辈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花了大量时间一起到曼彻斯特最破败的贫民区进行调查走访。“这片街区里的生活真是异样极了——看不到任何赏心悦目之物——吃不到任何可口的食品——也说不出任何睿智的言论。”丘吉尔事后曾对玛尔西如此评说。[166]

正如丘吉尔的传记作者威廉·曼彻斯特所写到的，丘吉尔让所有人都大吃了一惊。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位原先的极端保守派人士摇身一变成了“左派立场的大声疾呼者”。虽然这一变化背后的动机良多，而且政治上的权衡和考量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他所引用的具体观点以及社会改造措施几乎都是从比特丽斯那里借鉴而来。时至1906年初，自由党在选举中获得了压倒性胜利，并一跃成为国会中的多数党。此时，丘吉尔又一次在演讲中为他所谓的“被人遗忘的数百万人的事业”摇旗呐喊，他大声疾呼，“让我们划出一道线，让我们不再容忍有任何人的生活和劳动状况低于这条线的水平。”——而这恰恰是比特丽斯曾经向他大力推荐过的政策。[167]

同年10月，丘吉尔在格拉斯哥作了一场惊人的演讲。据丘吉尔的传记作家彼德·门德尔松称，他此次演讲的内容不仅远远超出了当时自由党各领袖人物的现有计划，它甚至具备了后来工党推行的政策中的大部分要素。而工党正是凭借这项政策才以压倒性的优势获得议会授权，并于1945年到1950年间发动了一场“无声的革命①”[168]。这是他毕生中最为出色也是最慷慨激昂的演讲之一。他在演说中指出，“文明整体发展的趋势是社会的集体职能在日益增加”；他正确地指出，应该由政府，而不是私营机构，将这些职能承担起来：

> 我希望政府开始着手进行一系列全新而大胆的试验……我认为，国家应当越来越多地承担起雇用后备劳动力的职能。我非常遗憾，我们未能将这个国家的铁路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我们

① Silent Revolution，工党通过议会选举得以影响国家政策的革命。

一致同意……对病人，老年人，还有，尤其是对儿童，国家应当更多更热心地想方设法为他们提供照顾。我期待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一个生活和劳动的最低标准，同时也希望这一标准会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而逐渐提升……我并不想削弱自由竞争的强大活力，但是如果我们能有所作为，便可以将竞争失败带来的可怕后果大大减轻……我们需要自由竞争来促使人提高和向上；但我们也可能会跌下来，因为那也是自由竞争的一部分；我们并不打算将整个科学与文明的制度全部推倒重建，我们想做的只是多铺一层安全网，以免人们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169]

“国家安全网”，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福利国家，这个主意的发明权非比特丽斯· 韦伯莫属。在 1943 年去世前不久，她曾回首往事并这样满意地写道，“我们能看到，要想让我们的后代得到悉心照顾，国家是唯一我们可以信赖和委托的对象……简而言之，我们逐渐认识到一种新的国家模式，这个模式也许可以称之为‘家务管理型国家’，它同‘极权国家’有着天壤之别。”[170]

这个主意最早来源于她和西德尼对行业工会的研究。早在他们 1897 年出版的《工业化民主》一书中，他们就曾建议设立一个全国性的健康与安全标准。除开农场工和家庭仆佣，“国家最低标准”适用于其他所有的劳动人口。而这其中最为激进的一部分就是“国家最低工资标准”。他们认为，“由于缺乏相关的立法，行业之间的竞争会导致某些职业的工作条件日趋恶化，并从整体上对国家造成危害。”马克思和穆勒都曾认为，由政府强制设定工作报酬和工作条件的最低标准的做法与生产力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因为实际工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最终将有赖于生产力的提高。对此她和西德尼并不苟同。[171] 相反，他们认为，这项立法将使劳动事故大大减少，工人们将变得愈加灵敏，他们的生活也将愈加滋润，所有这些替企业节省下来的成本将将远远超出企业因立法而被迫增加的开支。但他们也承认，行业工会的领袖们原本只是希望政府能在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方面帮他们一把，而韦伯夫妇的这一建议将会使政府对私营企业拥有的职能和权力大大

超出人们的预期。

然而十几年后，比特丽斯又有了一个更为大胆的“新国家模式”的设想。1905 年底，在托利和贝尔福[①]政府的末期，她奉命加入了一个皇家调查委员会，并参与改革现存的贫穷法案。该委员会的调查工作在新的自由党政府上台以后仍然继续了三年。委员会成立伊始，韦伯夫人便与其他成员发生了冲突。她坚信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所说的“贫穷的根源即贫穷本身”。她用极其绝对而非相对的眼光看待这一问题。她的推理是，生来的不平等导致穷人拥有的财产少于他人。从此意义上讲，贫穷是不可避免的；然而，赤贫现象，即“因为一种或数种生活必需品的匮乏，导致一个人的健康、精力和元气受到损害，乃至最终危及其生命本身。从此意义上而言，贫穷便不再是无法避免的。”[172] 消灭赤贫，便能防止贫穷从一代自动遗传到下一代的现象发生。

由于她在伦敦东区曾经有过的经历，她关于那一地区家庭状况的发言极具权威性：“这个或那个成员会不断地交替患上诸如酸痛、消化不良、头疼、风湿、支气管炎和身体疼痛等毛病，间或还会来上一场大病，甚至导致过早死亡的家庭。”或是父亲失业，就“意味着将缺衣少食，没有火取暖，没有起码的居住条件”的家庭；还有那些有成员无法工作的家庭：孤儿寡母，老弱病残，及精神病患者。[173]

韦伯夫人对“贫穷的根源是道德缺陷”的观点嗤之以鼻。相反，针对当时主要的赤贫人口和家庭类型，她列出了导致贫困的五大原因：伤病型，孤儿寡母型，年老体弱型，从低智商到精神失常的各类精神病患型；而最令人不安的却是有劳动能力的赤贫者。比特丽斯认为，这些人的贫困是由失业和长期失业直接造成的。

她明确指出，消灭赤贫之所以是当务之急，并不是因为“它的状况在日益恶化，而是因为就整体的体制而言，我们的社会标准正在逐渐提高”。她这么说有着双重意义，一来工人阶级如今已拥有选举权，二是因为德国，这个英国最强劲的国际竞争对手，也已经针对消灭赤

① Arthur Balfour，存在于 1902 年 7 月至 1905 年 12 月的政府，亚瑟·贝尔福为其核心人物。

贫现象采取了措施。[174]

英国现行政策的问题在于，它只是对主动寻求救济的人口给予帮助，但在防止出现赤贫和防止依赖救济方面却毫无作为。正如比特丽斯所指出的，“为了救济血汗工厂里的赤贫工人，政府官员遵照贫穷法案实施了一系列措施，但这些措施中没有一条能防止血汗工厂的出现”，它们“不能将工人从失业的境遇中拯救出来，不能让他们逃过扑面而来的疾病侵袭……它们无法制止为工人带来伤残甚至病死的生产事故的发生，它们对损害工人身体健康的恶劣的居住条件以及原本可以预防的职业疾病也束手无策。”[175]

她期待政府能最大限度地从分发福利的职能中摆脱出来，而致力于将导致贫困的根源彻底铲除。“在这种预防型的政策之下，每一个案例都会具备共同的基本要素：政府提供的不是救济，而是解决问题的方案，而且是对症下药的解决方案。”[176]但是，对政府及其专家们是否了解如何才能治愈“现代生活中的痼疾”，她并未予以质疑。至于对实施该项政策所需的成本她也未表示担心。因此，她提出的这种能预防贫困而不仅仅是救助贫困的“家务管理型国家”的大胆理念不可避免地与委员会中其他人比较有限的目标产生了矛盾。正如她事先声明的，她拒绝在委员会的最终报告上签字。她与西德尼转而在 1908 年的头九个月的时间里把她的理念写进了《少数派报告》一文中。她还成功说服了委员会中的三名成员参与签署了她写的该份报告。她声称，他们这份“伟大的群体主义的报告”[177]展望到了一种能影响人整个一生的制度。在这种机制下，“任何人，无论其性别和阶层，国家都将保障他能过上最低标准的文明生活……这指的是，在他年轻的时候会有充分的受培养和受教育的机会，在他能够工作以后他会有一份能够养家糊口的工资，他生病时能受到医治，即使在他伤残或年老之后也会有办法安度余生。”[178]

韦伯夫人承认，在其他改革派眼里，她的这个建议和乌托邦主义如出一辙，且完全抛弃了传统的有限政府的宗旨。但她相信，相较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家务管理型国家完全能与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相匹配。事实上，自由国家制度必将自然发展到下一个阶段，也就是福利

国家制度。国家要担负起保障公民基本福利的职责，政府必须要为那些力不能及的人提供不低于最低标准的生活水平。比特丽斯的这一观点不仅背离了斯宾塞尽量减少政府干预的理想，而且与传统的提倡机会平等但将最终结果交付于个人与市场的格莱斯顿自由主义也彻底决裂。除了社会党人提出的福利政策，它比当时所有人提出的所有观点都要超前。

她的朋友萧伯纳在他对《少数派报告》一书的评论中曾如此预言，“它于社会学和政治科学的影响，将不亚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对哲学和自然历史学的影响。它规模宏大，具有革命性，但同时它又合情合理，具有可行性。这正是我们鼓励和吸引年轻一代所迫切需要的。”他接着还写道，“他的生存权利以及社区帮助他维持健康和能力的权利，看上去似乎与他从私人雇主获取的商业报酬毫不相关。”也就是说，这个建议的最终目标远远超出了马歇尔生产力和工资共同增长的理论。“个人是构成社会机制的细胞，若要保持整个机制的健康，前提是要保障每个细胞的健康。”[179]

最低工资，在工作场所的休息，安全和健康的最低标准，安全保护网，就业办公室，针对周期性失业而调整大型政府项目的时间，许多人提出过各式各样不同的建议。基本上他们都认为，贫穷，或是韦伯所谓的概括性更广的赤贫，是可以预防的。而预防的这一职责必须由政府来承担。为了能够成功预防，则需要增加政府的功能。但以往从未有人能将这些理念表达得如此清晰，如此系统，并且如此切合“那些渴望可行性建议的人们”的需要。也从未有人能发明出一个如此出色的辞藻，它让一个具有革命性的改革听上去像是渐进发展的结果，而且是必然结果。

比特丽斯的天才在于，她能让激进的改革看上去像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她和西德尼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尚认为是很乌托邦的一些想法，在仅仅十年之后便已变得切实可行，或至少产生了一些政治影响，这让她非常惊讶。多年后，在对《工业化民主》一书进行回顾时，她不无自豪地说，“事实上，尽管未公开宣布或存在草率之处，但本世纪社会历史的最大特征便是，本书所阐述的国家最低标准最终被

纳入了政府的管理和立法机制。”[180]

1908年对自由党政府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一年。随着失业率的上升，行业工会变得愈加激进好斗，自由党在国会中占据了压倒性的多数，“社会议题”也便成了政治考量中的重中之重。比特丽斯在日记中写道，“人们都在争先恐后寻找新的有建设性的建议”。韦伯夫妇顿时变得奇货可居起来。“我们恰好愿意将许多想法贡献出去。于是，我们夫妇的行情也就看涨了。”比特丽斯接着高兴地写道，“每个政客都希望有人为之提供‘指导’。其实说来也非常可笑，他们究竟属于保守党、自由党还是工党，其实并不重要，因为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在翘首以待，希望能得到具有可行性的建议。”[181]这也为她提供了大肆挥霍一次的由头，她决定给自己订购一身新的晚礼服。

“温斯顿掌握了韦伯方案的精髓。”1908年10月，比特丽斯曾如此洋洋自得地夸口，她还说，“他们双方已重拾旧谊。”由于此时丘吉尔的地位已堪与她匹敌，比特丽斯在日记中已将他归到“极为出色能干的一类——而不再是夸夸其谈之辈”。[182]

在赫伯特·亨利为首的自由党执政的前两年中，丘吉尔所提倡的改革是只闻其声，不见其影。虽然在1906年的选举中大获全胜，但自由党除了恢复了某些保护行业工会的政策，在推动别的改革计划上却鲜有所为。1908年4月，这个僵局终于被打破。时年三十三岁的丘吉尔接替劳合·乔治出任贸易部主席，这是一项内阁级别的任命。比特丽斯认为内阁的该项人员调整“令人甚为兴奋”[183]。丘吉尔的这一职务综合了美国商业和劳工两部的众多职能。他的职责极其繁琐，其中包括：专利登记、公司法规、商船运输、铁路、劳务仲裁，并且还要就贸易事项向外交机关提供建议。但归根到底，如劳合·乔治在其自传中所言，贸易部主席的责任就是要保证“资本平稳有序地运转”。[184]但丘吉尔到职伊始，便开始利用该职务的影响，不断引入一些激进的社会改革计划。他的一位朋友当时曾如此评论道，“自从不久前他发现了穷人这一社会现象，他现在一心就只想着他们。他觉得，为穷人效劳是上帝赋予他的使命。‘为什么每次面对死神我都能转危为安呢？”

他问道，“还不就是为了能让我替他们做些事嘛。”[185]

在接下来的两年中，丘吉尔与和时任财政大臣的劳合·乔治联手，一劳永逸地废除了“格莱斯顿主义的陈旧传统：即只着眼于自由放任主义的政治议题，而将‘人民的生活状况’全部交由个人自负其责。”[186]这位贸易部的新任主席未待正式宣誓就职，便花了整整一个通宵给首相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他将其个人希望能付诸实施的政策全盘托出。他毫不客套地指出，“虽然被愚昧的鸿沟重重阻隔，我依然能隐约地看见这个计划的大致轮廓，我将它称为国家最低标准”[187]——丘吉尔从五方面对他所谓的最低标准作出了定义，并将其列为他立法诸事宜中的头等要事：失业保险，残废保险，实行十七岁以下义务教育，以救济贫民为目的由政府和社会提供修路和造林的工作机会，还有就是铁路国有化。

1907年的大恐慌过后，经济衰退接踵而至，丘吉尔的计划也因之变得愈加迫切。1907年末，行业工会成员的失业率仅有百分之五，而如今在一年之内它已经翻了一倍。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曾经指出，失业率上升通常是由商业活动的萎缩引起的。而现在，比特丽斯则对失业转而又成为贫困的主要原因作出了论述。但政府究竟应不应该和能不能够对此进行干预，对此人们的意见尚未统一。丘吉尔建议对传统的价值观发起挑战。虽然他清楚自己的建议远远超出了阿斯奎斯首相的初衷，他仍然呼吁自由党政府效仿德国的做法，采取失业与健康保险的政策：“我想说的是——我们应当从俾斯麦[①]主义中有所借鉴，并以此来完善我们工业化制度的基础。至于这么做将会带来怎样的后果，我们只能走着瞧，但至少我们的动机是良好的。”[188]“在采取有建设性的国家措施一事上，他可以说得上是孤注一掷。”[189]比特丽斯为此欢欣鼓舞，同时她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劳合·乔治和丘吉尔是自由党中的翘楚。”[190]她非常欣赏丘吉尔“迅速接受新思想，并能迅速将其付诸实施的能力，尽管他对那些思想背后的哲学理论根本一窍不通。”[191]

---

① Bismarck（1815—1898），德国政治家，德意志帝国第一任首相。

因为担心来自上议院的否决，自由党推动这项改革的努力逐渐遇到了一些阻挠。但最令人惊讶的是，这项改革建议中有如此多的内容最终都被通过并得到了实施。威廉·曼彻斯特曾如此评论道，“在丘吉尔和劳合·乔治得势之前，所有为穷人提供救济的立法程序无一例外都是以失败而告终的。”[192]

尽管提供社会保险的成本远比直接提供服务要低，但在这个局部战役上，韦伯夫人还是功亏一篑。然而，她却赢得了福利国家这场战争的最终胜利。“政府应该承担起责任，为公民们提供数量更多的服务，这些服务应该有越来越多的专家进行管理，而且还需增设相应的政府制度予以支持。”比特丽斯和西德尼为这种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193]《少数派报告》是为福利国家勾勒出的最早的蓝图之一。因提出1942年的贝弗里奇计划而声名显赫的威廉·贝弗里奇爵士曾经作为一名研究员参与了《少数派报告》的写作。他后来曾坦承，由他设计的二战后英国福利国家的制度“究其本源都是我们从韦伯夫妇那里借鉴而来的”。[194]

第四章

黄金交叉：费雪与货币错觉

“这些亲爱的人们，他们总是那么热衷于搞他们的新试验，总是那么自以为是，他们总以为他们在越变越好，越变越聪明——总觉得他们越来越富有。就这样年复一年，月复一月，日复一日……哎呀，随他们去吧，韦伯太太，就随他们去吧。”

——莫尔斯·斯黛芬丝[①1]

“他们本可以去俄国、印度或者中国……而他们却去了美国。什么品位这是！”1898年春，当一位托利党的熟人听说比特丽斯和西德尼即将前往纽约的时候，他曾如此嘲笑他们。[2]正如这种奚落所显示的，韦伯夫妇此行并非是去旅游，而是以社会考察者的身份前往。尽管如此，比特丽斯出发前还是进行了一次大采购，她挑选了大量“真丝绸缎、手套、内衣、动物皮毛，以及其他一些四十岁女人的必需之物。她要让美国人和殖民地的人们见识见识群体主义社会孕育出来的时尚和高雅。”[3]她听人说，她即将前往的那个地方被称作社会的实验室，因此她打定主意要在当地人面前炫耀一番。

此时，距离《世界的美国化》成为畅销书还有一两年，但韦伯夫妇对该书作者威廉·斯迪德的观点一点都不觉得陌生。斯迪德是《帕

① H.Morse Stephens（1857—1919），美国历史学家。

尔摩公报》的编辑，他坚信，英国未来的经济将与美国，这个它以前的殖民地息息相关。在十八世纪，美国尚处于英国的统治之下；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内战期间，由于北方联盟对南方的港口实施封锁，从而导致了英国兰开夏饥馑[①]的爆发。而如今，这两个经济体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紧密。在十九世纪最后的二十几年中，英国从美国进口的原材料比从它自己殖民地进口的还要多。[4]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法国人重新喊出了“美国入侵”，殊不知，英国的记者们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就发明了这一词汇。[5]

1902年，伦敦的一家报纸曾这样牢骚满腹地抱怨：

> “每天早晨，每一位普通公民都在美国制造的闹钟声中醒来；他从产自美国新英格兰的床单上爬起床来，用纽约的肥皂和扬基安全剃须刀刮脸。接着，他穿上产自西卡罗来纳的袜子，在外面再蹬上一双波士顿长靴；他系紧康涅狄格州产的背带裤，将沃特伯里[②]产的手表塞进口袋，然后才坐下吃他的早餐……从餐桌旁站起来，我们的这位公民便飞快地走出门去，他搭上一辆纽约产的有轨电车，在谢弗兹布什站下车，然后又挤进美国佬的电梯，电梯将他一直送上火车，沿着美国制式的铁路一直开进城去。他办公室里的用品自然也是美国造的。他坐的是内布拉斯加产的转椅，他的卷盖式书桌产自密歇根，他写信用的是西那库斯[③]产的打字机，在信件上签名用的是纽约产的自来水笔。然后，他又用新英格兰产的吸墨纸将信拭干，该信的复件则用大瀑布市[④]生产的文件夹保管起来。”[6]

自由党内阁首相威廉·格莱斯顿很早就曾预言，美国在商业地位上超越英国是无法避免的。“当我们还在为自己的快速发展洋洋自得

① 美国内战期间，由于北方对南方港口的封锁，南方的棉花无法运到英国，使得兰开夏的纺织厂缺乏原料，无法开工，导致了大饥荒。

② Waterbury，美国康涅狄格州中西部城市。

③ Syracuse，美国纽约州中部城市。

④ Grand Rapids，美国密歇根州一城市。

的时候，”他早在1878年就已指出，“美国人却正在一路小跑超过我们。”[7]1870年，衡量一个国家平均生活水准的最基本标准是人均生产总值。当时，英国人均生产总值比美国要高出百分之二十五。但在接下来的三十年中，每个工人的平均生产总值成了衡量一个经济体生产能力的标准，同时也成了决定平均工资水平的最主要因素。而美国的工人平均生产总值在这三十年中一直都在以两倍于英国的速度增长。[8]原因之一是英国人和英国公司每年都将他们一半以上的存款投资到美国，这甚至超过了他们对自己国家的投资。而这与他们对欧洲邻近国家的投资相比，也高出了数倍。[9]虽然这些投资带来的收益使英国每年的国民收入得到了增加，但这些投资本身却让美国企业完成了现代化。另一个原因是，几乎半数以上的英国人将美国当作移民的首选目的地。在爱尔兰移民中这个比例甚至更高。在这三十年中，从英国移民去美国的男女老少的总数达到了将近八百万人。而相比之下，虽然加拿大在文化上感觉更“英国化”，但它却只吸引了不到百分之十五的英国移民。[10]英美两国的平均收入和生活水平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时逐渐接近，因此，英国的格莱斯顿首相将英美两国称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规模巨大的自由制度的杰出典范”。[11]

美国在一夜之间从以农耕为主的社会摇身变成以工业为主的都市化社会，并因之成为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功的象征。这样的速度不得不令人为之侧目。在1875年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游览这个国家的时候，美国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农业和矿业，后者的比重较前者稍小。而到韦伯夫妇来美国参观之时，来自制造业的工资和利润已是农业收入的三倍。在1880年到1900年这二十年间，美国大型工业企业的年收入翻了四番。美国印刷和出版业的收入在同期内翻了五番；机器制造和麦芽威士忌翻了四番；钢铁和男衣制造，三番；随着从石油和煤中派生出来的各种产品的出现，一个个全新的工业在不断诞生，各式各样包括电气、制冷、新式香烟制造、轧压和蒸馏在内的机器设备也层出不穷。加上铁路线的延伸以及电报将千家万户联系在一起，所有这些因素共同催生了这场美国企业的革命，同时也决定了这场革命的规模、

结构和范围。雷明顿[①]（1816年）、鑫尔[②]（1851年）、标准石油（1870年）、钻石火柴（1881年）和美国烟草（1890年）都是在此期间应运而生。大规模的销售和生产以及科学化的管理，简而言之，大企业时代来临了。[12]

相对于美国企业的营运，比特丽斯和西德尼却对美国的政府机制更感兴趣。他们的头一站是华盛顿特区，不凑巧的是，美国的首都城市当时正被战事弄得焦头烂额。古巴起义，西班牙人的镇压及随后美国“缅因州号”军舰据传在哈瓦那湾遭西班牙人击沉，这一系列事件在美国国内掀起了一场强劲的主张军事干预的基层群众运动。主战情绪甚嚣尘上，使得反对开战的工商企业、宗教领袖以及共和党总统威廉·麦金利[③]一个个心力交瘁。比特丽斯和西德尼与一千多位其他观众一起，坐在众议院的来宾席上旁听了麦金利的演讲。在此次演讲中，他正式改变了他对战争的立场。众议院的情形让比特丽斯大惊失色，而参议院也同样乏善可陈。她唯独对泰迪·罗斯福[④]颇为嘉许，此君时任美国海军副部长，是当时最强硬的主战派。在同韦伯夫妇共进午餐的大部分时间里，他的谈话都夹带着战争的“腥风血雨和隆隆炮声”；对地方政府这个话题他漠不关心，而这正是比特丽斯和西德尼下一本书将要涉及的主要内容。这让比特丽斯大失所望；然而，当他谈起他在西部农场的生活经历时，她却发现他的言谈中其实并不乏“原汁原味的生动”。[13]

比特丽斯在纽约感受到的隔阂也不遑多让。

> 噪音，噪音，全都是噪音……在城市里，你的感官已全部错乱，你的耳朵聋了，眼睛也因为持续的匆忙而疲惫不堪；你的肉体和神经随同在街头出入的车辆一起震荡摇晃；如果你乘火车外出，不管你坐的是普通车厢还是卧铺，一路上你都不会有哪怕是

① Remington，美国枪械生产公司。
② Singer，美国缝纫机生产公司。
③ William Mckinley（1843—1901），美国第25任总统，任期由1897年至1901年。
④ Teddy Roosevelt（1858—1919），即西奥多·罗斯福，美国第26任总统，任期由1901年至1909年。

一分钟独处的时间；门接连不断地被打开，再被使劲关上；旅客们在上上下下，兜售东西的男孩们举着报纸、糖果、水果和饮料，在车厢里风风火火地进进出出，还一再请求你看看他正在叫卖的物品，最后逼得你只能粗鲁地将他们赶开；列车员们呢，则是把窗户开了又关上，把暖气点了又灭掉；发动机的铃声始终不绝于耳，偶尔，蒸汽排出时还会迸发出雷霆般的呼啸（其实更像是雾天信号的喇叭声），向人警示着火车的到来。[14]

新技术及其带来的高度社会流动性，这些都是马歇尔和美国人的最爱。但比特丽斯对此却丝毫不感兴趣。不仅是对火车和摩天大楼，甚至连“制作精美的电话，技术熟练的速记员，高速电梯和全部由电子显示的标志提示”她也都是冷眼相向。虽然她曾被迫表示“美国人普遍具有较强的办事能力”，但她却将其原因归结为“美国人普遍以个人的金钱利益作为唯一动力”。她很快便总结道，缺乏耐心是这个国家最大的性格缺陷，她认为，那些高速的交通与通讯，连同整个美国“喧嚣，混乱，动荡，忙碌”的生活方式，不过是对能源的浪费和消耗。“在我们看来，所有这些对机器发明的热衷和崇拜反映出的不过是美国人不善于未雨绸缪的普遍病症。”她如此评论道。[15]但她并未像马歇尔那样，将这种所谓“紧张的能量”与美国人在组织管理和提高效力上的热忱联系起来，她也未谈及这种力量与美国人勇于发明，勇于冒险以及美国社会高度流动性之间所具有的联系。

稍后几个星期，比特丽斯和西德尼开始向西部进发，他们首先在匹兹堡作了停留。卡内基钢铁公司，即后来的美国钢铁公司，在她眼里俨然是一个“巨大的财富制造机器”。技术的广泛运用导致人工被大面积取代，这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亨利·弗里克[①]亲自陪同比特丽斯参观了位于宾州霍姆斯特德的钢铁厂。他告诉她，卡内基钢铁在过去数年间将产量提高了三倍，而同时也将雇佣工人的数量从三千四百人缩减到了三千人。她如此描述道：

① Henry Clay Frick，卡内基钢铁公司的经理。

大片的车间里全都是最新最强劲的机器，这个地方看上去如同被人抛弃了一般。大型发动机、吊车和熔炉在轰隆声中不停地运转，看上去根本无需人力的帮助。偶尔，你能发现一个小型座舱载着一名工人，一边悬在地面和车间顶棚的支架之间，一边在运行某种电力设备。上百万马力的能量就是在以这样的方式被设置和调配……我们发现，在过去十年中，技术的迅速发展，尤其是电能的广泛使用和机器自动化，节省了大量劳动力。“自动搬运车”取代了工人，它们将堆积如山的钢从轧钢车间里搬进搬出；凭借自动化的机器，一名工人便能操纵机械手臂，把熔炉门打开，从里面将滚烫的成品钢悬吊出来，并码放在搬运车上；而在此之前，将大量废钢铁填入熔炉的全部过程也同样实现了自动化，同样只需一名工人操作便可。所有这些技术都是在过去的六年中引进的。

然而，她并未将卡内基钢铁的巨大成功简单地归结于“机械发明”，因为世界上所有其他的钢铁厂都能从发明中收益。她敏锐地发现，它成功的关键在于它出色的管理和组织。她留意到卡内基钢铁的拥有者们全都在私营企业里正式上班，这些企业对“脑力工作者都无一例外的极为慷慨”，它们给这些工人“豪华的住房……去欧洲度假以及各式各样的其他优待”。[16]

而同时，城市（匹兹堡）里面：

却如同地狱一般……这里的烟尘比英国污染最严重的地区有过之而无不及，下水道的肮脏污秽有如意大利最落伍的城市。人们已全被上帝遗忘……一排排木结构的低档公寓紧挨着挤在一起，它们的两边不远则是二十多层高的办公大楼。街道十分狭窄，但街面上电车却到处在以二十多英里的时速横冲直撞——总而言之，这是最丑陋的地方，这里的政府在美国各级政府中也是最为腐败的。[17]

在这里，她看到了查尔斯·特里威廉爵士在她到达前提醒她要留

意的现象：安德鲁·卡内基，这个她称之为“爬行动物”的钢铁大王和匹兹堡的其他富商们，他们也许的确是捐献了一两座公园，还有免费图书馆什么的，但除此之外他们对这座城市“几乎是不闻不问”[18]。离开匹兹堡，比特丽斯又去了芝加哥、丹佛、盐湖城和旧金山。等到她抵达夏威夷并由此前往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时候，她已经非常肯定地觉得，世界上其他国家能从美国的社会实验中得到的有益借鉴会少而又少。

离开纽约之前，比特丽斯特意物色了一些教育界和经济学界的人士并与他们会见。但除了伍德罗·威尔逊[①]这位未来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以外，她对美国学术界的印象颇为负面。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次午餐会上，她将那里的一位经济学教授形容为“出色的小学教师”，她还形容那里的校园也就是介于“普通医院和伦敦理工学院之间的档次”。耶鲁也不过是“一所漂亮的小型传统式大学”。至于那位起草了《谢尔曼反垄断法》的经济学家，她的评价则是，“若单看他的外表举止和言谈，我会以为他是伦敦西城哪个店里的企业监督经理。”[19]

欧文·费雪是耶鲁大学新来的经济学教员，此人远非泛泛之辈。他的目光里闪烁着睿智的神采，他的握手坚定而有力，他的身躯伟岸，形同一名运动员，而他的脸庞却如同孩子般英俊。虽然年方而立，但在剑桥大学、整个英国乃至全欧洲，他是唯一一名被另眼看待的美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和法国数学经济学家瓦尔拉斯[②]二人都称其为天才。[20]

美国内战结束之后两年，费雪在纽约哈德逊河畔撒杰提斯的一个农村社区出生。父母以《睡谷的传说》[③]的作者华盛顿·欧文[④]的名字为他命名。他的祖父是个农民，他父亲乔治·费雪是个心高气傲的福音教派的牧师。他母亲艾拉·费雪是位虔诚的意志坚强的年轻妇女。

---

① Woodrow Wilson（1856—1924），美国第 28 任总统，任期由 1913 年至 1921 年。

② Leon Walras（1834—1910），经济学家，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创建人之一。

③ *The legend of the Sleepy Hollow*，讲述的是发生在哈德逊河畔一个名叫“睡谷”的地方的故事。

④ Washington Irving（1783—1859），十九世纪美国最著名的作家。

欧文一岁的时候，父亲刚从耶鲁神学院毕业，并得到了一份在罗得岛皮斯德尔布道的工作。

亨利·詹姆斯在其《奉使记》中曾描绘过一个坐落在新英格兰的工业城。而皮斯德尔虽然比小说中的城市要小，但却是它活生生的再现。和马萨诸塞的伍莱特一样，欧文·费雪自幼生长的这个城市经济繁荣，秩序良好，并且深受新英格兰福音派教义的浸淫。城里的头面人物和慈善家劳兰德·海泽德三世，是贵格会[①]成员。他先是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座羊毛加工厂，后来自己又创建了一家化工公司。海泽德的工厂被人们认为是较为开明进步的雇主，它实行雇员参与利润分成的政策。在他将工厂托付给他儿子管理之后，他转而开始了其作为政治改革家的的第二事业。他的数个女儿之一，卡罗琳，日后成为了韦尔斯利女子学院的校长。海泽德修建了公理会教堂，并邀请乔治·费雪出任该教堂的首任牧师。由于海泽德的这一任命，欧文得以自幼在这个离大西洋咫尺之遥的牧师住宅里长大，人们常常在这里谈天论地，他们个个“语言温和平易”，而且“性情诚恳”。[21]

在欧文十三岁那年，父亲突然辞别他的教会和家人前往欧洲游历，在那里他参观了很多大学和大型教堂。从欧洲回来以后，不安于碌碌无为的他又开始热衷于自我节制；不久，他的教区里便因此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因为失去了教徒们的支持，他于是辞职并把家搬到了新罕布什尔州纽黑文市的一处狭小的公寓里。他将欧文送去入读当地的公立学校。在接下来的两年中，费雪一家基本上靠亲戚们的接济度日。

乔治·费雪终于找到一个新的布道教堂，但它远在一千二百英里以外的密苏里堪萨斯二州的交界处。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曾在1875年写道，“密苏里境内多沼泽，也多黑奴和爱尔兰人，疟疾流行，野花遍地，还盛产……玉米”，而圣路易斯则是一座罕见的“有碍健康的城市”[22]。由于小麦和农场土地价格在双双一路攀升，所以无论是酷热还是潮湿都未能使从东部来的移民浪潮望而却步。密苏里的卡梅龙镇充

① Quaker，又称教友派或者公谊会，是基督教新教的一个派别。成立于十七世纪。

其量也就有几个火车场站，几处仓库和饲养场，数条宽敞一点的街道及沿街盖的几所大房子，还有，就是十数个教堂，如此而已。1883 年秋，乔治·费雪离开纽黑文的时候，他本打算在明年春天来接取他的妻子和小儿子。而十六岁的欧文却同父亲一起上路，一直到了圣路易斯，他将留在那里同乔治·费雪的姐姐和姐夫住在一起。后者是华盛顿大学的一位教授。费雪已安排妥当，他打算让儿子在当地一所公理会的私立学校读完高中。他最大的希望是能让他聪明的大儿子进耶鲁，最终在那里接受神职培训。

乔治·费雪将独自继续剩下的旅程。在这对父子的一生中，他们此前仅仅分开过一次。他们都希望能去探望对方，但卡梅龙和圣路易斯之间隔着三百多英里，而冻雨、冰雪和严寒使这段距离显得更加漫长。在卡梅龙刚刚度过第一个冬天，乔治·费雪对那里便已经牢骚满腹，他经常莫名其妙地感到疲倦，并长期发烧，精神也因之格外低落。很快，后来经诊断证实，这些都是肺结核的典型症状。5 月中，时已重病缠身的乔治经过漫长的跋涉回到了东部。他在新泽西州他另一个姐夫家中与他的妻子和小儿子汇合。这个姐夫是名医生，他收留了他们一家并照料着这个垂死之人。而欧文则在圣路易斯留了下来。乔治·费雪坚持让他在那里读完高中，并在那里参加大学入学考试。1884 年 7 月，欧文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拿到了耶鲁的奖学金。等到他与父母和弟弟重聚一堂的时候，父亲已经奄奄一息。他抛下了一个身无分文的遗孀，一个十岁大的孩子，还有年方十七的欧文。

看起来大学学业不可避免地要被推迟甚至可能要被迫全部放弃，这让欧文极度失望，也让他的丧父之痛雪上加霜。他能看到的唯一一条出路就是回密苏里去，在他同学家的农场上找份工作。去年夏天他就曾在那儿干过。

这时，属于他的一份遗产被发现了：他父亲曾在皮斯德尔的一个朋友那里投资了五百美元，并指定用于欧文的教育。如果欧文同母亲和弟弟一起租住在耶鲁旁边的一个有三个房间的公寓，他母亲可以将第二个卧室转租给其他学生，他还可以当家教赚钱。这些再加上他

的奖学金和父亲的那笔遗产，刚刚够他按原计划在1884年秋在耶鲁入学。

维莱德·吉布斯，这位美国的第一位大科学家曾经指出：如果由人民大众来管理这个世界，那他们肯定会需要很多指导。在那个年代，没有几个职业必须要求有大学的教育水平，而面对四年中被耽误掉的工资收入，当时的年轻人中只有百分之二的人能够泰然处之，而其他人则根本无法承担。但到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越来越多来自小城市的美国孩子都“渴望摆脱童年带给他们的自卑”，他们将上大学当作一条极具前景的逃脱途径。在美国新型的工业化都市化的经济体系中，工程师、会计、律师、教师，更不用说企业的新型管理人员，他们的机会都在一天天成倍地增加。这些职业不再像从前一样，只是一些漫长没有保障而且艰苦的“赚钱的苦差使”，它们已成为出人头地的一条重要途径。[23]

在耶鲁，家里有钱的学生比比皆是。因此，金钱的社会价值在这里便被大大贬低。对费雪这类家境贫寒但志存高远的年轻人而言，这是非常幸运的。在这里，要想有名气和声望，你得具备如运动员、演说家、辩论家、幽默大师或大学者一般的才能。费雪在大学里十分刻苦，他在低年级辩论表演赛中的表现让旁观的教师们无不为之倾倒，他还获得了他梦寐以求的数学和其他学科竞赛的奖金。在他所在班级的一百二十四名学生中，他得以第一个毕业。[24]但是，当他开始对有名的秘密社团“骷髅会”[①]产生兴趣并打算加入时，他大学生涯的顶峰也就到了。

女诗人弥瑞尔·卢奇瑟曾在她为维莱德·吉布斯写的传记中说，那个时期的美国是“新兴科学的季节”。[25]在整个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的科学实践活动来了一次总爆发，整个社会对科学技术的兴趣也出现了全面提升。查尔斯·达尔文，赫伯特·斯宾塞，阿尔弗雷德·华莱士，这几位独立发现了物竞天择进化论的人物在美国家喻户晓；动物园和自然历史博物馆在各地纷纷普及开来；科幻小说也诞生

① Skull and Bones.

了；爱德华·贝拉米在《回顾2000—1887》一书中领着读者提前进入了2000年的波士顿，书中描绘了一个使用留声机、信用卡和收音机的黄金时代。[26]新兴的职业社团、科学刊物和实验室如雨后春笋般大量地涌现。同时，大学教育也不再是教年轻人如何阅读典籍，它的重点已转变为替社会培养拥有科学和技术的工人。在费雪高中毕业那年，布鲁克林大桥竣工通车，这标志着科学拥有改造社会的巨大力量。大型企业的诞生，创业者巨额财富的出现，加上铁路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这一切使得寻求新的“主宰性的工具”的努力蔚然成风。[27]在普通大众的眼里，科学越来越被视为一条发家致富的途径。同时，它也是治愈贫穷、疾病和愚昧等众多社会问题的一服良药。

吉布斯是耶鲁的“伟大人物”之一。他是物理学家兼化学家兼数学家。他第一个成功地将热力学第二定律应用于化学；费雪在耶鲁读本科的时候，耶鲁的教师中只有吉布斯一人在牛津和柏林两所大学中都享有知名度。他曾说过，科学家的作用在于“要探索出理论和规律，从而使看似复杂的事物变得至简至易”。[28]他大力倡导科学的数学化。数学是一门通用的语言，同时也是一种分析研究的工具。所以，数学能在世界范围内帮助科学家们交流思想，正如同拉丁语在过去几个世纪以来为植物学家和人体解剖学家所做的那样。

吉布斯在教职员会议上几乎从不发言。有一次，人们就数学是否可以替代拉丁语和希腊语作为耶鲁必修的古典语言之一展开了激烈辩论。辩论快结束的时候，他站了起来，很有礼貌地咳了咳。他一边走出房间，人们听到他一边在嘴里嘟嘟囔囔：“数学当然是一门语言”。[29]

到了毕业那年，费雪觉得自己已称得上是一名“数学家”，但他还有更多的追求。“我想了解哲学和宗教的全部真相。”[30]他并不想像他来自圣路易斯的好友威尔·艾略特一样去当一名牧师。在不同的阶段，他曾先后想过要投身法律、铁路、公共服务，或是科学事业。“我想干的事太多了。我总觉得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干所有我想干的事情。我想读很多的书。”他在一封给艾略特的信中写道，“我想写很多的东西，想赚很多的钱。”[31]但最终，费雪选择了追求“科学上的财富”。

进步时代的美国经济学一般被描述成是与英国的群体主义和福利

国家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的。除了少数包括托斯丹·凡勃伦[①]在内的所谓“制度学派”对商业社会极为不满之外，学术经济学应该一直都在被社会达尔文主义所垄断，他们鼓吹自由放任，为了维护富裕阶层而不惜践踏穷人的利益。

而事实却远非如此。全美经济学会的每一位创始人几乎都在德国的柏林、哥丁根或慕尼黑受过教育，他们都深切认同德国“历史学派”的价值观和世界观。该学派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不受限制的竞争，同时也是福利国家的大力鼓吹者。在耶鲁讲授政治经济学的阿瑟·哈德利[②]就曾经挖苦美国的经济学家们是“一个庞大而有影响力的群体，他们所做的只不过是政府职能的延伸”。[32]耶鲁经济学系也不例外，除了一个人，那就是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为了提醒人们，当代的一些政治标签，如保守派和自由派，左派和右派，已不再适用于十九世纪的知识分子，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达特曾经问萨姆纳：“在人类整部思想史上，究竟有没有存在过绝对进步的保守主义思想？”[33]萨姆纳的父母都是从英国来的移民，他们分别是圣公会教派的牧师和工人。而萨姆纳却成了一位政治经济学家，同时他也是美国首位社会学家。他生活朴素，语多讽谑，花白的头发从来都修剪得一丝不苟。萨姆纳在他四十多岁的时候通过自学掌握了“两门斯堪的纳维亚语、荷兰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俄语和波兰语”。由于他的自由主义观点，他将“纽黑文变成了一个宣扬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讲坛”。当时，人们对他讲座的评价是“固执己见”，还说他的举止“冷漠”，声音非常“刻板”[34]。但他感情充沛的演讲和他对不同观点的大胆支持使他仍然成为了耶鲁最受欢迎的讲课者。

萨姆纳是查尔斯·达尔文和赫伯特·斯宾塞二人的忠实信徒。他不仅反对扩大政府职能，而且还反对私人性质的慈善救济行动。他的经济学观点彻头彻尾地被马尔萨斯化，也就是说，极端的悲观；和马尔萨斯、李嘉图和穆勒一样，他对所有人为的促进社会发展的措施都持否定态度，他将它们统统贬称为骗人的万灵油，愚蠢之至，诡辩或

① Thorstein Veblen（1857—1929），美国经济学家、制度经济学鼻祖。

② Arthur Twining Hadley（1856—1930），耶鲁大学校长，1899年至1921年在职。

者是“假公济私”。然而，面对现状他也并非是一个墨守成规之人。萨姆纳曾经受过职业牧师的培训，因此，他对战争和社会福利持同样的谴责态度；他支持工会罢工，同时也捍卫安德鲁·梅隆拥有万贯家产的权利；在对职业妇女赞不绝口的同时，他对自由贸易也作出过高度评价。出于神学上的动机，耶鲁的校长曾经试图禁止他使用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作为教材，而他则以辞职相威胁作出了回应。在韦伯夫妇来耶鲁访问的那段时间里，萨姆纳正因为他对门罗主义和美西战争的公开谴责而激怒了众多的耶鲁共和党校友，他们一致要求将他开除出校。

据费雪的儿子欧文·诺顿·费雪说，费雪选修了萨姆纳开授的所有课程。他从数学家或是实验科学家的角度来接触经济学，他曾在艾略特面前称自己为“你冷静的分析加数学型的朋友”[35]。萨姆纳将他领进了经济学的大门。不久，他便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一个具备科学家素养的人，即冷静客观、有分析能力、有数学头脑的人，在这一领域将大有可为。

1890 年春，费雪就一篇论文的选题向萨姆纳请教。其时，萨姆纳本人的兴趣已从古典政治经济学转移到了“社会科学”上。萨姆纳正沉迷于生涯晚期在语言学习上所作的超凡努力。收集人种学资料也占据了他的很多时间，他希望在社会学方面能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出于这一考虑，他建议费雪选择数理经济学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在当时，数理经济学还是一门新兴学科，大多数老一辈的经济学家，包括他自己在内，都尚未具备掌握它的学术和技术能力。他借给费雪一套威廉·杰文斯[①]的书，该作者是从边际变化的角度来研究消费者行为这一新方法的先驱之一。

当时，为了使其各自的领域更加科学化，众多胸怀大志的人文主义者都争先恐后地操起了科学这一特殊工具。在同一年，刚从欧洲回到美国的心理学家兼哲学家威廉·詹姆斯，在给朋友的信中曾说，“在我看来，将心理学当作一门科学的时机也许已经到了”[36]。而费雪早已

① William Stanley Jevons（1835—1882），英国边际学派的创始人。

将数学视为一种可在全世界通用，可以用来促进思想交流的媒介。现在他将有机会像吉布斯为化学所做的那样，为政治经济学打下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这一前景令他憧憬不已：

> 一名工程师要想能胜任修建布鲁克林大桥这样的工程，要想获得在桥上宣布工程完毕那样的荣耀，他首先要深入研究数学、力学、应激学说、绳子悬挂时所呈的自然曲线，等等。因此，在将政治经济学应用于铁路运输费率，应用于信托，并且用它来解释当前面对的其他危机之前，最好是能先开发出一套完整的政治经济学的概括性理论。[37]

简单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与对它持反对意见的社会主义者都将竞争视为现代经济最为突出的特征。市场运行机制在他们看来与自然界的丛林法则殊无二致。但和马歇尔一样，费雪对家庭、企业和政府这些高度独立的经济主体更为感兴趣。同时，他也看到，一个既定事业可以经由多种不同的渠道以达到其最终目标。

费雪偶尔会从纽黑文去纽约。有几次他参观了那里的股票交易所。在此之前，在读萨姆纳给他的书时，证券交易市场的运行方式便已深深将他吸引。尤其让他印象深刻的是，经济学家们显而易见是从古典力学中借用了大量词汇。他们谈到了各种“力”，“流动”，“膨胀”，“扩张”还有“对立”。但据他所知，还没有人尝试过设计一个真正的模型来概括这一过程。而借助于这样的模型能使“美妙而复杂的平衡成为现实，虽然这种平衡是从这座伟大城市的交易所中宣告产生的，但它的成因和影响却远非这座城市的范围所能限量。”[38]

马歇尔曾将现代经济学比作“研究推动器”，他并且还曾用图表追踪外界影响对单个市场所起的作用。二十三岁的费雪满怀一位年轻天才的热忱和天真，他决心要构建一个能涵括整个社会经济的数学模型。他渴望能找到一些线索，从而发现市场中供求平衡状态下的价格是如何被“计算”出来的。作为一个讲究实用的美国人，他还希望这个模型不仅仅是一堆数学符号，而且还能迅速地为人们提供数据解答。数

学模型的工作刚刚开始，他便决定要用液压装置的方式建造一个模拟方程式和所有变量的实体模型。终日在实验室里埋头做琐碎重复物理试验的人也许会觉得这个模型同鲁布·戈伯格[①]描绘的那类机器如出一辙，看上去会非常直观，但却从没人想过要这样去做。

费雪的论文初稿完成以后，他将原稿拿去请吉布斯过目。对于费雪想要达到的目标，以及他已取得的独创性的成就，吉布斯都一目了然。在费雪的模型中，一切事物都具有相互依赖的关系。每一个消费者对某件商品的需求量取决于他对其他商品的需求。费雪承认，他这个由水箱、活塞、阀门、杠杆、天平和凸轮组成的庞大装置“充其量也不能说完全”反映了“纽约和芝加哥”交易所的状况，但他却丝毫不以此为憾。“设想充分完美的前提在任何科学中都是不可避免的。”这位博士研究生在他的论文中写道，“物理学家们从未就宇宙中某一个单独现象作出过彻头彻尾的解释。他只不过是在估计，经济学家也不应期望过高。”[39]

这个新奇的实体装置能让人直观地认识在决定价格的过程中起作用的各种因素。同时，人们还能将它“作为发现复杂隐秘的互联关系的一个工具”。比如，你可以用它观察到，外部因素对某一个市场供求的突然刺激对与其相联的其他十个市场的价格和生产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所有市场的商品价格和数量会有什么影响，以及它对收入和不同消费者对商品的选择又会有何种影响。费雪的液压装置是用大量方程式构建模拟预测模型的最早尝试，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人们开始用大型计算机主机来构建这类模型，今天的大学本科生们依靠它在笔记本电脑上就能算出一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费雪的原始模型在一次送展途中被毁坏了。1925 年又原样仿制了一个。唉，可惜的是，现在这两个模型都已不知所终。

费雪的论文是在 1890 年夏天写成的。他在论文中附带了大量令人目不暇接的测绘图以及所援引的书目，这充分展示了他对使用数量分析方法的极大热忱。经济学家保罗·萨谬尔森称费雪的这篇《价值和

① Rub Goldberg（1883—1970），美国漫画家，发明家。

价格理论的数学分析》为“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博士毕业论文”[40]。论文发表以后，《经济学杂志》对它的评论是天才之作。该杂志是由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和新近成立的英国经济学会的其他成员共同创办的。评论员弗朗西斯·伊西德罗·埃奇沃思[①]是牛津教授，也是数理经济学的奠基者之一。他这样写道，“我们至少可以这样预言，费雪博士使纯经济学理论的基础变得更加深厚和坚实，他所作出的贡献将是不朽的。”[41]在其《经济学原理》第三版中，马歇尔本可在其他学者所作的贡献方面惜墨如金的。但是，他却多达三次在书中高度评价了费雪所作的“调查研究”，他称其为“杰出”，并且将费雪与“德国和英国最深刻的思想家们”相提并论。[42]

费雪对经济现状的看法，尤其是他对诸多因素之间互相制约互相联系的了解，对他在其他领域内的思想观点也影响颇深。在获得博士学位前夕，他读到了一篇投往耶鲁政治科学俱乐部的论文，文章的作者建议成立一个能代表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国际性组织，而该组织应以和平解决国家间的争端为宗旨。据历史学家芭芭拉·塔其曼称，成立维持和平联盟的灵感就是来自这篇论文，而后来，威尔逊总统成立国际联盟的主意又是从维持和平联盟的基础上产生的。[43]

时至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自内战结束以来，曾经繁盛一时的铁路、采矿、土地业已逐渐停滞不前，这便使一些岌岌可危的金融问题暴露无遗。在1893年的大恐慌和股票市场崩溃之后，美国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为严重的经济大萧条接踵而至。而在费雪给他的朋友威尔·艾略特的信中，他却很少提及这场灾难，这就如同简·奥斯汀在她的小说中从未谈起过拿破仑战争一样。也许他的原因与那位小说家的颇为相似：在那段时间里，他的全部心思都在爱情、求婚和结婚这些事情上。

费雪将回皮斯德尔的行程一推再推，一直拖到现在。这非常符合他的个性。因为那个地方既有他童年的幸福回忆，也饱含着他青年时期所经历过的屈辱。而如今他可以衣锦还乡了。当初离开的时候他才

① Francis Ysidro Edgeworth（1845—1926），英国统计学家，数理统计学的先驱。

十三岁，而且毫无幸福感可言，而现在他回来了，全身还笼罩在“耶鲁功成名就的奖金获得者、演说家、教师和数学教授”的光环之中[44]。就像维多利亚时期三部曲小说中的主人公一样，他此行的目的就是要将富人家的千金小姐娶过来，或者，因为这是在美国，将他老板的闺女娶过来。而后来，事情的进展绝对是如有神助，费雪一眼都没有看完就同一个自己儿时的玩伴，玛格丽特·哈泽德一同坠入了爱河。人们也称她玛基。

玛格丽特·哈泽德非常幸运，她一直有一个稳定舒适的家庭环境。她性格恬静，为人温柔可亲。她有一个做学问的姐姐，而玛基本人却是更富于想象更母性化的那种类型。她对欧文的感情可以称得上是坚如磐石，从未动摇。在他尚身无分文的时候，她已经是一个富裕的女继承人，但她却始终坚信，有了他，她便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他们于 1893 年 6 月成婚，皮斯德尔全城出动，所有人都目睹了他们的结婚典礼并参与了庆祝。有不下三名牧师参加了他们结婚誓词的宣读仪式，婚礼用的蛋糕重达五十磅。在当时每天都有企业倒闭和银行挤兑发生的日子里，这种穷奢极欲的消费方式为他们招来了一些流言蜚语。于是，这对新郎和新娘干脆悄悄去了纽约，他们登上了一艘远洋客轮前往欧洲，开始了他们长达一年的新婚蜜月。[45]

“所有受过教育的美国人，不管是第一个还是最后一个，全都要到欧洲去。”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曾这样酸溜溜地说过。有钱人是去那些必须到此一游的各国首都来一次“大型巡回游览”，而学术追求者们则是去各大学进行“大参观”[46]。1893 年到 1894 年间，在乘坐火车在英国和欧洲大陆之间来回穿梭了数趟之后，费雪发现对他来说，同经济学领域内几乎每一个声名显著的同仁进行交流已成为可能。“他的那本小册子……为他在欧洲开辟出了一条通道”，并且已使他顿时跻身于世界经济思想家的行列。在维也纳，他曾同奥地利经济学的奠基者卡尔·门格尔共进午餐。在瑞士洛桑则同里昂·瓦尔拉斯[①]一起吃过

① Léon Walras（1834—1910），法国经济学家。

饭。瓦尔拉斯最出色的学生，维尔弗雷多·帕雷托也在一旁作陪。在他们用茶时，帕雷托的夫人居然燃起了一支香烟，这让费雪目瞪口呆。他还在牛津大学作了停留，以便能同说话结巴且心不在焉的伊西德罗·埃奇沃思互相切磋。他还去剑桥行朝觐之礼，以表达他对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敬仰之情。马歇尔刚刚出版了他的《经济学原理》，此书一举奠定了他在世界经济学界的领袖地位。

虽然旅行的日程安排极其繁忙，但他还是抽出大量时间出席了数学家亨利·庞加莱[①]在巴黎和德国物理学家赫尔姆·霍茨在柏林的讲座。当北欧气候变冷，不再适合他已经怀孕的新婚妻子时，他便雇了一名学生帮他做笔记，然后启身前往法国东南濒临地中海的里维埃拉。他在阿尔卑斯山中独自徒步旅行。湍急的水流从高处飞泻在岩石上，然后又在其下汇聚成一湾清潭。当他目睹这一情景，他便有了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和亨利·詹姆斯笔下的众多小说人物一样，欧洲的经历让他认识到："在这里我认识到一件事，那就是，我现在知道的并不多，将来也不会多到哪去。"[47]然而，在听完费雪在牛津的发言之后，埃奇沃思对陪同费雪一起前往的夫人玛基说，"费雪教授的进步真是令人刮目相看啊。"[48]

费雪和妻子回到纽黑文的时候，考虑极其周全的哈泽德一家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一座崭新的别墅，里面家具用品应有尽有。但此时，整个国家的形势却极为严峻。到1895年为止，已有超过五百家银行倒闭，有一万五千家公司宣布破产，因为失业的影响，每七名工人中便有一位在无所事事。[49]那些火花迸射的锅炉和大型纺织厂依然矗立如故，庞大的铁路网仍然拥有吞吐货物的巨大能力，广阔的草原上依旧被丰收的小麦和玉米点缀得一片金黄。然而，在这番美景的背后却出现了饥荒。"在过去几个月里有那么多人被饿死，这在我的记忆中还从未见过。"泰尔美其牧师[②]在他教区的集会上曾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报纸上老是在报道，这里发现死了多少人，那里死

① Henri Poincaré（1854—1921），法国数学家。

② Reverend T.De Witt Talmage。

了多少人，而验尸报告指出他们都是饿死的。”[50]

仇“富”情绪在社会上日益普遍。大北方铁路公司创始人詹姆斯·希尔在给朋友的信中就曾写道，“最近以来，全国人都在将注意力集中到社会问题上……在过去的十年中人们关心的话题一直是‘铁路、垄断和信托’，而现在却突然变成了‘一无所有的人与颇有家产的人之间的对立’”。[51] 同一年，查尔斯·达奇的音乐剧《财富的战争》在百老汇进行了首演。

大萧条使长期存在的社会与政治危机愈加激化。而这些大多并非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虽然1894年曾发生过“普尔曼”卧车工人的罢工，但自那以后罢工的次数都一直在逐年下降。如今更多的是存在于不同地域之间的矛盾，是不同产业代表之间的矛盾，以及小型企业和大公司之间的矛盾。西部的银矿工人将金属价格的下跌归罪于身居华盛顿的政客。而农民则认为东部的银行家和铁石心肠的铁路垄断巨头是导致他们债务缠身的罪魁祸首。在所有的基层民众当中，农民的愤怒最为强烈。经济繁荣的时候，他们没沾多大光，但如今的萧条却将他们推入了绝境。随着物价普遍降低，小麦、玉米和糖价下跌的平均幅度要比其他商品高出两到三倍。凡是与农业沾点边的人现在都个个债务缠身，他们饱受高利率的压迫，而且还被时时笼罩在破产清偿的阴影之下。

1896年的总统大选让人们有机会就国家的经济走向进行公投。民主党时任总统的格罗弗·克利夫兰[①]被自己所属的党派抛弃。威廉·布莱恩，这位民主党推出的候选人向西部选民们作出保证，“他将推行铁路国有化，清除关税，最重要的是，他将把他们从金融暴政中解救出来。”他将东部的银行家称为“一群世界上最铁石心肠最寡廉鲜耻的投机者”和“金钱垄断者”。[52] 而他的反对者也以一长串骂名回赠他，比如无政府主义者、本尼迪克特·阿诺德[②]、反基督者，还有“口若悬河的政客”等等。[53] 而他在共和党内部的竞选对手则是由詹姆斯·希尔等企业界大亨一手挑选出来的威廉·麦金利。

大选前六星期，威廉·布莱恩已将华尔街钉在了他的金十字架上。

---

① Grover Cleveland，美国第22任和第24任总统。

② Benedict Arnold，美国革命初期著名的叛国保皇派。

他把总统竞选的战火燃烧到了金钱与势力的杰里科[①]的城门口。在耶鲁大学秋季开学的第一天，这位“伟大的普通学生”与上千名本科生和教授见面了。他魁梧英俊，头发乌黑，头戴黑色呢帽，领下系着蝶形领结。他一上台，全场的嘘声和欢呼声立刻交织着响成一片。

他对台下的听众说，模糊不清的货币本位制是1896年大选的“首要问题”。他用深沉沙哑的声音对黄金本位制度进行了猛烈抨击，“因为它只肥了货币兑换商和货币拥有人，而其他所有的人都在挨饿”。他还说，1873年通过的采纳金本位制的法案禁止自由铸造银币，这导致了货币供应的枯竭。而这给这个国家最大的产业——农业所带来的危害远大于任何自然灾害。“如果你使货币变得越来越稀少，你便会使它越来越贵。”布莱恩对听众们说，“如果你让货币变得越来越贵，你就会造成别的所有物品的价值下降；而当所有物品的价值都在下降，你的日子就不好过了。”[54]

布莱恩认为，重振经济的唯一办法就是将美元维系在一个比黄金更宽泛的标准上，就是要让货币的价格重新变得低廉。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得到发展”。他谴责麦金利及支持他的一干“黄金民主党徒们”仍然顽固坚持现行民主党政府错误的“明智货币政策”。大萧条已持续了整整四年，而麦金利及支持“明智货币政策”的那些团体日夜担心的不是美国人正在遭受的苦难，而是通货膨胀率和伦敦货币市场的行情。对农民利益的任何危害就是对整个美国的危害，这包括农民所拥有的小型企业，从事农业的职业人士，工厂工人以及纽黑文的学生。如果实施银本位制“给企业带来的危害比金本位制还要快，那么朋友们，那就真是太糟了。”布莱恩对台下的人们说，“如果哪个党派在宣扬固守金本位制，那它就是在宣扬要将眼下的困难局面继续下去。”[55]

台下的学生们听到他提及共和党便开始鼓噪，哄笑，他们还一齐大声呼喊麦金利的名字。这时，布莱恩一反常态地发火了，他说，“一直以来，我只习惯同那些自食其力的年轻人交流”，他大声喊道，“有些人从不会创造财富，他们只想去瓜分他人创造的财富并想以此成

---

① Jericho，古代迦南的城市，古代以色列人曾攻陷此城，体验到上帝的恩惠。

名，面对这种人，我真的是无言以对。”[56] 据当时在场的一个二年级学生回忆（但布莱恩自己否认），布莱恩接下来是这么说的，“这所大学中的一百个学生中有九十九个来自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有钱人家庭。”“九十九”这个词一出口，就仿佛击响了赛跑比赛发令的枪声。“九十九，九，九，九十九。”这些“九九”届的学生们顿时开始全体高呼口号，一直到将布莱恩狼狈地赶下讲台，而留下这群货币兑换商们依然统治着他们自己的殿堂。[57] 次日，《纽约时报》随即进行了报道：“耶鲁拒绝听取说教；年轻的演讲人无法应付嘲弄的掌声和大学铜管乐队；他的发言不到二十分钟，便被轰下台去。”[58]

“我觉得，以前还从未有过什么能像反对银本位制一样激发出我在道义上的热情。”[59] 欧文·费雪在给好友威尔·艾略特的信中如此坦承，“社会科学尚不成熟……它要达到能治病救人的层次尚须时日。”[60]

费雪刚刚从耶鲁数学系转到政治经济学系，他这么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与当今的时代有更紧密的联系”。然而，在私下他却认为，政治经济学系里的人“狂妄得不可救药”。对于能否医治社会的诸多痼疾他们显得过于自信。此时，他的身材依旧苗条挺拔。有规律的慢跑、划船和游泳等锻炼使他保持了良好的体形，并拥有从不匮乏的充足体能。岁月流逝在他身上留下的唯一印记是他左眼的失明，那是一场不幸的壁球事故给他带来的后果。[61]

一直以来，费雪都没有十分强烈的政治信仰，但他逐渐发现，作为一位教授，“人们都期待他有自己的观点和意见。”[62] 他警告人们说，被误导的改革只会导致错上加错。民粹主义者在一本题为《改造世界的荒谬努力》的小册子中提出了若干改革措施，萨姆纳就曾对此表示过置疑。[63] 在 1893 年大恐慌之后的萧条年月中，费雪在给好友威尔的信中如此写道：

> “在社会改革方面，我觉得慈善家们过于迅速的实施救济总的来说是利大于弊。提倡进行社会改革的人们应该放弃“立刻开始行动”的想法，他们应该让我们耐心等待，直到我们对一切都胸有成

竹。与此同时，慈善活动应当局限在极小的范围之内，比如说教育。经验证明，在这个范围之内慈善的帮助是最有成效的……我们手头有这么多具体的事情需要改革，比如城市管理、惩办堕落、教育，等等。在这些“具体琐碎”的事情大部分完成之前，辛勤忙碌的人们不需要也不应该去就别的事情夸夸其谈。”[64]

但结果，费雪并未恪守自己订立的行为准则。1895 年 11 月，在美国经济学会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他的一些同道们“任意改窜货币的轻率态度”让他极度反感和震惊，他对支持自由铸造银币的观点提出了尖锐批评。“因为银是相对便宜的金属，因此实行金银双本位制的后果必然是货币贬值……一种制度既然自称要以考虑公平周全为基础，那它怎能以这样显而易见的错误和不公平走出第一步呢？所有诚实的人们听到重新采纳十五又二分之一比一兑换率的建议时都会觉得万分恐怖”。不出所料，他的这次演讲获得了反布莱恩阵营的赏识。费雪旋即加入了纽约改革俱乐部中的明智货币政策委员会，并正式投身于反布莱恩的阵营。[65]

货币政策究竟是怎样成为 1896 年总统大选的首要议题的，这还需要从头解释一番。在历史上，货币一直被人们视为权力的象征，人们都竞相追逐它；如同自然灾害和流行疾病一样，它总是给人以邪恶和神秘的印象；利息也从来都是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教义背道而驰的。而金融危机，无论是股票市场的崩溃，银行挤兑，还是过度通货膨胀，都更加深了社会对银行家的仇恨。这一话题始终笼罩在令人兴奋、迷信和情绪极其激动的气氛当中。

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民粹派的两派在辩论中都将自己这派选择的货币金属吹得神乎其神，而将他们对手的贬得一无是处。于是，丑恶贪婪的投机者成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文学作品中常见的戏剧角色，理查德·瓦格纳[①]的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中的尼伯龙根和安东尼·

① Richard Wagner（1813—1883），德国著名作曲家。

特洛勒普的小说《我们的生活方式》中的奥古斯塔·梅尔马特就是其中最早的例子。历史学家哈罗德·詹姆斯对此曾有过评论：

> 十九世纪讲述的那些关于整个世界的故事其实就是原罪论的世俗版本。众多思想家为这一不合理的制度开出的处方与路德[①]的改革难分彼此（当然是以世俗的方式）。消除所有遗留下来的罪恶需要强有力的公共权威。由于原来自然的社会群体已被各式各样的贪欲所摧毁，于是国家政府便应当让这些秩序和社区得以重建，并对资本主义强大的破坏力加以疏通和引导。为了避免马克思、瓦格纳和索尔兹伯里勋爵等人所预言的世界末日的到来，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66]

美国经济学家一贯比他们的英国同行对“货币问题”更感兴趣。这有其历史的渊源。一方面，美国人向来对中央政府拥有权力十分审慎，另一方面是因为在美国内战期间政府曾发行过不可兑换的美钞，二十年后这些美钞却可以兑换黄金。更令人不安的是，银行挤兑、金融恐慌、危机和萧条在以极其危险的高频率不断发生。英国金融作家白哲特[②]曾于1873年如此写道：

> “需要郑重指出的是，我们的产业机制不仅会遇到来自外部的毫无规律的变故，而且还需承受来自内部的有规律可循的变化。所有这些变化都会使我们的信用体系在某些时刻变得比平时更加脆弱。正是这种周期性出现的脆弱时期让人们觉得大恐慌是按预定的时间表降临的——大约每隔十年我们便会碰上一次。”[67]

面对传统的宿命论，一个满怀理想的年轻科学家发出了自己的反对呼声是完全可以想见的。他认为，真正的问题在于人们尚未对货币进行充分和长期的研究，人们必须对货币在经济事务中所起的作用有

① Luther，德国神学家马丁·路德于公元16世纪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

② Walter Bagehot（1826—1877），英国人，经济学家、政论家。

一个更好的理解，这样才能避免作出不合理的决定以及避免发生不必要的危机。

费雪在他 1892 年出版的博士论文中指出，“由于货币被用来衡量价值，所以它牵扯到了对经济价值认知的所有方方面面。然而，对货币的研究是如此之少，围绕着货币的神秘感是无数误解和误算的根本原因。”虽然他论文研讨的中心问题是供需交汇点的价格水平是如何确定的，但费雪首先是将货币当作一个度量单位看待。金本位是锁定货币价值最原始的方式。但甚至早在论文写作过程中，他便已开发出一个也许比金本位更好的办法。他发现，如果将以黄金为单位的美元的价值与某种消费价格指数联系起来，这样便可能会使价格保持稳定。费雪仅仅将平衡视为一个参考点，而货币的动荡在他看来却是导致社会动乱的诱因。他在《数学分析》一书中强调，“我们设想的理想的静态条件在现实中从来都不存在”，这也使他对“恐慌的存在证明了平衡的缺失”一说更加深信不疑。[68]

利息是拥有存款的人对让别人使用自己的资本所索取的价格。这也是一项实在而有价值的服务。而资本的价值转而却要由存款人和借款人对未来利息偿付金额的期待水平而决定。正是由于货币标准的价值波动导致了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而这二者又随心所欲地改变着人们的真实收入水平。这样的货币标准就如同一条可以伸缩的橡皮做的准绳，它并不是一个恒定的标准。它其实根本就不是由政客、黑帮或者华尔街的银行家们炮制出的阴谋。

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整个美国政坛充斥着围绕货币所进行的争论。费雪也正是经由这场争论开始接触到了经济学。他最为关心的是债权人和债务人是否能得到公正的待遇，以及难以预期的货币价值的浮动所导致的社会矛盾是否能够被避免。从事实上而言，单个的商人很难准确区分是他所卖商品的价格在变化，还是市场的整体商品价格在变化，因此他也就无从以此为根据来修改他的商业合同。普通市民们因为不懂得他们所持有货币的价值并非一成不变，因此他们常常将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造成的后果归咎于东方人、犹太人和外国人等替罪羊的身上。

美国是在英国、德国和法国之后实行的金本位制。在该制度下，一个国家的货币与一定数量的黄金挂钩，于是它自然也会与一定数量的别国货币挂钩。就把它想成是一个在全世界通用的单一货币，这种货币的存在对那些从事进出口贸易的人是极其便利的。堪萨斯的农民卖小麦给英国商人的时候，他们想收的是美元，因为需要用它来支付工资、铁路运输、种子供应商等费用。于是，英国商人不得不拿英镑去购买美元。很显然，对英国进口商而言，单一货币的另一最大好处是一英镑能够兑换五美元。

但不幸的是，固定货币汇率并不像许多人以为的那样能将货币以国内商品价格衡量下的价值固定下来不变。事实上，在美国将美元与一定数量的黄金挂钩以后，美元在国内的购买力曾经有过高达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百的波动。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世界范围内的黄金短缺使美元的价值急剧上涨，从而导致严重的通货紧缩。一场激烈的辩论也由此在固守金本位和回归银本位的两派之间愈演愈烈。

因为从事土地投机，并常常以抵押贷款的方式进行土地买卖的融资，所以美国农民通常属于债务人一方。他们认为，由于货币发行量被局限在与之挂钩的黄金的数量水平，这便使货币供应受到了限制，从而导致利息率上涨，农作物价格和农业收入也便随之下降。这就意味着，与债务达成时农民和银行所预期的相比，现在必须以更多数量的玉米、小麦和棉花才能偿清或者维持同样数额的债务。在密苏里的圣路易斯生活的两年期间，费雪与当地农民的孩子交往密切，而且在大学放暑假期间他还在他们的农场上打过工。这些都使他对西部农业有了第一手的了解。

在 1896 年威廉·布莱恩总统竞选期间，呼吁开放银币制造的运动发展到了顶峰。而费雪为捍卫金本位所作的努力也毫不逊色。他取名为《货币增值与利息》的专著刚刚出版。对他而言，保证分配公平是问题的关键。银本位的支持者们宣称，通货紧缩牺牲了债务人的利益，而让债权人变得更加富有；费雪并不否认这一点。然而，这并不妨碍回归银本位制在整体上仍然是一个错误立场。他指出，事实上（回归银本位制后的）利率下降完全会被他们所欠债务实际价值的上涨而抵

消掉。布莱恩的竞选努力最终遭到了失败。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他发表“黄金十字架”演讲的那段时间前后，金矿的发现以及其他方面的发展使得黄金的供应水平急剧上升，这使货币的供应量得以扩大。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直为祸社会的通货紧缩现象终于寿终正寝。美国最终也无需放弃已经开始实行的金本位制度。

年方而立的欧文·费雪已出版了数本书和专著，并成为了学术界的后起之秀。同时，他的家庭成员也在逐渐增多。他身形矫健英俊，与十年前相比，他的精力更加充沛。他经常骑车、散步和举重。游泳是他最钟爱的运动，无论是缅因州冰凉的水温还是玛格丽特为他安全的担心都不能阻止他在夏季到水中去畅游。

1899年8月，费雪在他们度夏别墅的海边游泳时险些溺水而亡。在接下来的数星期里，他出现了浑身疲乏，持续低烧，情绪抑郁等症状。这些很明显正是害死了他父亲的那种疾病即将出现的前兆。三十一岁生日刚过，也就是在他被提为正教授之后不久，他被诊断出了肺结核。这无异于宣判了他的死刑。

历史学家凯瑟林·奥特曾说过，肺结核就是十九世纪的艾滋病。在二十世纪最开始的那些年里，在大城市中，三起死亡中便有一起与痨病有关，而这种“白色瘟疫”[①]的主要受害者是年轻的成年男性。该病的发病过程非常可怕，而患者的治愈率也极低。一旦被诊断出患有此病，患者们最怕的就是失去工作和与外界隔离，但谁都对此束手无策。曾有人写道，大夫在通知病人他患的是肺结核时，他不如干脆再加上一句，“愿上帝宽恕你的灵魂”，因为在大夫看来，他已经与死人无异。[69]父亲临死前的情景费雪至今还历历在目，身体萎缩，骨瘦如柴，双耳完全失聪，除了几滴牛奶，任何食物都无法下咽，甚至几乎不能开口讲话。乔治·费雪在这种痛苦的状态下苟延残喘了几个星期。他去世时年仅五十三岁。

通常的治疗方式是靠静养、新鲜空气和充足的营养。而“精神疗

① White Plague，肺结核病。

法”则认为，该疾病的根源来自现代生活带给人的沉重压力。这种观点与当时痴迷于日本和中国文化的社会时尚不谋而合。“精神疗法”的医师们极力促使患者担负起维护自己健康的责任，并且鼓励他们“摒除杂念，调息静心，这样才能领悟上帝、人类和其他一切力量的真谛”[70]。这是一个“积极思考”的时代。费雪在当地一所男生学校演讲时，曾如此阐述自己的人生哲学：

> “世上的伟人们绝大多数都有超强的精神和自治能力。拿破仑就将他自己的大脑比成一个有很多抽屉的柜子。他拉出一个抽屉，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又把它关上，然后再拉开另一个屉子；银行家约翰·摩根先生据说也有类似的自我控制方法……我们所说的一个人的一生，其实不过就是一条源源不断的意识在流动，就是被允许进入他大脑的那些形象在逐个显现……我们完全有能力决定和选择自己想要的意识，从而按照自己的期望来培养自己的品行。”[71]

在接下来的六年中，费雪一直致力于改善健康，同时他也试图将自己的体力和精神状况恢复如初。他在位于纽约萨拉纳克的阿德隆戴克乡村肺结核疗养院住了将近半年。这家医院由爱德华·特鲁多医生主持，它以疗养别墅的形式依山而建，德国小说家托马斯·曼在《神奇的高山》中曾对其有过细致的描写。在来此之前，孩子们被送到了外公外婆家，而玛格丽特则陪同他一道来了塞拉纳克。他们买了一件浣熊皮大衣，还有一本约翰·格林利夫·惠梯尔的长诗《雪界：一首冬季田园诗》以供朗读。“大夫们完全相信我能够康复，不过这尚需时日”。1898 年 12 月，他在给威尔·艾略特的信中说，“此刻我正坐在屋前的门廊上，温度计显示这里是二十（华氏）度，雪有两尺来深，我发现写信用的钢笔墨水都已经冻住了，所以我只好改用铅笔。”[72]1901 年 1 月，医生通知他说，他的身体已经全面康复了。然而一直到三年以后，他的精力才完全恢复到病前的水平。

费雪从肺结核的魔掌中挣脱了出来，这使得隐藏在他心底的传道

欲苏醒了。他成为了一名公共健康事务的改革家。他大力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心智控制，他认为他的康复就是拜这二者所赐。战胜肺结核的事实让他坚信，一些看似匪夷所思的事其实是可以实现的，比如到2000年，人类的平均寿命也许能够在1901年的水平上翻上一番。在与“健康生活”的提倡者约翰·凯洛格医生会面时，费雪对他说，“他的确是在上下求索，但他却并非像庞塞·德莱昂[①]一样在寻找什么不老泉，他寻找的是能帮助人们延长和享受青春的方法。”[73]在凯洛格医生的影响下，费雪开始以耶鲁的运动员为对象进行素食试验。他申请了在史密森尼博物院当秘书的工作，并且为组建一个内阁级别的卫生健康部门而四处奔走。1908年麦金利总统遇刺身亡，接任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而费雪旋即被新总统任命为国家保护委员会的成员。“保护”这一观念“重在强调我们对子孙后代应承担的义务”。他指出，在美国，当人们享受着眼下丰富资源的同时，他们很难意识到“他们其实是在肆意挥霍本应属于子孙后代的物质资源。”[74]

1906年，即旧金山大地震的同一年，费雪宣称“理性的经济人”这一概念已经不再有任何作用，同时，经济上自由放任的政治理念也已经走入了一条死胡同。在美国科学促进协会的一次全体会议上，他发言指出，赞同实施政府立法和福利措施是“五十年来经济学观点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75]他说，自由主义者信奉个人是自我利益的最佳裁决者，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同时也会带来全社会利益的最佳化。但历史经验证明，这种观念是错误的。政府立法和自愿的改革运动（NGO[②]在十九世纪的雏形）不仅没有害，而且是必需的。他接着说，他们确实已为保护自然环境和改善公共健康作了大量工作。他还声称，如果在萨姆纳的放任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二者之间他必选其一的话，他宁愿选择后者；他还列举了众多符合个人利益但并不一定符合社会公益的例子。因此，自由放任的政策并不正确。

---

① Ponce de Leon（1460?—1521），西班牙探险者。

② NGO，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非政府组织。

费雪于1906年出版了《资本和收入的本质》一书。该书显示出费雪对于“资本其实是一系列于将来提供的服务”的理解愈加深刻，而且他对保护事业的兴趣也日益浓厚。费雪坚信，随着城市化、经济分工和全球化的加深，社会的经济联系也会变得日益紧密，这意味着对政府所提供的资讯、教育和协调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大。他指出，从长远和未来的考虑出发，干预和保护都是必行的。由于曾经有过与死神擦身而过的经历，他对提高经济效率和制止浪费的关注尤为急迫。佩里·梅林，这位研究经济思想的历史学家曾说，费雪对“利息”，包括利润、租金和工资等的定义是，凭借过去积累起来的机器、土地和人力资本所提供的一系列服务所具有的价值。他的这一观点显然受到了被称为“当代的亚当·斯密”的约翰·雷的影响。佩里·梅林认为，费雪提倡的所有改革，不论是延长人类寿命，还是制止经济萧条和战争，都是以增加当前国家财富为宗旨的。[76]

今天的经济学家们常常把有限理性、外部效应和市场失控挂在嘴上。而费雪在当时谈论的却是愚昧无知和缺乏自制。更为激进的是，他甚至还指出，即使每一个个人都能以完全理性的方式行事，他们所有行动的综合体仍然可能对集体的利益造成损害。“如果让每个人都自行其是，那么他们一定能最好地照顾到自己的利益。这种观点不仅是错误的，而且，那种认为每个能自行其是的人都能最好地照顾到社会公益的观点也是极其错误的。”[77] 他解释说，无知的一种特殊形式便是将今天的情形视为不变的固定模式。他认为，目前的人均寿命应该还能被延长一倍；生产力也只达到了其潜力一半的水平；他最令人感兴趣的发现是人脑有时会被一些诡像所迷惑。他将之称为货币幻觉。在费雪看来，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以及价格方面的所有变化，都是罪恶的，因为它们诱使人们做出错误和糟糕的决定。在整体经济这个层面上，货币幻觉意味着人们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能适应价格和利息带来的变化。

现代人并非理性的经济人，并非运算严谨周密的机器。在这一认识基础之上，费雪得出了两个结论。第一，实行义务教育势在必行；第二点更为重要，即必须以立法的形式，无论是为出租屋制定的防火

法规还是禁止赌博、酗酒和毒品的命令，对个人行动加以规范和控制。“不负责任的父母将自己对教育的错误态度强加于孩子身上，这是正当的吗？绝对不是。所以，童工这种现象，并不像有些人曾经认为的那样，只是个别人的问题。事实上，它与整个社会都有着十分重要和深远的关系。”[78]

费雪在深刻剖析自由竞争制度的缺陷方面比马歇尔走得更远。由此他也提前预见到了经济理论在二战之后的整体发展趋势。“即使在政府无法干预或政府干预不可取的时候，我们仍然有理由通过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施加影响，从而使生活条件得到改善。而社会争论也将应运而生。”[79]

即使每一个个人都绝对理性，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也并不一定会累积成对社会公益最为有利的结果。他指出，“个体行为无论如何也不会提升到建立城市公园体系，或者建立道路交通体系这样的高度。”因此，他对斯宾塞提出的将货币供应私有化的主张予以了严厉驳斥；而且，他对“那些更令人震惊的呼吁将政府的警察职能也移交到私人手中的建议”也严加斥责。“那些人认为，警察机构应该简单地由市民自发组成的警务委员会组成，就像早期存在多种消防队伍的那种模式。这些队伍之间的竞争将使其服务水平大大超过政府警察所提供的服务水平。”[80]

在费雪大病痊愈之后，他的创造力进入了一个高度勃发的阶段。在这五六年时间里，他将他被迫离群索居时萌生的思想都尽情倾泻了出来。那些思想深深打上了印度哲学和冥想修炼的烙印。

> “昨夜黄昏，我像一个印度人一样坐在户外，我摒除一切意念。我感受到了宁静和宇宙的力量……三年多来疾病带来的抑郁、恐怖和焦虑在我的潜意识中留下了深刻印象，至今仍残存于我大脑的记忆之中。但我希望它们永远深埋在记忆深处。之所以能战胜疾病带来的忧郁和癫狂完全归功于我作出的艰巨努力和运用了自我提醒的方法……我必须承认，患病一年后我终日笼罩在恐惧之中……积极的人生态度并非只是渴望知道世上都有什么样的恶

魔存在，或者我们对将来有着什么样的憧憬。一个人，他可以认为这个世界并不幸福，他可以认为这个地球会越变越冷，直至他死去，他甚至可以认为他注定要遭受痛苦，注定要失去他的朋友、荣誉和财富——但他却仍然可以是个乐观的人。”[81]

1907年的大恐慌对金融市场的影响持续了很长时间。当时，费雪正急于完成他的一本新书——《利息理论》。他为该书拟的副标题是《它的本质、决定因素及与其他经济现象的关系》。

在书中，他针对缺乏预见首次明确地指出：投机活动和经济萧条是人们对市场作出不同预测的结果。“恐慌从来都是因某些出人意料的变故而起。而货币信贷的短缺就是那些出人意料的变故中的一个，而且，那些变故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导致货币信贷的更加短缺。”[82]

如果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能被准确预测，人们便能即刻恰到好处地调整货币市场的利率。贷方若是预期整体价格水平将上涨，他们便会要求借方支付相应较高的利息；如果他们估计价格会下跌，他们便会接受相对低一些的利息；基于同样的原因，如果借方预计会发生通货膨胀，他们便知道名义上的高利率并不会真正影响到他们最终的资本回报。而如果借方估计将会发生的是通货紧缩，他们也同样会知道他们只能支付较低的利息。简而言之，如果能准确预测，价格波动对实际生产和就业就应该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当然，问题在于，要作出如此完美的预测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未能正确预计到通货紧缩的发生，这便导致了债务人遭受了意外的损失，而债权人则获得了意外的收入。”[83]

此前，费雪曾认为，货币价值的变化在实际经济活动中所起的影响小到可以忽略不计。而现在，他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由于利息并不能顺利完成它该起到的调节作用，因此，美元购买力下降所带来的的影响和变化就不能得到充分的弥补。因此，对一个公平透明的货币体系而言，价格的稳定是必需的。

支持金银复本位制的人声称，在1875年至1895年价格呈下

> 降趋势的这二十年中，从整体上而言债权人阶层是获利者。在这点上他们是对的。但在接下来的1896年至1906年这十年期间，情况就正好反了过来。但由于社会各阶层的人员构成在迅速更迭，我们并不能因此就错误地认为，过去十年中债务人的受益能够完全弥补他们在此前二十年中所遭受的损失。我们也不能错误地以为组成债务人阶层的全都是穷人。如今，最典型的债务人当属股票持有者，而最典型的债权人则是债券持有者。[84]

在当前通行的货币标准下，与美元相对应的保持不变的是黄金的重量，而非黄金的价值和购买力。这就决定了美元在国内的购买力会随货币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出现升降。大多数人，甚至包括绝大多数精明的投资者和生意人，都把美元当作衡量价值的工具。当然，让他们自己去跟踪和预测价值的变化太过困难，也不可能。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之所以危害极大就是因为投资者、消费者和商人们无法对这二者作出准确预测，他们甚至对现在和刚刚过去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都无法准确计算出其规模。在错误预期基础上作出的决定无疑将导致错误的投资决定，而且，从整体经济的宏观角度来看，在导致某些领域投资过剩的同时，它还造成了在另外一些领域内投资奇缺的情况，“商业危机降临之日也就是与这些肆意挥霍的行为算总账的那一天。”[85]

想一想在过去的六十年中都发生了些什么。首先，查尔斯·狄更斯、亨利·梅休和卡尔·马克思告诉我们，自从有记忆以来，人类就一直因物质条件的局限而陷入贫困。而现在，物质条件已不再像以前那样一成不变，它具有了更多的可塑性。马克思在1848年就曾经为我们演示，在竞争的压力下，企业能够用同样数量的资源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但同时他也坚持认为，人们将无法把生产力的提高转化成工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而接着，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却发现了一个新颖独特的竞争机制。在此机制下，企业长期不断地寻求提高生产力。同时，这也促使它将获取的收益以提高工资和生活水平的方式与

工人共同分享。只要工资水平和生活标准的决定因素是生产力，人们便能通过提高生产力的方式来改变个人和集体的物质条件。

比特丽斯·韦伯发明了福利国家的概念，同时也发明了她作为社会考察家的这一职业。社会学家穆勒指出，福利国家最终将耗尽国家的全部税收。马克思也认为，这样的国家在推理上不合逻辑。但韦伯却反驳道，贫穷是可以避免的，政府在教育、卫生、粮食、医疗等方面提供的实物帮助对私营企业生产力和工资的提升作用要比税收的压制作用大得多。换而言之，教穷人识字，为他们提供粮食，让他们少受疾病的危害，这些努力对经济只会产生促进的作用，而不会成为经济的累赘。

而欧文·费雪则第一个认识到货币对实际经济所起的巨大作用。他提出，政府应该通过货币管理来增强经济的稳定性。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导致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这两个看似相反的社会痼疾的共同病因，并找到了“控制货币供应”这个潜在的工具。有了这样一个工具，政府便能利用它来缓解或者完全避免通货膨胀下的经济高涨或是通货紧缩下的经济萧条。

第五章

创造性的破坏：熊彼特与经济演变

“通常需要几百年才能完成的历史发展被通通压缩在了这短短的二三十年中。”

——罗莎·卢森伯格[①]，《资本积累论》，1913[1]

1907年11月4日，美国纽约克尼布克信托公司发生挤兑的消息致使伦敦股票交易所里拥挤不堪。惊恐万分的投资者们为了安全起见纷纷要求兑换金银，这使得英格兰银行压力倍增。由于担心银行储备大量流失，银行实施了反制措施，它提高了借贷给其他银行的隔夜贷款利率。正当这场恐慌上演的同时，约瑟夫·熊彼特[②]和格拉迪丝·西维尔，这一对绅士和未婚女士，悄悄在派丁顿车站旁的注册办公室履行了结婚登记。不久，这对新人便离开了伦敦前往埃及开罗。他们离开的时候，银行贴现率狂升至了百分之七[2]，这在近四十年来还是首见。

年仅二十四岁的熊彼特早已是一位世界公民。他出生于现属于捷克境内的一个小工业城镇。他父亲继承了祖上已传了三代的纺织厂。熊彼特是家中唯一的男孩。父亲三十一岁时在一次打猎事故中意外身

① Rosa Luxemburg（1871—1919），德国人，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理论家、革命家。

② 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1950），美籍奥国经济学家。

亡，母亲便成了后来也一直都是他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人。当时，他母亲决定，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都要保证她刚四岁的儿子未来有一个辉煌的前程。主要出于为他考虑，母亲决定将家搬至格拉茨这座漂亮的大学城。在她的宝贝儿子满十一岁那年，她再嫁给了一位年长她三十岁的退役将军。在她的劝说下，将军将家搬至维也纳。他们住的公寓紧挨着闻名遐迩的林荫大道。由于有了他继父在贵族圈里的人际关系，熊彼特上的是一所专供贵族子弟读书的古老学校。在特蕾莎学校读书期间，除了击剑和骑术，他还学会了不下五门古典和当代的外国语言，积累了颇具价值的社会关系，并且培养了高雅华丽的举止、风流成性的习惯以及贵族生活的奢侈品位。然而，接受贵族教育让他在情感上也付出了巨大代价。这位想方设法要挤入上流社会的年轻人有着隐士般的羞怯，他惯于独处，狂热地阅读哲学和其他社会学的书籍。在学校里，“有点傻”意味着带有贵族的气派和血统，因此，他的聪明头脑和勤奋刻苦的中产阶层的工作习惯只会使他看上去更像是个暴发户。[3] 他个头矮小，皮肤黝黑，前额出奇地高耸，而眼窝却明显深陷。他这副异乎寻常的相貌常被别人暗地里奚落为有“东方”血统。然而，他却以在骑术、击剑上的出色成绩和他幽默风趣的谈吐对此作了弥补。他学会了用表面的漫不经心、冷嘲热讽和厌世来掩饰自己内心的抑郁。

1901 年，十八岁的熊彼特以最优异的成绩从特蕾莎学校圆满毕业，他获得了维也纳大学的入学许可。他和母亲都希望他能以最快速度爬上维也纳上层社会的顶峰，而进入维也纳大学则是朝该目标迈出的第一步。诚然，维也纳的“头等社会”基本上只属于皇帝及其朝臣和皇室人员。然而，只要有了一个大学教授的头衔或内阁级别的职位便能与“二等社会”的成员分庭抗礼，而“二等社会”通常是那些聪明能干之士和贵族富豪们的盘桓之处。早在熊彼特刚成为法律系新生之际，他便已经将自己视为未来皇帝麾下最年轻的大学教授和最值得皇帝信赖的经济顾问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维也纳常常被历史学家们描绘成一个颓废僵

化却仍在沾沾自喜的社会。而与英国、法国和德国相比，当时的奥匈帝国其实已经严重落后，毫无希望可言。奥斯卡·贾希就曾将奥匈帝国称为“在经济上已被击溃了的帝国”[4]，而卡尔·休斯克则指出，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极其消极[5]。社会中极度缺乏创业精神。那些成功的大商人的儿辈们，如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和弗兰茨·卡夫卡都纷纷弃商从文。面对这种情形，E·施特赖斯勒只能发出一声无奈的哀叹。[6]优塞福·罗特于1932年出版了一本反映奥地利君主制兴衰历史的小说，《拉特斯基进行曲》。书中的一位维也纳贵族，孔特·充尼吉，在谈到国家垂死挣扎的现状时就指出，“现在已经是电力时代，而不再是炼丹术流行的中世纪。”他指着光彩夺目的枝形电灯大声说，“在弗兰茨·约瑟夫①的城堡里，他们点的还是蜡烛。”[7]

事实上，维也纳已被现代化迷得神魂颠倒。早在1883年，电气化火车就曾满载着上万名游客前往普拉特这个位于多瑙河畔的巨大“人民公园”。在那里，他们参观了国际电力展。他们目睹了世界上最盛大的灯光表演和电力展示。包括美国西屋、通用电器、德国AEG、瑞典埃里克森等在内的六百多家厂商展出了十五个蓄电池、五十二台热水器、六十五台发动机还有一百五十台发电机。在“电话及音乐展厅”里，游客们“足不出户便能听到剧院里响起的音乐声和歌声”[8]。在另一个展厅里，他们还聆听了从布达佩斯传来的新闻简报，这是为订购了电话的顾客们提供的一项服务。游客中那些最勇敢的人们还登上了四周被玻璃环绕的液压电梯。电梯在二十五万烛光力的推动下于眨眼间便将他们送上了二百二十英尺高的圆形大厅的最顶层。在展览开幕仪式上，皇储鲁道夫在致辞时骄傲地宣称，“这片灯光的海洋”将从“维也纳照向全世界”。[9]

在竞相实现电力化的过程中，维也纳与伦敦相比甚至还略占优势。电话服务于1881年开通。1897年，电车取代了由马匹拖曳的公车；到1906年话剧《电工》②上演的时候，市内十个最靠里的城区都已通

① Franz Joseph，奥匈帝国的皇帝。

② 德语 Die Elektriker.

电。“电文化”[①]成了创业者们的口头禅。每个家庭主妇都梦想着家里能早日通电，希望从此能与厨房里缭绕的煤炭烟火告别；工厂主们也都渴望自己的工厂能早日换上最先进的电灯照明和电力驱动的机器设备。包括西格蒙德·弗洛伊德[②]在内的医生们则早已按捺不住焦急的心情，他们想尽早在病人身上尝试电震疗法。甚至连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祖母都带着他年仅六岁的表弟弗里德里希·哈耶克[③]坐到她的新电动车里兜了一圈。

虽然皇帝弗兰茨·约瑟夫将电梯和电灯拒之门外，但他儿子，皇储鲁道夫，却是现代化工业的坚定支持者。当时，奥地利是欧洲第四大工商业聚集地，其工业包括钢铁、纺织、造纸、化工以及汽车制造。维也纳俨然成为了这片辽阔的内陆地区的行政、贸易和金融中心，同时，它还向那些新兴的欧洲大都市提供其所需的粮食、燃料和原材料。随着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的经济复苏，糖和纺织品的出口也盛极一时。同时，铁路的修建也达到了一个高峰。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电气化已完全取代铁路而一跃成为最具吸引力的投资领域。

城市建筑不仅反映了皇室的威严，同时也折射出资产阶级的情调。维也纳的林荫大道极其宽阔，它围绕在内城四周，道旁有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国会大楼以及巴罗克风格的歌剧院。男爵大道两旁零星散布着居民的宅邸，所有这些都令人为此处蕴含的悠久历史而惊讶不已。对那些暴发户、新贵和拼命想挤入上流社会的人们来说，用作出租的豪华公寓或者叫“Mietpalais”，比豪华别墅更有吸引力。维也纳所拥有的庞大中产阶层人口、居民族裔的多样化以及绝对单一的德国文化，使它成为了帝国其他地区流亡者的首选目的地——1867 年内阁的自由派在推行经济现代化的同时也开始推动犹太解放运动。在那之后，这一趋势更加明显。许多新来的移民成了沿街叫卖的小贩或零售商，而他们的儿辈从事的大多是法律或医生职业，因为这些职业不要求有上

① 德语 Elektrokultur.

② Sigmund Freud（1856—1939），奥地利精神病医生及精神分析学家。

③ Friedrich Hayek（1899—1992），奥地利裔英国经济学家。

贵族学校的经历。他们也有的进入了银行业和新闻业，还有的干脆投身艺术，因为这些职业都不要求有大学学位。犹太人在法律、医学、银行、新闻以及艺术等领域占据了巨大优势，这种局面激起了社会其他人的公愤，在困难时期这种情绪尤其明显。正如某位历史学家所曾指出的，“股市行情一旦下跌，反犹情绪便会立刻高涨起来。”[10]

在人们众口一词替经济衰退担心之际，经济数据却显示出完全相反的势头。1870 年到 1913 年间，不仅经济增长的速度是此前四十年中经济发展速度的三倍，而且，即使在人口数额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人均实际收入在此期间仍然翻了一番。诚然，与维多利亚时期的伦敦一样，维也纳也缺乏足够的住房、下水道、可供饮用的干净水源以及铺设完好的街道，并一直为这种状况所困。但历史学家大卫·古德以大量的证据表明，“奥匈帝国所面对的这些难题并不是由经济失败引起的，相反，正是由于经济的成功发展才产生了这一系列的问题。”[11]

1901 年，熊彼特开始在维也纳大学攻读法律。此时，该大学已成为整个欧洲在数学、医学、心理学、哲学和经济学等方面的最大研究中心之一。当时，以柏林大学的古斯塔夫·施穆勒为领军人物的“历史学派”在德国经济学界占据着统治地位，该学派极端鄙视抽象化的原则，而对皇室的国家统治却极其崇拜。而卡尔·门格尔却使维也纳成了一座在意识形态和知识领域与柏林针锋相对的大本营，它并且还执掌着欧洲大陆理论经济学的牛耳。

法律的地位极其崇高，学习法律意味着在讲德语的大学中获得的教育将比在英美两国的更为开放和自由。在学习圣经正经和罗马法律的同时，熊彼特还选修了历史、哲学和经济学。他很快发现，经济学，尤其是理论经济学或“英国”的经济学，比法律更让他感兴趣。此时，门格尔因为年老体弱已无法继续授课，但他与柏林大学旷日持久的论战此时正在他两位杰出门徒的领导下继续进行着。这二人便是欧根·博姆-巴维克和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熊彼特聆听了他们的学术报告，他以其“冷静科学的客观态度”和“轻松有趣的举止”使自己在众多学长当中显得与众不同，他的同学中包括路德维希·冯·米

塞斯，一个激进的自由放任主义者；及奥托·鲍尔和鲁道夫·希法亭，两位欧洲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12]。在大学最后一年里，这位二十二岁的年轻人已经成功地在博姆-巴维克的统计月报上发表过不下三篇文章。1906年初，他被授予了法律博士学位。此时他已将自己视为现代经济学的坚决拥护者；在柏林，现代经济学被称为“英国经济学”，尽管其实有许多有名的奥地利人、法国人和美国人都曾为它作出过巨大贡献。毕业以后，他出版的第一项成果是《关于理论经济学中的数学方法》，这篇论文篇幅巨大，且颇具煽动力。

有了坚定的学术立场，熊彼特便开始了他的“欧洲学术巡回旅行”。这在当时讲德语的大学毕业生中蔚然成风。他心中暗暗有了一个理想，那就是要弥合各学派之间的纷争，而且最终可能还要向柏林大学，这所欧洲大陆上最重要的学府发起挑战。为了详细了解德国历史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将那年春天的整个一学期都花在了柏林大学。而夏天，他则去巴黎呆了几个星期。在那里他听了数学家亨利·庞加莱关于物理学的讲座。而他旅途的最终目标却是英国。他满怀崇拜地将这个国家称为“资本主义文明的典范”，对该国的经济学家们他也都一一进行过研究。[13]

熊彼特到达伦敦时正值初秋。他旋即开始了新鲜的双重身份的生活，他曾经受过的教育使他应付得游刃有余。他的公开身份是来自欧洲大陆的一位贵族，并且热心社交，爱慕虚荣和声色犬马的生活。他发现，“英国人的举止习惯和风俗与自己的习性颇为相投”，于是，他也开始沉湎于伦敦时尚圈的生活方式。他在靠近海德公园的王子广场租了一套公寓单元，在萨维尔街量身定制了服装。他保留了自己的猎狐马，每天都骑着它去海德公园的马道跑上一跑。晚上他则看话剧，下馆子；而到了周末，他便前往位于乡村的别墅参加聚会。

而他另外一个身份则是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严谨朴素的校园与大英博物馆宽敞宁静的阅览室之间来回奔走。他尤为看重的是，他也有机会使用当年身体笨重、衣着随意的马克思撰写《资本论》时用过的那张桌子。他坚持认为，所有伟大的思想家们最为杰出的思想都是在他们三十岁之前诞生的。因此，他打算尽快攀上他学术生涯的第一个

阶梯。二十四岁的熊彼特开始与自己制订的时间表展开了一场竞赛。

在离开维也纳之前，他为两部他有意开始撰写的书勾勒出了大致的轮廓。第一本他想将“英国”经济学或是理论经济学介绍给对之知之甚少甚至抱敌视态度的德国读者；而这第二本，他要留待他能作出石破天惊的贡献时用，他自信有能力为经济学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和众多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熊彼特为达尔文自然淘汰理论在人类社会中所具有的意义而心驰神往。他想，现代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使经济变得更富于创造力，更加专业化也更复杂，而经济理论却完全忽略了整个这个过程，这难道不可笑吗？正如马塞尔·普鲁斯特在《追忆逝水年华》中所暗示的，“自然界的许多发展过程是那样的缓慢，即使我们将它一段段分开，成为若干单独存在的状态，我们依然感受不到那种变化。”[14] 同样，经济的发展也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现存的理论认为，社会经济不过是年复一年在重复自己，在长期内它也许会略有增长，但从大体上而言它基本没有变化。如果经济学家要考察一个经济因素的细微变化对其他因素会产生何种影响，那么确实，“静态理论”正是为这个目的量身定做的。但是，如果变化的规模巨大，或者变化所涉及的时间非常久远，那么我们便不能再对技术、劳动力和社会机制所起的结构性变化视而不见，在这种情况下，现存的理论便不再适合或者根本失去了作用。与德国经济学家所认为的恰恰相反，经济学历史能发展到现在的水平已经很难能可贵了。科学与历史的不同就在于前者具有普遍性。历史注重的是发生过什么，而科学注重的是在一定条件下会发生什么或不会发生什么。正因为如此，科学才成为了一门统治的工具。如果经济学也要成为一门科学，那它就必须具备普遍性。

现在迫切需要一门着眼于经济发展的理论。这位刚刚大学毕业的学生立志要填补这一空白。他希望以一种动态的理论来取代静态理论，就像达尔文用他的进化论将传统理论通通扫除一样。多年后他自己对此评论说，“他当年的想法和卡尔·马克思的如出一辙”，马克思也曾将经济发展的过程设想为一个由经济体系内部诸因素决定的独立的过程。[15]

他还至少有一次专程乘火车前往剑桥大学去聆听阿尔弗雷德·马

歇尔的教诲。时年六十有五的马歇尔健康已每况愈下，他至今尚未从与约瑟夫·张伯伦（此时正担任辅政司司长之职）就自由贸易进行的争论中完全恢复元气。而且，他正打算放弃在剑桥大学的教职。尽管如此，马歇尔依然在自己的住所贝立奥庄招待他用了早餐，并耐心地听这位自以为是的年轻人喋喋不休地讲述其构建经济发展理论的各种设想。

这样一门理论也是面前的这位老者毕生孜孜以求却未能实现的梦想，熊彼特对此心知肚明。虽然马歇尔也曾借用物理学的研究方法来考察供需在单个市场中的互动关系。但他一直坚持认为，与机械运动的过程相比，经济现象还是与生物活动的过程更为类似。因此，他对以前经济学家们所作的批评都是因他们的假设而发，因为他们都错误地认为社会结构、生产技术以及人的本性都是永恒不变的。他在推出他最新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时就曾开诚布公地说，“经济生物学是经济学家的麦加圣地。”[16] 然而，他却没能进一步提出一整套经济发展的理论。显而易见的是，在他们长达一个小时的交谈中，这位英国哲人对他的计划提出了若干置疑，因为在两人分手之际，熊彼特对老人说，在他们的这次交流中，“我（熊彼特）扮演的是一个为了爱情甘愿冒险步入婚姻的人，而你则是那位好心劝阻我的叔叔。”马歇尔闻之，也不失幽默地答道：“本当如此。因为如果你的比喻果真成立的话，那叔叔的话最后肯定是白说了。”[17]

然而，熊彼特的比喻也许寓示了一场他在个人生活上即将开始的冒险。当时，他与一位年长他十二岁的女人产生了感情上的瓜葛，并发展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格拉迪丝·西维尔是英国人，出生于上层社会的家庭，并有着“惊人的美貌”。她父亲自幼在离哈罗镇不远的大别墅中长大。离家咫尺之遥便是圣彼得大教堂。他如今是“英国圣公会的一名高级神职人员”。除此之外，各种不同版本的传记对她的其他身世，包括她的真实年龄，都众说纷纭，不一而足。但根据有记录可查的资料能看出，她应该是又一个比特丽斯·韦伯那样的“迷人的老处女”，过的也是“典型的英国上层生活”。当时，格拉迪丝·西维尔三十六岁，她极可能是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结识了熊彼特。该学院尤

其适合像她这样对妇女运动、社会改革和费边主义的优生学感兴趣的女性。结婚的决定很突然，新郎和新娘似乎都没有期望能得到父母的首肯，其实人们根本就不知道他们事先有没有通知各自的父母。唯一到皮卡迪里见证他们结婚仪式的只有格拉迪丝的兄长一人。对英国的崇拜和两个贵族家庭之间的联姻也许是促成这个仓促决定的主要原因。但奉子成婚才是最有可能的动机。后来，熊彼特曾向他的朋友暗示，由于他当时天真幼稚，涉世尚浅，所以才会为格拉迪丝·西维尔所乘；格拉迪丝·西维尔于 1933 年去世，她留下了一笔对节育社会而言颇为可观的房产。”[18]

由于在“最神圣的十年”的结尾阶段发生了这起违背其信仰的未婚先育事件，他开始强迫自己考虑如何才能自食其力地生活。在他去世以后，人们从他遗留下来的文件中发现了一篇小说的部分手稿，小说讲述的是一位奥地利贵族娶了“一个英国女孩，女孩虽然也来自门当户对的上层家庭，但却根本没什么钱”。这也给我们透露了一些线索，那就是，格莱迪斯的收入至少在当时还不够支撑他们两人的生活开销。[19]而回奥地利去当个大学教授则无疑不但费事，而且不确定的因素也太多；他也曾一度考虑过加入伦敦律师协会，但那至少要花上几年的功夫。

富有事业心的年轻人在那个时代算是生逢其时。由于他生活品位高而收入却有限，而且还要照顾一位新婚妻子，他于是决定到东方去碰碰运气。也许是格拉迪丝·西维尔给了他一个建议，像他这样受过法律培训但又缺乏实际工作经验的人也许在开罗能找到比在伦敦和维也纳更多的赚钱机会。在熊彼特那篇没有写完的小说中，那位“英国女人”毅然动用了她的全部关系网来帮助她的丈夫”。好几位里卡德·西维尔家族中的成员当时都参与了北美洲与北部非洲之间的大综商业交易。比如，有一个叔叔不仅是塞西尔·罗兹[①]的商业伙伴，而且还是第一个对罗兹修建“从好望角至开罗”跨越非洲的铁路线计划表示支持的著名铁路工程师。

---

① Ccecil Rhodes：英国南非公司的创立人。

不管最终的决定是如何做出的，这对新婚夫妇在结婚之后便毫不迟疑地冒着严寒，取道向位于南边的埃及进发。

生活在英王爱德华七世时期[①]的人们眼瞅着一波波的巨变将世界搅了个天翻地覆。地球似乎在一天天变小，甚至连埃及这样的古老文明都未能免遭侵袭。对那些迄今为止一直将经济发展看成是欧洲特权的人而言，开罗给了他们一个最好的驳斥。开罗的意义不在于发展能达到怎样的程度，而在于是不是谁都能发展。研究经济思想的历史学家罗斯托曾称熊彼特为“一个生活在发达工业社会但思想却十分狭隘的经济学家”，该说法虽然有失公允，但假设熊彼特没来开罗的话，那结果也许还真会被罗斯托不幸言中。[20]

也许我们今天已难以想象，但开罗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时的地位就仿佛是如今的中国。安东尼·特罗洛普曾于1859年因为邮政业务访问过开罗。在离开埃及回国的途中，他有了《伯特伦一家》这部作品的构思。在该书中他干巴巴地写道，

> “男人们和女人们，喔，我是不是该说先生们和女士们，他们的行李箱从前都是要运往英国的得文郡南部；后来，大西洋上的马德拉群岛又流行了一段时间；而现在，他们又争先恐后地都去开罗。开罗已经发展得和英国如此接近，很快它也没什么看头了。”[21]

1798年拿破仑一世对马穆鲁克人的屠杀拉开了西方人征服埃及的序幕。埃及也从一个奥特曼采邑制的社会变为了英国的附属。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家、银行家和律师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做了大量工作并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

美国内战引发的棉花短缺使开罗成了尼罗河畔的另一个克朗代克[②]。埃及总督赫迪夫瞅准这一机会将整个国家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国营棉花种植场。后来，当英国与印度的贸易开始日益扩大，他又靠开通

① 英王爱德华七世时期，由1901年至1910年。

② Klondike，加拿大的黄金产地。

苏伊士运河从中大赚了一笔。巨额外国资本大多以贷款的方式源源不断地流向埃及。而在波兰革命者罗莎·卢森伯格看来，开罗俨然就是当代帝国主义”陷入疯狂”的一个缩影：

> 一笔接一笔的贷款，新的贷款被用来支付旧贷款欠下的利息，从英国和法国借来的资本又被用来支付向英国和法国作出的大宗工业订货。当整个欧洲与埃及的经济奇迹相比都相形见绌的同时，来自欧洲的资本其实正在以一个独特而巨大的规模在埃及运转，这简直就是圣经中肥胖的母牛[①]传说的现代翻版。在资本主义历史上，这种规模迄今为止都是空前的。[22]

最终的结果证明，为了完成苏伊士运河等庞大工程而堆积起来的巨额债务是难以为继的。在短短六年内，埃及总督因为破产而不得不出售运河百分之四十四的股份，同时，英国政府也被迫扮演起破产后埃及总督的财产管理人的角色。一些经济学家曾猜测，假设当初埃及总督在投资上谨慎从事，避免陷入巨额债务，那么进入二十世纪以后的埃及极有可能会成为另一个日本，当然它要比日本大得多。

从1883年开始，埃及进入了一段由英国实际统治的时期。艾弗林·巴林，即克罗默伯爵一世，被任命为埃及总督背后的实权人物。此公出自银行世家，他也是这一时代最著名的帝国主义分子之一。巴林的首要任务是恢复埃及的债务偿付能力。他将大批英国官员安插到埃及政府部门担任要职，支付了债务利息，平衡了预算，并将剩余的资金投入水利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1904年，英法之间达成一项新的协议，英国在埃及的统治被无限期延长。这便激发了又一轮声势更为浩大的投资热。虽然面积比荷兰大不了多少，但埃及吸引的英国资本却和印度一样多。不到三年，埃及资产的面值翻了五番，新成立了一百五十多家公司，新增资本达四千三百万英镑。拉什莫勋爵是埃及银行的董事，他曾这样描述当时投资者的狂热：“人们显然都已经疯

① 见《旧约·创世纪》第41章。

了；我不知道还能用什么别的语言来形容；他们似乎认为每一个新冒出来的公司都值得去哄抢，以致出现了公司尚未开始营业价值便已翻了一倍的现象”。[23]

然而，大量外国资本的涌入毕竟使埃及的封建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指出，历史上的帝国都是从臣属国那里吸纳贡品，而现代帝国却是向它们注入资本，并加速它们的经济发展。1900 年，埃及的全部制造业只不过由两座盐厂、两座纺织厂、两个酿酒厂和一个香烟厂组成。雇佣了两万名工人的炼糖业是当时最重要的产业。而到了 1907 年，一些崭新的工业，如轧棉、棉花油和肥皂生产，便已经雇佣了多达三十八万名工人。工资水平随着棉花价格的提升而水涨船高。此时，苏丹侯赛因·卡莫尔刚刚承袭了父亲的总督之位，他深为埃及人接受欧洲文化的迅猛势头而惊讶：“在我们的工厂里，我看到埃及人正在使用一些最先进的机器。”[24]

来自埃及外国殖民地的移民，以及犹太人、科普特人[①]和希腊人早在数百年前就已经在此定居，他们使埃及“几乎成为了世界上最国际化的国家。”开罗到处充斥着来此碰运气的人，他们当中有银行家、股票经纪，还有投资旅游、铁路、银行、制糖，当然还有棉花业的企业家。托马斯·库克父子旅行社已经将尼罗河驯服，他们为英国游客提供了能“一边随游船沿着非洲河流漂流，一边观赏类似美国西部景色”的机会。1902 年，约翰·艾德公司修建的阿斯旺大坝竣工。塞西尔·罗兹也在大肆推销他修建跨越非洲大陆铁路网的梦想。并非所有创业者的目的都是为了赚钱。J.P. 摩根这位公认的“埃及迷”就是为在尼罗河沿岸进行考古挖掘提供经济赞助的数位美国百万富翁之一，他们中还包括标准石油的创始人约翰·洛克菲勒。

埃及成为了新兴帝国主义的宣传工具。退休以后，巴林有一次在伦敦的一个自由党俱乐部演讲，他大言不惭地说，“据我所知，像发生在埃及的这种从贫困落后一跃而变成富裕优越的事，在历史上还从没有过。”[25]外号为“傲慢的巴林”的他这么说当然有自吹自擂的成分，

① Copts，埃及的基督教徒。

但即使是对英帝国主义一贯极端仇视和猛烈抨击的卢森伯格对他的这种说法也并未提出过异议。

1906 年，威廉·詹宁斯·布莱安，这位美国民主党的三次总统竞选人从印度回国途中在开罗稍作停留。这座城市给他的第一印象是惊人的，出人意料的现代化。他本以为这里只会有些危危欲坠的岩石和“美丽如画的古代遗迹”，但相反，他发现这里有明亮的灯光，有电车、汽车，有亚历山大-古斯塔夫·埃菲尔[①]设计的运河液压大桥，有瓶装水，而且，在这里，高楼大厦也随处可见，与回教寺院的数量相比毫不逊色。在这里买英国的 Bass Ale 啤酒或是《每日邮报》和在纽约或伦敦一样方便。这里的商业区充斥着用玻璃和合金建造的百货大楼，法老级别的豪华旅馆，为数众多的银行，以及电话室和电报室。这一切都使开罗的外观与欧洲的城市极其相似。而它淡色调的“美好时代”公寓群、宽阔的街道以及露天咖啡馆都让布莱安不禁想到了巴黎。[26]

当时，在尼罗河上乘船旅游是有钱人度蜜月的最佳选择。但熊彼特到开罗以后，他的当务之急却不是和格拉迪丝手牵手去库克的游轮甲板上漫步。在来埃及的一路上，他们先是乘火车到马赛，然后坐汽轮到亚历山大，最后又改乘火车才到了开罗。这一路上，世界金融危机的新闻一直陪伴着他们。在经历过股市大崩溃的每一个城市，人们对一波又一波的银行挤兑和破产都有着自己不同的认识。许多商人都以为自己社区里发生的悲剧是最严重的，而且他们都认为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只和他们当地的情况有关。而事实上，大恐慌在纽约爆发以后，相同的症状已在约六七个国家开始出现，这种席卷全球的连锁反应正朝人们扑面袭来。

在开罗，所有的麻烦都是从道格拉斯·福克斯爵士的合伙公司开始的。承修了罗兹跨越非洲大铁路首期工程的该家英国工程公司一直在设法获得许可权，以便修建一条从乔普斯金字塔底座一直通到塔顶的缆车道。经济历史学家亚历山大·诺耶斯后来写道，或许地下的神祇们被激怒而采取了某些行动，也或许是投资者们终于看清了投机活

① Alexandre-Gustave Eiffel，也是埃菲尔铁塔的设计者。

动究竟疯狂到了何等地步。[27] 不管是哪种原因，开罗的股票市场开始一泻千里。经纪商和企业经营者们却草率地认为这不过是一个无需过虑的暂时现象。不出一个月，一场盛装舞会仍然吸引了如此众多的“寻欢作乐兼美衣华服”的来宾，以至于舞场过于拥挤而使得来宾们无法跳舞。然而到了4月，股市再一次崩溃。而这一次，它不再回头，而是一直走低。《经济学人》杂志从伦敦对此作了以下报道：

> 成堆的股票在焦急等待着被抛售。此时，市场对这些形同废纸的股票已经望而生厌。不管什么股票，每当又有人抛售出几十张，便会使那只股票的市场报价应声下降数个百分点。而同时，此刻想买进股票也极其困难。众所周知，数家小型股票经纪公司已经摇摇欲坠，到后来危机变得日益严重的时候，其中的一家甚至停止继续对外支付款项。[28]

这次恐慌的规模之大是全方位的。短短数星期内，开罗股票市场上挂牌公司四分之一的市值如幻影一般被无形蒸发。这给本来极其红火的房地产业带来的影响也是立竿见影的。用贷款修建的“金字塔楼梯”工程在顷刻间分崩离析。5月间，开罗数家银行出现资金困难的流言引发了银行挤兑。《纽约时报》的记者对当时冷酷的事实作了如下报道，”自阿斯旺大坝建成以来，埃及私人拥有的资产数额（不包括政府）总共损失了达十亿美元之多。”[29] 而雪上加霜的是，此时埃及的政治局势，用一位英国高级外交官的原话来说，也“简直糟透了”。埃及民族独立主义者的煽动已变得“极其危险”。[30]

以巴林为首的英国官员仍试图粉饰太平。他们老调重弹，说大萧条不过是在暴饮暴食之后禁食的经济翻版，他们坚持认为，“危机最终对埃及和埃及的经济都是极其有利的，因为它对经济动脉中不健康的因素进行了一次全面净化。”[31] 可是，市场上贷款逐渐枯竭，英格兰银行不得不“立即调来一批价值相当于三百万美元的黄金。”埃及的一位头面人物也就局势发表了似曾相识的懊悔之情：“我们一直在干人不敷出的蠢事，我们花掉的那些钱并不是我们自己的。”[32]

然而，埃及的崩溃不过是世界性现象的一部分。开罗也只是那条锁链关系中的无数环节之一。这条无限延伸的锁链连接了美国的旧金山和智利的圣地亚哥，连接了伦敦和孟买，也连接了纽约、汉堡和东京。这条锁链的铸成靠的不单单是轮船、铁路和电报电缆，它依靠的还有汇票、纸币、银行间的转账还有黄金。开罗人曾以为他们的经济繁荣是得天独厚的，但那其实不过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现象。正如一位伦敦银行家在事后指出的，“大约从 1905 年年中开始，资本供给和信贷融通在世界范围内便已开始变得非常紧张。而在接下来的两年中，这种局面愈演愈烈；早在 1907 年 10 月之前，世界各地很多稍有头脑的人就已经在讨论这种局面最终会导致怎样的恶劣后果。”[33] 位于地球另一面的旧金山发生的一件事最先触发了这一串连锁反应。旧金山的大地震和 1906 年发生的大火不但几乎将该城市夷为平地，它还引发了对伦敦众多保险公司的巨额索赔。为了理赔，保险公司不得不纷纷出售英镑以换取美元。这便使英镑的黄金价格逐渐跌落到比与之相对的黄金价格要还低的水平；为了防止黄金流失，英格兰银行于 1906 年 10 月将贴现率提升至百分之六。这对急需贷款的人而言无异是在信用额度上的巨大压力。

在金本位体系下，只要英国打个喷嚏，美国就会患上重感冒。1907 年 3 月，纽约股票交易市场开始大跌；5 月，经济活动开始全面下降。这场经济衰退揭开了 1907 年大恐慌的序幕，这是最后也是后果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大恐慌。它的焦点是纽约信托资金。恐慌导致了信用冻结，它使美国境内上千家银行和企业被迫宣告破产。更严重的经济滑坡又持续了一年半。直到 1910 年，经济局势才得以完全恢复。在英国和欧洲大陆，经济萧条的后果则更为严重，持续的时间也更长。而开罗的情形却正好相反，1907 年的恐慌对它来说不过是稍稍停顿了一下。

离开派丁顿车站后一星期，熊彼特和他的新婚妻子已坐在了著名的丽悦酒店华丽的阳台上。该旅店俯视着人群熙熙攘攘的阿尔卡莫大街。他们轻拂着手里的苍蝇拍，听着一旁“上百名旅游向导和商人向他们推销着各色服务”[34]。他们一边品尝饮料一边领略着“开罗独具特

色的殖民地的氛围”[35]。年轻漂亮的他们完美地融入了这幅世界化的场景。正如伦敦的《旅游者》杂志解释的那样，“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俄国人，中间还夹杂着一些日本人、印度人、澳大利亚人和南非人，他们都是人类文明中最富裕，最高雅，最美丽的种族。”[36]

那年春，股票市场和房地产价格的崩溃使得各类民事诉讼案和官司堆积如山。熊彼特加入了一家意大利法律事务所，他很快便成为欧洲商人们与埃及独特的会审公廨打交道的代表。会审公廨是从奥特曼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制度。公廨所在的大楼俯瞰着开罗的 Ataba-el-Khadra 广场，所有的电车全都在此汇聚。在这个开罗最热闹的广场之上，到处是“小贩们沙哑的叫卖声，运水车上小铜盘发出的嘎嘎声，机动车的喇叭声和电车的铃声……在这些喧闹之外，又还有男人女人们情绪激昂的争吵声。”[37]

熊彼特发现，他的法律业务虽然很赚钱，但其实并没占用他的所有时间。每天从会审公廨离开以后，他并没有马上去乡村俱乐部消遣，而是找到一家心爱的咖啡馆躲了进去。因为开罗就像维也纳，是一座到处是咖啡馆的城市。这些只接待男性的幽静场所可以用来当作象棋赛、办公和文学沙龙的场地，并且它们还越来越频繁地成为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分子和反帝国主义同谋者们的活动据点。熊彼特一边呷着土耳其咖啡，抽着水烟（水烟在这里跟在维也纳一样容易弄到），一边用钢笔飞快地在一张接一张纸上工整地进行着自己的写作。

“德国经济学其实并不了解‘纯粹’的经济学的庐山真面目。”这位二十四岁的作者这样写道。熊彼特写这本书的原始动机是向经济批评家们，尤其是德国的经济学家们发出请求和呼吁，“希望他们能互相理解而不是互相争斗，希望他们能多学习，而不是评论；多运用分析以找出正确答案……而不是简单地全盘接受或是拒绝一门经济理论”；同时，因为当时有人认为，“英国”经济学或者理论经济学大势已去，在德国的大学里这种观点尤其盛行，熊彼特也希望利用这本书对这一观点进行反驳。[38]确实，“经济学和机械学一样，给了我们一套固定体系，而不是像生物学一样能详尽地为进化论作一番注释。”[39]经济学对阐明动态的过程无能为力，而恰恰是这样一种动态的过程先改变了英

国，然后改变了法国、德国、奥匈帝国，而现在又是埃及。

然而，指出经济学的缺陷目的是为了能构建一种新的动态理论，而并非要将旧的理论经济学全盘抛弃。熊彼特在他新书的最后一章里对经济学的未来作了一番展望。他提出了两个问题：如果人们追本溯源并能将发展的根本原因归结为经济因素，而不是人口、政治等其他外在因素，那我们能否由此证明经济发展的存在呢？如果假设现存的社会体系，即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能保持不变，我们能否对未来的经济演变作一番合理的阐述呢？他本人对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

1908 年 3 月初，由北非吹向南欧的夹带着沙子的热风开始了。此时他患上了马耳他热，这是一种令人虚弱不堪的病菌感染。此前他刚刚将他长达六百页的书稿投寄给了德国的一位出版商。无处不在的灰尘，火炉般的炎热以及病情可能进一步恶化，这一切都促使他决定返回伦敦。他来埃及的两个初衷现在都已实现。除了已写完他的第一部书，虽然他现在谈不上很富裕，但至少也有了些闲钱。不但他的法律业务日渐红火，他还有幸结识了埃及总督的一个女儿并且成为了她的投资经理人。他不但帮她将她房地产的租金收入提高了一倍，还负责对一座炼糖厂进行了整顿，他从中也挣取了可观的收入。[40] 1908 年 10 月，他回到了伦敦。他一边住在妻弟的家中养病，一边在为回维也纳作准备。

1909 年 2 月，他已完全痊愈。他回到维也纳大学作了一场带康复训练性质的演讲。演讲的题目是经济理论的本质。他在台上的表现赢得了好评，并被授予编外讲师的头衔。而对他的书，外界的评论却褒贬不一。但即使是那些对之提出批评的人，也对该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令他懊恼的是，他的母校并未邀请他加盟。所以，他未能进入维也纳这个欧洲最闻名的首都之一的名牌大学任教。他不得不退而求其次。他接受了一个位于帝国边境地区的助教职位，这个地方与他的原始出生地——波兰大致相仿。

1902 年到 1909 年的这段时间，爱因斯坦是在苏黎世的专利办公

室度中过的。后来，他将这几年称作他生命中的“灯塔时期”，他还建议其他学术天才们也借助这种强制性的与世隔离来专心于他们的工作。这种宁静致远的环境使人能理清自己的思想，当然还能将它形之于文字。并且，它还能大量减少来自旁人的不同思想的干扰。

塞诺维茨是一座多种语言通用的有大量短期居留者的小镇。它的大学新近才成立，自然也就默默无闻。小镇的居民分为德国新教教徒和罗马尼亚天主教徒两类。前者为讲德语的犹太人，而后者来到此地的时间大多要稍晚一些，而且他们中的很多人还在打算要移居到维也纳、巴黎或者纽约去。因为在这里谁都没有深厚的根基，于是没有任何一个族裔或宗教派别能占据统治地位，也无法诱使他人改换宗教信仰。除了照看好各自的店铺和生意以及在星期天去市区的公园散散步以外，谁都没有更多的冲动和想法。熊彼特来到这里以后肆意发泄着他的满腔忿懑，他背着格拉迪丝搞婚外情，对同事们极尽轻侮怠慢之能事，并且置起码的礼节规范于不顾。好几次他竟然穿着骑马裤若无其事地走进学校的会场。这些都严重败坏了学校教职员工的形象。还有一回，他甚至向学校图书馆的馆长发出了决斗的挑衅。

尽管如此，事实证明塞诺维茨还真成了熊彼特的灯塔。在那里的两年中，他将所有二十四到二十六岁期间在外国的所学、所见、所想和所思逐一去芜存精并加以提炼，然后将所剩下的全部精华倾注到了他的《经济发展论》一书中。

在熊彼特看来，经济发展的过程不仅意味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同时也意味着工人的生产力在提高，民众在变得更加富裕，产业更加专业化，金融体系也变得更加复杂。他理所当然地认为，所有的生产都以“满足人的需要”为目的[41]，而生活水平的提高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然而，发展代表的“不仅仅是人口和财富的增加”。一个人口快速增长的国家能够在不提高平均工资和消费水平的基础上实现生产的增长。像埃及那种奉行弱肉强食政策的古代帝国，他们通过对弱小国家的剥削和奴役而非提高生产力水平来实现自己的富裕。而在那些新开辟的地广人稀的疆域，即使没有专业分工和相互协作，人们也有

可能致富。

决定一个国家能否为其公民提供较高生活水平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它的生产力。生产力就好像格林兄弟童话中的神奇锅，它决定了经济能在同等资源基础上获得更多的产出。1897 年，马克·吐温[①] 曾经大胆指出，“从英国女王诞生到现在这段很短的时间内，人类社会取得的进步和发展超过了此前两千多年中所有进步和发展的总和。”[42] 而熊彼特也将经济发展视为一个事实，而不只是理论上的可能性，这和马克·吐温的观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仅仅在熊彼特降世之后的这些年里，单个工人的生产水平就已经翻了两到三倍之多，而此前，在基督诞生之后维多利亚女王诞生之前的两千多年间，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几乎一直在踯躅不前。相比之下，马尔萨斯和穆勒：

> 都生活在这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大飞跃的滥觞之际，不计其数的各种可能性就在他们眼皮底下一一变成了现实。然而，他们却单单只注意到了那些正经历着阵痛的经济，那些经济都是因为不能适应变革而在难以为继地艰难挣扎。他们都顽固地认为，技术进步……并不能完全抵消收益递减法则带来的致命压力……一种静止的状态已经触手可及。[43]

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已经比从前提高了好几倍，这种说法搁在 1848 年或甚至是 1867 年，也许尚会有人怀疑。但现在它早已是一个无法辩驳的事实。在那些富裕国家，粮食、衣服、烟草、肉类和糖类的消费都在急剧增长；营养的改善也能从人口的发展趋势上反映出来。1845 年以来，婴儿死亡率开始大幅下降，而平均寿命自 1860 年以来一直在逐步上升；平均身高在 1820 年至 1870 年间曾一度下降，但在 1870 年以后也开始节节攀升；无家可归和乞讨为生这一对社会阴影也开始消失。“资本主义在逐渐普遍地提升社会大众的生活水平，这个过程不是偶然的，它是由资本主义的内在本质决定的。”熊彼特这样写道。连一

① Mark Twain（1835—1910），美国小说家。

贯出语谨慎的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也于1907年宣称，“收益递减法则眨眼间便已几乎失效。”[44]

然而，不同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和速度上的差异是极其悬殊的。任何最近几年在开罗、伦敦、塞诺维茨或维也纳住过的人都会对此深有体会。1820年，荷兰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当时，荷兰的平均生活水平大概相当于非洲和亚洲最贫穷国家水平的三倍半。而到了1910年，最富的国家和最穷国家之间的差距已经飞蹿至八倍还多[45]。这种生活水平的悬殊差异反映出的主要是生产力，而非国土面积、自然资源和人口数额上的差距。在同样数量的资本和劳动力基础上，一个高效的经济体获得的产出可以是效率最为低下的经济体的数倍。[46]更为重要的是，一些经济体的发展速度比其他经济体要高出好几倍。因此，问题的关键就不仅仅是哪种过程能使生产力得到成倍提高，而是为什么这一同样的过程在有些国家起到成效的速度比在别的国家要快得多。马克思曾经假设，全球化进程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而当地的条件和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微乎其微。如果真是那样，那世界各地的生活水平应该逐渐趋于雷同才对，而不是相差得越来越悬殊。

对这个问题的传统答案一般会说那是因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取决于其资源。而熊彼特对此却持绝然不同的观点。重要的不是一个国家拥有些什么，而是它如何利用它所拥有的那些东西。他指出了推动“工业化和商业化生活”的三个基本的“当地”要素：创新、企业家以及信用。他认为，资本主义的最大特征就是“层出不穷的发明”，即人所共知的“创造性破坏的永恒风暴”[47]。马克思也曾经看到，“如果没有生产工具持续不断的革命性变革，资产阶级便无法生存。”但他指的主要是工厂的自动化[48]。而熊彼特的视野则要开阔得多。熊彼特所说的“发明”指的不仅仅是新的发明，而是指所有通过运用新思维新思想而获利的行为。它包括许多他所指出的也许属于不同类型的革新：新产品、新工艺流程、新供给来源，或是新的市场和组织类型。

马歇尔一贯恪守自然界不会跳跃式发展的信条。他在此强调的是由管理者和技术工人长年累月积聚起来的循序渐进的提高。[49]而熊彼特重点强调的则是创新导致的巨大飞跃所具有的颠覆性和非连贯

性。“无论你连续不断添加多少辆邮递马车，你也折腾不出一条铁路来。”他还说，“经济发展的本质就是赋予劳动力和土地以新的不同的用途。”[50]

由于新的机器设备和生产方式可以被输送到世界任一个地方，因此，新技术也就无法单独解释为什么有些国家在发展而另一些却没有。熊彼特将注意力集中在了人为因素上。马克思曾明确地将任何可能的人为影响排除在这一过程之外。韦伯曾经就此批评过马克思，她说，马克思理论中的那些“自动化工厂的所有者”都是在自己无力控制的力量推动下毫无意识地行事，他们盲目追求“利润，却从未有欲望得到满足的感觉。”[51]而熊彼特正是将注意力集中在了人为因素上。对他而言，发展主要依靠的是创业者的努力，在这点上他甘附十九世纪末德国文化中领袖崇拜的骥尾。他曾听说，西德尼·韦伯在阐述费边社理论时，将收入不平等的原因归结为天赋是遗传的。同时，他对弗兰西斯·高尔顿和卡尔·皮尔逊二人关于天赋遗传和精英的社会角色的著作也都颇感兴趣。前者是达尔文的表兄，而后者则是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的教授。

具有远见卓识的领袖型人物是熊彼特书中的重点。创业者的作用是通过对新发明，或者通俗的说，是通过对从未尝试过的技术可能性加以挖掘和利用，并为生产方式带来革命性的进步。[52]这可能是新产品，如汽车和电话，也可能是用氰化处理的方法提炼南非的黄金的新工艺，或者是类似信托的新组织形式，或者是像埃及那样的为铁路车辆和轧棉机提供的新市场，还有可能是新的原料供应来源，比如改从印度进口棉花，等等。与马克思理论中的自动化资本家和马歇尔的工程师兼公司拥有者绝然不同的是，创业者甘愿将“陈旧的观念和行为模式全盘推倒”，并以新的方式对原有资源加以运用。发明创造意味着克服障碍、惰性和阻挠。这需要的是出乎其类的能力和拔乎其萃的人物。“敢为人先和依葫芦画瓢二者之间的区别就好比一个在开辟新的道路，而另一个却是沿着别人开出的道路在走。”熊彼特这样写道。[53]

与金钱相比，他所说的创业者更多的是被“建立一个个人王朝的

梦想和意志所激励”。同时他们也满怀征服、斗争和赢得尊敬的激情。归根到底，他们追求的是“发明创造和成功所带来的喜悦，或仅仅是为了让自己的能量和才智有用武之地。”[54] 马克思将资产阶级比喻为寄生虫，并认为他们的行为终将导致社会的毁灭。而熊彼特却在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的理论基础上推陈出新，他认为，“一切发展都是领袖人物以其英雄般的举动朝经济的理想彼岸努力的结果。”[55] 熊彼特不厌其烦地指出，“工商阶级扮演着创造性的角色，而长期以来这一点都被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所忽视。即使最亲‘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概莫能外。”他坚定地认为，科学技术并非独立存在的力量，它和“商业表现”一样，都是“资产阶级文化的产物”[56]。虽然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委实通过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生产力聚集了巨额财富，但正是他们，而不是那些所谓的社会改革家，为消灭贫困做出了巨大贡献，这种贡献甚至比政府和慈善机构所做的还要大。”

但荒谬的是，虽然企业家有旺盛的精力、独到的眼光以及发号施令的才能，但他却只能在特定的环境下才能出人头地。财产私有，贸易自由，货币稳定，这些都非常重要，但对他而言，生存的关键是要能获得价格低廉且充足的信用额度。熊彼特认为，为了实施自己的计划，企业家们不得不将自己的土地、劳动力和机器从它们原来的用途上挪用过来。而能为他创造条件的人则是“那些银行家和金融机构的中间人，是他们在使存款流动，在评估项目，在进行风险管理，在督促企业管理人员，也是他们在兼并新的设施或将资源从旧的渠道转移到新的渠道中去。”[57] 金融领域对信心和信任的高度依赖使得它常常轻易遭受市场恐慌和崩溃的袭击，这是千真万确的。假使没有运转自如的信贷市场和健康的银行体系，社会经济便会丧失发明创造所必需的低利率和充足贷款。成功的经济体的最大特征不是它们能免受危机和萧条的侵扰，而是它们在危机过后的投资高潮中能迅速弥补刚刚遭受的损失，甚至获得更多的收益。

世界上最高的利息率通常存在于世界上最穷的国家。正如经济历史学家大卫·兰德斯所指出的，“在这些落后国家，资本主义文明的光辉尚未充分发挥其神奇的教化功能。那里银行匮乏，放贷者却奇多；

投资的金额小而储蓄额巨大；没有信用借贷，却遍地是高利贷。”[58] 在埃及，由于当地的银行体系极其落后，借贷和兑换机构也非常原始，因此企业家们需面对重重困难。当地的利息率是西方国家的两到三倍。最热门的债券利息高达百分之十二到二十不等，而同时，穷苦农民每月要支付的利息高达百分之五到六。

由于他论证了现存理论只适用于“基本上没有任何发展的体制”，熊彼特成功地构建了一个动态的理论体系。他在现存理论基础上向人们演示了经济在演变成一个新的更专业化的架构的同时，是如何在同样资源的基础上获得更多产出的。

更为重要的是，根据他的这套理论，任何国家都能做到这一点。熊彼特特别强调了每个国家当地的具体条件。他的理论认为，每一个国家都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所有希望自己的国民富裕起来的政府都应该放弃他们在领土上的野心，而应着手为国内的企业家营造一个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良好氛围，这包括保护财产所有权、稳定价格、自由贸易、合理的税收以及前后连贯一致的法律法规。

发展没有既定的极限。人类的需求是永无止境的。和开发新的领土和疆域一样，收入的增加和人们新的欲望的出现同样为追逐利润的企业提供了无穷无尽的机会。只要存在贸易的可能，发明创造便能弥补在人口、领土以及资源等方面存在的局限。这套说辞不但浪漫迷人，而且充满英雄气概。它宣扬的是机会均等，乐观向上。它能为成功发展经济提供一条有别于战争的全新途径，这绝非偶然。

熊彼特的《经济发展论》于 1911 年 5 月终于定稿。这时他已回到维也纳。他一边借住在母亲的公寓里，一边等着格拉茨大学的回信，看他是否会被选中填补该校的一个空缺教职。他曾在格拉茨这个城市度过了部分的童年时期。这是个省区级别的城镇，它的大学也不属于顶尖一类。但它的一个好处是离首都维也纳只有两个半小时的火车路程。该学校的教研主管们非常不近情理，他们认为他的著作“内容贫乏抽象，形式呆板拘谨”，并且投票表决打算聘用另一名候选人。最后是靠他的恩师博姆-巴维克在教育部从中干预，才使他们改变了之前作

出的决定。于是，在他二十八岁时，熊彼特成为帝国最年轻正教授的梦想终于得以实现。

熊彼特于1911年秋开始在格拉茨任教。学生们对初来乍到的他冷若冰霜，他们甚至抵制他的讲课。同事们对他的态度也好不了多少。但与他的著作在那年秋天所受到的冷遇相比，所有这些都相形见绌。他后来回忆道，他的著作遇到的是“全方位的敌视”[59]。甚至连博姆-巴维克都视它为眼中钉肉中刺，以至于他第二年特意写了一篇长达六十多页的文章来驳斥熊彼特书中的观点。更令他沮丧的是，包括他的恩师在内，只有少数几位经济学家愿意对他的书作出评论。

这时，熊彼特收到了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邀请，请他以首位奥地利交换教授的身份去那里度过1913年至1914年的学年。他欣然接受了这一邀请。但格拉迪丝却明确表示，她不会陪他一同前往。他们的婚姻早在婚后不久便开始走下坡路。也许，一个英国的女权主义和费边主义者与一个维也纳的王子本来就不是天造地合的一对儿；另一个可能的原因，至少据熊彼特本人的说法是，他们两人的性生活都相当混乱。既然知道这桩婚姻是个错误，他也就没有劝她改变主意。1913年8月，他独自从利物浦登上了皇家邮轮卢西塔尼亚号，而格拉迪丝则回到伦敦过起了她婚前的那种生活。

熊彼特的这一趟学术休假极其成功。他极其崇拜纽约，而美国人反过来也对他十分崇拜。不但他亮若珠玉的谈吐令人着迷，他的生活习惯，包括每天花一个小时进行个人修饰，也让美国人惊讶不已。一位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声称，他在该校的首场讲座“得了个满堂彩……他如此与众不同——才华横溢而且思想深刻。”[60]

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写信通知他，经该校理事会成员投票，决定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这无异为他的胜利送上了一顶桂冠。接着，普林斯顿、哈佛等其他著名学府的邀请接踵而来，欧文·费雪甚至邀请他前往纽黑文共度感恩节。在晚宴上，他们谈到了欧洲发生战争的可能。费雪与英国政治家诺曼·安吉尔一样，认为经济的互相融合使得这种可能变得非常遥远。因为如今，许多国家对外国资本过于依赖以

至于他们不敢再为所欲为。而熊彼特只在一旁静静地听着，他觉得这个观点有值得商榷之处。

离开美国之前，如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曾经做过的一样，熊彼特未能抵御乘火车周游美国的诱惑。等他最终回到维也纳，时间已是1914年的8月。

第二幕

恐　惧

序 幕

世界的战争

人们将尽其所能从废墟中寻找到一些残存之物。

——欧文·费雪，1918年[1]

“西德尼绝不相信欧洲列强之间有爆发战争的可能。”1914年7月31日，比特丽斯·韦伯在当天日记中的空白处写下了这句话。[2]股票和债券市场正如日中天，投资者们因此也未能感觉到一场大战的到来。毫无疑问的是，战争是一场经济自杀，因此它也是人所无法想象的。在德国占领比利时后一个星期，萧伯纳便在他与比特丽斯共同创办的《新政治家》杂志上撰文预言，战争在数星期之内便将结束。而比特丽斯在8月初也曾写道，战争“犹如一场噩梦，它的巨大影响遍及所有的社会阶层，没人能明白这场灾难究竟从何而来。”[3]

对她而言，战争是“一段沉闷乏味的时期”。自1914年开始，她的政治影响力便每况愈下，这一势头至今仍在延续。她原本希望自由党主持下的劳合·乔治战时联合政府会给她和西德尼安排一个重要职位，但这最终也没有兑现。于是，韦伯夫妇便开始时断时续地周游世界。一直到1918年，比特丽斯才获得委任加入一个调查男女工资差别的委员会，而履职未几她便后悔接受了这项任命。“我对这个课题丝毫不感兴趣。”她牢骚满腹地抱怨道。此刻让她忧心忡忡的是，当和平终于到来之际，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究竟会是个什么样子。[4]

集剑桥大学教师、公务员、投机商人和艺术赞助商等众多身份于一体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其实相貌平平，性情甚至有些粗鲁。然而，他头脑聪颖，声音动听，行事干练，这些都足以弥补他的弱点。他最好的朋友都是些艺术家和作家，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梅纳德”。他们这帮人被评论家们统称为“布卢姆茨伯里派”。这帮人仰仗他来购买他们的画作，替他们拿房地产方面的主意，还要帮他们投资信托基金。而同时他们一直还在争论，他究竟是不是一个附庸风雅的艺术白痴。

1914 年 8 月，英国向德国宣战。“布卢姆茨伯里派”旋即表示赞同萧伯纳的观点，认为战争是疯狂的，它只会为“少数资本家带来好处”[5]。凯恩斯曾经发誓将固守反战的立场，但后来他的态度却有了转变。他的朋友们对此大失所望。而更让他们气愤的是，他接受了时任财政大臣的劳合·乔治的邀请并出任其在财政部的幕僚。凯恩斯替自己辩解说，战争无疑是邪恶的，但如果他在政府工作的话，也许可以将邪恶尽量减少一些。

财政部的任务不仅要“以最小的成本杀死最多的敌人”，而且在为战争提供资金的同时，还必须保证不危及英镑这一全世界最安全的货币，以及不危及英国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优势地位[6]。随着战争的不断延续，英国向其欧洲盟国贷出了巨额款项，同时，它又不得不从美国借入更为巨额的贷款。因为借贷数量惊人而且关系复杂，“盟友间令人头疼的债务问题成了协约国之间产生恼怒、误解甚至争吵的主要原因。”就任后不到数月，凯恩斯便“成了协约国之间贷款事宜的专门负责人。”[7] 位于怀特霍尔街的政府部门之间通常用备忘录进行联络，而凯恩斯正是一个动笔的行家里手。他始终充满干劲和信心，从来不知疲倦为何物。

战争接近尾声时发生的一件事充分显示出凯恩斯把握全局的非凡能力。1918 年初春，德国人突破了西部防线，打了协约国一个措手不及。上万的德国部队迅速部署在距离凯旋门数里之外，巴黎开始日夜遭受德军的炮轰。远程榴弹炮不断地向外播撒着恐怖，甚至使得伦敦

也人心惶惶。焦急的英国人担心，巴黎万一沦陷，德国人便会将这些巨炮挪到英吉利海峡旁边的沙滩上，那时，英国南部诸郡县便将被炮火笼罩。

此刻，凯恩斯正被布卢姆茨伯里一位朋友提出的建议弄得魂不守舍，他根本没有心思去猜测战争的各种可能性。画家兼评论家罗杰·弗莱刚给他打了一个招呼，说是有一批极其出色的现代派作品即将上市出售。埃德加·笛格斯原本是个艺术商人，但后来他全身心地投入了绘画创作。在他的艺术生涯中，他从来都是多种风格兼收并蓄。因此，他收集了数百幅马奈、柯洛、安格尔、戴拉克鲁瓦等当代艺术家的作品。而这些艺术珍品即将于3月26、27两天在巴黎的罗兰画廊被拍卖。

凯恩斯意识到这是一个拯救文明的机会，而他热爱人类的文明，他的祖国也正在为此而战。他没有作片刻的犹豫。他即刻与英国伦敦国家美术馆的馆长查尔斯·福尔摩斯取得了联系，他极力撺掇馆长向战时内阁申请一笔两万英镑的活动资金。据罗伯特·斯吉多斯基的描述，凯恩斯很清楚，他财政部的上司们在全体国民都在作出巨大牺牲的时候对张口便要这么一大笔款子一定不会同意。于是，他便将整件事改头换面说成是购买债务违约保险。他写给财政大臣的备忘录是这么开头的："我们与法国财政部的协议规定，英国政府在法国的开销可以用来抵消我们给他们的贷款。"而战争进行到现在这个阶段，法国欠英国的钱数额太过庞大，英国的利息能否收得回都成问题，更不用说收回本金了。凯恩斯据理力争，他说"将这些无价的艺术珍品统统收回来比买那些靠不住的法国债券不知强到哪去了。"[8]

几天以后，凯恩斯给画家邓肯·格兰特（凯恩斯以前的同性恋人，凡妮莎·贝尔的现任情人）发去了一封报捷电报："买画的钱到手了。"[9]与此同时，他想方设法为自己和福尔摩斯弄到了参加在巴黎举行的协约国大会的邀请。他们在"军舰和飞机的共同护航下渡过了英吉利海峡"，然后乘火车到达了巴黎。[10]为了不惊动法国的艺术品商人和喜欢刨根问底的英国记者，福尔摩斯乔装打扮戴上了假胡须，而且他和凯恩斯都双双使用了化名。这个计谋极其成功。拍卖会过后两天，

凯恩斯在给母亲的信中得意地写道，“我自己买了四幅画，帮国家也买了二十多幅。”[11]

事实上，他买回了一幅塞尚的苹果静物画及戴拉克鲁瓦的两件作品，而福尔摩斯则将二十七件绘画和油画带回了国家美术馆，其中包括一幅高更的静物画和马奈的《女人与猫》。被德军占领的威胁迫在眉睫，因此这些艺术品的价格暴跌。尤其让凯恩斯高兴的是福尔摩斯花掉的资金只有原来预算的一半。他从巴黎刚回来，凡妮莎·贝尔便写信告诉罗杰·弗莱说，“昨晚梅纳德突然回来了，有人用车把他送到了巷口，他说他有一幅塞尚的画还放在路边上，邓肯赶紧跑出去把它拿了回来。”[12]

德国与奥地利结盟并加入了战争，这使身为亲英派和拥护君主立宪的约瑟夫·熊彼特惊恐万分。1914 年 12 月，他收到了征兵通知，他立即递交了永久免除兵役的申请，他的借口是他是格拉茨大学唯一一名经济学教授。格拉茨大学在维也纳西南，坐车有约两个小时的路程。自 1911 年起他便在那里任教。他曾经希望在政府谋个顾问的差使，这样他便可以尽量多地呆在维也纳，并替各党派的政客们出谋划策。（他的私生活依然混乱如故，格拉迪丝虽然尚未同意正式离婚，但她已宣布打算永远留在英国。）然而，对于他自己的党派，保守的基督教社会党而言，熊彼特的立场过于激进。但对社会党来说，他又过于保守。战争越拖越久，他也变得越来越沮丧，因为“他孤立无援，根本无法发挥任何影响”。

熊彼特对这场战争持反对态度。他向皇帝及其谋士们进言，劝他们与协约国单独议和。其实弗兰茨·约瑟夫也几乎这么做了。他并劝他们在战后一定要与英国结盟。在德奥宣布投降的前夕，他仍然将两件事视为自己的使命而为之四处奔走：其一，他反对奥地利在战后与德国结成一个经济和政治的联合体，即德奥合并，而这种论调近来一直甚嚣尘上；其二，奥地利的中产阶层对欧洲民主制度和私人企业的未来越来越抱听天由命的态度，熊彼特对此极其反感。在战争最后几年里，他一直在为战后奥地利政府可能碰到的难题未雨绸缪。

在停战条约签订之前六个月，熊彼特在维也纳大学举办的一场公开讲座中向世人展示了一幅战后经济恢复的蓝图。和凯恩斯一样，他也是个乐观主义者。在根据他的讲座而编成的《税务国家的危机》一书中，他对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势在必行的观点进行了驳斥。他预言，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即他所谓的“租税国家”，将能经受住战火的洗礼。他指出，危机并非来自社会主义已经取得的胜利，而是来自选民们期待享受福利而又不愿纳税二者之间的巨大差距。民主政府所面对的主要挑战是要避免陷入长期的预算赤字和通货膨胀。

即使是那些经历过这场“野蛮残暴和谎言”战胜了文明的年轻人，他们都认为文明将会再一次大放异彩。[13]1918 年 8 月 31 日，上百名士兵等候在阿尔卑斯山一座度假别墅的火车站台上。四年前，皇帝就是在此向塞尔维亚宣战。一个相貌奇特的人在队列中踱来踱去，他身材矮小，脸紧绷着，浑身散发着令人紧张的能量。他穿着联军制服，身体瘦削，头发行将变白，蓝色的眼睛看去十分冷酷，他踱至一名干瘦的下士面前问道，“你不是哈耶克家的吗？”而下士的回答是，“你不是维特根斯坦家的吗？”[14]

哈耶克和维特根斯坦是维也纳最显要的两大家族。前者出了很多政府高官，而后者则出了许多富裕的产业家及艺术收藏家。虽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是表兄弟的关系，但后者的年龄其实可以当前者的叔叔。他们俩在家庭聚会上除了简单的寒暄之外，从未有过深入的交谈。但他们二人不约而同在数星期内相继自愿参军并且强烈主战。原因之一是他们希望面对死亡能使他们成为更优秀的男人。他们俩忍受了长达数月的缺衣少食居无定所的生活，以及流感、疟疾和种族间日益紧张的敌对情绪。他们都参加了皮亚韦河攻势，这是奥匈帝国军队进行的最后一场毫无意义的垂死挣扎。他们曾亲眼目睹自己的战友将枪举过头顶，在蚊虫肆虐的咸水沼泽中艰难跋涉，一直到他们倒下为止。与其他十万名联军士兵不同的是，他们俩都苟活了下来。

哈耶克想急着回维也纳去，他想知道他加入空军的申请有没有被

批准。而维特根斯坦则向部队请了假要去与一名出版商见面。该出版商对他背包里装着的一部手稿表示过兴趣，手稿的题目是《逻辑哲学论》。该著作对阐明科学的局限性以及明确现实与语言之间的关系作了一次大胆尝试，该书不久便被公认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去维也纳的列车来了。这二人坐进了同一包厢。列车在夜幕中向东驶去，他们也便开始了交谈。

维特根斯坦在喋喋不休地谈论卡尔·克劳斯[①]。此人创办的反战刊物——《火炬》曾对虚伪的奥地利媒体及所谓的寻找和传播真理是“天才们的职责”的说法进行过大肆嘲讽。维特根斯坦的悲观使哈耶克十分不安，他觉得维特根斯坦已经滑到了“鄙视人性”的边缘。但同时，他也被维特根斯坦对“真理的热烈追求”而深深感动[15]。到维也纳之后，他和维特根斯坦便各奔东西。后来，在另一场世界大战期间，哈耶克终于写成了《通往奴役之路》一书，这也让他终于履行了他自己对真理应负的职责。

在未经历过战火洗礼的年轻一辈中，凯恩斯的门徒弗兰克·拉姆塞是最出类拔萃的一个。和凯恩斯一样，拉姆塞出生于一个历史悠久的剑桥家庭。他父亲是一所学院的院长，而他弟弟后来则成为了坎特伯雷的大主教。拉姆塞自幼天赋异禀，他十六时便翻译了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十九岁时，他针对凯恩斯关于概率的一篇论文写了一番评论，该评论对凯恩斯的打击如此之大，以至他随后便放弃了一切跟数学沾边的努力。拉姆塞还被英国权威哲学家伯特兰·罗素钦定为《数学原理》一书的修改人，该书是罗素和阿尔伯特·诺斯于战前共同撰写的。他们当时的创作动机是想将全部的数学精简成几条简单的逻辑规律。一战爆发时拉姆塞才十一岁，而战争使他和其他众多的中学男学生一样变得格外激进。他提出要从数学专业转到经济学。他说，他认为经济学更有可能让世界变得美好。他的言行让校长气不打一处来。拉姆塞没有作茧自缚只专注于数学或经济学中间的一门，相

① Karl Kraus（1874—1936），奥地利犹太裔讽刺作家。

反，他成为了一位对这两门学科都作出了思想贡献的哲学家。拉姆塞在二十六岁时死于一次拙劣的手术事故。此前他仅仅在《经济杂志》上发表过两篇论文，但如凯恩斯曾经预言的那样，这两篇论文都成为了经典之作。

拉姆塞性格无拘无束，天马行空，他酷爱文学和心理分析。许多女人都对他心生爱慕。凯恩斯认为，虽然正式的逻辑有这样那样的局限性，人们总是能依靠想象找到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甚至当他还是本科生的时候，他就对“社会的未来是由强大的客观力量决定的”这样的观点不以为然。虽然该观点似乎已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所证明。“使徒会”是剑桥的一个秘密社团，凯恩斯和拉塞尔读本科时都曾经是该社的成员。在该社的一次会议中，拉姆塞大肆宣称，“广阔无垠的天堂”也吓不倒他。“天上的星斗也许很大，但它们不能思考，也不能去爱；而这些品质在我看来比体积的大小要重要得多。”他接着还说，“在我脑中，世界的景象是一幅高屋建瓴的远景，而不是一个可大可小的模型。画面的最前方被人类所占据，而那些星星每个都只有三便士的银币一般大小。”[16]

人类的生命和资本在战争中的耗费之巨曾让欧文·费雪惊讶得瞠目结舌。因此，他在为公共健康和战后和平联盟的建立而辛勤工作的时候也格外努力。在 1914 年到 1918 年期间，他帮助成立了生命延展研究所。该机构的目标是推广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并在此基础上“促进健康保护，增强人类活力”[17]；他还与人共同撰写了一本名为《怎样生活》的畅销书。该书讲述的内容和我们今天所说的“保健”大同小异；同时，他还为全面禁酒做了大量宣传。虽然他支持美国加入对德作战，但这意味着年轻一代中的精英分子即将被送上战场遭受屠戮，因此他也为这将给“优生学”带来的负面影响而伤感不已。他还担任了一个劳工组织的主席，并且不断为安全生产、自动提高生活费工资以及实行全面健康保险的立法而大声疾呼。令人奇怪的是，这场战争让他对现代科学和人类素质的信心不减反增。

但不久他便遭受了一次沉痛打击。如果换了一个不那么自信的人，

也许早就开始对自己的信念产生怀疑。1918 年春末，在经过了数月的焦虑和不安之后，他终于被迫面对一个令人痛心的可能：他女儿，时年二十四岁的玛格丽特，可能患上了无法治愈的精神病。玛格丽特和费雪非常亲近，而且她刚刚订婚不久。就在她的未婚夫被任命为军官后不久，她开始不停地谈论奇怪的预兆、上帝和生命永恒。她还坚持说，她的未婚夫会被打死。[18] 后来，很显然她已开始听到来自另外空间的声音。她的行为举止变得越来越古怪。费雪带她去了上曼哈顿区的布鲁明黛尔精神病医院。诊断结果是毁灭性的：她患的是早发性痴呆。费雪无法接受玛格丽特的病根本没有可能痊愈的说法。他开始利用他在医学界的人脉关系四处打听，以期能找到乐观一些的病情预测。

他很快找到了位于特伦顿的新泽西州立医院的医务主任亨利·卡腾。卡腾在医治精神分裂症方面素来有许多成功经验，他是一位精神病专家兼医疗改革家。他坚信，精神疾病都是由“病灶性感染”引起的。他与持类似观点的其他研究人员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敢于将自己的这套理论运用在对病人的治疗上。他会大胆去除病人被感染了的牙齿、扁桃体、结肠和生殖器官。他声称，自战争爆发开始，他用此方法已治愈了数百个原本毫无希望的患者。

他的这些话对此刻的费雪来说无异是天籁之音。作为父母，他一心只想拯救他的孩子，而且他也一贯相信，现代医学能够创造奇迹。他为终于找到了一个能够制服病魔的人而欣喜万分。1919 年 3 月，他将女儿转到了卡腾的看护之下。当医生报告他说发现了“明显结肠杆菌”的迹象时，他同意了医生的治疗方案。卡腾旋即摘除了玛格丽特的两颗智齿。当她尚处于疑虑、幻想、冷漠、迷惑的状态之下时，他又摘除了她的子宫颈。在此手术前后，他还数次给她注射了她自己身上的链球杆菌，最后一次是在 9 月。后来，卡腾在普林斯顿的一次发言中不得不承认，对二十四号患者的“治疗是失败的”。玛格丽特于 1919 年 11 月 19 日死于败血症，当时她年仅二十五岁。[19]

女儿的去世使费雪身心交瘁。然而，他从未对卡腾所谓“治疗”的可信度产生过丝毫怀疑；对卡腾所说的玛格丽特精神病的起因，以及她的间接死因是她父母未能及时处理她受到影响的智齿以及她经常

性的便秘，费雪也深信不疑。而且，他对现代医学的信仰也未因此而有丝毫动摇。如果说这件事真对他产生了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他对工作变得更加的狂热。他反复提醒自己，玛格丽特的去世和世界大战这双重不幸一定能带来一些好的结果。在他看来，这二者是紧密相关的。他预言，人类社会将进入“一个妥善保护生命的阶段”，科学将被用来延长人类的寿命和改善人类的健康。“在一段时间里，战争消耗了很大一部分世界，并且将之摧毁殆尽。”他说，“但人们将尽其所能从废墟中寻找一些残存之物。”[20]

战争带来的破坏是难以估量的：八百五十万人丧生，八百万人永久性残废，这其中年轻人占了大多数。奥匈联军百分之九十的军人非死即伤，或是沦入被监禁或下落不明的命运。法国四分之三的军队也落得同样的下场。“我和西德尼的侄辈当中总共有十七人参加了这场战争，我们家族最终的伤亡结果是三死四伤，另外还有两个受了其他重伤。”对于这场战争，比特丽斯·韦伯曾有如下的记载，“每天，当你碰见一个熟识的女人，如果你发现她神情悲戚，面容枯槁，举止无精打采，那你就不敢问起她丈夫或儿子的情况。”[21]

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全球化的进程，它中断了经济发展，切断了各国之间在自然、金融和贸易上的联系。它导致政府和企业破产。它迫使一些羸弱且民族主义盛行的国家不得不采取孤注一掷的措施，这些措施的初衷原本是为了防止革命爆发，但结果却往往使革命来得更快。战争结束之后，胜负双方的政府都因所欠下的巨额债务而几近瘫痪。而同时，他们还要遭受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严厉打击。贫困、饥饿、疾病，马尔萨斯理论中提到过的那些灾难又一次趾高气扬地卷土重来。无论是在伦敦、巴黎，还是在柏林和维也纳，这些欧洲大都市里的人们都苦涩地意识到，他们的国家比从前要穷多了。弗吉尼亚·伍尔芙曾就这场战争及其巨大的破坏性进行了大量的反思。在她 1915 年出版的小说《远航》中，她借一位衣食无忧住在伦敦西区的老妇人之口评论道，“闹了半天，贫穷原来如此普遍，伦敦就是一座挤满了无数穷人的城市。”而在她十年后出版的小说《达洛维夫人》中，

“战争虽然结束了”，但那些战争的受害者们，比如有自杀倾向的老工人塞普提玛斯·史密斯和贫困的社会主义拥护者多乐丝·吉尔曼，他们遭受的痛苦却仍然持续了五年之久。而在她另一部小说《到灯塔去》中，拉姆塞太太和她全家还受到了肺结核的侵袭，这种疾病也是战争留给人们的遗产之一。

战争在沉重打击了私人财产的合法性、自由市场和民主制度的同时，也为从莫斯科到慕尼黑的暴力革命提供了强大动力。“全世界的人们无不欣喜若狂，”比特丽斯·韦伯在休战书签订当天写道，“在世界各地，君主制的宝座正一个个被摧毁，有产阶级正在暗暗发抖。”[22] 在奥地利和英国，熊彼特和凯恩斯从各自的角度出发，试图竭力让他们的国民相信，政治伤口的愈合完全有赖于经济恢复；平息人们高涨的革命激情也同样有赖于它。他们二人双双指出，要想重振世界经济，协约各国作出的政治决定就必须符合经济规律；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应该放弃用战败国的战争赔偿来弥补他们战争损失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提出，各国应当稳定货币，恢复信贷流通，并且去除贸易壁垒。

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和许多西方知识分子一样，他们都认为“这场世界大战表明，我们的文明的确有毛病。”[23] 当乍闻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消息，他最初的反应是谨慎的乐观。他几乎已相信，即使苏维埃俄国尚称不上是最理想的国家形式，但它至少也是未来主义者一次规模宏伟的尝试。但他终究没像其他人一样被自己的憧憬和恐惧冲昏头脑，他决定，在自己有机会亲身体验这个革命者们自我标榜的新型社会制度之前，他不应草率地下任何结论。

第六章

人类的末日：熊彼特在维也纳

“属于社会主义的时刻尚未到来。”

——约瑟夫·熊彼特，1918年[1]

“奥地利如果真的变成了废墟……我想我们一定有足够的材料用于废墟重建。”

——弗朗西斯·奥本海默，英国财政部代表，1919年[2]

1918年11月11日，停战协议正式生效。韦伯对当天的描述是，整座伦敦城爆发出“一片喧嚣的声浪”。在巴黎，“狂热的庆祝”活动一直持续到次日拂晓。甚至连柏林的气氛也同样是“欣喜若狂”。德国人为终于摆脱战乱同时也摆脱了那个将他们拽入战乱的王朝而兴奋不已。[3]在欧洲四大首都当中，只有维也纳悄无声息。一大群身着灰色军装的人聚集在国会大厦门前的林荫大道上，几名士兵将代表帝国的鹰徽从他们的军装上扯了下来，并且迫使其他人效仿他们的举动。同一时间，在离该地仅仅一英里之外的上坡街，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正坐在他的书房里。他在日记本上写下“战争结束了”这样一行字。耐人寻味的是，他并未使用“和平”这个字眼。[4]

由数国拼凑而成的奥匈帝国在几星期前便已经分崩离析。维也纳，这座与柏林人口数量不相上下的城市，发现自己突然成了一个“国土残缺生活贫困的共和国的首都”。这个国家此刻仅拥有六百万民众，相

当于以前奥匈帝国人口数量的十分之一。

在帝国国会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期间，愤怒的议员们纷纷将桌上的墨水池和他们的公文箱向国会议长的头上扔去。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南斯拉夫都纷纷从帝国脱离了出去，许多原本讲德语的国土也随着它们的离去而沦丧。最终的结果是，现今奥地利东部和北部的边界被划在离维也纳郊区不远的地方。[5] 而且，那些新冒出来的奥地利的邻国对这样的边界划分仍不满意。他们动辄以入侵相威胁。 而奥地利却根本没有自我防御的能力，更别提与它们作针锋相对的回击。同年11月12日，皇帝及其一家遭到了流放，新的共和政府正式宣告成立。曾经拥有四百万雄兵的奥匈联军被全部解散。在提出停战协议到最终签署的数日之间，几十万士兵被监禁在意大利的战俘营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一直到许多年后才得以陆续返回自己的祖国。

1917年2月，战败与饥饿使得革命的烈火首先在圣彼得堡被点燃。而后，它便一路向西蔓延，直扑布达佩斯、柏林和维也纳。当时的奥地利临时政府正为两名马克思主义者所把持。自1918年1月以来，观察家们都理所当然地一致认为，共产党领导的起义将无法避免。元旦过后不到一星期，戴姆勒·奔驰工厂的激进分子为了抗议面粉定额供应被减半而率先发难。将近五十万被帝国征集来进行军需生产的男女工人们先后弃厂而去。匈牙利起义和德国革命迫在眉睫的传言在维也纳街头不胫而走。

此时，这座城市正张开双臂迎接战败返乡的奥匈联军的士兵。反战讽刺作家卡尔·克劳斯在《人类的末日》一书中曾向人们发出过警告，这群心怀怨恨忍饥挨饿的人个个全副武装，他们将把维也纳变成一个浴火的战场。“与无法获得和平与安宁相比，战争就像儿童玩的游戏一样不值一提。”[6] 在发自威尼斯的火车上，包括年方十九的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在内的几十万人逐渐脱离了自己原来的部队，他们纷纷加入到一场向北行进的大规模迁徙的行列之中。他们“饥饿难耐，毫无组织和纪律”。一路上，他们用军马、车辆甚至枪炮换取粮食，他们抢劫沿途的店铺然后将其付之一炬。11月初，这支庞大的人流试图经由意奥边境上狭窄的勃伦纳山口进入奥地利西部城市因斯布鲁克。挥

舞着枪支的士兵将所有的火车都霸占了。“车顶上，站台上，车轮的缓冲器上，车厢门口的阶梯上，甚至连火车头的发动机上都像蜜蜂一样挤满了士兵。”[7]一名记者曾如此描述当时的场面，“从远处看，每列火车上都像有黑压压的一大群蜜蜂在狂乱地飞舞。”火车从隧道和桥梁下高速经过的时候，有数以百计的人从车上滚落下来，死于非命，他们的尸体横七竖八地在铁轨两旁的路基上散了一地。

为了使奥地利免遭“血腥的无政府状态”的破坏，那些名存实亡的帝国官员依然不管不顾地让这些火车继续日夜通行。据一位英国商人说，意大利的里雅斯特到维也纳铁路专线的运输量曾经一度高达平均每二十分钟运送七万到十万人次。由于担心出现无政府状态和共产分子乘机起事，官员们在维也纳市郊设立了检查站。所有的士兵在入城之前必须交还他们的武器。而城区内依然有警察在照常履行职责。不久便发生了红色卫队“解放”了数个食品和武器仓库的事件。消息传来，社会民主党领导的政府即刻召集失业的工厂工人，并组织起了民兵队伍。由于这一系列措施，同时也因为绝大多数匈牙利、捷克和南斯拉夫士兵都一心想尽早回家，因此相对而言，维也纳还算是保持了平静。

然而，刚刚回家的士兵们却发现，他们坐守着一座危城。在这座中产阶层人数最多的欧洲城市里，几乎找不到任何粮食和燃料。几乎从新共和国宣告成立的那一刻开始，维也纳便再也没有往外运出过由它生产的任何产品。同时，也没有任何牛肉、牛奶、土豆和煤从外面被运进来。自 1683 年遭遇了那次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短暂围城以来，维也纳还从未像现在这样与外界隔绝过。 到慕尼黑、苏黎世或是近一点的布达佩斯去，虽然不是不可能，但也极其困难。邮递服务时有时无，电报则需要两到三个星期才能送达。邮寄的包裹不是根本就到不了收件人的手中，就是送到时里面的东西早已不翼而飞。“千万别再寄东西了，它们都被海关官员和铁路工人给吞了。”弗洛伊德就曾这样警告过他在英国的亲戚们。[8]

无需赘言，一个拥有两百万人口的城市必须从其他地方购买粮食以供食用。战前，维也纳和几个紧挨阿尔卑斯山的省份都是从帝国非

德语系的地区进口他们所有的土豆、牛奶和黄油及其三分之一的面粉和三分之二的肉类[9]。早在战争期间，匈牙利就中断了它对奥地利的全部出口。而如今，奥地利的新邻国们，主要是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又都对其实施了封锁。正如一名英国高级特使所指出的，“上百年来，贸易都遵循着一定的渠道。人们之间的联系方式也是在此基础上形成。这些渠道和方式突然被堵塞了……而结果就是，相互毗邻的一些城区，有的在忍饥挨饿，而有的却出现了粮食过剩。”[10]

其实，奥地利有大量的武器、食盐、木材和工业产品可供出售。而捷克斯洛伐克则多的是糖、土豆、蔬菜和煤；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则有牛奶。虽然省级政府与新邻国之间关于物物交换的洽谈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但民族主义的政治因素以及人们对这些邻国自身存在物资短缺的担心，都使得物物交换迟迟无法进行。

更糟的是，协约国宣布，他们对德国的战争封锁将一直持续到所有同盟国成员都在协约国提出的和约上签字为止。这就意味着德国，这个现在唯一一个仍愿意卖东西给奥地利的国家将无物可卖。当时，赫伯特·胡佛[①]曾受美国政府委派来作事实调查。他不无辛酸地评论道，“那些和平制定者们使尽浑身的解数，将奥地利变成了一个没有粮食的国家。”[11]

奥地利各农业省份也开始了对维也纳的非正式封锁，这对局势的恶化起了难以估量的影响。数个省份还发出了要与德国和瑞士合并的威胁。在那些农业地区，战争已将国内农业摧毁殆尽。男人们都参军在外，不能在土地上从事耕作。牲畜本是农肥的主要来源，却都被宰杀以供军用。而且，因为政府强迫农民按规定价格出售粮食，这更使得真正耕种的人减少，囤积居奇的人反而增多。粮食短缺的现象日益严重，在战争的末期犹然。农业地区便开始采取自发行动，他们纷纷在当地颁布禁止粮食外销的命令，并通过了禁止旅游者前来参观的法律，他们还组织突击抽查行动以防止任何人将粮食从本地区带出去。

新政府继承了前政府沉重的战争债务，却未继承到它的任何黄金

---

① Herbert Clark Hoover（1874—1964），美国第31任总统。

储备。因此，它没有为国民购买粮食所需的资金。帝国中央银行的最后一批黄金已被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两国政府据为己有。胡佛于12月中旬抵达巴黎，他此行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能重新恢复粮食贸易的计划，如有必要，还可直接运送粮食进行救援。奥地利金融局势的恶化让他深为震惊："从前依法纳税供养军队和政府官员的公民现在都已不在了。于是，要给军队和铁路工人发薪支饷的政府也就只能破产了。"[12]

其实，战争刚一开始，粮食短缺的严重问题便已露出了头角。早在1915年的维也纳，松软的白面包已被又黑又硬的战时面包所代替。而"整星期吃不上肉"的情形也越来越常见。所有的货物都是劣质品。奥地利记者兼作家斯蒂芬·茨威格曾经如此描写道：面包"根本就不是面粉做的，咖啡是用烤过的麦粒熬出的汁，啤酒就是一些黄颜色的水，巧克力的味道跟涂了颜色的沙子一般。"[13]政府征用和分配粮食的行动使越来越多的粮食转入地下的黑市。虽然现在战争的敌对行动已经结束，城市里的各种物资供给仍在继续恶化。路德维克·冯·米塞斯，这位奥地利杰出的企业经济学家，曾回忆说，"在停战协议签署后的头九个月里，维也纳由始至终都没有多于八到九天的粮食储备。"[14]政府的仓库是唯一合法的食物来源，仓库里只有数量少得出奇的腌白菜和战时面包，家庭主妇们为了能分到一些而不得不在仓库外排上几个小时的长队。面包定量是每人每星期六盎司，这相当于战前平均消耗水平的四分之一。肉类定量则下跌至了战前水平的十分之一。一周岁以上的儿童根本没有牛奶定量；据一位专家估计，每天卡路里的平均消耗量下降到了一千卡多一点。这个水平只能让人的生命勉强维持短短数星期。

大街上的人们个个面无血色，无精打采，而所有的小孩看上去都比他们的实际年龄要小三岁。"现在我们真的是弹尽粮绝了。"弗洛伊德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与过去的几个月，当然还有接下来的几个月的艰苦相比，四年战争时期的困难简直不值一提。"[15]弗兰茨·卡夫卡当时是一家保险公司的职员，他写了一篇名为《绝食艺人》的短篇小说。它向人们描述了挨饿的艺术。战前，肺结核在中产阶层的居住区里已

经几乎绝迹，而现在它又变得司空见惯。战前，每天大约有四十到五十名死者下葬；而时至1920年早些时候，每天下葬的死亡人数骤升至两千名。奥地利剧评家、小说家兼《小鹿斑比》的作者菲利斯·沙顿至今还记得，“当获悉关在动物园笼子里的狮子、豹子、大象和长颈鹿等动物在漫长的饥饿中纷纷死去的时候，人们只能耸耸肩膀表示无能为力。如今有多少人正躺在床上被死神的阴影笼罩，他们苟延残喘，形销骨立，一直到生命悲惨地终结。”[16]

城市自身也在日渐衰败。人们普遍呈现出忍饥挨饿的典型症状：疲倦，漠然，消极，间或来上一阵癫狂的举动。虽然有大批退伍军人、政府官员和数千名逃避东方大屠杀的犹太难民的涌入，这个在二十世纪初曾经盛极一时的城市的人口缩减了达数十万之多。如同人体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会开始从自己的肌肉中吸取养分，整个奥地利全国也都在依赖以往积攒的家资度日。政府甚至曾一度宣布，奥地利愿意典当古老的哈布斯堡王室拥有的“所有物品”，包括其城堡、宫室、狩猎用的小屋、狩猎禁区和别墅。[17]

“寒冷封锁”使得粮食封锁造成的悲剧变本加厉。停战后一星期，住房供暖所需的煤便已告用罄，而所剩用于做饭的煤也只够一个星期的用度。每星期的燃料定额包括每户一个二十五瓦的灯泡，一支蜡烛和一杯多一点的燃料。对那些中产阶层家庭而言，连洗澡和洗衣服甚至都成了奢望。所有的学校此前已经因流行性感冒的传播而关闭，现在它们都已经宣布放“寒假”。店铺刚到下午四点便纷纷关门。餐馆酒吧被告知在九点以后不许待客。有人将屋门劈了当柴，有人去扒树皮，有人干脆去公园里伐树。整个维也纳以前被森林覆盖的地带现在都裸露无遗。维也纳原先华丽无比的通衢大道两旁的电线杆和植被早已无处可寻。 连墓地里的木制十字架也神不知鬼不觉地不翼而飞。一位来访者曾如此写道，“维也纳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了燃料短缺的影响。”[18]

人们陷入了左右为难无计可施的境地。正如社会民主党的《工人日报》所指出的，“人们需要木头是因为他们没有煤，但木头根本就无法运出去因为没有驱动火车所需的煤。”[19]据历史学家查尔斯·古利

克估计，新的奥地利共和政府继承了帝国原来百分之三十的工厂工人，百分之二十的蒸汽制造能力和仅仅百分之一的储煤。没有燃料意味着工厂、高炉、面包房、生产砖、石灰和水泥的工厂，以及发电厂都得关闭，而这无异于掐住了工业制造、房地产建设和能源生产的脖颈。在维也纳十六个拥有一千名以上员工的工业企业当中，有一半被迫永久性关闭。在这座曾经走在电气化最前沿的城市里，停电成了家常便饭，甚至圣诞节当天也未能幸免。电车服务因为需要用电而不得不中断。铁路交通只限运送粮食的货车使用。于是，在能源短缺、军需生产萎缩和大量军人复员的情况下，失业大军一直在继续膨胀。

1918 年圣诞前夜，在零时钟声敲响之前，英国派驻前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官方代表托马斯·坎宁开车来到玛丽亚希尔费大道。这是维也纳最雄伟壮观的街道之一。“街上黑灯瞎火，毫无生命活动的迹象。”他在日记中写道，“以往美丽的老城变成了一座死城。”[20] 而威廉·贝弗里奇[①] 则在节礼日[②] 那天在一个市场里遭到了几个家庭主妇的抢劫，她们像来自地狱的鬼使一般纠缠在他身边，口里直嚷着她们需要食物。[21] 维也纳曾经是欧洲最伟大的城市之一，而现在似乎已滑至死亡的边缘。

本来约瑟夫·熊彼特眼下最大的理想是成为帝国最新一届内阁的商务部长，但这一梦想在停战前数星期已然化为泡影。从那以后，他便回到格拉茨聊以度日，同时也漫不经心地为春季开学做准备。随着首次全国大选的临近，社会民主党和右翼基督教社会党有望组成一个联合政府。熊彼特私下与左翼党派进行了联系，看看有无任命他为内阁财务大臣的可能。一直以来，他都是一个伯克式自由党人，他拥护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主张将政府干预维持在最低水平。他与社会党人的主张并无严重冲突之处。当时，临时主政的两位社会民主党人都是他大学时期的老友。奥托·鲍尔是一位同情泛日耳曼主义的中产阶

① William Beveridge（1879—1963），福利国家的理论建构者之一。

② Boxing Day，圣诞节日后的第一个周末。

层犹太人，他是社会民主党领袖，现任过渡政府的外交大臣。而仪表堂堂，为人豪爽的卡尔·雷纳则担任首相，他原是一位摩拉维亚农民的第十八个儿子。虽然此二人都信奉马克思主义，但在政治上他们却与费边主义而不是布尔什维主义更为接近。但最终，另外一个人得到商务部长的职位。

然而，新年伊始，一个新的政治机遇便不期而至。另外一位大学同窗，此人现在是德国社会党人而且后来还成为了魏玛共和党的首任财务部长，他从柏林给熊彼特来信，并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建议。数位社会党的精英于前一年 12 月组成了一个顾问委员会，专门为新一届德国政府的社会主义过渡，尤其是筹备中的煤炭工业国有化提供咨询。在信中，他问熊彼有没有兴趣加入这一顾问组。

令人不解的是，那些此刻操纵着六千万人命运的政治家们虽然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但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经济该如何运转却从未有过深思熟虑。马克思就曾经特意警告他的信徒们，不要一头沉溺于“乌托邦的幻想”之中。甚至连德国马克思主义的权威人士也承认，这种想象中的飞跃不过是“一种不错的脑力游戏”[22]。然而，随着德国工人阶级变得更加激进，实现社会主义的要求也变得日益迫切。11 月停战以来，陆续发生了一些暴动和罢工，还有人要求提高工资，有人以暴力相威胁，还有企业职工“自发征用”企业的现象。德国劳工阶级已经充当了四年的牺牲品，如今，他们要求获得赔偿。左翼党派的领袖们几年来一直在许诺，会将企业控制权从雇主手中夺过来移交给工人。而现在，虽然已经执政，但他们却又意识到，如果不能恢复生产，任何政府都将无法生存。这个顾问小组的任务就是提出建议以解决这一矛盾。

熊彼特欣然接受了这一邀请。在他看来，借道柏林也许是通往维也纳的一条捷径。当时，德国和奥地利都是社会党人在执政，这两个德语系国家合并的可能性在日益增加。时任奥地利外交大臣的鲍尔也是该顾问委员会的一员。而且，熊彼特期待该委员会将采纳渐进主义的观点。后来，熊彼特为他加入这项社会党的计划自我辩护时说，“如果有人一心想要自杀，那么最好有个医生在场。”[23] 但当时，绝大部分

投资家、银行家和企业家们都没料到该委员会提出这样的建议。爱德华·伯恩斯坦[①]，这位德国著名的社会主义者也是委员会的成员。他前不久曾发出过如此的警告，“我们绝不能没收富人们的全部财产，那样做会使整个生产体系陷入瘫痪。”[24] 而鲍尔则想以从管理人员、工人和消费者中推举出来的代表来取代公司董事会，他强调，“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社会主义企业和私人企业仍将齐头并进，各司其职。[25]

熊彼特分秒必争，他即刻向格拉茨大学提出了请假申请，并马上得到了院长的许可。去柏林的行程原本只需两日，最后却花了四天。当他最终抵达普鲁士的首都时，他发现，尽管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时期，人们也绝不能用“死亡”二字来形容这座城市。

1919 年 1 月的柏林：城市免遭协约国军队的占领，战争结束之际，建筑设施虽然破旧，但基本都完好无损。但供应奇缺且物价昂贵。经历了数波遣散而复员的士兵们由愤怒到激动，再发展到如今的诉诸暴力。他们威胁要摧毁整座城市。任何一点偏差所擦出的火星都将引发一场熊熊烈焰。

大爆炸终于在圣诞节和元旦期间发生了。共产党人发动了总罢工，一场全面内战接踵而至。从亚历山大广场到国会大厦，四处都是大批的示威人群。铁路陷入了瘫痪，银行前被设置了路障，大学被迫关门，店铺纷纷打烊。共产党人几乎占领了几乎每一座工厂、发电厂、政府大楼以及报社和电报局。坦克在大街上横冲直撞。在革命党人向政府军投掷手雷和进行了机枪射击之后，德国总理授权军队使用火焰喷射器和野战火炮。惊恐万状的平民们希望逃离这座城市而竞相挤入了火车站，却发现这不过是场徒劳。柏林最为著名的人士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此时已避至了苏黎世，“我正在晴朗的天空底下，一边品尝巧克力，一边悠闲地读着关于柏林的新闻。”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如此写道。[26] 而熊彼特却更喜欢活跃在斗争最激烈的地方。

数位平民职员格外警惕并自发设置了路障。拜他们所赐，德国国

① Eduard Bernstein（1850—1932），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家。

立银行才免遭起义者占领。几个星期以来，社会党的智囊们一直在银行地下室里举行会议。在血雨腥风的混乱中，委员会依旧像大学研讨会一样按部就班地继续其各项议程。他们冷静而慎重地对包括完全国有化和政府实行自由放任政策等各项方案都进行了深思熟虑，同时，他们也就一些实际问题进行了探讨，比如在实行企业国有化的同时，如何才能不危及企业的效益和发明创造的能力。

昔日在维也纳大学博姆·巴维克的研讨会上，熊彼特表现得颇为桀骜不驯，愤世嫉俗。而如今，他又一次采取了同样的态度。“我不知道实现社会主义是否可能，但如果真的可能，那就必须言行一致。”他还很不严肃地说，“无论如何，这样的实验即使是试上一试也是很有意思的。”[27] 他将国有化当作一个技术问题看待。据委员会中的一位银行家回忆，他还说过，“战争结束以后，如果谁想将大型企业通通国有化，那么除了以某一种方式进行，他别无他法。”[28]

最终，如人们事先所料，委员会将自由放任主义和苏维埃式的国有化制度双双拒之于门外。它选择了一条由公共所有权和私人管理相结合的途径。在委员会报告起草阶段，两位自由派委员会成员表示拒绝参与签署。他们自行起草了一份少数派的意见报告。而熊彼特却在多数派的报告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他为委员会所做的工作不久便如同他预期的那样得到了回报。由于他的合作态度和专业技能给希法亭留下了深刻印象，后者因此极力向鲍尔推荐熊彼特出任奥地利财务大臣。委员会的报告最终于 2 月 15 日推出，这天正好是奥地利国会选举开始的前一天。此时，已经有若干维也纳的报纸在暗示，熊彼特将会应邀成为政府部门的一员。两星期后，鲍尔又回到了德国首都。他此行的目的是与魏玛共和国的外交部长乌里希·冯·勃洛克道夫就德奥合并事宜举行长达四天的秘密会谈。（与德国联合是鲍尔的首要任务，他早已抽调作家罗伯特·穆希尔，“正式委以他将剪报分门别类整理备用的任务……而实际上，他的任务是在各式各样不同的报纸上为与德国联合大造舆论”[29]）据委员会的另一位成员回忆，此时“熊彼特正着急想离开。”[30] 在另一轮总罢工和流血暴动爆发前夕，熊彼特和鲍尔一同离开了柏林。

谁能让一个已经破产的国家的货币免遭贬值？谁能在既无黄金也无美元的情况下从国外买回粮食？从边境线到战争赔偿，在所有的变数事无巨细都由在巴黎的协约国决定的情况之下，谁能为这个国家拼凑出一个完整的预算？首相雷纳刚提出任命熊彼特的建议，他所属的保守派基督教社会党便即刻表示了支持。他们这么做其实并非出于对他的信任。在奥地利这样一个反犹太主义的文化里，由于熊彼特与罗斯切尔德家族[①]及其他犹太银行家和商人关系极为密切，因此他在地主和贵族所属的党派看来是一个“犹太同情者”。而且，他还曾对同在格拉茨大学任教的基督教社会党党鞭的晋职加以阻挠。从此事看，他对自己党派的忠诚度也严重欠缺。然而，社会党人仍然考虑了他，因为当时他“被视为经济学领域的一位奇才”，而且他也是扭转政府财务状况危机的最佳人选。[31]再者，由于奥地利的命运被掌握在协约各国的手中，雷纳和鲍尔估摸着熊彼特的亲西方立场以及他在战前发表的反战言论对他而言也将是一笔难得的资产，此外，他在国外的生活经历，他的美国荣誉学位以及他对英语和法语的精通也同样具有不菲的价值。

左右两翼党派的评论员们迅速为熊彼特贴上了“机会主义者”的标签。率先发难的是《晨报》，“一个人同时拥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三个不同的灵魂该是多么美妙啊”。卡尔·克劳斯也称他为“专门从事信仰交换的教授”[32]。尽管如此，熊彼特加入政府为国效力的愿望却是不容抹杀的。如果嗷嗷待哺的新奥地利共和国在谋求和平的同时不能为民众带来面包，那刚刚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则必将失败。而熊彼特却拥有一个恢复经济的全盘计划。对熊彼特而言，能在革命的关键时期出任财务大臣，这给了他一个将祖国从毁灭中拯救出来的机会。

从某种意义上说，新上任的财务大臣和维也纳的普通家庭主妇们所面对的挑战并无不同。安娜·艾森曼格那部不平凡的日记为我们了

① Rothschilds，犹太银行家。

解人们在那段悲惨时期里的日常生活打开了一扇窗口。为了支付家庭所需的食物和燃料，安娜当时只有三个选择：去赚钱，去借，或者是出售自己的物品。而为了让火车能照开，军队能继续巡逻，人们的厨房能不断顿，熊彼特面对的选择也不外乎是这三个。为了生存，艾森曼格及其一家被迫去申请退休金，出租房间，替美国救援组织工作，最后甚至还不得不卖掉艾森曼格博士视若珍宝的在战前收藏的雪茄。而熊彼特能做的则包括收取税赋，引诱银行购买政府债券，动用国家的现金和黄金储备（如果还有的话）。另外，他只能靠出卖国有资产来筹集资金。除此之外，他别无良策。

当然，如果有人打算到外国去买东西，甚至是到邻近的日内瓦去跑一趟，那他就非得与他国货币打交道不可。假如他有瑞士银行户头，那一切就都妥了。麦克斯·冯·诺伊曼就是这么做的，这位布达佩斯的银行家在匈牙利共产党人贝拉·孔发动政变之后，曾经带着全家过了一段短暂的流亡生活。但假如没有类似这样的备用资金，他就必须去赚取或者借外汇。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他从事精神分析的同事们在替英国病人，比如詹姆斯·斯特雷奇[①]和他的夫人阿历克斯治疗的时候，也都曾收取英镑。而艾森曼格一家则是从美国的表亲那里借到了美元。大多数时候，人们都是用克朗兑换英镑或者美元。

由于奥地利赖以生存的物资绝大多数都依赖进口，奥地利的财务大臣就得设法筹集从国外购买物资所需要的黄金或者外汇。如果筹集不到，那他就只能设法贷款或是期待别的国家会免费赠送。但他最重要的职责还是要确保克朗相对于其他货币不会贬值。克朗的兑换价值每提高一分，就意味着奥地利为购买他国的煤和猪肉所支付的克朗数量要少一些。而一旦克朗的兑换价值下跌，奥地利所付出的克朗数便会增加。这就是为什么家庭主妇们都站在外汇交易商店的橱窗边“屏息静气地”等着听克朗价格的最新报告。对财务大臣而言，货币价格波动的后果就更严重了，因为他还要为政府的预算负责。克朗价格的每一次降低都将导致政府赤字的增加，财务大臣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防

① James Strachey（1887—1967），英国精神分析家，弗洛伊德著作的英文翻译者。

止本国货币的崩溃。归根到底这是一场基于信心的游戏。如果人们相信，使用某种货币肯定能完成债务结算，那么人们便愿意持有该种货币。他们之所以有信心当然是因为他们清楚该货币能用来支付他们所欠的债务。因此，每一个财务大臣都必须对本国的货币持乐观态度。即使没有黄金或者外汇储备，就是用空气他也得将本国的货币给撑起来。

维也纳，1919 年 3 月 19 日。熊彼特，这位奥地利历史上最年轻的财务大臣，正在作他就职后的首次演讲。演讲地点是位于市中心的“天堂之门”，这是一座隐匿在小巷之中的金碧辉煌的大理石宫殿。熊彼特不时在台上来回踱步，他挥舞着双手，带着特蕾莎学校学生特有的口音阐述着自己的观点。他时而轻松活泼，时而充满激情。他明白，在现代政治舞台上能否取得成功完全取决于政治家是否拥有鼓动民众，让民众敬服并且与民众进行互动的能力。而要使经济保持稳定则需要有“一个被人民拥护的政府和受人信赖的拥有才干，信念和权力的领袖人物。”[33] 阴暗冷漠的演讲厅里坐满了一个个身着黑色大衣的政府官员，这使熊彼特身上焕发出的能量，乐观和希望更加炫人耳目。

战争给所有参战国带来了沉重负担。连英法两国也都欠下了前所未有的巨额债务。而奥地利的情形则更是到了极致。帝国政府在战争期间未敢贸然加税，因此，到了 1919 年，国家税收仅仅能支付政府开销的三分之二。因为战争债务政府拖欠了大笔利息，而这些拖欠的款项绝大部分都被新成立的奥地利共和国继承了下来。政府还曾经许诺向失业人员提供救济。最主要的是维持民兵所需的费用。而且，国家还得向政府职员们支付薪水，包括数以千计从帝国边远地区纷纷涌回维也纳的官员。最后，政府还必须提供粮食补贴以弥补政府买进价与卖出给消费者价格之间的差距。前帝国政府的如意算盘是它累积起来的巨额债务的绝大部分最终会由战败的一方来买单。 当然，这只能让末日到来的时间稍有延迟而已。

此刻，大多数人奥地利人只能想到两种选择：被德国吸纳或是成为协约国的永久一员。奥托·鲍尔是德奥联合的狂热支持者。同时，

他还认为不必为有那么一点通货膨胀而大惊小怪，因为他将通货膨胀视为“产业经济保持活跃和提高工人生活水准的一种手段”[34]。而多数银行家和企业家则更倾向于奥地利与协约各国结盟。他们同英国财务部的官员们，尤其是凯恩斯有着共同的憧憬和希望，凯恩斯曾说过，“我们决不会坐视奥地利沉沦而不管，协约各国将帮助它理顺财务状况，一笔巨额英镑贷款便能让它所有的问题迎刃而解。”[35]

而熊彼特的观点却与此卓然有别。他相信，虽然奥地利面积缩小了，但它仍然有能力重振其经济。他最根深蒂固的一个信念便是，一个国家如何利用其资源比它拥有何种资源更为重要。只要能让企业家们开创新的企业，只要金融体系能正常运转，只要不为贸易设置过多壁垒，社会面貌自然会焕然一新。经济成功取决于广阔的疆土、大量的人口和丰富的自然资源，这种观点近年来甚嚣尘上，而熊彼特对此却不敢苟同。1919 年，他以德国为对象撰写了一篇关于帝国主义制度下社会学的杰出论文。在文中，他描述了古埃及在长期战争中是如何因为修建大量军工设施而使整个国家财政陷入枯竭的。他写道，“军工企业之所以产生本是出于战争的需要，而现在这部战争机器反过来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制造战争。”英国在追求帝国地位之前便已成为世界上最富的国家。[36] 人均收入水平与英国不相上下的瑞士，其领土面积与苏格兰在伯仲之间。而在战前，维也纳也曾一度是中欧最重要的金融、交通和贸易中心。熊彼特认为，只要协约各国和其他邻国不阻碍奥地利的贸易自由，同时不为奥地利政府恢复其信用的努力设置障碍，他相信奥地利完全有能力恢复其战前所拥有的经济地位，并能重新享受舒适的生活水平。尽管熊彼特也承认，“人们常说，一个德国化的奥地利是行不通的，”但他也坚决地补充道，“我对我们的未来充满信心……千万别以为一个国家若想在经济上生存下去，它自身就必须拥有所需的全部基本原材料……没有我们和我们所作的金融协调，我们的邻国也同样无法生存。”[37]

但毋庸置疑的是，奥地利需要面对它欠下的巨额战争债务。英国历史学家尼尔·福格森指出，缓解这种债务负担的方法有五种，也只有以下这五种：一是互不履行协议，列宁和希特勒就曾先后于 1918 年

和 1938 年使过这一招；按互不履行协议的程度不同还可划分为，降低用来支付债务的货币价值（通货膨胀），实现经济在短期内的迅速增长从而使收入提高的速度超过利息的增长速度。而最后也是最体面的一个方法，当然是将所欠债务通通付清。

为了表示对奥地利东山再起充满信心，熊彼特告诉台下的观众，他个人最希望的是采用最后那种付债方式。因为只有那样做，才能以最快速度恢复投资者对奥地利信用制度的信心，从而使生产得以重振。但是，以往的任何政府在战争结束以后，为了给予富裕的债券持有人以赔偿，都会提高农民和中产阶层的应缴税务。而值此经济急需注入大量新鲜资本之际，提高个人所得税无疑是南辕北辙之举。熊彼特较为推崇的解决办法是通过征收一次性高额房地产税，将奥地利沉重的战争债务负担转移到该国的富人身上去。实际上，他打算先从富人手中大量攫获其现金、债券、股票等流动资产，再用他们自己的这笔钱来偿付他们作为政府债券所有人所应得的本息。

熊彼特的计划与他在其理论专著《税务国家的危机》中所罗列的施政要点如出一辙。该计划的天才之处在于虽然工商企业、农场和其他产业的拥有者可能会出现更替，但它们仍然会被控制在私人手中。在现有产业而非未来收入的基础上征税，其益处便是投资者在为扩大企业生产规模而投入资金的时候不会因为担心税务而踯躅不前。为了减少政府用通胀手段化解债务危机的风险，熊彼特还建议成立一个像英格兰银行那样的独立于财政部的中央银行。同时，他还认为应该努力将克朗的汇率价值维持在目前的水平，而不是回归到战前的水平。所有这些措施都将使外国投资者们的信心倍增。熊彼特将他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外国投资者身上，因此，他要切实保证他们在奥地利的投资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熊彼特的经济恢复计划若要成功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和约中不能有任何妨碍自由贸易的条款，二是要长期性的提高税率以筹集政府开销所需的资金。“目前我们根本无法从外国获得贷款，因为外国人对我们的将来毫无信心。”他曾对他的下属们这么说。他也承认，要想完全消灭或哪怕只是大幅度减少政府财政赤字，则必须施行一系列

艰苦卓绝的努力和措施。他赞成对无产阶级最喜爱的烟酒等“炫耀性消费”征收罪恶税，同时对“属于奢侈品的食物、娱乐、纺织品、店铺、仆役以及服饰等物一概征收销售税。”[38]这样的计划必然会同时招致来自左右两派的非难。他自己所属的政党就对征收房地产业税持死硬的反对立场，当农场也被包括进去的情况下犹然。而社会党人则觉得征收啤酒税简直贻笑大方，他们认为这说明熊彼特对玩政治一窍不通。

熊彼特就任财务大臣不出三日，克朗便开始暴跌。前奥匈帝国军队中的一名下士前往莫斯科接受了训练，并配备了武器。如今在他的指挥下，共产党游击队乘着插满红旗的敞篷卡车在布达佩斯城内耀武扬威。已被解散的奥地利军队中有一位士兵立即启程前往匈牙利首都，向游击队表达输诚之意。人们都认为，布尔什维克的这一胜利意味着匈牙利非但没有向协约各国屈服，它反而已投入莫斯科的怀抱。该事件发生后，当时在战争赔偿一事上持强硬立场的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立即向巴黎和会发出了警告。由于协约各国遭受的“辛劳、流血和破坏”并不亚于战败国，所以他们都指望着用德国及其盟国的战争赔款来重振其经济。但与此同时，列宁主义的信奉者们正忙着将德国引诱到他们的阵营里去，他们许诺给德国一个“全新的开始”。用劳合·乔治的话讲，就是他们将“把德国人民从欠协约国的巨额债务和欠富人阶层的巨额债务”中解救出来，而这些债务都是前帝国为了进行战争借下的。如果协约各国执意把过于苛刻的赔偿条款强加于德国，那结果必然是“从乌拉尔到莱茵的所有地区都将成为共产党的天下”。[39]

几乎在同一时候，劳合·乔治耸人听闻的预言正在变为现实。4月7日，一伙无政府主义者在慕尼黑宣布成立巴伐利亚苏维埃。不出一星期，这伙国产的乌合之众便被一帮以俄国流亡者为主并与共产国际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职业革命家所取代。他们甫一上台，便立刻开始了极其恐怖的统治。一份被警方缴获的俄语文件显示，为了支持这次暴动，列宁的军队当时已准备要经由波兰向德国开拔。而从巴黎传来的消息称，下一张倒下的多米诺骨牌将是被这两个赤色之都夹在中

间的维也纳。随着5月1日，这个传言中的起事日期的日益临近，温斯顿·丘吉尔也对国会发出了如下警告，“饥饿就意味着苏维埃。”[40]

贝拉·孔的确向维也纳工人集中的地区派出了密使，他们甜言蜜语地许诺说，未来的奥地利苏维埃共和国将向无产阶级，而不是资产阶级，提供大量粮食。他们把起义后布达佩斯的生活描绘得天花乱坠，像什么住一流酒店和住末等客栈的价格一样，工人们全家都将住进没收来的皇室宫殿，还有无产阶级将终于取得与资产阶级一样的社会地位，等等。鲍尔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 当贝拉·孔意识到我们并没打算宣布成立奥地利苏维埃时，他便立即向我们发动了攻势。匈牙利驻维也纳大使馆成了他们的活动中心。从匈牙利涌来了大量资金，用以支持奥地利共产党。这些钱不仅被用来加强宣传攻势，而且还被用来贿赂工人和士兵中值得信赖的人员。共产党的宣传机器希望人们相信，匈牙利有充足的粮食供应，一定能满足奥地利的全部需求。[41]

为了回击这些不实的宣传，赫伯特·胡佛从位于蒙田路五十一号的巴黎总部发来了电报，他催促他的助手们在维也纳四处张贴传单，并警告市民们“任何扰乱公共秩序的举动都将使粮食运输无法进行，并将使维也纳即刻陷入饥饿的绝境。”[42]同时，为了对付共产主义和饥饿死亡的威胁，他也加强了救援工作的力度和速度。在维也纳，政府还命令由半个连社会党民兵组成的义务警察驻扎在海仁大道七号的院子里，因为内阁就在此地举行会议。

当时发生了一件与粮食大臣汉斯·洛文菲尔德-拉茨有关的怪事。它也许只能用担心发生政变来解释。很显然，熊彼特在3月的最后一天给他打了个电话，约他共进晚餐。熊彼特还特意嘱咐他叫上运输大臣路德维希·保罗一同前往。在晚餐过程中，在除了他们三人没有外人在场的时候，熊彼特突然问另外二人，如果真的发生政变，他们是否愿意同他一起加入新成立的苏维埃政府。“我做梦都没想过会那样做。”保罗斩钉截铁地作了回答。[43]洛文菲尔德-拉茨也义愤填膺地点

头表示对保罗的赞同。熊彼特见势便赶紧换了一副腔调，连声附和说自己也绝对没想过要加入一个这样的政府。

但汉斯·洛文菲尔德-拉茨却一再要求熊彼特解释清楚，他为什么要求与他们俩私下会面，而且还问了一个这么古怪的问题。熊彼特回答说，内阁中除他以外他们是仅有的两名不是由首相而是由所属政党提名的部长，因此他不过是想试探一下他们二人的态度。

他讲的也许是实话。据英国官方代表托马斯·坎宁报告，他的一位线人给他提供了一份“冗长的间接报告……包括社会党为成立社会主义政府而制定的详细计划”。坎宁的线人还说，这个政府应该只是一个幌子，“外表上看似苏维埃，实质上却不是”[44]。很可能雷纳等内阁中的温和派本打算采取这种策略，但遭到了鲍尔等立场更加左倾的内阁成员的严词拒绝。后来，英国外交部指示坎宁向奥地利国防大臣发出了明确照会，一旦奥地利出现了苏维埃政府，无论真伪，都将意味着粮食援助的中断，而且英国会重启向波兰运送武器的计划。而波兰一直在因为领土纠纷找奥地利的麻烦。

值此奥地利共和国生死存亡之际，内阁夜以继日地举行会议。会议一般在正常工作日结束之后开始。当国家歌剧院快要熄灯的时候，内阁十五位部长和各部的次长纷纷乘车或步行至位于海仁大道七号的摩德纳宫集合。海仁大道是维也纳最漂亮的一条街道，它历史久远，可以上溯至中世纪晚期。这些人一个个面容严肃，他们都已经连续数日彻夜未眠。他们拖着沉重的步伐从驻守在院子里的军容不整的义务警察身旁走过，然后拾阶而上进到灯火辉煌的大厅里。这里从前是皇帝召见辅政大臣们的地方。而现在，雷纳把他的首相公署设在了这里。他们的行动得格外留神，以免不小心被摆在窗户旁的机枪绊倒；因为这里空气非常湿冷，人们不得不将厚重的大衣一直穿在身上，不能脱下来。会议一般会持续到午夜以后很久，为了让与会者能坚持下去，有时候首相会从附近的餐馆为大家买来少许夜宵充饥。

4月17日那天，部长尚未来得及开始处理“多得无法想象”的事宜，上千名神情憔悴，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人们已涌至维也纳林荫

大道开始游行。著名的林荫大道如今早已是四处垃圾，满地狼藉。他们经过有着高大窗户的高楼大厦，最后聚集在了只有数个街区之隔的国会大厦门前。游行队伍中的大多数人是失业的工厂工人和复员军人，很多人已经缺肢断腿或带有其他显而易见的战争创伤。在这些人中混杂着少数全副武装的共产党员和外国煽动者。经过数小时的努力，他们成功将游行队伍的情绪煽动了起来，他们先是冲进了国会大楼，进去以后便开始放火。随后，枪响了，义务警察赶了过来。根据事件发生以后最初的一批报告，在夺回国会大楼的过程中，民兵们击毙了五十余名示威者，并且重伤了数百人。

而比这场骚乱更让公众们吃惊的是事件中的一段插曲。在双方搏斗进行得最如火如荼之际，在国会前面的大街上，一名警察骑的马不幸中弹倒地。这只可怜的动物躺倒在大街上。一名饥肠辘辘的暴徒将马身切成数段，然后扛着血淋淋的肉块扬长而去。如同美国人崇拜他们的拳击冠军一样，维也纳的普通民众一般都极其钟爱皇帝的那些白色赛马。因此，这次事件似乎在向人们证明，文明正在不可抗拒地向野蛮倒退。而在该事件中受震动最深的莫过于共和国的新任财务大臣。因为即使在如此困难的时期，他仍然保留了数匹自己最心爱的纯种马。

此时在布达佩斯，有传言说维也纳即将爆发革命。然而到了晌午时分，暴乱却逐渐平息下去。弗里德里希·阿特勒来到了暴乱现场，呼吁双方保持冷静和克制。阿特勒曾经行刺过前帝国倒数第二任首相，并因之成为了一名受人爱戴的社会主义政治家。同时，共产党的领导们也正在为是否应立刻宣布成立苏维埃政权而犹豫不决。事件发生的次日，总工会的领导人也不同意发布开始总罢工的命令。《每日电讯报》的战地记者艾利斯·阿西米德-巴勒特这时也风风火火地从布达佩斯赶到了奥地利的首都，他写道，“维也纳并未陷入一片火海，相反，我看它再平静不过了。”[45]

国家歌剧院对面的萨赫酒店不但以其美味的巧克力蛋糕驰名远近，它同时也是各国驻维也纳的外交使节，谍报人员和反革命人士竞相出没的场所。萨赫夫人据称是一名狂热的君主主义者。熊彼特也经常来

此用午餐。5月2日那天，托马斯·坎宁爵士在该酒店后面的Salles Privées餐厅发现熊彼特正与另外四人坐在一起，其中一位是首先披露了加里波利战争中大屠杀内幕的英国记者艾利斯·阿西米德-巴勒特。等他们的午餐吃到一半的时候，坎宁借口来看望阿西米德-巴勒特而与他们坐到了一起。

阿西米德-巴勒特正代表约一百五十名滞留在维也纳的匈牙利官员筹款。这些人一方面担心自己会被遣送回国，另一方面还跃跃欲试打算组织反对共产革命的活动。但他们面临的困境是，除了同情他们的萨赫夫人所提供的帮助之外，他们连包租一趟火车的钱都没有。布达佩斯的银行家冯·诺伊曼也来到了维也纳，并为他们的筹款活动助一臂之力。但其他持同情态度的富人们却都不敢公开将钱借给他们，因为他们担心如果此消息被奥地利社会党政府获知将对自己不利。最初，这些匈牙利官员们将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了路易斯·罗斯切尔德的身上，但此公提出的合作条件每天都在变。最终，坎宁建议阿西米德-巴勒特去见熊彼特，因为后者对德奥合并持鲜明的反对立场。这一点英国人非常了解，而且英国对此事同样持反对态度。

熊彼特的聪明才智、活泼的举止以及他对英语驾驭之熟稔都给这位英国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颇为赞许地注意到，虽然熊彼特尚不到四十，但他却丝毫不缺乏财务官员惯有的谨慎。“我们就奥地利的未来进行了讨论。”他后来回忆道。这次会面以后，熊彼特立即公开宣布自己拥护在奥地利实行像英国那样的君主立宪制，他并且赞同，“若想维也纳彻底免遭赤化的威胁，唯一的办法便是将匈牙利的苏维埃政府赶走。”在提供资金一事上，熊彼特先是含糊其辞地说，“作为财务大臣，每一笔钱他都必须对国会有所交待，否则他早就将钱预支给这些反对革命的匈牙利人士了。”接着，他却表示可以给罗斯切尔德一个承诺，如果罗斯切尔德答应借钱，政府财政部对此事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绝对是个好消息。”阿西米德-巴勒特说，“因为它将打消罗斯切尔德最大的顾虑……也就是说，他原来最担心的就是奥地利政府会因此事对他穷根究底，盘问不休。”

君主主义者于5月4日攻占了匈牙利驻维也纳大使馆。他们后

来从里面找到了被隐藏起来的大笔资金。据报道称，这其中包括一亿三千五百万克朗和三亿瑞士法郎。这笔钱都是用来在维也纳发动革命的专款。此时，由于与罗斯切尔德的谈判业已接近尾声，熊彼特便派他的秘书前去通知那位银行家，“我们已通过其他途径筹得了资金，因此不再需要向他借钱了。”[46] 事后，贝拉·孔曾试图索还这笔战争资金并要求引渡攻打使馆的凶手。而这时熊彼特又一次出面进行了干预。在该事件仍悬而未决之际，贝拉·孔的政府却已被右翼海军上将米克洛什·霍尔蒂及其支持者推翻了。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奥地利政府很是花了些钱。由社会党人主导的联合政府于1919年3月宣告成立，因为只有他们才能控制那些失业工人、士兵以及工会和激进分子。由于鲍尔认为，占人口大多数的持保守立场的农民绝不会拥护一场社会主义革命，而且任何政变的风吹草动都将遭到来自协约国的干预，因此他大力主张实行一系列社会福利措施。他们意识到，实施这些新政策不但势在必行，而且迫在眉睫。于是，社会党人只花了数星期便成功地为奥地利成为福利国家打好了基础和基本框架。仅在维也纳一地，符合救济标准的就多达六万人，他们都是战争伤员、战俘家属和前帝国的官员及其家人。不出一年，全部人口中有六分之一的人在享受福利，同时却不从事任何商品生产。

而同时，熊彼特为他的增税计划寻求支持的努力却遭遇了巨大阻力。从协约各国来的贷款仍然遥遥无期，而奥地利自己拥有的黄金和其他硬通货的储备又少得可怜，于是除了大量印刷钞票，政府在对付财政赤字一事上别无良策。

同时，政府想方设法将它的负担转移到工商企业身上去。他的办法无非是鲍尔所说的“大肆侵犯私营企业的利益，人们原以为这种做法不过是权宜之计，时间不会超过数月。”5月，内阁通过了一项新的法令，要求大公司一律将雇佣工人的数额提高百分之二十。而此后不久，其他一些类似的新法令陆续出笼，比如，要求雇主承认工会组织的地位，并要求他们为工人提供带薪假，同时，规定雇主未得到政府

允许不得擅自解雇工人。不出所料，这些法令的颁布导致了生产力水平严重下降。人们纷纷抱怨好逸恶劳和旷工现象在日益增加。政府的税务收入也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

尽管如此，以雷纳为首的内阁仍然在一意孤行地贯彻社会主义化。5月中旬，奥托·鲍尔宣布了一项将对矿山、铸铁厂、发电厂、森林和木材加工厂实行部分国有的计划。熊彼特对该计划持反对意见，他认为，只要政府的财政状况稍有起色，并能成功将克朗的价格稳住，那么工商企业的拥有者们便会重新扩大投资和生产规模。熊彼特先前曾提出过，让富人们承担战争债务，这将使保守派人士与他渐行渐远；而现在，他又指出，若实行私人企业国有化，那么奥地利将无法吸引外国投资者，任何恢复经济的可能都将被扼杀于无形。他的这番言论却又使得社会民主党的同僚们对他心生芥蒂。

和那些社会民主党的同僚们一样，他自己所属的党派同样对他颇不信任，他们在背地里说他“没用”，“自高自大”和“装腔作势”。其他内阁大臣们一个个都衣着寒酸，鞋跟旧得都磨出了洞。只有熊彼特穿戴得俨如一位英国银行家或外交官。他在萨维尔街上定做的西服套装裁剪极其考究，在他沉甸甸的金表下还压着一方雪白的真丝手帕；在报纸的漫画上，他的形象历来是身穿骑马裤、脚踩高筒马靴和戴着卷边毡帽，手里还握着一条短马鞭，这似乎在影射他试图用鞭子将他的财政部，整个内阁乃至整个国家驱向他想去的方向。其他内阁大臣们都与他们没见过世面的妻子一起住在毫不打眼的公寓里。而熊彼特自从与格拉迪丝离异以后，便过起了有声有色的单身生活。他在离财政部不远的阿斯托利亚豪华酒店租了一个套间，还在 Strudlhofgasse 街租了一套公寓，并且从一位伯爵手里租来了半座宫殿，他经常在此举行茶会晚宴以招待罗斯切尔德、维特根斯坦等一干财阀和其他外国的使节、新闻记者和政客。他常常乘坐一辆马拉的车招摇过市来到财政部大楼门前停下。他在最高档的饭店吃饭，喝的是最好的法国香槟。时常都会有一两个应召女郎与他一起出双入对或是与他一同坐在马车的车厢里。这种生活方式远非一个内阁大臣的薪水所能支付得起。很显然，熊彼特肯定没少从那帮有钱的朋友那里举债。就连他的恩师弗

里德里希·冯·维塞尔也觉得他“并不把国家的困难当回事”，他还怀疑“一旦虚荣心不再能得到满足，熊彼特就会撒手不管”[47]。而面对所有这些批评，熊彼特摆出了一副漠不关心的架势，而这无异于火上浇油。他曾对记者这样说过，“国家都快破产了，你觉得我真想把这个政府部长一直当下去吗？”[48]

另外一个时时引起摩擦的话题是德奥合并。奥托·鲍尔认为，德奥合并是能使奥地利经济复兴的唯一途径，而整个内阁之中只有熊彼特一人与他唱反调。5月下旬的一天，当地《时报》的记者发现熊彼特博士正坐在金色大厅里他的桌子后面。这座金碧辉煌的巴洛克风格的宫殿位于正被饥饿困扰的维也纳市中心；虽然宫中四处全部以金叶子当作装饰，但财政部的金库里却早已空空如也；殿内的墙壁上全是琳琅满目的壁画，它们描绘着奥地利历史上在各场战争中取得的辉煌胜利。而此刻，这更映衬出国家所处的无政府状态和战败的现实。这一切在该记者看来都极具讽刺意义。再把视线转回到熊彼特身上，“这位内阁中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此刻正坐在一幅斐迪南[①]的肖像画正下方。这个场景简直妙不可言。[49]《时报》的读者们一定能领会这其中的可笑之处：这位软弱无能且没有性能力的奥地利皇帝曾于1848年被迫逊位，那恰好也是充满革命风暴的一年。而同样的命运如今似乎正在羸弱无助的奥地利共和国和它的部长们的身上重演。即使像熊彼特博士这样意志坚定、才华横溢和放荡不羁的人也概莫能外。

由于协约国一手把持了停战和约各条款的制定，为了能对条款施加影响，奥地利政府发动了一场“奥地利有权与德国合并”的宣传攻势。[50]《时报》对熊彼特的采访见诸报端以后，鲍尔在接下来召开的内阁会议中指责熊彼特暗中游说英法两国禁止德奥合并。鲍尔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法国领导人回答我们说，奥地利的各界领袖们，包括银行家和工商巨头们每天都在信誓旦旦地向协约国驻维也纳的外交官们保证，奥地利并不需要与德国联合，如果停战和约的条件对奥地利稍微有利一些，奥地利就能独立自主地发展起来。”[51]

---

① 斐迪南大公，1914年6月被塞尔维亚青年刺死，此事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鲍尔所言不虚。几星期以来，熊彼特一直在发表反对合并的言论。而事实上，他还曾经对法国驻维也纳的军事特派员亨利·阿理兹提出过奥地利与法国结成货币联盟的建议。他的观点是，如果法国在战略上的优先考虑是在欧洲中部建立一个非德语系的共同市场，那么奥地利就能避免破产的命运。一直到6月底，熊彼特仍在公开宣称，他相信协约各国“一定会合理分摊战争遗留的债务负担”。它们也不会坚持收缴奥地利留在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财产。正如他所指出的，“对德国而言，和约的目的是要阻止它重新崛起；而对奥地利，和约则应鼓励它尽快恢复。”[52]

5月底，熊彼特再一次对合并的政策进行了攻击，他在接受《Neues 8 Uhr Blatt》的采访时作了颇具轰动性的发言，他警告说，“我们的安全取决于我们与所有国家的和平关系，尤其是与我们邻国的关系。”[53]鲍尔怒气冲冲地给他写了封信。但熊彼特并未在意鲍尔的威胁，他仍然试图与英国人达成私下的秘密协议。他向凯恩斯派驻维也纳的特使弗朗西斯·奥本海默提交了一份“秘密”计划的草案，该计划包括由协约国全盘接管奥地利的金融和中央银行，而作为回报，协约国将给予奥地利长期贷款。奥本海默的老板对熊彼特的方案表示了热烈的支持。在一份给他老板的电报中，奥本海默汇报说，奥地利的财务大臣

> 并不认为与德国合并是奥地利的唯一出路。如果有可能，他想要的是成立一个类似英国在埃及设立的金融管理部门那样的联盟金融委员会，并以之管理奥地利的事务。但是，无论这种管理和控制最终以何种方式进行，奥地利的尊严都不能受到侵犯。他还坚持在那些由前奥匈帝国分裂出来的国家当中实行统一的货币，而维也纳仍应保持它金融中心的地位。该点也是这个奥地利复兴计划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

他还补充道，“简单地说，能和这样一位谦虚亲切的专家打交道真是一件极为荣幸之事。”[54]接下来，这二人仍有频繁的会面。熊彼特的

另一个目的是帮助英国人获得掌握多瑙河航运权的奥地利公司。正如奥本海默向凯恩斯汇报的那样，“熊彼特博士同意，他将帮助将那个公司，也许还有其他三个公司，以非常优惠的条件转交给英国所有。条件是现金交易。他还承诺会给我们优先购买权，一直到我们决定究竟是买还是不买。”[55] 可在维也纳，没有什么事能长时间地瞒天过海。“熊彼特还在继续搞他的阴谋诡计。”鲍尔在给雷纳的信中说，“我现在的对策还是按兵不动，但和约一旦签订，我们就别无选择，必须逼他辞职。”[56]

5月7日，几乎就在协约国在凡尔赛将和约的最终条款呈交德国代表的同时，由首相雷纳率领的奥地利代表团也正离开维也纳赶赴巴黎。他们一边在圣日耳曼昂莱的皇家城堡里品尝法国的美食和美酒，一边在百无聊赖的等待中打发了两个星期。1919年6月2日，协约国的和约条款终于下来了。“这是一份相当糟糕的文件。”奥托·鲍尔后来回忆道。一大块讲德语的奥地利领土被分割给了捷克、南斯拉夫和意大利。“经济方面的条款也同样苛刻……它们几乎就是对德合约条款的翻版。”[57] 在圣日耳曼制定的这份和约草案对奥匈帝国已经瓦解的事实予以了确认，但同时，它却将对奥匈帝国所犯罪行的惩罚全部施加在了奥地利一个国家的身上。三百万讲德语的奥地利人从此将生活在捷克人的统治之下。奥地利公民的私有财产将遭到没收，奥地利政府将被迫在未来的三十年中持续支付战争赔款。和约还明确禁止奥地利与德国合并。至少在鲍尔看来，最后这条才是最为致命的一击。

在维也纳，人们对和约的反应是震惊和难以置信。熊彼特对一位记者说，“看来协约国的唯一动机是要置德国和奥地利于死地。”[58] 在6月30日，他还说，“想要消灭一个民族不是那么容易的。一般来讲，是不可能的。但现在，我们面对的就是极少数例外之一……财务状况的崩溃必将导致社会秩序的崩溃。”[59] 当合约的最终条款在外汇交易市场上公开之后，克朗又一次应声而跌。数月之后，伦敦举行了一次关于援助和重建的会议，凯恩斯也曾出席。维塞尔在该会议上发言指出，

> 新的奥地利共和国虽然拥有和约予以确认的国土疆界，但鉴于施加在它身上的沉重负担，货币市场已用行动明白无误地宣告，市场认为奥地利无法继续生存下去。热爱祖国的奥地利人民将竭尽全力渡过这一难关。外国人对奥地利是否能够继续存在是漠不关心的。他们宣称奥地利无法继续生存下去的言论也并不令人惊讶。[60]

然而，像对待德国一样苛刻地对待奥地利，不但使协约国摧毁了奥地利的生存能力，同时也将熊彼特所剩无几的公信力褫夺殆尽。在巨大的压力下，他被迫承认自己的政治判断过于幼稚。正如他在自己日记里所倾诉的，他是一个对政治现实毫无直觉的人，他是一个“没有政治触角”的人。[61]

熊彼特政治生涯的终结在痛苦中延迟着。在7月15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鲍尔向他扔出了一个新的指控：这次是指责他破坏了政府将基本资源产业“国有化”的计划。由于他将一个奥地利的主要采矿和木材加工企业拱手交给了意大利的菲亚特公司，导致现在政府已无法将其收回。熊彼特苍白无力地为自己进行了辩护，他提供了一系列通过外汇交换商柯拉进行的相关交易的资料，他声称，所有这些交易都是为了筹集巩固克朗外汇价格所需的黄金和硬通货。[62]两星期后，另一项令人尴尬的任务落在了熊彼特身上。政府计划将属于国家的数幅“邪恶的艺术作品”卖掉或用作抵押，其中包括皇帝珍爱的哥白林挂毯。而熊彼特还必须对政府的该项计划表示支持。他为之辩护说，除此之外已没有任何其他办法能筹集从国外进口粮食所需的外汇。但同时他也干巴巴地警告说，“但这样的事情只能偶尔为之。”他还最后一次请求国会的立法者们尽快通过他制定的财政预算：“国家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在不发行新的政府债券的前提下，如何使政府在未来三年内免于破产。”虽然他大声发出了他的呼吁，但他也明白，此时人们对他的话只会置若罔闻。[63]这也是熊彼特在国会露的最后一面。

10月中旬，此时已是孤家寡人的熊彼特成了媒体竞相嘲弄的对象。他终于被解除了职务。但整个去职的方式和过程却极其冷酷无情，

以至于一家自由派的报纸嘲笑雷纳在搞人格侮辱。并且这还不算完。他在财务大臣任内所做的若干决定受到了调查。调查的时间长达数月。银行家菲力克斯·萨姆莱注意到，“熊彼特没怎么把这一切当回事。”他认为熊彼特之所以能如此冷静是受益于他在特蕾莎学校受过的教育。因为在那里，学生们都被要求“学会自我控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表现出情绪激动。而且，一个人应该对所有相关各方面的游戏规则烂熟于心，但同时却不应贸然做出任何承诺。”[64]但在内心深处，熊彼特其实已痛不欲生。他深深地觉得自己“缺乏领导的才干”[65]。除了在公开场合遭受羞辱，母亲对他的失望也使他更加痛苦。虽然后来协约国实施的维持奥地利稳定的计划基本上是他在任时所设计的，而且解雇他的那届政府后来被公认为“无执政能力的政府”，但这些都无法使他的挫折感得到丝毫缓解。后来，每当有人问起他的这段经历，他都只是用如下的寥寥数语加以回答，“我曾在那样一个革命年代里担任部长级别的职务，可以告诉你说，那可不是个什么好差使。”[66]

同年11月，当维塞尔从伦敦回到维也纳，他的一些老相识仍在谈论熊彼特被赶下台一事。这位老人注意到，“看来熊彼特在所有相关党派的眼里已经是废人一个。甚至那些昔日视他为领袖的年轻经济学家们也已经纷纷抛弃了他。谁也不再对他有任何期望。”[67]甚至连他从前的崇拜者们也开始对他不屑一顾。他回到格拉茨大学呆了两个学期，利用这段时间医治自己的心灵创伤。然后，他做了一件许多前政府官员都做过的事：加入私营企业。

他选择的时机真是太完美了。在奥地利未来的希望招致毁灭的同时，它的股票市场却开始变得极其红火。人们在疯狂地达成各种交易。一位观察家后来回忆道，

> “股票价格随着货币的不断贬值也在一天天调整。资本拥有者千方百计想要让他们的资本免遭贬值，于是，他们开始大力投资政府债券和国库券……根据股票交易所作出的预测，克朗将会持续下跌。克朗相对于他国货币的兑换率一直在下降，其速度比它

在国内的购买力下降的速度还要快。因此，奥地利的物价水平比世界其他各地的水平要低得多。这意味着，将奥地利的产品出口到其他国家绝对应该有利可图。”[68]

国会挨到最后一刻总算对熊彼特在政府任职期间的工作表示了感谢。国会以颁发给他银行执照的方式给了他一顶金色降落伞，即高级职员去职补偿。时至1921年，熊彼特利用这个银行执照摇身一变成为了一家小型银行的总裁。该银行规模虽小，但历史悠久，在行业内外有口皆碑。他的积蓄早已挥霍一空。而且，为了维持他入不敷出的生活方式，在用完他作为教授和政客的收入之余，他还欠下了一屁股债。如今，他该赚点钱了。

第七章

欧洲奄奄待毙：凯恩斯在凡尔赛

“没人愿意听取来自专家的意见。凯恩斯对奥地利和约的设想简直太出色了。他仍会尽力争取。他还说，不行的话他就辞职。”

——弗朗西斯·奥本海默，1919年[1]

维也纳面对的困境并非个别现象。1919年1月，饥荒和瘟疫席卷了从圣彼得堡到伊斯坦布尔的广大地区。英国人和美国人竞相来到欧洲大陆考察灾情。在他们看来，整个欧洲已经到了濒临死亡的边缘。一名观察员在法国东部花了十个小时从沿海一直驱车到达里尔。他后来在日记中写道，一路上除了军队，他想不起来还曾见到过别的人，别的动物，或者是任何有生命迹象的东西。四处都是丛生的野草和荒芜的房屋。“战争期间数次最惨烈的战役均发生在比利时的伊普雷。如今，这里的败瓦残垣已恢复了往日轻柔的色彩，绿草和苔藓已渐渐将战争留下的废墟覆盖。”[2]

停战和约签订已过去了八个星期，但恢复战前的和平状态依旧看不到任何希望。封锁依然没有解除，协约国尚不敢立刻放弃他们对德国这一最行之有效的武器。十几起小规模武装冲突陆续爆发，导致至少几十万部队被卷了进去。杀戮，驱逐甚至大屠杀事件开始出现。

八百五十万人丧生，几乎同样数目的人留下了身体或精神上的残疾。在中欧，整整一代儿童——人们称他们为 kriegskinder，即战争儿童，被迫在饥寒交迫发育不良的情况下长大。

战争结束以后，“全球性时代”的到来及其经济成就听上去宛如痴人说梦。不但生命和财产的损失依然在节节攀升，甚至连战前建立起来的贸易和信用渠道也全都被摧毁。阻碍进出口贸易自由进行的贸易壁垒在各地竞相出台。而那些有产品可供出售的人们并不愿将产品卖出，因为他们换回的将是一个已经破产的政府发行的纸币。因此，很大一部分交易都退回到以物物交换的方式进行。为了勉强支撑这场人类历史上耗资最大的战争，胜负双方都耗尽了各自的家底，他们不但用尽了所有的资金储备，连国家税收这个筹集资金的手段都已经被用到了难以复加的极致。一直到 1916 年，法国，德国和俄国都再未征收过个人收入税。因此，如今国家没钱购买活命所需的粮食，点炉子取暖所需的燃料，工厂重新开工所需的修缮，以及重启贸易所需的资金。摇摇欲坠的各国政府在面对破产威胁的同时，也渴望向战争中的对手复仇。他们个个心怀鬼胎，想方设法让别的国家为这场刚刚结束的战争买单。

“整个欧洲的经济体系完全卡壳了。”英国战时的首相劳合·乔治在给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信中这么说过。[3] 尽管一切的一切都有赖于经济复苏，但聚集在巴黎的战胜国的首脑们却似乎无法将注意力集中在此事上。至少凯恩斯是这样悲观地认为的。此刻，他正从巴黎豪华的美琪大酒店的三楼往外眺望，该旅店离艾特利广场不远，它也是英国代表团在巴黎的驻地。梅纳德·凯恩斯，这颗财政部冉冉上升的明星，正在给凡妮莎·贝尔写信，他在信中向她夸口说，“这里正在进行的各种明争暗斗一定会让她瞠目结舌。这对正处于灾难边缘的欧洲而言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4]

凯恩斯于 1 月 10 日抵达美琪大酒店。这是巴黎一年中最潮湿也是最压抑的季节。此时，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已在巴黎逗留了一个月之久。而劳合·乔治首相却刚于昨日驾临。在战争中，这座城市虽然遭

到了狂轰滥炸，但终究逃过了被德国军队占领的下场。但现在，它却俨然成了一个被占领区。美国运通新开的众多分部如蘑菇一般于一夜之间冒了出来。大街上，美国宪兵在指挥交通。战神广场[①]上，英国人的大型印刷机在日夜轰鸣；外交官们乘坐的黑色轿车以及土褐色的军用吉普使街道变得异常拥挤。而路边，身着二十七个不同国家制服的众多年轻小伙和姑娘们，把人行道堵了个水泄不通。全世界的人似乎都挤到巴黎来了。

与此同时，一座微型的英国白厅和美国白宫似乎也先后搬到了塞纳河上。而英国军需部长温斯顿·丘吉尔在他忠心耿耿的秘书艾迪·马什的陪同之下，则担负起了在二者之间穿针引线的工作。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和他的高级幕僚驻扎在香榭丽舍大街的远端。这些幕僚中包括金融家伯纳德·巴鲁克，法律顾问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以及前陆军部长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美国代表团带来了自己的车队和飞机，架设了自己的电话和电报网，并且操作运营自己的火车。

这时，凯恩斯尚不属于劳合·乔治的圈内人士。因此，在首相与其情妇弗朗西斯·史蒂文森被安排在豪华套房的同时，凯恩斯却与英国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一起挤在美琪酒店。该酒店在停战以后便开始了接待和会的准备工作，它拥有自己的医生，有专为女性工作人员安排的监护人，还有由苏格兰场警方提供的严密安保。因此，出去很容易，“但想进来却非常困难。”英国代表团中的外交官哈洛德·尼科松后来曾如此回忆说，此公后来娶了凯恩斯的好友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②]为妻。“在旅店内，各层都安排了从英国国内带来的机灵能干的佣人。而由于这个原因，食物也基本上是盎格鲁瑞士人的风味。”尼科松补充道。[5]但奇怪的是，谁也没想到应该将隔壁阿斯托利亚酒店的工作人员也换掉。英国代表团在该酒店也租用了办公室，而且一些地图和秘密文件也都存放在那里。

在美琪酒店进进出出的人群中最异乎寻常的一位，就是后来越南共产党的领导人胡志明。当时他就在该旅店的厨房里刷盘子。T.E. 劳

① Champ de Mars.

② Vita Sackville-West(1892—1962), 贵族后裔，小说家、诗人。

伦斯，即阿拉伯的劳伦斯，也常常出现在旅店大厅里。剧作家让·谷克多[①]也在。还有马塞尔·普鲁斯特[②]，“他肤色白皙，胡子拉碴，衣服邋遢不整，脸上坑坑洼洼，他身上穿一件皮毛外套，而手上却戴着一双小孩用的白手套。”尼科松对他与普鲁斯特的不期而遇有如下的描述：

> 他问我能否告诉他委员会是如何运作的。我说，“我们一般是早上十点开会，秘书们都坐在我们身后……”“别，别这样，你一下讲得太多，也太快了。重新开始。你坐进代表团的专车，然后到法国外交部门前下车，你走上台阶，进到房间里，接下来呢？然后干什么？详细一点，亲爱的，讲详细一点。”于是我便从头到尾给他讲了一遍，那些虚与委蛇的客套，握手，还有那些地图文件，甚至还有隔壁房间里的茶和杏仁饼……他着迷地听着，时不时还打断我说，“再详细一点，我亲爱的先生，别讲太快了。”[6]

这里的记者比外交官还多。前少将弗雷德里克·莫里斯受《伦敦每日新闻》的委派也来到了巴黎。在战争后期，他曾经指控首相向国会隐瞒了英国军队的实力，这一举动几乎导致整个政府垮台。他最钟爱的孩子，南希，此时也在巴黎。她刚刚成为爱德华·路易斯·斯皮尔斯少将的新任秘书。当时，已臻中年立场保守的斯皮尔斯已经结婚，但他最终成了南希的丈夫。当时有无数像她一样的女助手，数支黄色小调的创作灵感就来自她们身上的卡其布制服。她的妹妹，琼，是伦敦圣保罗女子学校一位早熟的十五岁学生。但当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她将成为二十世纪最有名的经济思想家之一。琼也想到巴黎去并为之绞尽脑汁。但最终她只能借助于南希从巴黎为母亲发回的登有巴黎浮光掠影的简报过过干瘾。

梅纳德·凯恩斯被认为是当时巴黎“最具影响力的幕后人物”。即使是反对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他思路清晰，极其自信，而且有过目

① Jean Cocteau（1889—1963），法国诗人、小说家、剧作家。
② Marcel Proust（1871—1922），20世纪法国最伟大的小说家。

不忘的记忆力。”[7]他对过于繁重的工作曾有过抱怨，但同他一起共进晚餐的人们却常常苦笑着发现，“要论喝香槟的酒量和消化能力，简直无人能出其右。”此时年方三十六岁的凯恩斯仍然瘦得像一名大学本科生。他的朝天鼻和肥厚的嘴唇早在学校就曾为他赢得过“猪嘴巴”的外号。而且，正如伯特兰·罗素众多情人中的那位奥特林·莫瑞尔夫人曾经讽刺他的那样，他生就一幅“对工作、名望、影响力、统治力和个人崇拜如饥似渴的模样。”[8]凯恩斯的傲慢能令人窒息，他的举止能惊世骇俗，他的衣着也有可能毫不讲究。但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生动活泼的体态以及强烈的自信使他充满了魅力。他丝绸般轻柔美妙的声音让人难以抗拒。不论男女，人们纷纷为之着迷。

凯恩斯于1883年出生，他与熊彼特同岁。他来自一个非常成功，感情非常亲密的剑桥学术家庭。他是家中最受宠爱的孩子。他们家与其他一些知识巨匠的家庭往来非常密切，与其中的一些甚至还沾亲带故。这中间包括达尔文、拉姆塞、莫里斯、史蒂芬和斯特雷奇等。他父亲内维尔·凯恩斯是一位道德哲学教授，同时也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密友。母亲弗洛伦斯则热衷于当地的政治和慈善事业。后来，她于1932年成为了剑桥市的市长。内维尔和弗洛伦斯二人都聪敏过人，对孩子们体贴入微，对凯恩斯及其三个弟妹来说，他们称得上是慈父慈母。

早在青年时代，凯恩斯就被公认为天才。几乎从出生开始，他所受的培养便都是以剑桥人的模式进行的。内维尔·凯恩斯鼓励他这个聪慧的孩子钻研数学。1902年以优异成绩从伊顿公学毕业以后，他在剑桥大学的入学考试中又拔得头筹。因此，他得以考取了剑桥各学院中历史最悠久的国王学院的奖学金。在凯恩斯大学一年级学期末，哲学家乔治·摩尔[①]的《伦理学原理》出版了，这是凯恩斯本科学术生涯中的一个重要事件。摩尔也曾是“使徒会”的会员，这也是剑桥各个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之间保持联系的一个纽带。《伦理学原理》的出发点是想为理想的生活重新作一番定义。而它驳斥的对象则是维多利亚

① G.E.Moore(1873—1958)，英国当代哲学家。

时期人们对个人奋斗、赚钱和遵纪守法的执着态度。在拒绝这些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同时，他也对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时代行善的道德说教和性道德持反对立场。摩尔拥护的是一种极端个人主义和唯美主义，此二者与著名的黄金法则[①]是相辅相成的。“除了人的心态，其他所有的一切都不足挂齿。这包括我们自己的也包括他人的心态在内，当然，主要是自己的。”凯恩斯在1938年曾如此回忆道，“这里所说的心态与某个具体的行动，成就或是结果并没有关系，它只存在于长时间活跃的思考和交流的精神状态之下。”[9]

他的这一思想让人根本无法想象其实他对划船、骑马、网球，尤其是高尔夫，都极其投入……他还酷爱公开辩论，他在自由党内以及在他应邀参加或领导的精英性质的学生社团和学术社团中都非常活跃。他在大学的经历证明，他不但是一名杰出的学者，而且也是一个天生的领袖。虽然他很少在凌晨三点以前就寝，在他二十一岁生日前夕他仍以头等优异生的成绩毕业。他本以为自己会步父亲内维尔的后尘，于是便花了一年时间准备参加数学优等考试。1905年，被誉为“科学皇后”的数学已不像马歇尔拿第二名时那么容易被征服。凯恩斯获得的第二十五名的成绩虽然也还算拿得出手，但却不足以拿到国王学院的奖学金。当时的竞争激烈到了什么程度呢？以《一个数学家的辩白》一书广为人知的大数论家G.H.哈代[②]在1900年的数学优等考试中的成绩高居第四，而他至今还在为在剑桥大学拿到一个讲师职位而苦苦等待。

于是，凯恩斯随身带上了一本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躲进阿尔卑斯山中徒步旅行去了。他于秋季回到了剑桥。此时他对马歇尔的讲课产生了浓厚兴趣，同时他还在为参加公务员考试做准备。“马歇尔一直在不依不饶地劝我当一名职业经济学家，他在我的论文上写了许多近似奉承的积极评语来鼓励我。”凯恩斯在写给好友列顿·斯特拉奇的信中说，“你觉得他的那些话可信吗？反正我是不太信。”[10]

凯恩斯对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兴趣日益浓厚。他开始考虑也许他

① 西方文化中行为的第一原则，它最一般的表述是：“对待他人像你愿他人待你一样。”

② G.H.Hardy(1877—1947)，英国数学家。

“可以去管理一条铁路，设立一项信托基金或者至少是搞一次投资诈骗。”[11] 鉴于获得学术任命已经希望不大，他便将目标移到了财政部。他在公务员考试中考取了第二名。他随即被遣派到殖民部干了很短一段时间。他的具体工作与印度卢比有关。与奥斯卡·王尔德[①]的《真诚最可贵》[②]中的塞西莉不同的是，他被卢比给深深吸引住了。他产生了这样一种想法，即一种货币，也可以说任何一种货币，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而且，由于各个国家之间通过贸易和投资互相联系在一起，因此货币也便能反映出全球的经济状况。

所有人在出售自己产品和服务的时候都愿意收取英镑，但并非所有的人都愿意要卢比。货币的价值完全由人们是否愿意接受它而决定，不论是麦克罗尼西亚岛的居民当作货币的大石磨、金币，还是银行负债表上登记的每一项资产都概莫能外。因此，一个国家的货币必须反映出世界各国对它的经济前景、偿付能力以及恪守信誉所持的信心。从这个意义上讲，货币就好像人的脉搏，它是经济状况的一个重要特征，不论是癣疥之疮还是心腹大患，哪怕是极短的一阵兴奋或恐慌，都能从货币上体现出来。而大夫们所面临的挑战就是要及时找出脉搏跳动异常的根源，以免病人在病情发作时被吓得呆若木鸡或者像健康人一样从病床上摔下去。如果病人远在千里之外而且很难弄到他病情的具体情况，那么这个挑战就更加有难度。然而，凭借他敏锐的头脑、追本溯源的本领和综合概括的能力，凯恩斯不但解出了这道难题，而且还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天生的诊断专家。

在凯恩斯轻松地完成了卢比的职责之余，他在办公室里还有大量时间可用来撰写一篇关于概率的论文。他希望能靠它拿到那份诱人的奖学金。不仅如此，在晚上和周末他还利用闲暇时间来拓宽自己的社交生活。他住在伦敦市内，在戈登广场四十六号租了一个豪华套间。该处是有钱人经常光顾之所，在伦敦城里也颇有名气。住在他楼上的邻居有史蒂芬姐妹，后来的凡妮莎·贝尔，还有弗吉尼亚·伍尔芙，她们个个天生丽质，咄咄逼人并且才华横溢。凯恩斯与凡妮莎的关系

① Oscar Wilde(1854—1900)，爱尔兰剧作家。

②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

尤其融洽。凡妮莎是位画家，她喜欢闲聊，时不时还会迸出几句粗话。凯恩斯在记事本中对他的日常花销乃至打高尔夫的分数记录得一丝不苟，他对他的性事也做了同样细致入微的记载。从他的性事日记中看得出，这个时期他在情场上也是春风得意。在 1903 年到 1905 年的一段时期，他性伙伴的数目几乎为零；到 1911 年，该数目变为了八位；而到了 1913 年，它登峰造极地达到了九位。他们中间有的是情人，有的是长期交往的好友，中间包括邓肯·格兰特、列顿·斯特拉奇和公开了自己同性恋身份的剑桥国王学院的院长 J.T. 谢泼德。[12] 尽管如此，每星期日与他的一伙死党在剑桥的例行午餐，凯恩斯也几乎从未爽约。

在他二十几岁的那些年里，在对一些十分偏僻货币的了解方面凯恩斯已成了英国本土的专家。对货币的认识使他在考虑经济问题时养成了全方位思考的习惯，而不是将注意力只单独集中在“贸易”、“劳动力”或者“产业”某一个方面上。对货币的研究还教会他一叶知秋的本领，即通过分析若干指标从而得出重要的结论。同时，他也逐渐感觉到，政府行为影响的并不仅仅是某一特定的产业或团体，它对经济产生的影响如同月球对地球上潮汛的影响一样是全方位的。但 1908 年他还是辞去了印度办公室的职务。阿瑟·庇古和凯恩斯的父亲二人都表示，在接下来他继续完成论文的这一年里，他们愿意为他提供经济上的帮助。而前者是马歇尔在剑桥大学职位的继任者。1909 年，他虽然完成了论文，但最终还是未能拿到国王学院的奖学金。而只有有了这份奖学金，他才能与那些自费学生平起平坐，一起出席高桌晚餐。这时，马歇尔自己出资在剑桥特地为凯恩斯设立了一个经济学讲师的职位。在这种情况下，国王学院的其他教研员终于将凯恩斯吸纳为他们当中的一员。

作为新生，年方十八岁的凯恩斯在到达国王学院后给父母的第一封信中说，“我将这个地方仔细打量了一番，我发现它并不是很有效率。”[13] 正如凯恩斯的传记作家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所指出的，虽然学校在凯恩斯的一生中经历了诸多变化，但凯恩斯对学校，乃至对整个世界的看法却始终没变过。它们常常运转不畅，在管理方面急需很

大改善。有时，尤其是当他目睹了一些愚蠢的做法时，他“会发展到怒不可遏的地步”[14]。但总的来说，凯恩斯更多的是恼火而非愤怒，是缺乏耐心而非自以为是。“布卢姆茨伯里派”的那帮艺术家朋友依旧不屑于追求世俗的成就和权势，因此他与他们也日渐疏远。温斯顿·丘吉尔就曾经向他妻子坦承，“哪怕世上的一切都即将毁灭，我也仍然会兴致勃勃地欣然做好准备。”[15]和丘吉尔一样，世间的困难只会使凯恩斯变得更加生机勃勃，而不是垂头丧气。他总是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他一心想做的就是让坏的变好，让好的锦上添花。

他对战争的反应带有典型的爱国主义、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综合特征。在1914年8月英国向德国宣战之际，他尚无明确的态度。作为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他和大多数人一样，觉得战争在数月或甚至数星期内便将结束。当时的财政大臣劳合·乔治第一次找他咨询是在战争爆发前夕。凯恩斯当时花了一整天的工夫试图说服劳合·乔治，让他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屈从于城市银行的压力而中止英镑与黄金的自由兑换。很显然，凯恩斯对局势的看法比城市银行的银行家们要乐观得多。

1915年1月，凯恩斯正式被财政部征召，并且负责掌管战时财政。英国于1916年开始实行兵役法，所有十六到四十一岁的男性都在被征召之列。被财政部征召使得战争与凯恩斯更加休戚相关，因为他已成了英国战争机器的一部分。他的朋友当中有为数不少的人因为反对战争而拒绝参战，并且，他们还不断向他施压，让他不要再做这场他自己声称对之深恶痛绝的战争的同谋。有一次，他在自己晚餐的盘子上发现了斯特拉奇给他留的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亲爱的凯恩斯，你为什么还呆在财政部？你的列顿。”[16]只要他仍是财政部的一员，他倒是不必担心真的要去服兵役，因为对那些“从事国家重要工作的人员”军方可以免于征用。由于来自朋友们要求他支持反战的巨大压力，凯恩斯数次威胁要退出财政部。1916年2月，他正式提出了拒服兵役的申请，此举甚至惊动了他的父母。在他的申请中，他清楚地表明，他反对的是兵役法的强制措施，而不是战争本身，也就是说，他此举的动机更多的是基于维护自由主义而非和平主义。他通知兵役管理部

门，因为他在财政部的工作太过繁忙，因此他无暇出席相关的听证会。不久，他的申请被拒绝，而他也没有再就此事纠缠下去。朋友们后来也逐渐原谅了他，尤其到后来他还常常利用他在政府部门的关系来保护他的这些朋友。尽管如此，因为这一段经历可能有损凯恩斯的信誉，所以，在斯基德尔斯基之前的众多为凯恩斯写传记的作家们出于为尊者讳而对此事刻意隐瞒。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对凯恩斯为同性恋一事也避而不谈。

凯恩斯的工作是以尽可能优惠的条件从美国购买美元；同时，在向法国和其他欧洲盟国提供英镑贷款的时候则要争取最丰厚的利润回报。而这二者都要以维持英镑外汇兑换价值为前提。他的另一项职责是在紧急情况下，对像西班牙比塞塔之类供应量不足的货币进行收购囤积。这类任务给了他作为外汇交易商的亲身实践，同时也使他迷恋上了在货币价格的升降上下赌注的游戏。这种游戏风险很大但却极其刺激，凯恩斯对之已经欲罢不能。正如斯基德尔斯基所写，最终，所有与战时财政相关的事宜，甚至许多战后的事宜，通通都是由凯恩斯经手的。

在战争的结尾阶段，应向德国索赔巨额战争开支的言论在英国国内甚嚣尘上。凯恩斯也日益频繁地被卷入到有关战争赔偿的辩论中去。1916 年底，劳合·乔治成为了战时联合政府的首相，他指示财政部对德国支付战争赔偿的能力作一个估算。他理所当然地认为，“在接下来的四五十年里，由于要支付巨额战争贷款所累积的利息，财政部的专家们一定得保证政府在税收之外另有一个稳定的财政收入来源。他们应将此作为他们考虑的头等大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减轻税收的压力。”[17] 但凯恩斯优先考虑的却是另一件事，因为起草财政部意见书的重任落到了他的身上。1918 年 12 月 18 日大选结束后不久，凯恩斯向新任财政大臣奥斯丁·张伯伦，即约瑟夫·张伯伦的儿子递交了他与战争赔偿相关的报告，并由此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当时，一个由协约各国组成的战争赔偿联合委员会在纽约州前任州长查尔斯·埃文斯·休斯的主持下，已经就赔款问题提出了建议：应要求德国支付四百亿美元的赔款，这相当于协约国战争开销总额的

三分之一。而凯恩斯得出的结论却是，从德国能榨出的金额最多也就在三十亿到一百五十亿之间，这比英法两国所欠美国的贷款总额还要少。凯恩斯还指出，协约国联合委员会提出的赔款数额是战前德国拥有的黄金、证券、船舶、库存原材料、工厂以及机器价值的总和的两倍。他警告人们说，假使将战争赔偿的数目定得过高，德国拒不履行赔款债务的风险也会相应提高，最终这会让英国的经济利益反受其害。

凯恩斯的报告招来了一片骂声。大多数英国人认为，因为德国人率先挑起了战争，他们就应该自食其果。正如劳合·乔治所指出的，战争开支的沉重负担毕竟需要有人承担。光靠战前的税收水平根本无法支付战争贷款的应付利息。自 1914 年以来，法国的国家债务翻了十倍，而英国则翻了四倍。如果不让德国出钱，那么英法两国无辜的人民为了偿还贷款将被迫承担更高的税率负担。英国选民们之所以在此事上群情激愤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将近百分之四十的英国人口拥有政府债券。英国工商界同样支持索取战争赔款。他们希望由德国企业，而不是英国企业，来承担为偿付贷款而征收的高额税务。

但凯恩斯不为所动，他丝毫没有退缩，甚至在据理力争。他说，他先前所说的三十亿的数字仍嫌太高。同时，财政部内部也爆发了激烈争论。而凯恩斯自始至终都坚持他对德国偿付能力的低端估计。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中有一个叫淘气鬼的精灵，它曾有一句不朽的名言："主啊，凡世间的人们怎么如此愚蠢啊。"而现在，劳合·乔治开始称凯恩斯为"经济学界的小淘气"。[18]

当新闻记者、政客以及公众将眼光锁在德国赔款的数额上时，凯恩斯却在考虑该以何种方式收取赔偿。最简单易行的方法也就是那一最为古老的方式。假若德国在西线战场获胜，它同样会采用这种方式来向英、法、比利时等国索取赔偿。而休斯领导的委员会推荐的同样是这种方式，即将德国的财产，不管是政府还是私人拥有的财产，从股票证券，到黄金储备，以至船舶和机器，通通夺过来据为己有。但凯恩斯却另辟蹊径，他主张不去掠夺德国的现有财产，而是应该向它提供原材料，并对它将来的出口收入逐年征收定额的贡金。"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能帮助德国恢复其昔日较高的生产力水平。"凯恩斯解释

道，而且，协约各国同时还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使德国沦于替别人从事生产的附庸地位。”[19]

根据斯基德尔斯基的说法，凯恩斯是带着双重目的去巴黎的。在恢复欧洲经济的同时，他也希望不会危及英国的出口前景。而要这二者兼得却并非易事。他的策略要想成功，必须满足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德国的战争赔偿数额不能过高；二是美国愿意免除英国所欠其的战争债务。这是唯一能避免德国出现巨大贸易顺差的办法——即为了赚取英镑和法郎，德国必须使其出口大于进口。这同时也是唯一能避免英国与德国在出口市场上斗个两败俱伤的办法。虽然他的这项计划中没有任何一条能被美国、法国和英国的公众接受，凯恩斯也并未知难而退。但来自那几个国家的民选代表们却无法像他一样对这一社会现实视而不见。

德国宣布投降后十天，凯恩斯曾向他母亲如此自我吹嘘，“我已被任命为和会财政事务的主管。”[20]这话未免有些言过其实。他在和会的官方任务其实是援助和救济，他并不是专门与战争赔偿打交道的那些政治沥青娃娃中的一员。为了帮助欧洲从战争向和平过渡，他的首项任务是帮赫伯特·胡佛拟出一套财政计划，尤其是粮食供应计划。

根据停战协议，对德奥两国的封锁在战争结束初期仍将照旧，但对应急的粮食和药品可以网开一面。法国人进而声称对德国剩余的黄金、硬通货和其他流动资产拥有留置权，他们认为这些都应该特意留出来作支付战争赔偿之用。由于其所有的账户都已遭冻结，德国根本无法购买粮食，它正逐渐陷入饥荒。凯恩斯决心要冲破法国人蓄意设置的重重障碍。

抵达巴黎后不到数日，他便前往已被协约国占领的德国进行了一次“不同寻常的冒险之旅”。驻扎在特里尔的一个由美法两国金融财务专家组成的小组向他发出了邀请。特里尔是莫色耳河畔的一座古老城市，它位于法国、德国和卢森堡三国接壤之处。马克思就是在此度过了他的童年。因为特里尔临近法国斐迪南·福煦元帅的司令部，而且此刻它又正在美国军队的占领之下，因此，11 月的停战协定的重新谈

判便被选在这里进行。虽然协约国的专家们非常好奇“德国儿童的嶙峋瘦骨会不会尖得从皮肤下面捅破出来”，但在整整三天的时间里，除了为买战时价券，纸质衣服和其他纪念品出去了一趟之外，他们就呆在列车上哪儿都没去。[21] 第一天晚上，有四个人凑起了一桌桥牌，而凯恩斯几乎从头打到了尾。

凯恩斯此行的目的既与财政也与粮食有关。与胡佛和威尔逊总统一样，继续封锁的政策让他非常吃惊。他认为，“只要基层民众仍在遭受饥饿的煎熬，政府摇摇欲坠的局面就会一直持续下去。”[22] 他这次借机到特里尔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找到能让装运粮食的火车开进德国的办法。但和所有的和谈一样，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与此同时，协约国另有一个与此毫不相干的计划。德国有一支完整的商运船队此刻正全部抛锚停泊在汉堡港。协约国打算将其收归到自己旗下，但他们仍在为究竟用何种方式才能得手而面面相觑。停战协议对该船队的归属问题未曾置喙，而此刻专程派海军前往汉堡夺取船队在政治上又极不明智。于是，协约国的首脑们灵机一动，眼下的粮食危机也许为诱使德国人同意这笔交易提供了一个机会。凯恩斯的任务便是要让德国人相信“用船换粮食是一笔不错的买卖”。据后来他自己承认，这中间自然少不了恐吓的成分。那些参与谈判的德国金融家们“都已经被吓得如惊弓之鸟，不知所措，他们一个个精神崩溃，甚至还有的饥肠辘辘。”所以，要让他们搞懂这笔交易的来龙去脉和设想还当真费了些口舌。

在特里尔，凯恩斯好奇地瞅着德国的财政专家们向他们所在的列车车厢走来。他们的衣着让他们看上去仿佛送葬者一般。他们的“步伐僵硬而艰难”，他们抬脚的动作“犹如照片或电影中的人物”。一一登上列车进入车厢以后，他们并未伸出手来握手，而是十分僵硬地鞠了个躬。这是一伙伤心的人，他们的“面色憔悴绝望，眼神疲惫发呆，他们看上去仿佛刚刚在股市上遭受了沉重打击。”[23]

德国国家银行的头儿看上去犹如“一把陈年破旧的雨伞”。外交部那位“狡猾的家伙”的脸上“满是决斗留下的累累伤痕”。德国团队的发言人是他们的第三号人物。他“身形矮小，却极其整洁，衣着也非常干净考究，他的衣领浆洗的坚硬高耸，看上去比普通的衣领要白皙

和干净得多”。他的眼睛“炯炯有神地直视着我们，眼里充满了无限的悲伤，同时他也准备好要作困兽之斗。”此人名叫卡尔·梅勒西奥，是来自汉堡的一位犹太银行家。他是个自由派人士，曾经反对过德国的潜艇战。他是银行家麦克斯·沃伯格的合伙人。而沃伯格则同美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凯恩斯首先开始发言。他问在座的人是否都懂英语。麦克斯·沃伯格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描述道，凯恩斯的脸上好像戴了一个木无表情的面具，但从他的声音和提问的遣词中能感受得到他的同情。轮到梅勒西奥发言的时候，他操着“极为纯正的英语讲得极其生动，而且颇有说服力。”这位银行家别出心裁地列举了诸多理由，试图为德国争取一笔贷款，但凯恩斯尽量“明确和冷淡地”告诉他，给予德国贷款这一主意在政治上是根本行不通的。[24] 最终他们达成了如下的一致：德国即刻向协约国移交价值五百万英镑的黄金和硬通货，以此换取牛奶和黄油。除此之外，该轮协商并没有更多成果。

一个月以后还是在特里儿，凯恩斯与德国人举行了另一轮会谈，但谈判因为“以船换粮食”一事而陷入了僵局。德国人打算不到万不得已不放弃这支船队，因为他们认为在即将举行的和谈中该船队是他们手里最有分量的筹码。因此，他们决不会无偿放弃它。而且，德国人似乎觉得美国也许会同意预支给他们购买最初几批粮食所需的资金，因为这些食物中有一大部分是来自美国的过剩猪肉。

德国人在第二次会谈结束之际宣称，如果无法得到贷款，他们便没有安排大规模粮食进口的经济能力。假如真如凯恩斯所言，借钱给德国在政治上行不通的话，那么德国人便不会将船队移交给协约国。但如果谈判破裂，并任由德国的饥饿局面继续恶化下去，任何人都将无法阻挡“布尔什维主义这股洪水猛兽将整个欧洲大陆完全吞噬”[25]。谈判走进了死胡同。此时，除了四巨头，也就是英美法意四国的最高领导人，其他人谁都无能为力。但四巨头们此时正在为巴西代表团的人数问题争论不休。此外，他们还正在忙于听取来自“埃及、亚美尼亚、斯洛伐克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建议。T.E. 劳伦斯此时的公开身份是沙特费萨尔亲王的翻译。亲王决定提出阿拉伯人在前奥特曼帝国

的领土内实行自治的建议，而劳伦斯在建议书中趁机借用了可兰经中的数段经文。[26]

凯恩斯与梅勒西奥接下来的会谈是于3月初在比利时的斯巴举行的。会谈的地点是原德军最高统帅部的所在地。它在山岭的环抱之中，“远离饥饿中的城市和难民”。密密麻麻的黑松将四周的山头层层覆盖[27]。但会谈又一次搁浅了。凯恩斯开始陷入绝望。自从特里尔的首次会谈以来，两个月已经过去了，但德国以黄金换粮食的事宜却没有丝毫进展。他觉得梅勒西奥似乎也同样失望，于是他向上级请示，想试探一下梅勒西奥的口风。他瞅准机会，趁梅勒西奥的助手不在身边之际，用激动得带着颤抖的声音问他，他们俩能不能私下里单独谈谈。他回忆道：

> “梅勒西奥不明白我的用意何在。于是我尽量向他表明了我的感受。我告诉他，我们相信他的悲观预言，同时也为他的出色表现折服；我还告诉他，英美两国政府和他一样，同样坚信启动粮食供应当是首务之急。但如果他们德国人仍然按照上午的立场一意孤行的话，那么使粮食供应必将遭到严重迟滞。因此，他们必须早下决心完成船队的移交。”[28]

梅勒西奥表示他会倾力相助，但对结果他却不敢抱乐观的态度。“德国人的尊严，组织和道德观都已发生动摇，他看不到一点希望。他相信德国即将崩溃，它的文明也将从此黯淡无光。虽然我们仍需尽人事，但毕竟天命难违。”[29]与梅勒西奥的数次会谈使凯恩斯对战争的后果更加悲观。同时，鉴于柏林和德国其他各地正在不断爆发起义，因此他和梅勒西奥产生了相同的忧虑也就不足为奇了：那就是，如果和约的条款对德国过于苛刻繁重，那将使得德国无法抵御布尔什维主义的引诱。

时间又到了次日夜晚。很显然，梅勒西奥的努力没有见效，新的德国魏玛政府仍然无意妥协。有时，来自于革命的潜在威胁以及谈判的缓慢进展，甚至使凯恩斯比德国人还要焦急。他不知道德国人的粮

食短缺究竟是否真如英国人所想的那么严重。他打定了主意：为了打破眼下的僵局，一定得有一个大的动作。于是，他建议协约国方面公开摆出一幅谈判破裂的架势。在他的说服下，协约国的谈判队伍连夜命令列车返回巴黎，目的就是要让德国人第二天一早起来发现他们已经不辞而别。回到巴黎以后，凯恩斯才得知他们此举引起了四巨头的关注。报业大亨里德尔爵士当时担任战时政府的新闻秘书，他在1919年3月8日的日记中曾有这样的记载：

> 委员会决定同意向德国提供粮食，但有两个前提：一是他们需移交船队；二是他们需以他国货币、实物或者黄金等方式换取粮食。法国人强烈反对这一决定。LG（劳合·乔治）后来私下对我说，法国人的行为愚蠢至极。他们如果不当心，很有可能会把德国赶到布尔什维克那边去。他告诉我，他对法国财政部长克劳斯发了一通火，他对克劳斯说，如果德国果真成立布尔什维主义政府，那他们会为三个人竖纪念雕像：一个是列宁，一个是托洛茨基[①]，还有一个就是他克劳斯。克劳斯听了之后无言以对……而美国人对这项决定却十分满意。所有的工商业人士，不论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都主张撤除对德国的封锁，他们呼吁尽早与德国达成协议，让世界能重新开始运转。[30]

四天后，凯恩斯登上了一列去特里尔的火车。与他同行的还有英国海军元帅罗斯林·威姆斯。威姆斯此行是受四巨头的委派向德国人递交一份最后通牒。法国人在一项议题上最终取得了胜利：德国人必须无条件地交出船队，然后才能告知他们关于粮食的决定。“你看你能不能劝他们最好不要制造不必要的麻烦？”元帅问凯恩斯。于是，凯恩斯又一次单独将梅勒西奥叫了出来并告诉他，如果德国人同意无条件交出船队，他们将会得到补偿。“你能向我担保冯·布劳恩肯定会同意这么做吗？”凯恩斯问他。冯·布劳恩是当时德国代表团的头儿。

---

① Leon Trotsky(1879—1940)，俄国十月革命的主要领导人。

梅勒西奥沉吟半晌，然后“重新抬起头来严肃地看着我回答道，‘能，这件事应该不会有问题。’”次日，双方果然一拍即合，“好了，一切都妥了，运粮食的火车可以往德国开了。”[31]

1919年初，凯恩斯又成功说服协约国批给奥地利一笔贷款，以帮它购买英国卖给它的最初几批粮食。相比而言，这件事要容易得多。这轮小捷之后，凯恩斯将德国人安排在了巴黎市区外的维莱特城堡。当初的计划是将各国的财政专家们都集中起来，共同商讨战后的重建事宜。但结果，凯恩斯只去该城堡探访过一两趟。德国人住进城堡不久，巴黎和会便偏离了原先关于战后重建的议题，并由此开始一直在战争赔偿问题上纠缠不休。

“在巴黎和会期间，战争赔偿问题所引起的麻烦、争执和敌意，以及它给和会造成的延期，比其他任何议题都要多得多。”美国财政部代表托马斯·拉蒙特后来曾如此写道。[32]哈罗德·尼科松则评论说，人们通常将和会说成是黑暗与光明两股势力——美国的威尔逊与法国的乔治·克莱孟梭，迦太基式的苛刻条约与威尔逊式的和平，还有凯恩斯与法国的克劳茨之间的较量。但事实上，这种较量“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两军混战。”[33]

协约国内部也在争吵不休。威尔逊总统反对将战争的负担全部强加在德国身上。他认为，要求德国赔偿其军队对别国造成的损失是合理的，但除此以外，不应再有更多。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个甚为敏感的问题，那就是各战胜国在从德国征得的赔偿中所应得的份额，以及能分享多长的时间。劳合·乔治建议将德国支付赔款的时间定为三十年，而克莱孟梭则说，如果有必要的话，让他们付上一千年也未为不可。到1919年底，协约各国仍未能就此事达成一致。法国人坚持赔款数额不能少于二百五十亿英镑，而美国人则拒绝支持任何高于五到六亿英镑的提议。英国人的官方数字是一百一十亿英镑。3月初，凯恩斯提出了一个建议，即不将具体的赔款总额写入条约。这一建议最终被采纳。

因为此前发生的数次新闻泄露事件将他弄得焦头烂额，劳合·乔

治建议四巨头在私下举行会谈。于是，和会的第二阶段，即从3月中旬至5月中旬，便移到了伍德罗·威尔逊“狭小的书房”中进行的。一开始，除了有一位翻译在场，只有美英法意四国的首脑——伍德罗·威尔逊、劳合·乔治、乔治·克莱孟梭和维托利奥·奥兰多坐在软座垫椅上。他们围着火坐在一起。尼科松回忆道，“地图就摊开铺在地上，有时为了研究地图，他们不得不用手撑着地板，用膝盖在地上爬行。”就这样，四巨头终于协商出了和约的倒数第二个版本。[34]

结果，4月份成了最糟糕的一个月。随着气温逐渐变暖，巴黎早先的节庆气氛突然变得狂乱起来。一开始就反对在巴黎召开和会的那些人的担心终于被不幸言中：臭虫肆虐，老旧的排水系统，遭到哄抬的物价等，随口就能说出这么多。媒体也开始恶言相向。“在他们的报纸上，连篇累牍的抱怨和极端刺耳的人身攻击在接连出现。”英国外交官哈罗德·尼科松就注意到了这个情况，“会场外面响起的抗议声给和会带来了一丝紧张和病态的气氛。”[35]而此时，因为保守党人质疑他对德国人不够强硬，劳合·乔治不得不努力平息英国国会对他的尖锐批评。同时，由于法国新闻界认为克莱孟梭在和会与英国人和美国人的较量中落了下风，他也因此成了被新闻界鄙夷的对象。意大利的奥兰多干脆退出了和会。而威尔逊则正因食物中毒或流行性感冒而饱受疾苦。时至5月中旬，四国之间的纷争已愈演愈烈。有一次，劳合·乔治与克莱孟梭发生的争执如此激烈，以至于威尔逊不得不出面为二人劝架。

这种“会中有会”的局面不仅让来自小国的代表沦为了傀儡，而且连凯恩斯这样的专家也被弄得晕头转向。四巨头在没有咨询专家的情况下极其仓促地作出了一些影响深远的经济决定。英国人向美国提出了免除其战争债务的请求，而威尔逊总统在略加思索之后便断然拒绝了这一请求。根据劳合·乔治的传记作者的记载，英国首相在“赖账”之前曾经征求过凯恩斯的意见，“但他其实从未考虑过要采纳凯恩斯的建议。”[36]于是，一连二十四天，凯恩斯天天坐着漏风的汽车，在一个个供暖过足的会场之间来回奔波。在此期间，凯恩斯常与简·斯马茨一起共进晚餐。斯马茨是英国战时内阁中来自南非的一名成员，

此公是成立国际联盟和与德国达成和解的坚定支持者。

> 夜里用过晚餐之后，可怜的凯恩斯经常和我坐在一起。我们一起发泄着对世界局势和共产主义浪潮的痛恨……然后，我们又常常一起大笑。在笑的同时，我们的脑中闪现的却是胡佛描述的那一幅恐怖的画面：如果无人干预的话，三千万人将无法逃避死亡的命运。但紧接着我们又会想到，事情应该永远都不会发展到那么糟的地步；解决的办法总是会有的，最坏的结果永远都不会成为现实。[37]

1919 年 5 月 7 日的黎明来临之前，赫伯特·胡佛正在香榭大道上散步。他的身材宽正结实。他平素的待人接物让绝大多数欧洲人都觉得他是个无谓的好斗之人。街上的路灯仍然在闪烁着微光，而他走的这条通衢大道上却空空如也，仿佛被人遗弃了一般。他低垂着头缓缓地走着，宛若一名刚刚打输了比赛的拳击手。他根本没料想在这里会碰到熟人。在参加和会的代表当中，除了几位非常简朴的法国将军，其他人早餐时都是一边享用橘子和果酱一边浏览他们的伦敦《泰晤士报》。因此，当他看见两个头戴礼帽的熟悉身影正穿过大道时，他觉得非常惊讶。凯恩斯与斯马茨头挨着头，一边走一边聊得正起劲，他们似乎并未注意到胡佛也在场。这两个家伙这时候在这儿干嘛呢？

当走到近前认出他来时，他们两人也觉得非常意外。但他们三人又突然同时意识到：他们每个人今天早在凌晨四点便起床了，因为和约草案一印出来便由信使分发到了每个人的房间里。而在此之前，还没有人从头到尾看过和约的全部内容。而凯恩斯早在 5 月 4 日就曾经看到了该草案的部分内容。当时他看完之后的反应是难以置信。虽然他们都知道一些内部消息，而且凯恩斯与斯马茨都觉得和约谈判的过程极其可笑，但看完草案以后他们仍然都大吃了一惊。他们无法按捺心中的愤怒、失望以及对未来的不祥预感。因此，他们三人才会都不约而同地夺门而出。此刻在路上相遇，他们对对方的心情都感同身受。胡佛、凯恩斯与斯马茨三人顿时凑在一起聊了起来。胡佛后来回忆说，

“我们都同意，这真是太差劲了。”[38]

不出两星期，这位死心塌地的乐天派便从美琪酒店搬了出去。他在布伦园林边上租了一套带厨师和男仆服务的公寓。他趴倒在床，蒙头大睡，他的心情沮丧之极。即使首相召见他，他也是“天子呼来不下床”。到了5月14日，此时的凯恩斯在心里认定自己“也是这场恶毒阴谋的帮凶之一”。他决定提出辞呈。“这样的和平是令人无法容忍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它只会给我们带来不幸，而不会有别的。”在写给他母亲，邓肯·格兰特还有其他人的信中，他都一再如此表示。[39]

凯恩斯的最后一次干预行动是对“谋杀维也纳”进行抗议。[40]与奥地利的谈判被推迟到对德条款最终议定之后。他一直定期从财政部派驻维也纳的代表弗朗西斯·奥本海默那里获取报告。奥本海默一直与熊彼特保持着密切联系，后者也不断向他提供有关奥地利的资产，税收之类的数据。5月29日，凯恩斯向劳合·乔治递交了一份备忘录，他在该文件中请求免除奥地利的战争赔偿。30日，他参加了奥地利战争赔偿委员会举行的一次会议。他成功说服委员会作出一个较大的让步：即不再要求奥地利支付一百亿金克朗的战争赔偿。本来法国人还试图让奥地利交出它拥有的全部奶牛，但在凯恩斯脱口而出说出了一连串的数据并向人们描绘了儿童死于肺结核和营养不良的惨状之后，法国人被迫对他们的要求作出了部分修改。

维也纳的一家报纸对条约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它以下的这番话让凯恩斯觉得“于我心有戚戚焉”：

> 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如此名不副实的和约：它的实际内容完全违背了和约的初衷……每一项条款都透着残忍和冷酷，人们从中看不出一丝人类应有的同情心。它公然违背了人类所赖以维系的全部价值标准，它对全人类，以及对那些正在痛苦中煎熬的人们犯下了滔天罪行。[41]

虽然明知其不可为，但凯恩斯仍在锲而不舍地向美国财政部的伯纳德·巴鲁克请求，希望他能支持他的“使各方都尽快恢复元气的庞

大计划”[42]。劳合·乔治召集英国代表团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为了在最后一刻对和约作一些亡羊补牢的修改，他允诺将拒绝派遣英国陆军进入德国，同时也将拒绝派英国海军继续实施对德国的封锁。但正如凯恩斯在给母亲的信中所预言的，这些举动从全局上而言已经于事无补。法国人闻讯之后气得暴跳如雷。而原本应该对德奥抱有同情的威尔逊总统此刻又因为弄不懂英国人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因而断然否决了劳合·乔治的新提议。一个月以前，他曾以同样的方式否决过凯恩斯提出的免除英国债务的请求。劳合·乔治并未在此事上再多费口舌，因为据情报显示，德国内阁已秘密做出了在和约上签字的决定。尽管如此，他仍满怀忧虑地预言道：“不出二十五年，我们又得重新再来一次，但那时我们将要付出三倍于这次的代价。”[43]

6月28日，德国人终于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此时，凯恩斯早已回到英国有一月之久。他借弗吉尼亚和瓦内萨·斯蒂芬姐妹的乡下别墅隐居了起来。他靠每天在屋四周拼命除草以浇心中的垒块。他已于6月5日向财政大臣奥斯丁·张伯伦提交了辞呈。同一天，他还给劳合·乔治去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输了。现在，就让萨姆纳勋爵和英国赔偿委员会的主席坎利弗勋爵二人对着已被毁灭殆尽的欧洲沾沾自喜去吧，让他们看看到底英国纳税人还能从中得到些什么。”[44]

奥斯丁·罗宾逊是一位英国圣公会牧师的儿子。他作为飞行员参加了战争，后来又成了剑桥的学生。1919年10月，在聆听了凯恩斯那一学期的最后几次讲课中的一次之后，罗宾逊将那个月定为“自己正式皈依经济学”的开始。[45]当时，凯恩斯在爆满的听众面前宣读了一份自己写的讲述巴黎和约的半成书稿。很显然，“凯恩斯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对该课题的研究当中。而且他对世界未能避免一场在可预见的未来即将发生的灾难而痛心疾首”[46]。这一切都深深打动了罗宾逊。因为罗宾逊这代人想的正是如何才能愈合战争留下的创伤，并且将战争忘却。凯恩斯所宣扬的应该从纠正经济学理论着手的观点让他茅塞顿开。更让他着迷的是，凯恩斯还坚信，与各种各样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相比，信仰也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

从巴黎回到剑桥以后，凯恩斯即刻开始了辛勤的笔耕。在他的《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中，为了彰显其主题，他引用了简·斯马茨的情人的一段颇为高明的感慨："吉列夫人（指反谷物法案的联盟）让斯马茨意识到，早在十九世纪，经济改革就先于特许经营权的改革；所以现在我们似乎也应遵循同样的顺序。在经济问题被纠正之前，政治和领土问题根本无法解决。"斯马茨将此番话转告了凯恩斯，后者闻之不禁赞叹不已："说得太对了。我怎么从来没想到过。"[47] 前任首相的遗孀，为人风趣的亚斯圭芙也向凯恩斯提了一个建议，她让他在书中加入主要人物的照片。8月，伦敦的麦克米兰公司同意出版该书，但条件是凯恩斯得自己支付印刷费。而他在巴黎期间结交的好友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则将负责该书在美国的出版事宜。

凯恩斯对巴黎和约进行了猛烈的鞭挞，他声称，这个条约是老朽的政客们对国家一次彻头彻尾的背叛。四巨头不仅在促使欧洲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一事上无微功可言，他们甚至根本就没觉得有此必要。他们随心所欲地认为，所有被中断了的联系，所有被毁灭了的经济，都会奇迹般地自行恢复。

> 如何才能重振欧洲经济，如何才能使战败的中欧帝国成为一个和睦的邻居，如何才能使新诞生的欧洲各国保持稳定，还有，如何才能夺回被社会主义占领了的俄国。对所有这些和约都没有只言片语的谈及；同样，它对应该如何促进协约各国之间的经济融合也没提出任何建议；再者，它也未能就恢复法意两国混乱的金融秩序以及对新旧世界的体系该作出何种调整达成任何一致意见。
>
> 事实是如此令人震惊。一方面，四巨头眼睁睁地看着欧洲在挨饿，在崩溃，而另一方面，他们对解决欧洲最基本的经济问题却提不起一丝兴趣。只是因为关系到战争赔偿，他们才在经济领域内走马观花地逛了一圈。而最终他们解决赔偿问题的方式就仿佛这是一个神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一个选举的对策问题，或是其他所有可能的问题。但他们唯独没有认识到它也是一个经济问题。它决定了被他们操纵着命运的那几个国家的经济前途。

欧洲各国人民赖以生存的社会结构极其脆弱，也极其复杂。战争已经使这个结构发生了动摇，并开始崩溃。而这个迦太基式的和约如果真的得到执行，它不但不会有助于重新恢复这种社会结构，而只会给它造成更大的破坏。[48]

《和平的经济后果》全书充斥着悲观的论调，以至于弗吉尼亚·伍尔芙的丈夫伦纳德·伍尔芙给他起了个“凶事预言家[①]”的外号。“在欧洲大陆上，地球正在艰难地喘息。人们无不意识到世界即将毁灭。”凯恩斯在书中写道，“在那里，人们面对的不是铺张浪费和‘劳工纠纷’之类的琐碎问题，他们面对的是生与死的选择，是饿死与活下去的选择，是一个垂死的文明临终前发出的最后的痉挛和抽搐。”凯恩斯之所以如此悲观，究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认为，“欧洲之所以沦落到如此贫穷的地步并不仅仅是因为这场战争。”现在回想起来，凯恩斯觉得战前的那一片繁荣景象简直就像海市蜃楼一样虚无缥缈。

> “我们错将一些最稀奇最难持久的东西当成自己最本质最永恒的竞争优势，我们不但错误地依赖这些东西，而且还以之为根据制定我们的计划。就是在这样如沙子般松垮的错误基础上，我们在规划着我们的社会改革，在搭建着我们的政治平台。我们按捺不住扩张的野心，在各地招致仇恨；我们自以为会毫发无损，能全身而退，于是，我们便不但不试图缓解欧洲大家庭里的各种纠纷，相反，我们还时常在中间煽风点火，惟恐天下不乱。”

他坚持认为，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可能再这样持续很长时间。虽然自由竞争的“独创性体制”确实为企业家们提供了宽松的环境和充足的资金，但它却并非欧洲繁荣的唯一基础；这同时也是因为它幸运地赶上了一个历史机遇，所有制约它发展的桎梏都一度遭到了废除。还有，多亏美国拥有大量可供出口的过剩粮食，欧洲人才得以用较低的

① Keynessandra，这是凯恩斯的名字 keynes 与 Cassandra 一词的合写。

成本便能填饱肚子。

凯恩斯还写道，问题在于，对美国粮食的需求如果不断增加并逐渐与供给水平持衡，美国粮食的价格便不会永远这么便宜下去。他又一次重申了亚瑟·杰文斯的观点。杰文斯是与马歇尔同时代的一位天才之士，他曾于1870年预言，煤炭供应的下降将成为英国经济发展的严重阻碍。而现在，凯恩斯认为英国经济发展的阻碍不再是煤，而是小麦。他承认，在全球整体范围内也许并不存在小麦短缺的问题。但他认为，为了保证未来小麦能有更高的供应水平，英国将不得不付出比目前更高的价格。简而言之，收益递减的规律将再一次发挥作用，它将迫使欧洲以更多的商品和服务来换取与以前数量相等的粮食。

凯恩斯对经济局势的悲观预测后来被证实确实有些危言耸听。尽管战争对欧洲造成了巨大破坏，而且最终签订的和约也破绽百出，但欧洲经济在短期内仍然得到了恢复。从长期来看，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开始一直到该世纪末，相对于工资水平而言，食物变得更加便宜，而不是更贵了。与其在经济方面的预言相比，凯恩斯的政治预言更能显示出他的先见之明，这其中包括："我们必将遭遇以牙还牙"和"革命与反革命两股对立的力量必将冲突并最终引发内战，没什么能再迟滞这种局面的到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发生的一切让凯恩斯理清了思绪，他对经济的认识也逐渐成型。伦敦《泰晤士报》总编亨利·斯蒂德将凯恩斯的思想形容成"一场经济对政治的反抗"[49]。对凯恩斯所宣称的那个极其重要的东西，大多数将军和首相们都只是略知皮毛，比如：现代社会赖以生存的是什么，还有，和平的前提是能够生存，这或许也是和平的保证。

凯恩斯深深懂得，世界经济，尤其是欧洲经济的专业化程度已经达到了怎样一个水平，各经济体之间又已经形成了怎样相互依存的关系，以及某一经济体内部人们的心理变化乃至整个体制的崩溃将会如何轻易地波及到其他经济体。虽然凯恩斯尚未找到相应的政策杠杆并以之作为政府用来干预经济进程的调控工具，但他已开始从"经济整

体”的角度思考问题，而且对政府干预和不干预所可能带来的不同后果也进行了研究。

战争使他对传统智慧的怀疑日益加深，那些认为进步是自发实现的观念已被他全盘抛弃。更重要的是，他认为这是一个极其惨痛的教训，当一个政府蓄意无视当前的经济实际时，它的破坏力会是相当惊人的。维多利亚时期的经济奇迹确实曾促使生产力水平和人们的生活水平都得到了迅速提高。但该奇迹的出现有赖于政府做出的某些举措，比如推崇自由贸易，采纳金本位制，提倡法律治国和鼓励自由竞争，等等。正是因为吸取了这个教训，凯恩斯才会认为，在重振经济繁荣的过程中，政府绝不应袖手旁观，绝不能无所事事。

10月中旬，凯恩斯到欧洲出席一次国际金融家大会。“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像凡尔赛和约这样的大规模商业交易。”梅勒西奥的合伙人银行家麦克斯·沃伯格曾有过如此的评价[50]。而现在，他的兄弟保罗，一位美国投资者，希望能用美国银行的资金来向德国提供商业贷款，以使德国能够进口原材料。凯恩斯一时兴起，他给梅勒西奥发了封电报，邀他来见面一叙。三天以后，这两个人冒着雨一起在阿姆斯特丹的运河岸边散起步来。对“这次没有任何隔阂的不寻常会面”，他们都感慨良多。[51]

在和约签订前夕，梅勒西奥以退出德国代表团的方式以示抗议。之后，他又曾两次婉言拒绝出任魏玛共和国的财政部长。相反，他回到了汉堡银行任职。他告诉凯恩斯，德国总统向一名英国间谍提前泄露了德国打算签约的意向。梅勒西奥认为，就是因为这一情报才促使劳合·乔治最终放弃了修改和约的努力。午餐过后，凯恩斯邀请梅勒西奥和沃伯格回到他的旅馆房间，他为二人朗读了他书中描述威尔逊总统的有关章节。在凯恩斯笔下，这位美国领导人一开始确实曾经令全世界的人们眼前一亮并对他充满期待，但结果他却令人十分失望。

> 满带着好奇、焦虑和期待交织的感情，我们希望一睹这位命运主宰者的风采和气度。他从欧洲的西边而来，欧洲是他所代表

的国家文明的古老发源地。他本应帮欧洲愈合战争的创伤并为我们的未来奠定坚实的基础。

幻想破灭得如此彻底，以至于那些曾最抱有希望的人们都几乎都不敢再提起它。这怎么可能呢？他们这样质问那些从巴黎回来的人们。和约真的像看上去的那么糟糕吗？总统这是怎么了？究竟是什么方面的不足和不幸才导致了这样的背叛，才让所有的人都大失所望呢？

威尔逊本可以在他十四点的基础上，大肆宣扬建立世界和平的纲领。但他却缺乏

与那些阴险狡诈口若悬河的政客们打交道所需的超人智慧。而这帮政客都是从长期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中脱颖而出的胜利者，在利益交换以及各种面对面的讨价还价方面，他们个个堪称大师。[52]

沃伯格原本就非常鄙视威尔逊，当听到凯恩斯念到那些段落时，他禁不住笑出声来。但梅勒西奥的态度却一直很严肃，他看上去完全是一幅想哭的样子。

在金融家们举行会议期间，凯恩斯敦促他们对削减德奥战争赔款、免除协约国欠下的战争债务和给予德国贷款等事项表示支持。他和沃伯格共同起草了一份提交给国际联盟的呼吁，并成功说服了十几位会议参加者在呼吁上签名。就这样，凡尔赛和约的墨迹未干，试图修改该和约的第一份草案便已经出笼。在此之后，类似的修改尝试还有很多。

凯恩斯为自己定下的指标是每天写一千字，还必须具备“能直接拿去出版”的质量。每周七天，天天如此。到10月份，凯恩斯已写出了六万字。随着完成的章节越来越多，他开始把他的著作读给众多不同类型的人们听，或是寄给他们看。这中间包括他的母亲，弗朗西

斯·奥本海默和列顿·斯特拉奇。当时，整个出版界都在热火朝天地炮制一系列以和约为题材的书籍，而凯恩斯则中了个头彩。他的书在圣诞节前两星期率先上架。截止到次年复活节，该书在英美两国总共售出了十万册。对于自己曾经在战争中为虎作伥，凯恩斯以此书向“布卢姆茨伯里派”的朋友们表达了补过之意，而后者也大度地原谅了他。列顿·斯特拉奇的《维多利亚名人传》于1918年出版后也成了风行一时的文学作品。他评价说，凯恩斯的论述“有排山倒海之势”，他预言“谁也不能对此书视若不见”[53]。而奥斯丁·张伯伦虽然对凯恩斯在书中的出言不慎之处略有微辞，但他曾向他妻子坦承，凯恩斯的书“写得极其出色”，并给了他“极大的乐趣”。[54] 书评家们都众口一词地对凯恩斯的写作风格极尽褒扬之能事，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被该书说服，并认为德国根本不可能履行合约的规定。

凯恩斯的书将一个本已十分尖锐的争论带至了沸点。一些批评家认为，德国的支付能力其实比凯恩斯估计的要强得多。而另一些人则评价说，凯恩斯对政治一窍不通。甚至还有一些更难听的贬损之辞，如他的无党派身份决定了他是一个“失去人性的知识分子”等等。不出所料，托利党人对他的爱国心发出了置疑，他们甚至宣称他应该被授予一枚德国铁十字勋章。历史学家A.J.P.泰勒对《和平的经济后果》的中心思想作了如下简洁而不失公允的概括，“我们最需要预防的是德国滋生出怨恨情绪，而不是德国人的侵略行径”[55]。保尔·芒图上校曾经在和会期间为四巨头担任翻译，他也对该书进行了攻击，他还指出，“四巨头单独召开的所有会议凯恩斯一次都不在场。”[56] 然而，人们对该书最普遍的批评便是凯恩斯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伦敦《泰晤士报》总编亨利·斯蒂德评论道：

> 战争给我们最为重要的一个教训便是，那些在战前大肆宣称绝没有爆发战争的可能性的所谓经济学家、银行家和财政部的官员们，他们关于战争无利可图的预测绝对是一派胡言。德国人蓄意挑起战争正是因为它在1870年到1871年间的普法战争中尝到了甜头，所以这一次它还想故伎重施。[57]

美国书评家们则怀疑，在对欧洲实行利他主义的外衣下，凯恩斯其实是在为英国的利益服务。社会学家托斯丹·凡勃伦嘲笑书中对威尔逊的描写“牛头不对马嘴”[58]。在该书出版一周年之际，《纽约时报》对《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的评论是，“这本书给人的感觉是火气太旺”[59]，它还说，“美国公众的看法已经有了变化，他们对欧洲这一摊事已经不胜其烦，他们不想再被卷入到外国的这些纠纷中去。”伯纳德·巴鲁克的评论则代表了美国对该书的官方立场，他说，“凯恩斯是想让美国，而不是德国来为战争买单。”[60]

凯恩斯对威尔逊总统的批评有失偏颇，这一观点现在已为一些历史学家所接受。同时，他们也认为他对法国的谴责具有明显的偏向性。他们的根据是，英国索取战争赔偿的理由毕竟不如法国充分。而在另一方面，从玛格丽特·麦克米兰的《巴黎 1919：改变世界的六个月》和许多近来出版的有关巴黎和会的书籍来看，凯恩斯的观点已被广泛接受，那就是，协约国严重违背了他们与德国达成的协议，他们在合约中本应给战败国更多的话语权和谈判空间。而对凯恩斯书中的首要观点，即在如此松垮的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和平注定无法持久，几乎无人表示异议。

不出人们所料，《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使凯恩斯在维也纳和柏林成了人们交口称赞的英雄。报纸上铺天盖地全是有关此书的节选、翻译和新版本。人们绝对有理由认为，正是由于和约没为战争赔偿设定一个上限，凯恩斯才能在为德国人打抱不平的同时，还能赢得社会舆论的支持。奥地利前任财政大臣约瑟夫·熊彼特就称该书为“一部杰作”。[61]

第八章

忧郁的街道：熊彼特和哈耶克在维也纳

“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发展是以繁荣和萧条交替出现的方式进行的。”

——约瑟夫·熊彼特[1]

每当人们对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进行回顾和总结之际，他们都会不约而同地认为，这一段时期为后来的经济大萧条、法西斯主义的崛起，以至布尔什维主义取得胜利揭开了历史的序幕。从西方的角度看，这是一个颓废、幻想以及虚假的繁荣和信仰盛行的年代。然而，在约瑟夫·熊彼特、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梅纳德·凯恩斯和欧文·费雪四人的眼里，从它的创造性、激动人心和进步性几方面而言，这段时期与上一世纪的任何阶段相比都毫不逊色。

此时的凯恩斯和费雪都已成为经济学界的圣人。他们的收入也因此颇丰。更重要的是，他们同时也创造出了新的精神财富。一战以后，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引起的剧烈动荡让他们二人更加坚信，市场和民主无法长期承受这一社会病症。于是，他们开始专心致志地从制度上探索这一社会疾病的根源。像莫里哀的《无病呻吟》中的大夫一样，他们不再将注意力放在构成经济躯体的各个单独的身体结构上，而是

开始集中研究它的循环系统。他们的结论是，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虽然从表面上看似两个绝对相反的极端，但其实它们是同一疾病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症状。而货币和信用的产生机制既是该疾病的成因，同时也是它的传播途径。

眼下最迫切的问题是，世界经济的某些部分已经扭成了一个死结，有些地方甚至陷入了绝境。要想重新恢复这些地区的经济，就必须建立一个崭新的框架。费雪和凯恩斯都满怀希望的认为，这种繁荣与萧条交替的动荡局面应该是可以避免的。他们既不再认同马歇尔所认为的经济的繁荣与萧条是某些随机的外因作用下的产物，同时，他们对马克思所说的它们是市场经济的固有特性也不再苟同。与那些将原因归咎于自然的观点相反，他们相信这两种极端的交替出现是一种人为的灾难。因此，这种局面也是人力所能扭转的。费雪、凯恩斯和哈耶克都竭力寻找一种可用来调控的工具，他们都坚信，这种工具必定存在，而且一定能行之有效。凯恩斯和费雪二人均倾向于同意，应该让政府官员放开手脚随机应变地对付这种局面。而哈耶克则因为经历过奥地利相比之下更为悲惨的历史，他认为政府的行为也应该有一定之规。唯独熊彼特可以说是个宿命论者，这不仅与他的气质和坎坷的经历有关，这也是由他的信仰决定的。

1919 年秋，在熊彼特被从财政大臣的位子上被赶下台的同时，奥地利的财政危机已发展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卡尔·雷纳政府虽然面临急剧膨胀的财政赤字，但因为担心引起公众的不满和骚乱而始终在节减开支一事上畏手畏脚。因此，他当时唯一能做的就是靠源源不断地印钞票来偿还债务。奥地利商会主席路德维克·冯·米塞斯曾经如此形容中央银行的印钞机发出的低沉的轰鸣声："它们在夜以继日地运转……而此刻，大批的工厂企业却都已全部停产，只有少量一些仍在部分开工。只有印刷新钞票的机器依然在全速运转。"[2] 政府发行的克朗越多，每一克朗能买到的东西就越少。连维也纳的警察局长也在抱怨，他说，"每新发行一批克朗都会将克朗的价值降得更低。"[3] 这种做法对克朗外汇兑换率的影响是立竿见影的。而且，由于奥地利的日用

必需品大多依赖进口，克朗外汇兑换率的骤跌立刻使国内商品价格也应声而涨，而且居高不下。颇具讽刺意义的是，社会民主党人一开始还将通货膨胀视为刺激经济的一个法宝，但他们所料未及的是，和所有的狂热偏好一样，它带来的却是经济的衰竭和政治的毁灭。

最初，极易获取的贷款和高涨的物价一度造成了垂死的经济似乎在起死回生的假象。由于通货膨胀降低了借贷的实际成本，同时克朗贬值使奥地利出口商较外国竞争者占有优势，因此，投资、出口以及就业各方面变得活跃了起来。但随着奥地利的贸易伙伴国逐渐开始对它的出口商品征收关税，出口企业重新进货也日益困难，结果失业率便又升了回去。

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由慢跑变为小跑，最后演成了疾驰如飞之势。尽管工会合同几经重新协商，一名战前每星期挣五十克朗的工人在1919年底时能挣大约四百克朗，但他这份新的薪水能买来的食物、煤和衣服却只相当于他那份旧薪水购买力的四分之一。表面上他的工资数增加了八倍，但实际上他的真实工资下降了百分之七十五。不出一年的时间，一套便宜衣服和一双靴子的价格将会涨到比他八个星期的薪水还要高。[4]公务员和领取退休金的人们发现他们每星期领取的收入只够买几只鸡蛋或几条面包。这还只是刚开了个头。甚至连弗洛伊德都在开始考虑把家搬到柏林去，他一度抱怨说，“这里已没法再住下去了，连需要作精神分析的外国病人都不愿到这儿来了。”时至1921年10月，物价平均每月上涨的幅度超过了百分之五十，这标志着极度通货膨胀业已开始。[5]到1922年10月，物价水平已相当于一年前的两百倍。

通货膨胀将中产阶层的毕生积蓄一扫而光，同时，也使他们对民主制度的信任荡然无存。“我们所有人的存款都已所剩无几。”弗洛伊德在给朋友的信中如此诉苦道。[6]一钱不值的钞票与代用食品和纸制衣服一样，给人们普遍留下一种受骗上当的感觉。在斯蒂芬·茨威格的《隐形的收藏》一书中，一位双目失明的艺术鉴赏家错以为自己收藏的历史上艺术大师们的杰作仍然安然无恙，但其实他的家人们早已将那些艺术品同别人作了交换，他们拿了一沓空白的牛皮纸充作原来的画

在骗他。日记作家安娜·艾森曼格如此描写了她被人出卖的感觉，“她仔细审视着自己剩下的最后一千克朗的钞票，它们和我的各种食品供应卡一起躺在写字桌的抽屉里……一旦政府违背了其铭刻在每张钞票上的誓言，这些钞票会不会遭受和已经不能兑现的食品供应卡同样的命运呢？”[7] 随着人们完全丧失了对克朗的信心，日常贸易退回到了物物交换的方式。许多农民和店主拒绝收取现金。对中产阶层的人们而言，这便意味着要用一架钢琴换一袋面粉，用五十支战前收藏的雪茄换四磅猪肉外加十磅猪油，用一条金表链或者拿弗洛伊德的例子来说，一篇给杂志的投稿换来几袋土豆。

在商店里的货架尚未变空的时候，一个人揣上几英镑或是几美元便能在维也纳随意一个店铺里颐指气使地购物，有时甚至能将店里所有的存货席卷一空。法国记者皮埃尔·汉普于1920年出版了一部名为《人类的痛苦：淘金人》的小说，它描写了闻风而至的外来淘金者在维也纳城内趁火打劫的情景。小说的主人公苏尔茨巴赫指责这些人是在落井下石，以邻为壑。[8] 奥地利的农场、矿山、铁路、船舶、发电厂、工厂还有银行，这些大宗资产也都在一一待价而沽。随着克朗的贬值，如果买方用英镑，美元或别的硬通货支付，那这些资产的出售价格便会和拍卖价一样低。外来势力的全面接管在维也纳引起了公愤，这也是为什么菲亚特购买阿尔卑斯褐煤蜡铁矿公司一事会将熊彼特弄得灰头土脸的原因，甚至在他去职后很久此事仍一直在困扰他。

复员的老兵们在环城大道内侧的十几家豪华餐厅的门外等着吃别人的残羹剩饭。而与此同时，那些新近诞生的巨富们却正在里面觥筹交错。他们饮用的香槟和美食“在质量和数量上都丝毫不亚于伦敦的规格。”[9] 在愈演愈烈的贫富斗争最终发展到极致之前，新兴的富裕阶层和新的穷困阶层之间的生活差距让年轻的阿道夫·希特勒痛恨不已。叫花子、乞丐和难民似乎无处不在，人们将怨恨普遍集中在发黑市财和战争财的人，外国人，尤其是犹太人的身上。每一轮食物价格的暴涨都会立刻招来一连串针对生活成本上升的示威游行和暴力事件。1921年12月，一大伙人捣碎了店铺的橱窗，攻击沿途的酒店，并且

开始哄抢食品店。一位当时来维也纳参观的人在给他妻子的信中写道，“人们对食品价格无止境的上涨怒气冲冲。”同时，人们对所有借奥地利的不幸从中渔利的人都极度仇视，像那些黑市商人，那些股票交易所里的投机客等等，而他们“几乎全都是犹太人”。[10]

通货膨胀让古老的维也纳变成了一个乌七八糟价值颠倒的游乐场。乔治·帕布斯特1952年拍摄了《忧郁的街道》一片。在片中，年老的公务员们一个个都挤在黑暗狭窄，没有供暖的公寓楼里，邻居之间互相监视着各自的一举一动，原来的良家闺秀现在已沦落风尘，原来朴实无华的人们如今都成了疯狂的股票投机客。金边证券的凭证成了抵挡通货膨胀的首选武器。那些以前除了政府债券什么投资都没搞过的人们在突然之间倾囊而尽，将所有现金都投进了有望获取暴利的股市中去。

安娜·艾森曼格在日记中记录的一段她与银行经纪之间的对话，形象地刻画出了中产阶层的人们面对投机狂潮的袭击时的那种无助心态：

> “我让你买瑞士法郎的时候如果你照买了的话，现在你就不会亏掉四分之三的投资。”
>
> “亏了？”我吓得大声惊呼起来，“为什么，难道你不觉得克朗很快便会涨回来吗？”
>
> “涨回来？”他噗哧笑了一声，说道，“我们的克朗要去见鬼了，这是肯定的。”
>
> “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然后，他开始向我解释，“奥地利王室即将被迫发行战时公债，而认购这种公债通常是强制性的。政府之所以采取这种办法是因为它已用光了所有的黄金储备，它再也没钱来支撑正在进行的这场战争。只有依靠战时公债筹集到的资金，战争才能勉强继续下去。但此刻正在流通的这些债券根本就没有任何担保。”
>
> “就拿这张值二十金克朗的公债来说吧，它许诺你能得到，打个比方，二十银克朗的回报。”他边说，手里边拿着一张二十金克

朗的债券在晃悠……“现在你该懂我的意思了吧，我跟你说，在眼下这个时期，最好是拿钱置房，买企业，买矿山的股票之类，但唯独不要将钞票攥在手里，至少不要将奥地利和德国的钞票攥在手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懂你说的。但我买的毕竟是政府发行的债券啊？它应该比所有别的东西都更保险吧。”

“我亲爱的女士，为这些债券提供担保的那个政府现在在哪儿呢？它早就没影了。”[11]

这番谈话的最终结果是银行经理建议艾森曼格太太将钱投在股市上。和其他不计其数的维也纳人一样，她只能照办。

熊彼特的政治生涯已走到了尽头。百无聊赖的他只得又回到格拉茨大学重操旧业。尽管如此，他在政府高层仍然有众多熟识。作为对他被狼狈轰下台的补偿，国会中的保守派人士于一年之后给他颁发了一张银行执照。该执照可以由他任意支配，包括出售、使用或闲置不用。因为维也纳总共也就有十几家投资银行，许多银行界的合伙企业都正急于通过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来筹集资金。而一张可以开银行的执照注定不愁找不到买主。国会给熊彼特的这份礼物还真称得上是一顶价值不菲的金色降落伞。

1921 年 7 月 16 日，维也纳最古老的投资银行 M.L. 比德尔曼成功上市。同一日，熊彼特被选为该银行的主席。那天他年方二十九。作为使用他持有的银行执照以及让他在银行券上签字的回报，熊彼特得到了一间非凡气派的办公室，一份十万金克朗的薪俸（大致相当于今天的二十五万美元），以及足够让他成为该银行第二大股东的大量股份。另外一项最大的福利是他几乎可以不受限制地从银行贷款用于个人投资。

他的时机掌握得真是妙到毫颠。此时，国际联盟刚刚七拼八凑炮制出了一项奥地利援助计划，该计划酷似熊彼特于 1919 年制定但后来被迫流产的那个方案。为了换取一笔紧急贷款，奥地利承诺将恪守财

政和货币制度：它将禁止新成立的国家中央银行以购买短期国库券的方式解决财政赤字；它将削减十万名政府工作人员和修补赋税漏洞，争取平衡政府预算；在奥地利外债下降到一定水平之时，它还将重新回归金本位货币体系。和约即将签署的传闻以及协约国赔偿委员会将宣布放弃对奥地利索偿的消息一出，顿时止住了克朗继续下跌的势头；甚至在协议于 8 月最终签署之前，通货膨胀率便已应声从百分之一千的水平上降至百分之二十。[12]

但投机的热潮并未消减，相反，人们又开始对金边证券趋之若鹜。工商企业不再以高利率借贷筹集资金，他们现在都采用发行股票的方式。而银行则将这些新发行的股票大口吞入。不久，各银行摇身一变纷纷成了奥地利企业的最大股东。历史学家 C.A. 麦卡特尼认为

> 奥地利的银行，当然，少数几家知名和行事谨慎的除外，在投资的时候丝毫不考虑安全和风险因素。股票在交易所一露面，即刻被人们哄抢一空。企业界自身，包括那些最有信誉的公司，也变得投机起来。它们逐渐将自己的绝大部分都交到银行手中。它们的股票被抛来抛去用于看似最荒谬的目的。[13]

不出所料，熊彼特将银行的业务全盘交给比德尔曼的资深主管打点，他自己实际上成了一名资金管理人和风险投资者。他迅速出手，独自或是与特蕾莎学校的熟人一起合伙，控制了数家企业的大量股份。不出数月，他便成了数家企业和银行的董事，这其中包括考夫曼银行、一家瓷器厂和一家德国跨国公司下属的化学厂。[14]

疯狂的交易，疯狂的买进和卖出是令人陶醉的。虽然熊彼特的穿戴和一个银行主席没什么两样，但正如维也纳的报纸所讽刺的那样，他的生活方式如同王公贵戚一般奢侈。他仍然欠着一大笔个人债务，甚至还有欠税未交。虽然他不再保留酒店里的豪华套间，租来的半座宫殿也退掉了，但他仍时常在自己的公寓里大宴宾客，仍在他的情人、养的马和衣饰上挥金如土。和他在花钱上极其随意一样，他对自己的名声也颇不介意。银行同事曾提醒他不要和妓女一起在公开场合露面，

但结果是，“他仍然坐着车在市中心的大街上招摇过市，两只膝盖上各坐着一名漂亮的妓女，一边的是金发，另一边的是黑发。”[15]

1924年初，熊彼特觉得他的财务状况“已步入正轨”[16]。他从比德尔曼所贷的款也有金边证券作保障。然而紧接着，维也纳股票交易市场的惊天大崩溃于1924年5月9日发生了。熊彼特用作个人抵押的“极易销售的有价证券”，其四分之三的市值在早中两顿饭之间的数小时内如烟雾一般消于无形[17]。在接下来的疯狂数天中，他被迫将自己剩余的股票逐一抛售。所幸由于一笔在法国法郎上的逆向操作，比德尔曼银行才最终经受住了外汇市场的巨大损失。为了筹集现金，包括熊彼特在内的银行董事们不得不向英格兰银行下属的银行大量出售他们拥有的比德尔曼银行的股份。进入夏季以后，他持股的数家企业都已倒闭，因此，作为企业董事他不得不出资赔偿股东的损失。他那位特蕾莎学校的熟人即使不能说他是个骗子，至少也是个擅长鬼魅伎俩的家伙。因为他，好几桩官司和犯罪调查都将熊彼特牵连了进去，而且一拖就是数年。

此时的熊彼特不仅在个人财政上已完全破产，作为银行的工作人员他也声名狼藉。比德尔曼银行的英国投资方对他忍无可忍，他们坚决要求他从银行辞职。1924年9月，媒体又传出了对他新的指控，说他曾利用比德尔曼银行的关系替政府的某位部长捞好处。这使他最终提出了辞职。此时，他的数百万资产已经荡然无存。银行董事长答应给他一年的薪水作为离职补偿。但他所欠债务的数额比这要多得多，而且他几乎没有任何希望能捞回他在股票上的损失。金融危机触发了一场长期的经济衰退，好几家大型银行和上百家工商企业被迫关门倒闭。最终，比德尔曼银行也因为违约，导致全部资产被清算偿债，但令人惊讶的是，所有投资人都拿回了自己的投资。在经济下跌最严重的那些日子里，路德维克·冯·米塞斯站在他办公室窗户的旁边，示意一旁的另一位经济学家过来。他指着窗外的环城大道——这个维也纳自由时代的象征愁容满面地说，“那里也许很快就会变得杂草丛生了，因为我们奥地利文明马上就要完蛋了。”[18]

虽然熊彼特的政敌对他的评价十分苛刻，但他们对他的公开谴责

远不如他本人对自己的批评来得严厉。他从但丁《神曲：地狱篇》中借用了“Il gran rifiuto”即“断然拒绝”这句话来形容战争爆发以来他度过的这十几年（大约也就是他年满三十以后的这十几年）。这句话通常被用来暗示一个人丧失了机会或是缺乏胆量。如今，他已经四十一岁，生命中让他追悔莫及的事情比让他为之憧憬的要多得多。

他对影自怜的忧郁心情并未没持续太久。替自己的官司辩护，替自己赚钱，这些都让他重新振作了起来。在这个于他多灾多难的一年行将结束之际，终于发生了一件让他笑逐颜开的事情。和所有如唐璜般风流成性的人一样，熊彼特虽然有过无数为女人神魂颠倒的时候，有时甚至到了痴迷的程度，但他尚未经历过真正的爱情。然而，在安妮·莱辛格的年轻、工薪地位和柔弱面前，他解除了全部武装。她年方二十一，她父亲是熊彼特母亲所住公寓大楼的管理员。自她年幼时起他就认识她。她刚满十八，他便开始尝试过出言相挑，结果却总是碰壁而回。其实最让她害怕的并不是他是一个年岁长她一倍的公众人物，而是他寻花问柳成性的名声。圣诞节那天，她来看望他的母亲，二人因此又得以见面。她变得比以前更漂亮，更有女人味，也比他记忆中的更加沉着。沉闷乏味的他发觉她天性活泼，从不假装深沉，这些都让他耳目一新。

此时的他正忍受着孤独和痛苦。而她也正试图从此前与一名已婚男人的失败情史的阴影中走出来。他们都同样处于人生的反弹阶段。熊彼特将他们之间的爱情攻略当作一项任务来对待。他每天都向她献殷勤，他带她频繁出入歌剧院、舞会和饭店，有时还带她一起去乡村度周末。他送她的花和贵重小礼品不计其数。向她求婚的时候，他将高贵的膝盖跪在了地上。

眼瞅着一个工薪阶层的女孩即将成为自己的儿媳，熊彼特的母亲大吃了一惊，但她终于隐忍未言。像她儿子这样一个臭名远扬身无分文的男人，要想攀上她为他设想的那种婚姻几乎是毫无可能了。另外，他和格蕾狄斯在法律上仍然保持着夫妻关系。熊彼特已经很久未与格蕾狄斯见过面，自从他们俩 1913 年分道扬镳以后，她便已重新使用婚前的姓氏。是她拒绝考虑离婚还是他根本就没提出过离婚，这个人们

不是很清楚。但很明显，他们两人在法律上仍然是夫妻关系。如果格蕾狄斯真想那样做的话，她完全能制止他再次结婚，或许她还可以告他重婚。但熊彼特走运的是，在当时的红色维也纳，由社会党人组成的政府放宽了婚姻法原来有的某些限制。为了让他能如愿以偿娶到安妮，一名与他交厚的政府官员替他办了民事豁免。

与此同时，熊彼特的朋友们为了使他能在事业上东山再起绞尽了脑汁。虽然他在政坛和银行业都混得颇为不顺，但他作为一名杰出的经济理论学家的名号却依旧响亮。诚然，他在维也纳和柏林两地没少树敌，那些人若得知他要去那两个城市的大学任教也绝对会全力阻挠。但是许多国外的大学，包括日本东京大学，也都向他伸出了橄榄枝。最终，波恩大学授予他一个公共财政系主任的职位。马克思第一次尝试谋取教职并遭遇失败就是在这所大学。“熊彼特是个天才。”他的一位朋友写给柏林文化部的推荐信是这样开头的。德国大学与当代经济学完全被隔绝开了，这位写信人指出，而熊彼特将能使波恩从一个偏僻闭塞的死角一跃成为理论经济学的一方重镇。

“波恩拿下了！”1925 年 10 月，当熊彼特获知他在与另一位来自维也纳的候选人（路德维克·冯·米塞斯）的竞争中终于胜出，他便打电报向他的未婚妻报捷。他自己都没料到他竟然会如此渴望去波恩。虽然他是公共财政系的主任，但校方已答应他，他可以只讲授纯理论的课程。11 月初，他和安妮在仅有的两位见证人的目击之下结为夫妻。之后，他们旋即前往意大利北部的一处豪华温泉旅游。他们赶在春季学期开始之前到达了波恩。

没用多久，熊彼特和他的妻子便成了波恩城里最潇洒迷人的一对。熊彼特不改其一贯高调奢华的作风，租下了一座位置正好俯瞰莱茵河的灰泥墙豪宅。威廉皇帝在学生时期就曾在此居住。安妮首次出席他所在学校的教职员茶叙时，他已经为她编好了新的身份。在他的介绍中，她不再是公寓管理员的女儿，不曾在维也纳银行当过出纳，也不曾在巴黎当过寄居生。他把她说成是来自维也纳一个显贵之家的娇小姐，在巴黎昂贵的淑女学校受的教育。虽然在沉重个人债务的逼使下，熊彼特不得不兼职当起了记者和公共授课人，但熟知他的人都众口一

词地认为，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开心。最让他高兴的是，安妮已经怀上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可惜好景不长。6月中旬，他母亲的突然去世给了他当头一棒。在他一生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她都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人。他常对人讲起“他对她无条件的依恋之情和无限信任。”[19] 熊彼特赶回维也纳参加了她的葬礼。回到波恩后刚过两星期，他又遭遇了第二个残酷打击，安妮在分娩时“惨死”在他眼皮底下。[20] 而他们产下的男婴只存活了不到四个小时便离开了人世。

比德尔曼银行的失败和两个与他最亲近之人的相继离世在熊彼特的心里留下了永久的创伤。后来，他总共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才偿清了他的个人债务，他再也未能有机会在经济上卷土重来。六年后，熊彼特在一封发自新加坡的信中写道：

> 我无法真正的解脱。我摆脱不了那些痛苦的回忆和预感……每当我乘着美丽的船只悠然停泊在平静的海面上，这时，过去所有的那些错误，失败和困难，还有那刻骨铭心的1924年，便一一清晰呈现在我的眼前。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衰竭会径直凝化成对死亡的预感。[21]

对资本主义的未来，熊彼却保持着令人惊讶的乐观。经济学家伊斯雷尔·柯兹纳发现，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人们研究经济周期时最主要的一个问题便是：资本主义究竟还行不行？[22] 一个财产私有和自由市场的经济究竟能不能生存下去？卡尔·马克思认为，经济恐慌和经济萧条都是来源于经济制度本身，而它们最终也将摧毁这个制度。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观点则与马克思相反，他将经济萧条的原因归咎于某些外因偶然的作用力。而熊彼特则将马克思的观点完全颠倒了过来，但他出言颇为委婉。他认为经济的周期性是经济的固有属性。因为“通常经济繁荣与社会福利是息息相关的，而经济萧条则与生活水平的下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在我们的画面中却不是这样，甚至存在情况与之相反的暗示。”[23]

他指出，自 1848 年以来，虽然经济危机和萧条频繁发生，但实际上生产力和生活水平依然提高了数倍。由于“发明创造在各历史时期并非均匀分配，而是成批地相继出现”[24]，因此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便呈现出突然加速前进的模式。新的发明必然滋生众多的模仿者，必然带来新一轮投资热潮，当然也就还会有新一轮发明热潮。然后，投资热会逐渐消退，消费品会充斥整个市场，迫使价格下降和生产成本上升。利润率遭遇诸多压力的挤榨而导致经济衰退。

新发明的出现，生产力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存在弊处，那便是它会带来经常性的社会紊乱。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认为，经济繁荣之后，接踵而来的必然是经济衰退——一种“创造性破坏的永恒风暴”。然而，经济固有的稳定性并未改变。如果这一制度面临危险，那危险必定来自于政治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将经济衰退视为制度失败的征兆以及制度失去稳定的根源。熊彼特的观点正好与之相反。由于经济周期会带来发展，那么经济萧条则是健康的，因为它迫使效率低下的企业破产，强迫其他企业削减成本，并优化其经营。企业和产业的倒闭破产和人的死亡一样，是不可避免的。熊彼特认为，世上万物没有一成不变的，“没有任何一味济世良药能永久性地阻挡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趋势。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地位，无论是生命形式、文化价值还是理论思想，最终全都会从社会量表上滑落下来，并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死亡同时也为新的生命创造了空间。发展则要求有管理天赋的人才，劳动力和其他资源必须从旧的产业向新兴的产业转移。因此，那些渴望发展和进步的国家必须能承受住经济萧条。无论你同意与否，一言以蔽之，他的观点就是，“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发展是以繁荣与萧条交替出现的方式进行的。”[25]

为数众多的发明和创新，大到电，小到牙刷，都是经济繁荣周而复始不断出现的“主要原因”，并为经济体制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而经济“衰退”的反复出现则是由于“新产品新工艺打破现有平衡而造成的冲击”。尽管经济“衰退”通常会带来巨大的苦难，比如失业率上升，工资下降，企业亏损甚至倒闭，但它不会持续太久。“这种令人们感觉不好的现象只是暂时性的。”熊彼特写道，“随着商品源源不断

地出现并且日益丰富，生产在局部上恢复了原有秩序，生产成本开始逐渐下降。最初，企业似乎只是为企业家赚取利润，而最终它提升的却是其他所有阶层人们的永久性真实收入。”[26] 他坚信，不断的变革是经济保持稳定的必要条件，就好比若想让自行车不倒地，就得让它一直不停地动。

在波恩的那些日子里，他潜心投入了两部书的写作，并且悉心培养了一批天资聪颖的年轻学生；他经常性地向十几家报刊投稿，还花费数百小时的时间为德国工商团体进行巡回讲学。虽然对他活动安排如此紧凑的最好解释是他仍有巨额债务要偿还，但其实他是在以此麻醉自己。每天夜里，在日记中他才会稍稍敞开他伤痕累累的心扉。尽管如此，他日记里记载的也不过是一连串的悔恨和自责。自从母亲去世以后，他便再也没有回过维也纳。

1927 年秋，即在母亲和安妮过世两年之后，熊彼特接受了哈佛大学的任教邀请并第二次踏上了美国的土地。这一回也许他不再像 1912 年那次一样显得对美国那么倾心，但美国人的富足、旺盛的精力以及乐观精神使他深受震动。当时，一些金融专家就股市中存在投机泡沫一事发出了警告。而他在 1928 年春写的一篇论文中也明确指出，股市的高涨极有可能将被一轮暴跌所取代。随之而来的还将包括商品生产的下降和失业率的全面升高。然而，他得出的结论却是，“这种不稳定，是新的发明创造所引起的，它们通常趋向于自我纠正，而不会持续地累积下去。”他解释道，因此资本主义制度“在经济上是稳定的，甚至在稳定的基础上还会有所提高。”[27]

一位身材高挑的年轻人坐在纽约公共图书馆的主阅览室里。他在仔细翻阅旧得有些发黄了的《纽约时报》。他头发乌黑，穿着寒酸，长相有些类似列昂·托洛茨基。他在寻找有关奥匈帝国军队在战争最后几个月的新闻报道。他圆框眼镜后面的那双蓝色眼睛一次又一次在惊讶中睁得又圆又大。你几乎绕着地球跑了半圈来到这里，却发现你对自己一生中某个片段的了解原来全都是虚构的。这是多么的荒诞啊。

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是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表弟，也是

前奥匈帝国军队的一名下士。和大多数奥地利人一样，虽然他对奥地利的新闻报纸原本就不太相信，但此时他还是被惊呆了。在今天以前，他一直相信奥地利报纸所宣称的，皮亚韦河反击战——这场出人意料的战略冒险之所以失败是由于行动中出现的若干失误所致。但从《纽约时报》的报道能清楚地看出，美英两国的战地记者们早已确信在数星期之内完全击败奥匈帝国已是板上钉钉的事实。换而言之，一个谎言断送了十万条生命，而哈耶克差些便成了这十万人中的一员。

1918 年 8 月，哈耶克随着七零八落的奥匈军队从意大利仓皇撤退，往北翻越阿尔卑斯山。当他最终抵达维也纳时，他决定放弃先前当外交官的理想。他在维也纳大学注了册，成为了一名法律专业的学生。后来他将自己对社会科学的兴趣归结为战争的影响，尤其是在一支多国联军中服役的经历对他的影响。假如不采取类似军队中强迫和命令的方式，一个社会该如何让各种相互竞争的欲望与各利益群体之间保持和谐？它该如何促使语言、文化、教育水平各异的每一个个人之间进行交流并取得共识？奥匈帝国联军的指挥失灵证明它未能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但是实施壕沟战的战术却为哈耶克提供了大把的阅读时间。在那些被他翻来覆去读了一遍又一遍的书中间，有两本颇为晦涩的政治经济学书籍。

由于缺乏煤、照明以及食物，维也纳大学几乎无法正常运转。哈耶克在这里与另一名法律专业的学生，赫伯特·福尔斯成了好友。福尔斯同样是一名退伍军人，他曾在皮亚韦河反击战中身受重伤。福尔斯的父亲是维也纳市议会的议员，他母亲则是奥地利的首位女权运动人士。福尔斯介绍哈耶克认识了一大批思想成熟的左翼学生，他们大多来自已经融入当地文化的富裕犹太人家庭。福尔斯和他那些同道们经常在歌剧院对面的朗特曼咖啡馆打发时间。在哈耶克的印象中，他们很多时候都在围绕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进行争论。这些来自律师、教师和商人家庭的孩子们，他们给哈耶克留下的最大感受就是他们比其他同龄人要自信，眼界也要开阔得多。他后来回忆道，“他们对英法两国知识界最新动向的了解与对讲德语地区的了解同样熟稔。”正是通过他们，哈耶克才发现了伯特兰·罗素、H.G. 威尔斯、普鲁斯特和克

罗齐，也才接受了这样一种观念，即“为理想和主义献身并不意味着在追求现实生活的艺术中可以不切实际。”[28]

维也纳大学战后的学生政治基本上是以危险的天主教民族主义和宣扬暴力的马克思主义二者为主导。哈耶克和福尔斯二人都自认是费边社会主义者，所以，他们对以上两种主义都持排斥的态度。为了为人们提供另外的选择，他们在入学后第一个学期便发起和成立了一个温和社会主义组织，民主学生联合会。

哈耶克聆听了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的讲课。维塞尔曾经担任过奥匈帝国的末任财务大臣，他同时也是奥地利最卓有成效的对外发言人。哈耶克还曾经阅读过奥地利经济思想家卡尔·门格尔和欧根·博姆-巴维克的著作。然而，在维也纳这样一个拥有十万座咖啡馆，公寓短缺，失业知识分子过剩的城市里，哈耶克最重要的教育却是从咖啡馆里他的同伴那儿得来的。对此人们应该也不会太感意外。在大学的第三年，哈耶克和福尔斯组织举办了一个每两星期一次的研讨会，他们将之戏称为精神学派（Geist-Kreis）。Geist 包括降神会中所有可能出现的魂灵，可以是宗教圣灵也可以是世俗中人，甚至也可以是恶魔。该小组二十几个成员讨论的话题从戏剧到逻辑实证主义等不一而足。他们中间包括奥斯卡·摩根斯坦、戈特弗里德·哈伯勒、弗里兹·马克卢普、哲学家埃里克·沃格林、数学家卡尔·门格尔（经济学家卡尔·门格尔之子），以及其他一批历史学家、美术史学家、音乐学家和文学批评家。

哈耶克于 1922 年春完成了他的法律博士学业。他迅速在战争赔偿清算局找了一份初级公务员的全职工作。正如爱因斯坦在瑞士专利办公室谋的那份闲差一样，哈耶克这份工作也足够清闲，这让他能专心攻读政治科学的博士学位，这也是他第二个博士学位。他的一位朋友曾评论道，如果有人像哈耶克那样，在九个月内让每月的薪水突然从五千克朗一下涨至一百万克朗，这将对“其人的思想产生极大的影响”[29]。虽然此言不无夸张之处，但毋庸置疑的是突然鼓起来的钱包使哈耶克的注意力开始转移到货币所扮演的角色上来。当年爱因斯坦也是在坐在伯尔尼专利局的办公桌后面打盹的时候，突然对万有引力

定律发生了兴趣。这与哈耶克突然对货币产生兴趣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虽然哈耶克对收藏旧书比对投资股票证券更感兴趣，但这并不妨碍他梦想自己有朝一日能成为奥地利中央银行的董事长。

这时，一个突发性事件吸引了哈耶克的注意力。布尔什维克于1919年实施了“闪电式社会主义化”[30]。同时，奥地利的雷纳政府也威胁要将主要产业国有化。这些都向在维也纳的左翼知识分子提出了若干急切的问题：社会主义究竟能否奏效？它能否生产出人们需要的商品？计划经济可行吗？对此，德国社会学家麦克斯·韦伯斩钉截铁地给出了否定的回答[31]，而外交部长鲍尔和约瑟夫·熊彼特则双双给出了肯定的回答。熊彼特的乐观是以“一切情况正常”为前提的。[32]

哈耶克的老板兼导师，自由派经济学家路德维克·冯·米塞斯将这场辩论推向了新的高潮。在一篇极具煽动性的论文*Die Gemeinwirtschaft*，即《集体制经济》中，米塞斯将他的论据重新组织了一番，并将重点转移到信息上来。他的假设是，经济就好比一台计算机，就是用来解决数学问题的机器。他认为，中央计划经济严重缺乏解出诸多方程式中诸多未知变量所需的必要数据，因此，它也必然缺乏得出最终答案所需的手段。

米塞斯认为，制定计划之人当然可以开列出一份需要生产的商品和服务清单。但他想问的是，接下来又如何呢？政府官员们如何才能确保一件商品，比如说一辆汽车的价格对于消费者来说将会等于或超过制造它所消耗的劳动力、钢材、橡胶和其他原料的价值呢？他们又如何才能断定，对消费者而言，这辆小汽车比公共汽车更值钱呢？因为同样的原材料原本也可以用来制造公共汽车。

米塞斯说，在市场经济中，单个的企业和消费者都是依靠价格数据作出判断的。还是以汽车制造为例吧。制造一辆汽车的成本究竟是高于还是低于消费者所愿接受的水准呢？计算成本首先是将劳动力的时间、所耗费钢铁和橡胶的数量、营销、运输以及其他投入，乘以各自的单价，然后将所有的结果加在一起。而要计算它对消费者的价值，则将售价乘以一，得出的就是一辆车的价值。而生产汽车是否划得来呢？如果你的成本低于你的收入，你就可以一直生产下去。如果生产

成本比别人所愿付出的价格还要高，你就该再考虑考虑。

米塞斯指出，用计划制定人取代市场机制的问题就在于，没有了市场也就无法再利用市场价格来作出判断。但你不能人为地制定价格吗？当然也可以，但如果市场中根本没有人从事生产和购买的活动，那这个所谓的价格也就不是真正的市场价格。它们不能反映消费者对商品的主观喜好，也无法迅速反映出企业对是否生产该商品所作的判断。它们无法为你提供作出理性决定所需要的信息。你根本无法知道你究竟是在最大化地利用你所拥有的资源呢，还是在肆意挥霍你的这些资源。

关于社会主义化的辩论以及冯·米塞斯市场是计算器和信息发射机的观点都给哈耶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深受鼓舞，于是便写了一篇关于房租管理的论文。对众多的家庭而言，战争遗留下来的房屋供应极度短缺的问题和粮食短缺一样，正在变得日益严重。1922 年，包括福尔斯的父亲在内的社会民主党人决定将租金固定在相当于战前价格四倍的水平上。但由于自 1921 年 1 月以来，消费者价格指数已经上涨了一百一十倍，市议会的这个决定无意中等于将租金降低到了聊胜于无的水平。用这样的对策来解决房屋供应短缺的难题真是让人匪夷所思。结果，固定租金水平的政策开始实施以后，新建房屋的工程项目纷纷下马，原有的房屋也变得更加破败不堪，过度拥挤和无家可归的现象也愈演愈烈。这项失败的政策虽然意在保护穷人，但它阻止了人员的移动搬迁，制造了更多的不平等，同时也大量减少了原本可以用于投资的租金收入。[33]

哈耶克抓住了一个难得的机会。1923 年到 1924 学年，他将以研究助手的身份在位于格林威治村的纽约大学师从耶利米·惠普尔·杰肯斯博士一年。杰肯斯是协约国战争赔偿委员会的货币专家，其人的举止和外表能让人觉得比特丽斯·韦伯对美国人的偏见不无道理。囊中羞涩的哈耶克到纽约之后才惊讶地发现，杰肯斯已启程前往康奈尔大学，因为他在那里兼任有第二个教授职位。

好在在此紧要关头杰肯斯回到了纽约，不然，哈耶克就得去第六大道的餐馆里头刷盘子打工了。除了替杰肯斯收集数据之外，哈耶克

还在纽约大学选修课程，他并且开始撰写一本有关固定资本，比如机器和工厂厂房的价格是如何制定的著作。他还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成立十年以来的表现进行了研究并写出了长篇论文。因为有熊彼特写的推荐信，他得以与欧文·费雪会面。他还旁听了哥伦比亚大学的魏斯理·米切尔和约翰·贝茨·克拉克的讲课。当时，哥伦比亚大学是美国研究经济周期的重要学术中心。

哈耶克来纽约的主要目的是想尽可能多地了解美国人对经济繁荣与萧条交替出现所持的看法。对资本主义制度能否奏效这样抽象的问题他并不那么感兴趣，相反，他更感兴趣的是经济预测究竟能不能派上用场。有无可能对未来六个月到一年以内的生产和价格作出预测，也就是说，该预测能不能准确到货币管理当局能在它的指导下采取措施以预防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发生？在哈耶克看来，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了纯学术的范畴。是冯·米塞斯将哈耶克推荐给了杰肯斯。但米塞斯一直在跟哈耶克提起，他打算在维也纳商会开始一个新的与经济周期和经济预测有关的研究项目。

哈耶克原本会乐意在纽约再呆一年，但等到洛克菲勒基金会通知他该基金的受托管理人同意将给他的拨款延长一年的时候，他已经身在坐船返回欧洲的途中了。1924 年 5 月底，他回到了维也纳，并重新操起了以前那份赔偿办公室寡然无味的工作。他郁郁寡欢，心情压抑。离开维也纳之前，他爱上了在同一个办公室上班的表妹海琳·比特理奇。在出发去纽约之前，他差一点就脱口而出向她提出求婚，但最终却未敢开口。对此他一直后悔不迭。因为在他离开的这一年里，她早已嫁为人妇。

这时，米塞斯邀请他去参加他个人举办的研讨会，该研讨会是“全维也纳乃至全欧洲大陆上最重要的经济研讨中心”。这让他重新振作了起来。除了五六位昔日精神学派的成员之外，参加该研讨会的人还包括经济学家史蒂夫·布朗、哲学家费利克斯·考夫曼、阿尔弗莱德·舒尔茨和弗里茨·希瑞尔，还有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恩格尔-雅诺西。哈耶克向研讨会提交的首篇论文就是他关于维也纳房租管理的研究成果。

冯·米塞斯一直在设法替哈耶克在维也纳商会谋一份差使。在这一努力失败之后，他筹集到足够的资金并成立了一个独立的预测研究院。他便让哈耶克来负责该研究院的各项事宜。奥地利经济周期研究院是按照哈耶克在美国学到的学术和私人组织架构创建的。哈耶克是其首任院长。年仅三十岁的他突然发现，虽然他的全部手下只有两名打字员和一名文书，但他已经在主管一家与国外同类机构联系紧密的研究院，并且每月还要出版和发布一份面向国外读者的预测报告。

1928 年，哈耶克在纽约时便已开始撰写的著作《货币理论与经济周期》终于付梓，“这也为他取得了在维也纳大学授课的资格”。莱昂内尔·罗宾斯，这位来自伦敦经济学院的工薪阶层的自由党人当时正试图在知识界寻找一位盟友。他偶然旁听了哈耶克在维也纳大学的试讲，试讲的题目是《节俭的自相矛盾之处》。罗宾斯听罢对哈耶克赞不绝口，他便问哈耶克是否愿意来伦敦。同时，罗宾斯对研究院最新发表的预测报告也表示了浓厚的兴趣。在这份写于 1929 年 2 月的时事通讯上，哈耶克预言，“只有在美国股市的暴涨破灭之后，全球的利息率才有下降的可能”，而且“不出数月，美国股市的繁荣便将告崩溃”。他发出了这样的警告。[34]

第九章

无形的思维方式：凯恩斯和费雪在20世纪20年代

“世界正逐渐认识到它本身拥有的进步空间；政治经济学已不再是一门令人沮丧的科学。”

——欧文·费雪，1908年[1]

“应该有人挺身而出带领我们去控制和减少所谓的‘经济周期’。”

——欧文·费雪，1925年[2]

世界大战的爆发让凯恩斯需要选择固定职业的时间大大推迟了。他曾经一度想去经营一条铁路，但铁路业如今已不再像战前一般光彩夺目。如今，经济的制高点正被金融业占据着。外汇价格的浮动，高昂的战争债务，对贷款的迫切需求，以及令人恼火的战争赔偿问题，这一切都使借贷和保险业务发生了改变。昔日的金融业仿佛是一潭与世隔绝的死水，但如今它已摇身一变成为发展最为迅猛的产业——或者从那些怀疑者的角度来说，现在它就好像是一个规模巨大的赌场。

奥斯瓦尔多·福尔克是位股票经纪人，人们给他起了个“狐狸”的外号。战争期间，凯恩斯把他一同带进了财政部。而福尔克则将被

人们称为“城区”的伦敦华尔街介绍给了凯恩斯。不出一年，凯恩斯便成了一家保险公司的董事会主席。他本人对保险以及投资组合需要多样化一无所知。在他参加的公司第一次董事会上，他曾经大言不惭地宣称，一家人寿保险公司“理应只有一项投资，而且应该每天都换。”[3] 费雪认为，投资风险和投资回报之间存在着如何取舍和权衡的关系，但凯恩斯却没能看到这一点。这同时也说明费雪的观点是非常新颖和独特的。将所有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做法非常冒险。和其他许多似乎显而易见的思想一样，其实没有几个人能真正理解这句话的含义，就像没有几个人能真正弄懂爱因斯坦的万有引力理论一样。

凯恩斯并未将自己的活动仅仅局限于保险公司的运营上。战争期间，全球的金本位制度及相关的固定汇率（相当于一种全世界通行的货币）早已崩溃，而浮动汇率早已取而代之，这便为外汇投机者开辟了一个新的乐园。1919年秋和1920年春，凯恩斯在法郎、英镑和美元的投机上斩获颇丰，这让他有足够的资金购买数幅塞拉[①]、毕加索、马蒂斯[②]、雷诺阿[③]和塞尚等人的绘画。“这件事当然是要冒险的，但福尔斯和我都知道我们的名声好坏全靠它，因此我们也会极其谨慎地行事。”凯恩斯向他父亲作过如此的保证。就像布卢姆茨伯里派的几位朋友成立了信托基金交给凯恩斯打点一样，凯恩斯的父亲也满心欢喜地拿出数千英镑让他来管理。但凯恩斯接下来的想法是“无论输赢，这场高风险高回报的赌博都让我从中得到了莫大的乐趣。”假使父亲知道这些，他脑子里也许会敲响警钟的。[4]

这个时期，凯恩斯的思想框架在不断扩展。1920年春，他偕同凡妮莎·贝尔和邓肯·格兰特在欧洲大陆来了一次走马观花似的旅行。他们专程拜访了美国美术史学家伯纳德·贝伦森。此公对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极其推崇。在贝伦森位于佛罗伦萨的伊塔蒂别墅，凯恩斯和格兰特互换了身份——他们各自假扮成对方。虽然他们自己觉得这很有趣，但接待他们的主人对此却不以为然。在那里他们更多的是外

① Seurat（1859—1891），法国画家。
② Matisse（1869—1954），法国野兽派画家。
③ Renoir（1841—1919），法国画家。

出购物。甚至连凯恩斯这个向来在小钱上斤斤计较的人都一口气买了十七双皮手套。3月份，凯恩斯决定代表他的辛迪加购进大笔美元以期其升值。而与此同时，在维也纳，约瑟夫·熊彼特也正准备大赌一把。当时，英国物价上涨的速度比美国要快，而欧洲大陆则比英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凯恩斯推断，英镑相对于美元势必变得疲软。他的逻辑推理完全正确，但他的时机拿捏得却不是很准。他刚返回伦敦，法郎、马克和里拉对美元的汇率纷纷出乎意料地大幅上涨。待到市场的各项基本态势稳定下来，凯恩斯的全部资金已被一扫而光。他非但未能点石成金，反而将原先的一万四千英镑的纯获利变成了如今的一万三千英镑的净亏损。令人惊讶的是，他的投资人对他的信任并未因此产生动摇。他的父亲和朋友们都坚信，凯恩斯不久便能将他自己和他们的损失都一一挽回。他的股票经纪人也答应，只要他能再拿出七千英镑，便可以替他重开一个交易账户。更令人惊奇的是，事实最终证明，这些高度信赖的举动是极其英明的。因为到1924年底，此时的凯恩斯已经富甲一方。

自从成为一名畅销书作者以来，为了能维持目前已习惯的生活方式，凯恩斯开始转而面向新闻业。他同时为《曼彻斯特卫报》、比弗布鲁克勋爵的《伦敦晚旗报》以及美国的《新共和周刊》供稿。据他的传记作家罗伯特·斯吉多斯基声称，在20世纪20年代期间，凯恩斯为报刊的供稿不但为他赚取了三分之一的收入，同时也为他后来成为《新政治家》这一左翼政治周刊的出版商奠定了基础。而《新政治家》最初是由韦伯夫妇和萧伯纳发起的。彼德·克拉克也是一位凯恩斯传记作家，他曾评论道，“向那些混混噩噩不事思考的人们进行思想上的攻击"似乎终于为凯恩斯提供了一个大展身手的机会。[5]

在1922年一年中，凯恩斯言不离货币和银行这几个字。而在一战以前，似乎只有美国人才会如此痴迷于货币经济学。欧文·费雪是唯一能让剑桥的欧洲学者们以青眼相看的美国经济学者。费雪终于让凯恩斯相信，货币对现实经济所起到的影响绝对比现存经济理论已认识到的要大得多。[6]早在1913年，也就是他与费雪在乔治五世的加冕典礼上首次见面后两年，凯恩斯在对部分伦敦工商业界的人士发表演讲

时就对费雪的观点表示了支持。他指出，是经济繁荣还是经济萧条，其关键就在于“信贷是在产生还是在崩溃”[7]。而战争结束以来混乱的经济秩序似乎已充分证明了费雪的这一观点。

1923年的凯恩斯格外兴奋，因为他终于从长期的写作和思考中提炼出了一整套新的思想。他在《论货币改革》一书中对该思想作出了详细的论述：

> 1914年以来，货币价值的波动及其造成的影响，规模是如此巨大，它几可称得上是现代社会经济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无论是黄金、白银还是纸币，货币标准不但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剧烈变化，而且这种变化竟然还是发生在当今这样的社会：各经济体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密切，而且人们普遍认为价值标准会保持相对稳定。

他试图向人们指出，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发生使投资者和企业家在对商业决定的结果进行计算时遇到困难，这种困难已经超出大众所能忍受的界限，它甚至会误导人们在储蓄和投资之间作出错误的决定。同时，他也痛心疾首地指出了更为普遍的一点，那便是，“我们必须从深陷其中的不信任感中解脱出来，正是这种不信任使我们在深思熟虑作出决定之后却仍然在确定货币价值标准一事上不敢越雷池半步。我们再不能听之任之下去了。”通货膨胀的罪恶在于它随心所欲地对现有财富进行重新分配，使得一部分民众的利益与另一部分人的对立起来，最终它使民主制度遭到严重破坏。而通货紧缩的罪恶则在于因为它摧毁了人们工作和收入的机会，因此它对新财富的创造起了阻碍作用：

> 我们无需去比较这两种罪恶哪个的破坏更大。但我们应该很容易便能达成一个共识，那就是，对于这两种恶果我们都应该尽量避免。在奉行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我们将投资的决定交到一个个储蓄人手中，将生产的决定交到一个个雇主手中；正

> 因为如此，我们才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货币价值标准。如果缺乏这样一个标准，我们的制度便无法行之有效，甚至根本无法生存下去。

凯恩斯再三强调了他的中心思想，那就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有的："这个办法就是通过控制价值的标准，从而使无论什么事情发生，它都会让人们产生价格会因此而变动的预期。而控制价值标准的权威机构则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抵消掉人们的这种预期。如果我们不以货币作为"这个深思熟虑的决定"的出发点，那么'在那些受普通民众欢迎的解决办法之外我们将留下一个危险的真空。'因为那些所谓的办法都只能解决它们各自的问题，比如政府补助、限定物价和房租、打击奸商以及对利润征收高额税收等等。而这些做法久而久之也会变得有害起来。"

凯恩斯最有名的一句话，"从长远来看，我们都逃不过一死。"在《论货币改革》一书中，这句话是如此表述的："长远的观点对眼前的事务是会有误导的。从长远来看，我们都逃不过一死。在暴风雨频发的季节里，如果经济学家们能告诉我们的只有'暴风雨过去之后，大海又将变得风平浪静'，那他们替自己定下的任务也太轻松，太不实用了吧。"[8]后来，熊彼特和其他评论家将凯恩斯这句轻佻之言解释为，虽然在短期内实行货币和财政刺激政策将带来通货膨胀的后果，但凯恩斯对此并不太在意。但从以上他自己的那段话能清楚看出，对那种认为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在没有人为的积极管理的情况下也能自我治愈的观点，他是不遗余力地予以抨击的。他的观点是，在两个都极其诱人但又互不兼容的目标中，每一个国家都必须有所取舍。在此他借用了费雪的思想，他曾称后者为"研究价格稳定与汇率稳定二者关系的先驱"[9]。在一个资本能跨国界自由流动的世界里，所有的国家都必须选择，它们究竟是需要稳定的进出口商品价格呢，还是更需要稳定的国内市场的产品和服务价格。"这二者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关系。他们只能二选其一。"凯恩斯丝毫没有掩饰他自己的偏好。稳定的国内市场价格对避免财富遭到破坏性地重新分配以及避免高失业率的出现

有着无与伦比的重要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将金本位制摧毁殆尽。自1875年起，英国政府便一直确保六英镑能从英格兰银行兑换到金衡制的一盎司黄金。银行的职责就是要确保英镑的发行数量既不能快于也不能慢于维持上述兑换率所需的水平。后来，其他国家也纷纷将其货币与黄金挂钩。它带来的影响便是需要将各种“硬通货”，即以金本位为标准的货币之间的兑换率固定下来。比如说，由于美国政府规定，每三十美元能兑换金衡制的一盎司黄金，因此一英镑便等于五美元。换而言之，如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所言，十九世纪金本位制的运转方式几乎就像是由英格兰银行在统一监管一种世界货币。

战争爆发以后，各参战国为了采购武器和提供军需而相继放弃了金本位的标准。战争结束以后，英国的政治精英们和他们的数任财政大臣梦寐以求的便是能尽早重新回归金本位制。 在对重归战前金本位制的支持上，没有哪个政治家的态度比温斯顿·丘吉尔更为坚决。此时的丘吉尔又刚刚重新加入了保守党，而且被新组成的托利党政府的首相斯坦利·鲍德温任命为财政大臣。

1925年3月17日，凯恩斯与丘吉尔会面并共进了晚餐。他试图说服这位财政大臣，如果依然采用战前的价值对等标准，英镑的价值将会被严重高估。虽然强势的英镑对英国金融业来说是一个福音，但它同时也会使纺织和煤矿等传统出口产业步履维艰，并且将导致严重的失业。在此之前，他和费雪一直在报纸上反复宣传了这一观点。凯恩斯所作的劝说和努力最终功败垂成。正如丘吉尔事后引用他1918年的一句竞选口号所表明的那样，“这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这是一个政治问题。”[10]

数月之后，凯恩斯写了一本名为《丘吉尔先生带来的经济恶果》的小册子。书里描述的严重后果同他、费雪还有丘吉尔的其他反对者们曾经预言过的几乎一模一样。为了应对即将把英镑外汇兑换率提升百分之十的新政策，英格兰银行于1924年12月将其贴现率从百分之四提至百分之五，比纽约的贴现率高出整整一个百分点。此举意在通

过将美国的短期资金吸引到伦敦来从而刺激对英镑的需求。然而，高利率使借贷流通被迫中断，而英镑的强势地位又使得对英国出口的需求大幅下降。英国重工业生产水平急剧下跌，导致英国北部地区的失业率应声高涨。凯恩斯将这一轮经济不景气归咎于丘吉尔拒不采纳他的建议。

现在，凯恩斯该回过头去审视一番了。他已琢磨出最佳的谋生手段，也清楚自己最想将精力花在什么事情上。他开始越来越多地考虑自己想怎样生活。此时他已是三十过半的人了。生活中肯定还少了些什么。在 1921 年、1922 这两年的大多数时间里，他一直认为自己和塞巴斯蒂安·斯巴罗特已属于“婚姻”关系。相貌俊秀的斯巴罗特是剑桥大学的本科生，凯恩斯在那里授课时认识了他。除此之外，凯恩斯尚有别的风流韵事。但所有这些感情纠葛非但没有一个能与十年前与邓肯·格兰特的那段感情相比，而且，它们反而让他不称心如意的感觉变得愈加强烈。这些经历同时也在不断提醒他，这样的感情关系永远无法让他找到一个能与他分享财富，能与他一起过公众人物生活的伴侣。这其中的原因不一而足，但很重要的一条是，同性恋在当时既不合法也不为世人接受。

凯恩斯与自己家人在一起的生活从来都是幸福美满的。他以前“布卢姆茨伯里派”的那帮朋友也几乎都已结婚同居，成家生子。他们多多少少也希望凯恩斯能步他们的后尘。他的最终选择是来自俄国的一位芭蕾女演员。她有着让人情欲顿生的妖娆身段和一种滑稽古怪的幽默感，但在思想理智方面却没有任何明显的亮点。朋友们获悉这个消息后的反应先是大吃了一惊，继而都觉得有些可怕。凯恩斯是在俄罗斯芭蕾舞团的首演上与莉狄娅相遇的，当时后者在演出中扮演一个喜剧角色。他们之间的情史正式开始于 1921 年 5 月。凯恩斯寻了个借口为她在布卢姆茨伯里他的楼上一层找了个居所。而她住的这间公寓的主人是凡妮莎·贝尔。 而贝尔此时尚未起疑心。四年后的 1925 年 8 月 3 日，他们在伦敦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当时有大群观众在举行仪式的屋外聚集等候。举行婚礼之前，凯恩斯在伦敦西南的萨里郡购置了

一处名为“提尔顿”的乡村别墅。他常穿着花呢粗纺的大衣在别墅四周漫步，他也会像个乡绅一样停下脚步，仔细察看猪和麦子的长势。

他们的蜜月是在俄国圣彼得堡，即现在的列宁格勒度过的。起初，他们以客人的身份住在岳父母的家中，而后来他们却成了莫斯科苏维埃政府的座上宾。他和剑桥的其他几位教师一起代表剑桥大学参加了俄国国家科学院二百周年纪念。凯恩斯的贵宾活动日程安排包括参观经济计划部和国家银行，观看俄语版的《哈姆雷特》，观看芭蕾舞表演，以及出席不计其数的宴会。他在写给弗吉尼亚·伍尔芙的信中说，他的俄国主人们还授予他一枚带钻石的奖章，“这让他有些无地自容”。从俄国回来以后，凯恩斯和莉狄娅一同前往沃尔芙在萨里郡的家中拜访。伍尔芙发现凯恩斯原来乡绅派头的花呢粗纺大衣已经换成了托尔斯泰式的刺绣衬衣和俄国羔皮帽。这次见面以后，为了让他们其他的朋友方便了解，伍尔芙将凯恩斯对俄国的印象作了一番总结：

> 间谍无孔不入。没有言论自由。对金钱的贪婪和欲望已被彻底根除。人们衣食住行的条件都很平等……芭蕾舞很受尊敬。当世最棒的塞尚和马提斯的展览。身穿制服头戴帽子的共产党员在没完没了的列队游行，香槟的供应颇为充足但价格昂贵，烹调水平在欧洲首屈一指，宴会通常于夜里八点半开始，一直会持续到凌晨两点半……还有就是以前沙俄帝国时期留下的极尽奢华之能事的专列；晚宴用的盘子和餐具是以前沙皇使用过的。

与往常一样，凯恩斯显示出了他如新闻记者一般对细节，对不当甚至是矛盾之处的高度敏感；而且，凭借其杰出的分析才能，他能将事物的现象与实质截然区分开来。其他贵宾离开莫斯科的时候都对苏维埃工人在衣食住行方面受到的良好照顾留下了深刻印象。很显然，这些工人从来不会像西方国家的那些工人同行一样有失业之忧。但凯恩斯后来却对《新共和周刊》的读者们解释道，苏维埃的这种经济“奇迹”跟波特金的度假村一样不过是徒有其表。普通城镇工人的生活

水平与战前相比确实有了提高，而他们“享受的这种生活比他们的生产所能支持的合理水平要高得多。”凯恩斯向大家宣称。在苏维埃俄国，每七个公民当中就有六个是小户农民，这部分人所遭受的剥削甚至比沙皇时期还要残酷：

> 共产党政府正是通过对农民的剥削才有可能悉心照料和纵容迁就它的宠儿——无产阶级工人……虽然土地税是国家预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政府对农民堂而皇之的剥削主要还不是以赋税的方式，而是以价格政策的方式进行的。

很简单，莫斯科只需强制农民用远低于国际市场的价格将他们的农作物贱卖给政府，他们便能够轻松支付给城市工人相当于农民两到三倍的收入。这样做的后果不仅导致了绝大多数俄国人的生活水平下降，而且它还使经济遭到破坏。作为“一个国家最实在的财富”的农作物的产量已经开始下降，农业收入逐渐枯竭，大规模农村人口的外迁已经在蠢蠢欲动，而且势必无法抑制。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街头已经充斥着无家可归的非法滞留者。这两座城市的失业率实际已高达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而并非官方所宣称的零失业。“俄国农民的实际收入实际上只相当于他们过去收入的一半多一点，而俄国国营企业的工人们遭遇的则是前所未有的人员拥挤和失业。”凯恩斯如此总结道。[11]

他也曾向他的苏维埃东道主建议，希望他们能改变这种破坏性的政策。但他同时也承认，即使“它的效率和生活水准都极其低下”，但苏维埃经济“要想存在下去并不困难。”季诺维夫①，这位斯大林政权的二号人物预言，“十年以后，苏联人的生活将超越战前的水准，而所有其他国家则将变得比战前还不如。”[12]凯恩斯听罢未表示异议，究其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对西方社会满怀忧虑。也许是因为在圣彼得堡的他岳父母一家受到了政治迫害，更可能的是因为那个社会的低效、丑陋和愚蠢比政治的残酷更让他觉得震惊，他对那种认为俄国的苏维埃模

① Grigory Zinoviev（1883—1936），前苏联共党领袖。

式能拯救西方于水火之中的观点给予了断然驳斥：

> 把泥巴看得比鱼还重，把粗野的下层人的地位提升到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之上。我怎么能附和这样一种信仰呢？无论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有什么样的过错，他们都将是生活质量的保证，都必然承担着推动人类进步发展的重任。即使我们真的需要一种信仰，我们又怎能上肮脏得如同垃圾一般的赤色书店里去寻找呢？

此时他又流露出了布卢姆茨伯里式的偏见。他将苏俄的“泥巴”和垃圾“归咎于俄国和犹太文化中留存的兽性，因为这两种文化如今已结合在了一起。”[13]《新共和周刊》的编辑从美国读者的角度考虑，曾经请他将这句可能冒犯人的话删掉，但却遭到了他的拒绝。

1925年底到1926年初的这段时间里，凯恩斯的注意力被一件与货币不相干的事情分散了。在煤业巨头和矿工之间爆发了一场恶斗，由此并可能爆发全国性的大型罢工。和全国所有的人一样，他也深深地被吸引住了。原本因为供应过量、技术陈旧、高成本和管理落后等原因已经处于衰退中的英国煤矿业成了强势英镑的第一个受害者。煤矿老板和工会在削减工资一事上迟迟谈不拢。于是，保守党政府试图用政府向矿工们提供补助的方式来为双方争取一些时间。然而，在政府提供补助的时限即将到期时，双方仍然各不相让，一场罢工迫在眉睫。保守党人认为罢工将是引起革命总爆发的第一步，但凯恩斯自由党的朋友们却不那么认为。但他们仍然一致支持政府的立场，他们坚信，罢工的举动不但非法违宪，而且是对民主制度的攻击。凯恩斯本人对矿工持同情态度，虽然丘吉尔的错误决定根本怪不到他的头上，但他还是选择了介入，并提出了一个双方互作妥协的建议：作为对工会同意削减工资的回报，煤矿老板们将关闭他们最不景气的矿井，而政府仍将继续向矿工们提供工资补助。这样，所有各方都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但这不过是他的一厢情愿。1926年5月，为期十天的总罢工震动了全国。罢工接下来一直坚持了六个月，直到最后矿工们为饥饿所迫

不得不回到了矿井。而他们回归的条件与六个月前被他们严词拒绝的条件没有一个字的改变。与此同时，自由党却分裂成了两个派系。而结果，凯恩斯最终与他以前的对手劳合·乔治归属到了同一阵营之中。后者对政府对罢工采取的强硬措施和党内的一些老朋友都提出了尖锐批评。凯恩斯的其他新朋友还有比特丽斯·韦伯。他此前曾数次与她一起共进午餐。韦伯认为，凯恩斯的这段新的婚姻是他选择与矿工们站在一边的主要原因：

> 应该说，迄今为止，我尚未觉得他有什么吸引人之处。他才华横溢，目空一切，即使他有心于在社会学方面有所建树，他也缺乏足够的耐心……但我觉得，与那位迷人的芭蕾舞演员的美满婚姻唤醒了他心中对穷困和苦难的同情。[14]

韦伯还一针见血地指出，无论是对富裕的银行家、工会组织、无产阶级文化，还是对浮夸的爱国主义，凯恩斯对拉帮结伙都极其反感，这也使他天生不适合从政。但她觉得，当一名内阁大臣他也许还是颇具价值的。

9月，凯恩斯前往柏林就英国罢工事件作一个非正式的情况汇报，同时他还要举行一个题为“论自由放任政策的终结”的正式讲座。在柏林大学，一大群兴奋的观众给了他热情的欢迎，这种待遇是其他英国人难以企及的。他对凡尔赛和约的抨击，对法国人占领鲁尔区的谴责，以及他对削减战争赔款和给予战败方外国贷款的支持都使他成为了德国人心目中的英雄。最重要的，也是最新的一个原因则是道威斯计划。该计划大幅度削减了德国的战争赔偿数额，并且为外国投资，主要是美国资本源源不断地涌入德国大开了方便之门。现在的魏玛共和国由于有了资本的滋润，正吸引着大量的外国移民和旅游者，它开始逐渐步入一个黄金时期。德国巴比伦般奢华淫靡的氛围几乎让凯恩斯头晕目眩。

他又见到了老友卡尔·梅勒西奥。梅勒西奥在别后的这段时间里又结了一次婚，他还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会过一面，这也是他们之

间仅有的一面。凯恩斯对此的反应则略带些布卢姆茨伯里式的对金钱的厌恶，甚至还带着些惟恐外来文化危及德国文化的偏执。“爱因斯坦是犹太人……我亲爱的梅勒西奥也是个犹太人。”他评论道。

> “但如果我也住在那里，我觉得我也会变成一个反犹太主义者。因为可怜的普鲁士人与另外那些犹太人相比太过迟钝，太过笨重。那些头上长着小角，手中举着干草叉，还长着一根油光滑亮尾巴的犹太人，他们不是恶魔却干着恶魔的勾当……犹太人操纵着所有的金钱、权利和意识形态。眼看着一个国家的文明被这些污秽的犹太人玩弄于股掌之间，这真是令人无法容忍。如果让我选的话，我宁愿选择那些臃肿肥胖的家庭主妇和手指粗壮的德国候鸟[①]。”[15]

他之所以一反他通常对那些聪明恶魔的喜爱，却令人吃惊地对迟钝、粗糙和笨重的大众表示短暂的认同，这并非出于同情，而更多的是为了迎合和取悦于他们。他的这一举动也证明了他对暴民怀有的恐惧感。在他《论自由放任政策的终结》的正式发言中，他也曾以不太具争议性的语言表述过同样的意思。民主国家的政府如果愚蠢到对社会大众的经济状况听之任之，任其自生自灭的话，那它们将有可能遭遇暴力的威胁。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剩下的那段时间里，凯恩斯一直继续在剑桥讲学。一位本科生曾经回忆说，“他看上去更像是一位股票经纪人，而不是大学教师，他是一个城市人，只不过爱去乡下度长周末而已。”[16]尽管如此，他的风采和名声依然为他的讲座吸引来了大批听众。每周一的晚上，在他国王学院的房间里总会举行有邀请才能参加的政治经济学俱乐部的活动，该活动也吸引了大批有天赋的学生和在事业上追

---

① Wandering Birds，十九世纪末，德国青年开始兴起候鸟运动，强调在自然中历练生活能力，追寻生活真理。

求进取的教师参加。

“让我们都发动起来，利用我们闲置的资源来创造财富。”1928年3月27日，凯恩斯在自由党的一次政治集会上发言时曾这么说，“等到每个人每个工厂都忙碌起来了，再说我们没有时间干别的了也不迟。”[17]在煤矿工人罢工期间，凯恩斯曾经一度以为，将调控经济周期的理论和解决英国失业问题的方案这二者结合在一起，也许能在右派和左派分别提倡的提高进口关税和提高国内税收的两种政策之外提供另外一个政策选项。他的新政治盟友劳合·乔治正极力企图在政治上东山再起，因此也在苦苦寻找一种能让人耳目一新的施政哲学。凯恩斯一度考虑过作为剑桥大学的自由党代表参加竞选，但旋即因为不胜其苦而予以放弃。他转而成为了劳合·乔治1929年春竞选活动的政策总设计师。换而言之，他《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的理论其实是在政治活动的培养皿中萌芽并且成长起来的。

凯恩斯认为，不稳定，而不是不平等，才是对资本主义制度最大的威胁。在他看来，穷富之间的差别并非最大的不平等，那些与勤劳、节俭和新思想毫无瓜葛但又总是蓦然降临的不意之财或巨额亏损才是。“在十九世纪，社会稳定和社会公正所遭受的最大侵扰正是由价格水平的波动造成的。”他的这段话无疑附和了费雪的观点。“因此，第一步，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要建立一个全新的货币体系。”[18]但和韦伯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拒绝将阶级斗争当作一种政治策略。凯恩斯作为社会精英的优越感根深蒂固。“工人阶级已经换上了这样一副面孔，似乎他们与所有比普通人更成功，更能干，更勤劳和更节俭的人都势不两立，”他说，“这是一个阶级政党，而那一阶级并非我所属的阶级……通常，只要是我觉得公平和善意的事情都能对我有所影响。但在对待阶级斗争的立场上，我绝对是站在拥有良好教育的资产阶级这一边的。”[19]

早在1919年曾被凯恩斯斥为“恶魔化身”的劳合·乔治因为以政治利益换取竞选捐款，以及绯闻和其他违背政治伦理的行为被迫于1922年离职。但这位“威尔士奇才”依然将自由党和凯恩斯牢牢地攥

在手中。他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大多数时间里都闲赋在家，他将自己的府邸“彻特”改造成了一个经济智囊团。他为此投入了大量的心血，时间和被他掌握的党务经费。他期望能为自由党催生一个新的计划。而现在，他又准备凭借一项解决失业问题的计划卷土重来。而凯恩斯则是他这一战役幕后的首席经济智囊。

自1919年以来，英国的失业人口数额从未低于一百万，而且每年仍在上升，并且最终于1929年达到了百分之十的高峰。直到那个时候，英国都尚未从一战的影响中完全恢复过来。随着国际贸易的日益扩大，英国的出口额却在日益萎缩。1913年，英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而时至1929年，它便已经掉到了美国的后面，只能排在第二。[20]在消费者急需石油、化工产品、汽车、电影和其他新型工业产品的今天，这个昔日的世界工厂拥有的大部分仍都是煤矿、钢铁、纺织，以及造船等烟囱产业。更进一步而言，从全国的平均水平看，在英国南方富裕地区和经济长期不景气的北方工业区之间横亘着一道深深的鸿沟。这让产生于上世纪饥饿的四十年代的一种说法又死灰复燃：英国是由相互隔绝的一穷一富的两个国家组成的。

1927年9月25日，劳合·乔治邀请十四位大学教授前往他的“彻特”府邸，其目的是让众人能汇聚一堂，为新激进主义运动打下一个理论基础。[21]而凯恩斯也在被邀之列。凯恩斯还与劳合·乔治合作撰写了一份题为《英国工业的未来》的调查报告。为了完成该报告，劳合·乔治个人提供了一万英镑的赞助。1928年2月初，该报告刚一面世，便因为它的黄色封面而得了一个“黄皮书”的绰号。虽然在给H.G.威尔斯的信中凯恩斯曾表示，他希望今后再也不会如此大规模地与人合作写书，但同时他也认为，该书在政治和工业领域提出的一系列明智有效的建议毕竟也煞费了一番苦心。[22]

撰写这份报告让凯恩斯第一次有机会对产业型公司有了一些了解。而此前他接触到的都是金融领域内的企业。他给自由党竞选人的忠告是，企业大型化的趋势不仅有技术和资金方面的原因，而大量未能销售掉的库存积压也是该趋势的成因之一。大型企业是在发展中自然形

成的，因此人们也只能坦然接受它的存在。虽然这些公司不同于熊彼特为之摇旗呐喊的那类巨型跨国公司，但有一点很清楚，它们绝对是非社会主义性质的。

自由党在1929年的竞选中打出了“我们能够战胜失业”的口号。而3月1日，劳合·乔治则在众人的惊愕声中作出了在一年之内将失业率降至“正常”水平的保证。[23]他计划的中心环节是以巨额财政赤字为手段，为公共项目提供所需的资金，从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而经济的增长必将使国家的税收增加，这些收入和资金又可以用于兴建道路、排水系统、电话线、供电系统和新的住房。而工人的工资则可以由失业保险来支付。不出三个星期，凯恩斯参与策划的另一个竞选口号又宣告出台，“自由党的保证有可能兑现吗？”现政府的财政部也作出了回击，他们声称，公共项目所创造的政府就业机会只不过是取代了原本属于私人企业的工作机会。对此凯恩斯以他的第二个口号作出了回应，“劳合·乔治能行吗？”

> 众多目前靠领取救济的失业民众将重新领取工资，这就意味着实际购买能力会有所提高，从而对商业起到刺激作用。更重要的是，商业逐渐活跃又会带动越来越多的商业活动。因为促进经济繁荣的诸多因素，和导致经济萧条的因素一样，都是通过累积效应起作用的。[24]

斯基德尔斯基认为，凯恩斯的乘数效应理论应该就是在这个时期萌芽的。两年以后，凯恩斯的弟子之一，相貌俊秀的理查德·卡汉正式提出了该理论。他认为，政府的公共支出每增加一元，便将在私营领域内带动产生比一元还多的消费活动。原因是那些政府支出的受益必然促使他们增加消费，这样便将带来工作机会和收入的增加，从而带动另一轮也许规模会稍逊于前一轮的消费热潮，并且，这个过程将一直这样持续下去。

5月30日的大选前夕，凯恩斯信心百倍。他与人打赌，认为自由党将至少赢得一百个议席。但最终他们只赢了五十九席。这无异于宣

告了劳合·乔治政治生涯的终结。而凯恩斯也因此输掉了一百六十英镑的赌注。但由于他从与温斯顿·丘吉尔的打赌中赢了十英镑，这才让他总算扳回了一点老本。这次竞选使他不得不将《货币论》中的大量章节推翻重写。1929年之夏仿佛田园牧歌般美丽，在撰写书稿的同时，凯恩斯还为英国最早的几部有声电影之一的《深红色的玫瑰》拍摄了一段长达五分钟的芭蕾舞场面。他还同政府公共工程项目的负责人奥斯瓦尔德·莫斯理进行了会面。莫斯理是当时工党的一名政治新秀，但此公后来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却成为了一名法西斯主义者。夏天里唯一一件令人烦恼之事便是凯恩斯在商品交易市场上的投机不尽如人意。在1928年一年中，他一直在看好橡胶、玉米、棉花和锡等商品的长期走势，但市场突变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为了减少损失，他不得不将他股票组合中的一部分甩卖掉。

1916年，欧文·费雪购买了他平生第一辆以汽油驱动的汽车。此前，他最后那辆也是最高级的一辆电动汽车，道奇豪华型全封闭厢式汽车，每晚都必须开到车库中重新充电，而且其行驶速度不能高于每小时二十五英里。以往，费雪每年都要乘火车旅行达数千英里的路程，而现在他总算可以开着这辆崭新的道奇油老虎上路了。当时，纽约和波士顿之间的高速公路大部分还尚未铺好，路面凹凸不平不说，有的地方甚至还有一个个能让车轮陷进去的坑洞。尽管如此，这辆新车还是为费雪“打开了一片无可限量的新天地。”[25] 在整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期间，随着美国的财富聚集得越来越多，费雪的个人财富也水涨船高。他差不多每隔两年就要换一辆新车，而且每辆车的档次都会比前一辆更高。到了二十年代末，除了一辆林肯，他还有一辆凯迪拉克 La Salle 敞篷车和一辆崭新的 Stearns-Knight，后者在当时相当于美国的劳斯莱斯。而且，和大富翁杰伊·盖茨比一样，费雪还雇了一位专职司机。

时至1929年，美国每五户家庭中就有一户拥有汽车。正如费雪在1914年预言的那样，第一次世界大战让美国成为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也是最强劲有力的经济体。而英法两国的情形却大相径庭：

>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各国经济带来的影响并非千篇一律全都是损失。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它也带来了经济和社会的某些进步。更重要的是，它向参战各国证明，战略和经济政策的制定是政府应该担负的职责，而这些政策从一定程度上将决定战争给一个国家带来的是经济利益还是经济损失。这些国家并非只能画地为牢，坐以待毙。[26]

受益于战时生产和对英国和欧洲的大量出口，美国 1918 年的年产量超越了英国。[27] 美国经济既未像德国和奥地理的一样陷入崩溃，也未像英国一样受到政府货币政策的掣肘。美国的战后经济恢复早在 1921 年便已开始，并且毫无停止喘息之势。这十年当中曾经发生过两次经济衰退，虽然每次都为期一年多，但因为它们的规模都极其轻微以至于绝大多数美国人甚至都没有察觉到它们的存在。在 1921 年到 1929 年整个这段时间内，美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为百分之四，而美国同期的平均失业率尚不足百分之五。1929 年，美国的经济总规模与 1921 年相比增长了百分之四十，而人均收入也上升了百分之二十。这种惊人的表现不仅是空前的，而且在现在看来也几乎将会是绝后的。[28]

纵然是这些惊人的比率和数字也无法完全描述新的能源模式所带来的巨大变化。他们开创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汽车、位于市郊的居屋、加利福尼亚、石油、电力照明、收音机和电影、职业妇女、小型化的家庭、工会会员的减少、购物中心，以这一切为特征的现代社会已经正式粉墨登场。年满六十的人们已经开始考虑退休问题，而这个概念在以往还不曾有过。铁路公司只需按照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①]的管理原则从事其经营，那么在它为工人增加工资的同时，火车的票价就并不一定需要上涨。大法官路易斯·布兰迪斯[②]成功作出了这番论断之后，“科学管理”或是“泰勒主义”便成为了企业管理中最热门的字眼。RCA 和 AT&T 就仿佛是那个时代的微软和谷歌。而与此同时，农场、煤矿、毛纺、制鞋等众多在十九世纪曾为美国创造过大

① Frederick Winslow Taylor（1856—1915），现代管理学的鼻祖。

② Louis Brandeis（1856—1941），美国法学家，1916 年至 1939 年间任大法官。

量财富的旧经济形式早已成了明日黄花。

在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生活的年代，因为蒸汽船、铁路和电报的出现，人们流动和交流的局限性有了爆炸性的突破。而在费雪的年代，汽车和电话的出现也起到了相同的作用，不过这回它们是以个人旅行和远距离通讯的方式进行的。有了汽车便可自由安排出行的时间，费雪为此欣喜过望。这和比特丽斯·韦伯得到她第一辆自行车时的感觉一样，因为从此她可以不用司机便一个人骑出去好几英里。而大批量的生产使汽车、收音机、电扇、电话、冰箱和预制住宅在消费者中得到普及成为可能，而这回过头来，又使住在市郊的生活方式更为诱人，也更容易普及。消费者对这些新式工具的使用日益精通，他们只需要拨拨号码，开启开关和坐在方向盘的后面便足矣。

对汽车驾驶韦伯一直退避三舍，而杰弗瑞·凯恩斯也曾说过，他哥哥患有发动机恐惧症，对所有形式的发动机他都嘲讽有加。[29]“美国人酷爱像汽车这样能够节省时间的工具。而费雪便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1922年3月，费雪的演讲第一次被收音机转播，在那之后，他一口气买了两台无线型收音机。他在给儿子的信中说，“这一次演讲的听众人数也许是我有生以来最多的一次。”他向那群“看不见也听不见但他相信确实存在的观众”宣布，最新开通的跨大西洋的广播节目将会使人们产生“天涯若比邻”的感觉。[30]1927年，二十五岁的美国航空邮件飞行员林白驾驶一架单引擎的单翼飞机从纽约长岛起飞，中途不作停顿一直飞到了巴黎。在那之后不久，当时身在巴黎的费雪借助于最新推出的跨大西洋电话服务成功地与他在罗得岛的妻子，在新泽西的母亲以及在俄亥俄的女婿举行了一次长达九分钟的电话会议。费雪的儿子后来回忆说，当时“费雪的眼睛紧紧盯着手表上代表分钟的那根指针”[31]。其实那时候，费雪工作上的绝大多数通讯往来都是用电话进行的，他的写作也都是借助于口授录音机的帮助。而当他实在太过繁忙，他干脆就直接口授给一名打字员，再由她将内容在打印机上打出来。他的家庭办公室已经将他位于纽黑文的住宅的第三层完全占据，装得满满的文件柜和打字用的桌子甚至都被挤得摆在楼道的走廊里或是楼梯上。他手下的雇员包括八名“各式各样的女性”，她们使用

的电话话筒上都装上了玻璃罩子，在他们此起彼伏的打字声中还夹杂着臭氧机运转的嗡嗡声。他装臭氧机的目的是为了让办公室内的空气能使人更加精力充沛。

费雪的大多数时间和精力不是在为国际联盟而奔忙，便是在为限制移民、保护环境，以及包括普及医疗保险在内的公众健康改革等事务操劳。工作之余，他也没闲下来。他们家房子的最上面一层几乎全被辟为家庭健身房。费雪的车库“则是他精心保养他私人车辆的场所”。除了坚持食用健康食品和维他命之外，他也是一个运动器械的大买家。他的健身房里堆了一地锻炼肌肉的印度瓶状棒、哑铃、举重器材、一台划船健身器、一个电柜和一盏紫外线医用太阳灯。除此之外，还有一张能自发振动的椅子，他的孩子们都觉得它看上去像是处决犯人用的电椅，但其实这是一台能有节奏进行全身按摩的机器装置。[32]1929 年，费雪已为自己雇用了一名私人医生和健身教练。

费雪曾再三指出，历史常常成为人类发挥其潜能的桎梏。1926 年，他在一场公共健康的相关集会上发言时说[33]，人类还远未接近其寿命的最高极限，这比他们在发掘其消费潜力上的进展也强不了多少。他认为人类寿命的真实上限应该是一百岁。他曾经指出，到 1931 年，英国儿童的平均寿命水平将比 1871 年时增加二十年。[34] 同等重要的是，十个人中将会有七人能够健康地享受生活和从事工作。可与他预言的恰恰相反，到一战结束之际，在英国，每九个人中便有六个或“身体虚弱”，或“健康受损”，甚至还有一些因为身体残废而对生活的希望变得极其渺茫[35]。而他却又一次预言，到 2000 年，人类平均寿命将从五十八岁升高到八十二岁。这一次他说得倒是非常准确。[36]

费雪对人类的进步，对科学不可限量的潜力以及对自由经济的坚定信念是无比虔诚的，而这也是同二十世纪初世界经济的繁荣亦步亦趋的：

> 这个世界正逐渐认识到，其实它仍拥有巨大的提升空间。政治经济学不再是一门“令人沮丧的科学”，它不再大肆宣扬马尔萨斯所谓的人口增长必将导致工资下降到难以糊口的水平的论调。

它正严肃地看待铲除贫困的问题，并对前景满怀希望。与此相对应的是，生物学中最新兴的学科——卫生学也已经对以往陈旧的思想进行了有力的鞭笞，那些思想认为“死生有命”，“人类必须按照目前的速度年复一年无法避免地牺牲同样数量的人口。”与这些充满宿命的思想不同的是，如今我们已经从巴斯德[①]那里得到了保证，“人类完全可以凭自己的能力根除所有与寄生虫相关的疾病。”[37]

费雪成为了美国优生学协会的创始人和首任主席。优生学——即将遗传学应用于对婚姻、健康和移民方面的研究——并非仅仅为费边主义所提倡。当然，对人类进行有选择性的繁殖当然在绝大多数社会中都曾经以各种不同方式进行过。从斯巴达的溺婴习俗到英国贵族神秘的社交仪式无一例外都在此类。在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医药与科学的发展进步和改革的精神使优生学应运而生并日益受到人们的欢迎。查尔斯·达尔文的表弟弗朗西斯·高尔顿是理查德·波特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他被人们视为优生学之父。查尔斯·达尔文的儿子，列奥纳多·达尔文少校，于1911年成立了国际优生学协会。比特丽斯和西德尼·韦伯，以及事实上包括萧伯纳和H.G.威尔斯在内的绝大多数费边社主要成员，都是优生学的狂热支持者。凯恩斯也曾担任过英国优生学协会的副主席和理事，兼剑桥分会的财务主管。他认为优生学“是最重要的，意义最重大的，我还要加一条，名副其实的，社会学的一个分支。”[38]优生学得到了两个党派的共同支持。于1902年至1905年期间担任首相的保守党人亚瑟·贝尔福、温斯顿·丘吉尔、二战以后英国福利国家制度的设计师贝弗里奇勋爵、作家列奥纳多·伍尔芙和弗吉尼亚·伍尔芙、女权主义者维多利亚·伍德胡尔和玛格丽特·桑格等人都是优生学的热切支持者。

公平地说，由于与纳粹的种族屠杀和美国的种族隔离政策先后扯上过关系，优生学曾经声名狼藉；当优生学从1910年和1920年那一

① Louis Pasteur（1822—1895），法国化学家，疾病细菌学说的创立者和微生物学、病毒学、免疫学的奠基人。

时期发展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时，它的象征意义早已面目全非。1912年在伦敦召开的第一次国际代表大会“总的精神”是保守的。[39] 费雪也曾出席此次大会。他和凯恩斯都属于放任自由主义者，尤其费雪是一直“致力于消灭种族歧视和其他类似三K党那样的反社会的歧视性行径。”[40] 然而，费雪和美国优生学协会却是1924年移民法背后的主要推动者。该法案的目的不仅仅是如费雪所说的“要限制像二战期间从欧洲国家被公开排挤来美国的那些极其缺乏适应能力的移民”[41]，而且还要大幅削减从南欧和东欧来的移民。

费雪一直在对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进行研究，包括它们对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影响，它们带来的随意性的财富重新分配以及政府在受灾者的迫使下所采取的“有害疗法”。[42] 这些所谓的疗法仿佛是一副副“原始简陋的药物，它非但无益，而且还会造成新的危害。”此时，他尚未能将价格的巨幅摇摆与经济的繁荣和萧条联系起来，更未将价格变化视为导致经济繁荣和萧条的主要因素。确实，在他1911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的索引中并未出现经济繁荣、经济萧条和失业等内容。

但后来，费雪的注意力逐渐转移到了经济的高涨与衰退以及货币在经济稳定和经济动荡中所扮演的角色上来。他怀疑，货币和信贷供给的波动不仅引发了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它同时也是导致经济和失业率出现波动的罪魁祸首。他越来越坚信，更加出色的货币管理政策将“缩短经济波动的周期”。[43]

1921年到1922年间发生的短暂而严重的经济衰退使得费雪格外留意政府在解决失业问题上究竟能有何作为。早在1895年，美国联邦政府既没有能力也没有责任对经济活动的整体水平进行管理。与美国经济的规模相比，政府实在太小。税收是为政府活动，主要是与军事相关的活动，提供资金的方式之一，关税则能够为某些特定的产业提供帮助。而发行货币的责任则完全交给了银行。在十九世纪金本位制度下，发行货币的速度应该严格与世界市场上黄金供应的增长速度同步。

然而，现在美国有了一个中央银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成

立于1913年的它得到了更多的授权，使它能通过鼓励或抑制货币发行和借贷的方式对经济活动的水平施加影响。经济恶化的严重程度使得费雪认为，为了治愈一战带来的通货膨胀，美联储被迫采取了限制货币发行的措施，但它将“闸”踩得过猛，而且时间也过长了些。广大农民（他们让人不禁回想起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和工厂工人所遭受的贫困让他更加坚信，价格的不稳定所带来的最大罪恶集中体现在它对生产和就业的影响上。因此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期间，从货币发行一直到工作机会的创造等一连串的因果关系也便成了费雪研究的重中之重。

在其学术文章的发表数量一直保持稳定的同时，费雪越来越多的将时间用于向各报刊投稿。和凯恩斯和韦伯一样，他明白，向政府决策者兜售自己观点的最佳方式是以圈外人的身份间接行事。因此，他用连篇累牍的文章试图让广大读者相信，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两种现象都有一个与货币相关的共同起因。但他承认，如果因此便将“金融体制”同“与人们生活休戚相关的失业原因”联系起来，这也很难服众。诚然，众多的评论家都已认识到，在战后英美两国爆发的严重经济萧条中，平均价格的普遍下降和失业率普遍上升二者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联系。同样，伴随着通货膨胀的则是生产和工作机会的增加。然而，在经济周期，即生产和就业呈高涨和衰退交替出现之式的理论中，价格水平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却鲜有提及。而其他研究人员也无法在价格和就业之间找到任何相关的联系。

费雪指出，其他经济预测家们都忽略了价格和就业之间的实际关联。他们将价格水平和价格水平的变化混为一谈，他们犯的这个错误与把水流进澡盆的速度和澡盆里水的深度混为一谈如出一辙。费雪还说，其他研究人员“没有认识到高价格与价格上涨二者之间的显著差异，而同样的差异也存在于低价格与价格下跌之间。简单地说，他们一直在悉心研究的是价格水平，而非价格水平变化的快慢。”[44]其原因之一便是人们对经济中价格水平的变化尚缺乏一个适宜的衡量标准。而费雪则将他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里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研究如何准确地对价格进行评估，并将其研究成果公之于众。

费雪坚信，一旦人们能找到经济周期的起因，经济预测家们便

能“像预测天气一样，以真正科学的方式对经济状况作出预测。”他在1926年曾写道，“比如，货币理论就应该能对我们的价格分析和预测提供巨大的帮助。”他的设想是，一旦中央银行能对价格水平作出准确预测，它便能预先采取措施以阻止物价波动的出现，从而完全消除经济出现又一轮高涨或萧条的可能，或者至少使其规模不至于太过突兀。对费雪而言，采取何种手段将决定是否能达到目的。他还提出，面对“经济繁荣与萧条的交替出现，我们应该学会去控制和减轻所谓的经济周期”，而不是“沾染上听天由命的陋习。”[45]

总之，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费雪已成功地将经济周期列为有待解决的经济顽疾之一。但这些所谓的顽疾远非一成不变。事实上它们很快便在现代治疗手段面前俯首称臣：“那些认为经济周期不可避免而且无法预测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正好相反，它的各种成因大体上都已为人们所熟知。如今，我们大致已经了解怎样才能防止经济交替出现过热或者过冷的情形。”[46]他的信心之所以如此高涨与美联储“强制性稳定美元”所取得的成功是紧密相关的。比如，中央银行对阶段性投机活动就曾采取过防止措施。“我们完全有能力将美元、英镑、里拉、马克、克朗和许多其他国家的货币的购买力稳定下来，并以此作为预防失业的有效武器。”[47]和凯恩斯一样，他坚持认为，保持货币的稳定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他写道：“如果我们想让我们规模巨大的金融体系免受阶段性崩溃的侵扰，那么我们就不该将银行业仅仅视为私营产业，而应把它当做一个大型的公共服务行业。”[48]

在1925年为战溪疗养院的健康简报所写的一篇文章中，费雪对“为什么我宁愿作一名战溪疗养院的员工也不愿当一个百万富翁”给出了解释。[49]生活中虽然有许多东西比金钱更让他看重，但在暗地里他一直希望在经济实力上能达到与他妻子旗鼓相当的水平。他用以争取商业成功的第一个发明，其灵感完全源于他的急躁性格。工作中他需要逐张翻阅成盒的狗耳朵形状的资料卡片，这常常使他不胜其烦，沮丧不已。于是他特意制作了一个灵巧的装置，它能将卡片依次摆好，并能让使用者一目了然。费雪试图向十几家办公用品厂商推销自己的

这个装置。他宣称，现代企业面临日益繁重的资料保存需要，而这个发明恰好能够提供一个完美的解决办法。这种能帮助企业高效管理和储存资料的产品在市场上一旦出现，各公司必将趋之若鹜，争相抢购。

最初，Rolodex卡片系统与其他发明的命运大同小异。发明者被迫自己出资，或靠妻子玛格丽特的资助，才能将自己的发明投入生产。费雪在纽黑文成立了一家规模极小的工厂，厂里的职工包括他弟弟、一名木匠和一位帮手。公司的全部资本是玛格丽特给的一笔三万五千美元的贷款。而到一战结束后仅仅一年，显露式索引卡片公司的生产规模已发展到需要一座三层楼的厂房，同时，它还在位于曼哈顿市中心拿梭街的《纽约时报》大楼里开设了一个销售处。费雪的头一个大客户是纽约电话公司。这笔生意使费雪的公司于1925年首次实现盈利。紧接着，费雪一鼓作气与最大的一家竞争对手实现了企业合并，并以此奠定了雷明顿兰德公司的核心框架。至此，他在草创公司的过程中已总共投入了十四万八千美元。于是，他通过出售显露式索引卡片公司的股票换回了价值六十六万美元的现金、若干优先股、债券、股票期权和股息，并且成为了合并后新成立的Rand-Kardex公司的董事之一。事后，他曾经向他的儿子坦承，“自从结婚以来，他一直有个秘而不宣的愿望，那就是希望在经济上能够自立……而从事发明为他提供了一个无需牺牲大量时间便能致富的途径。”[50]费雪在知天命的那一年里终于实现了他的梦想，他成了一位百万富翁，他的财富甚至远超百万之数。

与此同时，经济预测也呈现出了腾飞之势。费雪开始为众多报纸杂志撰写有关经济预测的联合专栏。他每周还要出版一份货币购买力指数的报告，这份报告后来为美国政府所采纳，并成为其衡量价格的若干指数之一。不久，他又成立了指数研究所，并开始从该研究会的总部，即他位于纽黑文前景大街四百六十号的家庭办公室中向十几家报刊提供批发物价指数的数据。显露式索引卡片公司被出售以后，费雪将他的经济预测和数据运营中心转移到了《纽约时报》大楼的办公室内。由他提供的经济指数和图表开始在《费城询问者报》、《商业日报》、《明尼阿波利斯日报》、《哈特福德新闻报》等众多报刊上出现。

费雪一贯主张将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在战争期间，他开始按照通货膨胀的水平折算他办公室职员的工资数额。他很可能是有史以来第一位明确根据员工年度生活费用进行工资调整的雇主。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一段经历却使让他茅塞顿开：按照价格指数的变化来调整工资，用这个办法来对付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在实践中并不可行。对此，他的解释是：

> 只要生活费用水平一直保持上升，显露式索引卡片公司的员工们便乐得看见他们的工资袋变得越来越鼓。虽然公司非常仔细地向他们解释过他们的实际工资水平并没有变化，但他们却还是以为他们的工资在不断上涨。然而，一旦生活费用水平出现下降，当他们看到拿到的工资“减少”了的时候，便总是牢骚不断。[51]

费雪用他自己员工的这些反应为例来证明“货币带来的错觉”无所不在。他还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想，那便是，无论是精明的投资者，还是办公室的打字员，人们都能轻易地被误导并且相信，当商品和服务价格或者是别国的货币价值出现动荡波动的时候，他自己所持货币的价值仍然会稳如泰山，不受影响。在某一只股票上能盈利百分之十看上去已是笔不错的投资了，但如果通货膨胀率是百分之十一的话，那投资者仍然在亏钱。费雪相信，投资者和工会组织一定会愿意出钱购买一种衡量标准，这样他们便能知道他们的“真实”盈利比率是多少，或者他们拿到的工资究竟是涨了还是降了。

对稳定币值的浓厚兴趣使费雪爱屋及乌，对指数也发生了兴趣。而指数又让他对研究股票盈利着了迷。1921 年，美联储为了平息战时通货膨胀提升了利息率，这导致了美国股市的崩溃。但一年之后，股票价格又陡然回升。到 1929 年年中，股票的票面价值比 1921 年的水平高出三倍，企业的税后利润则大约相当于 1921 年的十九倍。[52] 费雪拥有的雷明顿兰德公司的股票在 1925 年至 1929 年之间增值了十倍。

早在 1911 年费雪就曾指出，与债券相比，多样化的股票组合是更

佳的长期投资方式。债券反映的仅仅是政府偿还债务的能力以及它防止通货膨胀发生的意愿。而股票从另一方面而言，反应的是私营经济通过生产力提升而得到的盈利，因此它所具有的上升空间也要大得多。随着经济繁荣的持续，费雪在经济预测中流露出的信心也日益高涨。到1927年，他不仅成了新经济最引人注目的鼓吹者，而且他还借了数十万美元用于融资股票交易。在此过程中，他也没少受惊吓。那年秋天他去了一趟巴黎和罗马。当他返回的时候，他的私人秘书正在纽约的港口旁焦急地等着他。由于股市下跌，她不得不从费雪股票经纪人的账户里支取了十万美元用来偿还银行的短期贷款。但不出一个月，费雪又开始极力鼓动他儿子，劝他“将其现有全部股票的一半作担保来借取资金，再用这笔资金买进更多股票。六个月或一年之后，你应该能有一笔非常可观的赢利，到那时你再选择将你的投资多样化。”[53]

1929年8月，美国的失业率仅为百分之三。战争结束以来，各式各样的新发明令人目不暇接地迅速出现。过去十年中专利注册的数量比此前一百年的总和还多。因此，新任总统，即美国帮助欧洲免除饥饿计划的前负责人赫伯特·胡佛，所任命的经济委员会对当前经济形势作出的结论也便并不令人感到惊讶：“我们有一个幸运的形势，我们的发展势头好得惊人。”[54]也有一些投资者，如罗杰·巴布森，对市场的前景感到悲观，他们警告说股票价格上涨的幅度过大，速度也过快。而费雪却回击他们说，股票价格上涨的幅度和速度与企业的利润率还是颇为一致的。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还列举了以下诸条理由以说明为什么企业的利润仍将继续增长：公司合并使规模经济不断上升，同时使生产成本下降；企业在研发上的投资日益增加；回收利用在日益推广；企业管理变得日益科学化；汽车和道路状况的改善将帮助企业提高效益；工会组织在企业中的发展预示着产业内部的争吵和矛盾将有所减少。

1929年，此时的费雪不但身为雷明顿兰德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他还对若干新创公司进行了投资，并且还领导着一家提供经济预测服务的机构。同时，他将那一年的大多数时间用来对他1907年出版的《利息理论》一书进行修改。在对这个美国股票历史上最为强劲的牛市进

行解释时，费雪把股票价格疯涨的原因归结于一战结束后众多新发明的爆发性涌现，以及它所带来的利润极高的投资机会。同年 9 月，在将书稿送出以后，他即刻又开始撰写另外一本关于股票的著作。他原定在 10 月 29 日这天于纽黑文的塔夫脱酒店为一批银行贷款负责人作一场演讲。两星期前《纽约时报》的报道曾说，欧文·费雪教授信心十足地向采购代理商协会的与会者们表示，看来“股价已立足于永恒的高地之上”。[55]

第十章

结构性难题：大萧条中的凯恩斯和费雪

“全世界的人们都在严肃地思考和坦率地讨论一种可能性，那就是，西方的社会制度也许即将崩溃，并将难以为继……”

——阿诺德·汤音比[1]

每天头半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凯恩斯总是在床上度过，他会将报纸上的金融消息浏览一遍，然后与自己的股票经纪和其他联系人在电话上交谈一番。然而，他的这些调查研究却未能在1929年10月美国股市大崩盘到来之前为他提供任何预警。在他管理下的国王学院基金下跌的幅度超过了三分之一，他自己股票组合的亏损则更严重。斯吉多尔斯基认为，凯恩斯的问题并非在于他持有众多美国股票，而是因为他预期美国的经济繁荣将使商品价格上涨，因此他以十比一的比率用保证金交易的方式买进了大量橡胶、棉花、锡和玉米。及至1928年商品交易价格开始疲软，为了在商品市场上轧平头寸，凯恩斯不得不卖掉他持有的大部分股票。至1929年年底，他的净资产数额从四万四千英镑跌至不足八千英镑。[2]这段惨痛的经历使凯恩斯转而成为一个价值投资的信仰者。价值投资的理念已经彻底让他信服：“正确的投资方式是将大部分资金投在自己对之有所了解并认同其管理模式的那些企业上。”[3]

面对这场金融灾难和出人意料的变故，凯恩斯仍然保持着他一贯的乐天态度。他几乎肯定，为了防止经济出现衰退，美国货币管理当局必将开启一个“低息贷款的新纪元”。1929 年 5 月，工党的拉姆塞·麦克唐纳在大选中一举击败托利党的现任首相同时也是凯恩斯所属的自由党的候选人劳合·乔治，并且当选为英国新一任首相。[4]凯恩斯曾经三次与这位新的工党首相共进午餐，他还由此得出了一个结论：新政府将不会把“财政部的传统教条”当作金科玉律来遵守。[5]

财政部对付金融危机的一贯办法是，在通过平衡预算加强政府的财政操守的同时，由英格兰银行提升利息率以捍卫英镑的黄金比价。这个办法背后的逻辑是，重新树立企业和投资者信心是恢复经济的捷径。任何被迫由政府提供工作机会的举动，其结果将仅仅是使私营企业的雇用人数相对减少而已。正如同温斯顿·丘吉尔这位即将卸任的托利党财政大臣向国会再三指出的，“无论由政府出面进行借贷和消费在政治和社会上具有多大益处，它创造的就业增长数量其实微乎其微。从长远来看，它甚至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6]凯恩斯相信，工党将会接受自由党关于大兴公共工程和降低利息率的建议，而这两项政策对政府财政赤字和稳定英镑黄金比价的影响将是致命的。事实证明了他的乐观分析。次年 7 月，麦克唐纳邀请他出任经济事务顾问委员会主席，该机构其实就相当于“首相的经济参谋团队”[7]。在给妻子莉狄娅的信中他欢呼道：“我东山再起的时刻到了。”[8]

凯恩斯坚信，低息贷款有助于经济稳定。他在为《伦敦时报》撰写的一篇文章中讲到，虽然失业形势在接下来的数月内仍可能恶化，但只要利率下降的速度快过物价下降的速度，那么企业投资便将出现反弹，商品价格和农业收入也将得到恢复。同时，美国新总统赫伯特·胡佛的积极干预政策明显有别于他的前任卡尔文·柯立芝的消极政策，这也让凯恩斯满怀信心。胡佛不但为美联储任命了一位精力充沛的主席，即日后通过拍卖购得《华盛顿邮报》的尤金·艾萨克·迈尔，而且他还宣布了一项加快实施联邦政府基建项目的计划。为了集思广益，曾经成功担任过采矿公司主管和欧洲食物援助计划负责人的胡佛还邀请众多工商界的重要人物到白宫会谈。股市大崩盘发生过后

数星期，胡佛的财政部长安德鲁·梅农向国会提出了将企业和个人所得税降低百分之一的建议。[9] 与往常一样，凯恩斯对他的经济预测信心十足，并以之来指导他的投资行动。据斯吉多尔斯基的说法，早在1930年9月，他已开始大量买进美国和印度的棉花。

社会急需倾听凯恩斯的意见，他的行情也因此看涨。他向报刊投稿，参加电台访谈，并在新闻短片中接受采访。他大力宣传应该采取行动主义的货币政策来对付眼下的经济困境。1930年12月，他为《国家杂志》撰写了一篇长文，该文章是如此开头的："在今年一年中，我们一直都生活在人类现代历史上最大一场经济灾难的阴影之下。全世界对这点的认识都非常迟钝。"为了消除人们束手待毙的消极情绪，他利用一切可能的公开场合来驳斥社会上流行的一些论调，那些论调将经济的繁荣和衰退说成是道德剧中劝人弃恶向善的不同剧集，将经济衰退视为对人类穷奢极欲、轻率鲁莽和贪得无厌的惩罚和合理纠正。相反，凯恩斯告诉他的读者们，"我们正深陷在一场巨大的混乱之中，我们在使用这套精密的机器时捅了个大娄子，我们尚未弄明白这套机器的运行规律。"[10]

换个说法，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与车祸导致汽车严重损毁一样，经济萧条也是由政策失误造成的。它给生产带来的损失是永久性的，就像时间一样，是无法补偿，也是无法挽回的，是纯粹被浪费掉了。虽然农业歉收、飓风、战争或其他突如其来的灾难有时也会使经济遭受重创，但绝大多数经济衰退都是由经济决策者制定的错误和愚蠢的政策引起的。原则上说，这就意味着我们将有办法缩小经济衰退的规模，或者从根本上预防它的发生。凯恩斯尤其想要纠正那种认为经济繁荣而非经济衰退才是问题的关键的认识。正如几年后他所指出的，"医治经济周期的正确方法并不是消灭经济繁荣，因为那样我们将永远生活在半萧条的经济状况之中。正确的方法应该是防止萧条的出现，从而使我们能永远维持在一个准繁荣的水平上。"[11]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经济萧条的发生意味着先前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全都是虚幻的。凯恩斯对这种说法也特别予以了驳斥。在谈及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投资热潮时，他这样写道，"往日的繁荣并非南柯一梦，只是我

们现在的处境太过恐怖而已。自然界依然拥有丰富的资源，人类拥有的才智和手段也不亚于以往任何时期……我们曾经目睹的并非假象，我们并未受到蒙蔽。”[12]

他的主要观点是，我们的经济出现了机械故障，这种故障还是比较容易修理的。在另一篇文章中他曾经写道，“对经济引擎而言，破坏性最大的故障莫过于‘磁发电机’或者启动装置出毛病。”[13]物价下降的幅度过大，以至于农民和商人陷入了入不敷出的境地。于是，他们别无他法，只能削减生产和投资规模，从而引发另一轮失业狂潮，并促使价格继续下降。为了避免这种恶性循环的发生，货币管理当局只需通过发行更多货币以促使利息率下降，一直到企业认为值得扩大投资并且能够提供高产品价格为止。他坚信，对于普通的经济衰退，采用这种对策一般来说就应该能药到病除。

正如斯吉多尔斯基所写到的，凯恩斯以汽车打比方来阐述他的观点，即引发重大灾祸的起因有时可能是一件琐细之事，而解决问题的办法同样有可能会毫不起眼。然而，他的这个观点在许多人听来似乎与人们的直觉格格不入，甚至有些荒诞不经。当时，声名显赫的数学家和马克思主义者 G.H. 哈代正在大肆嘲讽提倡用机械方法解决高深科学问题的主张，他说：“只有那些一知半解的外行才会觉得，数学家们只需拧动某台神奇机器上的某个机关，就能做出重大的发现。”对此凯恩斯的回应是一笑了之。

凯恩斯再一次向他的读者们保证，一旦我们准确诊断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便能找到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但前提是政府需要下决心有所行动：

> 大多数人都误将症状和日益恶化的客观环境当作是疾病本身，因此，美联储银行、法兰西银行和英格兰银行采取果断行动所起到的作用将比其他人的作用要大得多……我相信，只要英美两国能同心同德，通力合作，便能在合理的时间内将这台经济机器重新发动起来。但那是假设他们对作出的病情诊断坚信不疑。因为至今为止，正是因为缺乏这种信心和决心，才使得无论是英

> 吉利海峡两岸还是大西洋两案的各国政府都处于束手无策的尴尬境地。[14]

缺少决心的原因有一部分，或者可以说有一大部分是思想上的。在描述这场经济灾难的巨大规模时，凯恩斯解释道，“价格以如此的规模和速度跌离正常水平，这在人类现代历史上尚无先例。”[15]凯恩斯知道，批判旧的理论不能单单依靠事实依据，更需要有一套新的理论。为给他的社论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1930 年 9 月中旬，凯恩斯完成了他《货币论》的序言，并终于争分夺秒地将该书的前两卷交付出版。

《货币论》集中论述了通过稳定价格来调整经济周期的可能性。当投资额超过储蓄额的时候，便会发生通货膨胀。而反过来便会导致价格下降，生产萎缩，失业率上升。换而言之，就会发生经济萧条。因此，鼓励消费和不提倡储蓄也许便是治愈经济萧条的良方。但它与丘吉尔等传统派人士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却截然相反。“驱使企业前进的发动机并非节俭，而是利润。”他在论述中还文采斐然地提了一个问题，“世界七大奇迹中有哪一个是靠节约修建出来的吗？我看没有。”[16]

如果导致农民、矿工和企业缩减生产规模的原因是通货紧缩的话，那么政府就应该能治愈这一痼疾。欧文·费雪在他 1921 年出版的《稳定美元》一书中曾指出，中央银行应该通过调整利率来控制货币和信贷供给。面临通货膨胀威胁的时候提高利率，而发生通货紧缩时则降低利率，这样中央银行便能视其刺激或放缓经济活动的需要来达到其抑制或鼓励投资的目的。而通过控制投资数量，货币管理当局还能使投资和储蓄，物价与成本基本保持一致。这些便是凯恩斯在 1931 年时的观点。当时的他坚信有计划的降低利率将能成功终止经济衰退。

正如斯吉多尔斯基所指出的，凯恩斯并未充分领会社会主义政治家们在经济上的正统观念。虽然九年多来，高失业率在公众最焦虑的事项名单上一直高居榜首，但工党却始终未能拿出一套自己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只有比特丽斯·韦伯是个例外。在她 1909 年出版的《少数派报告》中，韦伯对财政部的立场以及其“财务管理”提出了猛烈的批评。[17]她认为，在经济繁荣时期，政府应该通过提高对富人的税

收而获取盈利；而在经济萧条时期，即使甘冒出现财政赤字的危险，政府也应该出资大肆兴建公共项目。然而到了 1930 年，她逐渐开始觉得失业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特征。虽然美国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大多数时间内失业率都不到百分之五，但韦伯却对此事实视而不见。她的结论是，只有将私营企业完全国有化，才有可能消灭失业这一现象。[18]

工党内阁的大部分成员都和丘吉尔一样对财政部的立场纷纷表示赞同。一位内阁部长在给首相的信中写道，“这艘大船因为遭遇退潮而搁浅了。无论船长还是船上的其他指挥官，单单靠人力是无法使船重新漂浮起来的。只有等到潮水自然而然地涨回来时才行。”而麦克唐纳对此信的答复是，“这封信表达的意思和我的意见不谋而合。”[19] 与凯恩斯和费雪所提倡的激进的刺激经济的方案相比，削减福利和增加税务的措施看起来自然要谨慎得多。

1930 年年底，凯恩斯领导的经济事务顾问委员提出了一个保守和激进措施兼容的大杂烩方案：削减失业福利，对进口货物征收百分之十的关税，启动一项“规模庞大的公共项目”并为失业人口提供就业机会。[20] 对于认为政府创造的就业不过是替代了私营企业的就业机会的观点他们也旗帜鲜明地表示了反对。“有人认为我们实施此项计划将必然导致私人企业就业机会的流失，我们不能接受这种观点。”[21] 但工党内阁，包括担任辅政司司长的西德尼 · 韦伯，最终只采纳了该建议中的第一条措施，而放弃了增加关税和启动公共项目这两条。

斯基多尔斯基指出，1931 年年初，凯恩斯的财务状况颇为紧张，他不得不试图出售他收藏的两幅最好的画，其中一幅便是马蒂斯的《青年妇女》[22]。但没有一位买主愿意出他所索取的最低价格。

1929 年的夏天，欧文 · 费雪不仅尽情享受了驾驶他 Stearns-Knight 豪华车的乐趣，而且还兴致勃勃地指挥着一队工人将他在纽黑文的住宅翻修一新。他对他的儿子说，这件事的最美妙之处就在于，这回是他，而不是他妻子玛基在买单。

时年六十的费雪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健康，他的外表也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更与众不同，令人尊重。他有着白而粗的头发，身形瘦削，凝视的目光中隐含着思考，人们根本看不出他的一只眼睛已经失明。在他将显露式索引卡片公司卖给兰德公司以后的四年中，他股票组合的价值已经翻了十倍。在他将显露式索引卡片公司卖给兰德的过程中，他拥有了兰德公司的部分股票期权，因此他也借了一大笔资金从事期权交易。

他的指数研究所依然坐落在《纽约时报》的大楼里，并已开始推出一项付费股价指数服务。费雪每周撰写一篇关于投资的联合专栏，该文章每周一都会刊登在全国各大报刊上。在公众眼里，费雪不仅是禁酒和健身时尚的认同者，而且他还是股市兴旺和新经济时代中乐观主义的代言人。

1929 年，人们对股票牛市能持续多久的质疑越来越多。费雪对罗杰·巴布森等声称熊市即将到来的职业股票分析家提出的警告进行了回击。他指出，过去十年中的经济特征是低失业率和快速经济增长二者并存。他写道："我们目睹的也许是历史上在同样长的时间内人们的实际收入获得过的最大的一次增长。"[23] 据《纽约时报》报道，费雪在 10 月中旬还曾预言，"数月之内股市必将升至一个新高"。[24]

股市崩溃发生以后，费雪仍不相信经济萧条的来临是无法避免的。他曾于 1930 年 1 月写道：

> 证券面值的下跌主要是财富的重新分配，而不是财富的消亡……各项实质性的计划并未遭受任何损失……企业所有权的重新分配是在占全部人口极小百分比的人中进行的，因此，它对绝大多数消费者的购买力所起到的影响应该是微乎其微的。[25]

他的竞争者，哈佛经济学社也同意，像 1920 年至 1921 年间发生过的严重经济衰退应该不会重演。股市崩溃之后数日，哈佛的经济预测家们向他们的订阅者发出了通告，"我们相信，眼下股市和经济的不景气局面并非经济将全面衰退的前兆。"[26]

费雪并未在他损失的股票上唉声叹气浪费过多的时间。相反，他

集中精力为股市崩溃作了一番事后的总结。他的《股市大崩溃及以后》一书在1929年11、12月间便已大部分写完。他坚持认为，股票价格必将恢复如初，因为“那些价格仅仅相当于收益的十一倍”，尚低于长期历史平均值。“而且未来的赢利速度将大幅加快，以此期许来衡量，这样的价格水平也仍算是极低的。”他不认同社会上流行的一种看法，那就是，股票价格的过度膨胀是股市崩溃的罪魁祸首。他指出，最新研究成果表，在1926年至1929年9月其间所有上涨的股票当中，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股票升值与其收益或者生产效益的增长有关，因此，这些股价的上升也是正当的。他同时也解释道，和他一样，许多投资者在低利率和高回报的双重引诱下，为了投资而欠下了巨额贷款：“当新发明带来投资回报率高于利率的机会时，人们便禁不住会用低息借款进行投资，以期获得高于利息率的投资回报。”股价上涨并不是问题，过度的借贷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 一方面，投资者发现他们面前到处都是赚钱的机会。而另一方面，借贷的利息又非常低。相比之下，他们借钱所付出的代价比他们可能赚到的钱要小得多。简而言之，之前发生的牛市和后来的股市崩盘大部分可以用一言以蔽之：正确的股市预期，糟糕的资金运作。[27]

费雪坚持他股市必将恢复的预测，他对经济萧条不可避免的观点也予以了否认。他指出，早在股市崩盘之前，经济活动的萎缩就已经开始。他预言经济会出现典型的衰退，但不会进入萧条。他坚信，只要企业对未来和前途的希望不过于黯淡，只要它们不开始减产并裁减雇员，我们的经济便能安全度过这场经济风暴。在接下来的一年中，他每个月都会再三重复股市上扬指日可待的观点。和凯恩斯一样，他对胡佛的能力和果敢充满了信心。

有几个月，费雪的乐观预言一度似乎露出了一些苗头。1930年4月，股市恢复到了1929年初的水平。价格的下降不再像此前那样迅猛，而失业率上升的速度似乎也有减缓的趋势。确实，到1930年

6月，失业率只有百分之八。而在1921年，失业率曾经高达百分之十二。而且此时的利率也低得出奇。但正如米尔顿·弗里德曼[①]和安娜·舒瓦茨[②]在他们的权威性著作《美国货币史（1867—1960）》中所论述的，让人们望眼欲穿的经济复苏并未到来，人们等来的却是"收缩的特点发生了极其显著的变化。"[28]

随着工业品价格指数的进一步下跌，贷款人从低利率借款中获得的收益已被剥褫殆尽。1930年秋至1931年夏期间发生的一波波银行倒闭使得亿万的资产于顷刻之间蒸发于无形。最终，当费雪不得不承认经济萧条的严重性时，他甚至仍然坚持认为，股市和经济都已经触底。他的乐观、过度自信以及他的固执己见将他害得不浅。和其他很多人一样，他一直满心期待着局势会迅速出现转机，因此他未能将股票尽早出手。假使他采纳了赫伯特·胡佛的秘密公式，即在1928年到1929年雷明顿兰德公司的股票飙升到每股五十八元的时候卖出股票，还清银行贷款的话，他剩下的资产仍将够他当八到十回百万富翁的。即使他在股市崩盘以后一年之内将股票全部出手，他仍有可能觉得舒服一些。因为1930年年末，雷明顿兰德公司的股票每股仍然有二十八美元。而到了1933年，它就跌到每股只有一美元了。时至1931年4月，费雪的资本净值缩水到只剩下一百万美元多一点。同年8月，他被迫关闭他的指数研究所，并且解散了为他工作的一众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似乎老天觉得他所受的打击尚嫌不够，这时国税局对他提出了一项起诉，原因是他在1927年到1928年出售雷明顿兰德公司股票的交易中欠交了七万五千美元的税款。在百般无奈之下，他只得向妻姐卡罗琳·哈泽德求援。哈泽德是韦尔斯利大学的前任校长，现已退休。她后来逐渐将费雪的这笔贷款交由她的律师和两个侄子组成的委员会来管理。

这场经济灾难不但在经济上给他带来了压力和羞辱，而且使他在社会上遭受了公开的指控和奚落。美国经济协会的前任主席在《纽约时报》上对费雪发起了攻击，指责他"将'一切正常'当作口头禅一

① Milton Friedman（1912—2006），美国经济学家，货币主义大师。

② Anna Schwartz，生于1915年，美国货币理论权威。

直挂在嘴边，说他言不离经济繁荣、新的纪元以及总将生产效率的提高说成是股票价格上扬的保证。”[29] 该报还报道说，“疯狂的投机热潮在华尔街股市崩盘之前之所以能得以持续和延长，财政部长梅农、前总统柯立芝和欧文·费雪教授昨天被指认为最应该为之负责的三个人。”[30] 他拥有巨额投资的一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受到了欺诈的指控，他也立即提出了诉讼。这些公众事件的发生使他的声誉受到了进一步的损害。据他儿子回忆，当时《纽约时报》每天都在报道费雪的这个官司，他曾亲耳听到两个素不相识之人在谈论一些耸人听闻的细节：“哎呀，他不是应该知道所有答案的吗？看他自己亏成什么样子了。”[31]

经济大滑坡不仅没有一丝就此打住的意思，反而呈现出加速的趋势，并且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蔓延开来。美国的工业产量跌至连 1929 年水平的一半都不到，而失业率狂飙至了百分之十六。这使经济评论员的腔调中充满了恐慌：到那年年中，报纸上已经开始出现“经济大萧条”的说法。[32] 费雪也承认，“对所有的人而言，这是我们一生中发生的最重要的一次经济事件。它在未来许多年后都仍将是一个谜。”[33] 他和凯恩斯都受到了股市的蒙蔽。但费雪失去的还有公众对他的信任。

1931 年 7 月的头一个星期，凯恩斯和费雪都来到正遭受旱灾肆虐的美国中西部。有二十几位金融货币专家聚集在芝加哥大学，一起商讨政府应当如何应对这场被称为“经济大萧条”的危机。凯恩斯对胡佛政府减免税收和批准大量公共项目（包括建造胡佛大坝）的政策颇为赞同。同时，他对美联储为了防止通货膨胀而将利率降至破纪录的低水平的做法也表示了嘉许。“对付经济萧条需要靠提高物价，而不是降低物价。”[34] 他曾如此向记者表示。他仍然认为，仅凭降息这一条措施就足以终结经济衰退，但他毕竟尚能聪明地意识到，不该将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而应该“从更加广泛的层面上对付这个问题，并同时尝试各种可行的解决方案”[35]。鉴于目前的局势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因此这样的做法从经济和政治双方面而言都是较为明智的。

凯恩斯主持了一次圆桌讨论会，讨论的话题是“政府和中央银行有无可能有目的地整治失业问题”[36]。虽然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人士在

财政上都奉行典型的中西部的保守立场，但他们对胡佛政府采取的增加政府支出提供低息贷款的政策却都表示了支持。家庭和企业需求的下降，即由他们的欲望和支付能力所决定的消费能力的下降，最终导致了经济衰退，而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由政府来填补家庭和企业留下的需求空白。在与会者中，并非只有凯恩斯懂得这一点。诚然，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人士对胡佛的公共项目和企业贷款计划的态度比凯恩斯要热切得多。因为凯恩斯对美国人的组织能力并不像对英国公务员那样信心十足。

工党政府发布了由委员会主席修·麦克米兰法官发表的《财政与工业委员会的报告》，凯恩斯对报告表示了支持。该报告提出，美英法三国应该共同努力，采取多种方法以增加贷款数量：包括废除战争债务，提供紧急贷款以及消除贸易壁垒，等等。为了重振市场对英镑的信心，工党政府提出了一项削减七千万英镑政府开支同时增加税收达七千万英镑的计划。而结果这也于事无补。1931 年 8 月，由于经济顾问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导致了工党政府内部出现意见分歧，拉姆塞·麦克唐纳辞去了首相之职。数星期之后，奥地利最大的银行——信贷银行轰然倒塌，并在欧洲大陆上引发了一场金融危机。随着欧洲投资者们从他们在伦敦的账户里疯狂地提取英镑，这便使英镑的价格一路上升。为了应对这种局面，英格兰银行将贴现率提升至百分之六，这比原来的水平几乎高出一倍还多。

9 月 21 日，英国终于采取了凯恩斯和费雪长久以来所提的建议：将英镑贬值百分之三十，并且终止了以黄金作支付。为了防止黄金和其他硬通货储备的外流，也为了捍卫英镑的黄金比价，英格兰银行并没有让利率一直停留在 9 月份的高水平上，因为这样将会引发另一轮削减工作的浪潮。相反，英格兰银行在 1932 年上半年将利率从百分之六下调至了百分之二。[37] 在发给麦克唐纳首相的一封电报中，费雪对他“成功打破了金本位制”表示了祝贺，他向麦克唐纳保证，“他采取的这项措施并无任何令人羞愧之处。”[38]

凯恩斯则更是令人信心倍增。那年 10 月，凡妮莎·贝尔和邓肯·格兰特在伦敦一道看了场电影。随后她便给姐姐弗吉尼亚·伍尔芙去

了封信：

> 忽然，梅纳德的形象在银幕上出现了，而且大得出奇……他对着灯光不住地眨眼，讲话的时候也颇为紧张。他向世界宣布，所有的事情都将稳妥无误。命运将会把英国从这场看似绝望的形势下解救出来，英镑绝不会崩溃，制止物价进一步上涨也指日可待；我们的贸易将会恢复如初，人们根本不需要担心和害怕。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之下，人们绝对应该相信这一点。[39]

但对工党来说，这一切都已经太晚。在10月份举行的大选中，托利党和自由党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拉姆塞·麦克唐纳保住了他的首相职位，但保守派又重新控制了制定国家经济政策的大权。

此时年已六十五岁的费雪虽然在经济上受到了沉重打击，名誉遭受了损害，而且年龄日益衰老，但这场经济灾难并未使他消沉下去，他的精力似乎反而变得更加充沛。在1932年里，他发表了数量惊人的科学论文和报刊评论。他锲而不舍地向胡佛政府及美联储提供了大量建议，同时他也鼓励和组织其他经济学家们同样行动起来。他的目标主要是为了说服胡佛总统让美国脱离金本位制，如果这在法理上暂时还行不通，那在事实上至少能让美联储在美元外汇比价下跌的时候不要试图进行干预。他也同掌管美联储的金融家们进行了会面，他敦促他们采取更为积极的计划，买进更多银行和政府发行的债券，目的是向银行系统注入更多的资金。但令他失望的是，“美联储的那些人认为，如果他们再等等，再观望一阵的话会‘更安全’。”他后来曾抱怨说，“在我看来，我们为坐等和观望付出的代价就是我们的国家未能躲过这场经济大萧条的绝大部分。”[40]

1932年1月，费雪出席了在芝加哥大学举行的第二次货币专家会议。这一次，他组织和发动与会者向总统发出了一封电报，呼吁他允许联邦预算赤字上升，将联邦储备资金注入已瘫痪的银行系统，降低关税，并且免除盟国之间的债务。三十二位来自芝加哥、威斯康星以

及哈佛大学的著名经济学家们共同签署了这项声明。费雪在该声明中指出，由于脱离了金本位制，瑞典、日本和英国的经济在一年之前便已开始复苏。如此众多人的共同签署反映出费雪和凯恩斯对这场危机所持的观点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因为它不但强调了危机的世界性及其与货币相关的起因，同时它还强调了需要对经济未来的走势进行预测，以及政府利用货币进行干预的必要性。但在另一方面，他们二人的这个观点毕竟尚属于少数派。在同一个月，两位哈佛大学的教师，哈里·德克斯特·怀特和罗奇林·科瑞也发表了一份类似的声明。他们将大萧条称为“一场世界性的灾难”，他们认为，政府不应该将它的作用仅仅局限于向受害者提供帮助，政府还应该集中精力防止经济衰退进一步恶化：

> 由于战争赔偿因素的介入，整个欧洲所面对的经济困难正变得愈加严重。同时，正在日益恶化的还包括黄金储备的分配不均，人们对银行的信心丧失殆尽，国家间的贸易壁垒，以及西班牙、印度和中国出现的动乱。总之，经济能在近期内得以恢复的希望是极其渺茫的。鉴于政府除了一些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以外别无良策，那么经济学家们就应该担负起这一重任，他们应该提出一套能加快经济复苏的行动方案。

这两位哈佛的持不同意见者呼吁政府大幅增加公共开支。他们对“那些认为人们无法抑制经济萧条，人们对政治和经济变化无能为力的经济学家们”进行了嘲笑。[41] 原来，所有哈佛大学的资深教授们都属于这一类人。除了他们自己以外，只有仅仅一名哈佛教师在他们的声明上签字表示支持。

时至1932年，这场经济危机的严峻性和世界性已清晰地展现出来，而赫伯特·胡佛此时已成了“美国最遭人恨的人物”。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甚至是互相矛盾的建议络绎不绝地向他不断抛来。为了对付日益高涨的失业威胁，总统采纳并实行了一系列前后矛盾的政策。由

于他在赤字不断加剧的情况下仍然减免税收和增加政府支出的做法受到了攻击，他便掉转政策方向，开始增税和削减公共支出。金融家和企业家们，事实上，整个经济学界的人士们，都拒绝支持这一非同寻常的措施。在一次与财政部次长的会面之后，费雪在给妻子玛基的信中写道，“我对他说，在他和胡佛定下施政措施之后，就应该雷厉风行地行动起来。”[42]

事实上，对于政府应该采取何种措施，人们从来就未达成过一致意见。大多数政府在物价、生产和税收呈现下降趋势的时候都会以平衡财政预算的方式来应对。但提高税率和削减开支的后果是使经济衰退雪上加霜，并将导致物价的进一步下跌。银行业发生的恐慌使政府的债务负担更加沉重。因此，正如经济历史学家哈罗德·詹姆斯所指出的，政府行为，尤其是华盛顿政府的行为，对通货紧缩和经济萧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并使这场经济大萧条的全球化变得名副其实。

那些期待1932年美国股市能重演其1923年的辉煌的梦想迅速化为了泡影。经济非但没有复苏，反而下滑得更加厉害。到了1933年，股票交易价格跌至1929年水平的五分之一，同时，商品零售价也下降了百分之三十。全国的生产和收入也缩减了三分之一。失业率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百分之二十五。自杀现象陡然增加，当然这也在人们的意料之中。而仅有的几条好消息之一便是，从整体上而言，美国人的身体越来越健康，寿命也越来越长，他们不到期望年龄就过早死亡的几率变得越来越低。虽然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经济繁荣提供了众多工作和消费的机会，但很显然，它为人们带来的并非完全是福祉。

1933年7月，凯恩斯和美国记者沃尔特·李普曼成功进行了他们第一次跨大西洋的实况广播。此时，罗斯福·富兰克林总统已成为白宫的主人。在广播结束之际，为了说服他的采访对象，李普曼特意发表了如下评论：

> 在人类知识已发展到的现今阶段，也许我们已经懂得的尚不足以让我们理解这场如此巨大的新的危机……在全世界范围

> 内，没有任何一个先知先觉之人能给予我们全面、及时和完整的教诲……这同时也是一场有关人类领悟力的危机，我们的最大失败并非来自我们所面对的威胁和敌意，而是来自我们自己错误的判断。[43]

绝大多数经济历史学家都同意，人们不但未能在以往发生过的经济萧条的基础上准确预言大萧条的到来，在现存的理论基础上他们也同样无法做到这一点。[44]现在，当我们回过头来重温历史，现代的学者们将主要责任归结于以下几点：美联储政策失误，消费者和企业信心和实际花销的崩溃，以及惊恐的投资者在股价暴跌时竞相低价甩卖股票的举动。但是，正如明尼苏达联邦储备银行的大卫·费蒂格所指出的，

> 最终，如果经济大萧条真的是一个故事的话，它绝对拥有悬念小说所必需的所有情节陷阱，也有着众多的犯罪嫌疑人。即使当我们已知道故事的结局，要想揭开谜底仍然非常困难。它是那种我们会翻来覆去读个不停的故事，而每次读过之后，我们都会冒出一个新的解释。至少在目前是如此。[45]

对那些有严谨科学态度的人来说，在某件事上的一番大错特错通常会激励他们开始全新的思考。到1932年年底，事实已十分明显，凯恩斯和费雪关于价格稳定足以带来经济稳定，即充分就业的理论存在严重的缺陷，或者至少未能考虑到另外一些至为关键的变量。对于1929年到1933年间爆发的这场经济崩溃的规模为何会如此巨大，他们二人都未能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由于没有一种理论能令人信服地将这场危机解释清楚，因此，世界上没有任何政府有信心采取坚决果断的行动。在此压力之下，凯恩斯和费雪开始重新审视他们先前所作的诸般假设，并且努力搜寻某些可能被他们忽视或误解了的作用力和因素。

费雪感觉自己已找到那个被人忽略的变量：负债。在新奥尔良的

一次经济学家会议上，他首次提出了他的新理论，即在解释经济崩溃的巨大规模的时候，应该充分强调过度负债和通货紧缩所起的破坏作用。“投资过度和投机过度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他对与会者说，“但如果用于投资和投机的资金不是借贷而来的话，那它们所能起到的实际影响将会小得多。”[46] 政府和私人的负债水平在一战结束以后出现了爆炸性的增长，不但在美国，在全世界也都是如此。[47] 在欧洲各政府因为战争欠下一屁股债务的同时，美国的家庭已经在用贷款购买汽车、家用设备和住房了。

股价在最初几日的狂跌已足够让那些债务缠身的企业、家庭及资不抵债的银行发生信心动摇。他们争先恐后地清偿自己所欠的债务以巩固它们的资产负债表。这便导致了最先一轮亏本抛售，即“并非因为价格足够高而出售，而是因为被价格跌得太低所吓而着急出售”[48]，该举导致了股价进一步的下跌，而股票的下跌转过头来又造成银行存款数额的紧缩。随着货币供给逐渐萎缩，商品价格便开始全面下滑。

从原则上讲，通货紧缩应该会使实际收入上升。因为在包括汽油和鞋在内的所有商品的价格都下降的情况下，同样的工资购买力会变得更大。然而，早在他 1911 年出版的《货币的购买力》一书中费雪就曾经阐述过，价格下跌有时也能对收入起到抑制的影响。一笔一千美元贷款的实际价值是以一千除以平均价格水平来计算的。假如价格下跌，该笔贷款的实际价值便会上升，从而使债务人变得更穷而债权人变得更富。而随着收入从债务人向债权人重新分配，第二个影响也就接踵而来。债务人的支出一般比债权人的要大，而储蓄额比债权人的要小，这也是他们需要贷款的根本原因之一。所以，由于收入的重新分配，债务人支出的下降幅度会大于债权人支出的上升幅度。

费雪指出，如果所有人都预期价格将要下降，那么企业便不会急于贷款来投资工厂和设备，否则将来它们不得不用更具价值的美元来偿还银行贷款。随着投资计划被纷纷搁置，企业在固定资本上的支出便会出现下降，而生产固定资本的企业和工人的收入同样也会下降。随着收入的下滑，对货币的需求和名义利率也双双会出现下降。但名

义利率的下降幅度与价格下降的幅度相比要小，因此，实际利率的水平最终会要高一些。不管是以上哪种情况，价格下降最终都将导致生产下降和失业率上升。

费雪想强调的是，企业为消除债务所作出的诸般努力其实最终却使它们的实际债务负担变得更加沉重。某些行为对个人和企业个体而言有利，但对社会总体却是存在危害的。这便是又一个绝佳的例子。当产品售价下跌的速度比产品成本和劳动力价格下跌的速度还要快时，即使那些零负债的企业也将陷入困境。利润下降必将导致企业裁员和产量削减。费雪指出，虽然对银行和个人来说，偿清债务以克服面临的困难是合情合理的。但该举动最终却贻害无穷，它对经济造成的影响无异于雪上加霜。

费雪已得出了他的结论，即引起这场危机最直接的原因是“过重的债务压力导致了信贷体系的崩溃。”[49]1929 年到 1933 年间爆发的三次银行大恐慌将企业、农场和个人拥有的价值高达数十亿的资产一扫而光，这个数额相当于国家货币总供应量的三分之一。而 1931 年秋，美联储又开始提升利率。美联储认为清除财务不健康的银行有助于为经济复苏奠定基础，因此它在巩固和挽救银行体系方面毫无建树。对美国悬而不决的战争债务，斯姆特-霍利关税法[①]以及美联储缺乏强有力的领导人等诸项事宜，费雪都一一提出了批评。此前，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主席本杰明·斯特朗完全把持了美联储，他对银行业有着深刻的了解，而且他与英格兰银行的首脑人物关系密切。费雪坚持认为，1928 年年底斯特朗的去世使迄今为止尚未经受过严峻考验的美国中央银行失去了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和在国际上的公信力。而这两条正是美国此刻最急需的。费雪告诉记者们，“如果美联储各银行一直遵循了纽约银行前主席本杰明·斯特朗所制定的稳定性政策的话，我们也许至少能将经济危机造成的损失降低百分之九十。”[50]

尽管如此，费雪仍然极其乐观地认为，对经济危机更为深刻的理解将使预防危机和减轻危机造成的灾害成为可能。在这一点上他从未

① Smoot-Hawley Tariff Act，1930 年通过的《关税法》，此项税则大幅提高一千多种商品的关税。

含糊其辞：

> 这本书的一个主要结论是，绝大多数经济萧条都是可以预防的。但若想预防它的发生，我们必须要有非常明确的政策，而美联储体系在其中发挥着极其关键的作用。我们应该争分夺秒地力求掌握各项具体实用的措施，从而将世界从1929年以来一直经受着的这种毫无必要的灾难中解救出来。[51]

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报纸的大标题便能看出，社会大众都是透过圣经的镜片来看待经济问题的：即经济衰退乃人们为其罪孽所付出的代价。每逢天下承平日久，企业和个人便开始忘乎所以，极尽骄奢淫逸之能事。而这时，经济便会开始衰退，即在这段时期内，生产、就业和收入将不再继续增长，而是会开始收缩。在这段时期里，企业和个人的过度消费渐趋缓慢，失败的投资将被报废，人们的投资和消费行为会变得重新审慎起来。这种观点认为，发生经济衰退纵然属于不幸，但它却是一个必要的纠偏过程，正如需将酗酒者送去戒酒中心属于同一道理。每当经济衰退发生，为防止企业和消费者的信心受到损害，政府必须平衡其预算并拒绝采纳低率过低的货币政策。当然，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大选中的政策平台也正是在这种观点的基础上搭建起来的。

罗斯福身边的智囊团由数位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竞选顾问组成，他们中间包括法律教授兼公司治理专家阿道夫·伯利、农业经济学家雷克斯·塔格维尔，以及来自西部的百万富翁兼银行家马瑞纳·伊寇斯。智囊团的成员们对凯恩斯和费雪等经济学界激进分子的不信任态度与英国工党人士差可比肩。他们认为，这些信奉通货膨胀政策的家伙们与威廉·詹宁斯·布赖恩等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主张自由铸造银币的那些人是一丘之貉。这种看法其实是不公平的。凯恩斯和费雪竭力提倡的是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停止以黄金兑换率作为标尺，而代之以整体价格水平。换而言之，他们想要的是各主要经济体的货币管理部门在防止国内价格出现通货紧缩的同时，应该放手让他们的外汇兑换

率贬值。但在智囊团的成员们看来，这并没有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差别。塔格维尔曾回忆说："在骨子里，我们乃是健全货币政策的忠实信徒。"[52] 罗斯福的顾问们在货币政策上的保守以及在财政事务上的固执己见与英国工党的做法如出一辙。

历史学家大卫·肯尼迪曾经对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头脑和智慧作过令人印象深刻的描述："他的大脑就像一个无所不包内容丰富的珍奇品商店，哪怕是最琐细最不经意的知识也被存储其中……他对所有的数字、现象、事实、理论、策略以及人物都保持开放的心态……对耶鲁的费雪教授，这位宣扬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的异端分子尤其如此。"[53] 据塔格维尔回忆，"很显然，那些鼓吹让货币贬值的旧学说尚未全部消亡，而一些新的学说已正在出现。老板（指罗斯福）想对它们都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而这让我们不寒而栗，但我们还是把他索取的资料一一给了他。"[54]

通货膨胀之所以有吸引力，其原因是政治上的。三分之二的民主党成员是西部和南部各州的农民。他们正为债务和农作物价格暴跌而焦头烂额，因此他们对金本位制深恶痛绝。而另一方面，对一战期间和战后通货膨胀的凶猛势头，及后来为治愈通胀而实行的通货紧缩，人们依然记忆犹新。在过去的一年中，价格平均水平下降了百分之十强，有三分之二的银行在拖欠债款。在这种情况下，通货膨胀可能带来的经济前景比往常更让银行家和企业家们谈虎色变。罗斯福对依靠国际合作来对付经济衰退的建议尤为反感。

智囊团的成员们颇不习惯用数学家的方式进行思考。在他们看来，那种认为大规模的骚乱也许是由一些琐细之事引发的观点有违人的直觉。罗斯福的经济顾问们更倾向于将经济萧条归咎于民主制度的固有缺陷：收入的不平等，垄断的存在，以及费雪所指出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罗斯福本人则对社会上正流行的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的理论更感兴趣，该理论将大萧条的原因归结为财富过多或是贫困过多。1932 年 5 月，在亚特兰大的奥格尔索普大学所作的一次演讲中，作为总统竞选人的罗斯福对美国经济中存在的"随意性"和"巨大的浪费"以及"在生产设施上的重复投资"提出了批评。他呼吁人们"少

从制造商的角度思考，而应多为消费者考虑。”他还预言，美国经济已发展至其极限，“与往年相比，未来我们有形经济设施的增长速度将会下降。”[55]

1932 年 9 月 23 日，罗斯福在旧金山联邦俱乐部作了一次演讲。大卫·肯尼迪指出，这次讲话反映出该候选人的观点颇为“折衷主义而且易变”：

> “一个只知重复盖建厂房的建造商，一个只会重复兴修铁路的发明者，一个只会组建一个又一个公司的组织者，他们给社会带来破坏的可能性与其对社会作出贡献的可能性一样大。那个属于公司发起人或金融巨擘的年代，那个只需他们承诺将继续开发与扩充我们便会对他们予取予求的年代已经过去了。”

令人惊奇的是，在三分之一的人口陷入赤贫的当时，罗斯福仍将大萧条的原因归咎于生产过剩而不是生产不足：

> 我们行事需要更加理智，更加低调：我们应该对已有的资源和设施实行更好的管理，应该为我们过剩的产品重新建立海外市场，还需要设法解决国内消费不振的问题，并且调整生产规模以适应消费水平，以及使财富和产品的分配更加公平合理。[56]

罗斯福的顾问们自然也有自己的政治企图。伯利一直都在宣扬，经济危机的发生为实施重大经济改革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大卫·肯尼迪指出，罗斯福在竞选期间提出的经济复苏计划“虽然有些扭扭捏捏，但其实它与许多胡佛正在实施的政策难分伯仲，比如支援农业，鼓励协定价格，为企业提供贷款，向银行提供支持，平衡政府财政预算，等等。”[57] 而在其向国会递交的第一份财政预算中，罗斯福削减政府开支力度之大令胡佛难以望其项背。

凯恩斯和费雪二人都认为，罗斯福在经济形势稳定下来之前便强调进行社会福利改革的做法是错误的，而且也是非常冒险的。在罗斯

福总统就职仪式举行前数星期，凯恩斯给他去了一封信。凯恩斯在信中提醒他勿将长期性的改革措施与暂时性的恢复计划混淆起来，他还呼吁“开放市场运行机制，从而使长期利率得以下降”[58]。费雪则敦促罗斯福在就职仪式当天宣布退出金本位制，他指出，“该举动将在一夜之间将目前的通货紧缩局面扭转过来，并将为重新达到经济繁荣的顶点明确前进的方向。”[59]1933 年年底，为了重申自己的观点，凯恩斯又给罗斯福写了一封公开信并发表在《纽约时报》上。“即使是极其高明或势在必行的改革也有可能会阻碍经济复苏的到来，或使它变得更加复杂。因为改革将降低企业的信心，并将使他们即刻采取行动的动机减弱。”[60] 和凯恩斯一样，费雪对罗斯福的新政也有所保留：

> 这是一个面目全非的政策混合体。我反对对土地面积和生产规模加以限制，但我支持通货再膨胀。很明显，罗斯福认为这几项措施的作用是相同的：它们不过是提升价格的两种不同方式而已。但实际上，它们一个是通过改变货币的数量使价格回到正常水平，而另一个则是在许多人忍饥挨饿衣不蔽体之际试图造成食物和衣服短缺的局面。[61]

胡佛施行的政策中唯独有一项未被延续下来，但它却是意义非常重大的一项：罗斯福决定退出金本位制。这正是自 1929 年股市大崩溃以来，凯恩斯和费雪一直在以各种不同方式为之摇旗呐喊的那项政策。从实际上而言，退出金本位制意味着美联储将不会用抬高利率的方式来防止美元对英镑或对其他国家货币的汇率下跌。农场主和矿业工人是该政策首当其冲的受益者，因为美元汇率下降意味着他们的农作物和矿石在海外市场将更有竞争力。其他受益人还包括那些利用贷款购置房屋或者进行基建投资的企业和家庭。

1933 年 4 月 19 日，罗斯福宣布放弃金本位制。凯恩斯旋即称赞总统“作出了一项极其英明的决定。”而费雪的信心则又一次高涨起来。他在给玛基的信中写道，“我现在确信——如果我们还能相信什么的话——我们很快便会从这场大萧条中重新振作起来。”[62] 而这一次，

费雪的经济预测是非常灵验的。在罗斯福就职后一个月，美国经济便成功触底，这标志着经济全面复苏的正式开始。但另一方面，费雪在个人经济上能挽回一些损失的希望却未能实现。相较而言，向妻姐寻求经济帮助并不是最令他颜面扫地之事。如果不是哈佛大学将他在纽黑文的房子买下来并同意让他免费居住下去，他可能已经被从那里赶了出来。他在海边的度夏别墅也已经移交到了卡罗琳·哈泽德的名下。卡罗琳在她的遗嘱中还免除了他余下的债务。由于已经没有了来自股息的收入，费雪只能依靠董事费苦苦支撑度日。

1934年5月28日晚五点十五分，凯恩斯终于得以和罗斯福首次会面。数天来，凯恩斯都在没日没夜地与罗斯福的内阁成员、智囊团以及国家复兴管理局和其他官员们举行会谈，而今天他总算能与总统本人聊上一个小时。事后，他向当时已成为罗斯福顾问的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通报说，他对罗斯福说，如果把用于刺激经济的联邦支出从每月三亿美元增至四亿的话，那美国的经济复苏将会让人十分满意。[63]而总统在会见后的说法是，他“与凯恩斯作了一次非常成功的交谈，并且对他极其欣赏。”但总统也抱怨说，凯恩斯说起话来像一个“数学家”[64]。次日的《纽约时报》上又刊登了一封凯恩斯给总统的公开信，该信对总统的新政进行了赞扬，并呼吁增加政府支出从而使赤字达到国民收入百分之八的水平；如果能这样，

> 它将直接或者间接促使国民收入实现三倍或者四倍于百分之八的增长……绝大多数人都严重低估了特殊紧急支出所具有的影响，因为他们忽视了乘数效应——即个人收入增加所累积起来的效应，因为这些个人收入的增长所派生出来的消费增加将会带来另一群人的收入增长，并一直如此循环下去。[65]

次日晚，凯恩斯与欧文·费雪还有约瑟夫·熊彼特一起出席了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举办的晚宴。[66]当晚，凯恩斯阐述了他通过赤字融资为公共项目支出筹集资金的理论，其中自然包括他提出的公共项目

上的一美元支出将产生远超过一美元的累积效应的观点。尽管费雪也一直认为是货币政策的失误导致了大萧条的爆发，尽管他相信“在所有的应对措施里货币政策是最为成功的”，而且他也声称“唯有货币政策才能保证最快地使经济得以恢复”，但很显然，他经历了一次信念危机。[67] 他略显迷惑地坐在一旁一言不发。“他的报告很有趣，但对我而言——我觉得也是对其他所有人而言——它未免过于晦涩，因此也不太容易让人信服。”他后来在给玛基的信中如此写道，“他回答别人的提问和反对意见都非常有技巧，但就是有些答非所问。”[68]

随着大萧条的时间越拖越久，凯恩斯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热忱也逐渐消退。到《货币论》出版之时，他已经在开始构思一个关于失业起因的新理论。剑桥大学的本科生们是他的首批听众。在 1933 年 12 月，他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里阐述了这个新理论的要点，即“当对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的调控双双都不起作用的情况下，由政府进行直接投资以刺激经济便成为必要。这种情况有可能会出现，其实它不久前就曾出现过。”[69]

在极其严重的经济萧条中，价格下降的速度超过了利率下降的速度。因此名义上的利率下降并不能阻止实际利率出现上升。而一旦名义利率跌至零，中央银行将别无良策能使借贷的成本变得更低，或是使债务负担得到缓解，从而使萧条得以终结。由于它带来的政治后果将数不胜数，因此凯恩斯将之称为“流动性陷阱”。“利率降不下来，历史上有些帝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而走向崩溃。”[70] 凯恩斯在他的一次讲座中曾如此宣称。

凯恩斯深知他的新理论有悖于传统：

> 以往所有的教条要么不得要领，要么是有百害而无一益。我们不仅未能正确理解我们赖以生存的经济秩序，而且我们对它的误解如此严重以至于我们采纳了一些破坏性极其严重的政策。而现在，为了治愈由我们自身的误解所带来的疾病，我们又准备靠一场革命来进一步破坏现存的秩序。[71]

从美国回来以后，凯恩斯于1934年完成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初稿。1935年初，他开始将手稿交由朋友们传阅。在给萧伯纳的一封信中他写道，他相信“他正在撰写的这部经济学著作将让世界考虑经济问题的方式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虽然我不敢说这种变化会立刻发生，但在接下来的十年内一定会。”[72]

凯恩斯在新发明的理论中试图指出，在经济萧条极其严重的情况下，单纯的货币政策将难以奏效。以传统模式为基础的经济学家们就仿佛是：

> 生活在非欧几里得世界中的欧几里得几何学家。他们通过亲身体验发现，绝对平行的两条直线居然能够相交，于是他们便只能去指责那些线条不够直，因为对正在发生的这种可怕的相交现象，线条不够直是他们唯一能想到的解释。但实际上，真正的解决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将平行公理全盘抛弃，并且开创一门非欧几里得的几何学。而今天，经济学所需要的正是与此类似的东西。

他发明的新理论时时会遭人误解。他宣扬的并非是政府在困难时期应当增加支出，或者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要制造出财政赤字。比特丽斯·韦伯、温斯顿·丘吉尔和赫伯特·胡佛等人早在凯恩斯之前就都已接受了政府赤字支出的观点。他也并非在宣扬，如果每一个个人的行动都是理智聪明的话，最终的结果将会适得其反。对那个所谓的经典命题，即劳动力供应过剩或者对劳动力的需求不足通常可以用降低工资或者利率的方式加以解决，他也并不认同：

> 我们许多人从无数事件的逻辑中不得不认识到，一个制度的整体经济与每一个个人的经济有着天壤之别；他们还认为，虽然某些行动对个人的经济状况有益，但如果全社会中所有的个人都群起而效仿的话，这种行动有时就会变得如同自杀一般有害。国民收入只不过是国民消费和支出的对应物；如果我们限制消费和

> 支出，那就意味着限制我们的收入，它转而又将带来另一轮对消费的限制。[73]

凯恩斯提出的问题与哈耶克和熊彼特提出的问题大相径庭。这两位奥地利经济学家在对大萧条爆发前的经济繁荣作解释的时候，他们曾试图想弄明白经济究竟是如何发展到那一步的。而凯恩斯对导致经济困境的起因兴趣缺乏，他感兴趣的是要解开那个更为基本的难题：在一个竞争未受任何限制的自由的市场经济中，高失业率和产能过剩为什么会持续那么长的时间？

在正常的经济条件下，失业不仅从理论上说应该是暂时的，而且自十九世纪中期以来在实际上也大体如此。无论是在费雪发明的液压机中，还是在马克思、马歇尔、熊彼特等人构想的经济模型里，一次农业歉收，一场战争或罢工，一项新的发明，或者是别的能引起“震动”的事件，都能导致在需求与供给之间出现短暂的失衡，而如果这种失衡的规模相对于整个经济而言足够大的话，它便有可能导致失业。然而，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工人之间以及放贷人之间的竞争必然会使得工资和利率开始下降。这种趋势会一直持续，直到雇佣工人和投资重新变得有利可图为止。

萨伊法则，即“供给能创造其本身的需求”的理论早在十九世纪中期便已经过时。基于众所周知的每次购买都会产生一笔收入的道理，该法则假定人们赚取收入的唯一目的是将它花出去。但其实储蓄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机，甚至早在维多利亚时代，工薪阶层的储蓄率便已经非常可观了。因此，一旦人们意识到他们挣到的钱并不一定全都会被花掉，萨伊法则也就不再适用了。

斯吉多尔斯基在书中写道，凯恩斯的做法其实就是将眼光从保证市场供求平衡上挪开。相反，他放手让一些资金流向（比如收入）发挥其作用，从而决定另外一些资金的流向（比如消费）。但他全盘否定供求平衡的做法实在无法为熊彼特所接受。因此，《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之所以如此激进完全是拜凯恩斯的以下证述所赐：一个自由的市场经济完全有可能陷入工人和机器长期遭到闲置不被利用的状

态；一些异乎寻常的经济萧条完全有可能会发生，它们周期漫长，而且不会随着价格和利率的下降而自动结束。更极端的是，即使在有工人和机器闲置的情况下，自由的市场经济仍然会自发地陷入停滞不前的趋势。面对这种经济萧条，运用货币政策来解冻资金流向已经不能提供足够的刺激，因为当价格仍然在下降，即使利率已降为零，企业也不会铤而走险去贷款。同时人们也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市场需求将会很快得到恢复。让企业重振信心，让私营经济重新开始消费的唯一途径就是减税，就是让企业和个人能够保留更多的收入以便让他们将收入花出去。或者还有更好的办法，就是让政府直接进行更多的支出，因为这样就能保证这些钱百分之百都会用于消费，而不是用于储蓄。如果私营经济无法开销或者不愿开销这笔钱，那么政府就得挑起这副担子。对凯恩斯而言，政府必须时刻准备以最后消费者的身份救场，这与中央银行所起的最后贷款人的作用是完全一样的……

耶鲁经济学家詹姆斯·托宾曾经指出，费雪在 1930 年出版的《利息理论》一书中不但针对投资和储蓄提出了一套理论，他并且阐述了在短期内产量和价格是如何确定的。而在 1932 年出版的《繁荣与萧条》里，他又提出了债务在自我强化的经济萧条中所起作用的理论。但与凯恩斯不同的是，费雪从未将所有这些分散的理论组成部分综合成一个整体模型，并用它来解释利率水平、价格水平、产量以及就业率是如何决定的。

和大多数新理论的遭遇一样，凯恩斯和费雪提出的大多数建议和措施在英美两国都未能得到采纳。只有放弃金本位制一事是例外。即使如此，到了 1932 年 8 月，英国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经济也开始出现缓慢的增长。到 1937 年，日本经济已连续六年保持增长。而在经济崩溃程度和美国不相上下的德国，到 1936 年，失业现象也已经基本消失。凯恩斯也意识到了一个莫大的讽刺：通过实施大规模的赤字支出、拒付外债以及任由其货币贬值，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均实现了充分就业。日本帝国也是一样。当然，这几个国家政府的目的是发动战争，是靠对那些受害国进行剥削来偿清他们自己的债务。

而在美国，大萧条却于 1937 年穷凶极恶地卷土重来。管理上的失

误，尤其是美联储所犯下的错误是导致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1936 年，复苏期的第三个年头刚过，罗斯福便开始增税。同时，他也在逐渐缩减对公共事业振兴署等新政计划的投资。1936 年 6 月，政府向参加过一战的退伍军人统一颁发了一次性的津贴。该措施使联邦赤字陡然上升，但上升的时间是非常短暂的。而且在那之后，联邦支出便开始一落千丈。与此同时，1935 年通过的《社会保障法》创立了工资税并于 1937 年开始实施。这两项政策的时机把握得极其不妥，它们使联邦预算在 1937 年晚些时候几乎实现了收支平衡。

然而，面对严重受损的银行体系和信贷市场，美联储依然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消极态度。1935 年通过的《银行法》授权美联储，使之能对法定存款准备金的数额进行调整。于是，在 1936 年 8 月到 1937 年 5 月间，由于对超额准备金日益增加的担心以及通货膨胀的压力，美联储突然宣布将法定存款准备金的数额翻倍。此后，超额准备金的数额开始下降，而市场上的货币存量也随之减少。从 1937 年 5 月至 1938 年 6 月，美国经济萎缩的幅度达五分之一，工业产量下降达三分之一，而在此前本来已跌到百分之十的失业率又重新爬升到百分之十三的水平。而据官方统计，失业率则从百分之十五上升到了将近百分之二十，该数据没有将临时性的政府工作包括在内。股市也在狂跌，这也宣告了费雪在个人财政上的完全崩溃。

凯恩斯在 1936 年趁美国股市低迷之际曾大肆买进，而且在 1937 年股市崩溃之后并未将之抛出。因此，在挽回损失之余，他尚颇有收益。凯恩斯一度在他位于伦敦的办公室里昏倒，后来被诊断出可能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他从此淡出了公众的视野，这对他似乎颇为有益。而费雪虽然一直在继续他的写作和演讲，但他始终未能与罗斯福政府建立起他与胡佛政府曾经有过的那种融洽关系。他在公众中的信誉也和他的股票组合一样遭受了沉重打击，令人惨不忍睹。

而哈耶克和熊彼特所预言的恪守无为，经济复苏自然会到来的局面同样没有出现。结果，他们二人在学术上愈加孤立，经济的继续衰退以及德奥两国日益高涨的政治极端主义让他们沮丧不已。

但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不论是在德奥两国还是在世界别的地方，没有任何一个经济学家能提出一套让人心悦诚服的理论，能将这些风云迭起的世界危机解释清楚。由于缺乏一个统一的理论，英国的经济学家们迅速结成了两个对立的阵营：一方是由以凯恩斯为首的提倡政府干预的人士和所谓的“剑桥圆场”派组成，“剑桥圆场”派中包括凯恩斯的门徒、信仰共产主义的皮埃罗·斯拉法[①]、琼·罗宾逊[②]和理查德·卡汉。而在他们对面，则是以年仅三十的利奥尼尔·罗宾斯为首的一群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年轻自由派学者。罗宾斯是少数几个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之一，他出生于矿工家庭，并与欧洲大陆的经济学派有着密切联系，他曾经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在维也纳与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及其圈内人士进行切磋。罗宾斯不仅觉得米塞斯在社会主义可行性的相关争论中的论述非常有说服力，而且他和米塞斯一样对英美两国政府实施经济干预时的那种不可阻挡的势头而惊愕不已。

罗宾斯对英国经济学界被剑桥和凯恩斯所把持的现象深恶痛绝。他在拉姆塞·麦克唐纳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任职时就曾与凯恩斯有过激烈的冲突。他将凯恩斯视为政治上的机会主义者和学霸。但颇为讽刺的是，罗宾斯的理想是将由费边主义者创建和支持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变成一个能与剑桥的群体主义相抗衡的自由主义阵地。急于寻找政治盟友的罗宾斯注意到了冯·米塞斯的奥地利门徒，时年三十一岁的哈耶克，并于 1931 年 1 月邀请哈耶克前往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举办一次系列讲座。哈耶克在维也纳主持着一个经济周期研究学院，并对货币政策的历史做了大量研究。让罗宾斯刮目相看的是，早在 1929 年春，当其他权威人士还在发出乐观的预报时，哈耶克就已准确预言了美国的经济繁荣即将崩溃：“经济繁荣将在未来数月之内崩溃。”[74] 哈耶克后来回忆说，他的原话是，“只要利率不下降，欧洲经济就没有复苏的希望。而只要美国的经济繁荣不出现崩溃，利率就不可能降下来。而

---

① Piero Sraffa（1898—1983），英籍意大利经济学家。

② Joan Robinson（1903—1983），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女性经济学家，新剑桥学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和实际领袖。

美国经济崩溃很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内便会发生。”[75]

米塞斯和哈耶克的理论将经济萧条的发生归咎于上一次经济繁荣时期中过度的货币创造及过低的利率。他们认为这二者导致了资本分配巨大的不合理，或是如罗宾斯所指出的，“错误预期推动下的不合时宜的投资活动。”[76]哈耶克认为，该理论对经济大萧条作出了圆满的解释。在他看来，经济大萧条之所以会发生是“由于失败的货币管理政策，以及在资本主义制度的优势已被战争和政策褫夺殆尽的情况下政府的横加干预。”[77]

如果经济衰退真的是由经济繁荣时的过度投资，而不是由凯恩斯所认为的经济衰退时的投资不足所引起的话，那我们需要的就“仅仅是时间，从而通过对生产机制的适应最终找出一个长期的解决办法”，换句话说，不到过剩的生产力被完全吸收或报废，不到市场对新一轮投资翘首以待之时，我们都不应该采取行动。哈耶克认为，就像1921年奥地利遭受恶性通货膨胀时发生过的那样，“制造人为的需求”根本无法扭转资本不合理分配的局面，因此，它带来的只会是另一波通货膨胀和又一轮的经济衰退。

按照罗宾斯的说法，哈耶克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系列讲座“轰动一时”，“这些讲座内容艰深但令人兴奋……它们在学识和分析性发明双方面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威廉·贝弗里奇[①]是当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院长，也被公认是英国福利国家理论之父。他对这位“高大有力而含蓄矜持”的奥地利人的印象如此之佳以至于他当即将一个空缺的教授职位给了哈耶克。哈耶克针对凯恩斯的《货币通论》写了一篇尖刻的评论，并与凯恩思及其门徒们进行过一场引人注目的辩论。哈耶克严肃的表情，高雅的举止，以及略显忧郁的含蓄深受英国观众的喜爱。他谜一般的表情，他的无畏，以及他拒绝以敷衍潦草的方法解决问题的态度，都使人们联想起他的表兄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哈耶克为传统自由主义政策所宣扬的健全货币、自由贸易、尊重财产所有权以及经济衰退会自我愈合的观点提供了新的颇有说服力的

① William Beveridge（1879—1963），福利国家理论建构者之一。

论据。

利奥尼尔·罗宾斯于1934年出版的《经济大萧条》一书巧妙地运用了哈耶克的理论，并对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出现的经济繁荣和衰退进行了分析。（数十年后，罗宾斯在他1971年出版的《一个经济学家的自传》一书中公开改变了他的立场，并承认“他宁愿他1934年出的那本书会被人们忘掉。”[78]）罗宾斯对凯恩斯的计划进行了公开的反对，哈耶克对罗宾斯的努力给予了支持。1932年，他和罗宾斯和其他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教授们一起，共同签名支持一项平衡预算的政策。[79]

哈耶克的明星效应并未延续多久。1935年，比特丽斯·韦伯在她的日记中就曾提及“罗宾斯及其同伙”，该“同伙”指的就是“哈耶克”。日记中说“他们俩和他们的理论都跑题了，它们在现实世界中不能起任何作用，甚至与现实毫无关联。[80]她这番话无疑是对的。等到第二年凯恩斯的《通论》一书一面世，这场辩论也就结束了。整个经济学界都坚定地站在凯恩斯一边。正如哈耶克的一位朋友所言，“凯恩斯的观点比哈耶克的货币节制理论更适合当前这个通货紧缩和高失业的时代。”[81]

此时的哈耶克虽未完全销声匿迹，但他介入的学术争论却越来越少。根据哈耶克全集的编辑布鲁丝·卡德维尔的猜测，哈耶克未对凯恩斯的《通论》发表任何攻击性评论，其原因很可能是他根本没有收到为该书写评论的邀请。而相反，他的学术对手，他往日的支持者和政治盟友对哈耶克早期理论所做的尖锐批评却是连篇累牍。凯恩斯就称哈耶克1931年出版的《价格与生产》一书“糟糕得令人害怕”[82]，米尔顿·弗里德曼也称，自己“虽然是哈耶克的狂热崇拜者，但却不是出于崇拜他的经济学理论。”[83]很快，哈耶克与凯恩斯之间的交流便仅仅局限于他们对古籍的共同爱好上。

在有过三次作为短期访问教授的经历之后，熊彼特于1932年永久性地搬到了哈佛。他离开德国的主要原因并非是日益高涨的左翼或右翼的政治极端主义（纳粹在1932年的选举中一败涂地），而是因为他

一直未能在柏林获得一份教职，而且他也不想同他相处甚久的情人米亚尔·斯多科结婚。德国对他而言一直是个流放之地，并且，这里发生过他一生中经历过的最大失望和悲剧。他最疼爱的第二任妻子安妮和他母亲都是在这里去世的。

凯恩斯《货币通论》一书的出版对熊彼特是一个沉重打击。熊彼特也一直在撰写一本关于经济危机成因中的货币因素的书。凯恩斯《货币通论》的出版让他觉得他正在进行的工作已“毫无意义”。他对自己的一位学生说，“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将那本关于货币的书稿扔掉。”[84] 从他的反应能够看出，他的观点和凯恩斯和费雪的大同小异，他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能够补充的。否则，熊彼特肯定会抓住这个机会对凯恩斯的理论加以批驳，并且详细阐明自己的观点。

黑色星期四华尔街股市突然暴跌以来，德国经济发生的崩溃令人瞠目结舌。这也使得熊彼特更加忧心忡忡。随着美国投资者竞相清算他们持有的海外债券或股票，随着美国商人大肆削减来自德国的粮食进口，德国工业产量下降的幅度高达百分之四十，失业率也飙升至百分之三十以上。[85] 德国的经济萧条比美国更加严重，实际上，比其他任何一个经济大国都要严重。

1919 年，当年在面对另一场世界经济危机之际，熊彼特和凯恩斯曾提出过相同的应对措施并都为之大声疾呼。而现在，熊彼特却坚信，自己的立场与凯恩斯是针锋相对的。在 1930 年 12 月举行的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熊彼特提出，既能治愈经济萧条又能在政治上左右逢源的良方是不存在的。他的发言引起了媒体的密切关注。[86] 经济历史学家约瑟夫·多夫曼在描述熊彼特引起的反响时指出，许多人都认为，“他的发言对英美派一贯秉持的乐观主义起到了极其有益的抗衡作用。”[87]

随着时间的推移，熊彼特对货币扩张政策必定失败的信念愈加坚定。但他的这一立场又让人颇为困惑。因为在同时他又对日本于 1931 年放弃金本位制的举动赞许有加。需要明确指出的是，熊彼特在对经济萧条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对非货币因素的关注比凯恩斯和费雪要多得多，他尤其对新技术，包括推动农业发生了革命性变化的化学和机械

技术，着重进行了研究。熊彼特还认为，若想使生产力水平及生活水平获得长久的增长，前提是必须对落后过时的企业和产业进行“创造性破坏”。但在1919年的时候他不是这么认为的吗？他的极端宿命论至少在他的一些学生和同事看来是新鲜出炉的。

熊彼特还积极替遭受新当选的希特勒政府迫害的犹太经济学家们寻找工作。当时，“有些德国科学家仅仅因为他们犹太宗教信仰便被现今政府解除了教职”，熊彼特和美国经济学学家威斯利·C. 密契尔共同组成了一个委员会，并对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给予了照顾。在1933年3月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后不久至纳粹全面实行独裁统治之前，熊彼特曾在一封信中流露出日益剧增的孤立感和郁郁寡欢的心情：

> 为了避免一些容易自然产生的误解，请允许我事先声明我是一个德国公民，我不是犹太人也不是犹太人的后裔。但同时我也不是现今德国政府的全力拥护者。现今德国政府的行为与前任政府的看来颇不一致。基于我的保守主义立场，我不可能和全世界的人们一起对希特勒政府进行共同的谴责。只不过是出于对那些曾经与我共事的人们的责任感，我才会在必要的时候试图为他们提供一些帮助，以使他们能在这个国家潜心从事科学研究。[88]

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举行关于经济萧条的系列讲座期间，熊彼特一定从那里吸取了新的思想。因为一年后当他到达哈佛时，他已经在宣称，“经济学家不应四处乱提建议。”然而，就此他的学生保罗·萨缪尔森曾颇为讽刺地评论说，“他自己给别人提建议从没断过。”他还与一些声气相投的同事一起组织了一个非正式的名为“七位智者”的研讨会，他们每周讨论一次。这个包括俄国计量经济学家华西里·里昂惕夫[①]在内的小组最终发表了一份鼓吹自由放任政策的宣言，并对罗斯福的新政进行了攻击。

---

① Wassily Leontief（1906—1999），美籍俄裔，投入产出分析方法的创始人。

> 只有在经济复苏自然发生的时候，复苏才会卓有成效。任何仅仅由于人为刺激而到来的复苏将使人们为解决经济萧条而做出的部分努力前功尽弃，并在那些尚未被完全消化和适应的失调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它自身有待清除的新的失调。这便对经济造成了威胁，并使得未来有可能发生另一轮危机。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提出了经济补救措施无需借助于货币和借贷的假设。因为，货币和贷款并非问题的根本所在，这一类政策尤其倾向于使经济失调不断延续甚至愈演愈烈，并且在未来引发更多的问题。[89]

以往，熊彼特对待凯恩斯一直执礼甚恭，他对后者的观点也颇有惺惺相惜之意。但凯恩斯的《通论》刚一面世，他便发表了一篇罕见的颇带火气的评论："他的建议也许不错（大家也都清楚凯恩斯先生提的都是些什么建议）。因为，对今天的英国而言，它真的也许很不错。这样的远见卓识应无愧于我们给它如下的赞美：它突出展现出了一个正在衰败之中的文明所持的态度。"[90]

第十一章

实验：20世纪30年代的比特丽斯·韦伯和琼·罗宾逊

“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苏联的面貌绝然不同。”

——瓦特·杜南狄，《纽约时报》，1931年7月20日[1]

“当今世界上正同时进行着两个规模宏大的实验：美国的资本主义和苏联的共产主义。”

——比特丽斯·韦伯，1932年4月[2]

西方各国政府面对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都束手无策，这似乎印证了比特丽斯·韦伯在其1923年出版的《资本主义文明的衰退》一书中所提出的观点.在韦伯看来，工党之所以在大选中出人意料地落败，人们责怪政府对危机应对不力并非其主要原因，它更多的意味着“英美两国的金融家获得了胜利”。至此，残留在比特丽斯·韦伯心中对费边社“渐进主义必然性”的最后一丝迷信终于彻底破灭。[3]最初，她对苏维埃俄国抱有极端的仇视，而现在，她却将苏联视为“唯一一个在丰富了物质资源的同时也增进了人民健康和教育状况的国家”。也许是一时心血来潮，她决定她和西德尼的下一部著作将以“这个新的社会制度”为研究对象。[4]

1931年10月27日大选揭晓，西德尼从内阁职位上被赶了下来。一星期之后，时年七十有八的比特丽斯·韦伯向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该如何度过自己的晚年呢？"[5]她不知道自己的健康状况是否能允许她亲自去俄国收集材料，其实她去俄国的目的也只不过是为了使她书中的叙述更加"生动"[6]。在内心她早已坚定地认为，苏联正在进行的实验是卓有成效的，而西方的实验却远非如此。她干脆公开宣称，"毫无疑问，我们站在俄国一边。"[7]在搭乘"斯莫尔尼"号轮船前往俄国之前，她"已经为她和西德尼从俄国返回之后要开始撰写的著作拟定了一份概要"。[8]

对这场世界性经济萧条的到来，斯大林并不比凯恩斯和费雪更具有先知先觉，然而，他却抓住这个良机，争取到了为数众多的来自西方的同情者和盟友。那些声名显赫的苏联的同情者们得到的待遇甚至比普通苏共党员的还要优厚。有整整一队官方向导、翻译和司机前呼后拥地前来迎接了韦伯夫妇，并带他们开始了为期两个月的安排紧凑的参观。他们走访了工厂、农场、学校和医院，并亲眼目睹了韦伯宣称的所谓"新文明"。[9]

在伦敦的时候，自从工党政府一下台，韦伯夫妇即刻门可罗雀，以往众多的宴请、政治咨询以及来自报纸的采访也日渐稀少。但在俄国，比特丽斯却满心欢喜地感叹道，"我们似乎成了新的皇室成员。"[10]现在，我们都已知道，就在韦伯夫妇乘坐豪华轿车和特制列车出游的同时，斯大林正将乌克兰变成一个巨大的集中营。莫斯科一直靠向西方出售粮食以换取机器设备，但世界粮食价格的崩溃则意味着如今它的出口吨位需要比以往高出一倍。苏联的那位独裁者对经济事务一窍不通，有一次仅仅因为小额铸币的数量出现了短缺，他便枪毙了数十名银行出纳。他还曾下令将农业收成的一半用于出口。结果，大饥荒不可避免地降临了，它夺取了至少六百万人的生命，这相当于当时正遭受强制集体化折磨的全部农村人口的四分之一。

一回到英国，韦伯便马上开始替莫斯科帮腔，否认苏联有饥荒发生。而她的依据全部来自于西方驻莫斯科记者的报道。《纽约时报》的瓦特·杜南狄就是他们中的一位。杜南狄便曾说过，"目前没有发生饥荒，也没有人挨饿，将来也同样不会有。"[11]但杜南狄却从未离开过首

都，他只不过是苏联政府否认有饥荒发生的传声筒。韦伯的一个侄女嫁给了《曼彻斯特卫报》的记者马孔·马杰瑞吉，而马杰瑞吉去乌克兰亲自考察过一趟。韦伯不肯相信马杰瑞吉有关那里的农民在挨饿、在遭受官员们的迫害的零星报道。“从苏联回来以后，马杰瑞吉就告诉我们，那里正在发生可怕的饥荒。”在征求过苏联驻英国大使的意见之后，韦伯在日记中如此写道，“我已经就此事询问过麦斯基先生，我认为马杰瑞吉绝对是弄错了。”[12] 在她 1935 年出版的《苏维埃共产主义：一个崭新的文明》一书中，她坚持认为，“从 1929 年开始，苏联面临的其实并非饥荒，而是农民们出于对抗集体化政策而广泛开展的罢工运动。”[13]

伯特兰·罗素曾因韦伯夫妇的“国家崇拜”以及“对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过度宽容”而批评过他们。而他们对苏联政府近乎荒谬的阿谀奉承更让他觉得震惊。[14] 历史学家罗伯特·康奎斯特也曾经指责社会科学家们不但幼稚地相信官方的统计数据，同时他们对趣闻轶事也不做必要的取舍，并且他们对历史也一知半解：他们根本就没有知识背景，更别提“对古代奴隶制帝国，对十六世纪千禧年分离主义，以及对中世纪来自亚洲的征服者”有何“感想”。[15] 凯恩斯将共产主义称为“一种能唤醒我们内心禁欲主义精神的宗教”，他的这一说法也许是对韦伯夫妇为苏联大唱赞歌最合乎情理的解释。[16] 在步入八十高龄以后，韦伯有了一个新的信仰。正如马杰瑞吉曾经抱怨的那样，“即使你用事实也无法让她改变观点。”[17]

虽然凯恩斯和韦伯一样“极端蔑视正式的工党”[18]，但其实他和罗素一样都是一个传统的自由主义者。他将苏联与法西斯德国相提并论，而且对斯大林深恶痛绝。他在 1937 年还曾预言，“如果时势需要，他（斯大林）与德国也能达成协议。这绝对不是在耸人听闻。”[19] 曾经有人请他为纪念韦伯八十寿辰而出版的文集写几句话，他的回答是，“我脑子里自然而然冒出来的唯一一句话是，‘正因为韦伯夫人是一位非苏维埃政治家，她才得以幸存并活到了八十高龄。”[20]

凯恩斯倾向于将他剑桥生活圈子里的那些年轻的共产主义者及他们的同志视为业余爱好者，他们身上的狂热不过是些无伤大雅的癖好

或者一时的头脑发热。他觉得意识形态不应该成为妨害友谊和学术研究的原因。毕竟，他对他们的理想主义精神和勇气还是非常欣赏的。他曾于 1939 年大胆地指出，“如今，在自由党以外的政治人物中，除了那些三十五岁以下在战后出生的那一代知识型的共产主义者，其他人都不值一提。”虽然受到了共产主义的蒙蔽，但“他们的资质绝对超群脱俗”，浪费了实属可惜。[21]

后来在凯恩斯的剑桥弟子中最为出名的琼·罗宾逊应该算得上是凯恩斯所称的“知识型共产主义者”中的一位。凯恩斯曾经写道，“这些年轻一辈中的某些成员最符合典型的英国绅士形象，他们举止严肃拘谨，不信奉圣公会教，他们参加过十字军东征，掀起过宗教改革，抵御过 1642 年至 1660 年期间的大叛乱。在上一世纪，他们还为我们争取到了公民权和宗教权，并使工人阶级的处境得以人性化。”在写下这一段话时，他的脑海中一定有着琼·罗宾逊的影子。[22] 罗宾逊骨子里有着与生俱来的矜持，同时她也有狂热和斗争的天性。罗宾逊原名琼·维尔莱特·莫莉丝。她家族的前辈大多是军官、大学教师、政府职员以及持不同政见者。她母亲是从不认输、永远年轻的海伦·马什夫人。1812 年，马什夫人的先人，英国前首相斯宾塞·珀西瓦尔遇刺身亡，国会为他设立了一个信托基金，而马什夫人成为了该基金的受益人。她的曾祖父，F.D. 莫利斯，曾是一位著名的大学激进人士，并且还是马歇尔·阿尔弗雷德在格洛特俱乐部的相识。他后来放弃了在剑桥的教职，原因是他拒绝认同圣经中关于“永久堕入地狱”的说法。[23] 她的父亲弗雷德里克·莫利斯少将也曾因为公开指责首相劳合·乔治在一战期间对公众撒谎而牺牲了自己在军界的前途，他后来转而成为了一名战地记者和军事历史学家。他担任过两所伦敦大学学院的院长，并撰写了十九部著作。罗宾逊的舅父，爱德华·马什，曾长期担任丘吉尔的私人秘书。他的所有闲暇时间不是用来创作蹩脚的诗歌，就是用来替崭露头角的年轻作家和艺术家们作宣传。这些人中包括鲁珀特·布鲁克[①]、西格里夫·萨松[②]和邓肯·格兰特。连罗宾逊的丈夫也不得不承认，头脑简单幼稚的人在他夫

① Rupert Brooke（1887—1915），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战争诗人”的代表。

② Siegfried Sassoon（1886—1967），英国作家。

人的家族面前常常会“心生惧意”。[24]

与韦伯一样，罗宾逊不得不进行了一番自我改造。虽然她生于名门世家，住的是别墅豪宅，受的是上层社会的私立教育，但自幼传输给她的那一套却是应如何相夫教子，而不是如何追求属于自己的事业。但是，年方十四的她便已充满梦想，书卷气十足，性格内向而羞赧。她想象中的世界似乎比她四周的那个真实世界更加生动，更加逼真。她不停地写作，写散文、故事，还有诗歌。她急需一位知音能去海德公园的诗人角将她的诗作高声朗诵给人们听。

1918 年，莫利斯事件让国会忙得无暇他顾。该事件既为她赢得了自豪，同时也带来了痛苦。即使按照英王爱德华七世时代的标准，莫利斯少将也是一位与儿女关系疏远淡漠的父亲。他坚信人们的一切感情都是自私的。在被迫离开军界之际，他在给孩子们的信中写道，他自己“坚信他所做的事是正确的，而一旦满足了这一条，对一个人来说，其他 所有的便都已不重要了。”他还补充道，基督之所以教导他的信徒们为了追随他就必须摒弃他们各自的父母和儿女，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他的女婿奥斯丁·罗宾逊就曾注意到，“只要是与他手头正在进行的工作不相关的事，他便丝毫都不会注意到，就仿佛它们是反射在墙上的一道影子一样。”[25] 甚至有一次，琼的妹妹南希在滑雪的时候跟在他们的父亲身后，她过桥时滑了出去，结果倒挂在了峡谷的悬崖边上。最后幸亏一位路过的滑雪教员才将她救了下来。

虽然她的家庭与剑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罗宾逊却是莫利斯所有四个女儿当中唯一一个进了大学的。在当时，上大学获得高等教育对一个上层社会的英国女孩来说仍被认为是画蛇添足。如果不是因为罗宾逊获得了奖学金，在当时父亲被迫退休的情况下，他们替这个与父亲一样固执己见的女孩支付学费也许都会成问题。她被剑桥大学历史最为悠久的女子学院——格顿学院录取。因为该学院仿中世纪的建筑形式以及它被与其他男校远远地隔开，小说家 C.S. 刘易斯将它比作霍勒斯。沃波尔[①] 哥特式小说中的奥托朗托城堡。[26]

---

① Horace Walpole（1717—1797），英国作家、历史学家。

在 1920 年至 1921 年那场痛苦而持久的经济衰退期间，罗宾逊尚在圣保罗女子学校就读。她曾去伦敦的一家社会福利中心从事过自愿服务工作。1922 年夏末，当她前往剑桥之时，持续日久的经济衰退已进入了第三个年头。当时的失业率高达两位数，这促使罗宾逊放弃了自己在圣保罗女子学校时最心爱的专业——历史。她开始转而攻读经济。正如罗宾逊的传记作家之一，玛乔丽·特纳所说的那样，罗宾逊的家族在当时的社会中高高在上，占据着特权地位，而贫困和失业成为了那个社会的瑕疵。因此，她觉得有必要对这些现象作一番深入的了解。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剑桥仿佛成了布卢姆茨伯里的富庶郊区。虽然 T.S. 艾略特、罗杰·弗莱、G.E. 摩尔以及约翰·凯恩斯等人常常在此出没，但在许多事情上女性学生都不得越雷池半步。无数的清规戒律在限制着女性师生们同住在校区附近的学术天才们进行思想上的沟通和交流。尤其是那条禁止她们像男性一样穿学袍上课而要求她们必须穿裙子戴帽子的规定就同其他众多此类规定一样，无时无刻不让她们觉得自己低人一等。当伯特兰·罗素计划前往历史第二悠久的女子学院——纽南姆学院举行讲座时，校方负责人闻讯之后顿时惊慌失措，他们先是威胁要撤回对罗素的邀请，继而又颁布了一纸禁令，严禁“年轻女学生在校内任何场所作为他的陪同”[27]。而阿瑟·庇古，这位接替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任教的杰出经济学家，他的所有女学生们，包括罗宾逊在内，都只能将自己的论文递交到庇古的门房，而那些男生们则可以将论文直接交到他本人手上。当然，后者因此便有很多机会受他的邀请留下来作一番长谈。还有学生会。学生时期的凯恩斯就是在那里练就了他日后与首相们进行辩论时所倚仗的唇枪舌剑。但该组织除了在楼上的画廊之外，其他场所一概禁止女性涉足。至于剑桥座谈会，也叫剑桥使徒会，也是同样的情况。与罗宾逊同年的哲学家弗兰克·拉姆塞最初就是在这里被他后来的恩师凯恩斯和罗素发现的。甚至连凯恩斯个人用于培育明日之星的苗圃——星期一政治经济俱乐部，也只向那些受到邀请的男性开放，女性则不在受邀之列。

罗宾逊无缘得到名师的点拨。相反，校方为她指派了一位衣着颇为不俗的来自纽约的年轻女教师。她父亲是一位香水生产商兼银行家。

当时才二十多岁的马乔里·塔潘在为美国参加巴黎和会的经济团队工作了两年之前，她曾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过经济。她自称在那里获得了博士学位，但该校却没有相关记录。罗宾逊对她憎恶之极。这种敌视究竟是因为塔潘是一名美国富翁而且来自生意人的家庭呢，还是因为塔潘的名望不够分量呢？真正的原因我们已经不得而知。罗宾逊从塔潘那里学到的似乎只有她抽烟时的习惯，那就是用一个长烟嘴将烟套上，而且在与学生谈话时老拿着它指指点点。

罗宾逊听过庇古关于经济理论的讲座。虽然次数不是很多，她也听过凯恩斯宣讲当今的经济形势。但从她本科时写的那些论文丝毫看不出她后来会取得那么大的成就。在剑桥的第三年，她向马歇尔俱乐部提交了一篇题为《美女和野兽》的论文，该文充其量是个靠模仿拼凑而成的大杂烩，但这篇面貌可爱的论文证明了她不仅颇为透彻地掌握了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而且还颇能写作。但与她的一些男同学正在悉心钻研的学术课题相比，她选的题目则显得过于幼稚而且缺乏意义。凯恩斯的得意弟子，当时同样是二十一岁的弗兰克·拉姆塞，已经就凯恩斯的概率理论发表了一篇令人惊讶的论文。他还针对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写了一篇力道颇足的评论。此外，他还为凯恩斯主持的《经济杂志》写了一篇文章，揭穿了当时红极一时的被视为是经济灵丹妙药的所谓“道格拉斯社会信用体系”，并指出该体系的基础前提完全是错误的。

虽然入学伊始颇为顺利，但罗宾逊的本科学业却是在悲伤的泪水中结束的。1924 年，她参加了经济学“优等考试”的首部分考试，接着，第二年又参加了第二部分考试。在前后两次考试中，她的成绩均属二流，她获取大学研究员职位的希望因此而落空。她对这个结果“大失所望”[28]。直到多年以后，她仍在为“她曾经受到的糟糕教育”而沮丧不已。[29] 灰头土脸的她回到了伦敦的家中。那年秋冬两季，她都在“痛苦的状态”中住在伦敦东区的一间脏兮兮的房间里。她平时在一家政府的房管办公室工作。[30] 她的感觉如此差劲以至于她不得不向父亲求助。她请他帮忙打听在美国是否有更好的机会，比如说能不能在哈佛的姐妹院校——拉德克里夫女子学院拿到奖学金。但来年春

天，她却决定还是用那个最传统的方式来解决女性在事业上进退维谷的矛盾。1926 年 5 月，在总罢工爆发前夕，为了选购婚礼所需的服饰，罗宾逊和姐姐南希一起来到了巴黎。

她的未婚夫是一位三十二岁外貌端庄的剑桥教师，奥斯丁·罗宾逊。他父亲是位身无分文的教区牧师，而他本人却曾在一战中担任过水上飞机驾驶员并曾立功受奖。在聆听了凯恩斯 1919 年的一系列抨击巴黎和约的讲座之后他如遭电击，兴奋不已。在那之后，他立即将自己的专业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经典文化研究转成了经济学。聪明、干练而且极其用功的他应凯恩斯的邀请加入了后者主持的星期一晚上的政治经济俱乐部。凭着出类拔萃的成绩他拿到了经济学的学位，并被推选为剑桥大学考波斯·克里希蒂学院的研究员。琼尚在读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他已经在开课讲授货币经济学了。但他们俩成为一对儿还是在琼离开剑桥去伦敦以后。

尽管奥斯丁爱琼爱得神魂颠倒，但琼却一直犹豫不决，她拒绝了他第一次求婚。当时的他英俊聪颖，正直善良，并且受人尊重。而且当她明确表示想拥有一份能挣钱的职业时，他似乎也并未觉得这是个潜在的威胁。当然，听到她对未来生活的那些惊人的设想之后，他也并没有笑逐颜开。数年后，她的文坛好友，斯蒂薇·史密斯，求她帮忙为她的小说设想一段情节，罗宾逊便帮她想了一个，讲的是一个女孩夹在她的两个追求者中难以取舍，而其中的一位追求者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年轻人，他有份不错的工作，并许诺将给她一个“颇为传统的生活”。而这样的生活“却不是她内心所向往的那种”[31]。对婚姻而言，这样的开始并不是一个好兆头。

“我梦寐以求的就是能继续留在剑桥。”结婚以后，奥斯丁曾经向她坦承。[32] 然而，尽管有凯恩斯的推荐，他想在剑桥或是英国的其他大学谋到一份带薪教职的希望仍然十分渺茫，原因是根本就没有空缺。这时，印度北部瓜利尔公国的一位年迈的王公去世了，这位王公死前对英国有着偏爱，他执意为他的孩子们取了“乔治（George）”和“梅（May）”的英式名字，并坚持要为他们专门从剑桥聘请老师。而他去世之后留下的一个年仅十岁的后嗣此时正急需有人教诲。当琼从

友人的父亲那里得知这一消息以后，她立即催促奥斯丁去申请这一职位。这样，在他们等待英国国内有职位空缺出来的日子里，他还能挣到一份数倍于普通英国教师收入的报酬。

于是，这对新婚夫妇婚后的最初两年便是在一座古老的城市中度过的。该城市位于印度德里与孟买之间的干线上。这里有着“宽敞的街道，雕刻精美的楼台、门户和带花格的窗户。有清真寺也有佛寺，还有众多新盖的和年代久远的宫殿。”[33] 虽然琼与她家庭的关系非常亲密，但能有机会自由行动仍让这对新人欣喜万分。在瓜利尔的生活通常是在清晨和骑兵们一起陪同那个男孩骑马，在中午时分上课学印地语，然后是打网球、读报，还有在晚饭前去俱乐部来杯鸡尾酒。由于交由她役使的仆人多达十几个，琼便有充足的时间去当地的一所中学兼授经济学课程。有人委托奥斯丁写一篇关于印度在英国未来税收中所占比重的文章，琼为该文的写作做了大量工作。但与此同时，她却仍念念不忘替丈夫在剑桥谋到一个终身讲师职位。她也为自己究竟能从事些什么工作作了大量思考。[34] 有一段时间，她曾打算开一家从事印度手工艺品进口的公司。

罗宾逊丈夫的三年家教合同于 1928 年底即将到期。那年 7 月，罗宾逊独自返回了剑桥。她打算亲手将他们撰写的报告交上去，并利用她的关系为奥斯丁的回归铺平道路。她过去曾是，日后也都一直是一个积极进取，从不言弃，善于营建人际关系的人。到 1930 年 5 月，奥斯丁终于被授予了永久全职讲师的职位。而此前，也就是奥斯丁开始撰写他第一本书之前，他们一直都在依靠他们的存款度日。也正是一直等到这个时候，罗宾逊才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到自己的事业上来。

印度的经历和婚姻生活让她重新拾回了自信，而奥斯丁更为她打开了通向大学社团的方便之门。丈夫的成功以及他与包括凯恩斯在内的学术泰斗们之间建立起的友谊让她觉得非常满足。但由于她本身不具备研究员资格，而且获得学位时的成绩也并非十分优异，因此她只好花五英镑弄了一张硕士学位的证书，并且传话出去说她有意为本科生提供有酬的辅导。她常不由自主地意识到，自己仍然是个圈外人。对于这场知识的盛宴而言，自己不过是个旁观者，而非参与者。贵宾

桌、研究员专室以及各类社团，所有这些都因为她的性别而与她无缘。

然而，美国股市发生崩溃之后，所有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其中有两件事尤为关键。

在奥斯丁等候 1929 年至 1930 学年年度任课安排的间暇里，罗宾逊出席了一个研讨会，并因此得知凯恩斯在剑桥的弟子们正在为一个理论难题绞尽脑汁。该研讨会的组织者，皮埃罗·斯拉法[①]是位自学成材的带些神经质的杰出经济学家。他是一名共产主义者。为了逃脱墨索里尼的统治他于 1927 年离开了意大利。他曾写过一篇文章，呼吁对现有经济理论进行修补和改进，从而使它能对现代经济中的垄断因素，如巨型公司的崛起还有品牌、广告等有所反映。该文章让他得到了凯恩斯的青睐。在以往的经济学家们所假设的竞争市场中，围绕某些基本相似的产品存在有数量众多的买方和卖方。在这种情形之下，没有任何一家企业能够单独对它生产的产品价格施加影响，就如同农民无力改变谷物的市场价格和矿工无法改变银子的价格是同样道理。然而，现代的公司企业却能复制出垄断地位，为了能实现价格操纵他们甘愿下大血本。斯拉法认为，这种情形就颠覆了竞争最主要的理论根据，即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能以最低的成本实现最大可能的产出。而这便为政府进行干预开启了大门。当务之急是需要有一个理论。斯拉法和另外几个人正以不同的方式着手进行这项工作。

与此同时，罗宾逊与凯恩斯“最心爱的学生”理查德·卡恩成了好友。这位相貌英俊黑眼睛的正统派犹太人成了她的盟友和合作伙伴。卡恩的天赋如此出众以至于在他仅仅接受了不到一年的经济学培训的情况下，凯恩斯便将他招至门下并让他参与协助对《货币论》一书的修改。能和一位在知识上和思想上比自己优越得多，并为自己悉心崇拜的男人交流，这实在令人欣喜若狂。[35]她开始对奥斯丁评头论足，说他不过是匹拉犁的孳马，而相比之下斯拉法却是只老虎。而对卡恩的不成熟、自恋及行为异常，她也常常顾左右而言他。此前，她已见识了一些大场面，而现在她迫不及待地想要粉墨登场了。

---

① Piero Sraffa（1898—1983），英籍意大利经济学家。

一日，奥斯丁、琼和卡恩一同共进午餐。在席间，奥斯丁针对斯拉法的理论挑战建议了一个课题。于是，在1930年至1933年期间，在她的情人——卡恩的帮助和支持下，琼挺身而出接受了这一挑战。琼和卡恩创立了一门理论，它告诉人们，在一个名义上自由竞争的产业中（即市场中有为数众多的买方和卖方而且不存在进入市场的壁垒），企业是如何通过广告、品牌和产品创新等手段行垄断之实的。它们凭借其市场势力欺诈顾客，榨取巨额利润，压挤雇员数目和工资水准。他们不再像以往那样靠最大限度地降低对顾客的销售价格和最大限度地增加产出和雇佣工人数目为赢利手段。在经济大萧条的历史背景之下，罗宾逊坚信自己一定能解释清楚，为什么在诸条件都非常理想的情况下，自由市场经济仍然倾向于产生长期性的失业、产能过剩和经济停滞问题。

随着罗宾逊的自信日益高涨，她的抱负也愈加远大。1931年3月，罗宾逊对卡恩说，“我正琢磨着将所有这些内容写成一本完整的书……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写，而是你、奥斯丁和我三个人合作。”[36]她像将军指挥自己的部队一样分配着任务，奥斯丁写导言，卡恩负责提出问题并编写数学方面的索引。而书的初稿则由她负责撰写。六个月过后，罗宾逊请丹尼斯·罗伯逊[①]为她的书作序。罗伯逊是一位声明卓著的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合作者，同时更是厂商理论的专家和权威。她告诉罗伯逊，她已写完了前面的五章，接下来的十章她在心里也已经有了大致轮廓。正如Aslanbeigui和Oakes这两位传记作家所共同认为的那样，很显然“罗宾逊是打算以自己一个人的名义出版这本书”[37]。在接下来一年半的时间里，罗宾逊和卡恩在该书上花费了大量心血，以至于没过多久罗宾逊便将该书戏称为她的“噩梦”。

与此同时，与卡恩合作让她终于打入了凯恩斯的核心圈子。1931年上半年，凯恩斯一直忙于应付外界对他《货币论》一书的各种批评，尤其是来自哈耶克的批评。同时，他也在为自己的学术思想理清头绪。这些思想后来逐渐成熟并被纳入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

① Dennis H.Robertson（1890—1963），英国经济学家。

那年1月到5月间，包括斯拉法，卡恩和奥斯丁在内的一帮剑桥的年轻经济学家以“圆场”为名充当起了凯恩斯的传声筒。罗宾逊参加了他们每星期的例会并开始通过卡恩向凯恩斯传递便笺。“凯恩斯扮演的俨然是道德剧中上帝的角色，”另一位亲身参与者曾如此回忆，“他自始至终操纵着整部剧的演出，却几乎从未在舞台上露面，而卡恩扮演的则是天堂的信使，他将凯恩斯的旨意和问题传达给‘圆场’的成员，然后再带着我们的讨论结果飞回到天堂去。”当时，凯恩斯正试图对历史上最为惨痛的一次经济危机作全面的了解。[38] 对罗宾逊而言，这些例会为她提供了了解凯恩斯最新思想动态的上佳机会，同时也让她充分磨砺了自己的分析能力。

她这一新的身份对她获得第一份正式大学教职究竟有无帮助，哪怕是暂时的帮助，人们已不得而知。但总之，她被授予了一个助理讲师的职位。她那年的一位学生后来回忆说，“当时的琼风华正茂，精力充沛，而且美丽动人。”对她的讲课他是如此描述的，“她的讲课充斥着深奥艰涩的名词术语，虽然我几乎什么都听不懂，但却像中了邪似地坐在那儿。”[39]

尽管在大学任教占用了她的时间，但她的书稿仍然在1932年10月完成。她的传记作者们众口一词地写道，至此，她所有的犹豫都早已烟消云散，她要将此书归至自己名下。[40] 丈夫、妻子和情人，他们三人利用剑桥一天之内五趟的递信服务进行沟通交流，就如同现代社会中的夫妇们相互送电子邮件一样。罗宾逊在给奥斯丁的一封报捷短信中写道：

> “我终于发现了我这本书的意义所在。直到昨天我才恍然大悟。我所做的一切正是皮埃罗在他那篇著名的文章中所说的必须要做之事。从企业已成为垄断者的论述开始，我已将价值理论整个改写了一遍。以前，我一直都觉得我的书是替未来的某些天才所准备的工具。自始至终我都是一个人完成了所有的工作。”[41]

在此之前，她一直认为自己只是一名教师。“以前我觉得‘我必

须告诉这些人经济学家们是怎么考虑问题的。'——而现在，我才真正觉得自己也成了一名经济学家，我终于可以告诉他们我自己的想法了。"[42] 她对卡恩说，奥斯丁会觉得她"变了个样，因为我已经完全恢复了我的自尊"。如今，她认为自己已成了他们三人中的领军人物，最富有创意的思考者和指引方向的天才，对此她毫不含糊其辞："在过去两年里，你，卡恩还有我三人一直在经济学的领域里互相帮助。然而最终是我拨云见日有了大的发现。这本书理所当然是我的。"击败男人之后的洋洋自得之态溢于言表。

而此时，卡恩正疯狂地爱上了罗宾逊。时至1931年，他们俩之间的情人关系时断时续，这让凯恩斯深为忧虑。他担心自己得意门生的事业会受到影响。这种关系也让罗宾逊十分紧张，她惟恐这桩丑闻会使她唾手可得的学术成就前功尽弃。奥斯丁这时去了非洲，并要在那里呆六个月，而琼固执地要求卡恩为了治好他的"爱情之疾"也同样离开剑桥。卡恩因此决定用一年的时间前往美国游历。留在剑桥的罗宾逊形单影只，她承受着沉重的压力。她觉得自己几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她只得疯狂地工作以早日完成她的书稿。在她开始对书稿进行校对的时候，卡恩正在芝加哥大学为她的书宣传造势。后来成了苏维埃间谍的弗兰克·科当时是芝大的博士生，而卡恩劝他将琼尚未出版的研究成果加进他的论文中去。紧接着，卡恩还传回一个爆炸性的消息。一位名叫爱德华·张伯伦[①]的年轻哈佛教授即将出版一本题为《垄断竞争论》的书，该书与琼写的书有内容重叠之处，而他的书将早她六个月面世。在2月，卡恩访问了哈佛，在那里他举行了一场讲座，而讲座的时间恰好是张伯伦的新书发行的前一天。他在讲座中宣称，相较而言，罗宾逊的理论和分析技巧更为出色，当时在观众席上的张伯伦并未就此作出有效的反驳。罗宾逊从卡恩那儿得知了他和张伯伦的交锋之后，在1933年3月2日给卡恩的回信中她曾如此承认："在得知张伯伦的才华并不出众之后，我有一种邪恶的喜悦之感。"她还说，她会在她书的序言中"提一句"，表明她对张伯伦写书一事毫不

① Edward Chamberlin（1899—1967），美国经济学家。

知情。她还曾考虑过要争取凯恩斯的同意，让她在他的《经济杂志》上写一篇针对张伯伦的书评。但后来她“思之再三，觉得那个主意不好”，她觉得“应该等她的书出版以后再来对付他”。[43]

让琼失望的是，凯恩斯对“不完全竞争理论的兴趣不大”，人们无法说服他并让他相信，垄断是导致有效需求出现周期性不足的一个主要因素。[44] 虽然凯恩斯事先给麦克米兰公司的出版人提了醒，说他们未必会觉得这本书很有意思，但他还是催促他们将该书尽早出版。《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于 1933 年秋终于面世。罗宾逊的这本书一鸣惊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外界对该书的佳评如潮，有些甚至对她极尽溢美之词。在卡恩的授意之下，熊彼特也立刻行动起来为她的书作宣传。此前他就已称她是“我们这群人中最出色的人物之一”[45]。在他为她写的书评中，他对她“名副其实的独创”赞不绝口，他的结论是，这本书毫无疑问将使“她成为经济该领域内的理论权威，甚至是该领域的第一人。他将她排在了卡恩、斯拉法以及张伯伦的前面。”[46]

与卡恩和斯拉法相比，罗宾逊有一个巨大优势。他们二人都深受写作障碍之困，斯拉法的焦虑症尤其严重，他甚至无法授课。而她呢，不但能言善辩，而且一旦她觉得自己有话要说，她还能将文章写得天花乱坠。她也因之成为了她的学科领域内最高产的作家之一。在完成了对书稿最后一遍校正之后，她便一头扎入一系列的文章和评论当中去了。

《不完全竞争》一书出版后不到半年，琼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你过得真不赖啊！”她的朋友多萝西·嘉利特曾羡慕地对她说，“先是在经济学上有了个大发现，现在又添了个女娃娃。”[47] 罗宾逊为评论界对她的交口称赞而欢欣鼓舞。那年 9 月，当卡恩因为凯恩斯新书的缘故前往英国的蒂尔顿工作之际，她在给他的信中颇为冒失地问道，“你说梅纳德会不会愿意让我为他的这部新书写段序言，以阐明他的观点在哪些方面发生了变化？”[48] 鉴于此前她与凯恩斯的大多数交流都是通过卡恩或者信件进行的，她的这一建议非常需要勇气。就是在“圆场”的所有成员当中也仅有卡恩一人凭借其乘数理论在凯恩斯的新理论中占了一席之地，考虑到这点，她的勇气就更是显而易见的了。毫无疑

问的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她赢得了凯恩斯的尊重。数年后，凯恩斯承认，罗宾逊“无疑是剑桥最拔尖的五六位经济学家之一，这其中还包括庇古、斯拉法、卡恩以及凯恩斯本人。”[49]

苏格兰记者安德鲁·博伊尔，曾于1979年成功揭露了安东尼·布朗特是剑桥五名臭名昭著的苏联间谍中的第四人。据博伊尔声称，罗宾逊是剑桥首个共产党支部的创始人之一。该支部的组织者原本是经济学讲师莫里斯·多布。1931年，他很快将他的学生金·菲尔比发展为成员，此人后来成为了替苏联克格勃效力的最著名的英国间谍。[50]但曾与罗宾逊有书信往来的博伊尔并未就他的这个说法提供任何证据来源。杰弗里·哈科特曾与晚年的罗宾逊相识，他认为她对斯大林的迷恋和崇拜，即他所谓的她被“激进化”的时间，最早能追溯到1936年。[51]

那一年，罗宾逊的思想的确是在一种剧烈躁动的状态之下。1936年年中，她就约翰·斯特拉奇出版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一书写了一番评论，斯特拉奇认为苏联模式的中央计划是医治经济大萧条的灵丹妙药，对此她提出了批评。虽然她没有像凯恩斯那样称斯特拉奇的逻辑是“对我智力的一种侮辱”，但她也指出，他将主流经济学理论中的不足与经济体制中的致命缺陷混为一谈。“我们不能仅仅因为有经济学家发表了一些谬论，就果真起来将现行制度全盘推翻。”她不无讽刺地评论道。[52]

但短短六个月之后，罗宾逊的信仰便似乎发生了改变。她将资本主义描述成“这样一种制度，它使那些为数众多，缺衣少食的人们的有效需求不断下降，它只会用限制产量的笨拙手段来应付失业的威胁；除了军备和武器，它不能为困难落后的地区提供任何其他帮助”。她承认，虽然马克思主义者宣传的教义也许难逃“过于简陋”之诟，但它至少没有扼杀“最基本的常识”。确实，她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医治“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圆滑世故”的一味良药。[53]

1936年5月，她的朋友嘉利特夫妇介绍琼认识了一对从叙利亚的阿勒颇古城前来剑桥访问的夫妇。当时的情形颇似阿加莎·克利斯蒂

的畅销书《东方快车谋杀案》中的场景。多拉·克林伍德是一位英国风景绘画家，她父亲不仅是位著名的考古学家，还是一名艺术家，他还曾经担任过艺术史学家约翰·罗斯金的秘书。克林伍德的丈夫恩列斯特·阿托彦是名医生，他是名英籍亚美尼亚人。多萝西·嘉利特将他描述成“一个奇怪但非常有吸引力的人，在他的情感水准面前，我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个没见过世面的乡下人。”当时他已年至不惑，虽然眼睛近视，两鬓斑白，但“他仍有着漂亮的额头和鼻子”[54]，低沉委婉的嗓音，以及各式各样充满罗曼蒂克的朋友，其中包括儿童文学作家亚瑟·兰塞姆和T.E.劳伦斯，也就是阿拉伯的劳伦斯。由于后者刚刚在一场车祸中不幸身故，阿托彦告诉罗宾逊，为了纪念他们之间的友谊，他正想找一家出版商来出版他为这位刚故去的朋友创作的一部史诗。罗宾逊主动提出想读读这部作品，然后再将它推荐给她叔叔。阿托彦大喜过望，同时也格外感激。他们之间由此开始了信件往来。那个月月底，他暗地里写道，她是“我有生以来在英国遇到过的最可爱的人儿”，每次与她相见“都令人陶醉”。[55]

阿托彦喜爱跳舞，他的一个女儿曾说，“他的整个人生都像是在跳舞，如果他无法这么做的时候，他的情绪便会变得异常郁闷和沮丧”。他还有躁狂抑郁双向情感障碍。他开始从阿勒颇给罗宾逊写来篇幅冗长且漫无边际的情书。而与此同时，罗宾逊则在为阿托彦的那篇诗歌做校对。埃迪·玛尔西，凯恩斯和十几位其他文学界的友人都认为认为这首诗写得糟糕透顶，但罗宾逊却不为所动，她坚持了下来。最终，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在她数番纠缠之下终于同意将该诗出版。

次年3月12日，在阿托彦的长诗正式出版前一个月，琼从维多利亚车站登上了东方快车。独自旅行的她此时正怀着两个月的身孕，她看上去很像克利斯蒂小说中的家庭教师玛丽·德贝汉。她吃早餐和唤侍者给她添咖啡的举止显得非常利落，看得出她对世事和旅行都十分内行。据他的判断，“她是那种无论去哪里都能轻而易举照顾好自己的女人。她很沉着，很能干。”[56]在叙利亚的阿勒颇，琼与阿托彦又一次相聚。之后，她又继续前往巴勒斯坦的雅法和提庇留。

4月14日，在回程中她与他又单独会过一面。这时，眼瞅着他整

天围着一个杂乱无章毫无快乐可言的家庭在转，她已开始意识到这位情人在自己眼中所拥有的魅力也许只是出于自己的想象。外界对他的诗歌《荣誉的装饰》的评论寥寥无几。但《巴勒斯坦邮报》却对他颇为拥戴，并将他称为“小丁尼生①”[57]。回到剑桥之后，与奥斯丁和理查德·卡恩的三角关系重新又成为了她感情生活的焦点。“若是生活在一个不同的时代，她也许会骑上骆驼去穿越沙漠。”经济学家弗兰克·哈恩曾经如此评论她，“她天生就有高人一等不愿随波逐流的个性，她有一种要从人群中脱颖而出的迫切需求。”[58]

在她第二个孩子出生之后一年，也正是希特勒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之后数星期，罗宾逊患上了非常严重的躁狂症。她去疗养院修养了数月。当她终于出院时，奥斯丁已被指派到英国政府部门从事与战争相关的工作，因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们俩难得见面。她的同事们一个个都接到了征召令。后来连卡恩也不得不离开了剑桥。他最终被派遣到开罗，并在那里度过了战争期间的绝大部分时间。而罗宾逊却在剑桥留了下来。

① Alfred Tennyson（1809—1892），英国诗人。

第十二章

经济学家的战争：凯恩斯与弗里德曼[①]在财政部的较量

“战争时期，我们会从富足的时代倒退到一个匮乏的时代。”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

战争的爆发为哈耶克和凯恩斯重归于好提供了机会。他们二人都曾经希望能够避免这一场战争，但他们谁也没奢望有谁能接受希特勒提出的所谓“和平”条件。他们二人也都曾经盼望并且坚信美国将参战。哈耶克说，“如果美国不参战，那么等到德国最终崩溃之时，欧洲的文明会已经被摧毁殆尽。”[2]他们皆视这场战争的目的是自卫，不仅是为了保卫英国，同时也是为了保卫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以来所取得的成果。1940 年 12 月，在剑桥艺术剧院举行的一场为难民募捐的义演上，凯恩斯告诉台下的观众，单是在剑桥就生活着上千名德国人。他说，如今存在着“两个德国”：

“在这里有一个流亡者的德国，它标志着这场战争并非国家之间或是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之间

① Milton Friedman（1912—2006），美国经济学家，货币主义大师。

> 的战争……在这场疯狂的但又无法逃避的斗争中，我们的目标并不是要征服德国，而是要改变它，要将它拉回到西方文明的怀抱。而西方文明体系的基础则包括……基督教伦理、科学精神和法治。只有有了这些基础，才可能有个人的生活。”[3]

1940 年夏，纳粹德国开始了对伦敦的大轰炸。这时，凯恩斯和哈耶克的通信往来已经持续了数月。他们在信中讨论了如何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转移到剑桥，如何帮助犹太学术精英从纳粹控制下的欧洲逃脱，以及怎样营救那些在 1940 年 6 月巴黎沦陷后的大恐慌中被当作“敌对国侨民”关押的外国同事。10 月，凯恩斯在国王学院以贵宾室和贵宾餐桌之礼接待了哈耶克。凯恩斯在剑桥一直以来享受着长周末的待遇，而这次，他却利用周末的时间与哈耶克一道多次光顾位于剑桥艺术剧院拐角处的古籍书店 G.David，并且聊了一些趣闻逸事。

更令人惊讶的是，战争使哈耶克和凯恩斯在经济政策的大辩论中站到了同一阵营之中。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哈耶克都将凯恩斯以宽松货币和赤字支出政策应对经济大萧条的建议称为“替通货膨胀做宣传”。甚至有一次，他还在私下称他这位对手为“公敌”[4]。然而时至 1939 年，哈耶克开始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赞美凯恩斯。令他一些左翼的朋友和学生深为懊恼的是，战争使得凯恩斯转而反对通货膨胀的经济政策。

发生了什么事呢？因为形势变了。一战结束以后，英国几乎完全解散了它的陆军和空军部队，因此在短期内想要在军事上赶超希特勒德国就必须从 1937 年起大幅增加政府开支。一方面由于担心提高税率将使已高达百分之九的失业率变得更加严重，而另一方面，重整军备在当时并不得人心，因此以内维尔·张伯伦为首相的英国政府决定不增税，而是选择了发行政府债券，即向公众打白条的办法。结果，甚至在还未宣战之前，英国欠下的国家债务便已爬升到了令人瞠目的高度。1939 年 9 月公布的第一份战争预算所预计的赤字高达十亿英镑，或者说它将相当于英国国民年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五，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巨额的赤字支出起到了惊人的效果。经济迅速繁荣起来，尤其是在英国南部。那里为数众多的港口和基地正被扩展，而且还在大肆兴修生产军需的工厂。这俨然就是凯恩斯早在1933年便曾为之大声疾呼过的治疗方案。只不过它已姗姗来迟。尽管如此，它似乎仍替凯恩斯的《通论》一书正了名。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英国财政部曾一直顽固地拒绝采纳凯恩斯的建议，而现在他们总算接受了“凯恩斯主义”。对此，也许有人以为凯恩斯会为之志得意满。但其实，据斯基德尔斯基的说法，他的担心和不满反而变得日渐强烈。政府在欠下巨额债务的同时又通过印钱增加货币供应量从而将利率维持在较低水平，这无异为未来通货膨胀的发生埋下了种子。鉴于此时，战争已经成为现实，情况只会越变越糟。凯恩斯断然否认自己的立场有任何改变，而是形势发生了变化。1933年的失业率曾经高达百分之十五，而1939年它已降至不到百分之四，并且仍有继续下降的趋势。工业界甚至已开始抱怨熟练技工和工程师供不应求。凯恩斯曾经提出了富足经济学的理论以解决经济萧条时存在的普遍需求下降现象。而现在，他又将同样的逻辑运用于另一种绝然相反的情形：即战时的需求过度。

一战之后，通货膨胀性质的战时财政及巨额债务带来了经济和政治极度混乱的严重后果。1939年11月中旬，凯恩斯在伦敦《泰晤士报》上先后发表了两篇文章，并以此正式推出了“凯恩斯计划”[5]。为了填补财政支出和税收之间存在的四到五亿英镑的资金缺口，他建议在战争时期征收所得税。它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所征收的税款在战后将予以退还。这就使凯恩斯能像熊彼特在1919年曾经做过的那样，将他的征税计划美其名曰“强制性储蓄”。数月之后，这些文章以《拿什么为战争买单》为名被集书出版。斯基德尔斯基指出，这些文章清楚地表明，“在凯恩斯看来，预算就是实施经济政策的工具。”[6]哈耶克给了凯恩斯最为热烈的支持。继凯恩斯之后，他也在《观察家》杂志上就前者的提议发表了一篇特约专栏，事后他还特意给凯恩斯去了一封短信：“我们对短缺经济学的理论认识完全一致，这真太令人欣慰了。我们唯一存在的分歧只是它在什么时候才适用。”[7]

凯恩斯很清楚，自己已时日无多。1937年，他曾经有过一次严重心脏病发作，被迫提前退休并回到了蒂尔顿。在以后的两年中，妻子莉狄亚给了他精心的照料，同时，他还服用了德国产的某种有奇效的良药。但德国征服世界的野心终于迫使他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山。

在希特勒旨在摧毁英国皇家空军的不列颠战役爆发前夕，凯恩斯回到了英国财政部。人们没有给他安排“任何固定的事务和具体的上班时间”。虽然他没有“固定的头衔，但他却是各重要委员会的成员。”[8]作为首相，温斯顿·丘吉尔，这只英国最后的雄狮，对这场抵抗希特勒的战争的财政状况花的工夫甚少，更无暇顾及战后的经济筹备工作。因此这些便都成了凯恩斯的职责所在。他成了丘吉尔在二战期间事实上的财政大臣。1919年，当凯恩斯满怀激情地对凡尔赛和约进行猛烈抨击的时候，他曾经警告过世人，“我敢预言，假如胜利者执意要让失败者陷入贫困破产的境地，那么报复将是无法避免的”。事实被他不幸言中了。斯基德尔斯基写道，凯恩斯的“首要目标”便是要让同盟国“比上一次干得漂亮些。”[9]

在法国令人震惊地沦陷之后，英国只得独自面对德国这个战争的恶魔。财政部和凯恩斯日思夜想的便是如何才能筹集到足够的资金以便继续抵抗下去。希特勒靠一连串的对外征服从而避免了将德国经济转入全面的战时状态，而与此同时，英国却严重缺乏进行持久战所需的财力。作为侵略者，希特勒能决定何时发动进攻。迄今为止，他的闪电战略通过对受害国的残酷掠夺而解决了其军费来源。而英国却只剩下了最后两条路：一是接受希特勒的“和平”条件，也就是遭受和法国同样的屈辱。此时，虽然凯恩斯政治生涯的导师劳合·乔治正准备充当爱德华国王身边佩当元帅的角色，而左翼人士也在大张旗鼓地彻夜为和平祈祷，但这一选项是英国的选民们无论如何都不会接受的。而另一条路则是将财政审慎置之脑后，不管会给战后带来何种后果，也要一心一意地去赢得战争。尽管凯恩斯明白后一条路才是正确的选择，但他始终在为琢磨出一个更为明智的办法而绞尽脑汁，他想尽量

减轻这些不良后果的严重程度。和丘吉尔一样，战争让他重新振作起精神，他“兴致勃勃，跃跃欲试，并且欣喜无比”[10]。正如他在给朋友的信中所言：“在这里，我仿佛就是一个循环小数，在同样的紧急关头同样的地点干着同样的工作。”[11]

从1940年8月开始，凯恩斯每日都在辛勤工作，有时一天甚至伏案长达十八个小时。办公地点经常是在财政部的地下掩体内。和坚持留在伦敦并且在第一轮空袭期间仍然每天都赶来剑桥的哈耶克一样，凯恩斯也丝毫不顾危险。他全然不信德国会大举入侵英国，他希望他的藏书和藏画都能逃过这场劫难。此时他已属于政府内部的核心人士，他不但能“接触到各种最核心的机密”，而且因为首相办公室就在他办公室的隔壁，他甚至能轻易与首相接触。因此，与一战时相比，他在制定英国财经政策上所拥有的影响力早已今非昔比。但尽管已成为内部人士，他叛逆的本色也依旧未改。尽管已人到中年，功成名就，而且还患有心脏病，但他对国王学院一年级新生们的低效并未有更多的包容，同样，他在《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中所发泄出的怒火也没有丝毫减弱。正如那句老话所说：“对手里正拿着一把锤子的木匠来说，所有的东西看上去都像钉子一样。”对凯恩斯而言，在所有问题面前，他都比被委派承担这项工作的人更有资格，也更能胜任。从关税到啤酒税的各项事务，他无不插手，有时甚至罔顾事实，并且也因之得罪了不少人。有一次，他甚至给当时正常驻埃及的理查德·卡恩寄去了一份全面改组埃及运输系统的计划。

其实凯恩斯的工作和上一次大战期间的大同小异，都是要想方设法从美国人的钱包里弄到钱。1941年5月初，在美国正式参战之际，美国是否应该派军舰为运往英国的军用物资护航引发了激烈的辩论。在此期间，凯恩斯以英国特使的身份在华盛顿特区停留了十一个星期。这是他第三次来美国，以往的两次旅行“都让他先是大病一场，然后身体才逐渐康复”[12]。但此番他放弃了一直以来他最喜爱的跨大西洋旅行的方式——“玛丽女王”号豪华邮轮。这次他选择了乘坐泛美航空跨大西洋的远程客机。当时，德国的U型潜艇正在北大西洋肆意横行，被它摧毁和击沉的英国船只的数目每月高达六十艘。坐飞机虽然

相对安全一些，但其实最终也没快多少。一踏上纽约拉瓜迪亚机场的停机坪，面对众多已经在那里等候的新闻记者，凯恩斯在发言中首先展望了一番在未来伦敦和纽约之间将会有当天往返的班机的美好前景，接着他便开始了对美国孤立主义者的大肆抨击。

他在讲话中指出，如果德国获胜，那就意味着美国将永远失去与欧洲旧大陆的所有联系。“美国经济在现有基础之上将根本无法运转。其后果之严重不堪设想。”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同意他的这番说辞。头号孤立主义者，来自蒙大拿的参议员伯顿·惠勒就嘲笑他说，“美国人民对外国人将我们拖入战争的企图深恶痛绝。他们将自己的国家弄得一塌糊涂，却还好意思为我们提供免费的建议，并对我们该如何管理自己的国家指手画脚。”[13] 该参议员所说的“一塌糊涂”，指的是英国已经无力付账。由于英国已全面转为战时经济，因此，尽管它已不能通过出口赚取硬通货，它仍然需要用硬通货来支付所需的进口物资。英国驻美大使洛锡安勋爵，就曾经直言不讳地说，“好了，伙计们，英国已经破产了，我们要的就是你们兜里的钱。”但美国财政部却不相信堂堂不列颠帝国竟会出现黄金短缺。[14]

一战结束之后，美国人对欧洲大陆上兄弟阋墙的战争及其所带来的生命和财富损失抱有极其强烈的反感，以至于当德、俄，还有后来的英法两国都在积极重整军备的同时，美国却在实行单方面的裁军。虽然美国仍然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海军，但它的陆军却只剩下一个区区二十万人的“空架子”。它空军的全部家当也只有一百五十架战斗机。1941 年，美国的国防开支不足其年收入的百分之二，而且，美国法律禁止向任何外国政府出售武器装备。1934 年通过的《约翰逊法案》就是特别针对英国而制定的。该法案禁止向任何尚拖欠一战债务的国家出售武器。

法国沦陷以及 1940 年 6 月英国远征军在敦柯尔克险些全军覆没，这些都迫使美国人对时局进行了重新估价。即使那一年是选举年，但已经没人能继续否认，德国，尤其是在它与苏联缔盟之后，已经形成了对美国巨大的潜在威胁。希特勒不但拥有庞大的造舰和建造飞机的计划，而且一直在与佛朗哥政府眉来眼去，以期获得在西班牙西部的

德军基地。而这一举动的矛头无疑是指向美国的。因此，美国国会迅速通过了一项价值四十亿美元的军需开支计划，并且确立了到1941年底将“美国军队”的人数扩充至两百万人的目标。

尽管如此，重整军备的目的仍被说成是将严格用于“半球防御”[15]。绝大多数选民都坚信英国难以逃脱战败的命运。正如历史学家阿兰·密尔沃德所指出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美国重整军备的决定使英国战败的可能性不降反升。英国向美国的军火商们订购了价值二十四亿美元的军需品，包括船舶、飞机和车辆，此项订货数量之大足够那些军工企业忙上数年的时间。而现在，这批订货面临着与美国政府的订购发生撞车的危险。

租借法案源自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灵感，凭借这一策略，他让美国可以避免直接参战，但同时又能帮助英国继续战斗下去。与他派驻英国的大使约瑟夫·肯尼迪和许多其他顾问不同的是，总统认为，如果能从美国得到足够的支持和帮助，英国能够也必然将赢得战争的最终胜利。当时，共产党和美国第一委员会等反战组织，以及英国战时内阁的两位成员还有肯尼迪大使，都在呼吁交战双方进行谈判。然而，丘吉尔在敦克尔克大营救期间发表的“我们决不屈服”的演说让罗斯福更加坚信，“伦敦与柏林之间绝不会有那样的谈判。”[16]

武装英国起到了重振美国经济的作用，并且开始使失业率下降。唯一的问题是，由于英国不能再依靠出口赚取美元，所以武器输出无法再按美国原先要求的以现购自运的方式继续进行。丘吉尔在他给美国总统的“求救信”中对这些都一一作了解释，但他一直等到1940年11月罗斯福连任成功时，才将该信发了出去。[17]罗斯福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对此信作出了回应，他对记者们说，“保卫美国最好的办法就是帮助英国成功地自卫。”[18]他也没忘了提醒美国公众支援英国所能带来的经济利益。为了阐述他的观点，他打了个比方，“假若你邻居的房子着火了，而你有一根浇水用的水管，你肯定不会试图将水管卖给你的邻居；相反，你会把水管借给他，并且告诉他灭了火之后把它还回来。我现在正打算做的就是……将代表着愚蠢和自私的旧的美元符号去掉。”[19]他如此表示。无论英国需要何种武器和物资，美国都将倾其

所有提供给它，而所有这些费用都将由美国纳税人先行支付。作为交换，英国必须承诺在赢得战争胜利之后会将这些费用全部偿还。12 月 29 日，德国轰炸机将伦敦市中心的金融区炸成了一片瓦砾，在当天夜里的“炉边谈话”广播中，罗斯福宣布，“我们务必充当民主国家的兵工厂。”[20]

由于罗斯福需要七十亿美元的启动资金，他的此项建议因此需要国会的批准。反对者指出，租借法案将不可避免地刺激德国对美国发动攻击，从而将美国拖入战争。还有一些人认为，那些运往英国的武器装备在英国无法避免地战败之后，会通通落入德国人之手。但最终总统的意见还是占了上风，国会于 1941 年 3 月 10 日通过了该项措施，同时通过的还有一项禁止派遣美国海军舰只进入交战水域的修正案。

丘吉尔为租借法案的通过而大声欢呼，并称之为“历史上最诚信的法案”。诚然，该法案的通过预示着价值五百亿美元的船只、飞机和粮食将开始源源不断地从美国的工厂和农场里被生产出来，但同时它也预示着美国把给盟国的贷款视为纯商业运作的一贯态度已寿终正寝。当然，该法案也不是没有附带条件的，而凯恩斯则决心不让这些加在英国身上的条件过于苛刻。

白宫将租借法案送往国会征求最后批准刚过一天，英美两国便已开始就此发生了分歧。原因是该法案只适用于在它正式生效以后所进行的采购，而并不适用于所有在此之前的采购。丘吉尔坚称，为了替以往的订购支付订金，“我们已经耗尽了全部的财力资源”[21]。他从中挑出一项极其严苛的条款，并且就此抱怨说“我们不但会被刮掉一层皮，而且可能连骨头都保不住。”[22] 为了证明他们确实急需帮助，英国本应该先用完它所有的美元存底，然后才能开始寻求租借法案的援助——事实上，就是替修建那些即将为英国生产武器弹药的美国工厂买单。这就意味着英国要拱手交出自己剩下的最后一批少得可怜的黄金存底。为了搬取英国保存在南非的一批价值五千万美元的金条，美国特意派遣一艘驱逐舰前往南非的开普敦。该法案还要求英国在眼下的弱市中出售其所持的美国公司及英国公司在美国子公司的全部股票。

在租借法案通过之前的数星期，来自英国财政部的代表一直驻扎在纽约，他每星期清算拍卖掉的英国股票组合的价值高达一千万美元。他甚至还由此发现了一套操作窍门，以至于在战后他还能用它来谋取商业利益。

凯恩斯坚信，美国绝不会坐视英国成为又一个维希法国而无动于衷。然而，他无法领会的是美国人不想卷入战争的决心同样坚定。而这部租借法案，正是为了在这两个目标之间取得协调而精心设计的。罗斯福不但在竞选中早已许诺，“我绝不会把你们的孩子送到外国去打仗”[23]，他还再三向国会保证过，除非遭到敌国率先攻击，否则美国绝对不会参战。来自左右两个阵营的批评者们都指责他背地里一直有挑衅敌国的行动，但最新的证据表明，一直到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前，总统仍然抱有能够避免参战的最后希望。“那一天也许终究会到来，德国人和日本鬼会干些蠢事将我们也卷进去，”他曾对助手们说，“对我们来说，唯一真正的危险是由于他们不慎擦枪走火而导致我们不得已而参战。”[24] 从一件事上能清楚地看出总统在参战这件事上的确心口如一。当凯恩斯来到华盛顿特区时，美国正在严密注视由破谜机破译出来的情报，该机器是英国人在那年 4 月提供给美国的。而美国使用该机器的目的并非是为了捕获德国的潜艇，而是为了规避它们。[25]

凯恩斯指责美国“对我们比我们对那些最穷最不负责任的巴尔干国家的态度还要恶劣”。他还称，若不是英国据理力争，“我们也许连自主行动所需的起码的资产都保不住。”[26] 而美国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不让英国对租借法案过于依赖，美国还将决定英国偿付数额的大权掌握在美国手中。凯恩斯作为英国首相的特使到华盛顿来的目的就是试图为租借法案通过之前的那些订购谋求更优惠的融资方式。他的目标是将英国的外汇储备额增至六亿美元。而美国最为警惕也是最欲提防的正是英国打着租借法案的幌子而行替自己囤积现金储备之实。

凯恩斯与罗斯福的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的首次会面整个谈崩了。凯恩斯矜持的学者气派让美国的部长恼怒不已。凯恩斯建议美国财政部将英国在租借法案通过之前为其订货所付的七亿美元订金退还给英国。这显然违背了总统对国会许下的租借法案只适用于未来订购的承

诺。凯恩斯见过罗斯福本人两次，第二次是在1941年德国撕破与苏联的和约并入侵苏联之后。这一次，他以英国最一流的豪华地产作抵押并以高昂的利率筹集到了一笔贷款，这使英国能够将以低价出售其资产的行动延后。

凯恩斯主义在战争的头两年得到了全面实施。靠赤字经济支撑起来的军备建设收到了巨大成效。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大量剩余失业人口的就业问题也一并得到了解决。所有这些成果都是在经济大萧条时期人们千方百计费尽心机都难以企及的。在年轻的经济学家们看来，早先凯恩斯借助于货币政策恢复全面就业的努力是失败的。但如今的形势却令人信服地证明，英国经济的确是在按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所预言的那样运转。时至1941年，凯恩斯主义的信仰者们已如蛋糕里的葡萄干一样在华盛顿的战时政府中触目皆是。

战争初期的一次成功预测让华盛顿的一群年轻凯恩斯主义者声名鹊起。为政府战时生产委员会提供咨询的绝大多数企业家们都认为，美国经济的生产能力“极其有限”。他们对武器和物资生产是否能像总统所希望的那样迅速地成倍地增长表示怀疑。但物价管理局的凯恩斯主义者们的想法却大不一样。在凯恩斯来华盛顿访问期间，他们曾就此征求过他的意见。而凯恩斯则露了一手他的绝技，即用极其有限的数据做出迅速而随性的估计。“那么，1929年的实际产量相当于1914年的几倍呢？”他问道，“好，这两者之间相隔十五年，而现在我们距离1929年又过了十二年，那我们就暂且采用那个增长率的十二分之十五吧……我觉得这样一个目标还是较为合理的。”[27] 物价管理局的那些预测家们对此也都无异议。凯恩斯的逻辑是，鉴于从一战开始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失业率在长期内一直都维持在较低的平均水平。对于研究在需求没有陷入困境的情况下经济究竟能以多快的速度增长，这是一个绝佳的指标显示器。事实证明，他和物价管理局的预测者所作出的预测惊人的准确。正如物价管理局的一位工作人员所言，“美国政府中信仰凯恩斯主义的派系已经成功替自己正名。”[28]

1941年，凯恩斯主义者在四个最主要的新政部门中都占据了主

导地位：它们分别是全国农场主联合会、全国规划协会、预算局以及全国资源规划委员会。在财政部内部他们也有一伙人。其中的一些人在罗斯福政府中已被提拔为高官，并已开始在经济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发挥影响。他们当中包括物价管理局副局长约翰·加尔布雷思、美联储主席马里纳·斯托达德·埃克尔斯、罗斯福六位行政助手之一劳克林·柯里，还有财政部部长亨利·摩根索事实上的办公室主任哈里·德克斯特·怀特。凯恩斯昔日的反对者们如今渐渐觉得也许他们能与凯恩斯合作，而同时，他以往的一些最狂热的支持者们却对他日益失望。在柯里家举行的一次晚宴上，数位年轻人试图说服凯恩斯，他的“凯恩斯计划”并非拯救美国的正确方案。官方公布的失业率仍保持在两位数，一些产业依然面临着产能过剩的局面。削减支出、提高税率以及其他一些严厉措施只会使目前的形势更加恶化。远在经济实现全面就业之前，这些措施也许早已将经济复苏的势头扼杀殆尽。但凯恩斯毕竟是对的，他的立场也始终没动摇过。尽管如此，他后来也曾说过，“那些年轻的政府官员和顾问们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们个个能力出众，精力充沛。”但同时，他也觉得，“他们身上的犹太人作派太过明显。”[29]

约翰·加尔布雷思来自加拿大农村，但他的言谈举止却活脱脱像个英国中世纪的领主。他常对人说，凯恩斯主义是经由他的母校哈佛传到华盛顿来的。[30]其实，很多其他院校对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的传播也起了桥梁的作用，它们中间包括威斯康星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城市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耶鲁大学，当然还有芝加哥大学。

不久前刚从芝加哥大学博士毕业的米尔顿·弗里德曼没能参加在劳克林·柯里家举行的晚宴。但时至1941年，这位未来里根时代反凯恩斯货币主义的领军人物在当时财政部年轻的凯恩斯主义者当中却是最为出色的一个。而后来的事实也表明，在对凯恩斯主义进行改造并使其变得在美国切实可行这方面，他所做出的贡献居功至伟。

弗里德曼是一对蓝领匈牙利犹太移民的后代。他父母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在纽约布鲁克林安顿了下来，而他正好是在一战爆发前出生

的。父母在拉威市的缅因街开了一家小店铺，他从小就在店铺的楼上长大。拉威是新泽西州一个小型工业城镇，它坐落在纽约和费城之间的铁路干线之上。关于拉威，最值得一提的便是乔治·默克于 1903 年将他的化工厂搬来了这里。弗里德曼亲眼目睹了他父母的辛苦创业，他们尝试过一连串的生意，包括开过冰淇淋店，但都先后失败了。他母亲一手撑起了整个家庭，父亲不幸在他四十九岁时因为心绞痛而过早地离开了人世。那年弗里德曼才十五岁。上高中的时候，他读了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写的成长纪事小说《人间天堂》，书中有关于普林斯顿大学的描写。小说的主人公艾莫瑞·布莱恩拥有一位迷人之士所能拥有的所有天赋：个性，美貌，魅力和高雅，总之他有征服现代男人以及令所有女性着迷所需的全部能力。虽然弗里德曼与他并不是非常相像，他身高不足五尺，戴眼镜，而且并不富裕，但他至少在布莱恩极为看重的一个素质上很有发展前途，即“在智力上他毋庸置疑要高人一等”。[31]

在弗里德曼的世界里，这意味着他要成为一位精算师。出于这个想法，这位高中辩论赛的冠军选择了去罗格斯大学，而不是普林斯顿。在罗格斯大学，由于经济萧条的爆发，同时也因为受到当时的年轻教师及未来的美联储主席阿瑟·伯恩斯的影响，他放弃了会计专业而转攻经济学。为了维持他本人学习期间的经济开销，弗里德曼卖过焰火，为别的学生作过考试辅导，还替别的学生代写过论文提要。1932 年毕业之后，他作了一次横跨全美国的自驾旅行，然后才前往芝加哥大学报到。芝加哥大学的教师们虽然内心里都渴望改革，但他们对改革普遍都抱着“怀疑，务实和负面”的态度。而且低阶层的犹太人在芝大入学障碍也相对较少。[32]在第一学年度结束的时候，他与罗丝·迪雷科特邂逅并且相识。罗丝是他学校某位教授的妹妹。他带她一起去了当时正在芝加哥举办的世界博览会，二人也由此坠入了爱河。

三年后，他修完了全部课程，同时也用光了所有的积蓄。而此时，罗斯福实施的新政“救了他一命”[33]。整个 1935 年夏天，他都望眼欲穿，希望能获得一份讲师的教职，但希望最终都落了空。因为当时不但空缺的教职少得可怜，而且社会上的反犹思潮使他的希望变得更加

渺茫。如果不是他的教授为他争取到了一个在华盛顿的研究职位，他或许将不得不放弃他自己选择的专业而回去搞会计。然而他对罗斯福新政的热情却是实实在在的——罗丝那位极端保守的兄长便能证明弗里德曼“对新政的极度偏爱”[34]。于是，他立刻动身前往华盛顿，并由此见证并参与了一个“新秩序的诞生”。而这个新秩序给社会带来的变化将是全方位的。[35]

他新的工作岗位，全国资源规划委员会，是罗斯福在其首届任期之内成立的十几家计划署之一。当时，“计划”一词非常时髦，制定农业生产目标，确立在不同国家的不同的销售价格，还有最低工资。诸如此类的建议，它们并非源出于斯大林的经济理论，而是来自于英国的费边派和工党人士。事实上，新政的筹划者们主要是建立了国民收入账户，并对未来的产出和就业形势作出了预测。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一直在游说英美两国政府，建议它们仿效股份公司的年度损益表并且建立一个国民收入账户体系。如果没有一个可靠的手段能准确衡量每年的经济产量多少，它以工资、利润、利息和房租的形式究竟创造了多少收入，如果无法了解家庭、企业和政府究竟花了多少钱，或者购买了哪些商品，那么企业和政府的行为和决策就必然是盲目的。以往，在生产和需求之间失去平衡的时候，人们根本无法感知它，更无法了解失衡所达到的规模。由于当时尚只有桌式计算器，设置国民收入账户便成了一项令人头痛而且费时的力气活。于是，一项新的规模巨大的政府公共工程诞生了，它的受益者就是那些学经济学的研究生们。弗里德曼在芝加哥时的同学之一赫伯特·斯坦恩曾经有过这样一个估计，华盛顿经济学家的数目在 1930 年时仅有一百来人，而到 1938 年，这个数字一下蹿升至了五千余人。[36]

交代给弗里德曼的任务是构建第一个有关消费者及其购买行为的大型数据库。虽然他干的是纯粹统计性质的工作，但他后来取得的许多杰出成就无不从他的这段经历中受益，其中就包括为他赢得了 1976 年诺贝尔奖的“永久收入假说”。该假说解释了为什么在面对一次性减税或其他意外收获的时候，消费者们花钱不如在永久性减税或其他收入能持续增长的情况下来得大方。

两年之后，开始于 1933 年的经济复苏不但距完全恢复时日尚远，甚至还出现了经济倒退。弗里德曼离开华盛顿前往在纽约的全国经济研究局赴任。在那里，他加入了由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西蒙·库斯内兹组建的一个小组。库斯内兹当时正在构建美国第一套完整的国民收入账户。弗里德曼不但要负责填补缺失的数据，而且还要对那些从事个体经营的从业者的收入作出详尽细致的估算。

在研究过程中，他惊讶地发现，虽然自希特勒 1933 年在德国上台以来，为数众多的犹太医生以难民身份涌入了美国，然而，在这其间的五年里，行医执照的数目并无显著的增长。职业协会利用权力对外来者进入他们的领域设置重重障碍的做法使他义愤填膺，因此，他针对职业注册制度的弊端写了一份措辞严厉的控诉信。他自己首当其冲受到了权力的打压和报复。由于数位与制药业关系密切的全国经济研究局董事会成员从中作祟，他所负责研究的最终出版被拖延长达三年之久。与此同时，他也在扪心自问，所有这一切都值得吗？“世界都要分崩离析裂成碎片了……而我们还坐在这里研究什么平均值，标准差和职业收入。”1938 年，他在给他他未来的小叔子亚伦·迪雷科特的信中说，“但是，（不干这些）我们他妈的又还能干什么别的呢？”[37]

那年夏天，他终于与罗丝·迪雷科特成婚。罗丝和她兄弟一样脾气急躁，精力旺盛，思想也很保守。1941 年秋，他第二次回到了华盛顿。在此之前，他刚刚完成博士学业并且好不容易才在威斯康星大学找到并逐渐适应了一份学术工作。在威斯康星大学，支持中立和反犹主义的情绪占据了绝对主流。这对年轻夫妇只能寄希望于美国迟早会参战，并以此来安慰自己。一直等到希特勒对他的苏联盟友开始发动了进攻，弗里德曼夫妇为即将再一次前往华盛顿而欣喜若狂，因为那里有非常重要的战时工作需要他们去完成。那年夏天，弗里德曼与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名公共财政专业的教授共同完成了一篇题为《通过征税避免通货膨胀》的论文。该教授还成功地将他招收到了财政部下属的税务研究处。在华盛顿首次露面时，弗里德曼的身份尚是一名统计师。而现在，他已胸有成竹，并准备在经济政策的制定上发挥重要的作用。

在敦克尔克溃败发生之后，鉴于美国卷入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罗斯福政府已开始未雨绸缪，积极为参战作资金准备。当时，美国经济已正在向支持欧洲盟邦的方向转型，国会也即将通过另一个新的刻不容缓的军备建设法案。由于经济正逐渐向战时的支柱产业倾斜，它带来的副作用也不期而至：通货膨胀又重新出现了。1940 年到 1941 年间，消费者物价指数猛然上涨了百分之五，这是自 1920 年至今在一年之内有过的最大涨幅。虽然相较今天的标准而言这远不值一提，但在当时，如此高的涨幅却足以让人们回想起一战结束后的那段通货膨胀和抗议物价飞涨的痛苦历史。同时，人们还能回忆起其后接踵而至的经济萧条。而当时，人们曾普遍认为，经济萧条是物价上涨带来的直接后果。

一战期间，美国的税收足以支付华盛顿三分之二的开支。而剩下的资金则是通过发行债券筹得的。政府通过借贷来弥补税收和其开销之间的缺口，这个推论听似合理。但也仅仅是合理而已，其实，它是错误的。绝大多数的“借贷”实际上就是改头换面地增印钞票。新近刚成立的美联储不断督促它属下的商业银行，让它们将钱贷给顾客，以便他们用来购买政府发行的战争债券。而为了增加自己的资金存底，这些银行又转而向中央银行伸手借钱：

> 人们能够轻易将美联储的贷款贴现，比如说他们可以用借款作抵押再向美联储借钱，但其实用作抵押的那些借款是用政府债券做的担保。结果，虽然美联储积存的货币和存款增加了二十五亿美元……但这个数字中只有不到十分之一代表的是直接购买政府发行的证券，而其余的则都是对下属各银行提供的信贷。[38]

货币供给规模的急剧扩展所造成的后果便是通货膨胀汹涌而至。对农民、矿工以及房地产开发商而言，通货膨胀一直意味着战时的经济繁荣将疯狂地延续下去；然而当美联储将利率调高之后，批发物价指数猛然下降了百分之四十四，经济转眼间便由繁荣期进入了衰退。共和党人沃伦·哈丁在竞选中打出了“让生活回归正常”的口号，他

凭借它在政治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并最终成功入主白宫。对于民主党的财政官员来说，怎样避免这一幕在未来重新上演，成为了二战结束之后他们需要研究的首要课题。

弗里德曼一家搬进了离杜邦圆环不远的一处公寓，从这里能走路到财政部的大楼。部长秘书有一位助手，财政部长的助手哈里·德克斯特·怀特，性格强悍固执，他正因为形势不妙而怒气冲冲。“形势快要失控了。”在一次有关通货膨胀问题的会议之后，他对加尔布雷斯说，“你得赶紧了。”[39] 财政部长此前已命令税务部准备一份关于重组联邦税务体系的计划。在华盛顿，在讨论应该如何对付通货膨胀的时候，人们几乎无一例外要就下面问题进行一番辩论：“在工资及物价管理与税务政策二者之间，究竟采用哪一个对付通货膨胀更为有效。”而最终，罗斯福政府采取了双管齐下的策略。

通过实施选择性的价格管制来制止“物价攀升，生活成本上涨，谋取暴利以及通货膨胀”等现象的出现，这项政策自 1941 年 4 月便已开始正式实施，物价管理局便是由此应运而生[40]。伯纳德·巴鲁克曾向一个国会委员会指出，“我不赞成搞零碎的物价限制，我认为你必须先针对整体价格体系设定一个上限，并将工资、房租，以及农产品价格包括在内……然后，如有必要，再视情况将各不同物价表中的价格分别上调或下调。”[41] 从那以后，国会便将在绝大多数产业内管制价格和工资的大权彻底授予了物价管理局。

最初，财政部与物价管理局对税入总额的估计颇有出入。巴鲁克认为，应该让政府拥有更多干预企业的权力，因为这将降低对增税的需求。但 1942 年最高价格法案颁布以后，这两个政府机构才开始就税务达成了一致。而弗里德曼的第一项任务便是估算出需要多少税款才能有效控制通货膨胀。

1942 年 5 月 7 日，弗里德曼第一次出席国会听证会。他提出了一项八十七亿美元的“能成功预防通货膨胀的增税计划”[42]。弗里德曼效法了凯恩斯捍卫其 1940 年的凯恩斯计划时所用的推理。他指出，在政府需求和大众的家庭收入双双大幅上升的时候，我们必须对消费者的支出作出限制，这样才能避免数量大增的货币在市场上争相购买产

量并未出现相应增加的消费品。弗里德曼对国会委员会直言相告，“税收是所有手段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如果我们不立即大力运用这一手段，单靠其他的办法我们将无法预防通货膨胀的发生。”在弗里德曼开列的名单中，其他相对次要的手段包括“价格管制和定量配给，对消费者贷款予以管制，削减政府支出，以及大肆发行和推销战时公债。”[43] 弗里德曼丝毫未提及货币的作用。后来在 1953 年，当他回顾自己在战时从事过的工作时，他将那次疏忽的原因归结于受“当时凯恩斯主义者风气”的影响。[44] 然而，弗里德曼的确曾经是一名美国的凯恩斯主义信仰者，他的这一立场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才有了转变。

当时的弗里德曼对凯恩斯主义深信不疑，他倾向于视所得税为比销售税“在预防通货膨胀上更为有效，同时，他也视所得税为分摊战争开支的更为合理的一种方式。”这无疑是一个倒退。[45] 那年夏天，他帮助提出了一份消费税计划，目的是通过该计划从而避免提升所得税的税率。怀特显然被弗里德曼这一针对消费而非收入进行征税的想法吸引住了。他建议将消费税与凯恩斯设立强制储蓄账户而且不到战争结束不得动用的建议结合起来。财政部就此计划开会进行了激烈讨论，最终的表决结果是十六票反对一票赞同，但财政部长莫根索决定支持怀特，并将该计划递交给国会。但结果是它在国会乍一露面便被否决。在这次尴尬的经历中，弗里德曼第一次领略了要在国会通过一项计划所必须面对的诸多挑战。这其中包括为他的上司们准备在国会的发言稿，以及日后亲自去国会山出席国会委员会的听证会。

毫无疑问，对任何税务计划而言，关键在于如何征收税款。而弗里德曼正是在这一关键之处在政府中留下了自己永久的印记。1942 年之前，前一年应交的所得税都是每季度一次分四次缴清。在纳税时限到来时，纳税人完全得靠自己筹集纳税所需的款项。无论对纳税方还是收税方而言，这种方式都无伤大雅，但这却需要满足一个前提条件：税率必须很低，而且纳税人所占的人口比例不是很大。1939 年，只有不到四百万人报税，而所征得税款的总额尚不足十亿美元，这个数字大概只相当于应纳税收入的百分之四。弗里德曼一家在美国家庭中能跻身于收入最高的百分之二，但他们税单上的应付税额却只有区区

一百一十九美元，这连他们应纳税收入的百分之二都不到。1955 年以前，联邦报税的截止日期一直都是 3 月 15 日。因此那年 3 月 15 日，他们毫不费力便付清了他们的所有应付税额。而根据正在筹备中的那项改革方案，弗里德曼一家的应付税款将陡升至一千七百零四美元，这大约相当于他们应纳税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三。显然，如果财政部打算收回更多的税款，它必须设法在收入被赚取之时就将应交的税款征获，而不是等到一年之后再进行。

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在收入的源头即将税款预先扣除。财政部在雇主们给员工发工资时即开始征税。而如果纳税人有其他类型的收入，比如利息、股息或通过自主经营赚取的收入，那么每个季度他必须根据已获取的收入就应付税款作出估计并缴纳相应的数额。英德两国一直以来也是靠在收入源头将税款预先扣除的办法来征税，但与它们的一个显著差异在于，在美国，已经支付的税款被视为暂时性的，将来还有可能会对它做出调整。唯一比较实质性的反对意见来自于美国国税局，他们预言该项计划将给税务征收者“制造出无法克服的沉重负担”。后来，通过安排国税局的官员到各企业多方走访，对企业的工资操作进行考察，从而使得在设计预先扣除税款的具体机制时将所有了解到的因素都考虑了进去。这样，反对的声音才逐渐平息。[46]

弗里德曼又一次来到了国会山。这回他吸取了教训。他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并且做到了言简意赅。当准备开始回答德克萨斯的参议员汤姆·康纳利的问题时，他清了清嗓子，然后说道，“理由有三。第一——”而康纳利却打断了他的话，“小伙子，有一条好的理由便够了。”参议员戴着他招牌式的长黑领带而非通常的领结如此说道。[47] 财政部的部长在弗里德曼看来是个“智力比较困乏之辈”。部长一贯要求他的手下必须用“我女儿琼”那样的高中生都能听得懂的语言来解释问题，后来，尽管琼已长大成人并进了大学，他的这句口头禅也仍然改不了。[48]

政治思想史家赛亚·伯林在他每日从英国大使馆发回的简报中，将弗里德曼的这个计划称为“一个在规模上史无前例的税务法案”，他还汇报说，通过该法案将能筹建到七十六亿美元的资金[49]。8 月 22 日，

他又一次兴奋地写道，“受到这项税法影响的美国民众的数目将超过以往国会通过的任何一件法案。”[50] 美国第一次拥有了一个基础广泛的所得税制度。一个年收入三千美元的四口之家在 1939 年时无需缴纳所得税，而到了 1944 年，他们须缴纳二百七十五美元的所得税。年入五千美元的家庭所得税则从四十八美元上升至了七百五十五美元，而年入一万美元的家庭则从三百四十三美元涨到了二千二百四十五美元。1939 年，政府征收到的所得税只相当于当年个人收入的百分之一多一点，而到了 1945 年，该比例骤然升至了百分之十一。莫根索于 1942 年初将预先扣除所得税的提案递交给了国会，1942 年 3 月 3 日，《1943 现期纳税法案》在参议院被正式推出的。

弗里德曼在战争期间的各项工作所起到的最为深远的影响便是，它“创造了一个规模巨大而且强劲有力的增收机制。”[51] 赫伯特·斯坦恩指出，二战结束以后，由于经济发展和税率递增的双重因素，该机制变得愈加强劲，以至于在二战后的十几年中，税收上涨的速度一直都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随着个人收入的增加，愈来愈多的纳税人被推入更高级别的税率等级。这个发展趋势为战后各届政府在增加支出的同时还偶尔能采取降税政策并而并未导致财政赤字提供了保障。尤其重要的是，相对而言，预先扣除应缴税款所带来的痛楚远比别的征税方法要少。

除此之外，它另外还起到了两个重要的影响：其一，至此，用税务调控来稳定经济已成为可能。斯坦恩指出，在战前，税收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还太小，它尚缺乏对经济起到刺激或限制作用所必需的规模。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征税机制将使每年征收到的税款数额自动出现差异。经济不景气的时候，税收的数额会下降；而当经济反弹之时，则会出现相反的情形。因此，在经济萧条时期，凯恩斯理论中的刺激因素会自动发挥作用；而当经济重新进入高涨时，凯恩斯理论中的制约因素也将自动生效。

第十三章

流亡：二战中的熊彼特与哈耶克

“正在进行之中的历史对我们而言，它并非历史。它将我们领入一片未知的天地，但前面等待我们的是什么我们常常是茫然无知。”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1944[1]

凯恩斯和他为数众多的信仰者们在战争期间都被征召为国效力，对他们而言，战争意味着繁重的工作、超常的精神挑战以及拥有前所未有的影响力。而对熊彼特与哈耶克而言，二战却是一段惨遭闲置、孤立甚至流亡的日子。在知识界他们已经失宠。作为外来移民，他们没有被要求参与这场战争。他们龟缩在大学的外壳里，与老弱病残以及外国人和妇女们为伴。他们在为盟军不可阻挡的胜利欢呼的同时，又无法不为敌对方所遭受的苦难和破坏而痛心疾首。

一战结束之后，他们二人既是奥匈帝国崩溃的见证者，同时也是受害者。因此，与那些自幼在美国和英国长大的人们相比，他们俩能想象到一些前者不能或不曾想到的可能性。凯恩斯坚信，同盟国绝不会重犯他们 1919 年曾经犯下的错误。同时他也信心十足，他认为人们一定会倾听他的声音，他的立场和观点也一定会为人们所接受。在英国对轴心国宣战之际，他年已五十有六。他正处于一个对政府和大众舆论都极具影响力的位置。这在他只有三十六岁的时候是可望而不可

即的。他不仅是一名追随者众多的经济思想革命的领袖，丘吉尔事实上的财政大臣，他还是英国与华盛顿金融谈判的首席代表。他更是战后世界货币体系的建筑师之一。

熊彼特一直都在为个人失败的感觉困扰。他同时也为德国和日本所陷入的巨大灾难而抑郁不堪。他与战争的狂热日益疏离。在哈佛，他与同事和学生之间也越来越疏远和被孤立。对美国将德日两国视为一丘之貉而却把苏联当做盟友的做法，他丝毫不掩饰其内心的苦涩。结果，他引起了联邦调查局的注意，针对他的调查持续了长达两年之久。

对熊彼特而言，一战以后，左右两翼的社会主义政党先后取得的政治胜利已经证明，单单靠经济上的成功并不能保证一个社会的生存。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是一个极其不稳定的混合体。成功的生意人要靠与政客们沆瀣一气来阻挠新的竞争对手的进入，而政府的官僚总是用税务和法规将发明创造扼杀于无形。那些持敌对态度的知识分子们总是一边高声为专制政权唱着颂歌，一边不遗余力地攻击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有时，他们甚至隐蔽或公开地向西方的死敌提供声援和帮助。他担心，资产阶级社会正像马克思曾经预言过的那样，正在大量培养出自己的掘墓人。这种担心愈演愈烈，直至在他心里根深蒂固。

与其他移居美国的奥地利人不同，熊彼特并未投身到为战争的服务当中。时年五十六岁的他将自己的恐惧全部倾注到自己的新书里，而该书最能显示出他是怎样一位登峰造极的讽刺家。1942 年，正当西方对其自由企业制度的信念摇摇欲坠之际，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出版了。它是一曲以悼词面目唱出的赞歌，它对凯恩斯得出的资本主义制度生来就破绽百出的结论发起了挑战。不管它有着怎些的缺陷，无论是金融危机，经济萧条还是社会冲突，资本主义的本性仍然是为“人类中九成的人”，那部分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一直受奴役受穷受苦的人们提供所需的商品。“资本主义制度的引擎由始至终都是一台致力于大规模生产的引擎。”虽然当时美国的国民生产尚未从大萧条中完全恢复元气，但熊彼特仍然如此充满信心地宣称。[2] 他还写下了这样一段为人们传颂的名言，“如今的职业妇女们早已买得起

长筒袜，而这种商品在一个世纪前还曾经如此昂贵以至于包括女王在内的所有妇女都对它望而却步。”他认为，从1928年开始，假如美国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内能一直保持它在此前半个世纪的经济增长，那么1978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1928年的两倍半。虽然后来发生的情形与他所说的正好相反，但他的原意并非要就某个结果做出预言，他不过是想让他的读者对这个“别具匠心的机制”所拥有的神奇力量有一个深刻印象。

熊彼特认为，自由竞争是一种天才的社会机制，它不但能充分发挥人类的创造力，而且还能提高人类的生活水平。在作出这番论述之后，他紧接着便对该制度的灭亡作出了预言。对他提出的“资本主义能否生存下去”这一问题，他的回答是，“不，我认为它不能。”[3] 不但在苏联，同时在西方，创业者，这股在资本主义成功中最具创造力的力量，正在遭受攻击。同时正在遭受攻击的还有经济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正如某位评论家所言，虽然“他预言社会主义将取得最终胜利，但接下来他却写下了一番有史以来最令人动容的替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行辩解的文字。”[4]

毫无疑问，熊彼特有一种不祥的感觉，那就是，对那些出类拔萃的个人来说，机会的窗口正越变越窄。这是熊彼特人至中年并且有抑郁倾向的一个反映。他总是被死亡和恐惧的思绪所折磨和纠缠，他几乎已成了一个跟不上时代的人。在哈佛，同他优雅的举止和华丽的演讲一样，他的思想已越来越多地被人们视为落伍和古怪。他在日记中写道，人们迫切需要“一门新的经济学”，但他并不认为自己能够胜任这项任务。他曾用他自己并未意识到的讽刺口吻声明，“重活我是从来不干的。”[5]

1931年秋，当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和他全家刚搬到伦敦的时候，他还盼望着有朝一日能返回维也纳。而刚过了两年，他便意识到他的流亡生涯很可能将是永久性的。在收留他的这个新的国度里，一连数年哈耶克都一直是自由派经济阵营的首脑人物。1938年，哈耶克终于成为了英国公民，而此刻他的信奉者们却早已将他抛弃。正如著

名的凯恩斯主义者约翰·希克斯在1967年所回忆的，“现在人几乎全然忘了在历史上曾经有过那么一段时期，哈耶克的新理论曾经一度成为凯恩斯新理论的主要对手。”[6]

哈耶克在知识界的孤立感由于奥地利局势的愈加恶化而变得雪上加霜。希特勒一直到1938年才将军队开进维也纳并公开宣布德奥合并。远在那之前，哈耶克以前的同事们，包括被大学开除教职的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内，便已经开始流亡国外以逃避日益高涨的反犹运动。1935年，他给弗利茨·马赫鲁普去了封信。马赫鲁普曾是哈耶克主持的“精神学派”研讨会的成员。身为犹太人的他刚刚将自己永久留在美国的决定通知了哈耶克。作为一名犹太人，马赫鲁普别无他法。哈耶克同意他的决定，但却还是说了这么一句：“知识分子从维也纳向外大规模移民，更重要的还有我们整个经济学派的没落，这些都让我痛心疾首。”[7]一年之后，他还说过，“知识界举手投降的速度之快，以及当今政治之腐败，（注意他根本没提及与财政相关之事）无不令人惊愕。”[8]

希特勒的军队在人们的欢呼声中开进了维也纳。在那之后的数日里，哈耶克一直忙于四处走访他以前“精神学派”的老友。他们为他讲述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有关被盖世太保拘押、解雇和骚扰的亲身经历。那一年，他递交了申请并且成功地成为了一名英国公民。他发表了大量攻击纳粹德国和谴责反犹太主义的文章。他还加入了帮助滞留在欧洲的犹太同事逃出欧洲大陆的营救行动。

哈耶克的不幸婚姻为他带来了另一层痛苦。他很早便向他妻子表明了离婚的意愿，却遭到了她的拒绝。一直以来，他依然爱着远房表妹伊莲娜。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他离开她去纽约的时间里，伊莲娜嫁给了别人。1939年8月，他曾与她见过一面。而那正是在希特勒与斯大林缔盟的消息传出之前。而当消息终于传来，它便不但预示着战争已无法避免，而且不到战争结束他们俩绝对无法再见面。

在战争终于到来之际，哈耶克与外界的疏远孤立已几乎到了与世隔绝的地步。虽然当时他尚未满四十，比凯恩斯要整整年轻十岁，但他给人的感觉已非常苍老。他有一只耳朵已完全失去听力。失聪是他

与外部世界完全失去联系的一个缩影，无论是昔日的那个世界还是他自己刚选择的这个新世界。在伦敦遭受大轰炸的头六个星期里，为了证明他对英国的忠诚和他并不畏惧危险，他一直留在了伦敦。但后来，他终于被迫随当时已经只剩下几十名女生和他本人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一起转移到了剑桥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在整个战争期间也一直驻留在此。他的妻儿转移去了乡村，他旧日的盟友莱昂尼尔·罗宾斯则去了白厅的政府机关工作。从前的同事们也都因为从事与战争相关的工作而一个个销声匿迹。

哈耶克以《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为同盟国的战争努力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自称“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职责”[9]。在宣战之后的最初短短数星期里，他满以为能从宣传部拿到一纸任命。他给宣传部部长麦克米伦勋爵发去了大量备忘录，就如何进行德语广播提供了许多建议——“我现在既有时间也有极其迫切的愿望想为战争发挥我的一技之长。经过慎重的考虑，我觉得我更适合于搞宣传工作。”[10]但很快他便得知，由于他出生在国外，所以所有与战争相关的工作都将拒他于门外。于是，心情极度苦闷的他只能以管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系聊以度日，而该系的规模也在日益缩小，他差不多是剩下的最后一名教师。

逢此感觉受伤并且心情沮丧之际，他一度产生了去美国与他的朋友们相聚之意。“我对目前这种与世隔绝的情形深恶痛绝。”他在给马赫鲁普的信中写道。马赫鲁普在回信中对他的想法表示了附和。然而到了此刻，他又对任何让他即刻前往美国的建议都怒然相向。“只要我留在这里还能有任何一点价值，我就会完全放弃去美国的念头……这里毕竟是我的职责所在。”[11]1940 年，美国纽约的新学院大学表示愿意给他一份临时教授职位，他打电报予以了拒绝，简单生硬得几乎有些傲慢。[12]后来，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你能从事与战争相关的工作，这还是让我颇为羡慕的。这一切过去之后，恐怕我将是唯一一位没有这种机会的经济学家。不管是不是出于自愿，我将成为最纯之又纯的理论专家。”[13]和往常一样，每当失意之时，他便会将眼光转向未来。“我似乎过早地失去了能静静享受眼前生活的能力，对我来说，

我之所以仍然觉得生活充满乐趣，其原因是我为未来所作的诸般计划——我的成就感大多来自于我的那些计划得以完成，而我的失望也大部分是源于我的计划未能付诸实施。”[14]

但说来也奇怪，接下来的三年却成了他最为高产的一段时期。“今年夏天我完成的工作比往年相同时期都要多。”[15]当天上还在一个劲地往下掉炸弹的时候，他却一度同时在撰写三本以上的书稿。很快，《经济学期刊》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学报上开始登满了他的来稿。有时他的稿件几乎一手撑起了所有的版面。德国对伦敦的大轰炸于9月初开始，而在开始后的头六个星期里，哈耶克一直坚持留在了伦敦。“至今为止，这场狂轰滥炸只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失败……我从伦敦搬出来仅仅是因为住在一所空房子里还有频繁的路途奔波实在让人受不了。”[16]尽管如此，为了保险起见，他还是将他新书中的一些章节邮寄给了在美国的朋友“以备不测”。

1941年1月，哈耶克首次明确表示，他有意效法凯恩斯的《和平的经济后果》，并写一本面向大众读者的书：“当前我考虑最多的是将我的《自由与经济制度》一书中的主要思想以合乎读者口味的方式作一番详细论述。但如果我真用那种方式来撰写此书，它也许将和企鹅公司出版的那些六便士一本的通俗书籍没什么区别。”[17]然而，这本书他是为他的同胞们写的：“既然为赢取战争的胜利我帮不上什么忙，那我就更多地去思考离现在更远一点的将来的事情。虽然在这方面我的立场一贯悲观至极，甚至比对这场战争的看法还要负面，但我依然要尽我的微薄之力来开阔人们的视野。”[18]

《通往奴役之路》一书的写作始于1941年元旦，完成于1943年6月，期间总共花了他两年半的时间。“我是一个干活奇慢之人。”他曾经一度这样自我抱怨，“照如今这个情形，我的兴趣分散在如此众多不同的领域。如果我想把此刻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全都做一遍的话，我还得活很久才行。”[19]

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的开篇，哈耶克便谈起了历史——它与现实的关系——以及他自己在两个不同国家和文化里生活的经历：

正在进行之中的历史对我们而言，它并非历史。它将我们领入一片未知的天地……如果可以让我们重新再来一次的话，结局也许会是另一番样子……尽管历史从不会重复自己，而发展也将无法避免，但我们依然能通过某些方式从过去吸取教训，并避免重蹈以往的覆辙。

哈耶克直接告诉他的读者们，他有一种强烈的似曾相识的感觉。英国正在发生的逐渐向群体主义靠拢的倾向使他回想起一战结束之后的维也纳。“书中接下来的这几页都是对我本人前后两次生活在同一种时期的尽可能翔实的记载——或者说我曾两次亲眼目睹人们的思想经历同一种发展演化的过程。”他针对英国社会发表的观点同恩格斯、马克思和熊彼特等欧洲早先的思想家们的颇为一致：

当你从一个国家搬到另一个国家，有时你便可能两次亲身经历同样的思想发展阶段。在那种时候，你的感觉会非常强烈。当你又一次听到你在二十或二十五年前就曾听到过的论调或者施政纲领，这些便都承载了新的含义…它们意味着形势的发展趋势将导致重蹈历史的覆辙。尽管这并非必然，但至少它是极有可能的。[20]

他在这段话里提到的论调和施政纲领指的是什么呢？要论最新出版的书籍，希特勒的《我的奋斗》绝对要算一个。1939 年，该书首次在英国出现，当时出版的是未加删节的英文版本。另外一本书则无疑是韦伯夫妇于 1936 年出版的替中央计划经济大唱颂歌的《苏维埃共产主义：一个新的文明》。哈耶克曾替《星期日泰晤士报》就此书写过一篇书评。虽然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政治上与前面所提的两本书几乎毫无瓜葛，但哈耶克肯定也没把它给忘了。

哈耶克的书首先坚决捍卫了现代信息化经济中市场和竞争所起的巨大作用：

如果想了解它的实际功能，我们则必须将价格制度作为一种

信息交流的机制来看待。有关该制度最重要的一个事实便是，该机制的成功运转对知识的依赖是如此之低，也就是说，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个体并不需要有多么高深的知识便能做出正确的决定。[21]

但这同时这是一个警讯。赫伯特·斯宾塞曾率先就这点提醒人们注意，对经济自由的侵害将最终导致对政治自由的侵害。哈耶克的导师，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也曾经指出，福利国家政策是一匹特洛伊木马，“它仅仅是一个将市场经济逐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手段……它最终带来的将会是一个全方位的计划型体制，它近似于一战期间德国的兴登堡计划所展望的那种类型的社会主义。”但哈耶克绝对并非在倡导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事实上，他对那种对经济无动于衷的态度提出了明确批评：

最后，还有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我们该如何应付经济活动中普遍存在的水平波动及其所带来的周而复始的失业浪潮。当然，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严重也最为迫切的问题。虽然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有良好的计划，但它并不要求，至少并不需要，那种特殊类型的计划，那种它的鼓吹者希望用它来取代市场机制的计划。许多经济学家们都曾希望，人们能在货币政策的领域内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最终办法，它甚至无需借助于任何与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相冲突的方式和方法。而另外一些人则真虔诚地认为，我们只有通过在合适的时机大规模实施公共工程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但这种做法将导致竞争领域内出现愈来愈多日益严重的限制和干预；如果我们在这条道路上继续尝试下去，我们必须谨慎审视前进中的每一步，从而使所有经济活动都逐渐依赖于政府支出的方向和规模的局面不会出现。[22]

在一次演讲当中，为了阐述此书的意图，哈耶克甚至进一步指出，“我们应该停止就诸如此类的政府行为进行无休止的争论……我们谁真的敢说，政府就应该袖手旁观，无所事事？”[23]

1943 年初，马赫鲁普投石问路，将该书的数个章节寄给了几家出版商，他得到的第一波反应不是很理想：

> 坦率地讲，我对这本书的销售前景不大看好，所以我们尚不能将它签下。我个人的感觉是，哈耶克教授似乎有点游离于当今的思想主流之外，在这里（美国）和英国都是如此……但假使有哪家别的出版商真的将这本书出版，而且它还成了非小说类作品中的畅销书，那就算我们的判断出了毛病吧。大家都有出错的时候，我们也不例外。[24]

哈珀杂志对它的评价也不高，说它“写得吃力”和“刻意雕琢”。[25]

1943 年 6 月，哈耶克最终与英国的罗德里奇出版社签下了一纸合同，将由后者负责此书在英国的出版。一直快到 1944 年 2 月，也就是该书在英国出版的前夕，哈耶克才终于获悉，美国的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已决定接手此书。

第三幕

信　心

序　幕

无所畏惧

1944年1月11日，罗斯福因为染上了感冒，已连续数日卧床不起。三巨头在开罗和德黑兰的多次会面已使他精疲力竭。同时，他还身患高血压、高血压性心脏病、心力衰竭（左心室）和急性支气管炎等多种疾病。这些病中的任何一个对他而言都能致命。他身体太过虚弱以至于他根本无法前往国会去发表一年一度的国情咨文演讲。[1]虽然他已经派信使将演讲稿递交了国会，但媒体绝对不会将他的发言在报纸上全文刊载，对这点他心知肚明。因此，他坚持要通过收音机用“炉边闲聊”的方式直接对美国人民讲话。当时，距离诺曼底登陆尚有数月的时间，美国在太平洋的战局正陷入一场你死我活的胶着状态。但总统鼓励所有国民将眼光越过战争，展望到战争以后：“为了赢得持久的和平，我们有责任从现在就开始着手制订计划并确定我们的策略。”[2]

总统一次又一次试图向人们灌输他的一个信念，即持久的和平不仅是以战胜残暴的政权为基础，它还需要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经济安全是一个民主政府至高无上的职责。他决心不再重犯同盟各国在一战之后曾经犯过的那种错误。他认为，那个错误正是眼下这场战争之所以会爆发的原因之一。他重申，福利国家和个人自由应该结合起来。他向人们警告道，“人民在忍饥挨饿，丧失工作，独裁者通常是在这种

时候产生的。”罗斯福呼吁国会对美国国内以及国外的战后经济恢复给予大力支持。他提出的最主要的一项国内计划是“经济人权法案”，即由政府为人民的工作机会、卫生保健以及养老金提供保障……[3]

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是罗斯福的传记作者。据他说，这是罗斯福在总统任期内最为激进的一次演讲，“它砰然有声地砸在空着一半座位的国会大厅里”[4]。当时，共和党是国会的多数党，而总统提到失业和饥饿现象似乎并未引起聚在收音机旁的数百万美国民众的共鸣。在那过后几个月，凯恩斯来到了华盛顿，他发现，“在这片大陆上，战争对每个人都是一个财源滚滚的机会。”[5]进入战争以来的这几年不但成了美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而且百分之六十的民众告诉民意测验者说，“在战争爆发之前他们对自己的情况就已经很满意”。[6]

答案在于战争自身。甚至早在1939年以前，战争引起的恐慌便日益严重，它带来的后果之一便是，亚洲和欧洲的投资者们为了给他们的存款寻找一个安全所在，便纷纷将大量黄金转移来了美国。美国银行的资金因此变得十分充裕，利息率停留在几乎为零的水平上。而且，自1939年开始，联邦政府的开支从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五迅速增长至将近百分之五十。尽管从个人收入和利润上征来的税收涨幅也非常大，而且新近又增加了社会安全所得税，但政府支出增长的速度比税收增长的速度仍然要快得多。相比之下，目前赤字支出的规模让罗斯福首届总统任期内施行的对抗萧条的财政政策相形见绌。

大规模的赤字支出与从国外突如其来的货币刺激，这二者共同激发了这一轮的经济高涨。一千一百万美国的男男女女参与了在军队，工厂、矿山以及农场的高速运转和工作。官方公布的失业率从1939年底的百分之十五——如果算上短期政府工作人员则只有百分之十一，下降至1943年底的远低于百分之二的水平。由于劳动力供不应求，工厂的工资在经过通胀调整之后上涨了百分之三十。在战争进行了四年之后，普通美国家庭的消费比1939年的要更多而不是更少了。

当时，美国大量对外供应飞机、船舶和坦克靠的是扩大其生产能力，而非缩衣减食。美国经济的年生产量，即它的GDP，一直在以将近百分之十四的年率增长，三倍于“疯狂的二十年代”时的增长速度。

在二十年代，当时的总统曾苦涩地说过，“我们的国家坐过山车去兜了一圈，但最后却不幸撞车了。”[7]准确地说，美国人当时买不到新车，电冰箱或是住房，但他们对美元在战后仍将保持它战前的价值是如此自信，以至于他们愿意把将近四分之一的收入存下来，以用来在战争结束后去购买那些物品。同样，他们也不能从事他们最钟爱的驾车旅行。但他们可以买更多的衣服，食品，酒，香烟和杂志，他们可以收听更多的收音广播和唱片，还可以观看等多的电影和球赛。同时期英国的人均消费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二者之间的差别是惊人的。熟读伊丽莎白·简·豪《卡兹莱特纪事》系列小说的人们都了解，一直以来英国人的生活都因为住房，燃煤，汽油和食品等物资的短缺而变得十分困难。这种节衣缩食的生活也并未因为停战协议的签订而变得有起色。直到1946年，工党政府仍被迫在暗地里考虑是否要实行面包配给制度。最后一批战时管制措施直到1954年才被最后取消。

很显然，美国的经济体系远未到濒临垮台的地步。但尽管如此，总统和他的顾问们仍在担心这种战时繁荣难以为继。罗斯福在他的一次演讲中指出，“在那些已为人们接受的不言自明的经济事实中”有一条便是，当我们的部队即将胜利凯旋之际，为了防止经济大萧条卷土重来，我们需要实施一个新的“新政”。在战争结束以后，我们如若再一次回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那种所谓的“常态”之下，那便意味着“我们将向国内的法西斯主义屈服投降。”[8]他不无夸张向人们提出了这样的警告。

总统的立场仅仅反映了当时凯恩斯主义者与反凯恩斯主义者之间激烈辩论的一个方面。美国民众和企业对战后的前景愈加乐观，凯恩斯主义的美国信徒们便愈担心经济即将进入新的衰退时期。随着军队大批复员，公共支出将大幅下降。阿尔文·汉森，这位美联储的顾问常常被人们称为“美国的凯恩斯”，他就预言了“一场战后的大崩溃：军队大量复原，国防工业关门停产，工人失业，通货紧缩，企业破产，随之而来的是一段艰难困苦的时期。”[9]保罗·萨缪尔森是战后政府的主要计划机构的咨询顾问，他也警告说，政府不应陶醉在目前低失业率的数字当中。“战前我们就未能解决高失业率这个难题，而从那时起

到现在，没有发生过任何事能保证失业率不会再一次出现攀升。”他们丝毫也不奢望企业和消费者个人会伸出他们的援助之手。正如萨缪尔森所言，“如果一个人六年来都未曾买过一辆新车，那并不意味着他现在打算一下购买六辆新车。”[10]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历史让凯恩斯主义者们得出了一个结论，那便是，企业在投资上一贯畏缩不前，而以货币政策为武器来对付经济衰退是极其乏力的。他们坚信，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是通过暂缓军队复员同时加大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从而减缓公共支出下降的速度。

凯恩斯主义的反对者们也同样担心经济会停滞，一种不同类型并来源于其他领域的停滞。熊彼特所担心的是经济增长的长远前景。他担心经济将再也无法再也无法带来生产力和生活水平的上升——并非由于需求不足，而是因为政府的政策。在 1943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同意“所有的人对战后的经济倒退都谈虎色变”，但他同时也指出，“但社会上流行的那种恐惧感其实被过于夸大了：战后重建任务被人们视为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完成这项任务其实也许比绝大多数人想象的要容易得多……但不管怎样，那些贫困家庭的需要是如此迫切，如此实实在在，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避免战后经济倒退的出现，而代之以一个战后重建的经济发展的高潮。资本主义方式曾经从容应付过比这要艰巨得多的挑战。”[11]

他认为，战后经济增长面临的真正威胁来自于新政设置的不利于企业和经济的政策条款。他和哈耶克都非常担心，战争胜利以后，政府仍将继续实行其对生产和分配的管制措施，这包括价格与工资管制，赤字财政以及高税率。这些原本用以预防经济停滞的措施很有可能恰恰将导致经济停滞的出现。熊彼特称之为“躲在氧气帐中的资本主义”[12]。而哈耶克并不太担心经济可能会丧失动力，他担心的是自由的丧失。总统曾经提醒过人们，“回归以往的常态”无异于让法西斯获得了胜利。但哈耶克则警告世人，在战后继续实行对生产和分配的战时管制最终将导致对政治和经济权利的极端限制。事实证明，他们的这些忧虑对英国和欧洲的形势而言更具有现实性。而在美国，所有战时的政府机构从 1945 年开始便被逐一撤销。

除了军事胜利之外，罗斯福最优先考虑的便是如何避免重犯协约国在一战后所犯下的错误。他认为，那些错误是导致眼下这场战争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从 1941 年 1 月开始，三巨头就已开始就战后的经济、贸易及政治格局进行了多次会谈。罗斯福指出，所有这些会谈都足以证明这次与上一次相比有了很大改。他对那些对会谈持不信任态度的“视而不见的鼹鼠”们提出了强烈批评，并指责了他们的“鸵鸟孤立主义”。同时他对那些“将世界其他地区取得的繁荣视为对美国经济利益威胁的人”也进行了鞭挞。在德黑兰，他成功取得了斯大林对成立一个新国际联盟的支持。总统坚持认为，“我们未来至高无上的目标”将是共同安全，它包括“国际大家庭中”所有成员的“经济安全、社会安全以及道义上的安全。”在我们用军事力量将发动战争的侵略者完全制服之后，维持战后和平最为基本的一个条件便是“为所有国家的男女老少提供一份水平得体的生活”。“免遭恐惧的自由从来都是同免遭匮乏的自由息息相关的。”[13]

支持和反对凯恩斯主义的两个阵营在对国际合作的迫切需求的认识上却没有丝毫异议。自 1919 年以来，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一直都是一致的。很少有人会认为，一个良好的全球经济环境能自发产生。在两次大战的间隙期间形成的双边贸易区就是为使苏联和纳粹德国能游离于世界经济之外而特意设计的。甚至连哈耶克这位无论从经历还是性情上都对政府干预持怀疑态度的人都已开始相信，如今的民主制度与上一代相比拥有更强的竞争力。为了重振国际贸易，解决战争债务危机，同时也为了稳定各国的货币体系，各国政府必须积极进行计划和开展合作。这一次，这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

但在欧洲，罗斯福对“一个世界”和各大国将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而不是致力于侵略扩张的预见似乎太过乐观。相比之下，1944 年 3 月 9 日，身为瑞典战后计划委员会首脑之一的纲纳·缪达尔发表的预测则要悲观得多。这位年轻的经济学家在战争初期一直在美国南部游历，在 1942 年他返回祖国瑞典之前，他写出了一份关于种族关系的经典性研究报告：《美国的困境：黑奴问题及现代民主》。瑞典虽然为德国的

战争机器提供过帮助，但它一直都保持了非交战国的地位。

未来在缪达尔的眼中要黯淡得多。他担心，在经过了长达四年史无前例的努力奋斗，牺牲和苦难之后，自给自足的经济形式，停滞不前的经济状况，以及军国主义等社会痼疾并未被完全消除。而正是因为这些因素作祟才使战火能在短短三十年内重新被酝酿出来，并让世界再一次遭受涂炭。他认为，成立统一的国际社会，各成员国之间的关系依靠贸易、可兑换证券以及国际法来维系，这种梦想不过是一个幻觉。他对美国经济学家的“过度乐观”进行了反驳，并且预言，目前的战时经济繁荣将演变成一场比经济大萧条更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大规模失业浪潮。而一旦美国经济进入萧条，它将对全世界产生巨大影响，尤其是对瑞典这种依赖出口换取维持其现代经济生存所需进口物资的国家。经济混乱将不可避免地导致风起云涌的罢工风潮和社会动乱。它还将使得各国间的民族主义竞争愈演愈烈，而在二战前夕，类似的经济局势就曾经带来这种后果。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隙期间曾经盛极一时的军国主义和自给自足经济[14]又将开始大行其道。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随着战胜轴心国的共同目标逐渐被三巨头相互矛盾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所取代，整个世界将不可避免地分化为相互竞争的三大帝国：俄国，英国和美国。在缪达尔设想的全球性的反乌托邦中，这些新型帝国主义不仅暴虐无比，而且具有天生的不稳定性。

这本书写的自然是1984年时候的世界。乔治·奥威尔在1948年完成了他那本描写反面乌托邦的小说，《一九八四》。在该小说中，世界被分割成了陷入了永久性冷战的三大帝国——澳洲帝国，欧亚帝国和东亚帝国。由于它们各自实力相当，任何一方都难以完全取胜或落败，于是，这些超级大国便常常以外来威胁作为对内实行极权统治和经济停滞的借口。而书中的男主人公名叫温斯顿·史密斯，他虽然是个普通人，但“身上却闪现出丘吉尔般的勇气”。他发现，“世界被分割成三个超级大国的局面其实早在二十世纪中期之前就能也确实曾被人们预见到了。”[15]

颇为讽刺的是，此时，只有一个人在以欣慰而非恐惧的眼光注视着这场梦魇。那就是斯大林。从德黑兰回来以后，罗斯福满以为同盟

国领导人已经达成了一致的目标，即战争胜利以后，他们要共同创建一个让所有国家都致力于经济发展的战后国际框架。他已向美国民众作出保证，“我们的盟国从以往的经历，而且可以说是极其痛苦的经历中已经认识到，如果他们的注意力总是被纷纭四起的战争或战争威胁所分散，使得他们不能朝既定的目标继续努力，那么真正的发展便将无从谈起。”[16]

其实，斯大林一直都坚信，他的那些资本主义盟友天性就不可能与人长期合作，一旦他们的共同敌人被击败，对利润的追求便会使美英两国开始互相攻击。他在心里认为，英美之战是“不可避免”的[17]。既然如此，他便可以一边从盟友那里索取更多的援助和疆土，一边却盼着即将到来的冲突会引发战争，并且会将他们的人民全都推至唯莫斯科马首是瞻的伪政治党派一边。

当时，有无数证据都在表明，事实和他所想的正好相反。但他为什么会都视而不见呢？约翰·盖迪斯教授是美国研究冷战首屈一指的历史学家。他认为，斯大林是列宁原始经济理论的忠实信徒，而该理论却是建立在将经济竞争与战争进行类比的错误逻辑之上。罗斯福认为，一个国家的发展将会使它的贸易伙伴国受益，而斯大林却不这么认为，他相信的是，贸易和战争一样，是一场零和的游戏，一方的获益必以另一方的受损为代价。列宁的确曾经相信，战争只不过是一种更富于侵略性的经济竞争。

在他的《通论》一书中，凯恩斯曾表述过这样一种理念，即信念非常重要：“大权在握的政治疯子们从来都自诩受命于天，但他们的狂热思想其实都是从几年前的一些三流作家的作品中提炼出来的。”
正是由于凯恩斯，哈耶克以及他们的追随者们在思想上所作的巨大贡献，那些身在高位的人们才没有变得疯狂也没有被金本位制这一野蛮的遗迹所束缚。他们决心避免梦魇的发生。

第十四章

过去与未来：凯恩斯在布雷顿森林

“经济疾病具有高度的传染性。因此，每个国家的经济健康都受到它远近各邻国的关注也就顺理成章了。”

——罗斯福，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对各国代表的发言[1]

1944年6月中旬，离国际货币大会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只剩下不到两个星期，凯恩斯和莉狄娅搭乘玛丽女王号邮轮渡过了大西洋。他将此次旅行称为“最安宁同时也是最忙碌的一段时间”[2]。和他同行的有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如今已成了他密友的莱昂内尔·罗宾斯，以及其他十几位英国政府官员。在船上，凯恩斯主持了不下十三次甲板会议。关于成立两个大型国际机构以管理战后国际货币工作的草案也是在船上写成，而凯恩斯在草案的写作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这两个机构将分别是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3]在船上的闲暇时间里，他便懒洋洋地躺在甲板的椅子上，聚精会神地阅读各种书籍。其中有一本新版的柏拉图的《理想国》，一部他最喜爱的散文家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的传记，还有就是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

凯恩斯与他一些教条主义习气十足的信徒不同，他有一种天赋，

他的脑中能同时容纳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在给哈耶克的一封长信中他写道，“从道义和哲学的角度，我对你的整部书几乎都是认同的。不仅认同，而且是深受感动的那种认同。”由于哈耶克未能“在自由和计划之间划出一道令人满意的界线”[4]，因此他的书并不能为制定“中庸之道”的政策提供实用的理论指导。然而，他在书中表达的价值观却正是凯恩斯认为“过上好日子”所必须具备的。[5]罗宾斯在一旁打趣说，凯恩斯在“纯精神层面的事情上是如此激进，但具体到文化上他又是个货真价实的伯克式的保守主义者。”[6]

凯恩斯接着还说，哈耶克将自由与计划二者并存的可能性完全排除有些过于鲁莽。自由并不完全排斥必要的计划，尤其当制订计划的人与他们拥有相同的价值观时则更是如此：“危险的举动并不能给一个行为和思想皆符合正义的国家带来多大的危害，但同样的举动将把一个行为和思想皆与正义背道而驰的国家带入地狱。”[7]他的意思是说，虽然罗斯福和丘吉尔与希特勒和斯大林一样，都实行了战时经济政策，但这并不会让美英两国同德苏二国一样成为极权主义国家。

下船之后，凯恩斯和莉狄娅被私人专列送至新罕布什尔州的白山。位于布雷顿森林里的华盛顿山旅馆是建于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一家豪华酒店。它似乎在模仿类似巴黎的美琪酒店那样的高档场所。而凯恩斯在上一场战争末期就曾在美琪住过。华盛顿山旅馆只有三百五十间套房，有私人浴室、舞厅、室内游泳池，还有一个装潢着蒂凡尼彩色玻璃窗的开放式大厅。当七百三十名会议代表从四十四个不同的盟国汹涌而至时，这个稍嫌陈旧已然过气了的度假胜地最开始有些一筹莫展。“自来水管里的水整天都在流个不停，窗户有的打不开，而有的却关不上。水管子已经修了一次又一次。想去哪儿都去不了。”莉狄娅在给她婆婆的信中这样写道。他们俩被安排在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隔壁的一个大套间。与刚刚结束的大西洋上的航行相比，这次大会就仿佛是一个疯人院，莉狄娅认为，“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玩命似地工作”。[8]

此次大会的邀请是由罗斯福发出的，而摩根索则是名义上的主办

者。该次大会的主要设计师，计划人以及国会议事专家其实是摩根索的助手哈里·德克斯特·怀特和凯恩斯二人。前来与会的人都心怀鬼胎，他们有着不同的利益考量，通常在幕后还有未可告人的目的。酒店里的间谍也多如牛毛。与会者达成的任何协议对各自的政府并不具约束力。但会议的组织者们认识到，他们必须保证经济复苏将会发生，但是没有国际合作，经济复苏便无从谈起。罗斯福在国情咨文演讲中曾表示，一定要避免重犯在一战之后曾犯过的错误。而该计划的制订者们与罗斯福有的决心一样。他们希望能采取一种世界性的，多边的并借助于“联合国”的方式。这次大会本身就反映出了政府的职责正在被彻底地重新定义和扩展。在华盛顿，伦敦和巴黎把维持其国内高就业率当作政府职责的同时，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政府也都将采取必要措施以维持其贸易伙伴国内的就业水平视为己任。

新秩序的各项特征反映了人们对上一次所犯的错误已经取得共识。而纠正错误所产生的影响将远远超出经济的范畴。罗斯福、丘吉尔、以及凯恩斯和他在美国的信徒们，这些人都坚信，正是由于经济病人膏肓——通货膨胀与失业，才导致了法西斯主义的产生，并导致许多民主政权被大大地削弱。他们同样坚信，一战前夕各国为使自己免遭世界经济危机的危害，它们争相奉行以邻为壑的疯狂政策，而这直接导致了世界经济的瓦解。而随之而来的国际贸易下降也是世界大战之所以最终爆发的起因之一。经济竞争可能导致战争的爆发。正如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所言，“如果贸易不受阻碍，它便会带来和平。而高关税、贸易壁垒以及不公平的经济竞争则将带来战争……假若我们能使贸易变得更加自由通畅……国家之间不再互相嫉妒，所有国家的生活水准都得到提高……也许那样，我们才会有机会享受持久的和平。”[9]

费雪，凯恩斯，以及贡献稍逊他们二人一筹的熊彼特和哈耶克等人创建的“整体经济学”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期间的一项伟大发明。它告诉人们，对某个国家有益之事也许对世界这一整体是有害的。将本国的货币贬值，设立贸易壁垒，对外流资本进行管制，这些做法也许能有效减少国际收支差额，阻挠黄金外流，而且能增加政府收入。

然而，假若每个国家都采取这种同样的策略，结果将会导致普遍的贫穷和失业。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世界贸易总额下降了一半，继续进行中的贸易活动大多局限在几大货币集团内部：比如英帝国的英镑集团，苏联的势力集团，和由希特勒的经济部长耶马尔·沙赫特精心设计的双边贸易集团。现在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要想使自由企业制度在世界范围内正常运转，政府干预这支“看得见的手”是必不可少的。传记作家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指出，在某种程度上，由怀特和凯恩斯亲手构建的这个新的经济格局其实乃凯恩斯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应用。

布雷顿森林会议的目的是为了重振世界贸易，稳定各国的货币，以及应对战争债务和信贷市场陷入冻结等问题。战争使得世界大多数地区变得愈加贫困。各国必须付出艰巨的努力才能重获经济繁荣。从广义上而言，营救则意味着重造和重建，意味着回归至 1913 年以前的全球化，但却绝不能再重弹一战前那种认为经济机器的运行纯粹是自发自动的论调。对西方各国而言，它还意味着要吸取历史的教训。马克思就曾经直言资本家必定无法吸取这样的教训。他们绝不能再犯在两次大战之间所犯下的诸般错误，而且必须努力重新树立他们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信誉。经济的稳定对政治稳定至关重要，而对西方世界的长久生存而言，经济发展即使不是充分条件，最起码也是一个必要条件。正像现代化大都市离开了电和火车便无法运转一样，如果设计精巧的经济机制发生故障或失控，现代社会也便将无法生存。

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大肆推崇自由贸易的英国思想家们不同，凯恩斯、费雪以及熊彼特和哈耶克等人中几乎无人相信，和平与发展真的将像生活在“美丽年代”[①]的人们所相信的那样自然而然地发生。政府干预是必需的。国际间的合作也是必需的。任何机制都不是自发产生的，它们也不会自动作自我调节。而在 1914 年以前，人们却认为那些都是理所当然的。而现在，如果真要建立这样一种机制，那它必须

①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人称巴黎的“美丽年代”（Belle epoque）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段。当时，法国已从几次战争中恢复了元气，而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发展，也使社会一派繁荣。

由美国，这个西方仅存的超级大国和那些曾经不可一世但却早已今不如昔的欧洲帝国们共同完成。除此而外，任何别的途径都是无法想象的。怀特就曾经表示，这一努力如果失败，那我们将再一次被引入战争："如果世界各主要国家之间缺乏高度的经济合作，那么他们相互之间爆发经济战争则不可避免。而经济战争又将为规模巨大的军事战争拉开序幕。"[10]

换而言之，虽然怀特和凯恩斯有着与乔治·奥威尔、纲纳·缪达尔、熊彼特、哈耶克等人同样的担心，但他们俩却既不信奉经济决定论，同时对政府也没有那种彻头彻尾的不信任感。他们认为，他们一定能说服各国政府，通过建立相互合作的共同框架来防止经济萧条和战争的再次发生。他们相信民主政府一定能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对马克思主义者历史必然性的观点和大国竞争的传统论断，他们都双双予以了反驳。而对斯大林所谓"战争是资本主义基因的一部分"的说法他们自然也不敢苟同。

当然，真正的考验并不仅仅是西方是否能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更重要的是，在其制度的帮助之下，它是否能从历史中吸取有益的教训。

1944 年，为国家生存而战的英国可谓在所不惜。它丧失了英帝国大部分势力范围，而不得不与苏联展开合作，同时，在与越来越咄咄逼人的美国打交道的时候它也渐渐甘居次席。除了一小部分共产主义者之外，绝大多数英国人在对战后世界的设想中都将美国继续参与欧洲事务视为重中之重。

在一战结束之际，虽然美国尚非一个超级大国，但它已然成为世界上最大也是最富裕的经济体。而到了二战结束之时，它却已经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正如接下来数届美国政府所发现的，更多的财富和更强的国力其实使它与别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变得更多而不是更少了。一战结束后，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曾经指出，美国应该继续参与欧洲事务。但当时，人们对他的呼吁充耳不闻。而到了 1944 年，人们对"为了美国的利益我们必须保障世界的安全"的看法已不再觉得牵强。美国人曾经以为，大西洋和太平洋这两大洋足以保护美国的

安全不受外国的威胁，但珍珠港事件的爆发将这种幻觉一劳永逸地击得粉碎。

根据历史学家约翰·加迪斯的说法，由于美国无法单枪匹马击败日本和纳粹德国，所以罗斯福战时的工作重心便包括了以下内容：对盟国进行大力援助；赢得苏联对战后安排的合作，因为没有苏联的参与，任何持久的和平都不可能实现；坚持以多边参与的方式解决安全问题；还有，便是防止另一次经济大萧条的发生。最后，因为美国实行的是民主制度，而政治家们必须顺应民意，因此，罗斯福一直在致力于说服美国民众并让他们相信，退回到战前的孤立主义将是无法想象的。

1919 年在巴黎的美琪酒店，凯恩斯只不过是数百名技术顾问中的一员，根本没人能听到他们的意见。他们对最终结果施加影响的希望也是微乎其微。而 1944 年在华盛顿山旅馆，用莉狄娅的话来将，凯恩斯却已是一位身兼数职的要人。同盟国已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如今他们认为，和平有赖于经济的复苏。而在 1918 年，只有熊彼特、凯恩斯和费雪等少数人持这种观点。尤其在各战胜国，从政府官员到普通民众都对之嗤之以鼻。

由于英国财政业已破产，在经济上它已经完全依赖于美国，这就意味着虽然从外表上英美两国大谈特谈相互合作，但美国人却在很大程度上独自操纵着会谈结果。在美国一方，虽然财政部长摩根索名义上是负责人，但其实他的副手哈里·德克斯特·怀特才是唯一的一个“通晓全局”之人，也只有怀特“才有权拒绝将任何没有经他同意的议题纳入会议的表决程序”[11]。大会的所有事务，从新闻发布会到会谈记录的打印和分发，全都由怀特一手把持。

凯恩斯沿袭了他的一贯风格。身为银行委员会的主席，他丝毫没有掩饰他打算将自己的观点强加给该委员会。摩根索经常得亲自到凯恩斯的房间来，“问他能不能请他将发言的速度放慢一些，声音再大一些，并将他的论文布置得更有条理一些。”[12] 斯基德尔斯基指出，虽然凯恩斯并不是很包容，但至少他效率很高。由于他坚持要求尽可能快地讨论完所有议题，因此代表们都精疲力竭，盼望着能够尽早离开此

地。凯恩斯在招待宴会上发表了最后一席演讲。当他进入会场的时候，所有的与会者都静静地站了起来，他们一直目视着他直到他走到讲台之后并坐下来。

“苏联是一个新兴国家，而英国则正走向没落。”在他们漫长而艰难的谈判过程当中，哈里·怀特有一次曾如此对凯恩斯说道。[13] 正如斯基德尔斯基所提到的，怀特对俄国的痴迷让凯恩斯颇为费解，而他对英国所持的敌视态度有时会让凯恩斯勃然大怒。对这位他在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理论信仰者，更多的时候还是谈判对手，凯恩斯根本没想到他竟然一直在暗地里将政府机密泄露给苏联，而且还在暗地里帮苏联对他和其他代表们进行暗中监视。同凯恩斯一道被怀特带到布雷顿森林来的政府经济学家当中有十好几位都是来自财政部货币研究部门的官员，他们无一例外都是苏联克格勃“西尔维麦斯特间谍网”成员。

作为战争中的盟友，苏联在战胜德国的过程中表现出了无与伦比的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再加上欧洲共产党在抵抗德国占领运动中发挥出的巨大作用，因此，当苏联建立规模巨大的间谍网的真相首次被公之于世时，人们最初的反应是觉得这简直不可思议，再后来他们就都被震惊了。最令人不安的是，苏联的间谍活动大量依靠美国公民中的第五纵队或者是内奸，这不禁让人回想起纳粹利用德国在欧洲的同情者而建立起来的庞大谍报网的成功策略。苏联真实面目的曝光不但解释了为什么罗斯福和杜鲁门迟迟不愿接受二战结束后新的冷战业已爆发的事实，而且它也解答了甚至直到现在人们依然无法理解的一个现象：为什么许多最优秀最杰出的人物竟会心甘情愿替充当一个外国政权的间谍、代理人或辩护人，为什么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对自己的行为非常明显地并无丝毫悔意。那是因为他们一切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全人类”。

即使在经济大萧条的灾害最严重的时期，美国共产党也远未发展到一个广泛性政治运动的地位，当然它的独立性就更无从说起。它的成员人数曾于 1944 年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的八万人左右。然而，绝大多数党员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便弃组织而去，它勉强能够在湾区、波

士顿和纽约等数个社区以及少数工会组织中发挥微弱的影响。那些间谍有些是出生贫穷或是经济情况不太稳定，他们经常是他们家庭中第一个上大学的人。他们中间有许多人都吃过偶然的反犹主义和世态炎凉的苦头。在希特勒和佛朗哥崛起之后，由于这二者旗帜鲜明地反知识并推行军国主义，因而也就对人类文明构成了威胁。共产党也因此在大学中获得了一些威信。与经济萧条作斗争就如同五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一样已经发展成了一个政治运动。参加过曼哈顿工程的物理学家们都认为他们曾经是战争的一部分。和他们一样，在财政部，制作经济预测也是与法西斯作斗争并且战而胜之的一部分。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劳克林·柯里曾经在哈佛任教并与他的至交好友哈里·德克斯特·怀特合写过数份支持刺激政策和新政的发言。1939 年，他已成为总统幕僚中的六位助手之一。很快，他便开始就一些重大问题向罗斯福进言，比如，为了充分调动战时经济、战时预算以及针对中国的租借法案等等。是柯里组织起了飞虎队。他一手负责了租借法案在中国的实施。他还积极参与了美英及美俄之间的贷款谈判和布雷顿森林会议之前的准备会议。多项独立的资料来源都有证据表明，柯里和怀特并非反对新政的险恶政治伎俩的无辜受害者，他们也并未遭受麦卡锡主义的迫害。对他们的指控是基于两个相互独立的情报来源，并且有被美国政府截获和破译的苏联电报为证。而这些电报的时间比约瑟夫·麦卡锡参议员发表他耸人听闻的指控的时间要早得多。后来被解密的克格勃档案材料也证实了这些指控的真实性。

其中，对柯里的指控是，也许是在总统的吩咐下，他向战略情报局施加压力，不但迫使该局将窃听来的苏联密码联系录交还给了苏联，并且还下令停止了所有窃听活动。而针对哈里·德克斯特·怀特的证据则更为严重。根据为怀特写过传记的作者大卫·里斯和布鲁斯·克雷格的说法，《时代》杂志编辑惠特克·钱伯斯是 GRU，即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的间谍。他在 1939 年向美国助理国务卿揭露了其他苏联间谍的身份，并且主动交待了怀特和柯里也都是间谍的真相。钱伯斯拿出了怀特让他转交给 GRU 的来自英国财政部的秘密文件。来自另外两名前苏联间谍的证词也与钱伯斯对怀特的指控相吻合。1944 年 11 月通过“维诺

娜”计划（“维诺娜”计划是美英两国的情报机构联手合作进行的一项长期收集和分析秘密情报的任务，目的是要截获和破译苏联情报机关〔大部分在二战期间〕所发出的消息。）获取的一份电报是由内森·格列高利·斯尔韦麦斯特转交给怀特的妻子的。电报中表示愿意为怀特的女儿上大学提供学费帮助。而另外两封电报则记录了怀特与克格勃的维塔利·帕夫洛夫将军所作的谈话，这两次谈话都未经美国政府授权，其中一次是1941年在华盛顿一家餐馆中共进午餐时的谈话。

尽管莫斯科也极其看重他们作为间谍的价值，但怀特和柯里的真正重要之处在于他们都是极具影响力的间谍。他们占据着高度敏感的职位，他们能接触到和权力所能及的范围都非常广泛。他们采取的行动或推行的措施并不一定符合自己祖国的利益，但他们为了追求苏联的利益却殚精竭虑，这一点却是毫无疑问的。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们对苏联的真正意图却一无所知，在这点上他们和绝大多数美国天真幼稚的政客们毫无区别。雅尔塔会议以后，罗斯福和杜鲁门对苏联的看法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而当斯大林大耍其欺骗伎俩的时候，美国那些顽固狡猾的政客们的反应是震惊和难以置信，他们觉得自己仿佛就像被情人抛弃了一般。

正如行将溺毙之人会不顾一切地扑向救生索一样，因为经济大萧条而决定转攻经济学的那一代人也牢牢把握住了《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的精髓。凯恩斯是他们的英雄，而他们则是他的信仰者，他思想的追随者。“凯恩斯主义者”这一标签并不意味着对凯恩斯政策建议的绝对支持，更非表明在政治上与他立场一致。这些追随者中有一些是政治上的保守之士。尤其在欧洲，有些人甚至是社会主义者。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都来自于主流政党的界定范围。他们中的有些人爬上了有权有影响力的高层职位。出于对苏联极权政府的忠诚，他们利用自己的职位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这一切都是这些人和他们所属的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但这些却与凯恩斯的思想扯不上任何联系，与凯恩斯本人更是毫无瓜葛。也许只有一点除外。那就是，那些个个聪明绝伦的人们为什么竟然会干出那么愚蠢那么邪恶的事情来，和其他人一样，凯恩斯对此百思不得其解。

第十五章

来自奴役之路：哈耶克与德国奇迹

有一句话无论怎么重复都不过分。无论怎么强调都仍嫌不足——群体主义生来就不具有民主性，相反，它将权力赋予专制残暴的少数派，而这些权力之大是连以迫害异端著称的西班牙宗教法庭都梦寐以求却又不曾拥有过的……

既然绝大多数人在国家管制与经济衰退和失业之间宁愿选择前者，那么，如果由公众舆论来决定的话，更加倾向于群体主义的趋势则必将继续下去。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对《通往奴役之路》的评论，1944年[1]

1945年3月31日，赛亚·柏林在从华盛顿发回的每周报道中说，“《读者文摘》实际上是美国大企业集团的代言人。该杂志近来刊登了哈耶克教授那本众所周知的著作中的一段摘要”，他还说，“反对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党派正热切期待着教授本人在近期内访问美国，同时他们也希望他能为他们的阵营增添一门重炮。”[2]

哈耶克在3月风大浪急的天气中随慢速护航船队横渡大西洋的旅行显然远不如凯恩斯去年6月的那次舒适。然而，在纽约下船后刚踏上

码头，他便即刻被闪光灯和成群的记者包围住了。三千多人出席并聆听了他在纽约大学的首场讲座。他原计划只在美国待两个星期，但在接下来的六个星期里，实地演讲、广播以及报刊采访将他的行程排得如此之满，以至于他在大晚上几乎都挤不出时间与他的老友弗里兹·马克卢普见上一面。从1943年起，马克卢普一直数年如一日地给哈耶克邮寄包括火腿、坚果、干梅、大米等在内的食品包裹。

大企业集团的代言人（指《读者文摘》）使哈耶克在美国声名鹊起。而由《新闻周刊》作家亨利·赫兹利特在《纽约时报》头版发表的一篇书评则包揽了其他替哈耶克作宣传的工作。《通往奴役之路》一书的巨大成功在某种程度上获益于它出版的时机。1945年春，雅尔塔会议刚刚结束，苏联红军也即将获得对纳粹德国的最后胜利，美国公众舆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对战后世界格局的安排，尤其是未来美苏之间的关系上。眼下，摆在国会面前的几项事务包括一个贸易法案，一笔对英国的巨额贷款，当然，还有对去年7月在布雷顿森林达成的世界货币协定给予最后批准。然而，所有这些来自政府部门的提议无一例外都遭到了共和党的反对。虽然哈耶克在他书中提及的绝大多数都是纳粹德国，而非斯大林的苏联，但他在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反斯大林的情绪却引起了反新政人士的巨大共鸣。正如赛亚·柏林所预言的，哈耶克让美国的保守派人士欣喜若狂，如获至宝，他们急不可耐地将自己的拥戴献给了这位来自维也纳的教授。但事实证明，哈耶克并不能胜任充当标志性代表人物的工作。在稍后发回英国的报道当中，柏林提到一件颇为有趣的事：美国银行家协会已放弃其反对布雷顿森林协议的立场，其原因“很奇怪地”是由于哈耶克教授在纽约一次银行家集会上的讲话。出席该集会的有温思罗·阿尔德里奇以及数位摩根的合伙人等颇具影响力的银行家和赫伯特·胡佛。而哈耶克在该集会上却声情并茂地表达了对布雷顿森林协议的赞许。[3]

一个月后，赛亚·柏林颇有些幸灾乐祸地写道，“英国经济学界的托利派人士在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教授身上寄托了殷切希望，原因是他对新政持不容置疑的反对立场。但事实证明，本应该成为盟友的哈耶克教授却令他们尴尬不已，因为对自由贸易机制的热爱使得他

对关税和垄断的憎恨并不亚于新政。”[4]

不为他共和党支持者们所知的是，早在战争开始之前，哈耶克便已经开始对罗斯福产生了好感。“我想，罗斯福一定知道他自己在干什么。”他在给马克卢普的信中承认，罗斯福在1938年“就经济权力的集中给国会的一封信”让他“对罗斯福的看法发生了巨大改变”[5]。哈耶克丝毫未因为他的转变将会给他的支持者带来困惑和难堪而畏缩不前。他在华盛顿停留的最后那天晚上，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阿尔伯特·哈克斯为他举行了道别晚宴。在席间，哈耶克抽象的观点和枯燥乏味的讲话让听众们非常失望，于是，另一位参议员站了起来并征求他对一项在国会待议的贸易法案的看法。哈耶克冷冰冰地回应道，“先生们，如果你对我的哲学思想略知一二的话，您就应该知道，如果有一样东西能得到我最最坚决的支持，那就是在全世界实行自由贸易。互惠贸易协定的宗旨是扩展世界贸易，因此，我对这样的法案自然是乐见其成的。”

《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马奎斯·蔡尔兹当时也在座。事后他欣喜地报道说，“屋里的温度似乎顿时下降了十度还不止，因为共和党此前已决定要全力阻止续延该项贸易法案。”过了一会儿，哈耶克的另一番表态让屋里的温度又再一次为之下降。哈耶克重申，虽然他不喜欢布雷顿森林协议中的许多内容，但对它他还是支持的。想要重起炉灶以另一个协议来替代它，“希望是极其渺茫的”。[6]

7月，美国国会正式批准了布雷顿森林协议。而英国国会一直等到那年12月才批准它，因为华盛顿一直到那个时候才终于为一笔凯恩斯为之呕心沥血价值八十八亿美元的对英贷款亮了绿灯。在自给自足和全球化经济二者之间，在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之间，人们已经作出了抉择。然而，俄国人却拒绝批准该协议。这不但让罗斯福政府大吃了一惊，连俄国人自己的间谍也大呼意外。杜鲁门主义的设计师，外交家乔治·凯南曾如此回忆道：

> 在希望战后与苏联展开合作一事上，在华盛顿没有别的部门比财政部更尽心尽力也更天真幼稚的了（甚至可以说是更毅然决

然的了）。可到头来，由于莫斯科令人费解地不愿加入世界银行和世界货币基金，财政部长久以来的梦想终于破灭，迷茫痛苦的哭喊声从财政部大楼的方向飘过来，笼罩在大街对面白宫的屋顶上空。而国务院也只能用无动于衷的单纯语气将这份不满传达给驻苏联使馆。对苏联政府的这一决定人们该如何解释呢？而这一决定的后面又隐藏了些什么呢？[7]

与丘吉尔不同，罗斯福和杜鲁门对斯大林的看法与内维尔·张伯伦在1938年以前对希特勒的看法颇为类似：他们认为他的某些抱怨并非无中生有，而且，作为一个统治者，他的目标也颇为有限。如果得到妥善对待，他还是能够与人达成协议并严守自己的承诺的。他们对大国之间的竞争以及商业利益上的冲突过于想当然。他们还在以为，美苏两国出于共同的利益，有必要确保他们之间的这些矛盾不会危及二者相互合作的大框架大方向。1945年4月12日，也就是在哈耶克到达美国两个星期之后，罗斯福因脑溢血不幸去世。但即使在那之前，那种将斯大林视为一个值得信赖的谈判对手的看法也早已开始摇摇欲坠。这位独裁者断然拒绝加入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该决定与其他的一连串变故促使人们开始对他重新审视。最开始是1946年2月美国驻苏使馆的特命全权公使，乔治·凯南给美国国务卿所发的那份著名的“长电报”。该电报将苏联描述成一个酷似乔治·奥威尔想象中的那种极权主义帝国。

凯恩斯和哈耶克最终也未能就他们俩之间那一个长期争论作个了断：究竟需要多少政府经济干预或者这种干预该如何实施，才能使之与自由的社会体制相匹配。但凯恩斯仍然对《通往奴役之路》一书表示了支持，而且他还提名哈耶克而不是他的学生琼·罗宾逊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946年4月21日，在凯恩斯最终去世之际，哈耶克在给莉迪亚的信中写道，凯恩斯是“我所认识的一个真正的伟人，我对他崇敬得无以复加。”[8]

1947年初，凯恩斯对大一统世界的期望行将破灭。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这些国家一个接一个都被苏维埃所征服。丘吉尔也已经发表了他有关铁幕的著名演讲。杜鲁门宣布，美国将“为自由的人民提供支持和帮助，以抵抗武装少数派的镇压和外来压力……这种帮助将主要是经济和财政上的帮助，因为对保持经济稳定和维持政治秩序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9]

战争结束以后，哈耶克选择了不返回维也纳。他最亲密的朋友们不是早已离开人世便是尚流亡在外。雅尔塔会议之后，因为斯大林认为必须抓住有利时机以增加其谈判的筹码，他便有意延缓了红军对柏林的攻击。在一番狂轰滥炸和激烈的巷战之后，维也纳终于被苏军占领。这座城市最精美的一些建筑变成了一片瓦砾。水、电和煤气管道也都被摧毁殆尽。警察和地方当局已完全瘫痪，成群结队的暴徒让手无寸铁的当地居民惊恐万状。苏军最初的进攻部队对维也纳的城市平民保持了相对的克制，然而，随着第二波进城部队的到来，一场长达六星期之久的奸淫掳掠也便就此拉开了序幕。

战争期间，哈耶克曾经梦想在美洲大陆上重建他的精神学派，并希望以此证明欧洲启蒙运动的理想尚存有一线希望：“以往的自由主义者之所以尊重传统只不过是因为他们习惯于因循守旧，而那种人对实现我们的目标毫无用处可言。我们需要的是那些曾经面对面与另一方进行过争论的人，是那些亲身参加过斗争而且通过自己的奋斗达到了一定境界的人，他必须能自如地应付对方的质疑并且能证明自己的观点。”[10]在他第二次到美国访问期间，保守派的沃尔克基金表示愿意为举办一次自由派人士的大会提供赞助，并借此帮助这些志趣相投的同道成立一个社会团体。1947年4月10日，哈耶克出席了朝圣山学社在瑞士一座俯瞰日内瓦湖的小山上举行的首次会议。绝大多数与会者都是从美国和英国回来的欧洲移民，他们中间包括卡尔·波普尔、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弗里茨·马克卢普。来自芝加哥大学的一个代表团中有密尔顿·弗里德曼和艾伦·迪莱克特。《新闻周刊》的亨利·赫兹利特和《财富》杂志的约翰·达文波特也都来了。这些济济于一堂的个人主义者们并未能就赞同私有财产制度达成一致意见，但

他们却顺利通过了拥护个人自由的纲领。他们决定将不以组织的名义出版任何书籍和杂志，也不以组织的名义从事任何政治活动或发表政治声明。来自芝加哥大学的富兰克·奈特对以两位“天主教贵族”的名字来命名这个组织的做法提出了异议。于是，哈耶克建议他们将自己命名为“阿克顿—托克维尔学会”，但与会者们同样驳回了这一提议。[11] 在有关收入分配的辩论中，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大肆指责辩论对手“心怀对社会主义的同情”，他的这一举动足足赚了不少眼球。在与会期间，德国经济学家瓦尔特·欧根自战争爆发以来第一次尝到了橘子。经过三天内容广泛的讨论，到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仍未能达成一份阐明其原则的宣言。莱昂内尔·罗宾斯，这位参加过无数此类会议的资深人士起草了一份声明。除了法国经济学家莫里斯·阿莱，其他所有与会代表都同意参与签署。[12] 该会议声明指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正遭到某些正不断扩散的信仰的威胁——这些信仰，当其尚处于少数地位的时候曾为获得社会宽容而大声疾呼——但它们的唯一目标确是千方百计地获取权力，以用来压制和扼杀与自己不合的所有其他观点。”该声明着重强调了自由企业机制，同时还对历史宿命论、国家义务以及个人应被某种道德准则束缚的观点表示了反对。最为重要的是，它表达了对绝对思想自由的支持。

会议刚告结束，哈耶克便即刻出发前往维也纳。城市以及居民的惨状无不超出了他的想象。在遭到同盟国四强共同占领三年之后，维也纳已经成了一个破败不堪、意志消沉和极其黑暗的城市，就像观众从电影《第三个人》中所能看到的那样。这部黑色电影是根据英国作家格林汉姆·格林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奥逊·威尔斯担任影片的导演并出演反派，他在片中添加的一段台词后来成了经典名言：“在博尔吉亚家族统治的三十年中，意大利经历了战争、恐怖、谋杀和流血，但是却产生了米开朗基罗、达芬奇和文艺复兴。而在瑞士，人们相互友爱，享受了五百年的民主和平。但这又能产生什么呢？布谷鸟闹钟而已。”[13]

让维也纳人恐惧而又鄙视的俄国人仍然控制着该城市的东郊。哈耶克认为，同盟国给维也纳的待遇“远不及像意大利一样主动与德国结盟的国家”，他也曾就此提出过抗议。占领军当局在维也纳执行的

几乎是对德政策的翻版，这就意味着，除了电影《第三个人》中哈里·莱蒙的黑市交易之外，几乎所有其他的经济活动都遭到了禁止。哈耶克抱怨道，“奥地利人想依靠自己的力量走出经济绝境，而有人却对此横加阻止。”[14]

在非常时期，发生这样或那样巧合的几率似乎比平时要高得多。在一趟从维也纳开往慕尼黑的列车上，哈耶克再一次与他的表哥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不期而遇。维特根斯坦看上去比以往更加郁郁寡欢，而且有一腔前所未有的怒气。他大部分时间都住在被俄国人控制的城区。红军将维特根斯坦为他妹妹设计建造的房屋当作马厩和车库在用。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维特根斯坦便一直对布尔什维克无比崇拜，他甚至曾经一度在认真考虑要移民去俄国。[15]而如今，哈耶克在想，从这位哲学家的举止便能看出，“与俄国人有了第一次亲身接触之后，所有他脑中曾经有过的幻觉都已被击得粉碎。”

对维也纳的访问结束之后，在英国文化协会的安排下，哈耶克又开始对数座德国城市进行走访。他在给马克卢普的信中说，在达姆施塔特他“有了作为大学教师最感人的一次体验”。这座城市，包括它的那些大教堂，

> 在战争中都已几乎被夷为平地；看上去根本不像还有什么城市存在。剩下的不过是满目的疮痍和废墟而已。我翻过一堆堆废墟，钻进了一个藏在地下的地洞，并同住在里面的人们进行了一番交谈。当时，我根本不知道德国人对我也有所了解。在那里我还举办了一场讲座，即便讲课的礼堂已经算是很大，却依然容纳不下争相赶来的大批学生。我这才知道，虽然在德国《通往奴役之路》一书尚未正式出版，但人们已在争相传阅用打字机打出来的抄本。[16]

回到伦敦以后，哈耶克想到的第一件事便是发起一场运动，目的是将1938年以来出版的但德国和奥地利的学者却因为政府审查和战争尚无缘得见的书籍都通通收集起来。到了那年年底，该委员会已经收

集到了大约两千五百多卷书籍。之后，经过千辛万苦，这些书被逐批运送到了维也纳。

时至 1947 年，究竟该如何对待德国，这个问题依然悬而未决。凯恩斯、怀特以及他们各自的政府自三年前诺曼底登陆前数星期开始便一直在为此事争论不休。怀特积极主张将德国全面非工业化，而凯恩斯却在强调经济融合和恢复。1944 年 7 月，在该计划出台之后数星期，凯恩斯放从报纸上第一次得知摩根索计划。《凡尔赛和约》带有明显的惩罚性质。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凯恩斯曾经一再将《凡尔赛和约》指斥为“迦太基”般的条约，他认为该条约是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罪魁祸首。而摩根索计划的目标也是要让德国从一个现代化的经济体倒退到一个十八世纪的工业化前的国家。凯恩斯在他给财政大臣约翰·安德森的一封信中指出，摩根索计划有两个优点：它是在一个战事非常惨烈，战争伤亡令人触目惊心的时刻被提出来的，在这种时刻，即便是相对极端甚至种族灭绝的一些手段也都能为人们所接受。另外，它算是一项计划。除此之外，美国国务院和陆军部尚无其他同样完整的计划。

凯恩斯并未公开表示反对，因为他无法承受与摩根索和怀特二人分道扬镳所带来的后果。对这一点他心知肚明。于是他便掩饰了自己的真实想法，转而预言说这个计划必定无法被美国国会通过。他说对了。1945 年，艾森豪威尔已经夺取了对德国南部的控制权，而这时摩根索计划早已被束之高阁。由于缺乏远见卓识和一个更为完善的替代计划，一个政策真空便出现了。凯恩斯未能仗义执言所造成的后果仍然在延续。由于缺乏一个积极正确的计划，“摩根索的政策及其部属在整整三年的时间里主宰着德国”。早在 1945 年 6 月，奥斯丁·罗宾逊受财政部委派来德国了解情况，他向凯恩斯汇报说，“与在物质上所受的创伤相比，更让他心急如焚的是德国的经济体系完全停止了运转。”他“找不到一份报纸……没有一台电话能够打通长途，几乎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通讯联系。”相反，“德国的城镇成了一片废墟，它所有的工厂被夷为了平地，它的房屋不是被烧毁便是已被炸毁，它已经丧

失了生机。而德国的乡村却仍然生机盎然，农业生产一如平常……只不过它缺少向城镇销售农产品的动力，因为后者能用来换取食物的东西实在是太少了。”[17]

禁止德国在其境内恢复经济活动导致了两个后果，而这都是美国的官员们始料未及的。首先，德国经济的崩溃阻碍了欧洲其他地区经济的复苏。其二，派军队占领德国让英美两国纳税人付出的代价急剧增加。据保守的估计，该行动至少使盟国付出的代价增加了三倍。罗宾逊对凯恩斯提出警告说，如果俄国人，“或是法国人”，从战争赔款中拿走太大的份额，那么“为了避免饥馑和灾难发生，英国则将被迫依赖和购买进口商品来为本国提供充足的食物。”[18]因为凯恩斯在一战结束之后曾经亲眼目睹过这样的情景，他即刻作出了答复：“看在老天的分上，但愿这一次我们不再犯错并遭受惩罚。”[19]

美国最终采纳了马歇尔计划。鉴于欧洲早已饥饿不堪，随时有被共产主义阵营吞噬的危险，马歇尔计划便自然而然地继承了布雷顿森林会议的精神，并且得到了英美两国的大力参与。它大力推动了自由世界的经济增长与稳定。在经济政策上，人们逐渐将眼光从民族主义逐渐向全世界范围转移。这也成为人们对安全的认识以及战后外交和军事策略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部分。以往的经济崩溃曾经导致过极权主义政府的产生，这种观点迫使美国在帮助欧洲恢复经济的努力中不遗余力；时至 1947 年，局势越来越紧张。很显然，欧洲无法依靠一己之力实现经济的复苏。而欧洲经济的复苏符合美国企业的利益，同时它也是欧洲能够进行自我保卫的先决条件。杜鲁门的这番分析使他获得了企业界领袖的大力支持，并使得政府能够在和平时期维持其在对外援助和军事上的庞大开支。

虽然德国从马歇尔计划提供的帮助中获利甚微，但德国经济恢复的势头是如此强劲，以至于很快它便被冠以“Wirtschaftswunder”或者“经济奇迹”的标志。在 1948 年货币改革过后三年，人均产值的年涨幅达到了百分之十五。尽管它在战争中遭受过巨大破坏，尽管俄国人曾将德国的机器统统搬运走，德国 1950 年的人均产值已经恢复到相当

于战前百分之九十四的水平。

这是怎么回事呢？德国财务部长路德维希·厄哈德将这一经济奇迹归功于新货币的推行以及1948年取消了价格管制。他回忆道，“对于民族主义、闭关自守和政府干预控制下的经济和贸易政策会给经济和超经济带来何种后果，德国人也许比任何别的国家都有更多的亲身体验。因为我们就曾尝过这颗苦果。”自由化“唤醒了企业家们的冲动，工人们已准备好重新开始工作，商人们也在跃跃欲试，准备出售他们的商品……整个国家的经济……也开始运转……迄今为止，经济停滞带来了物资供应的短缺。对外贸易在同盟国指定的框架内半死不活地在进行着。多种商品供不应求；民众们普遍发出了要求增加商品供应的呼声；然而，经济发展的动力仍旧十分虚弱。”[20]

对哈耶克而言，德国能从战争的灰烬中重新崛起，这不仅对他所信仰的自由市场、自由贸易以及健全货币是一个绝佳的证明，而且也预示着他无比热爱的自由欧洲的文明并未面临注定灭亡的命运。

在接到去芝加哥大学任教的邀请后，他便辞去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职位，办妥了离婚，然后又与自己长期以来的情人结成了夫妻。他不但沉湎于收藏书籍，而且还喜爱为知识分子写人物传记。他还写了一篇关于约翰·穆勒与哈丽雅特·泰勒的引人入胜的爱情故事。甚至连他自己蜜月的路线安排都与穆勒那趟有名的从伦敦到罗马的朝圣之旅的路线相吻合。

哈耶克成为了美国保守派人士的宠儿，但可是好景不长。他对绝大多数共和党的政客都极为鄙视，他讨厌所有的汽车，并且对美国生活方式中几乎所有的一切都嗤之以鼻。这其中包括美国尚没有全民医疗保险，也没有由政府提供资助的养老金计划。一来他对欧洲思乡心切，二来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所受到的欢迎已经今不如昔。于是，他终于选择在萨尔茨堡大学安顿了下来。

直到1974年，为了表彰他“在经济、社会以及制度诸现象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上所作的深入研究”，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授予他诺贝尔奖，这才把他从默默无闻的境遇中解救出来。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的奖项是与瑞典的社会主义者纲纳·缪达尔共同分享的。再过一些

年，他的《自由宪章》一书成了玛格丽特·撒切尔领导的保守主义复兴运动的圣经。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苏联的分崩离析以及自由市场改革在东欧和亚洲的迅速蔓延，都使他成为了全世界保守派人士心目中的英雄。

第十六章

统治的工具：萨缪尔森到了华盛顿

“我不管这个国家的法律是谁写的，也不管它那些复杂的条约是谁签订的；只要它的经济学教材由我来写就成……”

——保罗·萨缪尔森[①1]

罗斯福总统在那场以“激进”著称的国情咨文演讲中曾提到过一份政府报告，而保罗·萨缪尔森正是该报告背后那个默默无闻的构思者。战争爆发后的最初几个月，他只能靠以填鸭式的方式给工程专业的学生上经济学课打发时光。同时，他还为陆军在麻省理工学院的辐射实验室做了不计其数的运算。[2] 早在 1940 年，劳克林·柯里就曾经向罗斯福建议。美国应该即刻开始做好战后规划。总统同意了。于是，柯里雷厉风行地招募了一批新的智囊，并让他们在全国资源计划委员会任职。该委员会是美国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计划署，它的负责人是罗斯福总统的叔叔弗雷德里克·迪兰诺。时年二十七岁的萨缪尔森，这位来自哈佛的神童，新科博士，麻省理工学院的助理教授，很快便脱颖而出，他在由二十多位经济学家和一批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

① Paul A.Samuelson（1915—2009），当代凯恩斯主义的集大成者，经济学的最后一个通才。

生组成的小组中成为了名义上的领导人。该小组的任务是对战后经济可能出现的发展趋势进行计算，并为解决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建议和方法。[3] 为了让他的上司明白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并不比会计部门更具颠覆性，萨缪尔森曾特意在去白宫汇报工作的时候戴上一顶绿色遮光罩[①]。

1944 年劳动节的次日清晨，罗斯福当局辖下的庞大大学咨询队伍中的这名干将，在离开将近一年之后首次回到了华盛顿。保罗·萨缪尔森个头矮小，精力充沛，留着短短的平头。他是从波士顿搭乘夜车过来的。他身着一身整洁的西服，打着领结，他成了首都地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的暂住者”中的一员。他积极与从前的同事和学生进行交谈，希望从他们那儿打听到一些消息或是传闻。

萨缪尔森嗅到了一丝“战时生产即将被削减”的可能性。[4] 他走访过的每一间办公室都摆满了桌式计算器，以及一堆堆杂乱无章的绿色预算明细表和预算报告。此时，鉴于战争的结局已经十分明朗，华盛顿关注的焦点已经从战时生产转移到了如何实现经济向和平时期的转变上来。数以百计的政府工作人员都忙碌于计算，有多少军事采购将会被削减，有多少美国军人将被遣散，以及将坦克生产线改装成为汽车生产线大概需要多长时间，等等。第一轮裁减原定在那年秋季开始，这正好与 1944 年总统竞选活动的时间相吻合。这个安排也许并非巧合。在这次竞选中，杜鲁门总统的对手是共和党人托马斯·杜威，后者当时的职务是罗斯福早年也曾担任过的纽约州州长。但局势骤然起了变化。那年秋天，盟军席卷欧洲大陆的进攻势头在突出地带的坦克大决战中遭到了遏制，一直到 1945 年初，战局才恢复到了原先的态势。[5]

尽管天气湿热难当，但萨缪尔森却觉得在华盛顿跻身于“专家”和国会之间的感觉意外的良好。一天以前，《纽约时报》刚刚登了一条标题新闻：“战后出现经济繁荣几乎毋庸置疑”[6]。他被这条新闻惊呆了。因为当时潜在问题之多令人咋舌：在战争期间，有一千一百万男

①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期间，一些包括会计、打字员等职业在内的从业人员常戴着绿色遮光罩以消除工作时眼睛的疲劳。

男女女穿上制服为国家和政府效力，还有一千六百万人在与国防相关的工厂工作，这相当于国家全部劳动力人数的三分之一。1943 年，联邦政府支出高达六千亿美元，这几乎是国家年产值的一半，它相当于 1940 年联邦政府开支的七倍。越是展望战后的形势，萨缪尔森越是心急如焚。

他的这种感觉与其他一些凯恩斯主义者的颇为相似。他们曾经理所当然地认为，美国工商业一定会年复一年地持续提升其产量、效率及个人收入。但对于能否指望美国的企业和家庭将他们从这些经济活动中获取的收入和利润用于消费，而不是用于储蓄，他们却不那么肯定。而萨缪尔森愈来愈倾向于这样的观点，即经济停滞的倾向并非由货币政策失误或外部冲击等突发性疾病引起的，相反，这是一种慢性病。经济历史学家大卫·肯尼迪指出，萨缪尔森为全国资源计划署所写的报告中的主旨和结论有两个不同来源。一个是凯恩斯 1940 年写的名为《如何替战争买单》的小册子中的的观点；他认为，战争结束之后，如果没有大量和持续的政府支出的注入，英国经济的战后前景便不容乐观[7]；而另一个则是美国政府内部信仰凯恩斯主义的经济顾问们的观点，他们当中包括柯里、怀特和阿尔文·汉森，后者是哈佛大学的教授，并兼任全国资源计划署和美联储的顾问。正是在汉森的号召之下，财政部那些保守的刚走出校门的毕业生和教师们（萨缪尔森所说的“流氓无产阶级”）才汇集到了凯恩斯主义的旗帜之下。肯尼迪指出，凯恩斯在美国的一众信仰者甚至比他们的祖师爷还要悲观。早在 1938 年，即汉森刚从美国中西部来到哈佛的那一年，他便出版了一本名为《全面复苏还是陷入停滞》的书，在这本书中他对战后的暗淡前景早已有了预见。

萨缪尔森写作的速度与其语速一样敏捷，他也因此在新闻界开始了他极其亮丽的第二职业。他就“即将来临的经济危机”为《新共和》撰写了两回合的系列文章。[8] 他的笔调能量十足，并无丝毫的宿命和悲观。他向人们指出，问题虽然严重，但还是可以解决的。他呼吁政府采纳他在 1942 年为全国资源计划委员会所写的报告中曾经提出的那些措施：减缓军队复员的速度并将政府开支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他

这组文章字里行间洋溢着充分的信心，曾经主持过新政的政坛干将切斯特·鲍尔斯对之有过这样的评价："经济大萧条将是我们遭遇的最后一场经济危机，原因非常简单，因为人们已经认识到它并不是无法避免的。"[9]

萨缪尔森出生在一个从俄国移民到美国的犹太人家庭。他的家庭经历了一战期间美国中西部的经济飞涨期以及之后二十年代的经济繁荣。1915 年，他出生于印第安纳的加利，后来他常常将自己对经济学和投资股市的毕生热爱与他的出生地点联系起来。加利甚至连芝加哥的郊区都算不上，相反，它是一座由一家大型钢铁厂独力支撑起来的工业小镇。这里的居民大多来自农场和草原，城市里弥漫着独特的煤烟和金钱交织的气息。一战期间，钢铁车间一直在夜以继日地工作。而以外来移民为主的钢铁工人们有时甚至得一天工作十二小时，每星期工作七日。工厂的工人若是生病，为了避免损失一天的工钱，他们会直接到药剂师那里去买药，而不是去看大夫。弗兰克·萨缪尔森颇为幸运，因为他是小城中为数不多的几位药剂师之一。因为他本人是第一代犹太移民，他与顾客交谈时讲的是俄语和波兰语。

同时，他还是一个小规模的房地产投资商。在这点上，他和那些地道的中西部人一样，只有手里有几个闲钱，不管是自己存的还是借来的，都会用来投机。战时的经济繁荣也波及了农业市场，并且将谷物价格一路推至峰顶。农民们还从未经历过如此美妙的行情，他们都大量贷款以购买更多的农业用地和农用机械。在接下来的数年中，那些与弗兰克·萨缪尔森一样在加利市中心购置了地产的人们无一例外都发了。正如辛克莱尔·刘易斯在《大街》中描写的黄鼠草原镇一样，在加利城中像弗兰克·萨缪尔森这样事业有成的大有人在，而他们的太太们和他们一样对自己居住的这个城镇厌恶至极，她们认为它奇丑无比，她们恨丈夫将她们流放到这个离芝加哥足足有一天行程的地方。漂亮自负的埃拉·利普顿·萨缪尔森"非常势利"，对丈夫她是时而怂恿，时而又以嘲讽和奚落相加。性格喜怒无常的她素来有一个梦想，她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成为一位著名的帽子设计师。她想要的是女儿，

却一连生了三个儿子。他们刚到咿呀学语的年纪，她便逐一将他们送至别人家去寄养。

在他十七个月大，仍在蹒跚学步的时候，金发蓝眼的萨缪尔森便被送到了印第安纳维勒的一个农场。农场位于阡陌纵横一望无垠的麦田的交叉路口上，没有电，没有室内厕所，也没有电话和汽车。萨缪尔森日后曾经说过，“在童年的岁月里，我亲身经历了用牲畜运输经济方式的消亡和室内厕所和电灯照明的到来。再后来，无线电开始在空中传播，电视图像尤其让人沉湎其中。”[10]一直到要上幼儿园的时候，他才再一次与自己的母亲相见。

被母亲抛弃通常会导致母子间关系冷淡和缺少依恋感，但同时它也会让人产生对依恋的向往和取悦于人的愿望。对萨缪尔森而言，这两种影响兼而有之。从他的妻子、秘书、女儿到宠物狗，在热爱过他的所有女性当中，养母是一生中第一位给予他关爱的女性。与他的生母不同，养母身体丰满，性情温和善良，而且她还烧得一手好菜。

当年满五岁的保罗回到自己家中之际，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停战协议业已签订。为了扭转战时的通货膨胀，新成立的美联储紧紧关上了信贷的阀门。在英法这两个美国小麦最大的海外市场，中央银行也正实行同样的政策。在短短数月之内，谷物价格下跌了一半，钢铁车间一个个偃旗息鼓，破产倒闭的银行多如过江之鲫。“那时，在我住的印第安纳，银行倒闭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萨缪尔森后来曾如此回忆。“那些在战时经济繁荣的顶峰时期大肆贷款购置土地和设备的农场由于谷物价格的急剧下跌而损失惨重。也正因如此，大量当地的乡村银行也纷纷宣告倒闭。”接下来，土地价格的崩溃已无法避免，而萨缪尔森一家的经济安全与保障也难逃同样的命运。

1921 年年中，虽然经济已开始复苏，但遭受了惨重打击的农业经济和萨缪尔森一家的经济状况却从中受益甚微。四年来，弗兰克·萨缪尔森眼瞅着自己一度蒸蒸日上的药房生意瞬时化为乌有。在 1925 年夏天，在冬季温暖气候的引诱下，也出于对热带得天独厚的在家门口便能见到橘子的向往，早已对妻子的数落不胜其烦的弗兰克·萨缪尔森终于将自己的药房出手。他和埃拉坐上自己的汽车径直朝南往迈阿

密进发，并由此同上万个家庭一起加入了佛罗里达轰轰烈烈的圈地运动。当时，在佛罗里达买土地看起来是稳赚不赔：因为只需缴纳百分之十的首期，这样，只要土地价格翻倍，付出的原始投资便能获得百分之一千的利润。即使那些所谓的“梦幻开发区”其实都是“在野松树丛子和沼泽湿地的包围之中”，人们也不介意。[11]

在父母离开加利以后，十岁的萨缪尔森和他十二岁半的哥哥哈罗德便一起被送到每年都来此度夏的维勒。在劳动节前后，父母来信召他们前去相聚。于是，两个男孩坐上了从芝加哥开往迈阿密的火车包厢。萨缪尔森后来回忆说，下火车后首先映入他眼帘的并不是他的父母，而是“身穿超四号灯笼裤的人们在街头买卖土地的情景”。[12]

1925 年年中，买卖土地的热潮一直向北蔓延到了杰克逊维尔。这个沉谧宁静的农业小镇濒临大西洋，距离迈阿密约三百五十英里。该镇曾将臭名昭著的骗子查尔斯·庞齐吸引到此行骗。庞齐以十美元的低价将小块土地出售，但结果这些土地并不在杰克逊维尔，而是离杰克逊维尔有六十五英里的直线距离，并且土地的面积仅有二十三分之一英亩。到了 1926 年，那些相信佛罗里达遍地都是黄金的狂热开始逐渐消寂，汹涌而来的土地投资者也在慢慢减少。于是，土地价格不可避免地开始下跌。就在此时，先后来了两场飓风。于是，一次原本只是价格飞涨中的偶然停顿最终却演变成了价格的全面下跌。弗兰克·萨缪尔森几乎断送了他所剩的所有财产，来自妻子的羞辱和责骂自然也是变本加厉。

“她可没少发牢骚。”保罗曾经如此谈及他的母亲。她丈夫因为心脏病在四十八岁时便早早离开了人世，甚至在他过世多年以后，她时常还会谈起他那些愚蠢的投资决定。即使在一个年方十岁的孩子眼里，这个家庭所面临的经济困境也是显而易见的。

两年后，萨缪尔森一家重新回到了中西部，他们在芝加哥城南安顿了下来。该地区被紧紧夹在密西根湖与一个黑人居住区之间。在当时乃至现在，它都是属于中产阶层的一块飞地。芝加哥的经济正经历着又一次高涨期。牲畜围栏里传出的恶臭与从湖对面加利的钢铁厂飘来的烟雾交织在了一起。保罗进了海德公园高中上学，他和全体美国

人一样开始每天研究报纸中的股票版面，而且他通常还与他所在高中的数学老师一道切磋。

其时，对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作者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狂热崇拜正到达了顶峰。萨缪尔森开始为学校的文学杂志撰写小说，故事的主人公是一群精于世故而愤世嫉俗的年轻人，他们更换情侣的速度与换衣服一样快，他们脱口而出的常常是单句的口头禅："看在麦克、帕特、皮特还有耶稣另外七名门徒的面子上，你就住嘴吧。"[13] 由于长年跟爱"大嚷大叫"的母亲生活在一起，萨缪尔森常常梦想着自己能离家出走去东部的一所大学，它位于一个"宁静的绿色小镇"，而且那里的"教堂有白色的尖塔"[14]。1931 年，萨缪尔森年满十六岁并高中毕业，此时，经济大萧条正犹如漫长的冬夜正笼罩着全美国的绝大多数地区。若是说在以前去东部念大学还有几分可能性的话，那现在它已变得毫无可能。于是，在 1932 年 1 月，萨缪尔森在芝加哥大学注了册，他选择了数学专业，并仍然坚持住在自己家。

未能从中西部脱身也为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他原以为芝加哥会是一潭死水，但实际情况却与他的猜测大相径庭。当时的芝加哥已经成为一个思想和政治活动都极为繁忙之地。同时，希望政府在对付经济萧条的斗争中有更多作为的经济学家们也常常在此聚会。芝加哥大学的教师们大多是中西部财政保守主义与源于中欧的伯克自由主义的混合体。华盛顿面对经济危机所表现出的手足无措使他们警醒，同时，他们也迫切希望自己能提出一套更为积极可靠的措施。

萨缪尔森从新生辅导员那儿得知，"当今世界上的权威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曾于去年夏天来芝加哥大学讲课[15]。他的第一位经济学教授名叫艾伦·迪莱克特，这是一位机敏自信而又保守的经济学家，后来他还成了密尔顿·弗里德曼的妹夫并"深受弗里德曼思想的影响"。据萨缪尔森后来回忆，迪莱克特的第一堂课讲的是托马斯·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它让萨缪尔森顿时被经济学吸引住了。另一位教授是雅各布·维纳，他是一位罗马尼亚裔的加拿大人，在学校他以阅卷评分最严格而著称。罗斯福总统就任以后，维纳成为了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最为信赖的圈外顾问之一。他的学生在财政部、美

联储和新政执行部门中身居要职的多达数十人。身为熊彼特和哈耶克的挚友，维纳对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所作的评论在是美国经济学界最具影响力的一个，同时也是最直言不讳的一个。他对凯恩斯的政策表示了赞同，并且同意需要依靠赤字支出来对付经济萧条。然而，他也认为，凯恩斯的理论根本算不上什么“通论”，因为它只能在短期内适用，假如用它来指导长期的经济政策，它便将破绽百出。

在萨缪尔森刚到芝加哥大学的头一个月里，学校主持召开了一个包括欧文·费雪在内的一群金融货币专家参加的讨论会。欧文·费雪在当时可是美国最出名同时也是最名声扫地的经济学家。与会者们就胡佛政府应该如何应付经济萧条展开了激烈辩论。迪莱克特和维纳双双在费雪发给总统的电报上署名，他们共同呼吁总统采取一项更为有力的经济刺激计划。

三年后，萨缪尔森从芝加哥大学毕业并获得了一份研究生奖学金，他觉得，相较而言，在经济学上自己能取得的成就将远远超过在数学上的成就。于是他放弃了芝加哥大学转而选择了哈佛。虽然刚出版了有开创意义的《垄断竞争论》的哈佛的爱德华·张伯伦也对萨缪尔森有着巨大的诱惑力，但哈佛最吸引他的地方却是他能离家远游以及他昔日对“宁静的绿色小镇”的梦想。此时，罗斯福致力于经济复苏已至第三个年头，萨缪尔森来到了哈佛所在的马萨诸塞州的剑桥镇。他很快便发现，哈佛资深教授们的政治立场虽然比芝加哥同行们的要左，但在思想上他们却比后者要保守得多。

1936 年秋，在萨缪尔森就读哈佛的第一个学期，一位曾在剑桥大学聆听过凯恩斯讲课的加拿大研究生也翩然来到了哈佛。罗伯特·布赖斯提交了他的一篇论文，在文中他对凯恩斯当时尚未公开出版的《通论》一书中的主要观点作了一番概括和阐述。他格外强调了利用公共支出来应付失业这一措施。但他却未能对该措施背后的理论依据作一个全面解释。这便使萨缪尔森有点摸不着头脑，因为他从未将积极的财政政策视为“凯恩斯主义”的新观点和特征。但鉴于经济形势的确已有明显好转，他便理所当然地将这一结果归功于新政的推行。而

且他也乐于相信凯恩斯一定会推出一套新的充满生命力并且能自圆其说的理论来解释发生的这一切。“最后，我终于对自己说，‘既然这个模型能够解释 1933 年至 1937 年之间罗斯福所取得的经济增长，那我干嘛要拒绝它呢？”[16]

1936 年，英国工党的经济顾问，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信仰者尼古拉斯·卡尔多来到哈佛访问。他出席并聆听了一场绝妙的演讲。他还以为演讲者是张伯伦，于是在向演讲者提问之前他是如此开头的：“祝贺你，张伯伦教授。”但没想到这个所谓的“教授”其实是当时在就读一年级研究生的萨缪尔森。萨缪尔森选修了数学家艾德温·威尔逊开的一门课，威尔逊是威拉德·吉布斯在耶鲁的关门弟子。他和熊彼特二人占了学生总数的一半。而熊彼特本人也一眼便相中了萨缪尔森便将之视为自己的门生。萨缪尔森另外还选修了一位杰出的俄国移民和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华西里·列昂惕夫的一门课。萨缪尔森在研究生院最要好的朋友，日本经济学家繁人都重曾经回忆说，“列昂惕夫虽然名气大，但口才却不是很好，他常常要借助于黑板。有时他会在黑板上画上两条相交的直线，然后开始说，‘你们看，在这个交点上……’这时保罗便会插嘴说，‘对，这就是那个……’而不待保罗说完，列昂惕夫就会立即表示对他的认可，‘不错，你已经知道我想说什么了。’虽然他和保罗心有灵犀，但他们俩都从不把话说透，弄得班上其他学生都一个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17]

接下来的那一年，萨缪尔森成为了第一位被选入哈佛大学学者协会的经济学家。该协会在哈佛是一个非同一般的机构，它深受英国大学设立高桌传统的影响，它要求不同学科的青年学者们将他们攻读学位的努力暂停三年，而利用这段时间来……思考。他突然发现自己身边居然有威拉德·冯·奥曼·蒯因，逻辑学家；乔治·伯克霍夫，点阵理论的发明者；斯塔尼斯拉夫·乌拉姆，热核武器泰勒——乌拉姆设计的创始人；以及其他一些出类拔萃的数学奇才。

但令人兴奋的学术氛围和经历毕竟不能代替家庭生活。在一年之内，萨缪尔森与同是研究生的来自威斯康星的玛里昂·科罗弗德喜结秦晋之好。1940 年 5 月，在他二十五岁生日那天，禁止他完成博士学

位的时限也宣告结束。这时，玛里昂也完成了她的博士学位。这对年轻夫妇的第一个孩子也已出生。

同众多在经济大萧条时期长大成人的年轻人一样，萨缪尔森行事也急不可耐。他听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不按原曲的顺序听，因为他不想因为换唱片而浪费过多的时间，这让他的欧洲同学大惊失色。因为希望得到在哈佛留校任教的机会，他一头埋入了他的论文写作。玛里昂则负责帮他打字。最终将论文上交时，他为之所起的题目是《经济分析的基础》。这篇论文一方面受到了1931年熊彼特为经济理论危机发出的哀叹的影响，而另一方面它又与费雪的论文有着似曾相识之处。它对当代经济学理论进行了大胆的抨击，它以“简单的数学和逻辑”告诉人们，当前的这些理论其实可以被精减压缩成更为简洁，更加基本化的原理。“我感觉自己仿佛是在一片丛林中，试图凭手中仅有的一把铅笔刀开辟出一条路来。”萨缪尔森后来回忆说，“自相矛盾，内容重复，概念混淆，所有这些问题都纠缠在了一起。”[18]

《经济分析的基础》一文完成了伯特兰·罗素在《数学原理》和约翰·诺伊曼在《量子力学基础》中试图取得的成就——同时，只有马歇尔在1890年他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曾经达到过如此的高度。赫伯特·斯坦恩，这位芝加哥大学培养出来的新政的执行者，对萨缪尔森取得的成就给出了最为直观的解释，他将萨缪尔森的理论与在费雪之前和在凯恩斯之前的经济学作了一番比较：之前的经济学讲的是，如果有人失业，你就给他一份工作；而之后的理论讲的却是，如果有人失业，你只需要在体制这边的某个角落里的什么东西上拨弄一下——比如说货币供给或是税率——当然你是在假设这么做能对体制的另一边，也就是就业，起到影响。这便是新的“整体经济学”或者宏观经济学的现实意义与作用，这也就是费雪和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推陈出新之处。[19]

对经济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以及对间接和次要影响的极端重视也为宏观经济学对数学的依赖提供了最佳的解释。如果没有数学，你便无法对一个综合体系进行分析。人们时常会就运用数学来分析经济问题这一方法的利弊进行争论，这和他们在是否应该利用计算机来证

明数学定律一事上的争论如出一辙。经济学家们也是试图解决问题之人，这与工程师、核物理学家和作曲家没什么区别。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如果他们发现以前用的工具并不称手，他们便会试着尝试新的工具。诚然，老一辈的人们的确很难理解也经常几乎无法掌握新的技术，但对萨缪尔森这一辈在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长起来的人而言，威拉德·吉布斯的数学是一门语言的观点听上去是再自然不过了。事实也证明，那些担心数学运用将会导致其他语言的退化和萎缩的人未免有些夸大其辞。约翰·诺伊曼是曾经对经济学作出过巨大贡献的数位数学家之一。他能将德语即时翻译成英语，还能逐字逐句地背诵狄更斯名著中的一些章节。而萨缪尔森语言技艺之精湛比诺伊曼犹胜一筹。

《经济分析的基础》一书之所以诞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也许并非偶然，因为那是一个拥有非凡创造力的时代。萨缪尔森在哈佛头一学年期末便考完了他的综合考试。然后，在接下来的 1937 年至 1941 年的三个学年里，他以初级研究员的身份专心从事《经济分析的基础》一书的写作。“《经济分析的基础》一书的概念的最终形成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时间，”他后来回忆说，“它是在 1936 年至 1941 年这几年间通过自我发展和演变而来的。”[20] 在萨缪尔森进行论文答辩的时候，据说熊彼特当时转过头去问列昂惕夫说，“怎么样？……我们通过了吗？”然而，和那个孕育颇丰的时代中的其他伟大思想和发明一样，由于二战的原因，《经济分析的基础》一书迟迟未能进入大众市场。与诺依曼和奥斯卡·摩根斯坦合著的《博弈论》一书不同的是，萨缪尔森的这篇博士论文既没有深具影响力的支持者，也没有财力雄厚的赞助人。事实上，哈佛经济学系的主席哈罗德·伯班克对该篇论文的敌意如此之深，他甚至命人将该文的印刷板悉数销毁，并坚持只给萨缪尔森一个临时讲师的职位。1947 年晚些时候，当《基础》一书终于交付出版时，它受到的欢迎较之前要热烈得多，究其原因当是在战争过后，人们自然而然地渴望运用新的工具和技术。萨缪尔森获得了约翰·贝茨·克拉克奖，该奖的地位相当于为不满四十岁的卓越数学家所设立的菲尔兹奖。熊彼特称《基础》为一部大师级的著作，他还在给自己以前学

生的信中写道，“如果在夜里读它，那种兴奋感将扰得我无法入睡。”[21]

美国人对战后经济的恐惧感深植于他们对经济复苏原因的认识当中。他们认为，为他们带来了经济复苏的是爆发了战争，而不是实施了新政。在英国，人们如今最关心的是在防止爆发通货膨胀的同时，怎样才能对人们在战争中作出的巨大牺牲有所补偿。而在美国，人们最担心的却是一旦政府开始削减军事开支并将上百万军人遣散复员，失业又将重新落回到人们的头上。

全国资源计划委员会，即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前身，是当时受命负责计划经济向和平转型的几个政府机构之一。埃弗里特·哈根，这位曾经与萨缪尔森一道共同起草了给全国资源计划委员会报告的经济学者正负责提交一份政府对经济的统一预测。及至1944年年中，华盛顿的经济学家们对预测的结果产生了尖锐的意见分歧。新政的拥护者们倾向于对战后经济前景持乐观的看法。而凯恩斯主义者的态度则要悲观得多。随着企业开始补充库存以取代耗尽的存货和更换磨损的设备，随着消费者也在进行着同样的购买行动，战争结束之后一定会出现一个因为重新进货而带来的经济高涨期。对此萨缪尔森也表示认同。但他也认为，这种经济高涨期必定是短暂的，因为它将难以抵挡军事开支大幅度下降而带来的巨大压力。

军队复员的速度比萨缪尔森预想的要快得多，但他预言会发生的危机却没有出现。在1947年经历了陡然而短暂的衰退之后，接下来经济便迅速反弹。冷战的粉墨登场使得杜鲁门政府不惜花费数千万美元以充实美国的核武库，尽管在同一时期，传统地面部队的力量出现了大幅下降。然而，消费者久遭压抑的消费欲望的规模之大却是萨缪尔森始料未及的。因为在银行中存下了足够多的钱，消费者们便急不可耐地开始争相购买住房、汽车、家用器具以及其他中产阶层生活方式的必需品。他自己一直认为，他令人尴尬的错误预言使凯恩斯主义在学术界的传播遭到了延误。对一个痛恨失误并且也很少犯错的人来说，在事业早期铸此大错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也许不无裨益。因为它让萨缪尔森对待经济预测的态度更为审慎，也使他在开口表示支持或反对某项政策之前会考虑得更加周到。

军队复员无疑给美国的大学院校带来了好运，这对麻省理工学院和它成立不久的经济学系也不例外。在罗斯福 1944 年的那次著名演讲之后，美国国会只通过了唯一一项经济人权法案，这便是《军人安置法案》。该项法案对战后的经济起到了巨大而长远的影响。在英国，为了回报英国人民在战争中作出的巨大牺牲，工党政府选择构建一个福利国家制度并为人民提供终生保障。《军人安置法案》则是美国所采取的相应措施。根据大卫·肯尼迪的说法，唯一有分量的反对意见是来自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的母校，芝加哥大学，还有该校很有名的校长，罗伯特·希钦斯。希钦斯警告说，“高等学院和大学将会变成流浪者和失业者出没的场所。”[22] 麻省理工学院因为尚未开设经济学研究生的课程，所以对此它采取了更加务实的态度。

1944 年 6 月，在军队复员开始之前，《退伍军人权利法案》正式得以通过。萨缪尔森迫不及待地想离开辐射研究室，转而去从事新的项目，他觉得辐射研究室的工作实在过于单调乏味。他一度考虑过替人代笔，写一部有关曼哈顿计划历史的书，但最终还是婉言给予了拒绝。与此同时，退伍军人们开始源源不断地涌入哈佛所在的剑桥镇，这使他的教学任务在成倍的增长。1945 年 4 月，他所在系的系主任拉尔夫·弗里曼建议他编写一本以工程师为教学对象的经济学教科书。“麻省理工学院很想让我回去干一些我力所能及的项目，”由于他的工作时间依然受陆军支配，因此他向陆军管理机关作了如此的汇报。他还说，“这一天马上就要到了。把一个一流的经济学家变成一个平庸的数学家，这不再是符合国家利益的事情。”[23]

所有来麻省理工学院的新生都必须修经济学，这也是时代在变化的一个标志。但正如弗里曼私下透露给萨缪尔森的，问题是“他们都恨死了这门课。”而这对萨缪尔森而言并非是什么新闻。在日本偷袭珍珠港的第二天，当麦格劳·希尔教科书公司的销售员巴茨尔·丹迪逊前来拜访的时候，整个哈佛经济学系只有一位教授还在他的办公室里。丹迪逊告诉那位教授，他的公司正在为编写新经济学教科书物色人选，他们当时也听说有位年轻的经济学新秀近来投靠了位于剑桥镇另一端

的工程学院。到日本投降的时候，丹迪逊已和这位麻省理工的高人达成了协议。该作者很机灵地决定拒收预付订金，他坚持要求收取该书百分之十五的版税，而这在当时是闻所未闻的。[24]

萨缪尔森原想，如果福射实验室同意他离开，用一夏天的时间来写这本教科书绝对应该手到擒来。但是 1945 年，他答应万尼瓦尔·布什并成为了后者的三名代笔人之一。布什是麻省理工的一名工程师，他还是雷声公司的创始人。当时他正主持着一个战后计划的研究小组。罗斯福派给他一项任务，让他提交一份题为《科学：永无止境的前沿》的研究发展报告。[25] 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一书直到 1948 年 4 月才宣告完成，但在这之前麻省理工工程系的学生早已捷足先登看过它的油印讲义。

在他 1925 年名噪一时的著作《耶鲁的上帝和人》中，作者小威廉姆·F. 巴克雷将批评的矛头直接指向了自己的母校。“耶鲁经济学所起的最终影响，”他指责道，是“彻头彻尾的群体主义”，而这恰恰与该校全体校友所衷心拥戴的企业价值背道而驰。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他以“经济学 10”这门课的教材作为例子。在耶鲁，平均有三分之一的班级都选修了这门在耶鲁属于入门课的课程。[26] 而在遭到巴克雷指责的教材中，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赫然在列。巴克雷指斥萨缪尔森在美化政府的同时，也贬低了竞争和个人进取的作用。萨缪尔森的“如簧巧舌……以及肥皂剧般的吸引力”让巴克雷极为恼火。[27] 而更让他怒不可遏的是《经济学》一书的作者竟然暗示，巨额的财富和遗产的来历往往很值得怀疑。

《经济学》一书中有许多被传统智慧视为大逆不道的言论，而与传统智慧的吻合之处却屈指可数。[28] 他弃亚当·斯密“隐形之手”不用，而新提出了“缺少有效方向盘的机器”的概念，并用它来生动地描述私有经济。[29] 萨缪尔森并没有将政府看做一个绝对邪恶的势力，相反，他认为政府已成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因素。因为“生活中错综复杂的经济状况使得社会协调与计划成为必需。”[30] 而且，有必要强调的是，“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再也不会相信‘治理得最好的政府必定是

最无为的政府’这样的话。”[31]一战之前由金本位制强加在人们身上的货币秩序被人们轻而易举地否定了，因为“它让每个国家变成了它自己经济命运的奴隶，而不是它的主人。”[32]萨缪尔森将实现预算平衡同样视为老旧过时的痴心妄想，他向学生们保证，“一个对实行赤字支出政策如此痴迷的国家完全应该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或在更长远的时间里将这项政策一直贯彻下去，在技术和财政方面我们没有任何原因对此说不。”[33]

《经济学》的这位年轻作者在他的书中与其他年轻人进行了直接对话：

好好打量一下你右手边的那个人，
然后再好好看看你左手边的人……

现代经济学的首要问题是经济萧条的成因是什么。其他还包括经济繁荣、充分就业和高生活水准的成因又是什么。我们从二十世纪的历史中能够读到，民主制度的政治健康与它是否能成功维持和稳定高就业率和较高的生活水平息息相关。独裁政权之所以能在世界上泛滥成灾并且最终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世界未能充分解决它所面对的最基本的经济问题。这一说法丝毫都不过分。[34]

萨缪尔森代表了大政府与自下而上民主的时代思潮。他煞有介事地宣称，“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正在接受人们的考验。”[35]这本书的篇章结构反映出了崭新的优先考虑的事项。萨缪尔森开篇便解释了国民收入是如何产生、分配和支出的，同时他也阐述了政府税务和支出的决定是如何影响到私有经济的。这些内容“不仅对理解战后的经济世界至关重要”，而且“人们普遍对它们都很感兴趣。”他改变了通常的顺序，将宏观经济学放在了前面，而将一些传统的内容，比如厂商理论和消费者的选择放到了书的第二部分。由于人们在战争期间存有大量储蓄，而且还购买了大量的政府债券，因此人们对投资的兴趣也应运而生。萨缪尔森觉察到了这一现象，他也意识到该书需要照顾到工

程师们的口味，因此，在书中他特地拿出一整章的篇幅来讲述个人投资和股票市场。

萨缪尔森基本上是将凯恩斯新经济学与从马歇尔那里继承来的经济学理论结合在了一起。同时，他也效仿马歇尔的做法在书中加入了自己的见解和方法。在《经济学》一书的第四版中，萨缪尔森将他这套方法命名为“新古典综合派”[36]。马歇尔和熊彼特都曾经强调，生产力的发展是生活水平提高最主要的决定因素。而萨缪尔森则添上了一条，“防止大规模失业的发生也是极其重要的。”[37]

他借用《爱丽丝梦游仙境》的故事来说明这其中的关联。在实现了全面就业的世界里，换句话说，在一个匮乏和依赖替代品的世界里，从来都不会有免费的午餐，更多地占有某样东西意味着将在其他东西上失去相应的数量。在这样的世界里，那些用数学语言也许阐述得更加准确的旧规则完全适用。但在凯恩斯主义的富足世界以及不完全就业的情况下，获取免费之物这样不可能之事便成为可能。“节约悖论”便是最好的例子。[38]在全面就业的经济里，如果一个家庭将他们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存起来，这将使该经济的储蓄总额增加。而在经济萧条期间，事实上，储蓄行为将导致社会存款的总额下降，因为消费支出的减少将使生产和收入—从而也使得存款—出现下降。而在非全面就业的情况下，“一切都将颠倒过来”。这些对政府节约开支的行为也同样适用。

经济大萧条并非某一单个市场而是众多紧密相联的市场发生的大崩溃。在该书 1948 年的版本中，萨缪尔森并未提出宏观经济学这一概念。“你我都认为，宏观经济学涵括的主要是有效需求、失业总数、通货膨胀率，等等。”假如说真的有一句话是萨缪尔森希望学生们能悉心领会的，那它便是货币政策已经不再灵验。经济大萧条的爆发便是明证。他指出，“如今，没有几个经济学家还会将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视为操纵经济周期的灵丹妙药。”[39]依赖美联储的观点就好比二十年代的时髦服装，它早已过时并落满了历史的灰尘。这段话用在一年前已然去世的费雪身上也不为过。事实上，施之于 1933 年以前的凯恩斯也并无不可。

虽然《经济学》一书在大学课堂上取得了势不可挡的成功，但如果有人仅凭这点便以为华盛顿已全心全意接纳了这位经济学新星，那他就错了。今天，每当谈起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们总免不了有一丝淡淡的怀旧之情。但那十年中，我们其实有过三次令人瞩目的经济衰退，其中一次还极其严重。在那十年的末期，失业也处于较高的水平。有些时候，历史学家们并未能完全领会杜鲁门和后来的艾森豪威尔为什么都要将平衡联邦赤字，尤其是削减军事支出，作为他们执政的当务之急。还有些时候，历史学家们也未能将杜鲁门为因应冷战而发表的强硬言论与他真正以实力作后盾而作出的承诺区分开来。但正如赫伯特·斯坦恩所解释的那样，杜鲁门不仅曾在 1945 年寻求削减军事支出，在 1946 年、1947 年和 1948 年他也同样醉心于此。马歇尔计划只是一个例外，而非惯例。

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距该如何解释呢？答案之一是财政审慎。杜鲁门坚信，一个强大的国防必定是建立在健康的经济之上，在很大程度上他还将同盟国的最终胜利归功于美国出色地充当了“民主兵工厂”的角色。对杜鲁门这位个来自中西部的财政与经济上的保守者而言，（而且，毕竟他面对的是一个共和党控制下的国会）他的首要任务是要通过消除联邦政府的年度赤字并且防止战争债务进一步增加。1940 年，美国的国防极其空虚这一事实告诉人们，美国从来就没有在和平时期维持庞大军事力量的传统。在战胜德国以后，解散军队以及让士兵复员的压力是政府难以抵御的。杜鲁门随后提出的一份和平时期普遍兵役制的草案就被反对意见以压倒性的优势击败。为了保卫美国的安全，我们需要在全世界范围内展示力量。而现在，我们的需要又新增了一项，那便是需要用尽可能少的钱来达到这一目的。

一直到六十年代，凯恩斯主义才终于得到华盛顿的青睐。在萨缪尔森的所有学生中，没有比约翰·肯尼迪更重要的人了。在 1960 年总统竞选开始之前，肯尼迪邀请萨缪尔森前往他位于鳕鱼角海恩尼斯港的家中，在室外给他上一堂课。“我原以为这一趟应该能饱餐一顿美食，”萨缪尔森后来打趣道，“结果我们就吃了些法兰克福香肠和

豆子”。

总而言之，肯尼迪的冷静、精明和慎重颇对萨缪尔森的脾气。人们很难让这位新总统改变他的观点，但一旦他作出了决定，他便不再动摇。虽然政府已经有了数额巨大的预算赤字，但为了重振经济，也为了提升他自己糟糕的支持率，肯尼迪呼吁进行一次规模巨大的减税行动。“经济衰退将为我们带来最为严重的赤字，”他在一次有电视转播的发言中对全国民众补充说，“降低个人和企业的税率是我们预防另一场衰退发生的至关重要的一步。”

在肯尼迪遇刺身亡之后，他 1963 年提出的减税政策在国会顺利获得通过，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功。直到 1970 年，理查德·尼克松总统仍然一再声称，“如今我们一个个都成了凯恩斯主义者。”然而，1963 年的减税政策标志着凯恩斯主义在调控经济周期方面达到了其成就的顶峰。萨缪尔森认为，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世界上最富裕的几大经济体先后发生了滞胀，即失业、通货膨胀以及生产力同时出现停滞的现象。正是由于滞胀的出现，而非更有竞争力的经济理论的出现，才使凯恩斯理论的地位变得摇摇欲坠起来。早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初，密尔顿·弗里德曼就已开始从芝加哥大学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理论定式发起了攻击。有人认为，“通过调整预算，政府应当能选择一个对它最有利的失业和通货膨胀的组合。”弗里德曼向这种观点提出了挑战。他为欧文·费雪的思想遗产以及货币供给决定经济产出的理论重新注入了生命力。并且，他还将经济大萧条重新解释为一场对货币流通进行控制和调节的巨大失败。弗里德曼首先说服了那些年轻的经济学家，而后是总统吉米·卡特。卡特总统因此任命了保罗·沃尔克以试图驯服通货膨胀这头怪兽。货币政策毕竟还是非常重要的。弗里德曼和萨缪尔森都没有再回到政府部门工作。二人都认为，他们在著述和教学岗位上所起的作用比出任总统幕僚或美联储官员所能起的作用要大得多。

第十七章

巨大的幻觉：罗宾逊在莫斯科

“现如今讲授经济学理论真是太难了，因为我们不但有了社会主义国家还有资本主义国家。”

——琼·罗宾逊，1945 年[1]

4 月的莫斯科依然春寒料峭，积雪尚未完全消融，直到夜里九点日光仍然恋恋不舍不肯坠去。街角突然冒出了数位乡下来的老妇人在叫卖含羞草。1952 年的春天，在丘吉尔宣布英国已拥有原子弹之后不久，琼·罗宾逊出神地凝视着克里姆林宫金色的圆形屋顶，激动万分，思潮澎湃。她觉得眼前的景象既那么熟悉，又不可思议的陌生。“我目不转睛地看了又看，”她在日记中写道，“我不敢相信自己眼前的一切都是真的，也不敢相信正亲眼看着这一切的人真的是我自己。”[2]

稍后，在高柱穹顶的巨型会议厅里，罗宾逊心不在焉地听着那些夸夸其谈的发言、和平决议的讨论以及“苏格兰妇女”代表向她发出的“兄弟般”的问候。她的思绪已全然被会场外那个崭新的社会给她留下的印象所占据：农贸市场上那一堆堆粉红的萝卜和黄绿色的莴苣；商店里闪亮的橱窗上满满挂着的那些火腿、香肠和奶酪。（在英国，挂在橱窗里表示真货已经卖完，而在这里则与英国不同，挂在橱窗里是

出于卫生的考虑）；忙着去上班的妈妈们将衣食无忧的孩子放心地留在免费的托儿所里；已经变小的衣服在寄卖商店里被集中回收再行利用（“这是一个多好的主意啊”）；它的“公共秩序和清洁程度能与瑞典标准相媲美”，但却没有斯堪的纳维亚死气沉沉的氛围。这与沉闷，肮脏和破败不堪的伦敦是一个多么鲜明的对比啊。[3]

罗宾逊尽情享受着主人的慷慨好客。对她的招待如此丰盛，几乎让人觉得在这个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里，货币已经真的被完全废除。四百多位代表无一例外都享受到了皇室般的待遇。[4]他们下榻的酒店“有巨型楼梯，枝形吊灯以及孔雀石铺设的地板，奢华的程度不亚于任何苏丹国王的宫殿”[5]。从捷克斯洛伐克到布拉格一路过来一切都是免费。主人给每位代表发了一千卢布的零花钱，以便他们去特供商店购买伏特加、动物皮毛和鱼子酱等物。一百多辆黑色豪华轿车组成的车队配备了身着制服的司机，随时听候代表们的差遣。而罗宾逊却不顾缺少交通地图，也不管她的俄语水平十分有限，仍然兴致勃勃地坚持去试坐了一趟地铁和有轨电车。[6]剧院和芭蕾表演最好的座位都随时为他们留着。在英国，土豆泥是定量供应，而且被磨成了粉末状，腊肠吃起来味道像是湿乎乎的面包。相比之下，莫斯科的晚宴则简直是“完美无比”。即使从“吃”这一小事上也能反映出“正在崛起”和“正在没落”的强国分别都意味着什么。有某一次大快朵颐之后，琼仿佛看到“大陆在自己的四周延伸开来，就仿佛维多利亚时期的宴宾们也许会觉得全世界的物资正经由海上航道一直被送到他的桌上。”[7]

虽然表现出了“东方式的好客”，但罗宾逊强调说，她的俄国东道主在大会的组织上却展示出了“日耳曼式的效率”。五百名包括口译员、翻译、打字员和信使在内的服务人员在随时听候来访者的派遣。琼非常自信地觉得，“所有那些翻译、车辆和向导并不是来监视我们行动的，他们是为我们提供方便的。同时，俄国人也不折不扣地遵守了他们不进行任何公开宣传的承诺；（据《时代》杂志的报道，俄国人甚至将公共场所通常要悬挂的有真人大小的斯大林画像都一一摘除。[8]）置身于后种族社会的莫斯科，罗宾逊不禁欣喜若狂，在这里，“你可以拒绝接受一个令人生厌的东方人，就像你可以不接受一个讨厌的英国

人一样。”[9] 这才是西方一直都不敢承认的事实真相。

虽然罗宾逊并未大肆散布对西方前途的悲观言论，但她对东方的未来却明显满怀信心。此次大会其实就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就是由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联合国。会议大厅里“非常聪明地”配备了同声翻译装置，这些装置似乎体现了与会代表对统一的世界经济和世界认识的向往。[10] 正在紧锣密鼓进行中的冷战使世界经济产生了裂痕，而罗宾逊和与会的大多数代表一样，都认为美国，这个世界上新兴的帝国主义超级强权，一手造成了这一局面。博伊德·奥尔勋爵率领一个二十三人组成的代表团出席了此次大会。他的发言道出了绝大多数代表的共同心愿，他呼吁东西双方“冲破横亘在他们之间的铁幕，让我们把东方丰富的物产一车接一车地运往急需它们的西方国家，然后再用这些车辆满载着西方的货物回来以满足东方的需求。”[11] 代表们相继发言，他们一致认为，美国最新颁布的禁止向苏联集团出口战略性物资的命令以及其他类似的“人为障碍”一旦被清除，东西方之间宛如涓涓细流一般的贸易将顿时变成一股洪流。所有的经济隐患，无论是英国纺织业界的失业，还是印度难以根除的贫困，都将通通被扫除。一位美国代表信誓旦旦地表示，贸易协定的签署将使“人类的手足之情发生连锁反应”，从而避免核武器大屠杀的发生。

在莫斯科呆了一个星期之后，罗宾逊得出结论，斯大林并非独裁者，相反，他是一位充满爱心，颇为严厉甚至让人难以接近的父亲般的人物。她还记录了一个令她深受感动的故事：战争爆发前夕，一名年老的女厨师一直在莫斯科某户人家家中干活；后来随着纳粹的入侵，她被分配到了一个乡村小镇的工厂里工作。战争结束以后，她从前的女主人被批准返回莫斯科，而她却仍羁留在外。“在通过正常渠道无法解决她的问题的情况下，”罗宾逊在日记中如此写道，“她直接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说明工厂并不适合她，而且她住的小镇已完全被摧毁，在这个世界上，除了那位女主人她早已没有别的亲人。”据琼的说法，“在三个星期之内，她便拿到了（返回莫斯科的）许可。”[12]

同莫斯科告别之际，罗宾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信，冷战的爆发完全是一个错误，错误的根本在于美国偏执狂般的疑惧，而不是

苏联处心积虑的结果。回到剑桥之后不久，她出版了《会议素描》一书并得出了一个颇为祥和的结论。“我毫无保留地相信，无论是靠言论还是用武力，苏联都丝毫没有要拯救我们灵魂的意思。”她如此写到。至于苏联对东欧各国实行的强制性统治，她在书中没有直接提及。但她坚信，苏联的做法完全是出于担心遭到西方的包围。“如果我们能向他们保证我们绝不会干涉他们的话，那他们一定也不会阻拦我们在通往罪恶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她还请读者们放心，“如果我们本国的共产党人并不这么想的话，那他们受苏联的蒙蔽比我们更加严重。”[13]

罗宾逊并未将自己描写成一个前往社会主义的新麦加圣地朝觐之人，相反，她自诩为客观的观察家，讲真话的人。她坚称，她和其他与会者一样都并非“什么人的代表，他们都是在进行工作，很多人认识到，将我们在这里的所见所闻原原本本地告诉人们有多么重要。”[14]但她其实知道，人们不一定会相信她。她在给理查德·卡恩的信中说，“回去以后，肯定有人会要向我们扔泥巴，对此我们已有心理准备。”[15]结果在她回去以后，迎接她的非但没有泥巴，相反，她在剑桥开设的介绍苏联社会的讲座听者甚众。“但那个犹太医生企图阴谋暗杀斯大林是怎么回事呢？”有一个操美国口音的本科生大胆地提了个问题。她想都没想便答道，“那你们的南方对黑人动私刑又是怎么回事呢？”[16]

至此，罗宾逊已经死心塌地充当起了莫斯科的明星知识分子。这是一个极具挑战而同时报酬也格外丰厚的角色。每年她都可以享受公费旅游，有机会与最高当权者同聚一堂合影留念，她在莫斯科开有银行户头，她交际网中的朋友即使不全是，至少也绝大部分都是政府官员、地下共产党员或者是间谍。

《速描》一书中描写的那位像爱丽丝一样误打误撞进到了社会主义仙境里的大眼睛的解说员其实是大会的组织者之一。如果知道了这一真相，读者们一定会大吃一惊。罗宾逊是促进委员会中的两名英国人之一，虽然她自己坚称，她之所以加入该委员会完全是为了给“她的老朋友奥斯卡·兰格”一个面子。兰格是一位信奉中央计划的波兰经济学家，此公曾与克格勃有过密切合作。英国外交部断定，她对这次

大会的“所有来龙去脉都心知肚明”。而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对她的“极端观点”也颇有微词。[17] 她那些所谓的“极端观点”恰好与从英国来的另一位叫杰克·佩里的代表的观点不谋而合。而佩里是英国共产党的官员兼商人。据来莫斯科的英国代表团的成员阿莱克·凯恩克劳斯爵士报告，代表们都清楚该次大会原本是“共产党展开和平攻势的一个新的步骤”。因此，当斯大林出于政治动机，即为了离间美国与其欧洲盟邦的关系而充当这次大会的东道主时，代表们都并不觉得奇怪。[18] 出席大会的经济学家们，包括兰格、于尔根·库钦斯基、皮埃罗·斯拉法、查尔斯·马奇在内，也几乎全都是党员或共产党同情者。

然而，对于斯大林的真实想法罗宾逊并不比哈里·德克斯特·怀特知道得更多。比如，她肯定不知道，仅仅在大会召开前数星期，斯大林刚对此次大会的基本前提和宗旨进行了大肆批判。在2月初的一次讲话当中，斯大林就曾对与西方和平共处经济融合的观点加以驳斥，而该观点正是罗宾逊和像她一样梦想实现寰宇一家的人们所期待的福音。也曾经有苏联共产党人预言，将会出现一个统一的世界经济体。斯大林对这些人进行了猛烈批评，他指责他们被二战期间以及二战结束之际的一系列国际合作所误导。他警告人们，第二次世界大战最重要的历史遗产便是它将世界经济永久分隔成了“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经济体系将老死不相往来，并将保持相互对立。这样，一个“难以避免”的后果就必然发生：西方的经济危机将进一步加深，帝国主义之间的尔虞我诈和竞争将进一步激化，而最终，美英两国之间将爆发一场自相残杀的战争：“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战争是无法避免的。这仍然是百试不爽的真理。”[19] 斯大林向他的听众们保证，所有他讲的这些都是科学规律。

美国专攻冷战的历史学家约翰·盖迪斯认为，斯大林的这番话的确是他的肺腑之言。[20] 很显然，斯大林对俗世间世界末日说的信仰之虔诚丝毫不亚于早他一个世纪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但他这番讲话的时机却显然将主持召开这次大会的俄国人置于极其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他们不断以大宗订货为诱饵以保证英国纺织厂商和其他商人们能前来出席大会，而另一方面，斯大林却依旧咄咄逼人，他甚至宣称，共产

主义阵营将能很快实现完全摒弃来自西方的进口。他还坚称，更可能的是，苏联及其盟邦很快“便会觉得有必要为他们的过剩产品寻求国外市场。”[21] 然而就在大会召开前夕，斯大林却又表示，在不干涉别国内政和其他一些前提条件下，他对“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和平共处”是有可能的这一更为政治性的观点还是支持的。[22]

如果说罗宾逊对会议进程确实有过不满，至少在公开场合或在给卡恩的信中她没有作出任何表示。她和其他与会代表极有可能根本不知道斯大林有过那样一番讲话，因为一直到次年 10 月那篇讲话才被翻译成英文。[23] 大会期间达成的贸易协议所带来的成果非常有限，而大会对这些协议的公开宣传却极尽夸张粉饰之能事。据一位经济学家估计，这些协议所促成的东西方间的贸易额甚至将远远低于战前的水平。

罗宾逊很可能真的对事实产生过怀疑。她曾一度蹿达进商业部的一些办公室，亲眼目睹了算盘和台式计算器并排摆在桌上的场景。也许，正是这种现代和古代并存的反常现象使她注意到了另外一个不协调之处：那就是，参加大会的苏联经济学家们“在发言中很少援引数据，他们对这种发言技巧的掌握堪称大师。”[24]

剑桥经济学家杰弗里·哈科特曾为罗宾逊写过传记。他将她经历政治“转变”的时间定在 1936 年。[25] 对英国知识分子而言，1936 年与经济大萧条的关系并不是很紧密，因为那年经济萧条在英国几乎已接近尾声。对他们来说，那一年与西班牙内战的开始联系更多一些。当德国和意大利应民族主义者的请求开始进行干预时，站在西班牙共和党一边的苏联也搅了进来，于是，这场冲突便逐渐被视为一场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代理人之间的战争。斯大林在西班牙挺身而出同法西斯所作的斗争大大提高了苏联的威信，而英美两国在这场冲突中选择了置身事外，这让他们看起来胆小怯懦，这还是往好听了说。

然而，1936 年的罗宾逊正为她在阿勒颇的诗人恩列斯特·阿托彦着迷，而思想上她也完全被凯恩斯所束缚。一直到 1939 年她才开始从感情的崩溃中恢复过来，并开始研究被凯恩斯深恶痛绝的马克思主义。这也让长期以来对她崇敬有加并一直与她保持联络的熊彼特十分惊讶。

在战争期间，她涉足过的政治活动无非是参加了若干工党的顾问委员会，替工党撰写政治传单，还参与了一些报告的写作。这其中就包括《贝弗里奇就业报告》。该报告是由她的好友尼古拉斯·卡尔多最先起草的。卡尔多，这位绝顶聪明的匈牙利人原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教师，结果他与罗宾逊和哈耶克一样辗转到剑桥并在此度过了战争中的岁月。她认为西方必将陷入长期的经济停滞，并且将反复遭遇经济萧条的爆发。她的这一观点得到了散布在各政治派系中凯恩斯主义者的一致赞同。但在 1943 年，她尚未排除这个问题根本无法解决的这一可能："与失业问题相比，战后出现的所有其他问题都黯然失色。我们生活在其中的那一经济体制正经受着严峻考验。现代世界正目睹一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伟大试验……民主国家究竟能否找到一条通向和平与繁荣之路仍待见分晓。"[26]

与工党其他经济学家们一样，罗宾逊大力提倡将社会主义计划与凯恩斯主义利用税收和补贴来调控需求的办法结合起来。[27] 作为英国工会联盟的顾问，她赞同对大多数产业实行国有，她的理由是政府必须有所有权才能实施其计划[28]。她更为认同的解决办法包括：政府制定经济计划、控制投资以及在关键产业实行国有；同时"在保证其不会造成对公有制的进一步侵蚀的前提之下，允许少量小规模私营经济的存在。"[29] 所有这些都是标准的工党左派立场。有历史学家评论说，"及至 1944 年，在战争时期曾达到顶峰的激进主义业已渐渐平复，而卡尔多和罗宾逊提出的计划在调子上明显要温和得多。"[30]1945 年 12 月，凯恩斯从华盛顿回到了英国，他向人们公布了那笔"臭名昭著"的美国贷款的详细条款。尽管为了这笔贷款，他与美国人唇枪舌剑磨破了嘴皮，但回来以后，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将他骂了个狗血淋头。然而罗宾逊却公开表示了对他的支持。她认为，英国根本无力将该笔贷款拒之门外，而且英国也无法承受与美国疏远关系的可怕后果。

在 1945 年工党全面执政以后，罗宾逊与反对工党领导层的极左派站在了一边。与 1931 年的工党政府不同，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的政府上台以后便立即开始兑现他们在战争期间许下的承诺：推动产业国有化和建立终身福利国家制度。随着失业率逐渐下降以及工资的逐渐

上涨，她对工党领导层的意见不减反增，而且她对国内事务的关注愈来愈少。美国的强大以及核战争的威胁时刻在困扰着她。工党取得的压倒性胜利并未能如人们预想的使英国的外交政策完全背离丘吉尔的极端亲美反苏路线。据历史学家乔纳森·施纳的说法，工党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当时就曾认为，“与俄国人就战后世界格局达成坚实可行的协议根本是不可能的。”和许多保守派人士一样，贝文的首要目标是要说服美国：“他们必须挺身而出，要抢在俄国人之前，将欧洲和其他地区由于英国国力日薄西山而形造成的权力真空都填补上。”[31]

1950年，斯大林曾向英国共产党领导人哈里·波立特抱怨道，工党对“美国人的卑躬屈膝”与托利党人相比有过之无不及。[32]斯大林在竞选刚刚结束之际发表的这番对工党的攻击性言论，起到了鼓舞士气、促进党内团结的作用[33]。工党内的左翼人士对斯大林指责他们尚不及托利党的说法深恶痛绝，因为当时，他们正在国会为实施重工业国有化和建立全国性医疗体制展开一场激烈的斗争。虽然左派依然倾向于不结盟立场，但苏联在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波兰以及东德的所作所为，已让他们对俄国人的敌意越来越深。早在1946年，工党的领袖们便已坚定不移地相信一点：对和平的主要威胁是来自苏联，而非美国。

左派的核心分子在今天所谓的人权问题上与党内主流意见相悖。这些人为数不过十几，但都是像罗宾逊一样的激进分子。与美国的政治自由派相比，工党左派的绝大多数人的反共立场要坚决得多。公开的共产主义者，如D.N.比里特和约翰·普拉茨-米尔斯，都被驱逐出党，而且英国共产党要求加入工党的要求也遭到了否决。哈洛德·拉斯基是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他曾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任教并于1945年担任过工党主席。即使是拉斯基这样可靠的亲苏派人物，也替工党领导层的行为进行了辩解。他指出，共产党人“采取行动的方式宛如混编旅中的秘密伞兵部队……为了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会不惜牺牲真理和诚实的原则。”[34]对绝大多数英国左派而言，英苏两国在战争中曾经谱下的那段浪漫早已成为昨日云烟。

但对罗宾逊却不然。天生的独断性格以及对民主制度标志性的政治妥协的不屑一顾，使她对斯大林在国内大张旗鼓的整肃以及在国外

浑水摸鱼的伎俩都无动于衷。如果说世界舆论对斯大林的广泛谴责对她真产生了什么影响的话，那也是使他在她心里的形象变得更加高大。在她看来，美国才是对世界和平最大的威胁。“俄国是不是真的在为侵略做准备，这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因为，假若根本不是，那我们的政策整个就是荒谬的。”她还指责美国故意将意识形态和军事入侵混为一谈，她指出，“美国发展军备的迅猛之势已超出了令人放心的限度……如果国际局势出现缓和，导致军备开支突然下降的话，对他们的经济将是极其不利的……于是最省事的办法自然是一切照旧。在我看来，这才是当前局势中存在的最大威胁。”[35]

马歇尔计划的突如其来导致了英国左派的分裂。1947 年 6 月 5 日，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在哈佛发表的讲话中对他的计划做了一番概述。“美国应该尽其所能地提供帮助以使世界经济保持正常健康的局面，因为非此不能维持政治的稳定，世界和平也将无法得到保障。”马歇尔计划的出台使国际货币基金与世界银行的作用相形见绌。国际货币基金原本就“几乎无所作为”，而世界银行则一直忙于节减开支并拒绝为战后重建提供任何贷款。理查德·加德纳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的董事们在 1949 年发表的报告无异“为战争期间人们对多边贸易的美好憧憬写下了墓志铭”。加德纳还断言，“战争结束至今已有四年，然而对双边贸易和双边货币的依赖程度甚至比战前还要严重得多。”[36] 不出一个月，苏联外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在共产主义阵营国家在巴黎召开的一次大会上公开表示了对马歇尔计划的反对，他并且指斥其为“美国奴役欧洲的计划”。

工党对美国的援助表示了欢迎，他们认为这是“欧洲迈向统一和繁荣的重要一步”。而罗宾逊却随即对该计划进行了谴责。[37]6 月 25 日在英国广播公司的“伦敦论坛”节目中，她再次提出，美国资本将“在西方建立一个反对共产主义的阵营”，而这将使战争爆发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加。她还补充说：“靠获取美元援助和分裂欧洲将使西方的价值观得到维护，我觉得你们的这种说法无法自圆其说。相反，我认为那将使西方的价值观遭受严重威胁。”[38] 换言之，她认为英国应该仿效苏联及其东欧盟国的做法，拒绝接受美国的援助。这一观点将她置于

团结在工党后面的几乎所有英国左派的对立面。英国共产党是唯一的例外，他们指责工党“已经背叛了自己的原则而被华尔街收买了”。[39]

罗宾逊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对斯大林的支持与比特丽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对斯大林的热情相比更让人不解，也更具无条件性。这有点类似于她早先对凯恩斯的崇拜。她曾一度将凯恩斯视为自己的偶像。[40]政治学家比尔·琼斯在他1977年的著作《俄国情结：英国工党与苏联》中估计，1946年罗宾逊在工党里的政治同道只有大约二十位左右。她为苏联所作的大力宣传将她与这位被乔治·奥威尔称为“具有社会主义信仰和自由主义性格”的拉斯基以及绝大多数工党左派区分开来。由于她的这一立场意味着对她家庭传统价值观的背叛，因此它必然少不了有口是心非的成分。而外界对此的谣传更是五花八门。“遇上难以启齿之事，还是保持缄默为宜……”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在其《逻辑哲学论》中曾有这样一句名言。罗宾逊在发表自己见解的时候从来都无所畏惧，但唯独在她与苏联的关系一事上始终守口如瓶。

1939年，她曾向理查德·卡恩坦承，“这些年来，在她对政治信仰和对国家民族的忠诚之间一直都存在着裂痕，而且其紧张程度有增无减。”[41]及至她彻底投靠莫斯科之后，她之前关于西方注定没落而东方却将欣欣向荣的预言如今早已成了她的人生信念，而在对信仰和民族的忠诚之间她愈来愈难以取舍。1952年夏秋之际，罗宾逊的情绪非常高涨，甚至有些亢奋。她写道，她发现了一些秘密，其中就包括为什么她与卡恩的关系总是不如人意。她开始相信，她已经发现了经济理论基础中隐藏着的一个瑕疵。一旦人们认识到这个瑕疵的存在，资本主义制度便将会土崩瓦解。入秋以后，她便无法进入睡眠，而且嘴里一直讲个不停。很显然，她得了妄想症。卡恩、罗宾逊和厄尼斯特·阿托彦三人协商之后，她又一次住进了医院，这一住就是六个月。

她身体恢复得十分顺利。次年春，她又一次回到了莫斯科。此时，斯大林已经去世。在她精心安排的这一趟朝圣之旅中，莫斯科不过是第一站。她还将先去北京，然后是去受俄国庇护的包括缅甸、泰国、越南、埃及、黎巴嫩、叙利亚和伊拉克等一众第三世界国家。而且，她还同意出任英中国际贸易委员会的副主席。该委员会的董事会

成员大多是英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它曾经被怀疑是英国共产党借以进行资金运作的渠道。该组织的主席是营养生理学家博伊德·奥尔勋爵，他曾担任过参加莫斯科大会的英国代表团的团长，他一直也是此类场合的常客。[42] 在所谓的“破冰计划”中，她也许曾觉得自己扮演的角色颇为尴尬。因为在“商业部署”的签字仪式上，她被晾在了一边，她被挤到某位达官贵人的身后一个连照相机都几乎都照不到的位置。密尔顿·弗里德曼那一学年度一直在剑桥进行访问。像罗宾逊这样杰出的经济学家竟然“会为苏联的政策作辩护和大唱赞歌”，“这让弗里德曼百思不得其解。”[43]

此时年已四十九岁的罗宾逊比以往更令人敬畏，她像“瓦尔基里女战神一般光彩夺目”，同时不乏美丽女人的风情，而且还身兼苏俄人民委员。傲慢专横，在才智上高人一等的她有着令人神往的诱惑力。坚定的信念与恰到好处的讽刺在她身上合为了一体。虽然直到 1958 年她才被英国学会吸纳，而且，一直到 1965 年奥斯丁退休之时，她才被授予大学教授的职位，但正是她的挺身而出才填补了凯恩斯去世后出现的领导真空。当时她并非唯一一位名声卓著的凯恩斯主义者，但由于斯拉法正埋头收集和编撰大卫·李嘉图的论文集，而尼古拉斯·卡尔多则正逐渐成为工党的政治圈内人物，于是她便当仁不让地开始发挥自己的影响。她周围的男人都唯她马首是瞻。

约翰·希克斯，这位后来以其在经济增长方面的成就与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阿罗共享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曾在牛津大学主持过一场研讨会。据一位与会者回忆，在会上，罗宾逊“不住地跟希克斯叨叨他曾经说过的一些话。他十分窘迫，脸色越来越红，最后他只得结结巴巴地说：‘我从没说过那种话。’而她立即顶了回来：即使他没说出来过，但他心里其实想要那么说。”[44] 身为天主教徒的凯恩斯从来都很注意不画地为牢，不被自己的思想观点所局限。他不喜欢自己的学术继承者们成为理论空谈家。与凯恩斯不同的是，琼却喜欢四处网罗。由她教诲过的男性不是被她迷得神魂颠倒，便是哑口无言。他们中有人曾这么回忆道：

“R夫人会坐在一个当坐凳用的厚垫子上，用一支很长的烟嘴抽烟……她穿着一件女式浴衣，将正在变得有些灰白的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发髻，她那双睿智的眼睛正在舒展开来的眉毛下聚精会神地看着我。那幅情景依稀就是毕加索的名画《葛楚·斯特恩肖像》的再现：那么实在，那么真实。然而，二者的相似之处也仅此而已。即使R夫人称不上是最有吸引力的女人，她容貌之秀美至少也是罕有的。在她常坐的厚垫子旁有一张小桌，桌上摆着一幅手绘的素描，素描画的是一位裸体女人，她坐在地上的厚垫子上，双手捂住了自己的脸庞。”[45]

对罗宾逊而言，英国剑桥已成为美国马萨诸塞反剑桥的一块阵地。她对数学的厌恶和鄙视几乎到了病态的地步。计量经济学会邀请她担任该学会的主席，却遭到了她的断然拒绝，她给出的理由是她看不懂该学会出版的期刊，因此她不应该成为该期刊编辑委员会的一员。她以前的导师亚瑟·庇古称琼“本人是只喜鹊，可她培养出的全都是些鹦鹉”。庇古还曾抱怨说，“她总是以真理的代言人自居，效率像普鲁士人一般高得惊人。而那些可怜的男人们就仿佛是机器做出来的香肠个个一模一样，丝毫没有自己的思想和主张。”[46]而麦克·史崔特却声称，“但对那些经济学专业的学生而言，她是最激动人心和最才华横溢的一位老师。”史崔特的家族是《新共和》杂志的拥有者，他本人后来也被克格勃网罗至麾下。[47]

琼所属的阶级曾经参与过大英帝国的治理，而当她长大成人之后却正赶上英帝国的国势在江河日下。也许正是这种站在历史失败一方的感觉使得她与历史的胜利者并肩而立的决心愈加坚定。第一次去莫斯科访问的时候，她将全部激情都倾注在经济发展之上。当时她已经认识到，“二十年前当她在静态假设的基础上撰写《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一书时，她在学术思想上便已误入了歧途。”[48]而在经济大萧条期间，她曾经绞尽脑汁试图找出答案的那个问题，在她今天看来其实根本就是一个错误的问题。现在她已意识到，当初她不应该在引发暂时性失业的原因这一问题上纠缠不休。相反，她应该集中精力去研究导

致一个国家富裕或者贫穷的决定因素究竟是什么。她还说，回首往事，她觉得自己早就应该放弃“静态分析”，转而接受马歇尔的发展理论。

长期性增长的问题原先也曾吸引过包括罗宾逊在内的凯恩斯主义者们的注意，因为他们担心实现了工业化的西方会出现长期的经济停滞。但后来形势的发展渐渐将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了那些“人口众多的落后国家”，即位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前殖民地国家。[49] 刚开始，战后经济停滞的现象并未出现，在战争中遭受了重创的英国以及欧洲的经济反弹是如此强劲以至于到 1950 年时，失业现象已经几乎完全消失，而工资则有了迅速的增长。左派们都认为，是军备竞赛挽救了市场经济。但无论如何，从此人们已不再将经济问题作为应当在西方实行社会主义的有力依据。

殖民地的解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已是大势所趋。英国的财力已羸弱至极，而且正将其有限的资源用于在其国内建立福利国家体系。而此时，各殖民地国家的解放运动正在风起云涌。冷战的愈演愈烈为第三世界国家增加了讨价还价的筹码，贫困国家越来越积极地投身于像联合国这样的世界政治舞台，他们将“发展程度较低”视为一个经济问题看待并对此十分重视。

回首往事，我们会觉得莫斯科大会发表的那些信心十足的浮夸之辞实在是盲目乐观得到了荒谬的地步。1952 年，虽然中国的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但它的人均收入却只有大约非洲收入水平的一半或者是美国的百分之五。而占世界人口总数百分之十五的印度，其收入水平也比中国高不到哪去。倘若有人在战争爆发前提出这个问题，那么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也许都会认为，贫困国家应该能逐渐富裕起来。毕竟，欧洲就是凭借比人口增长率稍稍高出一到两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从而摆脱了马尔萨斯所预言的普遍贫穷和食不果腹的命运。

然而，欧洲的经历又能给予人口众多的中国、印度以及中东各国什么样的希望呢？这些人口众多的穷国与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间差距大得出乎人们的想象。而且，即使是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英国相比，也就是与普通英国人的实际工资和生活水平开始迅速增长之前的那一时期相比，如今的这些落后国家也还是要穷得多得多。“如今，在

印度和中国的平原上，生活着人数众多的男男女女。他们遭受瘟疫的折磨，食不果腹，他们的生活状况比受他们驱使的牲畜强不了多少。”T.S. 阿什顿在 1948 年曾如此写描写道，“这种亚细亚水平，这种非机械化的惨剧，正是那些拼命繁殖却尚未经历过工业革命的民族的命运。”以英国，欧洲和美国摆脱贫困的速度来看，中国和印度要达到那样的水平至少还需花上一百年的时间。

中央计划和国营企业的利弊并不是唯一的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是国际贸易与投资。世界经济一体化与自给自足型的一体化，究竟哪个是最快的捷径呢？人们对导致经济不发达原因的不同认识将决定他对这个问题给出的答案。在一个世纪以前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卡尔·马克思就坚持认为，贫穷是一个新出现的社会痼疾。在维多利亚时期这个问题已经比伊丽莎白时期要严重得多。他们二人将责任归咎于到富人的身上。但后来的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欧文·费雪、约瑟夫·熊彼特以及约翰·凯恩斯等人却持有不同观点。他们认为，早在现代经济出现之前，贫穷的命运就一直伴随着人类。生活水平低下的根本原因并非资源匮乏，也不是不平等的收入分配方式，真正的原因在于人们不能有效利用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知识等现有资源。而现在，对世界大多数地区而言，问题则是这些国家的贫穷局面是西方经济制度造成的呢，还是本国不利于经济发展的条件和体制造成的？（西方的组织结构也许能对后者的改善助上一臂之力。）

熊彼特曾将布尔什维克在俄国这样一个前资本主义的自给自足经济中取得胜利称作是“侥幸而已”。罗宾逊在为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所写的书评中也曾这样坦承：

> “他说得也许没错。但即使如此，这个例外似乎也比惯例要重要得多。有谁知道眼下进行的这场战争结束后又会有什么样的侥幸之事发生呢？而且，即使布尔什维克的这一侥幸不会重新上演，人们也不应怀疑，即使不依靠蓄意干涉他国事务的方式，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的存在对其他国家的发展所能起到的作用将丝毫不亚于资本主义的内在特性对更加微妙的进化过程所曾有过的影响。

二战中，苏联战胜了德国这个雄冠欧洲的工业强国，这显然使罗宾逊对社会主义是实现工业化的捷径的说法心悦诚服：

> 近三十年来历史给我们的最大教训并非是针对生活水平已足够高的西方工业化国家，它针对的是那些不发达的国家。共产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虽然这只是共产主义的基本信念，但从已经证实的事实来看，苏维埃制度成功地向世人展示，资本主义取得的技术成就能够被复制，甚至可以被超越。而能实现这些成就的那个阶级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却只有劈柴挑水充当苦力的份。[50]

1951 年，罗宾逊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罗莎·卢森堡写的《资本的累积》写了一篇简短的介绍。卢森堡是德国共产党的领袖，她于 1919 年被刺身亡，她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当中少数几位有着超一流头脑的人物之一。今天，提到她的贡献时，人们更多谈及的是她早年对布尔什维克独裁专制所作的批评，而并非她在经济理论方面取得的成就。然而在 1951 年，罗宾逊却被卢森堡的一个观点深深打动，那就是，世界市场经济增长的极限是导致经济崩溃的最终源头，而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去第三世界中寻找。

卢森堡认为，国内投资机会的不断萎缩促使企业家们开始去海外寻求利润，也因此将不可避免地带来竞争。而一旦不再有这种能任由帝国主义分子肆意剥削的新的地域，或者这些帝国主义者之间发生了冲突，那么资本主义必定会由于经济停滞或者战争而崩溃。罗宾逊也意识到卢森堡的分析并不全面，因为她将帝国主义视为资本主义之所以能苟延残喘的唯一原因，却忽视了技术更新以及工资上涨等因素：尽管如此，却几乎无人能否认，资本主义疆域的扩张为经济学家所称的过去二百年来“长期性经济繁荣”提供了主要的推动力。而同时，众多的经济学家们认为，在二十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将不再像昔日一般舒坦，而最主要的原因是“全世界的边界都已经关闭”。即使如此，罗宾逊依然不无偏颇地总结说，卢森堡在其著作中“体现出的远见卓识让那些与她同时代的正统派们难望其项背。”[51]

罗宾逊自己也开始着手在经济增长方面著书立说，并且她打算借用卢森堡曾经用过的书名。[52]1949 年，她曾针对罗伊·哈罗德有关经济增长的经典著作写过一篇满含敌意的评论，此举使她的最终目的暴露无遗。[53] 她批评哈罗德无视由不同利益、历史、政治，尤其不同的“收入分配和增加有效投资的方式”所引发的各种矛盾。[54]1952 年，前往莫斯科之前，她在为《经济杂志》所写的一篇文章中将她的主要观点作了概括：经济增长，她如此写道，是一个积累物质资本的过程——包括道路、办公楼、水库、工厂、机器设备，等等。不可否认，马克思关于自由市场经济不可能永无止境地增长下去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她便能向人们证明，不论哪种经济制度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虽然从本质上而言，永久性的稳定增长并非完全不可能。”她如此写道，但“实现那种模式所需的条件在现实中几乎是不可能找到的。”[55]

罗宾逊对中国的首次访问是在 1953 年，这趟旅程为她提供了最终的证据，从而使她更加坚信“共产主义并非只是紧接在资本主义后面的一个社会阶段，它而是资本主义的替代者。”[56] 她后来曾经解释说，“私营企业已经不再是最适合运用现代技术的组织形式。”[57] 她总结说，贫穷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最大障碍并非缺乏资金和创新精神，而是来自西方的干涉。南北贸易是场零和的游戏，它不仅有赢家，也有输家。而那些贫穷国家不可避免地都将成为输的一方。她贬低了教育和发明创造所起的作用。“发达国家只会在确信它们自身不会受到任何影响的前提之下，才会容忍或者允许那些殖民地、前殖民地或者是准殖民地国家实行彻底的社会改革，并由此迈上希望之路。”她还写了这么一句似乎毫不相干的话，“和平共处合乎自然，也合乎逻辑。”

在罗宾逊努力写作的同时，理查德·卡恩则主持着一个被他和她称为“秘密研讨会”的组织活动。在一年中夏秋两个学期中的每星期二，该研讨会都会在国王学院卡恩的房间里举行。它同时也被当作罗宾逊仍在撰写之中的著作的测试场所。经常会有很多来宾应邀而至，但他们却发现要得到发言的机会很难。萨缪尔森曾对该研讨会作过一番形象的描述：“卡尔多讲了百分之七十五的时间，琼本人又讲了百分之七十五的时间。”[58]

《资本的积累》于1956年终于出版。它“恢弘的规模”加上罗宾逊的崇高地位使为之作评的不乏其人。虽然评论家们都称该书为“里程碑”或是“意义重大”，但对该书的反响总的不是很热烈。有些人批评它“缺乏新的见解”，“未能提出经实践检验过的建议和主张”，还有人说它只不过是“以语言和图表对线性规划中为人熟知的结果作了一番阐述”。[59]另外还有人批评她不理解消费者所起的作用，犯了逻辑性错误并且忽略了最新的研究成果。（这其实是英国剑桥一贯的陋习，一位评论家曾指出，皮埃罗·斯拉法在他于二战期间撰写的《用商品生产商品：经济理论批判绪论》一书时，没有引用过一份1913年以后出现的资料。）哈里·约翰逊的评论也不中听，他说，罗宾逊，他以前的这位老师，“只是自以为圆满地证明了资本主义根本行不通”。[60]萨缪尔森将罗宾逊的理论与列宁的三法则（电力＋苏维埃＝共产主义）进行了一番比较。[61]阿巴·勒纳称该书为一颗“明珠”，它不仅让人们开始重新关注“国家财富的成因”，而且该书中众多的错误和概念混淆也为研究生们提供了一个大显身手挑错的机会。[62]与罗宾逊政治立场相同的劳伦斯·克莱因对她书中的见解也不以为然，他称该书为“用经济理论中最大化或者最小化原理便能推演出来的再普通不过的结论。”[63]

麻省理工学院的凯恩斯主义者罗伯特·索洛同年也同样发表了一篇有关经济增长的论文。该论文后来为他赢得了1987年的诺贝尔奖。索洛的评价给了罗宾逊最为致命的一击：“我认为琼的经济理论与凯恩斯主义毫无瓜葛……在《资本的积累》一书中或是她其他的著述中，没有任何地方能让我觉得她的理论本源或者灵感来自于凯恩斯。”[64]

索洛不仅提出了一套简练的理论，而且他还在事实基础上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单个美国工人的平均产量在1909年至1949年期间提高了一倍。而在这提高的一倍当中，有十分之九是受益于技术进步，而非物质资本的积累或劳动力教育和健康状况的改善。这个结论意味着一个有助于发明创造的经济环境比增加工厂和机器投资更为重要，这便直接触及到罗宾逊最关键的理论前提，至于这个结论对于人们争相效仿的苏联模式意味着什么，就更无需赘言了。索洛还不无偏颇地对熊彼特进行了一番驳斥，他指责熊彼特是德国的支持者和反犹派，

并称他是个“伪知识分子”。索洛提供的证据极其有说服力。它表明，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在长期内是否能够成功的关键不是该国家拥有些什么，而是它用它所拥有的东西做了些什么。而这，毫无疑问，恰恰是纯粹熊彼特的观点。

罗伯特·索洛与肯尼斯·阿罗于1963年至1964学年度到英国剑桥进行了访问。他们也曾亲耳聆听罗宾逊描述她花两个月的时间在中国参观人民公社的经历。她说，她要反驳那些“对中国极尽歪曲污蔑之能事的西方媒体”，她将“那些对中国发生饥荒的批评和评论”称为“鳄鱼的眼泪”，并声称中国的公社在三年水旱灾频发的“苦日子”期间起到了“组织救济的作用”。与比特丽斯和西德尼·韦伯在1932年乌克兰大饥荒时所写的报告如出一辙，罗宾逊称中国的人民公社为“伟大的发明”，她并且还断言，“配给制度实为有效，尽管配给的物资数量比较紧张，但它们从来都能兑现。”

如今我们知道，1958至1962年间，河南、安徽与四川数省，农民死亡的人数目众多。而导致这场惨剧的主要原因根本不是恶劣的气候，而是强制性的集体化、灾难性的大跃进以及对外来救灾援助的严词拒绝。

享有民主是生活幸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种观念如今已深入人心。但在此前很长一段时期内，情况却并非如此。许多受实用主义影响的知识分子认为，个人权利对贫穷的国家来说宛如奢侈品，他们根本无法消受。而罗宾逊则认为，民主就如一场诈骗，政客们既胆小怯懦，又欺骗成性。“自由的理念是靠不住的。”她早在二战期间就这么写过，“只有当在国内或国外都没有极其危险的敌人时，才会允许有完全的言论自由存在。”她说这番话时并没有一丝讽刺的意味。[65]她倾向于反对民主改革，她称它们为“趋易畏难的不成熟举动”。她的这个思想死角充分说明了为什么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频频去中国访问的罗宾逊“竟然会对这场现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饥荒完全没有察觉”。而包括伯特兰·罗素、迈克尔·富特、哈罗德·拉斯基以及哈罗德·麦克米兰在内的其他人虽然也曾一次或者多次被人污蔑为共产党的同情者，他们却都一眼便看到了饥荒的存在，并呼吁进行国际救援。

诚然，琼·罗宾逊在西方著名观察家中并非绝无仅有。曾经率领英国代表团参加1952年莫斯科经济大会的洛德·博伊德·奥尔是世界著名的粮食专家之一。他得出的结论是，毛正在结束“中国长期以来的饥荒周期”[66]。而事实上，因饥荒造成的死亡人数之大一直到1976年以后才逐渐为中国以外的人们所了解。罗宾逊的一厢情愿也反映出她思维模式的一个特征：即忽视政治权利所应起的重要作用。而这种思维模式在五十年前研究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家们当中司空见惯。

杰弗里·哈科特曾经评论道，罗宾逊“总是在寻找一个新的乌托邦”。事实也许如此，但她同时也总在期盼下一个伟大领袖的出现，当然，还有下一群诚心拥戴其领袖的信徒。她非常享受她的名人地位，她的公费旅游，她受到的特殊接待以及她的名望为她带来的话语权。她喜欢扮演一个开诚布公向当权者进言的外来者角色。至于她在莫斯科的银行账户，她与包括所罗门-阿德乐，弗兰克·科，唐纳德·维勒以及奥斯卡·兰格等冷战间谍们的友谊，以及时不时需要略施含糊其辞和略过不提以为尊者讳的伎俩，也都为她提供了额外的刺激和乐趣。

随着时间的推移，罗宾逊变得愈加高傲、专横和悲观。在1962年出版的《经济哲学》一书中她对十八世纪以来的经济学观点作了一番综合论述。密尔顿·弗里德曼的挚友，芝加哥大学的乔治·史提格勒在对该书的评论中，称罗宾逊是“一位超群的逻辑学家”，但他也补充道：

> 其实，我认为该书是建立在一些毋庸置疑的公理之上的逻辑结构，因此，它与经济学并无多大关系。假如一个人将自己与过去五六十年来各种不同但极具指导性的实证研究隔绝开来，假如一个人认为经济历史与经济理论毫无关系……那么他所剩下的便只能是一门空洞虚假的科学。逻辑学家是一种奇妙的动物，但他却无法区分两种简单至极的错误：如果A＝B，而且B＝C，那么，（1）A＝1.01C，（2）A＝10^{65}C。而一个经济学家却能分得清。[67]

第十八章

命运之约：森在加尔各答与剑桥

为资本主义而作的民谣寥寥无几，而为社会公正而作的却不胜枚举。

这是人们视发展为一个能不断扩展他们所能享受的自由的过程而作出的抗争…在这种方式之下，自由的扩展既被看作是发展的主要目的同时也是其主要的手段。

——阿马蒂亚·森[①1]

罗宾逊手中握着一本红宝书，结束了她在德里经济学院的讲话。此时正值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尽管她发言的题目是西方经济学的凄惨现状，但在大多数时间里她都在大谈特谈中国和文化大革命。而观众们也听得是如痴如醉。当雷鸣般的掌声终于消退之后，一位身材纤瘦的年轻人向她提了个问题。他的声调中隐含着一丝轻微而不失礼的怀疑。罗宾逊十分明智地将他挡了回去，但“态度却十分友好”。[2]毕竟，他们是一对关系最为亲密的对手：教授和她曾经最喜爱的一位学生。在剑桥的时候，她曾培养了许多来自第三世界的学生。而阿马蒂亚·森是其中出类拔萃的一位。但森对人权以及对迅速改善贫穷的

① Amartya Sen（1933—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状况十分关注。而这便与罗宾逊对苏联模式工业化的巨大热忱发生了严重冲突。

阿马蒂亚是“注定不朽”之意。阿马蒂亚·森出生在一个见识颇广并且信仰印度教的学术之家。在他的童年时期，孟加拉大饥荒、部族暴力、英国统治的崩溃以及印度分裂等一系列事件接连地爆发。这位成绩优异的学生和加尔各答校园中的政治鼓动者克服了的癌症带来的致命影响，在近十万考生中一举拔得头筹，并且双双拿到了拥有G.H. 哈代的艾萨克·牛顿学院和拥有数学家斯里尼瓦萨·拉马努金的剑桥三一学院的入学许可。1970 年之后，森大多数时间都在英国和美国居住，但他一时一刻也未曾将印度遗忘。凭借他自己的生活经历，他对被剥夺了公民权利的人们的毕生研究，以及他对东西方哲学的精湛了解，森对当代经济思想的方方面面都提出过自己的疑问。他向传统观点中关于什么是社会福利以及如何衡量进步等认识提出了挑战。也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帮助，“在重大经济问题的讨论中才重新恢复了道德这一维考量。”[3] 他是一位公众知识分子，他接触的社会问题十分广泛，从饥荒、妇女的非正常死亡，到多元文化主义以及核扩散等不一而足。印度独立之后，他从贫穷的加尔各答出发，最终却登上了英国剑桥与马萨诸塞州剑桥这两座象牙塔。之后他又回到了祖国。他的这段激动人心的历程是理性与感情的胜利，也昭显了人类战胜艰难困苦的毅力与决心。

2002 年 1 月，由印度人民党执政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府在德里为印度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海外移民举行了长达三天的庆祝活动。而森却置这场集会于不顾，他同数百名农民和工人一起，跑到德里市内一个又远又冷又脏的地方参加了一场抗议饥饿的露天听证会，并在会上作了一番发言。他的这一举动足以显示出，虽然他曾到那么远的外面世界闯荡，但他离他的根却仍然是那么近。

代表们从观众中一个接一个走到麦克风前发言。一位来自德里的骨瘦如柴的少女讲述了她在失去一份洗盘子的工作之后忍饥挨饿的经历。另一个从奥里萨邦来的肤色黝黑的男子则诉说了去年在当地遭遇干旱之后他们家三位亲人先后夭折的惨剧。在独立五十年后，印度营

养不良患者占总人口的比重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甚至包括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地区）都要高。但印度政府却仍然通过农业价格补贴使粮食的价格居高不下。印度政府集聚起了世界上最大的粮食储备，然而这些粮食的三分之一都在政府的粮仓里喂了老鼠或腐烂变质。

森站了起来，他的身体在那件松松垮垮的灯芯绒夹克里冻得直发抖。他没有在“牺牲消费者利益以取悦农民”一事上多费口舌，他谈论得更多的是那些“极度孤独的死亡”。面对下面这群显然是痛苦万分的听众，他在表达深切同情的同时也给了他们极大的鼓励。“假如没有类似这样的示威，”他说，“死去的人将会多得多。早就开始这么做了的话，孟加拉饥荒也许就不会发生。”他充满赞许地告诉他们，他们敢于站出来大声疾呼，这一行动本身就是“民主活生生的体现”。

森是孟加拉人。正像说某个美国人是个南方佬一样，这句话也颇有些言外之意。孟加拉位于河流的三角洲上。鱼是孟加拉人食物的主要来源。腰布、凉鞋和旁遮普是他们的传统服饰。据森说，所有的孟加拉人都和他一样非常健谈。孟加拉人常开玩笑说，死亡的最可怕之处就是你能听到别人在口若悬河地说个没完，而你却无法开口回答。

在孟加拉语中，公共知识分子就是 bhadralok。在孟加拉有一个能上溯至两个世纪以前的传统，那就是学识渊博，眼界开阔之人必须承担起向贱民歧视和妇女殉夫自焚等社会邪恶现象进行挑战的责任。而森就是该传统的一部分。他的家庭来自孟加拉达卡的老区。达卡，这个古老的河滨城市，距离加尔各答有二百四十公里。如今，它已成为孟加拉国穆斯林联盟的首都。在简·奥斯丁的年代，达卡曾经是一个“头等重要的繁忙大都市”，它还以出产质量优良的平纹绸布（当地叫作 baftahawa，即“像空气一样轻盈的纺织品”）而著称于世。[4] 但后来，来自曼彻斯特的竞争导致了它的没落。到 1900 年，达卡的人口萎缩了将近三分之二，而且，据现代旅游指南的介绍，“如今，在这座城市四周的密林中，漂亮的房屋、清真寺和佛寺的遗迹仍然随处可见”[5]。而三十多年之后，也就是到了森出生的 1933 年，由于达卡成为了英属印度的一个地区性管理中心，它才稍稍恢复了一丝往日的显

赫地位。

森出生在讲英语的学者和政府官员阶层，正是这一阶层在帮助治理英属印度。他父亲阿苏图什在他的描述中是一个“敢于冒险之人”，他从伦敦大学获得了化学博士学位，而且还爱上了一位英国教友会的女教徒。后来他回到印度服从家族的安排成了婚，并成为了达卡大学农业化学系的系主任。森一家住在一个很典型的达卡式的房子里，长约五十至六十英尺，房屋的前面很窄小，“中间则是一座露天庭院”，房间很多，足够仆人和来访的亲戚居住。[6]

森从1939年开始在英国人的教会学校接受教育。两年后，由于日本人在不断向英属印度挺进，“为了他的安全和不受炸弹威胁”，他被送到了位于加尔各答北边的森廷尼克坦同他的亲祖父母住在了一起。因为它与著名诗人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关系，森廷尼克坦对于孟加拉人，甚至是全体印度人，都有着极其特殊的意义。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泰戈尔用他获得的奖金在森廷尼克坦创建了国际大学。在那里，他试图将自己的教育理念付诸实践；他认为，应该将东方的精神与西方的科学融合起来，并且也做了一些尝试。圣雄甘地1940年曾经来森廷尼克坦进行过访问。许多年来，包括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在内的印度本国的上层精英们都将自己的孩子送到那里读书。

森的亲祖父，克希蒂莫汉·森是一名精通梵文的学者，他也在国际大学教过书。在泰戈尔男女混合制的学校里，森常常坐在桉树下聆听讲课。他的大多数课余时间都是陪祖父度过的。“人人都对他敬畏有加。”森后来回忆道，“他每天凌晨四点就醒来。他对天上所有的星座都了如指掌。他曾同我讲起希腊语与梵文之间的渊源。因为他所有的孙辈中只有我一个人是搞学术的料，于是我便成了那个将要继承他衣钵的人。”

如果说森廷尼克坦是一块宁静的绿洲，那它却丝毫未能躲过时代动荡的冲击。泰戈尔于1941年去世。在那之前，他对西方所曾抱有的幻想已深深地破灭，他甚至声称，在他看来，同盟国和轴心国两大集团几乎没有区别。战争大大加快了印度与英国最终决裂的进程。1942

年，在甘地发起“退出印度运动”之后，英国人逮捕了六万多名国民大会党的支持者，这其中就有森的叔叔。截止到那年年底，已有一千多人在反对英国的暴乱中丧身。“我叔叔在预防性拘留所中被关了很长一段时间，”森回忆道，“而另外几位‘叔叔’也遭到了关押，中间还有一位死在了狱中。我便是在体验这种不公正的过程中长大成人的。”

1943 年孟加拉饥荒爆发的原因并非粮食歉收。相反，战时的通货膨胀、审查制度，以及帝国主义对殖民地人民的漠不关心才是罪魁祸首。它的爆发摧毁了人们对英国残存的最后一丝好感和尊重。新任印度总督韦福在给丘吉尔的信中说，“孟加拉饥荒是在受英国统治的人们遭遇过的最大的灾难之一。无论在印度的印度人还是外国人中间，这场灾难对我们的信誉破坏之大都是难以估算的。”[7] 据森后来的估计，大约有三百万人死于饥饿和疾病，而其中大多是穷苦渔民和没有土地的农场工人。

在当时，对森这样一个十岁的男孩来说，饥荒就意味着有一队队川流不息的饥饿村民从森廷尼克坦经过，孤注一掷地争相前往加尔各答去碰碰运气。他的祖父同意他向乞丐们施舍米饭，“但最多只能给装满一个香烟筒的分量”，而且每家只能给一筒。后来上大学的时候他曾回忆说，其实只有那些特别穷的家庭或者最下层的种姓成员在挨饿，他和他的家庭，还有整个他们那一个阶层，一直都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也证明了他关于饥荒是人祸而非自然灾害造成的之论述。

更令人痛苦的是在印度独立前夕爆发的部族暴力。建立一个有多元文化的印度，这样的想法在森廷尼克坦颇为普遍。而且从传统上而言，在孟加拉，穆斯林教徒与印度教徒互相融合和同化的程度比印度其他任何地方都要高得多。然而独立前夕，宗教冲突开始爆发，它让原来的邻居们开始了自相残杀。于是在 1945 年，阿苏图什·森与达卡大学的其他印度教教师们一起被迫离开了达卡。

在达卡的家中享受最后几天假期的过程中，森亲眼目睹了极其恐怖的一幕。一个名叫卡德·米阿的穆斯林农场工踉踉跄跄地跑进了森家的院子。他的后背被一些印度教的暴徒们砍得血肉模糊。后来，他当天就死了。“那个经历对我来说是毁灭性的。”森后来回忆说。森的

父亲将米阿送到医院进行抢救，米阿告诉他说，他妻子那天曾劝他在家里呆着不要出去。但因为他家里已经没有吃的，所以他别无选择，只能到印度教徒居住的那部分城区去找活儿干。森说，这件事让他认识到“极度贫困可以将人变成任人宰割的猎物。”同时，它也给了他极大的鼓励，并使他从此开始对需求与自由之间的矛盾进行哲学探索。[8]但此事对他最立竿见影的影响是，他对所有形式的宗教狂热和文化上的民族主义都产生了强烈的反感。

院长学院是印度最负盛名的高等学府之一。如今，它看上去跟1951年森刚被录取时极其相似。其实可以说，它与二十世纪初英国人刚刚创建这所印度大学时相比也没太多的变化。它粉色的灰泥已变得斑驳不清，建筑正面的百叶窗有些剥落了下来，悬挂着的黑色匾牌将不同的教室一一标明，教室里光线暗淡，天花板上有吊扇在转，教室中间摆着成排的长制木凳。所有这些都不禁让人回想起那个早已逝去的年代。在印度独立后的最初几年，该学院成了一个政治温床。森刚入学时本来打算学物理，但他很快便发现，经济学比物理更具紧迫感，他对经济学也更感兴趣。

受益于印度高等教育的良好传统，森不但研读了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等经典著作，并且也接触到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其中包括希克斯的《价值与资本》和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基础》。（后来在三一学院就读的时候，他对给他上课的剑桥老师的数学造诣不高还颇有微词。）然而，他最喜爱的还是政治，第一学年尚未结束，他已被共产党员占多数的全印度学生会选为领导人之一。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常常不去上课，他的大多数时间都是与他那些信仰斯大林主义的朋友们就马克思主义进行辩论。他们常去附近学院路上的咖啡馆，那时候在那条街上有上百个书摊沿街一线排开，那种情景直到现在都依然还在。

他后来回忆说，“当我回顾一生中花费心血最多的那些学术领域时，我发现，其实早在我在加尔各答读本科的时候它们便已开始让我

为之心驰神往。”[9]而他在院长学院读二年级时发生的一场生死危机使他对某些事情的关切注定会终身不变。在他将满十九岁之前，森感觉他的口腔顶部有一个豆大的小肿块。街上的一家普通诊所给他诊断的结果说那是一块鱼刺扎到了皮肤底下。然而，肿块并未逐渐消散，事实上，它反而在越变越大。在请教了隔壁基督教青年会的一位医科预科生之后，他才得知在印度的男性中患口腔癌的颇为普遍。他借来了一本医学教科书。在独自钻研了几个小时之后，森的结论是他患的是鳞状细胞癌二期。

在亲友们的帮助下，数月之后，森总算在加尔各答的吉德伦金肿瘤医院做了活组织检查。检查的结果证实了他自己的判断。在那个时代，被诊断出口腔癌无异于被宣判了死刑。通常，动手术只会加快癌细胞的扩散，而且，随着肿瘤逐渐将气管堵塞，大多数患者会慢慢出现窒息的现象。自二十世纪初开始，在英美两国，此病的标准治疗方式是放射性治疗，但对于当时的加尔各答而言，这种疗法的难度太高，花费也过大，因此并未得到普遍的应用。从医学杂志上了解到放射性疗法之后，森终于找到了一位愿意帮他治疗的放射治疗师。该医生极力建议森让他允许他下最大的剂量，他为这种冒险所给出的理由是，“我只能给你做一次。”而对森来说，与其铁定将死于窒息，还不如选择放射性治疗，因为放射性疾病仅仅是有导致死亡的可能性。

结果，治疗过程虽然不能说是糟糕透顶，但至少也并非什么乐事。医生为森量做了模子，然后用铅做了一个面罩，在面罩里再置放了镭针。森就像维克多·雨果小说中的主人公一样，坐在医院里一间狭小的病房里，面罩紧紧地箍在他的脸上“以保证他不会动”。这样的治疗过程每天进行一次，就这样持续了一个星期。“我就这样边坐便看书，一坐就是四个小时。”森后来回忆道，“我能看见窗外有一棵树。在这种时候能看见那样一棵绿树，对我来说真是莫大的安慰。”

治疗所用的剂量相当大，有大约一万拉德[①]——这相当于如今标准剂量的四到五倍。当他被从医院送回家之后——此时他的父母已经

① RAD, 辐射剂量单位。

来到加尔各答居住——辐射治疗的后果便开始显现出来：皮肤渗液，身体多处出现溃疡，骨骼酸疼，咽喉疼痛以及吞咽困难。“我的嘴感觉就像是一团面团。我不能去上课，不能吃固体食物。我整天活在担心被感染的恐惧之中。我不能笑，因为一笑便会导致出血。我总算是领教了活在人世间但又感觉生不如死的滋味。”这样的折磨一直持续了长达六个月之久。而且这些还只是最初的症状。长期下来，辐射会逐渐摧毁人体的骨骼和组织，它将导致坏死和断裂，而且会将所有的牙齿损坏殆尽。

癌症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一方面，知道自己患上了绝症——尤其是一种社会对之有极大成见的绝症，甚至简直可以说是忌讳——不仅仅是可怕的，它而且会让你觉得自己遭到了玷污，觉得自己已经无能为力和已经被世界抛弃。森在成长的过程中所目睹的那些可怕的场面虽然也很令人震惊，但那毕竟是发生在他人身上。而这些却实实在在就发生在他自己的身上。这使他对同样遭受过伤害，同样声音弱小甚至声音被人剥夺了的人们产生了难以磨灭的认同感。

然而，战胜癌症也同样给了他无穷的力量。他母亲阿米塔说，“在阿马蒂亚十九岁的时候，我便将他交给了上帝。”[10]但他自己却曾说过，能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让他对自己的直觉和进取心有了极大的信心。“在心理上我感觉是自己在把握方向。”他回忆道，“我非常进取。我常常问自己，我还能活下去吗？我的最佳选择是什么？我能做些什么？我有了一种获得胜利的感觉。”

当他回到久别的课堂，他说，“我的归来引起了轰动”，也为我树立了全新的目标。不久，他便拿了个第一，获得了各种各样的奖励，其中包括一项辩论竞赛的奖励。他向尼赫鲁曾经就读过的剑桥三一学院提交了入学申请，一开始，他的申请被予以拒绝，但数月之后，他却出乎意料地收到了来自三一学院的召唤。为了他这趟旅行，父亲从他微薄的积蓄中拿出了将近一半以支付他这趟旅行的开销。因为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机票价格过于昂贵，于是，在1953年9月，即在他二十岁生日前夕，森登上了从孟买至利物浦的班轮，与他同船的还有印度女子曲棍球队的选手们。

在剑桥等待着森的是新的不幸——阴暗的天气，寒冷的气候，难吃的食物和可怕的孤独。他的牙齿因为受辐射的伤害已经损坏，它们为他带来了长期的痛苦和在人前的窘迫感。他住宿之处的房东太太曾经恳求校方不要安排“有色人种”作她的房客。她时常为一些像夜间拉上窗帘之类的琐碎小事而向他大发牢骚；“你看不见外头，但他们能看见你。”她会常常这么说他，似乎他还是一个懵懂的少年。

在学校，森面临的是一片政治雷区。两个积怨颇深的派别——凯恩斯的支持者和批评者们，在校内针锋相对，壁垒分明。曾经在森廷尼克坦学习过一年的英迪拉·甘地曾经说过，她就是在那里学到了最基本的生存技能，亦即“无论外界正在发生什么事，都能够保持自己内心的安宁的能力”[11]。森在培养内心的安宁方面还过得去，虽然他也在急切地与各不同思想阵营的学者们进行接触，但他却从未放弃自己对事物的独立看法。

但最终他还是拜倒在琼·罗宾逊的才华和高傲之下。刚刚独立的印度面对的不仅有种族分裂，而且还有人们对未来两种决然不同的期待。甘地的追随者们憧憬的是一个手摇织机的印度，是一个神圣和农业的印度。而尼赫鲁的徒众们期待的却是苏联模式的中央计划和一片为无数水库和钢铁厂所点缀的大地。森在 1960 年出版的《技术选择》一书中对印度政府在其计划中忽视基本经济规律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在读完第二个学士学位并完成论文研究之后，他回到了印度。他先是在贾达普大学任教，继而加入了新成立的德里经济学院。

假如森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便停止了写作的话，即使我们还能知道有他这一号人，他留给我们的印象也一定是印度那一批发展经济学家中的一员，这些人都支持尼赫鲁发展重工业和国营企业，力求自力更生的主张。但这个方案的实施结果却极其令人失望。自那以后，包括森在内的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已将其否决。大约从 1970 年开始，森的思想重点发生了一次突然转向，他令人惊讶地撰写了一系列有关社会福利的哲学论文。正是这些论文成就了他今天所拥有的巨大影响。

他的这股创造力是在经历了第二场生活危机之后突然迸发出来的。

在一年的时间里，先后发生了一系列事情：他接受了伦敦经济学院给他的教职，他父亲因为前列腺癌去世，而且，他还需要面对他的癌症也许会死灰复燃这一可能性。回到英国之后，他立即进行了充分的重建手术，后来发现在他身上出现的症状只不过是先前辐射治疗的延期反应而已。在漫长而艰难的康复期过后，他离开了他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女儿，而热恋上了爱娃·科里尼。科里尼是意大利的一位经济学家，她父亲曾是一名声名显赫的社会主义哲学家，他在二战中为法西斯所杀害。爱娃对森在哲学方面新产生的兴趣予以了鼓励。她劝他将自己对本民族的了解和知识充分运用在诸如贫困、饥饿和妇女的不平等等迫切社会问题的研究上。他和爱娃从 1973 年开始便一起住在伦敦，一直到 1985 年她因胃癌去世。他们共同养育有两个孩子。

在森开始转向伦理学时，罗宾逊对她这位明星学生的建议是“赶紧扔掉所有那些垃圾”。但他并未理会她的这番劝告。在爱娃的鼓励之下，他对他曾亲眼目睹过的专制统治的可怕后果，尤其是饥荒，作了一番极其细致的研究。“有一次，我为从西孟加拉的两个村镇前来的两百五十多名儿童称量了体重，并以此考察他们的营养状况与其家庭收入和性别等因素之间的关系。”他还说，“如果当时有人问我在干什么，我会回答他说，我正在从事福利经济学的研究。”[12]

森认为，在孟加拉爆发饥荒的时候，其实当时并非没有充足的粮食供应。它的爆发是由于物价和失业率的步步高升使社会中最孱弱的那部分人被剥夺了“享用”粮食的权利，是由于选举和新闻自由的缺乏使得没有任何公共压力强迫政府进行干预。而相比之下，罗宾逊却在为大跃进那样的残酷政策大唱赞歌。正如森后来愤愤不平地指出的，“对现代历史上爆发的规模最大的一次饥荒她竟然没有丝毫察觉”。在这场饥荒中，大约有一千五百万到三千万中国人因为强制集体化带来的恶果而丧命。森从未与罗宾逊公开决裂，但是到 1983 年罗宾逊去世的时候，他们俩之间已经多年未通音讯。

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森提出了一整套社会福利理论。他试图将经济学家对优越的物质生活的一贯关注与政治哲学家们对个人权利

和公正的传统结合起来。而另外有一些经济学家则主张，应该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物质进步的主要标杆，他们引用从亚里士多德到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再到约翰·罗尔斯的话来证明他们的观点。森对他们这种功利主义的学说提出了明确反对。森认为，人们能享受多少自由，而不是他们的富裕程度，才是衡量一个良好社会的最佳尺度，这同时还应是经济发展最主要的目标和手段。正如他在一本关于印度的书中所说的，他希望“能以人类自由得到扩展的程度，而不是经济增长的程度，来评判发展……技术进步或社会的现代化……对于（这些）因素在丰富人们的生活和自由上究竟起到了多大的作用，我们尚需进行仔细的评估……而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它们的价值是巨大的。”[13]

森提出了三个独立的问题，而且对每一个问题他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存不存在一种办法能让社会做出的统一选择能最广泛地反映出每个公民的个人喜好？个人的权利与经济福利能否相互调和？最后一个问题则是，衡量一个公正社会的标准究竟是什么？

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那些支持自由意志主义的人们担心，西方会为了经济安全而牺牲其对政治自由主义曾经许下的承诺。三十年过去了，如今森所担心的正是印度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会为了赢得经济增长而以牺牲民主作为代价。他想知道，社会举措和个人权利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如何才能得到解决。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森开始着手对这一个问题进行研究。协调这二者关系所面临的两大挑战摆在了他的面前。一条是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提出的。哈耶克最担心的是那些“专家”与利益集团会将他们的喜好强加给其他每一个人。他认为，如果以政府的计划取代个人计划，那么当权者便会将他们那些庞大而僵化的优先事项强加给每一个人，而个人原本更喜欢根据自己的喜好在众多的选择中进行取舍。

另外一条更加让人望而却步，并且它是从一个人们意想不到的地区提出来的：1952 年，持温和政治立场的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阿罗出版了一本高度理论性的名为《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的小册子。森

最早是在院长学院接触到了阿罗的不可能定理。该理论认为，任何一种投票制度，其结果都不可能反映出每一位公民的喜好。这个观点看上去似乎在逻辑上无懈可击。除非所有人的看法完全一致，所有经投票方式产生的结果将不可能做到绝对民主。森的大多数同学都是斯大林主义者。森虽然与他们一样热烈向往平等，但他“却对政治独裁怀有深深的忧虑”。阿罗的理论会不会被用作独裁的理论基础呢？

鉴于很难对阿罗的结论进行直接挑战，森于是便选择在阿罗的理论假设上下功夫。他的假设看上去似乎平淡无奇，即任何民主程序所必须满足的条件。他在 1970 年出版的《集体选择与社会福利》一书中指出，阿罗的数条公理之一，即排除对不同公民的生活状况进行比较的可能性，事实上并不绝对成立，因此它也便是主观和武断的。森表示，如果确实能够进行这种比较，那么阿罗得出的不可能的结论便无法站住脚。森与那些受到他鼓舞的研究者一起，进而准确地列出了能让决定程序与个人权利保持一致的几大条件。事实上，森的“幸福比较指数”是他致力于探索衡量幸福的标准的开始。在这些标准的激励下，民主政府开始大力发动各项社会改革。这些标准还将引发一场经久不衰的关于什么是定义和衡量贫穷的最佳办法的大辩论。

个人权利与经济福利之间有没有矛盾存在？森进而对功利主义发起了更为广泛地攻击。从某种意义来说，他的这一行动受到了约翰·罗尔斯于 1971 年出版的《正义论》一书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该书为现代福利国家提供了哲学上的正当性。[14] 功利主义者，其中包括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社会唯一应该考虑的是如何为每一位公民提供福利。而权利二字即使曾经在他们的思考中出现过的话，那只怕也是间接的，而且是作为一个能带来幸福和满足感的因素。他将杰里米·边沁提出的著名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原则稍加修改，从而提出了他自己的差异原则。该原则认为，一个公正的社会应该将最贫困的那些人的福利最大化。当然，这个观点本身就极为功利。但罗尔斯最为关注的还是个人权利，它的重要性甚至超越了物质生活的舒适。而一直以来，个人权利都被传统的经济学家们所忽视。

1970年他在杂志上还表了另外一篇文章，《帕累托自由的不可能性》。在文章中，森呼吁人们在重视福利的同时对权利也给予同等的关注，并且给出了充分的理由。他还指出，这二者之间隐藏着非常尖锐的矛盾。大多数经济学家所能接受的经济福利的标准都远不如边沁和罗尔斯二人所要求的那么高。十九世纪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弗雷多·帕累托曾经说过，想让某些人变得更富，就必须以让其他人变得更贫为代价，如果一个社会达到了这种状态，也就达到了最理想的状态。换句话说，这个社会已经倾其所有并充分利用了所有不会引起矛盾的机会。

但森却又告诉人们，甚至连这种看似无害的标准都有可能危及到个人权利。许多人在定义自己的福利时通常是以限制他人的福利为代价的——不许女孩上学会让穆斯林的神职人员们欢天喜地；而如果堕胎被定为非法，则会令天主教的修女们的心情好得多。如果消遣性毒品遭到禁止，父母们必定会衷心拥护——选择的自由与帕累托最优性原理很有可能会产生冲突。

让我们用最新的方式来阐述森最初举过的一个例子。假设，一位“正经人”对宗教信仰的自由极为珍视，但他更想要的是禁止和取缔所有的淫秽作品。而另一位“下流的小人”虽然视阅读色情作品的自由为天经地义，但他却更想将宗教自由去之而后快。如果政府决定将色情和宗教二者都双双予以取缔，那这两个人都会觉得很满意，但同时他们拥有的自由也都比以前要少了。

经济学也许尚不能解决森指出的现象，但经济学家们在集中精力研究福利的同时，已经更频繁地在思考他们有没有忽略掉别的因素，尤其在将国内生产总值等同于健康和幸福的时候他们也越来越审慎。而森认为，GDP（国内生产总值）无法反映个人所拥有的机会，这是其一大缺陷，因为机会比人们的收入也许更重要。固然，虽然人们（比如说以“机制设计理论”获得诺贝尔奖的埃里克·马斯金）可以说权利与福利之间有时也许会产生矛盾，但总的来说，权利可以被视为保护福利的一种手段。譬如，拥有想读什么书就读什么书的权利——而不用别人来告诉你该读些什么书——这通常会为你带来更高水平的

收入。然而如今，在许多社会当中，这种矛盾已发展到了极端对立的程度。森早在三十年前便指出了这种可能性，他的远见卓识由此可见一斑。

为了扩大他对功利主义的攻击，他还指出，单单以增长来衡量福利尚嫌不足，因为增长并不能反映那些缺衣少食的人们究竟过得是好还是坏。同时，由于效用是以人们目前的喜好和满足为基础的，因此它便会给人以误导，因为穷人们的志向和渴望是由他们眼前的生活环境所决定的。为了克服这些和其他一些难题，他就发展的目标提出了一套全新的看法。他将之称为“可行性能力方法”。

他认为，创造福利的并非商品本身，而是你凭借商品所能从事的活动。比如说，车辆能增强我的机动性，因此它对我非常有价值。你也可能会认为教育对你非常有价值，因为它让你能参与我们正在进行的这场讨论。根据森的观点，收入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它能创造众多的机会。但是，真正的机会（也就是森所说的“能力”）同时还有赖于其他的一些因素（并不仅仅是指被匮乏所制约的诸般喜好），比如人的寿命、健康状况，还有文化水平。在对福利进行衡量的时候，所有这些因素都应该被考虑进去。抱着这一信念，他另辟蹊径构建了许多新的福利指标，其中就包括后来被联合国所采用的人类发展指数。

与他在福利衡量上的方法立场相对应，森坚持认为，社会应该努力推动和促成更多的平等，而个人能力则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然而，他并未进一步表明他指的是哪些能力，也未谈及要将平等提高到何种程度。但他也承认，他给公正下的这个定义也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做出最终决定的是个人——是去工作还是去读个学位——而这个决定将决定他们在今后会拥有什么样的能力。

那么，在森的眼里，后殖民主义时期印度的表现究竟如何呢？在他与让·德雷日于2001年合作出版的《印度：发展与参与》一书中，开篇便引用了尼赫鲁在宣告印度独立时的那段激动人心的讲话：“很久以前我们就曾经暗暗地与命运有过一个约定。而现在，履行我们诺言的时刻来到了。”在尼赫鲁许下的誓言当中就包括要“铲除贫困、愚昧、疾病以及机会的不平等”。[15] 在森看来，“这些宏伟的目标……还

远未实现。”曾经有学生问森，为什么他思考的“内容”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没变过。“那是因为，”森的回答是，“周围的环境没有变。很可能到我死的时候，还是可以这么说。”

但毫无疑问的是，他同时也指出，第三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平均寿命已经从四十六岁提高到了六十五岁，个人的实际收入也翻了将近三倍。一些曾经贫困不堪的国家如今已从昔日落后的国家中脱颖而出，依稀有了富裕国家的雏形。

尽管如此，森告诉人们，这个拥有十亿人口的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依然是世界上最贫困最落后的国家之一。他指出，在当今的世界上，最极度的贫困集中在两个地区：南亚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印度的平均寿命要高于非洲，因为印度没有发生大面积的饥荒，也未受到内战的侵袭。但在文化水平，长期阴阳不良与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这些方面，印度的情况与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地区同样恶劣，甚至比后者还差，特别是妇女的处境之差尤甚。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印度与中国在贫困程度上不相上下。然而今天，中国人均寿命达到了七十二岁，而印度是六十四岁。中国的婴儿死亡率不到印度的一半：中国一千个新生婴儿中平均只有十七例死亡，而印度有五十例。在营养指标方面，中国在消灭长期性营养不良上的成果也遥遥领先于印度。中国青少年的识字率远远高于百分之九十——而且在男孩和女孩之间不存在任何差异——而印度的比例则要低得多，男女之间的差别也要悬殊得多。[16] 当然，印度公民能享受到民主权利——包括新闻自由——而这是那些比他们更为富有的中国公民们梦寐以求却又无法得到的。森和其他经济学家所面对的最大挑战便是应该给印度一个什么样的建议，使它既能像中国一样走上一条全球化的经济道路，而同时又不以牺牲森和印度人民为之无比骄傲的民主制度为代价。

曾以其经济增长理论荣获诺贝尔经济奖的罗伯特·索洛曾经称森为“我们这个职业的良知”。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森研究经济学的方式显然遭到了来自左右两派的怀疑。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风靡一时之际，无论是在剑桥、加尔各答还是德里，

森都是一个不受左派欢迎的人。而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当自由市场经济重新风靡世界的时候，诺贝尔奖委员会的时任主席曾信心十足地预言："森永远都不可能拿奖。"森以其"对福利经济学的贡献"荣获了1998年的诺贝尔奖。

然而，时代变了。今天，当森回到亚洲并在警察的护送之下到各处走访的时候，人们更多的是像对待圣雄甘地一样来接待他，而不再当他是一位经济学教授。2002年1月在森廷尼克坦，拥挤的人群排列在街道两旁争相目睹他的到来和离去；在维斯瓦巴拉蒂大学，年轻的少女们纷纷跪倒在地触摸他的脚（其实他本人对此从来都是决然拒绝的）。与曾替他起名字的诗人泰戈尔一样，他决心利用他所获的诺贝尔奖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他所关注的问题上来。他将他获得的一百万美元奖金中的一半用来创建了两个基金会，一个在西孟加拉邦，另一个在孟加拉共和国。两个基金会都以推广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为目的。

在印度仿自苏联的自给自足的官僚主义经济日益运转不顺之际，日本和亚洲其他数个新兴国家却已经成功实现了现代的生活水准。因此，森也顺应时势，不再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关键在于西方的援助和优惠的贸易条款。他越来越认同熊彼特的看法，那就是，本国的条件是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决定一个国家命运的最终还是这个国家自己。他拥护放松管制，以及将印度经济的大门向国际贸易和投资全面开放。但同时，他也坚持要求政府为了顾及穷人的利益而实行干预，尤其是在健康、教育和营养等领域。当中国结束文化大革命并引入经济自由之际，所有的争论都随之戛然而止。中国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步入了现代化，并将苏联远远抛在了身后。这一事实使得苏联经济模式的信誉荡然无存。

尾　声

想象未来

大多数旅行都始于人们的想象。而这一场意在将人类变成环境主人的伟大探索也不例外。

十八世纪经济学的奠基者们曾经憧憬着一个以自愿合作取代威逼强迫的经济组织的出现。然而，他们想当然地认为，上帝和自然早已决定，人类当中十分之九的人们注定要过贫困潦倒的生活。两千多年来的历史告诉他们，人类中绝大部分人逃避这种命运的可能性就跟犯人想从四周被大海包围的监狱里逃出去一样渺茫。

狄更斯、梅休还有马歇尔，在那个生产力和生活水平发生革命性变化的时代，在维多利亚时期的伦敦接触到了经济学。他们因为拥有一个更光明，更有希望的设想而显得生机勃勃。在他们看来，围绕在四周的大海更像是一条护城河，他们想象着人类正在壕沟的另一边，一步一步迈向距离他们越来越近的遥远地平线。激励着这些经济学思想家们的不仅仅是他们的求知欲，更是他们希望将人类扶上马鞍送上征程的强烈愿望。他们在千方百计寻找一个掌控的工具：即一种思想，凭借它将能创造出一个以个人自由和物质丰富为特征而不是在精神和物质上双双崩溃的社会。

他们发现，对成功而言，经济智慧比国土面积、人口数量、自然资源甚至技术的先进程度都要重要得多。思想观点绝对重要。事实也

的确如此，在经济大萧条期间，凯恩斯曾经有一句名言："统治这个世界的（除了思想之外）别无他物。"[1]和马歇尔一样，凯恩斯将经济学视为一个分析的引擎，它能分辨清良莠，去芜存菁。他还坚信，经济思想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远比蒸汽机的作用要大。经济学真理也许不如数学真理那么持久，但经济理论对了解什么方法可行，什么方法不可行，什么能起作用，什么不能起作用是不可或缺的。通货膨胀能在短期内使产量增长，但这种增长却无法长期性地持续下去。生产的增益是推动工资和生活水平增长的主要因素。教育与社会安全网在减少贫困的同时也不会导致经济停滞。稳定的货币对维持经济稳定是必不可少的，而健全的金融体系也是发明创造所必需的。正如罗伯特·索洛所指出的，"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面对的问题也在不断变化，甚至对过去那些老问题的答案也在变化。然而，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某个特定的阶段我们就什么都不懂。"[2]

金融恐慌、恶性通货膨胀、经济萧条、社会矛盾还有战争，所有这些经济灾难总是在触发信心危机。然而，它们远未达到那样的程度以至于能将人们在平均生活水准上创造出的成就完全抹杀。经济大萧条使经济学和分权经济经受了严重考验。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在人们的忧虑和自我怀疑中结束的。信仰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们期待着一个前途黯淡的经济停滞时期的到来，而哈耶克的弟子们则担心社会主义即将在西方获得胜利。但结果正好相反，经济增长出现了反弹，生活水平有了急剧的改善。政府在管理他们的经济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就。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越来越多的人口成功摆脱不幸和贫困成了这段历史的主流。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德国和日本这两个战败国如凤凰浴火一般从战争的灰烬中重新站了起来。而中国则是从七十年代开始启动了它令世人惊讶的迸发式的快速增长。而在最近几年，印度也终于从几十年的经济停滞中走了出来。

在与想象的较量之中，现实大多数时候都将最终胜出。即使聪明如熊彼特，他也不会料到，在人口数量增加了六倍的情况之下，今天这个世界的富裕程度尚能较以前提高十倍。并且，仍然生活在贫困中的地球公民的人口比例下降了六分之五。还有，今日中国人的平均寿

命已达到或超过了英国人在1950年的平均水平。世界人口的平均寿命与1820年时相比提高了近两倍半，而且仍在继续上升。这一事实是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唯独费雪除外。2008年至2009年间的经济衰退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爆发过的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令人惊讶的是，即使是这场经济危机也无法扭转此前在生产力和收入上的巨大成就。人类寿命在继续提高，世界经济体系也未崩溃。第二次经济大萧条也并未降临。

从凯撒到希特勒，再到斯大林，那些大权在握的狂人们曾经在不断尝试——今天他们仍然在尝试——罔顾经济现实或者对之进行压制。但当摆脱了贫困并且掌握了自己经济命运的国家越来越多的时候，为独裁进行辩护的那套说辞也就愈加没有了说服力。苏联终于未能赶超西方，相反，它于1990年土崩瓦解。

历史不会倒退。今天，没有人会在是否应该对我们的经济环境实施管理的问题上争执不休，他们关心的只会是管理该如何进行。曾经有人向开罗的示威者们提问，他们对未来最美好的期望是什么。而他们的回答是经济能得到改善。2011年，那些在突尼斯、叙利亚以及其他中东各国的街头示威游行的男男女女们，他们代表的是最新一波对未来经济充满了憧憬的民众，而这种经济将会以增长，稳定和有利于创造发明的商业氛围为特点。一旦人们的想象中出现了这样一个未来，过去的那些可怕梦魇会重演的可能性也就愈加渺茫。

鸣　谢

在本书的研究和写作过程中，我欠下的人情债实在是太多了。

给予我帮助最多的有三位。没有他们，我根本不可能开始本书的写作，更不可能坚持下来并最终完成它。他们是：我的编辑艾利斯·梅休，她格外的耐心与投入，是她教会了我怎样将经济学，历史和传记三者融合成一个故事；我的经纪人凯茜·罗宾斯，是她以她一贯的热忱启动了整个这一项计划；还有我的大女儿克拉拉·奥布莱恩，在她的帮助下我才得以圆满完成全部的工程。

许多的个人和机构对我的研究工作给予了慷慨的支持。排在名单最前列的有阿马塔亚·森，艾玛·罗思柴尔德，埃里克·马斯金，菲利普·格里菲思，艾伦·克鲁格，奥利·阿申费尔特和埃里克·万纳。对以下的机构我也由衷地表示感谢：高等学术研究所（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罗素·赛奇基金会（Russell Sage Foundation），剑桥大学的丘吉尔与国王学院，雅斗基金会（the Yaddo Foundation）和麦克道威尔艺术村（MacDowell Colony）。对这些机构的采访都给了我极大的启发，并且极富成效。

在哥伦比亚大学，杰出的布鲁斯 C.N. 格林沃尔德给了我一些绝佳的建议。我新闻系的同事吉姆·斯图尔特始终都在为我提供支持和建议。对埃德·麦凯尔维，我的教学伙伴，我更是怎么感谢都不为过。在过去的两年中，他将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了我们的学生身上，我和

我们的学生都因此而受益匪浅。

能与西蒙与舒斯特这样一支出色的团队合作对我来说是一大幸事。我要向以下几位表示特别感谢：乔纳森·卡普，理查德·罗雷尔，罗杰·拉布里，雷切尔·柏格曼，艾琳·凯拉蒂，吉娜·迪马西亚，约翰·瓦勒尔，南希·英格利斯，杰基·塞奥，鲁思，李-梅，特蕾西·格斯特，丹妮尔·林恩，罗谢尔·安杜哈尔，还有菲尔·梅特卡夫。

以下数位答应了我的采访请求或是为我提供了资料来源，对他们我也表示衷心的感谢：威廉·巴伯，彼得·辛格，哈罗德·詹姆士，布鲁斯·考德威尔，梅格纳德·德赛，玛丽娜·惠特曼，彼得·多尔蒂，杰弗里·哈考特，普鲁·克尔，弗朗西丝·斯图尔特，弗朗西斯·凯恩克罗斯，芭芭拉·杰弗里，达特·贾亚斯瑞，阿维纳什·迪克西特，劳伦斯·海克，路易吉·帕西内蒂，比尔·吉布森，劳里·卡恩-莱维特，吉姆·米尔里斯，汉斯·约格·亨内克，汉斯·约格·基辛格，奈尔斯·埃里克-萨林，杰弗里·希尔；玛格丽特·保罗一家；哈罗德·库恩，休·梅勒，彼得·帕塞尔，埃德蒙·费尔普斯，杰格迪什·布加迪，安德鲁·斯卡尔，鲁思和卡尔·凯森，彼得·傅特克，吉多·豪斯曼，威廉·巴尼特，弗农·史密斯，彼得·特明，伊丽莎白·达林，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马克·惠蒂克，雷·蒙克，阿玛蒂亚·森，保罗·塞缪尔森和他的妻子 Risha 和他的长期助手珍妮丝·默里，罗伯特和安尼塔·萨默斯，罗伯特和博比·索洛，米尔顿和罗斯·弗里德曼，最后还有肯尼思·阿罗。

鲁思·特南鲍姆针对书稿中的错误和遗漏作了兢兢业业的校对。亚历山德拉·桑德斯，路易丝·斯托里，乔纳森·赫尔，巴里·哈博，梅勒妮·奥朗，雷切尔·埃尔鲍姆，凯瑟琳·维耶特，托丽·芬克尔等在不同的阶段参与并协助了了此书的研究工作。我特别要感谢比尔·吉布森在终稿前为我指出了一些逻辑和其他方面的纰漏。

本书的绝大部分调查研究都是在档案馆和图书馆中进行的。对以下单位的工作人员给予我的热情接待和帮助我要表示特别的感谢：马歇尔图书馆，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档案馆，国王学院档案馆，剑

桥市档案馆，哈佛大学档案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档案馆，麻省理工学院档案馆，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我自然也要感谢“谷歌图书”（GoogleBook），“期刊储存”（J-Stor），律商联讯（Lexis-Nexis），马克思恩格斯档案馆和其他无计其数的网络资料库和他们的创建者。他们为从事历史的调查与研究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

与往常一样，最后一句话留给我的孩子克莱拉，莉莉，杰克和我亲爱的朋友们。他们都懂得有关这段旅程的一切……还有那些与你并肩跋涉的人。

注　释

前言　十分之九的人类

1. John Kenneth Galbraith, *The Affluent Society*(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58).
2. Edmund Burke, "A Vindication of Natural Society Or, a View of the Miseries and Evil Arising to Mankind from Every Species of Artificial Society, In a Letter to Lord**** by a Late Noble Writer, 1756," *Writings and Speeches*(New York: Little Brown and Co., 1901), 59.
3. Patrick Colquhoun, *A Treatise on the Wealth, Power, and Resources of the British Empire*(London: Jay Mawman, 1814(1812)), 49.
4. James Heldman,"How Wealthy is Mr.Darcy—Really? Pound and Dollars in the World of *Pride and Prejudice," Persuasions*(Jane Austen Society), 38—39.
5. Author's calculation based on data from Colquhoun, *Wealth, Power, and Resources;* Harold Perkin, *The Origins of Modern British Society*(London: Routledge), 20—21; and Roderick Floud and Paul Johnson,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92.
6. Jane Austen to Cassandra Austen, *Jane Austen's Letters,* Deirdre le Fay, e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and Anonymous, *How to Keep House! Or Comfort and Elegance on 150 to 200 a Year*(London: James Bollaert, 1835, 14th edition).
7. Claire Tomalin, *Jane Austen, A Life*(New York: Knopf, 1997).
8. Burke, *Vindication,* 59.
9. Gregory Clark, *A Farewell to Alms: A Brief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10. James Edward Austen Leigh, *A Memoir of Jane Austen*(London: Richard Bentley & Son, 1871), 13.
11. Clark, *A Farewell to Alms.*
12. Robert Giffen, *Notes on the Progress of the Working Classes(1883) and Further*

Notes on the Progress of the Working Classes, Essays in Finance(London: Putnam & Sons, 1886), 419.

13. Burke, *Vindication,* 60.
14. Tomalin, *Jane Austen,* 96.
15. Patrick Colquhoun, *A Treatise on Indigence*(London: J.Hatchard, 1806).
16. Leigh, *A Memoir of Jane Austen,* 13.
17. Giffen, 379.
18. Alfred Marshall, *The Present Position of Economics: An Inaugural Lecture* (1885), 57.
19. John Maynard Keynes, "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 *Essays in Persuasion*(London: Macmillan, 1931), 344.
20. John Maynard Keynes, Toast on the occasion of his retirement from the editorship of *The Economic Journal,* 1945, quoted in Roy Harrod, *The Life of John Maynard Keynes*(London: Harcourt Brace, 1951), 193—94.

第一幕 希望

序幕 好好先生与守财奴

1. G.Kitson Clark, "Hunger and Politics in 1842,"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24, no.4(December 1953), 355—74.
2. Thomas Carlyle, *Past and Present*(London: Chapman and Hall, 1843), 26.
3. Charles Dickens, *Daily News*(London), January 21, 1846.
4. Asa Briggs, ed., *Chartist Studies*(London: Macmillan, 1959).
5. Carlyle, *Past and Present,* 335.
6. Thomas Carlyle to John A.Carlyle, Chelsea, London, March 17, 1840. The Carlyle Letters Online, 2007, http://carlyleletters.org(accessed January 2, 2011).
7. John Stuart Mill to John Robertson, London, July 12, 1837 in *The Earlier Letters of John Stuart Mill,* vol.1, *1812—1848,* ed.Francis E.Mineka(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3), 343(paraphrasing Carlyle's description of Camille Desmoulin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 History,* [1837]).
8. Quoted in Michael Slater, *Charles Dickens: A Life Defined by Writing*(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143.
9. Thomas Carlyle, "Occasional Discourse on the Negro Question," *Fraser's Magazine for Town and Country* 40(February 1849), 672.
10. Edmund Burke, *A Vindication of Natural Society: or, a View of the Miseries and Evils Arising to Mankind from Every Species of Artificial Society*(1756), Frank N.Pagano, ed.(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Inc., 1982), 87.
11. Thomas Robert Malthus,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as It Affects the Future Improvement of Society with Remarks on the Speculations of Mr.Godwin, M.Condorcet, and Other Writers*(London: J.Johnson, 1798), 30.

12. Ibid., 139.
13. Ibid., 31.
14. Leviticus 19:18, Romans 13:9.
15. Charles Dickens, *Oliver Twist,* vol.1(London: Richard Bentley, 1838), 25.
16. Nicholas Bakalar, "In Reality, Oliver's Diet Wasn't Truly Dickensian,"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9, 2008.
17. Charles Dickens, *American Notes for General Circulation,* vol.2(London: Chapman and Hall, 1842), 304.
18. Charles Dickens to Dr.Southwood Smith, March 10, 1843, in *The Letters of Charles Dickens,* vol.3, *1842—1843,* eds. Madeline House, Graham Storey, Kathleen Mary Tillotson, Angus Eanon, Nina Burgi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461.
19. James P.Henderson, "'Political Economy is a Mere Skeleton Unless...': What Can Social Economists Learn from Charles Dickens?," *Review of Social Economy,* 58, no.2(June 2000): 141—51.
20. Charles Dickens, *A Christmas Carol;in Prose: Being a Ghost Story of Christmas*(London: Chapman Hall, 1843).
21. Henderson, "Political Economy," 146.
22. Dickens, *A Christmas Carol,* 96.
23. Thomas Malthus,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Or, a View of Its Past and Present Effects on Human Happiness: With an Inquiry Into Our Prospects Respecting the Future Removal or Mitigation of the Evils Which It Occasions,* 2nd ed.(London: J.Johnson, 1803), 532.
24. Dickens, *A Christmas Carol,* 94.
25. Michael Slater, introduction and notes to Charles Dickens, *A Christmas Carol and Other Christmas Writings*(London: Penguin, 2003), xi.
26. Anthony Trollope, *The Warden*(London: Longman, Brown, Green, and Longmans, 1855), chap.15.
27. Charles Dickens, "The Bemoaned Past," *All the Year Round: A Weekly Journal, With Which is Incorporated Household Words,* no.161(May 24, 1862).
28. Sir Robert Peel to Sir James Graham, August 1842, quoted in Clark, "Hunger and Politics in 1842."
29. Charles Dickens, "On Strike," *Household Words; A Weekly Journal* no.203 (February 11, 1854).
30. Ibid.
31. Joseph A.Schumpeter, *The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of Capitalism,* ed. Richard Swedberg(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290. Schumpeter coined this phrase to describe Alfred Marshall's view that economics "is not a body of concrete truth, but an engine for the discovery of concrete truth." Alfred

Marshall, *The Present Position of Economics: An Inaugural Lecture*(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885), 25.

32. John Maynard Keynes, introduction to *Cambridge Economic Handbooks,* I (London: Nesbit and Co. 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1).

第一章 焕然一新：恩格斯和马克思在神奇年代

1. Friedrich Engels to Karl Marx, November 19, 1844, 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 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44/letters/44_11_19.htm.
2. Friedrich Engels to Arnold Ruge, June 15, 1844, quoted in Steven Marcus, *Engels, Manchester and the Working Class*(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6), 82.
3. Friedrich Engels, writing as "X," four-part series o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in England, *Rheinische Zeitung,* December 8, 9, 10, and 25, 1842.
4. Edwin Chadwick, *Report on the Sanitary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Population of Great Britain*(1842).
5. Friedrich Engels, *Rheinische Zeitung,* December 8, 1842.
6. Charles Dickens, *Nicholas Nickleby,* chap.43.
7. Friedrich Engels,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in l844, With a Preface Written in 1892,* trans. Florence Kelley Wischnewetzky(London: Swan Sonnenschein & Co., 1892).
8. Quoted in David McLellan, *Friedrich Engels*(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77), 22.
9. Friedrich Engels, "Outlines of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Deutsch-Französiche Jahrbücher* 1, no.1(February 1844).
10. Karl Marx, preface to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1859) in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Selected Works*(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51).
11. Karl Heinzen, *Erlebtes*[Experiences], vol.2(Boston: 1864), 423—24.
12. Isaiah Berlin, *Karl Marx: His Life and Environment,* London: Thompson Butter-worth, 1939), 26.
13. George Bernard Shaw, "The Webbs," in Sidney and Beatrice Webb, *The Truth About Soviet Russia* London: Longmans Green, (1942).
14. Arnold Ruge to Ludwig Feuerbach, May 15, 1844, in Arnold Ruge, *Briefwechsel und Tagebuchblatter aus den Jahren 1825—1880* [Correspondence and Diaries from the Years l825—1880], vol.1(Berlin: Weidmannsche Buchhandlung, 1886), 342—49.
15. Karl Marx to Arnold Ruge, July 9, 1842, in ed., *Marx/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1, 398—91.
16. Karl Marx,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 1, no.1(February 1844).

17. Karl Marx to Arnold Ruge, September 1843; *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 1, no.1(1844), 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43/letters/43_09-alt.htm.
18. Gertrude Himmelfarb, *The Idea of Poverty: England in the Early Industrial Age*(NewYork: Alfred A.Knopf, 1984), 278.
19. Friedrich Engels to Karl Marx, November 19, 1844, in *Der Briefwechsel Zwischen F.Engels und K.Marx,* vol.1(Stuttgart, 1913), Marxist Internet Archive, 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44/letters/44_11_19.htm.
20. Friedrich Engels to Karl Marx, January 20, 1845, in *Der Briefwechsel Zwischen F.Engels und K.Marx,* vol.1(Stuttgart, 1913), Marxist Internet Archive, 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45/letters/45_0l_20.htm.
21. Engels,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296.
22. Friedrich Engels to Karl Marx, Paris, January 20, 1845. Marxist Internet Archive,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45/letters/45_01_20.htm(accessed March l5, 2011).
23. Karl Marx, Preface to *Das Kapital*(1867), Friedrich Engels, ed., trans. S.Moore and E.Aveling(NewYork: Charles H.Kerr & Company, 1906), 14.
24. Henry Mayhew, letter 47, *The Morning Chronicle,* April 11, 1850. *The Morning Chronicle Survey of Labour and the Poor: The Metropolitan Districts,* vol.4(Sussex or London: Caliban Books, 1981), 97.
25. Asa Briggs, *Victorian Cities*(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311.
26. William Lucas Sargant, "On the Vital Statistics of Birmingham and Seven Other Large Towns," *Journal of the Statistical Society of London* 29, no.1(March 1866): 92—111.
27. Roy Porter, *London: A Social History*(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187.
28. Engels,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23.
29. Charles Dickens, *Dombey and Son*(London: Bradbury and Evans, 1846—1848).
30. Niall Ferguson, *The House of Rothschild,* vol.1(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0), 401.
31. Bagehot, *Lombard Street,* 4.
32. Ferguson, *The House of Rothschild,* vol.12, 65.
33. Peter Geoffrey Hall, *The Industries of London*(London: Hutchison, 1962), 21.
34. Francis Sheppard, *London 1808—1870: The Infernal Wen*(London: Secker and Warburg, 1971), 158—59.
35. George Dodd, *Dodd's Curiosities of Industry*(Henry Lea's Publications, 1858), 158.

36. Hall, *The Industries of London,* 6.
37. Henry Mayhew, *The Daily Chronicle,* October 19, 1849, in *The Unknown Mayhew: Selections from the* Daily Chronicle *1849—1850*(London: Penguin Books 1884), 13.
38. John Maynard Keynes,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London: Macmillan, 1919), 9.
39. Henry James, *Essays in London and Elsewhere*(New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893), 19.
40. George Augustus Sala, *Twice Around the Clock; or the Hours of the Day and Night in London*(London: Richard Marsh, 1862), 157.
41. Henry Mayhew and John Binney, *The Criminal Prisons of London and Scenes of Prison Life*(London: Griffin, Bohn and Co., 1862), 28.
42. *The Economist,* May 19, 1866.
43. Harold Perkin, *The Origins of Modern English Society 1780—1880*(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9), 91. Sala, *Twice Around the Clock,* 157.
44. Mayhew and Binny, *The Criminal Prisons of London,* 28.
45. Ibid., 32.
46. Henry James, "London," *Century Illustrated Magazine,* December 1888, 228.
47. Charles Dickens, *Bleak House*(London: Chapman and Hall, 1853), 1.
48. Friedrich Engels to Karl Marx, Paris, November 23—24, 1847. Marxist Internet Archive,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44/letters/44_11_19.htm(accessed March 14, 2011). Friedrich Engels,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Edition of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1888), in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Gareth Stedman Jones, ed.(London: Penguin Books, 2002).
49. David McLellan, *Karl Marx: His Life and Thought*(London: Macmillan, 1973), 169.
50. Friedrich Lessner, quoted in David McLellan, ed., *Karl Marx: Interviews and Recollections* (London: Barnes & Noble, 1981), 45.
51. *The Rules of the Communist League,* adopted by the Second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League in December 1847, in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30).
52. Friedrich Engels, "The Book of Revelation"(1883), in *Marx and Engels on Religion*(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57), 204.
53. Karl Marx, preface to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1847), trans. H.Quelch (Chicago: Carles H.Kerr & Company, 1920).
54. Anonymous[Robert Chambers], *Vestiges of the Natural History of Creation* (London: John Churchill, 1844).
55. Marx and Engels, *Communist Manifesto,* 223.

56. Friedrich Engels, "The English Constitution," *Vorwaerts!,* no.75(September 1844).
57. Angus Maddison, *Statistics on World Population, GDP and Per Capita GDP, 1—2008 AD,* www.ggdc.net/maddison/.
58. Marx and Engels, *Communist Manifesto,* 224.
59. Gregory Clark, *A Farewell to Alms: A Brief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Roderick Floud and Bernard Harris, "Health, Height and Welfare: Britain 1700—1800," in *Health and Welfare During Industrialization,* eds. Richard H.Steckel and Roderick Floud(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91—126.
60. Charles H.Feinstein, "Pessimism Perpetuated: Real Wages and the Standard of Living in Britain During and After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58, no.3(September 1998), 630.
61. Thomas Carlyle, *Past and Present*(London: Chapman and Hall, 1843), 4.
62. Arnold Toynbee, *Lectures o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England*(London: Rivingtons, 1884), 84.
63. John Stuart Mill, *The Subjection of Women*(London: Longmans, Green, Reader, and Dyer, 1869), 29—30.
64. John Stuart Mill,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2(London: John W.Parker, 1848), 312.
65. Marx and Engels, *Communist Manifesto,* 233, 258.
66. McLellan, *Karl Marx,* 35.
67. Charles Dickens, "Perfidious Patmos," in *Household Words; A Weekly Journal 7,* no.155(March 12, 1853).
68. *Times*(London), October 26, 1849.
69. Anne Humpherys, *Travels into the Poor Man's Country: The Work of Henry Mayhew*(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77), 203.
70. Henry Mayhew, "A Visit to the Cholera Districts of Bermondsey," *The Morning Chronicle,* September 24, 1849.
71. E.P.Thompson and Eileen Yeo, eds., *The Unknown Mayhew*(London: The Merlin Press Ltd., 2009), 102—3.
72. Quoted in Humpherys, *Travels,* 31.
73. Charles Dickens, *Oliver Twist*(London: Richard Bentley, 1838), 252.
74. Gareth Stedman Jones, *Outcast London: A Stud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asses in Victorian Society*(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4).
75. Henry Mayhew, letter 11, *The Morning Chronicle,* November 23, 1849.
76. Ibid.
77. Ibid., letter 15, December 7, 1849.
78. Douglas Jerrold to Mary Cowden Clarke, February 1850.

79. Henry Mayhew, *London Labour and the London Poor,* no.40, September 13, 1851.
80. John Stuart Mill, "The Claims of Labor," *Edinburgh Review,* April 1845.
81. Quoted in James Anthony Froude, *Thomas Carlyle: A History of the First Forty Years of His Life(1795—1835)*(Montana: Kessinger Publishing, 2006), 298.
82. Ibid., 282.
83. Thomas Carlyle, "Chartism," *Latter Day Pamphlets,* London, December 1839.
84. John Stuart Mill to Macvey Napier, November 9, 1844.
85. H.G.Wells, "Men Like Gods," *Hearst's International* 42, no.6(December 1922); David Ricardo,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London: John Murray, 1817).
86. Mill,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3, ch.1.
87. Thomas Carlyle, "Occasional Discourses on the Negro Question," *Fraser's Magazine, 1849.*
88. *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Archive for the History of Socialism and the Workers' Movement](1922), 56ff 10, quoted in McLellan, *Karl Marx,* 268—69.
89. Karl Marx to Joseph Weydemeyer, London, August 2, 1851, in Saul K.Padover, ed., *The Letters of Karl Marx*(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79), 72—73.
90. John Tallis, *Tallis's History and Description of the Crystal Palace, and the Exhibition of the World's Industry in 1851* London and NewYork: John Tallis and Co., 1852), quoted in Jeffrey A.Auerbach, *The Great Exhibition of 1851,* (1999).
91.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no.184, January 1, 1850.
92. Ibid.
93.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May-October, 1850.
94. Marx and Engels, *Communist Manifesto,* chap.1.
95. Karl Marx to Ludwig Kugelmann, December 28, 1862.
96. Ibid.
97. Marx and Engels, *Communist Manifesto,* chap.1.
98. Marx, *Das Kapital,* 671.
99. John Stuart Mill, *Essays on Some Unsettled Questions of Political Economy*(London, 1844), 94.
100. Mark Blaug, *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101. Marx, *Das Kapital,* 711.
102. Robert Giffen, "The Recent Rate of Material Progress in England," *Opening Address to the Economic Science and Statistics Section of the British Association*(London: George Bell and Sons, 1887), 3.
103. R.Dudley Baxter, *National Income, the United Kingdom*(London:Macmillan, 1868), B1.
104. E.J.Hobsbawm, "The Standard of Living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 Discussio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vol.16, no.1(1963), 119—34.
105. Charles H.Feinstein, "Pessimism Perpetuated: Real Wages and the Standard of Living in Britain During and After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8, no.3, 625—58.
106. Gareth Stedman Jones, introduction to Marx and Engels, *Communist Manifesto.*
107. Marx, *Das Kapital,* 264—65, note 3.
108. Egon Erwin Kisch, *Karl Marx in Karlsbad*(Weimar, Germany: Aufbau Verlag, 1968); Saul Kussiel Padover, *Karl Marx: An Intimate Biography*(New York: McGraw-Hill, 1978).
109.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July 22, 1859. Reviews appeared in *Das Volk,* no.14, August 6, 1859, and no.16, August 20, 1859.
110. Berlin, *Karl Marx,* 13.
111. Ibid.
112. Karl Marx, "The Right of Inheritance," August 2 and 3, 1869, endorsed by the General Council on August 3, 1869. Marxist Internet Archive, 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iwma/documents/1869/inheritance-report.htm.
113. Karl Marx to Eleanor Marx, quoted in McLellan, *Karl Marx,* 334.
114. Karl Marx to Ludwig Kugelmann, December 28, 1862.
115. Fyodor Dostoyevsky, *Winter Notes on Summer Impressions*(Illinoi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88).
116. Author's calculation.
117. *The Bankers Magazine,* vol.26(1886), 639;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May 19, 1866; *Times*(London), May 12, 1866.
118. *New York Times,* May 26, 1866.
119. Sidney Pollard and Paul Robertson, *The British Shipbuilding Industry, 1870—1914*(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77—79.
120. Marx, *Das Kapital,* 733—34.
121. J.H.Clapham, *An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 vol.3, *Machines and National Rivalries(1887—1914) with an Epilogue(1914—192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2), 117.

122.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April 6, 1866.
123. Friedrich Engels to Karl Marx, May 1, 1866.
124. Karl Marx to Friedrich Engels, July 7, 1866.
125. Marx, *Das Kapital,* 715.
126. William Gladstone, "Budget Speech of 1863, House of Commons," *Times*(London), April 16, 1863.
127. Honore de Balzac, *The Unknown Masterpiece*(1845), www.gutenberg.org/files/23060 /23060-h/23060-h.htm.
128. John Maynard Keynes, *Essays in Persuasion*(W.W.Norton and Co., 1963). 300.

第二章 无产阶级的存在是必然的吗？马歇尔的守护神

1. Ralph Waldo Emerson, "Ode, Inscribed to William H.Channing," in *Poems*(London: Chapman Bros., 1847).
2. Alfred Marshall, "Speech to 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Senate," in John K.Whitaker, ed., *The Correspondence of Alfred Marshall,* vol.3, *Towards the Close, 1903—1924*(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399.
3. *Morning Star*, quoted in Karl Marx, *Das Kapital*(1867), Modern Library edition. 734; W.D.B, "Distress in Poplar," letter to the editor, *The Times*(London), January 12, 1867; "Able-Bodied Poor Breaking Stones for Roads, Bethnel Green London,"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February 15(or 16?); "The Distress at the East End: A Soup Kitchen in Ratcliff Highway,"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February 16, 1867; "The Distress at the East End: A Soup Kitchen in Ratcliff Highway,"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February 16, 1867.
4. Sara Horrell and Jane Humphries, "Old Questions, New Data, and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Families' Living Standards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2, no.4(December 1992): 849—80.
5. Florence Nightingale to Charles Bracebridge, January 1867, in Lynn McDonald, e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Florence Nightingale,* vol.6, *Florence Nightingale on Public Health Care*(Ontario: Wilfred Laurier University Press, 2002).
6. Francis Sheppard, *London: 1808—1870*(London: Secker & Warburg, 1971), 340.
7. *Times*(London) May 6, 1867.
8. Robert Giffen, "Proceedings of the Statistical Society," *Journal of the Statistical Society of London* 30, no.4(December 1867), 564—65.
9. Henry Fawcett, *Pauperism: Its Causes and Remedies*(London: Macmillan, 1871), 1—2.
10. Edward Denison, *A Brief Record: Being Selections from Letters and Other Writings of Edward Denison,* ed. Sir Bryan Baldwin Leighton(London: E.Barrett and Sons, 1871), 46.

11. Alfred Marshall, in John Maynard Keynes, "Alfred Marshall, 1842—1924," in Arthur Pigou, ed., *Memorials of Alfred Marshall*(London: Macmillan, 1925), 358.
12. Alfred Marshall, "Lecture Outlines," in Tiziano Raffaelli, Eugenio F.Biagini, Rita McWilliams Tullberg, eds., *Alfred Marshall's Lectures to Women: Some Economic Questions Directly Connected to the Welfare of the Laborer*(Aldershott, UK: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Company, 1995), 141.
13. Ronald H.Coase, "Alfred Marshall's Mother and Father," and "Alfred Marshall's Family and Ancestry," in *Essays on Economics and Economists*(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14. Charles Dickens, *Great Expectations*(London: Chapman and Hall, 1861).
15. *The Times*(London), October 8, 1859.
16. Anthony Trollope, *The Vicar of Bullhampton*(London: Bradbury and Evans, 1870).
17. K.Theodore Hoppen, *The Mid-Victorian Generation 1846—1886*(Oxford, UK: Clarendon Press, 1998), 40.
18. Anthony Trollope, *The Warden*(London: Longman, Brown, Green, and Longmans, 1855), 289.
19. Peter D.Groenewegen, *A Soaring Eagle: Alfred Marshall: 1842—1924*(London: E.Elgar, 1995), 51.
20. David McLellan, *Karl Marx: His Life and Thought*(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4).
21. William Dudley Baxter, *National Income: The United Kingdom*(London: Macmillan, 1868), *Global Prices and Income History Website,* http://gpih.ucdavis.edu.
22. Groenewegen, *A Soaring Eagle*, 107.
23. John Maynard Keynes, "Alfred Marshall," in *Essays in Biography*(New York: W.W.Norton, 1951), 126.
24. Mary Paley Marshall, quoted in Keynes, "Alfred Marshall, 1842—1924," 37.
25. Ibid.
26. Groenewegen, *A Soaring Eagle,* 62.
27. Leslie Stephen, *Sketches from Cambridge by a Don*(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865), 37—38.
28. Alfred Marshall to James Ward, in John King Whitaker, ed., *The Correspondence of Alfred Marshall,* vol.2, *At the Summit, 1891—1902*(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441.
29. Mary Paley Marshall, quoted in Keynes, "Alfred Marshall, 1842—1924," 37.
30. Alfred Marshall, "Speech to Promote a Memorial for Henry Sidgwick," in Whitaker, ed., *Correspondence,* vol.2, 441.

31. Groenewegen, *A Soaring Eagle,* 3.
32. Alfred Marshall, preface to *Money, Credit and Commerce*(London: Macmillan, 1923).
33. Beatrice Webb, *My Apprenticeship*(London: Macmillan, 1926).
34. Alfred Marshall to James Ward, September 23, 1900, in Whitaker, ed., *Correspondence,* vol.2.
35. Gertrude Himmelfarb, "The Politics of Democracy: The English Reform Act of 1867,"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6, no.1(November 1966): 97.
36. Henry James, preface to *The Princess Casamassima*(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08[1886]), vi.
37. Keynes, "Alfred Marshall, 1842—1924," 37.
38. Marshall to Ward, September 23, 1900.
39. Henry Sidgwick,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883), 4.
40. John E.Cairnes, *The Character and Logical Method of Political Economy; Being a Course of Lectures Delivered in the Hilary Term, 1857*(London: Longmans, Brown, Green, Longmans and Roberts, 1857), 38.
41. John Ruskin, *Unto This Last: Four Essays in the First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London: Smith Elder, 1862).
42. Gertrude Himmelfarb, *The Idea of Poverty: England in the Early Industrial Age*(New York: Alfred A.Knopf, 1984).
43. Leslie Stephen, *The Life of Henry Fawcett*(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86), 222.
44. Ruskin, *Unto This Last,* 20.
45. J.E.Cairnes, *Some Leading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London: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1874), 291.
46. John Stuart Mill,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885), 220.
47. Francis Bowe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pplied to the Condition, the Resources, and the Institutions of the American People*(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 1859) 197.
48. Millicent Garrett Fawcett, *Political Economy for Beginners*(London: Macmillan, 1906), 100.
49. John Francis Bray, *Labour's Wrongs and Labour's Remedy, or the Age of Might and the Age of Right*(Leeds, UK: David Green Briggate, 1839).
50. Alfred Marshall, *Alfred Marshall's Lectures to Women, Some Economic Questions Directly Connected to the Welfare of the Labourer*(Aldershot, UK: Edward Elgar, 1995), lecture 5, 119.
51. Ibid., 156.

52. Ibid., quotes from April and May 1873 notes by Mary Paley, 47, 53, and 54.
53. Joseph Schumpeter,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290.
54. Arnold Toynbee, *Lectures o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England*(London: Rivingtons, 1884) 175.
55. Marshall, *Lectures to Women.* May 9, 1873.
56. Ibid.
57. Mary Paley Marshall, *What I Remember,* 9.
58. Winnie Seebohm in Martha Vicinus, *Independent Women: Work and Community for Single Women 1850—1920*(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151.
59. W.S.Gilbert and Arthur Sullivan, *Princess Ida,* 1884.
60. Mary Paley Marshall, *What I Remember,* 16.
61. George Eliot, *The Mill on the Floss*(London: William Blackwood and Sons, 1860).
62. Mary Paley Marshall, *What I Remember,* 20—21.
63. Lord Ernle, *English Farming Past and Present,* 3d ed.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22), 407.
64. *The Cambridge Chronicle,* April 11, 1874.
65. Alf Peacock, "Revolt of the Fields in East Anglia," *Our History*(London: Communist Party of Britain, 1968).
66. *Times*(London), April 13, 1874.
67. George Eliot, *Middlemarch*(Edinburgh: William Blackwood and Son, 1874).
68. *The Cambridge Chronicle,* April 25, 1874, and May 8, 1874.
69. *The Cambridge Independent Press,* May 16, 1874.
70. Alfred Marshall, "Beehive Articles," 1874; in R.Harrison, "Two Early Articles by Alfred Marshall," *Economic Journal 73*(September 1963): 422—30.
71. Alfred Marshall, quoted in *The Cambridge Independent Press,* May 16, 1874.
72. Alfred Marshall to Rebecca Marshall, Niagara Falls, July 10, 1875, in John K.Whitaker, ed., *The Correspondence of Alfred Marshall, Economist, vol.1, Climbing, 1868—1890*(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68—70.
73. Ibid., Alfred Marshall to Rebecca Marshall, Springfield, Mass., June 12, 1875.
74. Ibid.
75. Ibid., Alfred Marshall to Rebecca Marshall, Boston, June 20, 1875, 54.
76. Ibid., Alfred Marshall to Rebecca Marshall, Cleveland, July 18, 1875, 71.
77. Alfred Marshall, "Some Features of American Industry," November 17, 1875, lecture to the Cambridge Moral Sciences Club, in John K.Whitaker, ed., *The Early Economic Writings of Alfred Marshall, 1867—1890,* vol.2(London: The Royal Economic Society, 1975), 369.

78. Alfred Marshall to Rebecca Marshall, Cleveland, July 18, 1875, in Whitaker, *Correspondence*, vol.1, 72.
79. Keynes, "Alfred Marshall: 1842—1924," *Essays in Biography*(New York: W.W.Norton and Co., 1951), 142.
80. John K.Whitaker, "The Evolution of Alfred Marshall's Economic Thought and Writings Over the Years," in Whitaker, *Early Economic Writings,* 57.
81. Alfred Marshall, "Some Features of American Industry," in Whitaker, *Early Economic Writings,* 354.
82. *Reminiscences of America in 1869 by Two Englishmen*(London: Sampson, Low and Son and Marston, 1870).
83. Mary Paley Marshall, *What I Remember.*
84. Marshall, "Some Features of American Industry," 357.
85. Alfred Marshall to Rebecca Marshall, Lowell, Mass., and Cambridge, Mass., June 22, 1875, in Whitaker, *Correspondence,* vol.1, 58.
86. *Reminiscences of America,* 86.
87. Samuel Bowles, *The Pacific Railroad—Open: How to Go, What to See*(Boston: Fields, Osgood and Co., 1869).
88. Marshall, "Some Features of American Industry," 357.
89. Alfred Marshall to Rebecca Marshall, Springfield, Mass., June 12, 1875, in Whitaker, *Correspondence,* vol.1, 44.
90. *Reminiscences of America,* 242.
91. Marshall, "Some Features of American Industry," 359.
92. Alfred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London: Macmillan, 1890).
93. Marshall, "Some Features of American Industry," 353.
94. Alfred Marshall to Rebecca Marshall, Cleveland, July 18, 1875, in Whitaker, *Correspondence,* vol.1, 71.
95. Ibid., June 5, 1875.
96. Marshall, "Some Features of American Industry," 372.
97. Karl Marx, *Das Kapital*(1887), Friedrich Engels, ed., trans. S.Moore and E.Aveling(New York: Charles H.Kerr & Company, 1906), 709.
98. Marshall, "Some Features of American Industry," 375.
99. Alfred Marshall to Rebecca Marshall, June 5, 1875, in Whitaker, *Correspondence,* vol.1, 36.
100. Mary Paley Marshall, *What I Remember,* 19.
101. Phyllis Rose, *Parallel Lives: Five Victorian Marriages*(New York: Alfred A.Knopf, 1983).
102. Mary Paley Marshall, *What I Remember,* 23.
103. Alfred Marshall, testimony, December 1880, Governmental Committee on Intermediate and Higher Education in Wales and Monmouthshire, quoted in

J.K.Whitaker, "Marshall: The Years 1877 to 1885," in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4, no.1(Spring 1972): 6.

104. Mary Paley Marshall, *What I Remember,* 24.
105. Marion Fry Pease, "Some Reminiscences of University College, Bristol" (University of Bristol Library, Special Collections, 1942).
106. John Maynard Keynes, "Mary Paley Marshall," in *Essays in Biography.*
107. Marshall, in Whitaker, *Early Economic Writings,* 355.
108. Alfred Marshall, "The Present Position of Economics," in Whitaker, ed., *Early Economic Writings,* 51.
109.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1.
110. Mill,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2.
111. Mary Paley Marshall, unpublished notes, Marshall Archive, Cambridge University.
112. Charles Dickens, *Hard Times,* 1854, chap.5.
113. Marx, *Das Kapital,* 462.
114. Alfred Marshall, in Whitaker, *Correspondence,* vol.1, 59.
115. Alfred and Mary Marshall, *The Economics of Industry*(London MacMillan, 1879).
116. Mary Paley Marshall, *What I Remember,* 24.
117. Edwin Cannan, "Alfred Marshall, 1842—1924," *Economica 4*(November 1924): 257—61.
118. Alfred Marshall to Macmillan, June 1878, in Whitaker, *Correspondence,* vol.1, 97.
119. Henry George, *Progress and Poverty*(New York: Appleton, 1879).
120. *Jackson's Oxford Journal,* March 15, 1884. An account of the meeting is reprinted in an appendix to George Stigler, "Three Lectures on Progress and Poverty by Alfred Marshall,"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2, no.(April 1969):184—226.
121. Ibid., 186.
122. Ibid., 188.
123. Ibid., 208.
124. Ibid.
125. Ibid.

第三章　波特女士的职业：韦伯夫妇和家务管理型国家

1. George Eliot, *Middlemarch*(Edinburgh: William Blackwood and Son, 1874).
2. Daniel Pool, *What Jane Austen Ate and Charles Dickens Knew*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3), 50—56.
3. Beatrice Webb, *My Apprenticeship*(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26), 48.

4. Michelle Jean Hoppe, "The London Season," *Literary Liaisons,* accessed March 14, 2011, www.literary-liaisons.com/article024.html.
5. Norman and Jeanne MacKenzie, eds., *The Diary of Beatrice Webb,* vol.1, *1873—1892: "Glitter Around and Darkness Within"*(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90(July 15, 1883).
6. Ibid., 75(February 22, 1883).
7. Ibid., 76(February 26, 1883).
8. Ibid., 74(January 2, 1883).
9. Beatrice Webb, *My Apprenticeship,* 157.
10. Henry James, preface to *The Portrait of a Lady*(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08).
11. Margaret Harkness to Beatrice Potter, n.d., 2/2/2 Papers of Beatrice and Sidney Webb, Passfield Archive, British Library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cienc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12. Henry James, *The Portrait of a Lady,* vol.1(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881), 193.
13. MacKenzie, *Diary of Beatrice Webb,* vol.1, 80(March 31, 1883).
14. Ibid., 54(July 24, 1882).
15. Eliot, *Middlemarch,* 61.
16. Barbara Caine, *Destined to Be Wives: The Sisters of Beatrice Webb*(Oxford, UK: Clarendon Press, 1986), 12.
17. Webb, *My Apprenticeship,* 39.
18. Ibid., 42.
19. MacKenzie, *Diary of Beatrice Webb,* vol.1, 4.
20. Norman and Jean MacKenzie, eds., *The Diary of Beatrice Webb,* vol.2, *1892—1905: All the Good Things of Life*(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132(n.d.[March 1883]).
21. Herbert Spencer, *An Autobiography,* vol.1(New York: D.Appleton and Co., 1904), 298.
22. Webb, *My Apprenticeship,* 10.
23. MacKenzie, *Diary of Beatrice Webb,* vol.2.
24. Spencer, *An Autobiography,* vol.1, 298.
25. Ibid.
26. Webb, *My Apprenticeship,* 10.
27. MacKenzie, *Diary of Beatrice Webb,* vol.1, 112(April 8, 1884).
28. Ibid., 16(March 6, 1874).
29. Webb, *My Apprenticeship,* 25(emphasis added).
30. Kitty Muggeridge and Ruth Adam, *Beatrice Webb: A Life, 1858—1943*(New York: Alfred A.Knopf, 1968).

31. Ibid.
32. MacKenzie, *Diary of Beatrice Webb,* vol.1, 19(September 27, 1874).
33. Webb, *My Apprenticeship,* 56, 106, 112; MacKenzie, *Diary of Beatrice Webb,* vol.1, 74(January 2, 1883).
34. Webb, *My Apprenticeship,* 112—13.
35. MacKenzie, *Diary of Beatrice Webb,* vol.1, 77(March 1, 1883).
36. Ibid.
37. Ibid., 81(March 31, 1883).
38. Ibid., 88(May 24, 1883).
39. Ibid., 79(March 24, 1883).
40. Helen Dandy Bosanquet, *Social Work in London, 1869—1912: A History of the Charity Organization Society*(New York: E.P.Dutton, 1914), 95.
41. MacKenzie, *Diary of Beatrice Webb,* vol.1, 85(May 18, 1883).
42. Ibid., 89(July 7, 1883).
43. Ibid., 81(March 31, 1883).
44. J.L.Garvin, *The Life of Joseph Chamberlain,* vol.1(London: Macmillan, 1932), 202.
45. MacKenzie, *Diary of Beatrice Webb,* vol.1, 90—91(July 15, 1883).
46. Ibid., 88(June 3, 1883).
47. Ibid., 89(June 27, 1883).
48. Ibid., 91(July 15, 1883).
49. Ibid., 111(March 16, 1884).
50. Ibid., 95(September 22, 1883).
51. Ibid., 94(September 26, 1883).
52. Ibid.
53. "The Bitter Cry of Outcast London," *The Pall Mall Gazette,* October 16, 1883(issue 5808), 11.
54. Andrew Mearns, *The Bitter Cry of Outcast London: An Inquiry into the Condition of the Abject Poor*(London: James Clarke and Co., 1883), 5, 7; Earl Grey Pamphlets Collection(1883), Durham University Library, www.jstor.org/stable/60237726(accessed January 13, 2011); Gertrude Himmelfarb, *Poverty and Compassion: The Moral Imagination of the Late Victorians*(New York: Alfred A.Knopf, 1991).
55. MacKenzie, *Diary of Beatrice Webb,* vol.1, 137(August 22, 1885).
56. Webb, *My Apprenticeship,* 150.
57. Ibid., 152.
58. MacKenzie, *Diary of Beatrice Webb,* vol.1, 101(December 31, 1883).
59. Ibid.
60. Ibid., 100(December 27, 1883).

61. Ibid., 102—3(January 12, 1884).
62. Ibid.
63. Webb, *My Apprenticeship,* 23.
64. Terence Ball, "Marx and Darwin: A Reconsideration," *Political Theory 7,* no.4(November 1979), 469—83.
65. Herbert Spencer, *The Man Versus the State*(London: Williams and Norgate, 1884), vii.
66. Arnold Toynbee, "Progress and Poverty: A Criticism of Mr.Henry George—— Mr.George in England," London, January 18, 1883, in *Lectures o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f the 18th Century in England: Popular Addresses, Notes and Fragments by the Late Arnold Toynbee,* 6th ed.(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02), 318.
67. MacKenzie, *Diary of Beatrice Webb,* vol.1, 91(July 15, 1883).
68. Beatrice Webb to Anna Swanwick, London, 1884(not sent), in MacKenzie, ed., *The Letters of Sidney and Beatrice Webb,* vol.1(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23.
69. MacKenzie, *Diary of Beatrice Webb,* vol.1, 115(April 22, 1884).
70. Webb, *My Apprenticeship,* 138.
71. MacKenzie, *Diary of Beatrice Webb,* vol.1, 105—12(March 16, 1884).
72. Joseph Chamberlain, "Work for the New Parliament," Birmingham, UK, January 5, 1885, in *Speeches of the Right Honorable Joseph Chamberlain, M.P.,* Henry W.Lucy, ed.(London: George Routledge and Sons, 1885), 104.
73. MacKenzie, *Diary of Beatrice Webb,* vol.1, 117(May 9, 1884).
74. Ibid., 119(July 28, 1884).
75. Ibid.(August 1, 1884).
76. Webb, *My Apprenticeship,* 272.
77. MacKenzie, *Diary of Beatrice Webb,* vol.1, 145(December 19, 1885).
78. Ibid., 153(January 1, 1886).
79. Ibid., 154(February 11, 1886).
80. "London Under Mob Rul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8, 1886.
81. Ibid.
82. Ibid.
83. "London's Recent Rioting,"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0, 1886.
84. "The Rioting in the West-End," *Times*(London), February 10, 1886.
85. Queen Victoria to William Ewart Gladstone, Windsor Castle, February 11, 1886, in *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 Third Series: A Selection of Her Majesty's Correspondence and Journal Between the Years 1886 and 1901,* vol.1, George Earle Buckle, ed.(New York: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32), 52.
86. Ibid.

87. Margaret Harkness[John Law], *Out of Work*(London: Swan Schonnenschein, 1888).
88. Webb, *My Apprenticeship,* 273.
89. MacKenzie, *Diary of Beatrice Webb,* vol.1, 154.
90. Beatrice Webb, "A Lady's View of the Unemployed at the East," *Pall Mall Gazette,* February 18, 1886.
91. Joseph Chamberlain to Beatrice Potter, February 25, 1886, 2/1/2 Passfield Archive.
92. Joseph Chamberlain to Beatrice Potter, February 28, 1886, 2/1/2 Passfield Archive.
93. Ibid.
94. Beatrice Potter to Joseph Chamberlain, Bournemouth, n.d.[March 1886], in *Letters,* ed. MacKenzie, vol.1, 53—54.
95. Joseph Chamberlain to Beatrice Potter, March 5, 1886, 2/1/2 Passfield Archive.
96. Royden Harrison, *The Life and Times of Sidney and Beatrice Webb: The Formative Years, 1858—1903*(London: Palgrave, 1999), 125.
97. MacKenzie, *Diary of Beatrice Webb,* vol.1, 160(April 4, 1886).
98. Webb, *My Apprenticeship,* 212.
99. MacKenzie, *Diary of Beatrice Webb,* vol.1, 164(April 18, 1886).
100. Charles Booth, "The Inhabitants of Tower Hamlets(School Board Division), Their Condition and Occupations,"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London, May 17, 1887, in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vol.50(London: Edward Stanford, 1887), 326—91.
101. MacKenzie, *Diary of Beatrice Webb,* vol.1, 164(April 17, 1886).
102. Ibid., 173(July 2, 1886).
103. Ibid.
104. Ibid., 174(July 18, 1886).
105. Ibid., 213(n.d.).
106. Webb, *My Apprenticeship,* 300.
107. MacKenzie, *Diary of Beatrice Webb,* vol.1, 241(April 11, 1888).
108. Beatrice Potter, "Pages from a Work-Girl's Diary,"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 Monthly Review* 24, issue 139(September 1888): 301—14.
109. MacKenzie, *Diary of Beatrice Webb,* 249(April 13, 1888).
110. "The Peers and the Sweaters," *Pall Mall Gazette,* May 12, 1888.
111. MacKenzie, *Diary of Beatrice Webb,* vol.1; 261(September 14, 1888).
112. Ibid., 264(November 8, 1888).
113. Ibid., 269(December 29, 1888).
114. Ibid., 250(April 26, 1888).

115. Ibid., 274(March 8, 1889).
116. Webb, *My Apprenticeship,* 341.
117. Review of *Labour and Life of the People,* ed. Charles Booth, *The Times*(London), April 15, 1889, 9.
118. Webb, *My Apprenticeship,* 374.
119. MacKenzie, *Diary of Beatrice Webb,* vol.1, 321(February 1, 1890).
120. Ibid., 328(March 29, 1890).
121. Ibid., 321(February 1, 1890).
122. Ibid., 310(November 26, 1889); Beatrice Potter to Sidney Webb[December 7, 1890], in *Letters,* vol.1, ed. MacKenzie, 239.
123. *Letters,* vol.1, ed. MacKenzie, 70.
124. Webb, *My Apprenticeship,* 390.
125. Muggeridge and Adam, *Beatrice Webb: A Life,* 123.
126. MacKenzie, *Diary of Beatrice Webb,* vol.1, 184(October 31, 1886).
127. Ibid., 324(February 14, 1890).
128. Sidney and Beatrice Webb, *The History of Trade Unionism*(London: Green and Co., 1907), 400.
129. G.M.Trevelyan, *British Histor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1782—1901)*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22), 403.
130. Sidney Webb to Edward Pease, London, in *Letters,* vol.1, ed. MacKenzie, 101; Sidney Webb, *Socialism in England*(London: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889), 11, 20.
131. Sidney Webb, "Historic," in *Fabian Essays in Socialism,* ed. G.Bernard Shaw, 30—61(London: The Fabian Society, 1889), 38.
132. MacKenzie, *Diary of Beatrice Webb,* vol. 322(February 1, 1890).
133. William Harcourt, Speech to the House of Commons, August 11, 1887. *Parliamentary Debates,* 3rd series, vol.319.
134. MacKenzie, *Diary of Beatrice Webb,* 330(April 26, 1890).
135. Beatrice Potter to Sidney Webb, Gloucestershire, May 2, 1890, in *Letters,* vol.1, ed. MacKenzie, 133.
136. Ibid., Sidney Webb to Beatrice Potter, April 6, 1891, 269.
137. MacKenzie, *Diary of Beatrice Webb,* vol.1, 354.
138. Beatrice Potter to Sidney Webb, Gloucestershire, in *Letters,* vol.1, ed. MacKenzie, 281.
139. MacKenzie, *Diary of Beatrice Webb,* vol.1, 357(June 20, 1891).
140. Friedrich August Hayek, review of *Our Partnership* by Beatrice Webb, eds. Barbara Drake and Margaret I.Cole(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48); *Economica,* New Series 15, no.59(August 1948): 227—30.
141. MacKenzie, *Diary of Beatrice Webb,* vol.1, 371(July 23, 1892).

142. Ibid., vol.2, 37(September 17, 1893).
143. Michael Holroyd, *Bernard Shaw: The One-Volume Definitive Edition*(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97), 164.
144. George Bernard Shaw to Archibald Henderson, June 30, 1904, in Archibald Henderson, *George Bernard Shaw: His Life and Works*(Cincinnati: Stewart and Kidd Company, 1911), 287.
145. George Bernard Shaw, preface to *Mrs.Warren's Profession: A Play in Four Acts*(London: Constable, 1907), xvii.
146. George Bernard Shaw to the editor of the *Daily Chronicle,* April 30, 1898, in *Bernard Shaw: Collected Letters, 1874—1897*(New York: Dodd, Meade and Company, 1965), 404.
147. H.G.Wells, *The New Machiavelli*(New York: Duffield and Co., 1910), 194—95.
148. James A.Smith, *The Idea Brokers: Think Tank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Policy Elite*(New York: Free Press, 1991), xiii.
149. Wells, *The New Machiavelli,* 199.
150. Ibid., 197.
151. A.G.Gardiner, *The Pillars of Society*(London: James Nisbet, 1913); Wells, *The New Machiavelli,* 195.
152. Wells, *The New Machiavelli,* 194.
153. Ibid., 190.
154. MacKenzie, *Diary of Beatrice Webb,* vol.2, 262(November 28, 1902), 325(June 8, 1904).
155. Gardiner, *The Pillars of Society,* 204, 206.
156. Wells, *The New Machiavelli,* 196.
157. Richard Henry Tawney, *The Webbs in Perspective: The Webb Memorial Lecture Delivered 9 December 1952*(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1953), 4.
158. MacKenzie, *Diary of Beatrice Webb,* vol. 3, 69(March 22, 1907).
159. Wells, *The New Machiavelli,* 196.
160. Wells, *The New Machiavelli,* 191.
161. MacKenzie, *Diary of Beatrice Webb,* 287(July 8, 1903).
162. Ibid., 321(May 2, 1904), 326—27(June 10, 1904).
163. Elie Halevy,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vol.6, *The Rule of Democracy(1905—1914),* 2nd ed.(London: Ernest Benn Limited, 1952), 267.
164. Edward Marsh, *A Number of People: A Book of Reminiscences*(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39), 163; Winston Churchill and Henry William Massingham, introduction to *Liberalism and the Social Problem: A Collection of Early Speeches as a Member of Parliament*(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09).

165. Winston S.Churchill, "H.G.Wells," in *The Collected Essays of Sir Winston Churchill,* vol.3, *Churchill and People,* ed. Michael Wolff(London: Library of Imperial History, 1976), 52—53.
166. Marsh, *A Number of People,* 150.
167. William Manchester, *The Last Lion: Winston Spencer Churchill, Visions of Glory(1874—1932)*(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83), 403.
168. Peter de Mendelssohn, *The Age of Churchill,* vol.1, *Heritage and Adventure, 1874—1911*(New York: Alfred A.Knopf, 1961), 365.
169. *Never Give In! The Best of Winston Churchill's Speeches,* Winston S.Churchill, ed.(New York: Hyperion, 2003), 25.
170. Beatrice Webb, *Our Partnership,* eds. Barbara Drake and Margaret I.Cole(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48), 149.
171. Sidney and Beatrice Webb, *Industrial Democracy,* vol.2(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897), 767.
172. Sidney and Beatrice Webb, *The Prevention of Destitution*(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11), 1.
173. Ibid., 17, 97.
174. Ibid., 5.
175. Ibid., 90.
176. Ibid., 285.
177. MacKenzie, *Diary of Beatrice Webb,* vol.3, 95(July 27, 1908).
178. Webb, *Our Partnership,* 481—82.
179. George Bernard Shaw, "Review of the Minority Report," quoted in Holroyd, *Bernard Shaw,* 398.
180. Webb, *Our Partnership,* 481—92.
181. MacKenzie, *Diary of Beatrice Webb,* February 10, 1908.
182. Ibid., October 16, 1908.
183. Ibid., April 18/20, 1908.
184. John Grigg, *Lloyd George: The People's Champion, 1902—1911*(London: Eyre Methuen, 1978), 100.
185. Charles Frederick Gurney Masterman to Lucy Blanche Masterman, February 1908.
186. Roy Jenkins, *Churchill: A Biography*(London: Hill and Wang, 2001), 143—44.
187. Winston S.Churchill to H.H.Asquith, March 14, 1908, quoted in Martin Gilbert, *Churchill: A Life*(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91), 193.
188. Churchill to Asquith, December 29, 1908.
189. MacKenzie, *Diary of Beatrice Webb,* vol.3, 100(October 16, 1908), 118(June 18, 1909).

190. Ibid., June 18, 1909.
191. Ibid., vol.3, 90(March 11, 1908).
192. Manchester, *The Last Lion,* 371.
193. Himmelfarb, *Poverty and Compassion,* 378.
194. Baron William Henry Beveridge, *Power and Influence*(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53), 86.

第四章　黄金交叉：费雪与货币错觉

1. David A. Shannon, ed., *Beatrice Webb's American Diary*(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3), 72. Remark made by Professor H. Morse Stephens to Beatrice Webb during a tour of Cornell University in May 1898.
2. Norman and Jeanne MacKenzie, eds., *The Diary of Beatrice Webb,* vol.2, *1892—1905: All the Good Things of Life*(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137.
3. Beatrice Webb, *Our Partnership*(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48), 146.
4. Niall Ferguson, *Empire: The Rise and Demise of the British World Order*(New York: Basic Books, 2004), 242.
5. See, for example, the following articles in *The Manchester Guardian*: "An American Invasion," June 21, 1871(rumors of Susan B. Anthony's trip to Ireland with the American Woman's Rights League); "From Our London Correspondent," October 21, 1890(American girls invade the market for Britain's eligible noblemen); "Cycling Notes," October 29, 1894(American-made bicycles threaten to dominate the British market); "By-ways of Manchester Life, XI. An American Invasion," April 9, 1898(American firm builds a grain elevator on the Manchester Ship Canal).
6. Frederick Arthur McKenzie, *The American Invaders: Their Plans, Tactics and Progress*(London: Grant Richards, 1902), 142—43.
7. William Ewart Gladstone, *Gleanings of Past Years,* vol. I, *1843—78: The Throne and the Prince Consort; The Cabinet and the Constitution*(London: John Murray, 1879), 206.
8. Angus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Paris: OECD, 2001), 265.
9. Ferguson, *Empire,* 242.
10. Dudley Baines, *Migration in a Mature Economy: Emigration and Internal Migration in England*(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63, table 3.3.
11. William Ewart Gladstone,"Free Trade" in Gladstone et. al., *Both Sides of the Tariff Question by the World's Leading Men*(New York: Alonzo Peniston, 1890), 44.

12. Jeremy Atack and Peter Passell, *A New Economic View of American History from Colonial Times to 1940*(New York: W.W.Norton, 1994), 468.
13. Shannon, *American Diary, 27*(April 12, 1898).
14. Ibid., 136(July 2—7, 1898).
15. Ibid., 137—50(July 2—7 and July 10, 1898).
16. Ibid., 89, 90—91(May 24, 1898), and 92—93(May 29, 1898).
17. Beatrice Webb to Catherine Courtney, Chicago, May 29, 1898, in Norman McKenzie, ed., *The Letters of Sidney and Beatrice Webb*, vol.2, *Partnership: 1892—1912*(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18. Norman and Jean MacKenzie, eds., *The Diary of Beatrice Webb*, vol.2, *1892—1905: All the Good Things of Life*(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159(May 16, 1889); Charles Philip Trevelyan to Beatrice Webb, Chicago, April 19, 1898, quoted in Shannon, *American Diary*, 88, note 4.
19. Shannon, *American Diary*, 60(April 29, 1898), 10(April 1, 1898), May 24, 1898, and 68(May 7, 1898).
20. Milton Friedman, *Money Mischief: Episodes in Monetary History*(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92), 37.
21. Henry James, *The Ambassadors*(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Publishers, 1903), 257.
22. Alfred Marshall to Rebecca Marshall, St. Louis, August 22, 1875, in John K.Whitaker, ed., *The Correspondence of Alfred Marshall, Economist*, vol, 1, *Climbing, 1868—1890*(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73.
23. Henry Seidel Canby, *Alma Mater: The Gothic Age of the American College*(New York: Farrar Reinhart, 1936), 71, 32.
24. Irving Norton Fisher, *My Father: Irving Fisher*(New York: Comet Press, 1956), 21, 26—27, 29—30, 33.
25. Muriel Rukeyser, *Willard Gibbs: American Genius*(New York: Doubleday, Doran and Co., 1942), 158.
26. Edward Bellamy, *Looking Backward: 2000—1887*(London: George Routlege and Sons, 1887).
27. Rukeyser, *Willard Gibbs*, 146.
28. Ibid., 231.
29. Paul A.Samuelson, "Economic Theory and Mathematics—An Appraisal," in Joseph E.Stiglitz, ed., *The Collected Scientific Papers of Paul A.Samuelson*, vol.2(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1966), 1751.
30. Irving Fisher to William G.Eliot, Jr., Berlin, N.J., May 29, 1886, in Irving Norton Fisher, *My Father*, 25—26.
31. Irving Fisher to Will Eliot, Fisher to Eliot, Jr., Pittsfield, Mass., July 25, 1886, in Irving Norton Fisher, *My Father*, 26.

32. Arthur Twining Hadley, *Economics: An Account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Private Property and Public Welfare*(New York: G.P. Putnam's Sons, 1896), iv.
33. Richard Hofstadter, *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New York: George Braziller, Inc., 1959), 8.
34. Albert Galloway Keller, introduction to *War and Other Essays by William Graham Sumner*, Keller, ed.(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11), xx, xxiv; Hofstadter, *Social Darwinism*, 51.
35. Fisher to Eliot, Peace Dale, R.I., September 1892, in Irving Norton Fisher, *My Father*, 52.
36. William James to Thomas W.Ward, Berlin, n.d. [November 1867], in Henry James, ed., *The Letters of William James*, Vol.1(Boston: Atlanta Monthly Press, 1920), 118.
37. Irving Fisher, "Mathematical Investigations in the Theory of Value and Prices(April 27, 1892)," in William J.Barber, ed., *The Works of Irving Fisher*, vol.1(London: Pickering and Chatto, 1997), 162.
38. Ibid., 68.
39. Ibid., 145.
40. Ibid., 4.
41. Francis Ysidro Edgeworth, review of "Mathematical Investigations in the Theory of Value and Prices" by Irving Fisher, *Economic Journal*, vol.3, no.9(March 1893), 112.
42. Alfred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3rd ed.(London: Macmillan, 1895), 450, 148(note 1).
43. Barbara W.Tuchman, *The Proud Tower: A Portrait of the World Before the War, 1890—1914*(New York: Macmillan and Co., 1966).
44. *Narragansett Times*, June 23, 1893, quoted in Irving Norton Fisher, *My Father*, 60.
45. *New York Times* wedding announcement, June 18, 1893.
46. Daniel T.Rogers, *Atlantic Crossings: Social Politics in a Progressive Ag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47. Irving Fisher to Ella Wescott Fisher.
48. Fisher, Jr. *My Father*, 69.
49. Douglas Steeples and David O.Whitten, *Democracy in Desperation: The Depression of 1893*(New York: Greenwood, 1998).
50. Reverend T.De Witt Talmage, sermon delivered in Washington on September 27, 1896, quoted in William Jennings Bryan, *The First Battle: A Story of the Campaign of 1896*(Chicago: W.B.Conkey Company, 1896), 474.
51. Albro Martin, *James J.Hill and the Opening of the Northwest*(Minneapolis:

Minnesota Historical Society Press, 1975), 428.

52. Bryant, *The First Battle*, 439.
53. Paxton Hibben and Charles A.Beard, *The Peerless Leader: William Jennings Bryan*(Whitefish, MT: Kessinger Publishing, 2004), 189.
54. Bryan, *The First Battle*, 485—86.
55. Ibid.
56. Ibid.
57. "Bryan's Backers Are Shy,"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7, 1896; Canby, *Alma Matter, 27*; Martin L.Fausold, *James W.Wadsworth, Jr.: The Gentleman from New York*(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75), 17.
58. "Yale Would Not Listen,"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5, 1896, 15.
59. Fisher to Eliot, summer 1895, quoted in Irving Norton Fisher, *My Father*, 71.
60. Fisher to Eliot, July 29, 1895, quoted in Barber, *Works of Irving Fisher*, 10.
61. Fisher to Eliot, summer 1895, quoted in Irving Norton Fisher, *My Father*, 71.
62. Fisher to Eliot, New Haven, November 1865, quoted in Irving Norton Fisher, *My Father*, 71.
63. William Graham Sumner, *The Absurd Effort to Make the World Over*, in Keller, *War, and Other Essays*, 195—210.
64. Fisher to Eliot, summer 1895, quoted in Irving Norton Fisher, *My Father*, 71.
65. Irving Fisher, "The Mechanics of Bimetallism,"*Economic Journal*, 4(September 1894), 527—36; Irving Norton Fisher, *My Father*, 187.
66. Harold James, *The End of Globalization: Lessons from the Great Depression*(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24—25.
67. Walter Bagehot, *Lombard Street: A Description of the Money Market*(New York: Scribner, Armstrong, 1873), 123.
68. Fisher, *Mathematical Investigations*, in Barber, *Works of Irving Fisher*, 147.
69. Katherine Ott, *Fevered Lives: Tuberculosis in American Culture Since 1870*(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113.
70. Ibid.,79.
71. Irving Fisher, May 1901,"Self Control," a talk given at the Thacher School in Ojai, California, a high school founded by William L.Thacher.
72. Fisher to Eliot, Saranac, December 11, 1898, in Irving Norton Fisher, *My Father*, 75.
73. Fisher to Margaret Hazard Fisher, Battle Creek, Michigan, December 31, 1904, in ibid., 108.
74. Irving Fisher, "Memorial Relating to the Conservation of Human Life," S.Doc. No.493, at 7—8(1912).
75. Irving Fisher, "Why Has the Doctrine of Laissez Faire Been Abandoned?" Address at the Fifty-fif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New Orleans, December 1905—January 1906.

76. Perry Mehrling, "Love and Death: The Wealth of Irving Fisher," in Warren J.Samuels and Jeff E.Biddle, eds., *Research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and Methodology*, vol.19(New York: Elsevier Science BV, 2001), 47—61.
77. Fisher, "Why Has the Doctrine of Laissez Faire Been Abandoned?"
78. Ibid.
79. Ibid.
80. Ibid.
81. Fisher to Bert, Peace Dale, Rhode Island, January 1, 1903, in Irving Norton Fisher, *My Father*, 84—85.
82. Irving Fisher, *The Rate of Interest: Its Nature, Determination and Relation to Economic Phenomena*(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07), 326.
83. Ibid., 327.
84. Ibid., 288.
85. Ibid.

第五章　创造性的破坏：熊彼特与经济演变

1. Rosa Luxemburg,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1913)(London: Routledge and Keegan Paul, 1951), 458.
2.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UK Bank Rate, www.nber.org/databases/macrohistory/rectdata/13/m13013.data.
3. Felix Somary, *Erinnerungen aus Meinem Leben*[Memories from My Life](Zurich: Manesse Verlag, 1959).
4. Oszkár Jászi, *The Dissolution of the Habsburg Monarchy*(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9), 210.
5. Carl Schorske, *Fin de Siècle Vienna*(NewYork: Knopf, 1979).
6. Erich Streissler, "Schumpeter's Vienna and the Role of Credit in Innovation", in H.Frisch, ed., *Schumpeterian Economics*(New York: Praeger, 1981), 60.
7. Joseph Roth, *The Radetzky March,* trans. Geoffrey Dunlop(New York: Viking, 1933), 212.
8. "Open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Electricity at Vienna," *Manufacturer and Builder,* vol.15, no.9(September 1883), 214—15; "An Electric Exhibition," *New York Times,* August 12, 1883.
9. Quoted in Roman Sandgruber, "The Electrical Century: The Beginnings of Electricity Supply in Vienna," trans. Richard Hockaday, in Mikulas Teich and Roy Porter, eds., *Fin de Siècle and Its Legacy*(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42.
10. Richard L.Rubenstein, *The Age of Triage: Fear and Hope in an Overcrowded World*(Boston: Beacon Press, 1983), 8; Raymond James Sontag, *Germany and*

England: Background of Conflict, 1848—1894(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1964), 146.

11. David F. Good, *The Economic Rise of the Habsburg Empire, 1750—1914*(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256.
12. Gottfried Haberler,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64, no.3(August 1950), 338.
13. Arthur Smithies, "Memorial: Joseph Alois Schumpeter, 1883—1950,"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40, no.4 (September 1950), 628—48.
14. Marcel Proust, *Swann's Way,* trans. C.K.Scott Moncrieff(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22), 73.
15. Joseph A. Schumpeter, "Preface to the Japanese Edition of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chumpeter, *Essays on Entrepreneurs, Innovations, Business Cycles, and the Evolution of Capitalism,* Richard Clemence, ed.(New Yor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51), 166.
16. Alfred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vol.1, 5th ed.(London: Macmillan, 1907), xxix, 820.
17. Joseph A.Schumpeter, "Review of *Essays in Biography* by J.M.Keynes," *Economic Journal* 43, no.172 (December 1933), 652—57.
18. "Wills and Bequests," *Times*(London), January 12, 1933.
19. Richard Swedberg, "Appendix II: Schumpeter's Novel Ships in Fog (a Fragment)," in *Schumpeter, a Biography*(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207.
20. W.W.Rostow, *Theorists of Economic Growth from David Hume to the Present,* 234—35.
21. Anthony Trollope, *The Bertrams*(London: Chapman and Hall, 1859), 465.
22. Rosa Luxemburg,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1913)* (London: Routledge and Keegan Paul, 1951), 434.
23. Quoted in Alexander D. Noyes, "A Year After the Panic of 1907,"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3(February 1909); 185—212.
24. "The Progress of the World," *American Monthly Review of Reviews,* vol.35, no.1(January 1907).
25. Evelyn Baring Cromer, *The Situation in Egypt: Address Delivered to the Eighty Club on December 15th, 1908 by the Earl of Cromer*(London: Macmillan, 1908), 9.
26. William Jennings Bryan, "The Government of Egypt Beyond Definition," in *The Old World and Its Ways*(St. Louis: Thompson, 1907), 323.
27. "Railroad Up Cheops," *Los Angeles Times,* February 12, 1907, II.
28. Quoted in Noyes, "A Year After the Panic," 202.
29. "Cotton Crops and Gold in Egypt," *New York Times,* January 5, 1908, AFR 28.

30. Harry Boyle to Lord Rennell, April 21, 1907, in Clara Boyle, *A Servant of the Empire: A Memoir of Harry Boyle with a Preface by the Earl of Crorner*(London: Methuen, 1938), 107.
31. "Egyptian Financ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8, 1907, 54.
32. Noyes, "A Year After the Panic," 202—3.
33. Ibid., 194.
34. Desmond Stewart, "Herzl's Journeys in Palestine and Egypt,"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vol.3, no.3(spring, 1974), 18—38.
35. Wassily Leontief, "Joseph A.Schumpeter," *Econometrica,* vol.8, no.2 (April 1950).
36. Quoted in Trevor Mostyn, *Egypt's Belle Époque, 1869—1952: Cairo and the Age of the Hedonists*(London: Quartet Books, 1989), 154.
37. Douglas Sladen, quoted in Max Rodenbeck, *Cairo: The City Victorious*(New York: Alfred A.Knopf, 1999), 138.
38. Joseph A.Schumpeter, *Das Wesen und Hauptinhalt der Theoretischen Nationalekonomie*(Altenburg: Stefan Geibel, 1908), 621, trans, by Bruce McDaniel as *The Nature and Essence of Economic Theory*(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10), x.
39. Ibid., 621.
40. Smithies, "Memorial," 629.
41. Joseph A.Schumpeter,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Inquiry Into Profits, Capital, Credit, Interest and the Business Cycle,* (1911) trans. Redvers Opie(New Yor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4), 91.
42.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 vol.2, *The Age of Victoria*(New York: Norton, 2000).
43. Joseph Schumpeter,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571.
44. Alfred Marshall, "The Social Possibilities of Economic Chivalry," *Economic Journal* 17, no.5 (March 1907); 7—29.
45. Angus Maddison, "GDP per Capita in 1990 International Geary-Khamis Dollars," *The World Economy: Historical Statistics*(Paris: OECD Publishing, 2003).
46. Jeffrey Williamson, "Real Wages and Relative Factor Prices in the Third World Before 1940: What Do They Tell Us About the Sources of Growth?" October 1998, Conference on Growth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y: A Quantitative Economic History, December 14—15, 1998, Valencia, Spain, 37, table 2, www.economics.harvard.edu/pub/HIER/1998/1855.pdf; Michael D.Bordo, Alan M.Taylor, Jeffrey G.Williamson, *Globaliza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285.

47. Joseph A.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87.
48.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1848), trans. Samuel Moore,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Gareth Stedman Jones(London: Penguin Books, 1967), 222.
49. Marshall, *Principles.*
50. Schumpeter,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95.
51. Beatrice Webb, *My Apprenticeship*(1926)(Longmans, Green, 1950), 380.
52.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132.
53. Schumpeter,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85.
54.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132.
55. Friedrich von Wieser, *The Theory of Social Economics*(New York: Augustus M.Kelly, 1927 and 1967).
56. Joseph A.Schumpeter,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in Sociology and Economic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June 1949), 199—212.
57. Ibid.
58. David Landes, *Bankers and Pashas: 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Imperialism in Egypt*(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57.
59. Joseph A.Schumpeter to David Pottinger, June 4, 1934, in Swedberg, *Schumpeter,* 219.
60. Edwin A.Seligman,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t Columbia, to Nicholas Murray Butler, President of the University, October 22, 1913, quoted in Robert Loring Allen, *Opening Doors: The Life and Work of Joseph Schumpeter*(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1), 130.

第二幕 恐惧

序 幕 世界的战争

1. Irving Fisher, "The Need for Health Insurance," *American Labor Legislation Review* 7 (1917): 10.
2. Norman and Jeanne MacKenzie, eds., *The Diary of Beatrice Webb* vol.3, *1905—1924: The Power to Alter Things*(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204.
3. Ibid., August 5, 1914.
4. Ibid., November 4, 1918.
5. George Bernard Shaw, "Common Sense About the War," 1914.
6. Bertrand Russell, quoted in Niall Ferguson, *The Pity of War*(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318.
7. Robert Skidelsky, John Maynard Keynes: *Hopes Betrayed,* vol.I(New York: Viking, 1986).
8. John Maynard Keynes to Neville Chamberlain.

9. Richard Shone with Duncan Grant, "The Picture Collector," in Milo Keynes, *Essays on John Maynard Keyne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283.
10. Charles John Holmes, *Self & Partners(Mostly Self): Being the Reminiscences of C.J.Holmes*(London: Macmillan, 1936); Anne Emberton, "Keynes and the Degas Sale," *History Today,* December 31, 1995.
11. John Maynard Keynes to Florence Keynes.
12. Vanessa Bell to Roger Fry.
13. Sigmund Freud, in Peter Gay, *Sigmund Freud: A Life of Our Time*(New York: W.W.Norton, 1988).
14. Friedrich Hayek, "Remembering My Cousin 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 *Encounter,* August 19, 1977, 20—21, and Ray Monk, *Ludwig Wittgenstein: The Duty of Genius*(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1).
15. Hayek, "Remembering My Cousin," 20.
16. D.H.Mellor, "Better than Stars: Portrait of Frank Ramsey," BBC; D.H.Mellor(1995) "Cambridge Philosophers, vol.I: F.P.Ramsey," *Philosophy 70*(1995), 259.
17. "National Society to Conserve Lif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30, 1913; Irving Fisher and Eugene Lyman Fisk, Preface to *How to Live: Rules for Healthful Living Based on Modern Science,* 2nd ed. (New York: Funk & Wagnalls Company, 1915).
18. Henry Andrews Cotton, *The Defective, Delinquent, and Insane: The Relation of Focal Infections to Their Causation, Treatment, and Prevention, by Henry A. Cotton, lectures delivered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January 11, 13, 14, 15, 1921,* with a foreword by Adolf Meyer(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22).
19. Bette M.Epstein, New Jersey State Archives, to author.
20. Irving Fisher, *American Labor Legislation Review,* p.10.
21. MacKenzie, *Diary of Beatrice Webb,* vol.3, 324(November 17, 1918).
22. Ibid., 318(November 11, 1918).
23. Ray Monk, *Bertrand Russell: The Spirit of Solitude 1872—1921, Vol.I*(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6).

第六章　人类的末日：熊彼特在维也纳

1. Joseph A.Schumpeter, *Politische Reden* [Political Speeches], Wolfgang F.Stolper and Christian Seidl, eds.(Tubingen: J.C.B.Mohr, 1992).
2. Francis Oppenheimer, *The Stranger Within: Autobiographical Pages*(London: Faber, 1960).
3. Norman and Jeanne MacKenzie, eds., *The Diary of Beatrice Webb,* vol.3, *1905—*

1924(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84), November 11, 1918.

4. Sigmund Freud, quoted in Peter Gay, *Freud: A Life of Our Time*(New York: W.W.Norton and Co., 1988), 382.
5. F.L.Carsten, *Revolution in Central Europe: 1918—1919*(Aldershot, UK: Wildwood House, 1988), 41.
6. Karl Kraus, *The Last Days of Mankind: A Tragedy in Five Acts*(New York: Unger, 2000).
7. Edmund von Glaise-Horstenau, "The Armistice of Villa Giusti 1918", in *The Collapse of the Austro-Hungarian Empire*(London: J.M.Dent and Sons, 1930).
8. Sigmund Freud, quoted in Gay, *Freud.*
9. F.O.Lindley, British high commissioner, quoted in Carsten, *Revolution in Central Europe*, 11—12.
10. Friedrich Wieser, "The Fight Against Famine in Austria," in *Fight the Famine Council,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nference*(London: Swarthmore Press, 1920), 53.
11. *The Memoirs of Herbert Hoover*, vol.1, *Years of Adventure 1874—1920*(New York: Macmillan, 1951), 392.
12. Ibid.
13. Stefan Zweig, *The World of Yesterday: An Autobiography*(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4), 289.
14. Ludwig von Mises, "The Austro-Hungarian Empire,"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921.
15. Quoted in *Gay, Freud*, 378.
16. Felix Salten, *Florian, the Emperor's Horse*(New York: Aires Scribner Sons, 1934).
17. "Austria Willing to Pawn Anything,"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2, 1920.
18. Carsten, *Revolution in Central Europe*, 37.
19. Joseph Schumpeter, *Die Arbeiter Zeitung*, November 22, 1919, in *Dokumentation zur Oesterreichischen Zeitgeschichte, 1918—1928.* [Documentation of Austrian History, 1918—1928], eds. Christine Klusacek, Kurt Stimmer(Vienna: lugend und Volk, 1984).
20. Sir T.Montgomery-Cuninghame, *Dusty Measure*(London: John Murray, 1939), 309.
21. SHB to ASB, December 30, 1918, quoted in William Beveridge, *The Power and Influence*, 153.
22. Karl Kautsky, *The Social Revolution and On the Morrow of the Social Revolution*(London: Twentieth Century Press, 1907), part 2, 1.
23. Felix Somary, *Erinnerungen aus Meinem Leben* [Memories from My Life]

(Zurich: Manesse Verlag, 1955), 171.

24. Eduard Bernstein
25. Otto Bauer, *The Austrian Revolution*(London: Parsons, 1925).
26. Albert Einstein to Hedwig and Max Born, January 15, 1919, *Albert Einstein, Collected Papers*, vol.4.
27. Joseph Schumpeter, quoted in Eduard Marz, *Joseph A.Schumpeter: Forscher, Lehrer und Politiker*[Researcher, Teacher, and Politician] (Munchen: R.Oldenbourg, 1983).
28. Somary, *Erinnerungen*, 172.
29. Karl Corino, *Robert Musil*(Hamburg: Rowolt, 2003), 598.
30. Friedrich von Wieser, *Tagebuch* Gertrud Enderle-Burcel, Staatsarchiv Wien Nachlass Wieser in the Haus-, Hof-und Staatsarchiv Extracts in Seidl, *Politische Reden*, 10—12.
31. Wolfgang F.Stolper, *Joseph Alois Schumpeter: The Public Life of a Private Man*(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123.
32. Karl Kraus, *Die Fackel*, April 1919.
33. Joseph Schumpeter, *Politische Reden*.
34. Otto Bauer, *The Austrian Revolution*(London: Parsons, 1925).
35. Gabor Betony, *Britain and Central Europe 1918—1933*(Oxford, UK: Clarendon Press, 1999), 10.
36. Joseph Schumpeter, "The Sociology of Imperialism," in Richard Sweds, *The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of Capitalism*(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156—57.
37. Joseph Schumpeter, *Politische Reden*.
38. Joseph Schumpeter, *Politische Reden*.
39. David Lloyd George, "Fontainebleau Memorandum" March 25, 1919, www.fullbooks.com/Peaceless-Europe2.html.
40. Winston Churchill, House of Commons, May 29, 1919, http://www.winston churchill.org; Randolph Spencer Churchill and Martin Gilbert, *Winston S.Churchill*, vol.4, *The Stricken World*(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1966), 308.
41. Bauer, *The Austrian Revolution*, 106.
42. *The Memoirs of Herbert Hoover*, vol.1, *Years of Adventure 1874—1920*(New York: Macmillan, 1951); Bauer, *The Austrian Revolution*, 103.
43. Hans Loewenfeld-Russ, *Im Kampf Gegen den Hunger*[In the Fight Against Hunger] (Munich: R.Oldenburg, 1986).
44. T.Montgomery-Cuninghame, *Dusty Measure*, (London: John Murray, 1939).
45. Ellis Ashmead-Bartlett, *The Tragedy of Central Europe*(London: Thornton Butterworth, 1924), 159.

46. Ibid.
47. Friedrich von Wieser, *Tagebuch*, Gertrud Enderle-Burcel, Staatsarchiv Wien Nachlass Wieser in the Haus-, Hof-und Staatsarchiv Extracts in Seidl, Politische Reden, pp.10—12.
48. Eduard Marz, *Austrian Banking and Financial Policy: Creditanstalt at a Turning Point, 1913—1923*(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4), 333.
49. "Entretien avec le Docteur Schumpeter," De notre envoye spécial, Vienne, Mai, *Le Temps*, June 2, 1919, translated and quoted in W.F.Stolper, *Joseph Alois Schumpter, The Public Life of a Private Man*(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219.
50. Bauer, *The Austrian Revolution*, 110.
51. Ibid., 257.
52. Schumpeter, *Politische Reden*.
53. Ibid.
54. Francis Oppenheimer to John Maynard Keynes, May 18, 1919, Kings College Archive.
55. Francis Oppenheimer, *The Stranger Within: Autobiographical Pages*(London: Faber, 1960), 369.
56. Bauer, *The Austrian Revolution*.
57. Ibid.
58. Joseph Schumpeter, *Neue Freie Presse*, June 24, 1919, in Klusacek et al., eds., *Dokumentation*.
59. Joseph Schumpeter, *Neue Freie Presse*, June 28, 1919. "Es ist nicht leicht ein Volk zu vernichten. Im allgemeinen ist es sogar unmöglich. Hier haben wir aber einen der seltenen Fälle for uns, wo es möglich ist."
60. Friedrich Wieser, "The Fight Against Famine in Austria," in *Fight the Famine Council,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nference*(London: Swarthmore Press, 1920), 53.
61. Quoted in Stolper, *Joseph Alois Schumpeter*.
62. Richard Kola, *Rückblick ins Gestrige: Erlebtes und Empfundenes*[Looking Back to Yesterday: Experiences and Perceptions] (Vienna: Rikola, 1922).
63. Schumpeter, *Politische Reden*.
64. Somary, *Erinnerungen*.
65. Richard Swedberg, *Joseph A. Schumpeter, His Life and Work*(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91).
66. Ibid., 144—45.
67. Friedrich von Wieser, *Tagebuch*, November 19, 1919: "Es scheint, dass Schumpeter in der Meinung aller Parteien und aller gebildeten Menschen völlig abgewirtschaftet hat. Wie mir Kelsen erzählte, auch unsere jüngeren Nation-

alökonomen, die ihn als ihren Führer betrachteten, sind von ihm abgekommen und geben ihn wissenschafflich auf, es sei nichts mehr von ihm zu erwarten"

68. Eduard Marz, "Joseph Schumpeter as Minister of Finance," in Helmut Frisch, ed., *Schumpeterian Economics*(New York: Praeger, 1981).

第七章　欧洲在奄奄待毙：凯恩斯在凡尔赛

1. Frances Oppenheimer, *The Stranger Within: Autobiographical Pages*(London: Faber, 1960), 374.
2. Lord William Beveridge, *Power and Influence*(New York: Beechhurst Press, 1955), 149—50.
3. David Lloyd George toWoodrow Wilson, April 1919.
4. John Maynard Keynes to Vanessa Bell, March 16, 1919, Keynes Papers, King's College Archive.
5. Harold Nicolson, *Peacemaking 1919: Being Reminiscences of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33), 44.
6. Ibid., 275—76.
7. David Lindsay, *The Crawford Papers: The Journals of David Lindsay, Twenty-seventh Earl of Crawford and Tenth Earl of Balcarres(1871—1940), During the Years 1892 to 1940,* April 9, 1919.
8. Robert Skidelsky, *John Maynard Keynes,* vol.1, *Hopes Betrayed*(New York: Viking, 1986), 304.
9. John Maynard Keynes, "My Early Beliefs," September 9, 1938, *in Essays in Biography*(London: MacMillan St. Martin's Press for the Royal Economic Society, 1972), 436.
10. John Maynard Keynes to Lytton Strachey, November 23, 1905, quoted in Skidelsky, *Keynes*, vol.1, 166.
11. John Maynard Keynes to Lytton Strachey, November 15, 1905, Skidelsky, 165.
12. "A Key for the Prurient: Keynes's Loves, 1901—15," Donald E.Moggridge, *Maynard Keynes: An Economist's Biography* (London: Routledge, 1992), annex 1.
13. C.R.Fay, "The Undergraduate," in Milo Keynes, ed., *Essays on John Maynard Keyne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36.
14. Lionel Robbins, *Autobiography of an Economist*(London: Macmillan, 1971).
15. Winston Churchill to Clementine Churchill, *Speaking for Themselves: The Personal Letters of Winston and Clementine Churchill,* ed. Mary Soames,(London and New York: Doubleday, 1998).
16. Elizabeth Johnson, "Keynes' Attitude Toward Compulsory Military Service," *Economic Journal* 70, no.277(March 1960):160—65.
17. David Lloyd George, *Memoirs of the Peace Conference,* vol.1(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39), 302.

18. William Shakespeare, *A Midsummer Night's Dream*(New York: Palgrave, 2010).
19. Lloyd George, *Memoirs of the Peace Conference,* vol.1, 302.
20. John Maynard Keynes to Florence Keynes, quoted in Skidelsky, *Keynes,* vol.1, *Hopes Betrayed,* 353.
21. John Maynard Keynes to Florence Keynes, Keynes Papers, King's College Archive.
22. Quoted in Macmillan, *Paris 1919,* 60.
23. John Maynard Keynes, "Dr. Melchior: A Defeated Enemy," in *Essays in Biography,* 210.
24. Max Warburg, "Aus Meinem Aufzeichnungen" [From My Records], quoted in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 vol.16, *Activities 1914—1919, The Treasury and Versaille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17.
25. Keynes, "Dr. Melchior," 214.
26. Ibid., 216.
27. Ibid., 218.
28. Ibid., 221.
29. Ibid., 223.
30. George Allerdice Riddell, *Lord Riddell's Intimate Diary of the Peace Conference and After, 1918—1923*(New York: Reynal & Hitchcock, 1924), 30.
31. Keynes, "Dr. Melchior," 231.
32. Thomas W.Lamont, "The Final Reparations Settlement," *Foreign Affairs,* 1930.
33. Nicolson, *Peacemaking 1919,* 86.
34. Peter Rowland, *David Lloyd George*(London: Macmillan, 1975), 485—86.
35. Nicolson, *Peacemaking 1919,* 78.
36. Skidelsky, 367.
37. Jan Smuts, quoted in Skidelsky, *Keynes,* vol.1, *Hopes Betrayed,* 373.
38. *The Memoirs of Herbert Hoover,* vol.1, *Years of Adventure 1874—1920*(New York: Macmillan, 1951), 461—62.
39. John Maynard Keynes to Florence Keynes, in Skidelsky, *Keynes,* vol.1, *Hopes Betrayed,* 371.
40. John Maynard Keynes to Florence Keynes, Keynes Papers, King's College Archive.
41. John Maynard Keynes,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920), 233(note 1).
42. John Maynard Keynes to Duncan Grant, May 14, 1919.
43. Rowland, *David Lloyd George,* 480.

44. John Maynard Keynes to Austin Chamberlain, June 5, 1919.
45. Alec Cairncross, "Austin Robinson" *Economic Journal* 104(July, 1994):903—15.
46. Ibid.
47. Jan Smuts, quoted in Skidelsky, *Keynes,* vol.1, 373.
48. John Maynard Keynes,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London: Macmillan, 1920).
49. Henry Wickham Steed, "A Critic of the Peace," "The Candid Friend at Versailles," "Comfort for Germany," *John Maynard Keynes: Critical Responses,* ed. Charles Robert McCons(London: Taylor and Francis, 1998), 51—60.
50. Quoted in Niall Ferguson, *Paper and Iro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206.
51. Keynes, "Dr. Melchior," 234.
52. Keynes,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39.
53. Lytton Strachey to John Maynard Keynes, quoted in Michael Holroyd, *Lytton Strachey*(London: Heineman, 1978), 374.
54. Austin Chamberlain to Ida Chamberlain.
55. A.J.P.Taylor,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London: Penguin Books, 1964), 26.
56. Paul Mantoux, *The Carthaginian Peace or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Mr. Keyne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57. Wickham Steed, "A Critic of the Peace," "The Candid Friend at Versailles," "Comfort for Germany," *John Maynard Keynes: Critical Responses*(Charles Robert McCann, ed.(London: Taylor & Francis, 1998), 51—60.
58. Thorstein Veblen, "Review of J.M.Keynes'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35(1920):467—72.
59. "Europe a Year Later," *New York Times,* May 16, 1920.
60. "Solution of Europe's Disorder, as Seen by Baruch," *New York Times,* April 20, 1920.
61. Joseph A.Schumpeter,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London: Allen & Unwin, 1954), 39.

第八章　忧郁的街道：熊彼特和哈耶克在维也纳

1. Joseph A.Schumpeter,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215.
2. Ludwig von Mises, "The Austro-Hungarian Empire,"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921.
3. Schober, quoted in F.L.Carsten, *The First Austrian Republic*(Aldershot, UK: Wildwood House, 1986), 41.

4. Ibid., 45.
5. Peter Gay, *Freud: A Life of Our Time*(New York: W.W.Norton and Co., 1988), 386.
6. Ibid., 382.
7. Anna Eisenmenger, *Blockade: The Diary of an Austrian Middle-Class Woman, 1914—1924*(London: Constable Publishers, 1932), 149.
8. Pierre Hamp, *La Peine des Hommes: Les Chercheurs D'Or*[The Pain of Men: The Seekers of Gold], 1920.
9. Quoted in Carsten, *The First Austrian Republic,* 13.
10. Charles A.Gulik, *Austria from Habsburg to Hitler,* vol.1(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48), 248.
11. Eisenmenger, *Blockade,* 149.
12. Ibid.
13. C.A.Macartney, *The Social Revolution in Austria*(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6), 215.
14. Alois Mosser and Alice Teichova, "Investment Behavior of Joint Stock Companies," in *The Role of Banks in the Interwar Economy,* Harold James, Hekan Lindgren, Alice Teichova, ed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127.
15. Quoted in Richard Swedberg, *Joseph A.Schumpeter: His Life and Work*(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91), 68.
16. Quoted in Wolfgang F.Stolper, *Joseph Alois Schumpeter: The Public Life of a Private Man*(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3.
17. Charles A.Gulik, *Austria from Hapsburg to Hitler,* vol.1(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48), 251.
18. Fritz Machlup, *Tribute to Mises, 1881—1973*(Chislehurst, UK: Quadrangle, 1974).
19. "Ships in Fog," a fragment of a novel Schumpeter started in the 1930s, in Swedberg, *Joseph A.Schumpeter,* appendix 2.
20. Thomas K.McCraw, *Prophet of Innovation: Joseph Schumpeter and Creative Destruction*(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140.
21. Quoted in Robert Loring Allen, *Opening Doors: The Life and Work of Joseph A.Schumpeter,* vol.1, *Europe*(New Brunswick, N.J., and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1), 274.
22. Israel Kirzner, "Austrian Economics," lecture at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 July 26, 2004.
23. Joseph A.Schumpeter, *Business Cycles: A Theoretical,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Capitalist Process*(New York: McGraw-Hill Company, 1939).
24. Joseph A.Schumpeter,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Inquiry into*

Profits, Capital, Credit, Interest and the Business Cycle(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34).

25. Ibid.
26. Ibid., 245.
27. Joseph A.Schumpeter, *Essays on Entrepreneurs, Innovations, Business Cycles, and The Evolution of Capitalism,* ed. Richard Clemence(New Yor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51), 71—72.
28. Friedrich A.Hayek, *Hayek on Hayek: An Autobiographical Dialogue,* ed. Stephen Kresge(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29. Fritz Machlup to Barbara Chernow, June 12, 1978.
30. Gulik, *Austria from Hapsburg to Hitler,* vol.1, 134—35.
31. Max Weber, "Der Sozialismus" (1918), in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Soziologie, Economy and Society.*
32. Otto Bauer, "Der Weg zum Sozialismus" [The Way to Socialism], 1921, serialized in *Arbeiter Zeitung,* January 1919.
33. *Hayek on Hayek,* 54—59.
34. Friedrich Hayek, *Austrian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 Monthly,* February 1929.

第九章　无形的思维方式：凯恩斯和费雪在20世纪20年代

1. Irving Fisher, et al, *Report on National Vitality Bulletin 30 of the Committee of One Hundred on Public Health*(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08), 1.
2. Irving Fisher, "Unstable Dollar and the So-called Business Cycl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vol.20, no.150(June, 1925), 179—202.
3. John Maynard Keynes, quoted in Robert Skidelsky, *John Maynard Keynes,* vol.2, *The Economist as Savior, 1920—1937*(London: Macmillan, 1992).
4. Ibid.
5. Peter Clarke, *Keynes; The Rise, Fall, and Return of the 20th Century's Most Influential Economist*(New York: Bloomsbury, 2009).
6. John Maynard Keynes, "Alternative Theories of the Rate of Interest," *Economic Journal* 47(June 1937).
7. John Maynard Keynes, "How Far Are Bankers at Fault for Depressions?," 1913, quoted in Angel N.Rugina, "A Monetary and Economic Dialogue with Lord Keyn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Economics* 28, vol.1, No.2, 200, www.emeraldinsight.com/journals.htm?articleid=1453937&show=html.
8. John Maynard Keynes, *Tract on Monetary Reform,* 1923.
9. Ibid.
10. Quoted in D.E.Moggridge, *Keynes: An Economists' Biography*(London:

Routledge, 1992), 429.

11. John Maynard Keynes, *A Short View of Russia*(London: Hogarth Press, 1925).
12. Ibid.
13. Ibid.
14. Norman and Jean MacKenzie, eds., *The Diary of Beatrice Webb,* vol.4, *1924—1943: The Wheel of Life*(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August 9, 1926).
15. John Maynard Keynes, "My Visit to Berlin,"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 vol.10, 383—84; "Das Ende des Laissez-Faire, Ideen zur Verbindung von Privat und Gemeinwirtschaft" [The End of Laissez-Faire: Ideas for Combining the Private and Public Economy], *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te Staatswissenschaft* 82(1927): 190—91.A review of a lecture given by Keynes in Berlin. In papers: October 1925-June 1926 correspondence, autograph manuscript "My Visit to Berlin," June 23, "The General Strike," June 24, given to Berlin University; Conditions in Germany; Keynes at Melchior's apartment in Berlin for dinner, 1926 visit; source: Felix Somary, *Erinnerungen Aus Meinem Leben,* (Zurich: 1926), 199.
16. *The Letters of Virginia Woolf,* vol.3.
17. John Maynard Keynes addressing the National Liberal Federation, March 27, 1928, quoted in Robert Skidelsky, *John Maynard Keynes,* vol.2, *The Economist as Savior, 1920—1937*(London: Macmillan, 1992), 297.
18. Skidelsky, *Keynes,* vol.2, *The Economist as Savior,* 231.
19. Ibid., 232.
20. Charles Loch Mowat, *Britain Between the Wars, 1918—1940*(London: Methuen and Co., 1956), 262.
21. Skidelsky, *Keynes,* vol.2, *The Economist as Savior,* 258.
22. John Maynard Keynes to H.G.Wells, January 18, 1928.
23. Mowat, *Britain Between the Wars,* 349.
24. Skidelsky, *Keynes,* vol.2, *The Economist as Savior,* 302.
25. Irving Norton Fisher, *My Father: Irving Fisher*(New York: Comet Press, 1956), 171.
26. Alan Milward, *War, Economy and Society, 1939—1945*(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17.
27. Angus Maddison, "Statistics of World Population, GDP, per Capita GDP, 1—2008 AD," www.ggdc.net/maddison/.
28. Joseph Schumpeter, "The Decade of the Twent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46* and "Business Cycle Date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9. Geoffrey Keynes, quoted in D.E.Moggridge, *Maynard Keynes: An Economist's Biography*(London: Routledge, 1992), 103.

30. Irving Norton Fisher, *My Father: Irving Fisher,* 200.
31. Ibid., 232.
32. Ibid., 117—18.
33. Irving Fisher, address to the American Public Health Association, October 23, 1926.
34. Irving Fisher et al., *Report on National Vitality,* bulletin 30 of the Committee of One Hundred on Public Health(Washington, D.C.: GPO, 1908), 1.
35. Irving Fisher, *Stabilizing the Dollar*(New York: Macmillan, 1920), 75.
36. Irving Fisher, *The Purchasing Power of Money: Its Determination and Relation to Credit Interest and Crises*(New York: Macmillan, 1912).
37. Irving Fisher, "Our Unstable Dollar and the So-Called Business Cycl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June 1925): 181.
38. John Maynard Keynes, "Opening remarks: The Galton Lecture" *Eugenics Review,* vol.38, no.1(1946), 39—40.
39. See Robert W.Dimand, "Economists and 'the Other' Before 1912,"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July 2005, http://findarticles.com/p/articles/mi_m0254/is 3_64/ai_n15337798/?tag=content; coll, and *New International Year Book*(New York: Dodd Meade & Co., 1913).
40. Irving Fisher, "Lecture on The Irving Fisher Foundation," *Collected Works,* vol.I(1997), 35.
41. Ibid.
42. Irving Fisher, "Our Unstable Dollar and the So-Called Business Cycle," 197.
43. Irving Fisher, "Depressions and Money Problems," April 4, 1941.
44. Irving Fisher, "I Discovered the Phillips Curve:'A statistical relation between unemployment and price chang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1, no 2; 496—502, reprinted from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1926.
45. Irving Fisher,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 1923.
46. Irving Fisher, "The Unstable Dollar and the So-called Bisiness Cycle" (1925). 179—202.
47. Irving Fisher, "A Statistical Relation Between Unemployment and Price Changes" (1926), 496—502.
48. Ibid.
49. Irving Fisher, *Battle Creek Sanitarium News,* 25, 7, July 1925.
50. Irving Norton Fisher, *My Father: Irving Fisher,* 57.
51. Ibid., 192, from autobiographical appendix in *Stable Money, A History of the Movement.*
52. Jeremy Siegel, *Stocks for the Long Run*(New York: McGraw-Hill, 2008).
53. Irving Norton Fisher, *My Father: Irving Fisher,* 264.
54. *Recent Economic Changes in the United States*(Chicago: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29), xii.
55. "Fisher Sees Stocks Permanently High,"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6, 1929.

第十章 结构性难题：大萧条中的凯恩斯和费雪

1. Arnold J.Toynbe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31, 1.
2. David Fettig, "Something Unanticipated Happened," in *The Region*(Minneapolis: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inneapolis, 2000).
3. John Maynard Keynes to F.C. Scott, August 15, 1934.
4. John Maynard Keynes, "A British View of the Wall Street Slump," *New York Evening Post,* October 25, 1929.
5. Charles A.Selden, "Big British Labor Gains; Third of Vote Counted; Tory Control Seems Lost," *New York Times,* May 31, 1929, 1.
6. Winston Churchill, "Disposal of Surplus," *Hansard 1803—2005,* April 15, 1929, Commons Sitting, Orders of the Day, www.hansard.millbanksystems.com/commons/1929/apr/15/disposal-of-surplus.
7. Lionel Robbins, *Autobiography of an Economist*(London: Macmillan, 1971), 151.
8. John Maynard Keynes to Lydia Keynes, 1929.
9. Joseph J.Thorndike, "Tax Cuts, Confidence, and Presidential Leadership," September 8, 2008, www.taxhistory.org/thp/readings.nsf/.
10. John Maynard Keynes, "The Great Slump of 1930," *The Nation & Athenæum,* December 20, 1930, and December 27, 1930, www.gutenberg.ca/ebooks/keynes-slump/keynes-slump-00-h.html.
11. John Maynard 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book 6, chapter 22, section 3(London: Macmillan, 1936), 322.
12. Keynes, "The Great Slump," *Nation.*
13. Ibid.
14. Godfrey Harold Hardy, "Mathematical Proof," in Raymond George Ayoub, *Musings of the Masters: An Anthology of Mathematical Reflections*(New York: American Mathematical Association, 2004), 59.
15. Keynes, *The Great Slump of 1930.*
16. Robert Skidelsky, *John Maynard Keynes,* vol.2, *The Economist as Savior, 1920—1937*(London: Macmillan, 1992), 333.
17. *Minority Report,* 35, 507n, 657—59, 660, 661, 662.
18. Skidelsky, *Keynes,* vol.2, *The Economist as Savior,* 32.
19. Sir John Anderson to Ramsay MacDonald, July 31, 1930.
20. October 20, 1930.
21. Ross McKibbin, "The Economic Policy of the Second Labour Government, 1929—1931," *Past and Present* 65(1975); 95—123.

22. Skidelsky, *Keynes,* vol.2, *The Economist as Savior,* 524.
23. Irving Fisher, September 2, 1929, quoted in Kathryn M.Dominguez, Ray C.Fair, Matthew D.Shapiro, "Forecasting the Depression: Harvard Versus Yal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8, no.4(September 1988); 607.
24. "Fisher Sees Stocks Permanently High,"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6, 1929, 8.
25. Irving Fisher, January 6, 1930, *Collected Works,* ed. Robert Barber, vol.14, 4.
26. Harvard Economic Society, *Weekly Letter,* vols.8 and 9(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9), quoted in Dominguez et al., "Forecasting the Depression," 606.
27. Irving Fisher, The *Stock Market Crash and After*(New York: Macmillan, 1930).
28. Milton Friedman and Anna Jacobson Schwartz, *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867—1960*(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29. "Scores Coolidge in Market Slump,"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2, 1930.
30. Robert W.Dimond, "Irving Fisher's Monetary Macroeconomics," in *The Economics of Irving Fisher*(London: Elgar, 1999).
31. Irving Norton Fisher, *My Father, Irving Fisher,* 263.
32. "Harvard Group Sees Debt Plan Benefits: Believes Moratorium Will Balance Exchanges and Remove Pressure on Commodities,"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17, 1931, 20; "The 1929 Speculation and Today's Troubles: Controversy as to How Far the 'Great Boom' Caused the Great Depression,"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 1932, 33.
33. Irving Fisher, "The Stock Market Panic in 1929,"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1930.
34. June 22—23, 1931, quoted in Skidelsky, *Keynes,* 391.
35. John Maynard Keynes, typewritten notes, King's College Archive.
36. John Maynard Keynes, discussion leader, typewritten notes, King's College Archive.
37. Bank of England rate of discount, 1836—1939,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Macro Data Base, www.nber.org/databases/macrohistory/rectdata/13/m13013.dat.
38. Irving Fisher to Ramsay MacDonald, December 1931.
39. Vanessa Bell Skidelsky, *Keynes,* vol.2, *The Economist as Savior,* 430.
40. Irving Fisher to Henry Stimson, November 11, 1932, quoted in Fisher, 273.
41. Lauchlin Bernard Currie, *Memorandum Prepared by L.B.Currie, P.T.Ellsworth, and H.D.White*(Cambridge, Mass., 1932), reprinted in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34, no.3(Fall 2002): 533—52.
42. Irving Fisher to Margaret Fisher, quoted in Irving Norton Fisher, *My Father: Irving Fisher,* 267.

43. Walter Lippmann, *Interpretations 1933—1935*(New York: Macmillan, 1936), 15.
44. K.M.Dominguez, R.C.Fair, and M.D.Shapiro, "Forecast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Harvard Versus Yal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8(September, 1988), 595—612.
45. David Fettig, "Something Unanticipated Happened," (Minneapolis Fed, 2000).
46. Irving Fisher, *Booms and Depressions: Some First Principles*(New York: Adelphi, 1932).
47. Irving Fisher, "Cancellation of War Debts," Southwest Foreign Trade Conference Address, July 2, 1931, quoted in Giovanni Pavanelli, "The Great Depression in Irving Fisher's Thought," *Fif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European 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February 2001.
48. Irving Fisher, *The Depression: Causes and Cures*(Miami: Committee of One Hundred, March 1, 1932).
49. "Economists Urge Release of Gold,"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8, 1931.
50.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9, 1931.
51. Irving Fisher, *Booms and Depressions,* viii.
52. R.G.Tugwell, *Brains Trust*(New York: Viking, 1964), 97.
53. Kennedy, *Freedom from Fear,* 113.
54. Tugwell, 98.
55.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Oglethorpe University Commencement Speech,* May 22, 1932, http://georgiainfo.galileo.usg.edu/FDRspeeches.htm.
56.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Address to Commonwealth Club,* September 23, 1932, San Francisco, in *Great Speeches*(New York: Courier Dover, 1999).
57. Kennedy, *Freedom from Fear,* 123.
58. John Maynard Keynes, *The Means to Prosperity*(London: Macmillan, 1933).
59. Irving Fisher, George Warren of Cornell, and John Commons of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to Franklin Roosevelt, February 25, 1933.
60.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31, 1933.
61. Irving Fisher to Irving Norton Fisher, August 15, 1933.
62. Irving Fisher to Margaret Hazard Fisher, quoted in Irving Norton Fisher, *My Father, Irving Fisher.*
63. Skidelsky, *Keynes,* vol.3, 506.
64. Ibid.
65. *The New York Times,* May 29, 1933.
66. D.E.Moggridge, *Maynard Keynes: An Economists' Biography*(London: Routledge, 1992), 584.
67. Irving Fisher to Howe(FDR's secretary), May 18, 1934.
68. Irving Fisher to Margaret Hazard Fisher, June 7, 1934.

69. John Maynard Keyn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33.
70. John Maynard Keynes, *Lecture Notes.*
71. Quoted in Skidelsky, *Keynes,* 503.
72. John Maynard Keynes to George Bernard Shaw, January 1, 1935.
73. Marriner S.Eccles, *Fortune,* April 1937, reproduced in *The Lessons of Monetary Experience: Essays in Honor of Irving Fisher Presented to Him on the Occasion of His 70th Birthday*(New York: Farrar and Rhinehart, 1937), 6.
74. Friedrich Hayek, Austrian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Report, February 1929.
75. Friedrich A.Hayek, interview. *Gold and Silver Newsletter*(Newport Beach, Calif.: Monex International, June, 1976).
76. Lionel Robbins, *The Great Depression,* 1934.
77. Ibid.
78. Robbins, *Autobiography of an Economist,* 154.
79. Skidelsky, *Keynes,* vol.2, *The Economist as Savior,* 469.
80. Beatrice Webb, quoted in José Harris, *William Beveridge: A Biography*(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7), 330.
81. Fritz Machlup to Barbara Chernow, June 12, 1978.
82. John Maynard Keynes "The Pure Theory of Money: A Reply to Dr.Hayek," *Econometrica,* vol.11(November, 1931), 387—97.
83. Alan Ebenstein, *Friedrich Hayek: A Biography*(New York: Palgrave, 2001), 81.
84. Erich Schneider, *Joseph A.Schumpeter: Leben und Werk eines grossen Sozialekonomenen* [Life and Work of a Great Social Scientist].
85. Harold James, *The German Slump: Politics and Economics, 1924—1936*(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6), 6.
86. Joseph Schumpeter, "The Present World Depression: A Tentative Diagnosis," in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Proceedings,* March 31, 1931.
87. Joseph Dorfman, *The Economic Mind in America,* vol.4, 168.
88. Joseph Schumpeter, to Rev. Harry Emerson Fosdick at Riverside Church, April 19, 1933.
89. Douglas V.Brown, *The Economics of the Recovery Program*(New York: McGraw-Hill, 1934), reprinted in Joseph Schumpeter, *Essays: On Entrepreneurs, Innovations, Business Cycles, and the Evolution of Capitalism*(New Yor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89).
90. Joseph Schumpeter, review of Keynes's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December 1936), 791—95.

第十一章 实验：20世纪30年代的比特丽斯·韦伯和琼·罗宾逊

1. Walter Duranty, *New York Times,* July 20, 1931, 1.
2. Beatrice Webb to Arthur Salter, April 12, 1932, Norman and Jeanne MacKenzie, eds., *The Letters of Sidney and Beatrice Webb*(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3. Norman and Jean MacKenzie, eds., *The Diary of Beatrice Webb,* vol.4, *1924—1943: The Wheel of Life*(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September 23, 1931, and October 10, 1931.
4. Ibid.
5. Ibid., 272.
6. Ibid., May 14, 1932.
7. Ibid.
8. Ibid., September 2, 1931.
9. Ibid.
10. Ibid.
11. Walter Duranty,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3, 1932, 1.
12. MacKenzie, *Diary of Beatrice Webb,* vol.4, 299—301, 315, 328(March 29, 1933; March 30, 1933; October 21, 1933; February 22, 1934).
13. Beatrice and Sidney Webb, *Soviet Communism: A New Civilization*(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35), 265.
14. Bertrand Russell, *Autobiography*(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67), 74—75.
15. Robert Conquest, *Reflections on a Ravaged Century*(New York: W.W.Norton and Co., 2001), 148.
16. John Maynard Keynes, *Collected Writings,* vol.23, *Activities 1940—1943*(London: Macmillan, 1979), 5.
17. Malcolm Muggeridge, *Chronicles of Wasted Time,* vol.1, *The Green Stick*(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73), 207.
18. MacKenzie, *Diary of Beatrice Webb,* vol.4, 371(June 19, 1936).
19. John Maynard Keynes to Kingsley Martin, 1937, in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 vol.28, *Social, Political and, Literary Writings*(London: Macmillan, 1928), 72.
20. John Maynard Keynes, quoted in Muggeridge, *Chronicles,* 469.
21. John Maynard Keynes, "Democracy and Efficiency," *New Statesman and Nation,* January 28, 1939.
22. Ibid.
23. Rita McWilliams Tullberg, "Alfred Marshall and Evangelicalism" in Claudio Sardoni, Peter Kriesler, Geoffrey Colin Harcourt, eds., *Keynes, Post Keynesianism and Political Economy*(London: Psychology Press, 1999), 82.

24. Austin Robinson to Joan Robinson, Robinson Papers, Kings College Archive.
25. Major General Sir Edward Speers, "Forward," in Sir Frederick Maurice and Nancy Maurice, *The Maurice Case*(London: Archon Books, 1972), 95—96.
26. Quoted in Marjorie Shepherd Turner, *Joan Robinson and the Americans*(New York: M.E.Sharpe, 1989), 13.
27. Margaret Gardiner, *A Scatter of Memories*(London: Free Association Books, 1988), 65.
28. Interview with Geoffrey Harcourt, Jesus Colleg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2000.
29. Joan Robinson to Richard Kahn, n.d., November 1930.
30. Joan Robinson to Stevie Smith.
31. Ibid.
32. Austin Robinson to Joan Robinson, n.d., April 1926.
33. *Diary of Beatrice Webb.*
34. Dorothy Garratt to Joan Robinson, January 26, 1932.
35. Joan Robinson to Richard Kahn, March 1931.
36. Ibid.
37. Nahid Aslanbeigui and Guy Oakes, *The Provocative Joan Robinson: The Making of a Cambridge Economist*(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9).
38. James Meade, quoted in George R.Feiwell, *Joan Robinson and Modern Economic Theory*(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9), 917.
39. Ibid., 916.
40. Aslanbeigui and Oakes, *The Provocative Joan Robinson.*
41. Joan Robinson to Austin Robinson, October 11, 1932.
42. Joan Robinson to Richard Kahn, Michaelmas term, 1932; Joan Robinson to Austin Robinson, October 11, 1932; Richard Kahn to Joan Robinson.
43. Joan Robinson to Richard Kahn, March 2, 1933.
44. Joan Robinson,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ty of Employment*(London: Macmillan, 1969), xi.
45. Richard Kahn to Joan Robinson, March 1933.
46. Joseph Schumpeter, "Review of Joan Robinson's Theory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34.
47. Dorothy Garratt to Joan Robinson, May 25, 1934.
48. Joan Robinson to Richard Kahn, September 5, 1934.
49. John Maynard Keynes to Richard Kahn, February 19, 1938.
50. Andrew Boyle, *Climate of Treason*(London: Hutchinson, 1979), 63, 453(note 4).
51. Geoffrey Harcourt, "Joan Robinson," *Economic Journal.*
52. Joan Robinson, "Review of *The Nature of the Capitalist Crisis* by John Strachey," *Economic Journal* 46, no.182(June 1936): 298—302.

53. Joan Robinson, "Review of Britain Without Capitalists," *Economic Journal*(December 1936).
54. Taqui Altounyan, *Chimes from a Wooden Bell*(London: I.B.Taurus and Co., 1990) and *In Aleppo Once*(London: John Murray, 1969).
55. Ernest Altounyan to Joan Robinson, May 30, 1936.
56. Agatha Christie, *Murder on the Orient Express*(New York: Collins, 1934), 17.
57. Quoted in Altounyan, *Chimes from a Wooden Bell.*
58. Interview with Frank Hahn, Churchill Colleg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2000.

第十二章 经济学家的战争：凯恩斯与弗里德曼在财政部的较量

1. John Maynard Keynes, *How to Pay for the War* (London: Macmillan, 1940), 17.
2. Friederich von Hayek to Fritz Machlup, October 1940.
3. Robert Skidelsky, *John Maynard Keynes,* vol.3, *Fighting for Freedom, 1937—1946*(New York: Viking, 2001), 51.
4. Friedrich Hayek to Fritz Machlup, March 19, 1934(Machlup Papers, box 43, folder 15).
5. John Maynard Keynes, "Paying for the War I: The Control of Consumption," *Times*(London), November 14, 1939, 9, and "Paying for the War ll: Compulsory Savings," *Times*(London), November 15, 1939, 9.
6. Skidelsky, *Keynes,* vol.3, *Fighting for Freedom,* 142.
7. John Maynard Keynes to F.A.Hayek, guoted in Skidelsky, ibid., 56.
8. John Maynard Keynes to J.T.Sheppard, August 14, 1940.
9. Skidelsky, *Keynes*, vol.3, 179.
10. Winston Churchill to Clementine Churchill, July 18, 1914, in Mary Soames, *Winston and Clementine: The Personal Letters of the Churchills*(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01), 96.
11. John Maynard Keynes to Russell Leffingwell, July 1, 1942.
12. John Maynard Keynes to P.A.S.Hadley, September 10, 1941.
13. "Wheeler Doubts President Will Order Convoys," *Chicago Daily Tribune,* May 10, 1941.
14. Sir John Wheeler Bennet,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4, 1940, 7.
15. Alan Milward, *War, Economy and Society, 1939—1945*(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49.
16. Gerhard L.Weinberg, *A World at Arms: A Global History of World War II*(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David Kennedy, *Freedom from Fear: The American People in Depression and War*(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446.
17. Winston Churchill to Franklin D.Roosevelt, December 7, 1940, Great Britain Diplomatic Files.

18. Franklin D.Roosevelt, press conference, White House, December 17, 1940, http://docs.fdrlibrary.marist.edu/ODLLPc2.html.
19. Ibid.
20. Franklin Roosevelt, "Fireside Chat" radio address, White House, December 29, 1940, http://docs.fdrlibrary.marist.edu/122940.html.
21. Winston S.Churchill to Franklin D.Roosevelt, December 31, 1940, in Martin Gilbert, ed., *The Churchill War Papers*(New York: W.W.Norton and Co., 2000), 3:11.
22. Winston S.Churchill to Sir Kingsley Wood, March 20, 1941, in Gilbert, *The Churchill War Papers,* 3:372.
23. Franklin D.Roosevelt, campaign address, Boston, October 30, 1940, www.presidency.ucsb.edu.
24. Franklin D.Roosevelt, conversation in the Oval Office with unidentified aides, October 4; 1940, White House Office Transcripts, 48—61:1, Franklin D.Roosevelt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Hyde Park, New York, http://docs.fdrlibrary.marist.edu:8000/transcr7.html.
25. Weinberg, *A World at Arms,* 240.
26. John Maynard Keynes, quoted in Skidelsky, *Keynes,* vol.3, *Fighting for Freedom,* 102.
27. Paul A.Samuelson in *The Coming of Keynesianism,* 170.
28. Ibid.
29. Quoted in Skidelsky, *Keynes,* vol.3, *Fighting for Freedom,* 116.
30. John Kenneth 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s.*
31. F.Scott Fitzgerald, *This Side of Paradise*(New York, 1920).
32. Milton Friedman and Rose Friedman, *Two Lucky People*(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33. Ibid.
34. Ibid.
35. Ibid.
36. Herbert Stein, *Presidential Economics: The Making of Economic Policy from Roosevelt to Clinton*(Washington, D.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1994).
37. Friedman and Friedman, *Two Lucky People.*
38. Ibid., 107
39. 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s,* 163.
40. Ibid. Galbraith was assistant, then deputy, chief of the Price Division. Richard Gilbert, George Stigler, Walter Salant, and Herbert Stein belonged to OPA's economics staff.
41. Quoted in ibid., 133.The General Maximum Price Regulation of 1942 went into effect on April 28.

42. Friedman and Friedman, *Two Lucky People*, 113. See also Milton Friedman and Walter Sala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32(June 1942); 308—20; Milton Friedman, "The Spendings Tax as a Wartime Fiscal Measur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March 1943): 50—62.
43. Friedman and Friedman, *Two Lucky People.*
44. Ibid., 113
45. Ibid.
46. Withholding was first imposed on 1943 income, but the Ruml Plan, the subject of the 1942 debate, called for it to be imposed on 1942 income. The Revenue Act of 1942 passed on October 21, 1942; the Current Tax Payment Act of 1943, on June 9, 1943.
47. Friedman and Friedman, *Two Lucky People.*
48. Ibid., 116.
49. Isaiah Berlin, March 3, 1942, *Washington Dispatches,* 25.
50. Ibid.
51. Herbert Stein, *Presidential Economics,* 68.

第十三章　流亡：二战中的熊彼特与哈耶克

1. Friedrich Hayek, *The Road to Serfdo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4).
2. Joseph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New York: Harper and Co., 1942).
3. Ibid.
4. Joseph Schumpeter to Irving Fisher, February 18, 1946.
5. Joseph Schumpeter, Diary, October 30, 1942.
6. John Hicks, "The Hayek Story," in *Critical Essays in Monetary Theory*(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7. Friedrich Hayek to Fritz Machlup, January 1935.
8. Friedrich Hayek to Fritz Machlup, May 1, 1936.
9. Friedrich Hayek to Fritz Machlup.
10. Friedrich Hayek to Lord Macmillan, September 9, 1939.
11. Friedrich Hayek to Fritz Machlup, June 21, 1940.
12. Friedrich Hayek to Alvin Johnson, August 8, 1940.
13. Friedrich Hayek to Alfred Schutz, September 26, 1943.
14. Friedrich Hayek to Fritz Machlup.
15. Friedrich Hayek to Fritz Machlup, June 21, 1940.
16. Friedrich Hayek to Herbert Furth, January 27, 1941.
17. Friedrich Hayek to Fritz Machlup, January 2, 1941.
18. Friedrich Hayek to Fritz Machlup.

19. Friedrich Hayek to Fritz Machlup, July 31, 1941.
20. Friedrich Hayek, *The Road to Serfdom.*
21. Ibid.
22. Ibid., 135.
23. Friedrich Hayek, "The Road to Serfdom: Address Before the Economic Club of Detroit, April 23, 1945," typescript, Hoover Institution.
24. Quoted in Fritz Machlup to Friedrich Hayek, January 21, 1943.
25. Ordway Tead to Fritz Machlup, September 25, 1943.

第三幕　信心

序幕　无所畏惧

1. James MacGregor Burns, *Roosevelt: The Soldier of Freedom, 1940—1945*(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0), 424.
2.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Economic Bill of Rights,"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January 11, 1944, transcript, Franklin D. Roosevelt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Hyde Park, New York, http://www.fdrlibrary.marist.edu/archives/stateoftheunion.html.
3. Ibid.
4. James McGregor Burns, *Roosevelt: The Soldier of Freedom*, vol. 2(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0), 426.
5. John Maynard Keynes to Sir J. Anderson, August 10, 1944, quoted in Robert Jacob Alexander Sidelsky, *John Maynard Keynes*, vol. 3, Fighting for Freedom(New York: Viking Press, 2001), 360.
6. Gunnar Myrdal, "Is American Business Deluding Itself?" *Atlantic Monthly*(November 1944), 51—58.
7. Roosevelt,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January 11, 1944.
8. Ibid.
9. Alvin H. Hansen, "The Postwar Economy," in Seymour E.Harris, ed., *Post-war Economic Problems*(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43), 12.
10. Paul A. Samuelson, "Full Employment After the War, in Harris," *Postwar Economic Problems*, 27, 52.
11. Joseph A. Schumpeter, "Capitalism in the Postwar World," in Harris, *Postwar Economic Problems*, 120—121.
12. Ibid.
13. Roosevelt,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January 11, 1944.
14. Myrdal, "Is American Business Deluding Itself?"
15. George Orwell, *Nineteen Eighty-Four*(London: Penguin Classics, 2009), 231.
16. Roosevelt,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January 11, 1944.
17. John Lewis Gaddis, *The Cold War: A New History*(New York: Penguin, 2006), 14.

18. John Maynard 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1936; repr. London: MacMillan & Co., 1954), 383—384.

第十四章 过去与未来：凯恩斯在布雷顿森林

1. FDR, Message to Delegates at Bretton Woods, July 1944.
2. John Maynard Keynes to Florence Keynes, June 28, 1944.
3. Robert Skidelsky, *John Maynard Keynes*, vol. 3, *Fighting for Freedom 1937—1946*(New York: Viking, 2000), 343.
4. John Maynard Keynes to Friedrich Hayek, July 1944.
5. John Maynard Keynes, "My Early Beliefs" in *Essays in Biography*.
6. Lionel Robbins, *Autobiography of an Economist*(London: Macmillan, 1976).
7. John Maynard Keynes to Friedrich Hayek, July 1944.
8. Lydia Keynes quoted in Liaquat Ahmed, *Lords of Finance: The Bankers Who Broke the World*(New York: Penguin, 2009).
9. Cordell Hull, *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New York: Macmillan, 1948), 1:81.
10. Papers of Harry Dexter White, Princeton University Archive.
11. Skidelsky, *Keynes*, vol. 3, *Fighting for Freedom*, 348.
12. Ibid.
13. Ibid.

第十五章 来自奴役之路：哈耶克与德国奇迹

1. George Orwell, review of *The Road to Serfdom*(1944).
2. Isaiah Berlin, March 31, 1945, *Washington Despatches, 1941—1945: Weekly Political Reports from the British Embassy*(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
3. Berlin, *Despatches*, May 6, 1945.
4. Berlin, *Despatches*, June 10, 1945.
5. Friedrich Hayek to Fritz Machlup, and *Message to Congress on the Concentration of Economic Power*, April 29, 1938.
6. Marquis Childs. "Washington Calling: Hayek's 'Free Trade,'" *Washington Post*, June 6, 1945, http://www.proquest.com.ezproxy.cul.columbia.edu/(accessed February 10, 2011).
7. George Kennan, *Memoirs 1925—1950*(New York: Atlantic Monthly Press, 1967), 292.
8. Friedrich Hayek to Lydia Keynes, April 21, 1946.
9. Harry S.Truman, March 12, 1947, transcript of the Truman Doctrine(1947), http: //www.ourdocuments.gov/; Robert A.Pollard, *Economic Securit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1945—1950*(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5), 123, http: //questia.com.

10. Friedrich Hayek, "Opening address to a conference at Mont Pelerin," 1947, P.G.Klein, e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F.A.Hayek, Volume IV: The Fortunes of Liberalism,* (Chicago, Il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238.
11. Friedrich A.Hayek, *Nobel Prize Winning Economist Friedrich A.von Hayek*(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 Oral History Program, 1983), http: //www.archive.org/stream/nobelprizewinnin00haye#page/n11/mode/2up.
12. *Statement of Aims,* Mont Pelerin Society, https://www.montpelerin.org/montpelerin/mpsGoals.html.
13. Orson Welles's contribution to *The Third Man,* 1949 in Robert Andrews, *The Columbia Dictionary of Quot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888.
14. Quoted in Kurt R.Leube, "Hayek in War and Peace," *Hoover Digest,* no.1, 2006.
15. Ray Monk, *Wittgenstein: The Duty of Genius*(New York: Penguin Books), 518.
16. Friedrich Hayek, *Hayek on Hayek: An Autobiographical Dialog,* Stephen Kresge,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105—6.
17. Austin Robinson, *First Sight of Postwar Germany, May-June, 1945*(Cambridge: The Canteloupe Press, 1986).
18. Ibid.
19. John Maynard Keynes to Austin Robinson, June, 1945.
20. Ludwig Erhard, *Germany's Comeback in the World Market*(New York: Macmillan, 1954).

第十六章　统治的工具：萨缪尔森到了华盛顿

1. Quoted in Philip Saunders and William Walstead, *The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Course*(New York: McGraw-Hill, 1990), ix.
2. Paul A.Samuelson, *The Samuelson Sampler*(Glen Ridge, N.J: Thomas Horton & Co., 1973), vii.
3. Paul A.Samuelson with Everett Hagen, "Studies in Wartime Planning for Continuing Full Employment"(Washington, D.C.: National Resources Planning Board, 1944); Paul A.Samuelson et al., *After the War 1918—1920*(Washington, D.C.: National Resources Planning Board, 1943); and Paul A.Samuelson et al, (Washington, D.C.: National Resources Planning Board, 1942).
4. Paul Samuelson, Godkin Lecture I.
5. Alan Millward, *War, Economy and Society, 1939—1945*(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6. Will Lissner,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3, 1944, 23.

7. Paul Samuelson, "Unemployment Ahead and the Coming Economic Crisis," *New Republic*, September, 1944.
8. Quoted in Polenberg, 94.
9. Interview, Paul Samuelson.
10. Paul A.Samuelson and William Nordhaus, *Economics: The Original 1948 Edition,* 573.
11. Robert Summers, father of Lawrence Summers. He and Harold Samuelson, Paul Samuelson's older brother, changed their names to "Summers" in an attempt to avoid anti-Semitism.
12. Florence Wieman, South Chicago, *The Scroll*, May, 1930.
13. Paul A.Samuelson, "Reflections on the Great Depression," typescript.
14. Ibid., p.58.
15. Paul A.Samuelson, "How Foundations Came To B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98), 1376.
16. Tsuru Shigeto, "Reminiscences of Our 'Sacred Decade of Twenties,'" *The American Economist*(Fall 2007).
17. Samuelson, "Reflections on the Great Depression."
18. Herbert Stein, *Presidential Economics*.
19. Paul A.Samuelson, interview.
20. Joseph Schumpeter to Paul A.Samuelson, November 3, 1947.
21. Robert Maynard Hutchins, quoted in David Kennedy, *Freedom from Fear: The American People in Depression and War*(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22. Paul A.Samuelson to F.Wheeler Loomis, director, M.I.T.Radiation Laboratory, April 26, 1945.
23. Kenneth Elzinga, "The Eleven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Southern Economic Review*(April 1992).
24. Stanley Fisher, interview with Paul A.Samuelson, typescript transcript.
25. William F.Buckley, *God and Man at Yale*(Washington, D.C.: Regnery Gateway, 1951).
26. Ibid., 49.
27. Ibid., 60.
28. Ibid., 81.
29. Paul A.Samuelson, *Economics*(New York: McGraw-Hill, 1948), 412.
30. Ibid., 434.
31. Ibid., 152.
32. Ibid., 380.
33. Ibid., 433.
34. Ibid., 3.

35. Ibid., 584.
36. Paul A.Samuelson, *Economics*, 4th ed.(New York: McGraw-Hill), 209—210.
37. Samuelson, *Economics*, 1st ed., 607.
38. Ibid., 271.
39. Ibid.

第十七章　巨大的幻觉：罗宾逊在莫斯科

1 Joan Robinson, lecture, Cambridge University, quoted in Harry G.Johnson, *On Economics and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110.
2. Joan Robinson, *Conference Sketch Book, Moscow, April 1952*(Cambridge: W.Heffer and Sons, 1952), 19.
3 Ibid., 6, 21, 23—24.
4. Alec Cairncross, "The Moscow Economic Conference," *Soviet Studies* 4, no.2(October 1952), 114.
5. Robinson, *Conference Sketch Book,* 5.
6. Robinson, *Conference Sketch Book,* 7—8; Cairncross, "The Moscow Economic Conference," 119.
7. Robinson, *Conference Sketch Book,* 23.
8. "Russia: Two Faces West," *Time,* April l4, 1952.
9. Robinson, *Conference Sketch Book*, 11.
10. Committee for the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nference in Moscow April 3—12,* 1952(Moscow, 1952); Oleg Hoeffding, "East-West Trade Possibilities: An Appraisal of the Moscow Economic Conference," *American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1953; Richard B.Day, *Cold War Capitalism: The View from Moscow, 1945—1975*(Armonk, NY: M.E.Sharpe, 1995), 79.
11. Committee for the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nference*, 85.
12. Robinson, *Conference Sketch Book,* 28.
13. Ibid.
14. Ibid., 3, 5.
15. Joan Robinson to Richard Kahn, April 4, 1952, Papers of Richard Ferdinand Kahn, RFK/13/90/5, King's Colleg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16. Paul Samuelson, "Remembering Joan, " in G.R.Feiwell, ed., *Joan Robinson and Modern Economic Theory*(London: Macmillan, 1989), 135.
17. Paul Preston, Michael Partridge, and Piers Ludlow,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Lexis Nexis, 2006).
18. Cairncross, "The Moscow Economic Conference," 113, 118.

19. *Economic Problems of Socialism in the U.S.S.R.*(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52), 26, 30. Stalin's "Remarks on Economic Questions in Connection with Discussion of November 1951" were distributed around February 7, 1952, to Central Committee members working on Stalin's textbook on Soviet economic theory. "Remarks" was published later that year as *Economic Problems.*
20. John Lewis Gaddis, *We Now Know: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A, 1997), 195.
21. Stalin, *Economic Problems of Socialism,* 27.
22. Richard B.Day, *Cold War Capitalism: The View from Moscow, 1945—1975*(Armonk, NY: M.E.Sharpe, 1995), 76.
23. Ethan Pollock, "Conversations with Stalin on Questions of Political Economy," July 2001, Working Paper No.33,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http://www.wilsoncenter.org/topics/pubs/ACFB07.pdf.
24. Robinson, *Conference Sketch Book.*
25. Geoffrey Colin Harcourt, "Some Reflections on Joan Robinson's Changes of Mind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Post-Keynesianism and the Economics Profession," in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Post-Keynesianism: Selected Essays of George Harcourt*(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1995), 111.
26. Joan Robinson, *The Problem of Full Employment: An Outline for Study Circles*(London: Workers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1943).
27. Stephen Brooke, "Revisionists and Fundamentalists: The Labour Party and Economic Policy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Historical Journal*(March 1989), 158.
28. Elizabeth Durbin, *New Jerusalems: The Labour Party and the Economics of Democratic Socialism*(London: Routledge and Keegan Paul, 1985), 164.
29. Quoted in C.W.Guillebaud, "Review of Joan Robinson, *Private Enterprise or Public Control: Handbook for Discussion Groups," Economica* 10, no.39(August 1943), 265.
30. J.E.King, "Planning for Abundance: Joan Robinson and Nicholas Kaldor, 1942—1945," in European 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Political Events and Economic Ideas*(London: Elgar), 307.
31. Jonathan Schneer, "Hopes Deferred or Shattered: The British Labour Left and the Third Force Movement, 1945—1949,"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June 1984), 197.
32. Joseph Stalin, *Meeting Between Comrades Stalin and H.Pollitt 31st May 1950,* transcript, Russian State Archive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4.
33. Eric Shaw, *Discipline and Discord in the Labour Party*(Manchester, UK: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Press, 1988).

34. Harold Laski, *The Secret Battalion,* a 1946 pamphlet defending the Labour Party's rejec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s application for affiliation.
35. Joan Robinson, "Preparation for War," *Cambridge Today,* October 1951, reprinted in *Monthly Review*, no 2(1951), 194—95.
36. Richard Gardner, *Sterling Dollar Diplomacy: Anglo-American Collaboration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Multilateral Trode*(London: Clarendon, 1956), 298.
37. Schneer, "Hopes Deferred or Shattered."
38. Joan Robinson, BBC, *London Forum,* June 25, 1947, quoted, ibid., 221.
39. "Why the CP Says Reject the Marshall Plan," July 5, 1947, quoted in Keith Laybourn, *Marxism in Britain: Dissent, Decline and Re-emergence, 1945—c.2000*(New York: Taylor and Francis, 2006), 35.
40. Robert Solow, quoted in Marjorie Shepherd Turner, *Joan Robinson and the Americans*(Armonk, NY: M.E.Sharpe, 1989), 143.
41. Joan Robinson to Richard Kahn, King's College Archive.
42. Christopher Andrew, *Defend the Realm: The Authorized History of MI5*(New York: Alfred A.Knopf, 2009), 400; Marjorie S.Turner, *Joan Robinson and the Americans,* 86; Percy Timberlake, *The 48 Group: The Story of the Icebreakers in China*(London: 48 Group Club, 1994).
43. Milton Friedman and Rose Friedman, *Two Lucky People: Memoirs*(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245—46.
44. Robert Clower, quoted in Turner, *Joan Robinson and the Americans,* 133.
45. Alvin L.Marty, "A Reminiscence of Joan Robinson,"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Newsletter,*(October 1991), 5—8.
46. Arthur Pigou to John Maynard Keynes, June 1940, King's College Archive.
47. Michael Straight, quoted in Turner, *Joan Robinson and the Americans,* 56.
48. Brian Loasby, "Joan Robinson's Wrong Turning," in Ingrid H.Rima, ed., *The Joan Robinson Legacy*(London: M.E.Sharpe, 1991), 34.
49. Joan Robinson, "Mr.Harrod's Dynamics," *Economic Journal*(March 1949), 81.
50. Joan Robinson, "Review of Joseph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 Economic Journal,* 1943.
51. Sidney Hook, "Review of Rosa Luxemburg,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with a Preface by Joan Robinson,"* 1951,
52. Joan Robinson,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London: MacMillan, 1956).
53. Roy Forbes Harrod, *Towards a Dynamic Economics*(London: Macmillan, 1948).
54. Robinson, "Mr.Harrod's Dynamics," 85.
55. Joan Robinson, "Model of an Expanding Economy," *Economic Journal*(March 1952).

56. Joan Robinson, *Letters from a Visitor to China*(Cambridge: Students' Bookshop, 1954), 8.
57. Joan Robinson, "Has Capitalism Changed?" *Monthly Review,* 1961.
58. Samuelson, "Remembering Joan," 121—43.
59. Stanislaw H.Wellisz, review,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40, no.1(February 1958):87—88.
60. Elizabeth S.Johnson and Harry G.Johnson, *The Legacy of Keynes*(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78).
61. Samuelson, "Remembering Joan."
62. Abba Lerner,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September 1957):693, 699.
63. L.R.Klein,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by Joan Robinson," *Econometrica* 26, no.4(October 1958), 622, 624.
64. Robert Solow, "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39, no.3(August 1957); 320; and Robert Solow, quoted in Turner, *Joan Robinson,* 143.
65. Joan Robinson, *Private Enterprise or Public Control*(London: English University Press Ltd.), 13—14.
66. Quoted in Jason Becker, *Hungry Ghosts: Mao's Secret Famine*(London: Macmillan, 1998), 292.
67. George J.Stigler, review of *Economic Philosophy* by Joan Robinson,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1, no.2(April 1963), 192—93(emphasis added).

第十八章 命运之约：森在加尔各答与剑桥

1. Amartya Sen, *Development as Freedom*(New York: Alfred A.Knopf, 1999), 36.
2. Sankar Ray, "The Third World Apologist Finally Strikes," *Calcutta Online,* October 15, 1998, http://www.nd.edu/~kmukhopa/cal300/sen/artl014m.htm.
3. 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 "The Prize in Economics 1998—Press Release," news release, October 14, 1998,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1998/press.html.
4. John B. Seely, *The Road Book of India*(London: J.M.Richardson and G.B.Whittaker, 1825), 12: "Dacca ... is celebrated for the manufacture of the finest and most beautiful muslins." Muslin was a favorite topic of Jane Austen's letters to her sister Cassandra. In *Northanger Abbey*(1818), a potential suitor wows a chaperone with the "prodigious bargain" he got on a gown for his sister made of "true Indian muslin."
5. William Sproston Caine, *Picturesque India: A Handbook for European Travellers*(London:George Routledge and Sons Limited, 1891), 367.

6. Amartya Sen, interview by the author. Except where otherwise noted, quotes of Mr.Sen are from discussions and interviews with the author.
7. Archibald Percivel Wavell to Winston Churchill, telegram, February 1944, in Penderel Moon, ed., *Wavell: The Viceroy's Journal*(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54.
8. Amartya Sen, "Autobiography,"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1998/sen-autobio.html.
9. Ibid.
10. Amita Sen, interview by the author.
11. Indira Gandi, *Selected Speeches and Writings of Indira Gandi,* vol. 5, *January 1, 1982—October 30, 1984*(Delhi: Publications Division,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Broadcasting, Government of India, 1986), 457.
12. Arjo Klamer, "A Conversation with Amartya Se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3, no.1(Winter 1989), 148.
13. Jean Drèze and Amartya Sen, *India, Development and Politic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3.
14. Amartya Sen, "The Impossibility of a Paretian Libera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8(1970): 152—57.
15. Drèze and Sen, *India, Development and Politics,* 2.
16.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accessed April 13, 2011),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

尾声　想象未来

1. John Maynard 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36), 383.
2. Robert Solow, "Faith, Hope and Clarity" in David Colander and Alfred William Coats, eds., *The Spread of Economic Ideas* (Cambridge, Ma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37.

封面
书名
版权
目录
前言 十分之九的人类
第一幕 希望
序幕 好好先生与守财奴
第一章 焕然一新：恩格斯和马克思在神奇年代
第二章 无产阶级的存在是必然的吗？马歇尔的守护神
第三章 波特女士的职业：韦伯夫妇和家务管理型国家
第四章 黄金交叉：费雪与货币错觉
第五章 创造性的破坏：熊彼特与经济演变
第二幕 恐惧
序幕 世界的战争
第六章 人类的末日：熊彼特在维也纳
第七章 欧洲奄奄待毙：凯恩斯在凡尔赛
第八章 忧郁的街道：熊彼特和哈耶克在维也纳
第九章 无形的思维方式：凯恩斯和费雪在20世纪20年代
第十章 结构性难题：大萧条中的凯恩斯和费雪
第十一章 实验：20世纪30年代的比特丽斯·韦伯和琼·罗宾逊
第十二章 经济学家的战争：凯恩斯与弗里德曼在财政部的较量
第十三章 流亡：二战中的熊彼特与哈耶克
第三幕 信心
序幕 无所畏惧
第十四章 过去与未来：凯恩斯在布雷顿森林
第十五章 来自奴役之路：哈耶克与德国奇迹
第十六章 统治的工具：萨缪尔森到了华盛顿
第十七章 巨大的幻觉：罗宾逊在莫斯科
第十八章 命运之约：森在加尔各答与剑桥
尾声 想象未来
鸣谢
注释
图片来源